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5](#_Toc54534190)

[導讀 沉默的記憶 6](#_Toc54534191)

[引言 23](#_Toc54534192)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29](#_Toc54534193)

[第二章 大轉變（1928—1932） 69](#_Toc54534194)

[第三章 對幸福的追求（1932—1936） 105](#_Toc54534195)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151](#_Toc54534196)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194](#_Toc54534197)

[第六章 “等著我吧”（1941—1945） 232](#_Toc54534198)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5—1953） 271](#_Toc54534199)

[第八章 歸來（1953—1956） 312](#_Toc5453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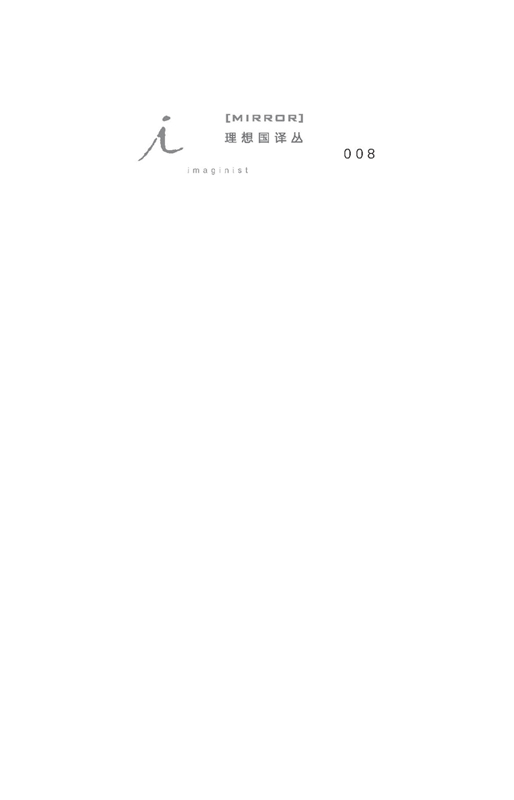
[第九章 記憶（1956—2006） 346](#_Toc54534201)

[后記及致謝 380](#_Toc54534202)

[[注釋] 384](#_Toc54534203)

[[資料來源] 426](#_Toc54534204)

[[譯名對照表] 438](#_Toc54534205)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沉默的記憶

許知遠

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曾相信蘇聯帝國將存續上千年。不過，她仍寫下了兩卷、超過1500頁的回憶錄。其中有關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回憶，也有對自己日常生活掙扎的記錄。

既然上千年都無法讓人讀到，回憶與書寫就變成了一種自我治療，她可以用此來回避與對抗這壓抑、殘酷、粗糙的現實，確認自身的存在。

談起蘇聯時代的生活，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布羅茨基總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們象征了最值得贊嘆的人類精神——即使你身處最可怕的環境，仍能誠實地面對自身的經驗、堅持內心價值。

但在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語者》（The Whisperers）中，你讀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書的“導言”中，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引用到安東尼娜·戈洛溫娜的故事。她不是選擇記住，而是主動埋葬了自己的過去。作為一個“富農”之女，她在親人的死亡、饑餓、流放中度過童年。18歲時，她作出了一個大膽決定，她隱瞞了自己的出身，偽造了文件，成功地進入了一所醫學院。在接下來的40多年里，她進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爾什維克（盡管這個政黨讓她家破人亡），積極地工作與生活，誰也看不出她的過去，不僅同事與朋友不了解她的過去，甚至兩任丈夫也都一無所知。

大約5年前的冬日，我幾乎同時讀到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的《希望對抗希望》與這本《耳語者》。那時，我正著迷于蘇聯與納粹德國歷史，尤其是社會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個黑白顛倒的時代，人們該怎樣度過這漫漫長夜。在劍橋的書店里，德國與俄國題材的書籍常占據著顯著的位置，似乎代表著這個熱衷于經驗與常識的國家對這兩個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別興趣。而對我來說，這些“非理性”不僅是出于興趣，也是對我自身困惑的回應。

倘若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愛與勇氣，安東尼娜·戈洛溫娜的遭遇似乎更讓我接近歷史的普遍經驗。在《耳語者》中，有很多這樣的例證。在俄國的著名人權組織Memorial的協助下，奧蘭多·費吉斯收集到數百份家庭檔案，它們既包括信件、日記、回憶錄，也有照片、實物，作者還對經歷者進行了大量采訪。它們構造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道德與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論都更好地解釋了極權主義的運轉，與人們面對悲劇時活下去的欲望。

奧蘭多·費吉斯將焦點集中于斯大林時代，它既是一個全面控制時代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通過這許多的個人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臺龐大的蘇維埃機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會、家庭、個人，讓人們拋棄所有熟悉的思維與習慣，讓原本的多元豐富變得單一、匱乏。

在一開始，蘇維埃信仰是充滿誘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們投身其中，感覺到一種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歷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這個新宗教不僅準備引領你的靈魂，還準備摧毀你的任何其他選擇，除了跟隨它，你毫無選擇。

家庭不再重要了，蘇維埃比父母更重要，為了蘇維埃，你還可以隨時背叛父母。貴族的遺產，資產階級的商鋪，農民的土地，藝術家的自由創作，都不再屬于個人，它們都被收歸國有。國家給你提供一切，從公共宿舍、集體農莊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試圖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機器。在斯大林的指揮下，這個機器不僅碾平哪怕最輕微的不服從者，也同樣令他自己身邊的革命者殞命。

接下來，蘇維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漸退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龐大官僚體系維持的系統。它也對個人做出了少許讓步，允許你維持一些個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習慣與消費口味，但蘇維埃隨時有權力干預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黨報《女工》這樣寫道：“黨不干預共產黨人的日常瑣事，也不為之設立標準。它并不要求每一位黨員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為規則，只要求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以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重。”

這種矛盾最終導致了一個極度虛偽的社會的誕生。它在蘇聯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了頂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懼減弱卻仍舊普遍存在，人們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義中，這樣的社會私欲高漲、犬儒盛行。

不過，你實在不能指責這些普通人。面對如此的恐懼記憶與現實的壓迫，倘若你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學會自我調整。倘若極權主義是建立于個人意義消失之上的，普通個體就要主動忘記構成個人意義的來源——你的家庭傳統、你的獨立思考、你對未來的想象，你就必須壓制這一切。唯有讓自己符合黨的規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黨的路線也是隨時變化的，斯大林與列寧不同，赫魯曉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這劇烈的轉變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須既謹慎——嚴格壓制自己的真實想法、緊跟路線，又遲鈍——讓內心的道德、不安的聲音徹底沉睡。當時的流行說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沒人能保持絕對的沉默，于是在這樣的系統中，每個人都成為了“耳語者”。你或者對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說出自己的感受，還有人成為了告密者，他們成了某種秘密警察。他們變成了特殊的“蘇維埃人”，一種因極權統治而被徹底扭曲的人群。他們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

奧蘭多·費吉斯用很多生動的例證來展示這種轉變的掙扎。當然，這些故事不僅有掙扎，更有主動的合作。主動成為一名合作者與加害者，意味著你更安全，減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幾率。

幸好曼德爾施塔姆夫人的預言不準確，這個政權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沒有看到這一天。她的回憶錄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最終都獲得出版，他們是英雄。但同時，一股記憶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時代的暴行被不斷揭露出來，普通人也開始起身控訴——記憶可以被一時壓制，卻不會徹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這股集體記憶轉化成了巨大的歷史力量，集體回憶造就出一個共同體，緩解了個體的恐懼，它也使蘇聯的合法性徹底消失。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說得沒錯，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不在于國家結構，也不是領袖崇拜，而是“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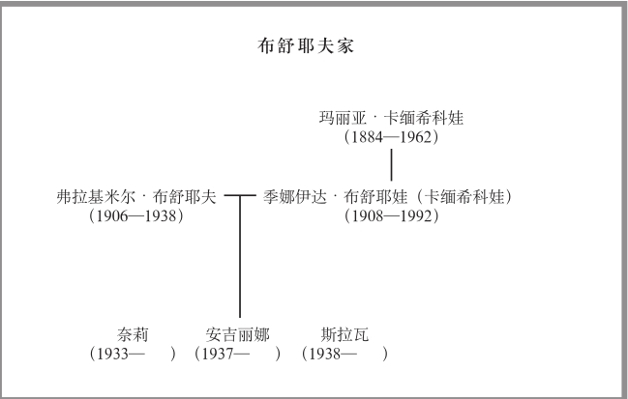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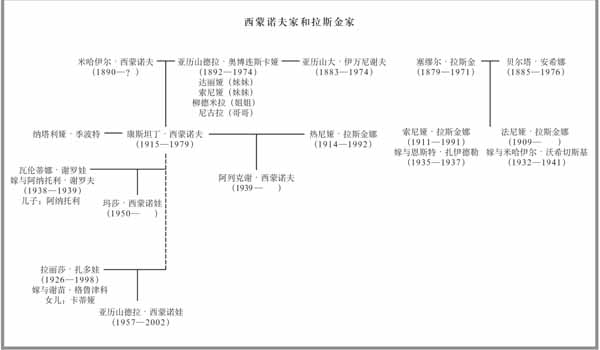
但這記憶也注定是褊狹與膚淺的。它僅僅演變成一樁黑白分明的道德劇，其中更細微與深層的描述、分析尚未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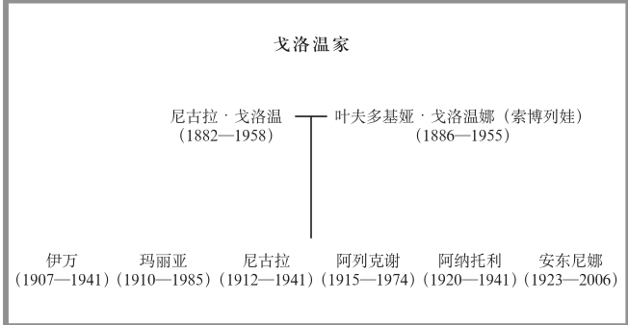
感謝奧蘭多·費吉斯的努力，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重新敘述了這些故事。所有對極權社會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會是個多么艱難的過程。在這樣的社會，盡管人們遭遇了巨大的痛苦與折磨，親歷者卻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們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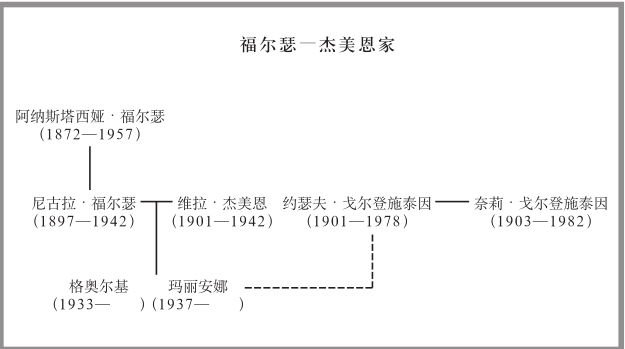
奧蘭多·費吉斯很可能是當今俄國歷史研究的首席權威（至少在英語世界），將近20年來，他對俄國的近代歷史作出了各種探究。與冷戰時代的蘇聯學家不同，他的興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結構，而在于文化、社會心理、個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準確地抓住了極權主義的本質——它首先是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體制，它以崇高的價值與道德誘惑人，而靠使人喪失價值與道德來維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遺癥尤其嚴重，需要更長的時間與努力來修復。普京的再度上臺、他的強硬姿態，再度證明“潛入內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爾還有局部復活的沖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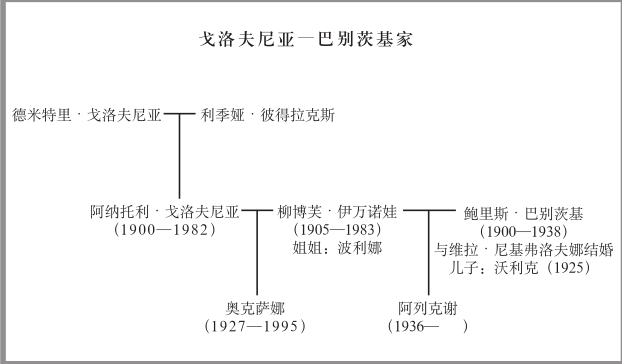
獻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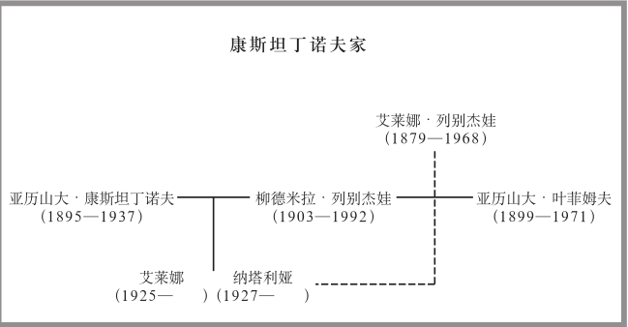
我的母親伊娃·費吉斯，以及我們消逝的家族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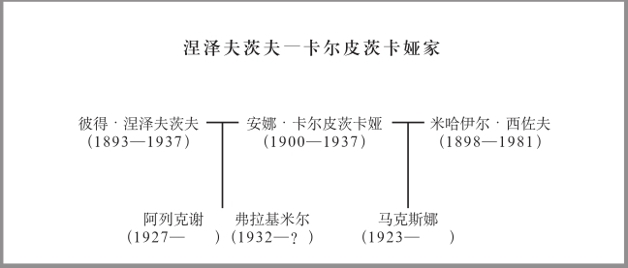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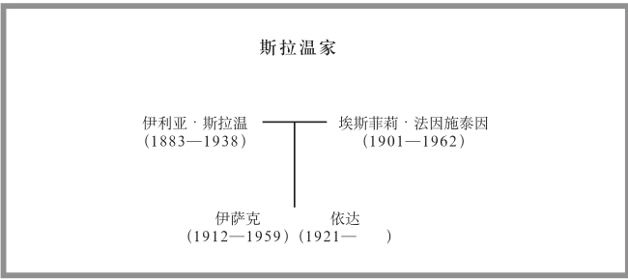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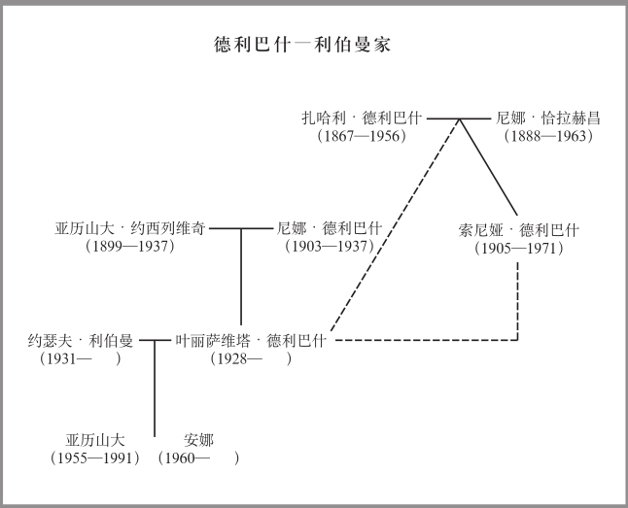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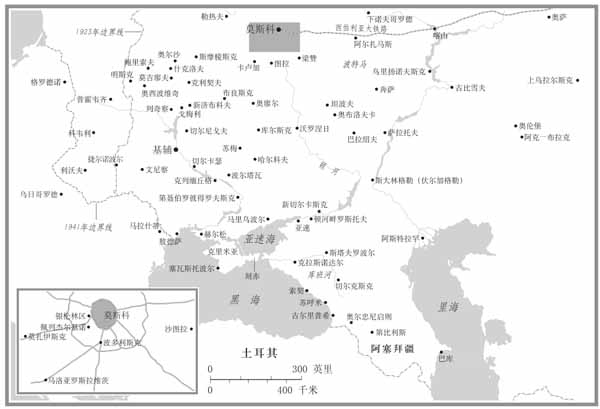








北歐地區蘇聯相關地點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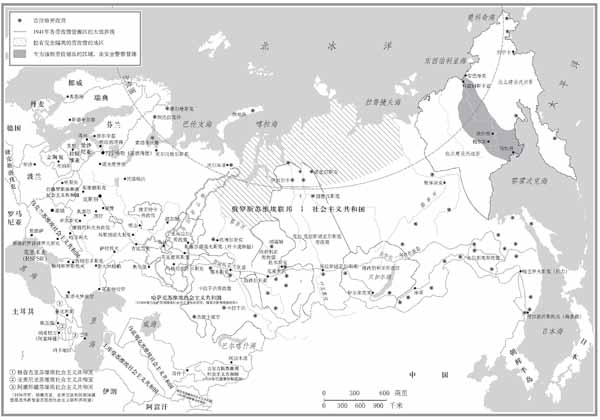
南歐地區蘇聯相關地點示意圖



西伯利亞西部和中部相關地點示意圖



西伯利亞東部地區相關地點示意圖



斯大林時期蘇聯相關地點示意圖

# 引言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8歲時，與母親和兩個弟弟一起，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父親在俄羅斯北部的農莊集體化運動中，作為“富農”被捕，被送去勞改營3年，家里的財產、農具、牲畜都歸了集體農莊。母親僅得一小時時間來準備長途旅行的行裝，戈洛溫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鳥獸散。安東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媽以及表親們，四下逃竄，試圖躲過此劫。但到最后，多數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勞改營，其中多人從此銷聲匿跡。

安東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個伐木營地，沿河設置了5座木結構營房，安置了1000名“富農”和他們的家人。第一個冬天，大雪壓垮其中的兩座營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凍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斷交通，沒有糧食補給，人們只得依靠隨身從家鄉帶來的干糧。多人死于饑餓、嚴寒、傷寒，尸體多得無法全部掩埋，只好凍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東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與父親重聚，遷入佩斯托沃鎮的一個單間房，該鎮聚居了大批前“富農”和他們的家人。她承受的創傷在心靈中留下深深的痕跡，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農”出身。在一個處處講階級成分的社會里，安東尼娜屬于“階級敵人”，不配獲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業機會，在斯大林時代不時席卷全國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這種自卑感積累形成了她所謂的“恐懼感”——“我們是富農，政府可以生殺予奪，沒有任何權利，只能在默默無言中忍受”。她在學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負，都不敢自衛。有一次，教師找安東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學面前說她“那種人”就是“人民公敵，窮酸的富農！遭到驅逐也是罪有應得。我希望你們都在那里死絕”！安東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憤慨，真想呼喊出來，以示抗議，但更深沉的恐懼卻逼迫她緘默不語。 [(1)](#_1____MSP__f__3__op__14__d__2__l)

這種恐懼滲透于安東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蘇維埃社會。安東尼娜是一名聰明的女子，性格堅強。她下定決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學習，冀望有一天能在社會中獲得平等認可。盡管遭遇歧視，但她學習成績優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團。共青團領導看重她的主動積極和能力，對她的“富農”出身視而不見。到18歲時，安東尼娜作出一個關乎自己命運的大膽舉措：她決定向組織隱瞞自己的出身——這帶有極大的風險——甚至偽造有關文件，以便就讀醫學院。她在列寧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從沒與朋友或同事談及自己的家史。她現在聲稱，之所以成為共產黨員（直到該黨在1991年遭到取締），不是因為相信它的意識形態，而是想轉移他人的猜疑，以保護自己的家庭。她也許認為，入黨將有助于自己的職業生涯。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1943年

安東尼娜對她的先后兩任丈夫都隱瞞了自己的過去，而她與他們同居的時間都超過了20年。她與第一位丈夫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是終生朋友，卻很少談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奧爾基的姨媽來訪時說漏了嘴，安東尼娜方才獲悉，他的父親原是遭布爾什維克處決的沙皇海軍軍官。這么多年來，安東尼娜竟茫然不知，這位與自己結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樣，青少年時期也是在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度過的。

安東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愛沙尼亞人，名叫鮑里斯·約翰遜，也來自“人民公敵”家庭，其父親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無所知。她自己從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經歷，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其時，由于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以及媒體對斯大林鎮壓的公開批評，他們受到鼓勵，方才啟齒。另外，安東尼娜和格奧爾基也借機袒露了互相隱瞞40多年的秘密，但仍擔心共產黨的反擊，便商定不讓當教師的女兒奧莉加知道。他們認為，如果斯大林主義者卷土重來，蒙在鼓里反而能給奧莉加提供某種保護。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東尼娜才逐漸沖破恐懼，鼓起勇氣，將自己的“富農”出身告訴女兒。

《耳語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隱瞞的家史，像戈洛溫娜家一樣，第一次將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蘇維埃公民的內心世界公之于眾。很多書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審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殺——但《耳語者》首次詳盡探討了它對個人和家庭刻骨銘心的影響。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蘇維埃人民如何過私人生活？他們真實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狹小的住所，隔墻都能聽到相互的交談，究竟能有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通過立法、監督、思想控制來橫加干涉，幾乎無遠弗屆，私人生活到底還有何意義？

像安東尼娜一樣，數以百萬計的人因親屬受到鎮壓而生活在不間斷的恐懼之中。他們如何應付這種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蘇維埃制度的不公和異化；另一方面，又要設法從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們如何獲得平衡？為了補救他們的“歷史污點”，為了變成社會中的平等成員，他們又作出了何種調整？安東尼娜在反思自己經歷時說，她從沒真正相信黨和它的意識形態，但作為蘇維埃專業人士，仍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這意味著，作為一名醫生，她接受了該制度的基本目標和原則。也許，她在過著雙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蘇維埃的規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農民的價值觀。體驗這種雙重生活的，有許多蘇維埃人士。當然，另外還有不少“富農”孩子，更不用說還有貴族或資產階級出身的孩子，與自己的過去徹底決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蘇維埃制度。

《耳語者》的主要舞臺是家庭道德領域，探討各式家庭如何應對蘇維埃政權的壓力。如果學校、共青團等機構向年輕一代灌輸的蘇維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標，與自己的價值觀發生沖突，家長如何保存自己的傳統和信念？又如何傳給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對私人之間的親密造成何種影響？當丈夫、妻子、父母突然變成“人民公敵”而被捕時，家人會作出何種反應？作為忠誠的蘇維埃公民，他們如何處理胸中的郁結，是信任自己所愛的人呢，還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還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謊言，友誼，背叛，抑或塑造數百萬人生的道義上的妥協和遷就？

沒受斯大林恐怖影響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計，從斯大林接掌黨權的1928年到這名獨裁者去世的1953年，約有2500萬人受到蘇維埃政權的迫害。1953年終告結束的，如果不是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開發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統治。這2500萬人——遭行刑隊處決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農”、遭到強制奴役和驅逐的少數民族——約占了總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蘇維埃總人口估計是2億，換言之，平均每1.5戶家庭即有1人。這個數字并不包括死于饑荒或戰爭的。 [(2)](#_2____Wo_De_Gu_Ji_Ji_Yu__M__Ellm) 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數百萬人，還有數千萬斯大林統治下的受害者親屬，他們的人生遭受了驚心動魄的摧殘，至今仍在吞食這苦澀的社會惡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離，使家庭難以重聚，使親情和友情一去不復返，人們再也無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統治的持續惡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個沉默而順從的民族，像安東尼娜一樣，學會了緘口不談自己的過去——同樣的，有人甚至欺瞞自己最私密的親友。孩子受到教誨，千萬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不要將家里事講與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斷或批評。“我們孩子必須學會聽和講的規矩。”一名成長于20世紀30年代的布爾什維克中層官員的女兒如此回憶：

如果偷聽到大人的耳語，或是背著我們的悄悄話，我們都很清楚，絕不能轉述給任何外人。甚至讓大人知道我們已聽到他們的悄悄話，都會有麻煩。有時，大人脫口說了什么，然后告訴我們“隔墻有耳”，或“小心你的舌頭”，或其他表述，我們馬上就懂，他們剛剛說的，本是我們不應聽到的。 [(3)](#_3____Interview_with_Elena_Dombr)

另一名女子——其父親被捕于1936年，記得：

我們從小就學會了閉嘴。“舌頭會給你帶來麻煩”——這是大人一直叮囑我們孩子的，我們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發表意見。媽媽常說，兩人之中必有一名舉報人。我們害怕鄰居，特別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會怕得發抖。 [(4)](#_4____MP__f__4__op__25__d__2__ll)

在一個被認為口太松就會被捕的社會中，家庭抱成一團以圖生存。他們學會過雙重生活，掩飾自己有悖于蘇維埃規范的信息、意見、宗教信仰、家庭價值、傳統和私人生活模式。他們設法避開危險的鄰居耳目，有時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學會了耳語。

俄羅斯語言中有兩個詞代表“耳語者”——第一是指怕人偷聽而竊竊低語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當局匯報的舉報人（sheptun）。個中的區別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時，整個蘇維埃社會全由耳語者們組成，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

《耳語者》并不講述斯大林，但與他的政治直接相關，在每一頁當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講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融入人們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系。本書并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只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扎根，讓數百萬普通老百姓卷入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觀者，或是合作參與者。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敘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于國家結構，也不在于領袖崇拜，而在于“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5)](#_5____M__Gefter___V_predchuvstvi)

歷史學家在透析斯大林主義的內心世界這一課題上姍姍來遲，直到最近，大多數研究仍與公共領域有關，譬如政治、意識形態、“蘇維埃群眾”的集體經驗。個人——如真有出現——主要是向當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變成公眾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個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領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來源匱乏。在前蘇維埃和黨的檔案中，大多數的個人收藏屬于政治、科學、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選后捐贈給國家的，大多涉及這些人的公眾生活。在為本書做調查的初期，我們曾瀏覽數千份個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實在是寥若晨星。 [[1]](#_1___Ke_Xue___Wen_Xue___Yi_Shu_D)

出版于蘇聯的回憶錄，或在1991年前業已公開的蘇維埃檔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別是1985年之后在開放政策時期出版的文字。 [(6)](#_6____See_e_g__V__Kaverin__Epilo) 發表在西方的回憶錄，不管是來自蘇聯流亡知識分子，還是斯大林鎮壓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樣的缺陷。它們被廣泛認作“沉默者”的“真實聲音”，讓我們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應對斯大林恐怖的。 [(7)](#_7____You_Guan_Wen_Xian_Xiang_Da) 在冷戰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權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這些知識分子的幸存敘述為主，特別是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和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她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以證明個人精神是反抗蘇維埃暴政的內在力量。 [(8)](#_8____A__Krylova___The_Tenacious) 這種道德視野——在1991年的“民主”勝利中獲得了兌現和象征——對蘇維埃政權倒塌后的回憶錄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9)](#_9____You_Guan_Wen_Xian_Ye_Xiang) 它也深深打動了歷史學家，使他們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傾向于強調人民對斯大林獨裁的反抗。 [(10)](#_10____See_e_g__S__Fitzpatrick) 對許多幸存者來說，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這些回憶錄確實揭示了真相。但是，它們無法為千百萬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并不同樣心懷這種內心的自由或異議。恰恰相反，他們默默接受和內化了該制度的基本價值，盡可能順從它的公共規則，甚至在犯罪過程中淪作為虎作倀的幫手。

出現在檔案中的日記呈各種形式（作家日記、工作日記、文學年鑒、剪貼簿、每日紀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價值。但相對來說，出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如果不愿作牽強附會的解釋，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見的，僅有極少一部分。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書寫私人日記的風險。一旦被捕——幾乎可在任何時間，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沒收的就是日記，如果含有可解釋為“反蘇維埃”的想法或情緒，便可成為罪證（作家米哈伊爾·普里謝維恩以細小潦草的字跡來記日記，即使用放大鏡也難以辨認，為的就是預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體而言，在蘇維埃時期出版的日記，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 [(11)](#_11____See_e_g___N__Kosterina__D) 1991年之后，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日記——包括蘇維埃社會中下層人士的——或來自前蘇維埃檔案，或歸功于人們的自發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檔案（TsDNA）。 [(12)](#_12____See_e_g__V__Vernadskii) 但總的來說，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其數量仍然太少（尚未公開的前克格勃檔案中可能還有），無法就普通公民的內心世界得出結論。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還需要面對“蘇維埃語”（Soviet-speak）的問題，很多日記千篇一律，所表達的思想都循規蹈矩。如果不知道寫日記的動機（恐懼、信仰、風氣），便很難解讀這些日記。 [(13)](#_13____Li_Shi_Xue_Jia_He_Er_Bei)

近幾年來，部分歷史學家將注意力投向“蘇維埃主觀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讀文學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記），強調正統意識形態對公民內心世界的主宰程度。 [(14)](#_14____See_e_g__J__Hellbeck___Fa) 他們認為，要偏離蘇維埃政治的公共話語，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產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緒，很可能被當做“自身危機”，而接受自覺自愿的剔除。 [(15)](#_15____Zhe_Shi_He_Er_Bei_Ke_De_Z) 蘇維埃的價值和理念已滲透人的內心，這的確是《耳語者》中眾多研究對象的特征。其中僅有極少數人，以自我改進的方式來認同斯大林制度，成為這些歷史學家所謂的“蘇維埃主觀性”的代表。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意識中的舊價值和舊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壓抑，被本書反映出的蘇維埃心態所取代。人們接受這種心態，并不是出于“成為蘇維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恥和恐懼。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安東尼娜決心努力攻讀，成為社會中的平等人——以此來克服自己作為“富農”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經歷的“恐懼感”）。對大多數人來說，包括許多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融入蘇維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慮和恐懼的必要途徑。如果大聲說出，生活便會變得難以為繼；相信和參與蘇維埃的活動，使他們的痛苦獲得意義；如果沒有崇高的目標，他們可能會走投無路，陷入絕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農”孩子的話——“相信斯大林的正義……使我們更容易接受處罰，并帶走我們的恐懼”。 [(16)](#_16____MP__f__4__op__18__d__2__l) 他本人作為“人民公敵”被流放多年，然而，終其一生卻是一名心悅誠服的斯大林主義者。

與口述歷史相比，這種心態在斯大林時代的日記和信件中較少出現——其內容一般得遵循蘇維埃的規則和禮貌，承認恐懼是絕不容許的。 [(17)](#_17____Te_Bie_Can_Jian_Catherine) 研究斯大林政權的歷史學家，愈益轉向口述歷史的研究手法。 [(18)](#_18____See_e_g__Golos_krest__ian) 與任何受制于記憶誤差的其他學科一樣，口述歷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學會了耳語的俄羅斯，對蘇維埃歷史的追憶又充斥著編造的神話和意識形態，這些缺陷因此變得格外麻煩。數百萬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發，鋃鐺下獄。許多有此經歷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麥克風（與克格勃掛鉤的設備）的研究人員，馬上變得格外謹慎。這些幸存者出于恐懼、羞恥、禁欲主義，壓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憶。很多人無法反思過去的生活，因為他們已習慣于逃避令人尷尬的問題，包括做出怎樣的道德選擇，來界定自己在蘇維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則不愿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往往以事后諸葛的動機和信仰，作出各種各樣的辯解。盡管有這些挑戰，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為如此，處理得當的口述歷史，可為專門研究私人生活的歷史學家提供巨大的好處。這意味著要對照家庭和公共檔案的書面記錄，盡可能嚴格地核查受訪者的證據。

《耳語者》引述的數百份家庭檔案（信件、日記、私人文件、回憶錄、照片、實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時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羅斯各地的秘密抽屜中或床墊下。我們在每戶人家仔細采訪年齡最長的成員，只有他們方能解說這些私人文件，并將之與基本上諱莫如深的家史掛上鉤。與本書相關的口述歷史項目，側重于家庭和個人的內心世界，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口述歷史，后者主要是社會學的，比較關注恐怖時期的外部細節和古拉格的經歷。 [(19)](#_19____Di_Yi_Ci_Zhong_Yao_De_Kou) 這些資料組成了一份特殊檔案，是斯大林時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匯集之一。 [[2]](#_2___Da_Duo_Shu_Dang_An_You_Zuo)

《耳語者》所講述的這些家庭，代表了蘇維埃社會相當廣泛的橫截面。他們具有各式社會背景，來自俄羅斯各地的城市、集鎮、村莊，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參與鎮壓的。他們或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任職，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員。另外還有未受影響的家庭，但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其數量極少。

《耳語者》憑借這些材料，圖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們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間，其經歷隨蘇維埃制度的軌跡波動而變遷。到了后面的章節，本書又為他們的后裔提供發言機會。為了理解該制度的遺毒，多代跟蹤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個世紀中，蘇維埃制度對家庭的道德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尚無其他的極權制度對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遠的沖擊——包括共產主義東方（經常與斯大林政權相比的納粹獨裁統治僅持續12年）。本書的與眾不同之處，還在于以長遠眼光來看待斯大林現象。有關這一題材的現有歷史敘述，主要集中于20世紀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權的本質。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中最為兇殘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處決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來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許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數量的頂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幾十年，數百萬人仍身受其漫長暴政的遺毒。

在《耳語者》的公開敘述中，交叉編織起來的家史可能太多，讀者很難逐一追蹤個別的敘述，但可運用索引將它們串連起來。它們可被當做一個共同歷史的變種——即給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義。另有幾戶人家，包括戈洛溫娜家，其故事貫穿整個敘述，所以列出了家族樹。《耳語者》的中心題材，圍繞著聯姻的拉斯金家和西蒙諾夫家。他們各自的命運，在斯大林恐怖時期有天淵之別，悲劇般交織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1915—1979）是中心人物，也許是《耳語者》中的悲劇英雄（取決于你的見解）。他出生于遭蘇維埃政權鎮壓的貴族家庭，卻在20世紀30年代蛻變為“無產階級作家”。今天幾乎被人遺忘的他，曾是蘇維埃文學陣營中的重要干將——獲得六項斯大林獎、一項列寧獎，又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他的戰爭小說頗受歡迎，他的戲劇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傳，但在戰爭時期，他又是俄羅斯最優秀的記者之一。后來，他成為一名優秀的回憶錄作家，誠實地審視自己在斯大林政權中的罪行與道德妥協。1939年，西蒙諾夫與葉夫根尼婭·拉斯金娜結婚。她的猶太家庭從“柵欄區”（Pale of Settlement）搬來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諾夫很快拋棄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兒子，轉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員瓦倫蒂娜·謝羅娃——這段浪漫史激勵他寫下他最著名的詩篇《等著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幾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記于心，冀望打完勝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邊。從1945到1953年，西蒙諾夫成為蘇聯作家協會中的重要人物。其時，斯大林的理論家要求蘇維埃的文學領袖，參與迫害那些被視為過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反猶運動中搖旗吶喊。這一官方反猶運動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諾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權太深，無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許，他根本就是無能為力的。

西蒙諾夫是很復雜的，他從自己父母身上繼承了貴族的公眾服務價值、軍人職責和服從精神。在他腦海中，這等同于熱心公益、為國犧牲的蘇維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級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諾夫具有許多令人欽佩的素質，如果說有“優秀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完全可以當之無愧。他誠實、純真、有條有理、嚴守紀律，具有相當的熱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還是自己的性格，他生來就是積極分子，幼時即迷失于蘇維埃制度，面對其在道德方面的壓力和要求時又無法脫身。在這個意義上，西蒙諾夫體現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沖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權的陰影中——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動，也許先要了解他的時代。

[[1]](#_1_2) 科學、文學、藝術檔案館內的個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時更加真實坦誠，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門往往不對外開放。1991年后，有些前蘇維埃檔案館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贈的個人收藏——如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2]](#_2_2) 大多數檔案由作者和紀念學會一起取得。該協會是一個人權和歷史方面的組織，成立于20世紀80年代末，專門代表和紀念遭受蘇維埃迫害的受害者。這些檔案分存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爾姆（MP）的紀念學會，其中大多數可在網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既有摘錄，又有訪談錄音，部分材料還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該研究項目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書末的后記及致謝。

#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一

1917年10月，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在布爾什維克總部的斯莫爾尼學院見到自己父親時竟然都認不出他。上次見面時，她只有5歲，過后不久，父親便潛入地下活動。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樣忘得一干二凈，只記得他的黨內化名。葉麗薩維塔在斯莫爾尼學院任秘書，非常熟悉數十份法令上的簽名——“謝爾蓋·古謝夫”，他是負責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她沿斯莫爾尼學院無盡的拱形長廊匆匆走過，聽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衛隊員發出嗤笑和口哨。這座貴婦學校營房一般的教室，已改為蘇維埃新政府的臨時辦事處，她的工作就是分發法令。當她告訴其他秘書，這些簽名屬于她失散多年的父親，她們都沒將之當做一回事。從未有人建議，她應該與他重建聯系。在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爾什維克的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共同事業。黨在為人類解放開展決定性的斗爭，你如果仍在記掛私人生活，就會被視為“市儈”。 [(20)](#_20____RGALI__f__3084__op__1__d)

最后驅使葉麗薩維塔走向父親的是饑餓。她在煙霧繚繞的地下室食堂剛剛吃完午餐，走進來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碩的英俊男子，身著軍裝，戴夾鼻眼鏡，尾隨一長列黨的干部和赤衛隊員，在中央長桌旁坐下。兩名士兵向餓壞了的無產者們分發菜湯和粥。葉麗薩維塔仍然很餓，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觀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湯匙喝湯，另一手執鉛筆在尾隨者遞上的文件上簽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謝夫同志”。

我意識到，這一定是我父親了，想也沒想就站起身來，朝擁擠的餐桌擠過去。

“古謝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轉過身來，顯得很疲憊，因睡眠不足而雙眼通紅。



布爾什維克首席組織者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的4名秘書，1917年10月攝于斯莫爾尼學院，德拉布金娜位于右二

“我在聽，同志！”

“古謝夫同志，我是你女兒，給我3盧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許，他已筋疲力盡，聽到的只是我對3個盧布的索求。

“當然，同志。”古謝夫說，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張綠色的3盧布鈔票。我接過錢，向他表示感謝，用它買了另一份午餐。 [(21)](#_21____E__Drabkina__Chernye_sukh)

列寧很喜歡這一則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經常叫其時已變得稔熟的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講述此事。它在黨內變成了一個傳奇，生動表現了布爾什維克的個人犧牲，以及對革命事業的無私奉獻。斯大林曾說：“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不應也不能擁有家庭，因為他必須將自己的一切獻給黨。” [(22)](#_22____S__Sebag_Montefiore__Stal)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該項革命原則的典例。1895年，葉麗薩維塔的父親（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學生時就加入了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她母親費奧多西婭也是黨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員（娜塔莎），經常帶著作為掩護的女兒奔赴赫爾辛福斯（赫爾辛基），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購買彈藥（葉麗薩維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藥和子彈盒）。1905年的革命流產后，葉麗薩維塔的父母為躲避沙皇警察而轉入地下。5歲的葉麗薩維塔赴羅斯托夫與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時，新上臺的臨時政府釋放了所有的革命者。 [[1]](#_137_1) 葉麗薩維塔與母親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當時的名字）重聚，隨即加入布爾什維克，成為赤衛隊中的機槍手。她在布爾什維克10月25日的奪權中參與強攻冬宮，復又擔任其首席組織者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的秘書。這份工作讓她走進了斯莫爾尼學院，而她的父親就在那里工作。 [(23)](#_23____RGALI__f__2804__op__1__d)

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敦促普通黨員以沙俄時的革命家為榜樣，犧牲個人幸福，放棄自己家庭，為工人階級服務。 [[2]](#_1_7) 他們提倡對“大公無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構建全新的道德觀，以一切獻給黨的單一原則取代所有的舊誡。在他們的烏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為公眾利益而活的“集體人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將由這種新人組成。很多社會主義者把培育新人當做革命的根本目標。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17年春天寫道：“政治生活的新結構向我們要求全新的靈魂結構。” [(24)](#_24____Partiinaia_etika__dokumen)

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從根本上實現“集體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殼”。列寧的妻子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認為，允許“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存有差別，遲早會導致對共產主義的背叛”。 [(25)](#_25____Cited_in_E__Naiman__Sex_i) 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說法，與政治領域截然分開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謬的，因為政治影響一切；所謂的“私人生活”，無不與政治有關。所以，私人領域仍應受到社會公眾的監督和控制。布爾什維克將不受國家控制的私人空間視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險溫床，認為必須予以揭露和鏟除。

這次遭遇之后，葉麗薩維塔很少看到父親，他們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動。1917年之后，葉麗薩維塔繼續在斯維爾德洛夫辦公室工作。在內戰期間（1918—1920），她參加了紅軍，先是做醫療助理，后來成為機槍手，參與在西伯利亞、波羅的海、俄羅斯南部向西方列強支持的白軍或反革命軍隊發起的進攻。她在抗擊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白軍的東線戰役中，甚至在父親指揮下投入戰斗。其時，父親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高級職務，充當蘇維埃軍隊的指揮中樞，該委員會以托洛茨基為首。葉麗薩維塔經常聽父親向戰士發表演講，但從沒走近他。她后來說，自己認為布爾什維克不應“關注私人事務”。整個內戰時期，他們只相遇兩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維爾德洛夫的葬禮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宮的正式會議上。到了20年代，父親和女兒都在莫斯科從事黨的工作，見面更加頻繁，甚至有一段時間住在一起，但仍然無法親近。他們分開得太久，無法培養親情。葉麗薩維塔回憶：“父親從沒對我說過他自己。我現在才意識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別人講起他，我才開始對他有所了解。” [(26)](#_26____RGALI__f__2804__op__1__dd)

內戰不僅是對白軍的軍事斗爭，還是對舊社會私人利益的革命斗爭。為了應付白軍，布爾什維克開發了第一套計劃經濟（戰時共產主義），后來成為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原型。他們試圖杜絕私人的貿易和財產（甚至計劃以配給來取代金錢）；向農民征集糧食來養活城市和軍隊；征召數百萬勞動大軍奔赴“經濟戰線”，包括伐木為薪、建筑道路、維修鐵路；強制推行實驗性的集體勞動，讓人們住進工廠附屬的宿舍和營房；向宗教開戰，迫害神職人員和教徒，關閉數百座教堂；鉗制所有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異見者。在內戰的“內部戰線”上，布爾什維克發起反對“布爾喬亞”——前沙皇官員、地主、商人、富農、商販和舊知識分子——的恐怖運動（紅色恐怖），因為這些人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很容易使自己成為白軍和其他“反革命”的潛在朋友。布爾什維克相信，如此兇猛地清洗社會，是通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捷徑。

到1921年的春天，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摧毀了蘇維埃經濟，把眾多農民帶到饑荒的邊緣，蘇俄農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餓。全國各地的農民發動一系列叛亂，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及其糧食征用制度。列寧自己說，這“比全部白軍加在一起還要危險”。在許多農村地區，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不復存在。農民奪取村莊權力，切斷對城市的糧食供應，饑餓的工人舉行罷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瑯施塔得海軍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幫助布爾什維克奪得權力，現在反過來發動兵變。他們打著無政府主義的起義旗號，呼吁蘇維埃的選舉自由、“全體勞工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農民自主耕地的自由”。顯然，布爾什維克自己正面對著新興的革命。列寧在3月初承認，“我們快撐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稱贊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驕傲和喜悅”，此時卻親自指揮向該海軍基地發起軍事突擊。軍事力量和無情的恐怖，也被用來對付農民起義。據估計，在鎮壓起義期間，被監禁或驅逐出境的有10萬人，遭槍決的有1.5萬人。但列寧意識到，要扭轉起義浪潮、促使農民恢復向城市供糧，布爾什維克必須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并恢復自由貿易。擊敗白軍之后，布爾什維克便向農民作出讓步。 [(27)](#_27____O__Figes__A_People__s_Tra)

1921年3月，列寧在第十次黨代會上引進新經濟政策（NEP），以相對寬松的稅收來取代糧食征用制，使小規模的私人貿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農業和消費品的生產，置重工業發展于次要地位。列寧這樣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對小農——執著于私人家庭生產的原則——暫時但必需的讓步，以挽救革命，為國家重整旗鼓。他談到，這一政策將持續“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長”。1921年的蘇維埃居民，身著綴滿補丁的衣服，以破損的器皿烹調，用開裂的杯子飲水，什么都要換新的。市場的恢復給蘇維埃經濟帶來新生命，私人貿易對革命和內戰所造成的長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應。貿易商人設立攤位，跳蚤市場蓬勃發展，農民將食品運來城鎮。因有新法律的許可，私人的咖啡館、商店、餐館、夜總會、妓院、醫院、診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廠，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內戰時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機盎然，嘈雜的貿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車司機、燈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 1917年之前。

對許多布爾什維克來說，市場的恢復似乎是對革命的背叛。引進的新經濟政策招致廣大黨員的懷疑（甚至列寧“偏愛”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過程也非常緩慢，從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來，他反倒成了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捍衛者），列寧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說服力和權威，使之獲得黨代會的通過。尤其是在城鎮工人中，人們普遍認為，新經濟政策犧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農民因食品價格上漲而變得越來越富。在城鎮工人看來，私人貿易的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富懸殊和資本主義復辟。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稱作“對無產階級的新型剝削”，他們的憤怒主要針對“新經濟人”，即在20世紀20年代興旺發達起來的私商。在蘇維埃宣傳漫畫所塑造的大眾想象中，“新經濟人”以鉆石和皮草裝扮妻子和情婦，駕駛碩大的進口汽車，在歌劇演出時打鼾，在餐館里高歌，在昂貴酒吧中大聲吹噓其揮霍于賽馬場和賭場的美元財富。新興暴發戶的這種大肆揮霍，襯以20世紀20年代的城市貧困和大量失業，給人們帶來苦澀的怨恨。他們認為，革命本來應該終止不平等。

在“內部戰線”上，新經濟政策讓“資產階級文化”的殘余得以茍延殘喘。共產主義曾承諾要予以消滅，但暫時還不能沒有。它中止了反對中產階級和專業知識分子的斗爭，因為蘇維埃經濟需要他們的專長。從1924到1928年，對宗教的斗爭也告暫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續的）的頻度關閉教堂或壓迫神職人員，讓老百姓繼續保留自己的信仰，不過，反教會的宣傳仍在繼續。最后，新經濟政策為私人生活的舊習慣和家庭傳統保留了空間，引起眾多布爾什維克的擔憂：俄羅斯“小布爾喬亞”的心態和習俗——數以百萬計的小商人和小生產者，其數量因新經濟政策而日益增多——將會阻撓甚至破壞革命運動。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們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態度和習慣，束縛著千百萬勞動者的心靈，成了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 [(28)](#_28____I__Stalin__Sochineniia__1)

布爾什維克設想，建設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是要與舊的習俗和習慣展開不斷的斗爭。隨著內戰的結束，他們準備在“內部戰線”上發起新的持久戰：通過消滅個人主義（“資產階級”）的行為和舊社會留下的陋習（賣淫、酗酒、流氓、宗教），來贏得共產主義個性解放的革命戰爭。布爾什維克中幾乎沒有分歧，他們認為改造人性的戰役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有　爭議的只是何時打響第一槍。馬克思教導說，意識的改變依賴于物質基礎的改變。列寧在介紹新經濟政策時承認，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實現之前——其過程需要橫跨整個歷史時代——試圖在私人生活中創建共產主義道德制度是不切實際的。但為了推行新經濟政策，必須撤離私人領域，這又是多數布爾什維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戰場每一時刻，積極參與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內心中保留舊心態，只會對黨的根本思想目標造成重大威脅。他們看到，“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本性在新經濟政策下日益增強，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擊。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1927年寫道：“不能讓所謂的私人生活領域逃離我們。恰恰需要在那里實現革命的最終目標。” [(29)](#_29____K__Geiger__The_Family_in)

布爾什維克投入戰斗的第一個舞臺是家庭。20世紀20年代，他們堅信“資產階級家庭”對社會是有害的：它是內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無知、偏見的堡壘，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質占有欲，壓迫婦女和兒童。布爾什維克預計，等到蘇俄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制度，家庭將會消亡。其時，國家承擔家庭的所有基本職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區里提供托兒、洗衣、食堂等服務。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婦女，可自由加入與男子平等的勞動大軍；激進派相信，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和相應的性道德都會消亡，將被“愛情的自由結合”所取代。

以布爾什維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最大障礙。蘇維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寫道：“家庭喜愛孩子，使他變得任性，鼓勵他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 [(30)](#_30____L__Kirschenbaum__Small_Co) 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同意要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理性之愛”，來取代這種“自我中心的愛”。《共產主義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中，父母講到自己孩子時，將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將會關心社區內所有的孩子。這種變化需要多久方能實現，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不同見解。激進派認為，黨應采取直接行動，馬上著手破壞家庭。但多數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理論家的論點：在蘇俄這樣的農業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家庭仍是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慢慢隨著國家向都市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再逐漸變弱。

同時，布爾什維克又采納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間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體。為了解決擁擠城市的住房短缺，布爾什維克迫使富裕家庭與城市貧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稱為“摻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紀20年代，最常見的共用公寓由原業主占據主房，讓其他家庭搬進偏房。當時，只要符合“衛生標準”（即人均生活空間，它從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業主仍可自由選擇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傭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搶占。該項政策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強大吸引力，不僅是新政權宣傳的反特權斗爭（“反宮殿的斗爭！”），更是一次創建集體生活方式的運動。布爾什維克認為，迫使人們住入共用公寓，可讓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行為上更趨向于共產主義。私人空間和財產將會消失，個人家庭（“資產階級”）將被共產主義的友愛和組織所取代，個人生活將融入社區。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新型住房設計就以這種改造作為出發點。最激進的蘇維埃建筑師，例如當代建筑師聯盟中的建構派（Constructivists），建議修造廢除一切私人領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內衣的所有財產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飪和育兒的家務由各團隊輪流負責，大家按性別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專為性生活而設的包房。但這類房子實際上造得很少，僅在烏托邦想象和未來小說中廣為流傳，如尤金·扎米亞金的《我們》（We，1920年）。大多數確實落成的建筑，如建構派莫伊謝·金茲伯格在莫斯科設計的財政部公寓大樓（1930年），并沒采用完全的社區形式。它們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間，又有社區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廳、廚房、幼兒園、學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標仍是敦促大家，從私人家庭（“資產階級”）轉向集體生活。 [(31)](#_31____O__Maitich___Utopia_in_Da)

布爾什維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確的框架，以促進傳統家庭的崩潰。結婚和離婚只需向國家提出簡單的注冊，從而取消了教會的影響力。它向事實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賦予同等的法律權利。離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現在變得經濟方便，大家都可一試。其結果是大幅增長的隨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在1926年是法國或德國的3倍、英國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潰和革命年代的混亂，家庭和社區的關系、性道德等，都變得松弛。 [(32)](#_32____W__Goldman__Women__the_St)

蘇維埃政權的初期，革命積極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幾乎構成了一種職業病。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圈子中隨意的性關系已成事實上的規范，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獲通知，立刻奔赴遙遠的前線。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這種輕松隨意的態度相當普遍。黨的積極分子和共青團的年輕仿效者經常接受教誨，要把自己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承諾，放在愛情或家庭之上。與普通的蘇維埃青年相比，性亂交在年輕黨員中更為普遍。許多布爾什維克將性自由，視作“蘇維埃現代化”的標志，不再接受資產階級道德的約束。有人甚至主張，配偶關系只會促使戀人們脫離集體，減弱對黨的忠誠，而性亂交反而可以成為一種抗衡。 [(33)](#_33____I__Halfin___Intimacy_in_a)

由于黨的需求，布爾什維克人不能照料家事，當不好盡職的丈夫和父親，這是眾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人說：“我們共產黨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歸，很少看到妻子，幾乎從不遇見自己的孩子。”整個20世紀的20年代，黨代表大會經常討論此類問題。普遍認為，與非黨員丈夫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放棄妻子和家庭，因為他們對黨的忠誠高于對愛情的忠貞。事實上，妻子和母親的缺失所帶來的麻煩，不僅存在于黨內，也存在于廣泛的蘇維埃知識界。其時，大多數知識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 [(34)](#_34____L__Trotsky__Problems_of_E)

托洛茨基認為，與其他人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響，因為他們“在新條件面前暴露得最為徹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寫道，作為現代生活方式的先驅，“共產黨先鋒隊只是以更為激烈的方式，較早地經歷了”人民大眾無法避免的進程。 [(35)](#_35____Trotsky__Problems_of_Ever) 許多黨員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開拓新型家庭的職責——父母雙方都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投身公益活動——盡管要付出與子女疏遠的代價。

安娜·卡爾皮茨卡婭和丈夫彼得·涅澤夫茨夫都是列寧格勒（列寧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與3個孩子住在斯莫爾尼學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馬克斯娜 [[3]](#_2_7) 。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出生于1923年。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來之前，父母已經離開，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馬克斯娜回憶：“我覺得缺乏母親的關愛，總是嫉妒那些母親無須上班的小孩。”因為父母不在，孩子們由兩名女傭照料，都是新近來自鄉下的農婦，充任管家和廚師。根據她的回憶，作為最年長的孩子，馬克斯娜自4歲起便承擔家里的“全部權責”。廚師會問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錢，去高級干部專用店購買食物。如果女傭打破家規，或“做了我認為是不正確的事”，馬克斯娜就會向母親匯報。但更多的時候，她回憶：“如果做了我不喜歡的，我會直截了當告訴她們。”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負責任——她很清楚，母親喜歡她負起責任——并欣然接受：“母親說得很清楚，家里發生的事與她無關。對此，我從不懷疑。”

馬克斯娜從小接受新社會價值的熏陶，屬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視作“小同志”。她沒有玩具，也沒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間。馬克斯娜回憶：“父母視我為平等人，交談起來把我當做成年人，教我從小學會獨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歲上小學的第一天早上，母親帶她去學校，讓她記住路程——將近3公里的復雜旅途——這樣，下午放學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馬克斯娜回憶：“從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學校。我的腦海里從沒閃過應該有人陪我的念頭。”馬克斯娜步行一小時去市中心的商店，購買了所有的書籍和文具。從8歲起，她自個兒赴劇場，因為有父母的高級干部出入證，可坐在包廂內。馬克斯娜回憶：“從來沒人告訴我該怎么辦，是我把自己帶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遙遠的身影。到了節日，他們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亞的高級度假村，卻把孩子們留在列寧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實施僵硬的管束，在馬克斯娜的回憶中，往往成為煩惱的來源。母親責怪她鐘情于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卻不讀共產黨青睞的兒童教育書籍，如弗拉基米爾·奧布羅切夫的科學探險故事《薩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別雷赫和阿列克謝·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講述的是無家可歸的孤兒，如何被送進列寧格勒的學校。母親將這兩本書帶回家，馬克斯娜盡職地讀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遺忘。母親還禁止馬克斯娜邀請學校的朋友到家里來，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看到黨領導過的舒適生活——盡管仍屬適度的，且帶有斯巴達風格——特別是與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稱贊或表揚她，幾乎從沒親吻或擁抱過她，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時前來照料她的祖母。馬克斯娜回憶：“我喜歡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關愛。她教我如何縫紉，如何穿珠成項鏈，為我準備玩具，甚至還給我買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廚房，放在她房間的一角，我喜歡待在那里盡情玩耍。” [(36)](#_36____MSP__f__3__op__16__d__2)

1917年后出生于黨員家庭的許多兒童，都談到父母親情的缺乏。在這一方面，蘇維埃精英養育子女的習慣與19世紀俄羅斯貴族相比，沒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對育嬰室興致索然，很早就把嬰兒托交給保姆、女傭和其他家仆。 [(37)](#_37____See_O__Figes__Natasha__s)

安吉麗娜·葉夫謝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爾什維克家庭。內戰時期，父母都在紅軍服役，得以相遇相識。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親成為參與鎮壓喀瑯施塔得兵變的師指揮官。到1925年，他就讀于軍事醫學院，晚上仍要刻苦學習。母親任職于貿易委員會，等安吉麗娜出生后，開始在外貿學院學習，同樣要在晚上苦讀。在安吉麗娜的回憶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過的：

母親很愛我，既耐心又細心，就是不夠親熱。她從不溺愛，從沒與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樣行事，把我當做成年人……父親全心投入工作，我覺得自己只會給他們擋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贅。我非常調皮，不喜歡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長大的。我8歲那年，父親出差去莫斯科，帶回一個魚缸。他不讓我出去玩，結果我絆倒了魚缸，所有的魚兒灑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聲叫嚷：“你不是一個父親，你是一個繼母，繼母！” [(38)](#_37_2)

1923年，瑪麗亞·布德克維奇出生于莫斯科黨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蘇維埃軍隊主要出版機構“軍事百科全書”供職。父親與家人分開，單獨住一套公寓，這不是因為與母親的離異，而是因為獨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瑪麗亞的母親自己也是蘇共內戰歷史方面的研究員。瑪麗亞很少看到父親，五六歲時甚至懷疑他的存在。她回憶：“我不懂‘父親’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幾乎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他會在出國旅行后突然出現，非常熱鬧，給每人帶來禮物，然后再一次消失。” [(39)](#_38_2)

艾萊娜·邦納的父母是列寧格勒的黨干部，從清晨持續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給祖母照看的女兒。艾萊娜渴望母愛，“假裝愛哭”，還經常裝病，迫使母親留在家里。她羨慕那些母親無須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們“總是顯得非常歡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時，也忙于黨的工作，很少關心孩子。艾萊娜回憶，她9歲或10歲時，“父母每晚都在編寫小冊子，說是關于‘黨的建設問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黨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40)](#_39_2)

邦納一家住在黨務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寧格勒的阿斯多里亞酒店。房間裝飾簡陋，一切擺設都是為了工作方便。大多數黨員都生活在類似的簡樸環境中，即使高級官員，其生活也很樸素。要等到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華公寓和消費物品獎勵他的忠誠部下。從1923到1930年，尼古拉·謝馬什科擔任衛生人民委員，他家在莫斯科財政部公寓大樓只占一套簡陋的小公寓。其鄰居回憶道：“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舒適或裝飾從來不感興趣。” [(41)](#_40_2)

20世紀20年代的布爾什維克理想主義者，將這種斯巴達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諭戒律。他們繼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義，在蘇維埃政權的早期，更將之轉換成自己的價值觀和做人的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知識階層，其文化和思想的內核，就是對物質占有的排斥。他們努力掃除“小布爾喬亞”的生活遺跡——壁爐架上供賞玩的瓷器、鳴唱的金絲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軟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擺設——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資產階級舒適”發起攻擊，這兩者緊密結合。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寫道：

墻上的馬克思在注視

突然

張開嘴，

開始呵詰：

庸俗理不清的紗線纏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蘭格爾 [[4]](#_3_4) 更為惡劣

最好

擰下金絲雀的首級——

由此，共產主義

將不會敗于金絲雀。 [(42)](#_41_2)



列昂尼德·埃利亞舍夫，1932年

根據布爾什維克的美學，熱衷于裝飾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間”（蘇維埃官員對家的稱呼）只需最少的裝飾和布置，純粹以實用功能為出發點，家具最好能節省空間，如兩用沙發床。在布爾什維克的想象中，人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因崇拜財產而受奴役，簡樸生活反而是一種解脫。在費奧多爾·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說《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黨員的一對夫婦犧牲自我，拋離家園和女兒，去幫助重建一座在內戰中被摧毀的水泥廠。當丈夫格列勃開始想念老家的舒適時，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標提醒他：“你想要美麗的鮮花在窗臺上綻放，床上鋪滿軟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沒有暖氣的房間，在共用廚房就餐。你看，我是一個自由的蘇維埃公民。” [(43)](#_42_2)

布爾什維克對個人外表持有同樣嚴苛的態度——時髦的衣服、精致的發型、首飾、香水、化妝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資產階級舒適。共產黨先鋒隊的“新人”衣著樸實——類似無產階級或半軍事化的制服——沒有任何裝飾。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階段，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擔憂，“布爾喬亞”文化的舒適和誘惑突然襲來，可能腐蝕廣大黨員，所以要將這種斯巴達態度推崇為思想純潔的象征。1922年，黨在共產主義道德方面的主要發言人阿隆·索爾茨警告說，新經濟政策可能會誤導黨員，讓他們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個人生活確實存在，甚至還可模仿資產階級社會認定的優雅”。索爾茨呼吁布爾什維克改變自己的審美觀，自行清洗內心的資產階級本能。在他看來，“想要戒指、手鐲、金牙齒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會激起黨員們的審美憤怒”。 [(44)](#_43_2)

瓦倫蒂娜·季哈諾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的家中長大。1917年10月率隊攻堅冬宮的，就是奧夫謝延科。瓦倫蒂娜的母親在布拉格遇見這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其時，奧夫謝延科擔任蘇維埃駐捷克大使。她離開身為出版社編輯的瓦倫蒂娜的生父，1927年與奧夫謝延科結婚。瓦倫蒂娜回憶，20世紀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鐵床”，唯一有價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為母親所擁有。公寓里沒有任何飾物或裝飾，父母對此也毫無興趣。母親后來成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飾。禁欲主義在奧夫謝延科的家中占統治地位，這個家是由4個小房間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員會第二居住區。那是莫斯科的一個公寓街區，住的全是黨的高級干部。瓦倫蒂娜的房間宛如牢房，僅有的家具是折疊床、寫字臺和小書柜。她回憶，這種簡樸的環境都是自覺自愿的，體現了她家的知識分子原則和蘇維埃意識形態。她反思道：“我們是蘇維埃人，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幸福而活，不是為滿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純潔性。” [(45)](#_44_2)

柳德米拉·埃利亞舍娃在拉脫維亞的布爾什維克家庭長大。父親列昂尼德在1917年還是一個少年時，就從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爾什維克。他為自己富裕的猶太父母而感到羞恥和不滿，他的父母非常嚴格和兇狠，而工人運動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達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寫給妻子的信中承認，他擁護工人運動，就是為了“唾棄我的資產階級出身”。根據女兒柳德米拉的講述，列昂尼德對《國際歌》的歌詞有親身體會，我們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她說，他需要放棄的不只是他的階級，“還包括他的家人、他習慣的生活方式、舒適的公寓、郊外別墅（dacha）、精致美食、時髦服飾、網球等”。他教育女兒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階級的財富和舒適，就應感到羞愧。他會教誨她們，即便吃一頓豐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內疚，因為其他孩子更窮，都吃不飽。他會在進餐時說：“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雞蛋，而我們吃魚或香腸，這實在可恥，我們憑什么要比人家過得更好？”他篤信“黨的最高限額”——20世紀20年代限制黨員薪酬的制度——并盡量培養小孩量入為出的習慣。女孩們不得購買新鞋，除非舊鞋已經破爛不堪，只在重要的蘇維埃節日，才可領到糖果的犒賞。“我們過得很省，”柳德米拉回憶：

我們的家具很便宜——都購自政府。我們粗茶淡飯地過日子，除了軍裝、背心、靴子，從沒看到父親穿戴其他的。母親為上劇場準備了“特殊裝備”，另有一兩套禮服，僅此而已……上劇院是我們唯一的奢侈——還有大量書籍。



約瑟夫和亞歷山德拉，1924年攝于葉卡捷琳諾斯拉夫

像1917年的許多其他孩子一樣，柳德米拉和姐姐從小就懂得克勤克儉代表道德純潔，是為大家的美好未來而作出的艱苦奮斗。1936年，她在日記封面上寫道：“受苦受難，摧毀了渺小者，鍛煉了頑強者。” [(46)](#_45_2)

對某些家庭來說，共產黨斗士的禁欲主義又成了過于沉重的負擔。維金斯基一家是個很好的例子。約瑟夫·維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雖是猶太家庭，但已俄羅斯化，屬于自由派。父親是一名數學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師，他與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爾都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蘭；曾是孟什維克的弗拉基米爾，在1917年的臨時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移居到柏林后，又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頑強對手；家庭成員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約瑟夫和妹妹娜杰日達。像弗拉基米爾一樣，約瑟夫曾經也是孟什維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參加了布爾什維克，并積極投入內戰。為了證明他的忠誠，他甚至寫信給遠在柏林的哥哥——毫無疑問，他知道上司會讀到此信——懇求他“重新審視他的政治原則，返回蘇俄，投身于共同事業”。哥哥的反革命活動把他嚇壞了，約瑟夫更竭盡全力投入黨的事業。他寫信給尼古拉說：“由于我的歷史罪孽，他們只讓我當預備黨員，但我要承擔很多黨員的職責。如同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我隨時準備上刀山、下火海。” [(47)](#_46_2)

事實上，他被派去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供職于當地工會組織的法律部門。約瑟夫與妻子亞歷山德拉住在潮濕的地下室，置辦了少得可憐的家具。亞歷山德拉1922年寫信給娜杰日達說：“我們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處都非常昂貴，只有新經濟人才負擔得起。我們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亞麻布、服裝、針線。總之，什么都缺。”約瑟夫太忙，不關心此類“瑣碎的家事”。據他的妻子說，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實際，又雜亂無章”。夫婦倆沒有錢，因為“黨的最高限額”只允許少量的現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給逃亡在芬蘭的母親。亞歷山德拉盡量找散工以貼補家用，她對此耿耿于懷，認為黨毀了她的“家庭夢”。她在1922年做了流產，在給娜杰日達的信中，她說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終還是中斷了懷孕，她實在是被自己的“虛弱身體拖垮了”，也不想給“疲于奔命為黨工作”的約瑟夫添加負擔。小兩口的婚姻變得痛苦不堪，不時為錢發生爭吵。約瑟夫又與另一名女子發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個兒子，經濟上要給予支持。他與亞歷山德拉的關系更趨緊張。約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傳授勞動法，或去庫班參與當地的工會工作。亞歷山德拉在1925年寫給娜杰日達的信中說：“我很少見到我的約瑟夫。淪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傷心。但這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沒有一丁點的私人生活，我們必須埋葬浪漫，它只是歷史遺跡。” [(48)](#_47_2)

二

布爾什維克把教育當做創建新社會的關鍵。他們通過學校，以及兒童和青年的共產黨組織（少先隊和共青團），向下一代灌輸新型的集體生活方式。蘇維埃教育理論家之一在1918年宣稱：

我們必須將年輕人塑成新一代的共產黨人。孩子像柔軟的蠟一樣，可塑性很大。他們應被塑成優秀的共產黨人……我們必須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響……我們必須使孩子國有化，從小就接受共產主義學校的良好影響……責成母親將孩子交給蘇維埃國家——這是我們的任務。 [(49)](#_48_2)



1920年代的一個“列寧角”



阿列克謝和父親伊萬·拉達琴科，1927年

蘇維埃學校的主要任務，一是要讓孩子脫離“小布爾喬亞”家庭，因為它私人生活的舊心態只會破壞社會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輸共產主義社會的公共價值。教育人民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1918年寫道：“年輕人應學會以‘我們’來作思考，拋棄所有的私心雜念。” [(50)](#_49_2)

蘇維埃課程的指導方針是傳播共產主義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在蘇維埃學校中的作用，類似于沙皇學校中宗教的作用。對此，蘇維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實驗性學校強調學習要通過實踐，而不是理論。即使是在新興的聯合勞工學校——旨在向全體蘇維埃學童提供從小學到大學的框架，其教學安排也圍繞一系列生產車間（而不是教室上課）。孩子們通過學習技術和工藝的技能，作為攻讀主流學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學和經濟。 [(51)](#_50_2)

政治灌輸主要與積極分子的培養掛鉤。宣傳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說家，善于宣傳鼓動。教育思想家認為，光是書本傳授不了共產主義，還必須依靠學校的整體生活，再通過課外活動與校外廣闊的政治世界結合起來，如慶祝蘇維埃節日、參與公眾游行、讀報、安排學校的辯論和審判。其宗旨是讓孩子接觸到蘇維埃制度的行為、崇拜、儀式，讓他們長大后成為忠貞活躍的共產主義者。

孩子們從小被灌輸對“列寧叔叔”的個人崇拜。在幼兒園，他們一旦能手指列寧的圖像，便被稱作“十月兒童”。列寧逝世后，有人擔心新的一代將不清楚他是誰。于是，學校得到指示，紛紛建立“列寧角”。那是一塊政治圣地，宣傳這位蘇維埃國家的創始人，把他當做像上帝一樣的偉人。有關列寧和其他革命英雄的傳奇故事，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數孩子不懂蘇維埃國家的意識形態——只把革命看成“好人”與“壞人”的斗爭——卻能認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跡。

進步學校辦得恰似微型的蘇維埃國家：在墻上以表格和餅狀圖形，列出工作計劃和取得的成就；將班級組織成軍隊；讓理事會和委員會的機構來監管學校的日常運行；把蘇維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紹給孩子。有的學校鼓勵學生組織自己的警察，鼓勵他們批評違規的同學，甚至舉辦課堂上的審判。為了提倡集體服從的風氣，有些學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練，包括游行、歌曲、向蘇維埃領導人宣誓效忠。依達·斯拉溫娜回憶在列寧格勒的學生時光：“我們在公共假日，整個班級一起游行，為代表學校而感到自豪。經過窗后有人窺視的建筑物時，會故意減慢步伐，齊聲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窺視者——

恬不知恥！” [(52)](#_51_2)

阿列克謝·拉達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寧之前馬克思主義地下運動的老將；父親伊萬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成員，1917年之后主管蘇維埃泥炭工業（被視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東面的沙圖拉小鎮，其寬敞、舒適的住宅就在電廠的附近。電廠功能是將泥炭轉化成電力，向蘇維埃的首都供電。阿列克謝的母親阿利西婭來自塔林的小布爾喬亞家庭，祖上有德國和瑞典的血統。她希望獲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個人品味，顯現了她中產階級出身的遺痕。但在意識形態上，她心悅誠服于共產主義理想，即橫掃布爾喬亞舊文化以創造新人。她是蘇維埃教學理論的前驅，也是克魯普斯卡婭在教育工作中的親密伙伴。她將自己兒子的求學當做共產主義教育的實驗，其理論主要來自俄羅斯體育創始人彼得·列斯蓋夫特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聽過前者的演講，又給兒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爾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謝·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謝各種語言；讓他學習鋼琴和小提琴；鼓勵他從事家務和花園里的瑣事，以激勵他對體力勞動的尊重；安排他參觀窮人居所，以培養他的社會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婭擔任沙圖拉的聯合勞工學校校長。她將之辦成一個公社，既有學術課程，又有農場的勞作，讓孩子從一開始就明白何為共產主義生活。 [(53)](#_52_2)

阿列克謝自小就崇拜父親和其他革命者，但他體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從而躲進了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寧，把父親鼓勵他向列寧學習的話牢記在心。他在1923年12月聽到列寧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記中袒露：“如果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沖出家門，把我所有的鮮血獻給列寧。”列寧去世后，阿列克謝在自己屋內設了列寧角，在墻壁上貼滿列寧的照片和熟記的列寧語錄。阿利西婭記錄下阿列克謝的政治進步，其中有他的日記、學校工作和繪圖的樣品、自己對兒子教育的評論。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記錄是一份“科學日志”，可作為在家庭和學校實施共產主義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婭鼓勵兒子與沙圖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來自電廠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戲和活動，讓自己感覺已是這些弱勢朋友的領袖。阿利西婭在兒子日記本的邊緣寫道：“遵循你父親的榜樣。他是工人階級的領袖，你也要學會充當小伙伴的領袖。”阿列克謝在母親的鼓勵下，與學校同伴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世界兒童協會俄羅斯分會的中央局。他們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婭為兒童編寫的《開始》）、自制的紅色橫幅。公共假日時，他們就在沙圖拉鎮四下游行。 [(54)](#_53_2)

1917年的孩子們受到鼓勵，自覺地扮演革命家。蘇維埃教育思想家受歐洲教育家的影響，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祿貝爾和瑪麗亞·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戲”。他們把組織起來演戲當做受教育的過程，讓孩子從中汲取蘇維埃的集體價值觀、社會參與和責任感。蘇維埃學校的整個目的，不管是通過墻報和列寧角，還是通過理事會和委員會，都旨在灌輸孩子是潛在革命者的觀念：一旦有黨的呼吁，隨時準備奮起挑戰——如有必要，甚至針對自己的父母。20世紀20年代，賴莎·貝格在列寧格勒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她如此回憶學校朋友之間的同志友誼和戰斗氣氛：

偉大的友誼、信任、團隊精神，使我們全班同學緊密團結起來。我們也喜歡老師，無一例外。但在同學和老師之間仍有不間斷的斗爭，那是一場真正的階級斗爭。我們不需要任何戰略或陰謀，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即我們同志之間的忠誠是最重要的。我們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們可能會向老師告發。 [(55)](#_54_2)

20世紀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戲之一是紅軍與白軍的戰斗，很像美國牛仔與印第安人的戰斗。俄國內戰的戰事由孩子們重演，經常使用專為此類游戲而生產的氣槍。扮演紅軍和白軍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寧的角色。其中一人回憶：

我們都想扮演領袖。每個人都想當紅軍和布爾什維克，沒人愿當白軍、孟什維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這一類的爭吵——建議游戲開始時先不定下稱呼，誰贏了，誰就是布爾什維克。



1930年代早期的維拉·米諾蘇娃

另一個游戲是搜索與征用，其中一組（通常是男孩）扮演紅軍征用隊，另一組（女孩）扮“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或藏匿糧食的“富農”。 [(56)](#_55_2)

紅軍與白軍、搜索與征用這類游戲，鼓勵孩子接受蘇維埃的世界兩分法，一個是“好”，一個是“壞”。20世紀20年代，在蘇維埃學校中進行的研究顯示，孩子們總體上對近代歷史的基本事實一無所知（很多學生不知道沙皇是誰）；但蘇維埃宣傳品、書籍、電影中的舊政權支持者的邪惡形象，卻給他們留下深刻影響。這些形象使眾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敵人”繼續存在。這種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對舊政權標志的非理性恐懼、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輕女學生問老師：“資產階級吃小孩嗎？”另有一人看到同學穿的襯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圖案，禁不住在班級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57)](#_56_2)

許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鋒隊里第一次見識政治。少年先鋒隊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軍運動為藍本。童子軍是共產主義俄羅斯保留的最后的獨立公共機構之一，它在1920年被蘇維埃政府取締。童子軍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輕成員，通過實踐活動來培養自己的公共責任感。在20世紀20年代，這種精神繼續存在于許多少先隊組織（也存在于部分蘇維埃精英學校）。到1925年，在10歲至14歲的蘇維埃兒童中，約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隊。隨后幾年中，該比例逐漸上升。像童子軍一樣，少先隊有自己的道德準則和禮儀，還有每一名隊員都熟記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后，很多人仍能回憶起來）。“我，一名蘇聯少先隊員，當著我的同志們的面莊嚴宣誓：遵守列寧的戒律，堅決擁護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事業。”少先隊員參與甚多的行軍、唱歌、體操和體育活動。他們還有一個呼應口號（呼：少先隊員，做好準備！應：時刻準備著！），源于紅軍。他們編成大隊，擁有自己的條幅、旗幟、歌曲和制服（白色襯衫和紅領巾）。這是隊員感到無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隊主要的誘惑。一名少先隊員回憶：“我不懂該運動的職責和義務，像其他人一樣，只企盼紅領巾。”1928年在彼爾姆加入少先隊的維拉·米諾蘇娃回憶：“我喜歡制服，特別是紅領巾。我每天都熨，戴著去學校。這是我唯一漂亮整齊的服飾，每當穿戴起它們，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長大了。”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學的瓦萊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紅領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隊后好幾天，每晚睡覺都要戴著它上床。 [(58)](#_57_2)

蘇維埃兒童通過少先隊強烈感受到社會的包容和排斥，每個孩子都希望成為少先隊員。加入少先隊是光榮和令人興奮的，紅領巾是為社會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標記。不能加入少先隊的孩子——其中許多人是因為自己的社會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瑪麗亞·德羅茲多娃被少先隊開除了，因為她來自“富農”家庭。她想恢復隊籍的愿望如此熾烈，以至在襯衫底下悄悄佩戴紅領巾多年。波蘭貴族的女兒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上教堂被人發現，因而遭到少先隊開除。她講述了被開除時的情景，依然情難自抑：

突然，他們在學校走廊的墻報上發布一條公告——快訊：“立刻集合！”孩子們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場上排成隊列，我被要求站在整個大隊面前，忍受羞辱。孩子們大聲喊道：“看，她去教堂，給我們全大隊帶來恥辱！她不配佩戴紅領巾！她沒有資格佩戴紅領巾！”他們朝我扔土塊，然后試圖扯下我的紅領巾。我開始哭，并大聲叫：“我不給！我不給！”我跪了下來，懇求他們不要拿走我的紅領巾，但到最后，還是被拿走了。從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隊員了。 [(59)](#_58_2)

少先隊的目標是向蘇維埃兒童灌輸共產黨的價值和紀律，讓他們接受黨和共青團慣用的“工作計劃和討論制度”。心理學家和教育理論家扎爾金特，是黨在人格的社會調整方面的主要發言人。他認為少先隊運動的目標，是訓練“革命的共產主義戰士，徹底避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毒害”。克魯普斯卡婭認為，少先隊將取代家庭，成為影響蘇維埃兒童的主要力量；它將教育少先隊員學會勤勞和聽話，以達到思想和行動上的純潔。米諾蘇娃回憶：“通過少先隊，我變得聰明整潔，按時完成任務，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這一切成為我一生奉行的準則。” [(60)](#_59_2)

少先隊員又是積極分子，參與各式俱樂部活動——組織示威游行、編輯墻報、從事義務勞動 [[5]](#_4_4) 、參加戲劇和音樂會——以培養自己的社會積極性和領導才能。瓦西里·羅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農家，他回顧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的學習和少先隊活動，還記得當時對公共活動的重視：

什么是“蘇維埃人”呢？它意味著，遵循我們在學校和少先隊中所學的，熱愛蘇維埃祖國，努力工作，樹立好榜樣。我把這些牢記在心。第三學年[ 1924年]時，我已是學校委員會的主席，后來又成為學校法庭的主席、學校審判中的公訴人、學校工會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積極的少先隊員，通過少先隊懂得了自己對學校和國家的愛，應超過對自己家人的愛。我喜歡我們村校的班主任，把她當做自己的母親。 [(61)](#_60_2)

并非所有的少先隊員都像羅馬什金一樣投入。對許多兒童來說，少先隊活動其實只是一種游戲。依達·斯拉溫娜是一位著名蘇維埃法學家的女兒，她回憶幼時在列寧格勒公寓街區組織自己的俱樂部：

我喜歡看兒童雜志《莫濟爾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號是：“媽媽！爸爸！我們將推翻你們的權威！”這雜志呼吁兒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匯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組織成像少先隊一樣的俱樂部。我是我們這一層樓孩子里的頭兒，我會大聲朗讀雜志上的文章，向俱樂部成員解說其中的道理。大樓管理部門讓我們借用地下室來聚會，我們在地下室的墻上貼滿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 [(62)](#_61_2)

其他少先隊員對政治活動更感興趣。他們受到長輩的鼓勵，模仿成年共產黨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這些早熟的積極分子，攜帶公文包前來出席“行政會議”，以黨的口號發言，做正規的記錄，并譴責涉嫌懷有反動思想的老師，甚至還有人在街上充當舉報人，協助警方追捕“間諜”和“敵人”。 [(63)](#_62_2)

到15歲，蘇維埃兒童從少先隊升至共青團，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夠格。1925年，共青團有100萬成員——約占共青團員合格年齡的4%（從15歲到23歲）——僅是少先隊成員相應比率的五分之一。 [(64)](#_63_2) 加入共青團是加入共產黨的前奏，很多工作職位和大學課程只對共青團員開放，或優先擇取共青團員。尼娜·維什尼亞克娃記得，加入共青團是一件“頭等大事”：

迄今[她寫于1990年]，我還記得共青團員手冊中的每一句話——它激起我的萬千思緒。我記得，我突然變成肩負重任的成年人……與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變得能干許多。加入蘇維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夢想。現在這個夢想即將成真。 [(65)](#_64_2)

詩人葉夫·多爾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師家庭，1930年從少先隊升入共青團。他參加申請入團的會議時遲到了，受到團書記的責備，指責他“顯然不夠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團的要求，申請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爾馬托夫斯基告訴父親此事，他的滿不在意受到了嚴厲的批評。父親警告說：“他們都在看你，你必須證明，隨時準備奉獻自己。”下一次會議中，一名女孩追問多爾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為蘇維埃政權犧牲自己的生命”。 [(66)](#_65_2)

加入共青團，就必須接受共產黨的命令、規則、倫理。共青團員對革命的忠誠，應該高于對自己的家庭。他們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輕的共產黨人，要像黨員一樣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團是黨的后備軍，都是年輕的積極分子，志愿為黨工作，在反對腐敗和濫權的斗爭中，隨時準備充當間諜和舉報人。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樣的任務具有極其廣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內戰的理想，深深打動了蘇維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這樣的行動和活力。許多年輕人加入共青團，不是因為信奉共產主義，而是因為身為積極分子，亟想有所作為，卻沒有施展抱負的其他渠道。 [(67)](#_66_2) 共青團員被要求在家長和教師中揭發“階級敵人”，作為鍛煉，還在學校和大學里參與對“反革命分子”的模擬審判。

他們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間），沒受到舊社會價值觀的熏染；又太年輕，沒參與血腥的內戰。這些青年積極分子，對革命的“英雄時期”抱有極為浪漫的憧憬。羅馬什金回憶：“我們渴望與父兄輩的革命家掛上鉤，認同他們的斗爭。我們穿得像他們一樣，一身軍服，模仿農村男孩從紅軍那里學來的軍人口語。”積極分子熱烈歡迎布爾什維克的斯巴達文化，他們從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革命、內戰的貧瘠中，對刻苦節儉并不陌生。他們更以禁欲主義的激進，杜絕所有個人（“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快樂，以免革命斗爭受損。有的自組公社，聚集大家的錢和財產，以“消滅個人主義”。他們在道德品質上也是絕對主義者，奮力掙脫古老的習俗。 [(68)](#_67_2)

20世紀20年代的理想主義共青團員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將在斯大林政權中發揮重大作用。敖德薩地區的共青團積極分子米哈伊爾·巴伊塔爾斯基，與朋友們組成俱樂部，他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時的主導精神：“人人都是純真的，如有需要，時刻準備以生命捍衛共產主義。如有炫耀或抱怨，會被冠以‘臭知識分子’的帽子，這是最具侮辱性的標簽之一，比它更糟的僅有‘自私自利者’。”在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獻給黨的事業。譬如有報道稱，某契卡（政治警察）為了革命需要而沒收父親的五金店，沒有一人會為此感到震驚。大家都認為，追求個人幸福的思想是可恥的，應予以消滅。正如巴伊塔爾斯基所說的，革命需要我們為明天的美好生活犧牲今天的歡樂：

我們的希望都寄托于未來。能夠親自參與即將來臨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擔其中的全部責任，我們感到無比激動，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會堅強無比。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車，把我們帶去別處，投入輝煌的事業。我們愉快地豎起耳朵，尋覓遠方火車的汽笛聲…… [(69)](#_68_2)

青年男女之間的親密關系被視作一種分心，只會削弱對革命的集體熱情，婚姻被斥為“資產階級”的習俗。列寧格勒紅色普蒂洛夫廠一名共青團積極分子在1926年宣布：“維持個人關系的想法是無法接受的，這種想法屬于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 [(70)](#_69_2) 巴伊塔爾斯基苦苦追求名叫葉娃的猶太女孩——她是當地的共青團書記，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有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團會議后陪她回家，牽她的手，偷一個吻。他們最終結了婚，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弗伊（Vi），以紀念列寧（列寧名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頭兩個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驅逐出黨，巴伊塔爾斯基作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開除。葉娃把對黨的忠誠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認定，宣布與他斷絕關系，將他驅出家門。巴伊塔爾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爾斯基以20世紀70年代的眼光回顧過去，認為葉娃仍是好人，對黨盡責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黨員的信仰預設了她對世界上“好壞”的反應。她讓自己的個性和理性，屈從于黨的“不容置疑”的集體權威。在布爾什維克中間有“成千上萬”個葉娃，即使革命漸漸讓位于斯大林專政，仍在無條件地接受黨的裁判：

這些人沒有變質，相反，他們幾乎沒有改變。他們的內心一如從前，對外部世界的變化視而不見。他們的不幸在于保守主義（我稱之為“革命的保守主義”），體現在他們對革命初期的標準和定義……保持一成不變的奉獻。這些人甚至接受勸服，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認是間諜。許多人相信，這樣做是革命的需要，從而可以視死如歸。 [(71)](#_70_2)

三

斯大林在1924年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屬于這支隊伍非常光榮，再也沒有比這更高的榮譽。”布爾什維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責任的載體，在社會上與眾不同。阿隆·索爾茨在影響甚廣的《政黨倫理》（Party Ethics，1925年）中，把布爾什維克與沙皇時代的貴族作了比較。他寫道：“今天，我們成了統治階級……我們國家的習俗，將以我們如何居住、穿著、行事、重視何種關系為準。”布爾什維克是執政的無產階級，與不同的社會階層進行親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索爾茨認為，布爾什維克娶無產階級之外的女子為妻，就是“壞品味，就像上世紀伯爵娶女傭一樣，必須受到相同的譴責”。 [(72)](#_71_2)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貴族的風貌為主。與此相應，黨的風貌很快也在蘇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據了主導地位。列寧本人曾把布爾什維克比作貴族。事實上，1917年后入黨就像社會階層的攀升，它能帶來精英地位、特權、優先獲得的官位，以及成為黨國的一部分。內戰結束時，布爾什維克已占據政府所有的主要職位。隨著蘇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國家的控制，官僚機構急劇膨脹。到1921年，蘇維埃官僚人數是沙皇時的10倍，共有240萬國家官員，超過俄羅斯產業工人的兩倍，成了新政權的主要社會基礎。

精英的態度很快在布爾什維克家庭扎根，并傳染給他們的孩子。根據1925年在各校進行的控制游戲的研究，大多數蘇維埃學生認為，黨員的地位理所當然應高于社會其他成員。兩個男孩發生糾紛，如果留給孩子們自己決定，他們通常支持父母是布爾什維克的男孩。該研究顯示，蘇維埃學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價值觀的重大變化，以新的等級制度，取代了曾在勞工階層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黨員的孩子滋長了明顯的特權意識。在一次控制游戲中，孩子們在玩火車，男孩想要開車，不愿等待一個小女孩上車。那女孩卻說：“火車會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車后，還要求獲得免費車票。 [(73)](#_72_2)

這個自封的精英階層，其資格是“共產主義道德”。布爾什維克把自己定為政治和道德的先鋒隊，其救世主式的領導意識，要求其成員證明自己擁有這個資格。作為精英，每一名成員必須證明，自己的私人行為符合黨的利益和信念。他還要顯示，自己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擁有比群眾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覺悟，誠實守紀，工作勤奮，無私奉獻。這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德體系。布爾什維克拒絕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為一種“資產階級壓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關的道德問題，必須服從于革命需求。一名黨的理論家在1924年寫道：“在階級斗爭中有助于無產階級的就是道德，有害于無產階級的就是不道德。” [(74)](#_73_2)

信仰是每一名“自覺的”布爾什維克的道德關鍵，使之有別于為私利而加入共產黨的“野心家”，信仰又是問心無愧的代名詞。黨的清洗和做秀公審（show trails），被用來探索被告的靈魂深處，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視為內心的真實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個公共問題，并不屬于私人。也許，這與東正教傳統的公開懺悔有關，卻與西方基督教的私下懺悔大相徑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但共產主義道德對此是不予承認的。1917年之后，這種意義上的俄語中的“良心”（sovest）一詞，幾乎從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覺悟或能力，達到對世界的較高級別的道德判斷和理解。它在布爾什維克的話語中還表明已經獲得道德革命的較高邏輯，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 [(75)](#_74_2)

當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能詳細了解黨的思想。對普通黨員來說，只要參與日常的實踐儀式便已足夠——誓言、歌曲、儀式、崇拜、行為準則——猶如組織起來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黨的學說是所有追隨者的信條，集體作出的判斷就是終極的正義。如果領袖指出某黨員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黨下跪，歡迎黨的判決。如果為自己辯護，無疑是對黨的意志抱有異議，是罪上加罪。這解釋了為何這么多布爾什維克，即使是無辜的，也在清洗中認命。布爾什維克領袖尤里·皮亞特科夫，1927年作為托派而遭開除。過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對話，對這類人的心態有所披露。皮亞特科夫為了能夠重返黨內，決定放棄許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責他已變成一個懦夫。但皮亞特科夫辯解，這僅僅表明：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隨時準備放棄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早已把自己的個性徹底融入“黨”的集體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拋棄自己的意見和信念……如果黨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76)](#_75_2)

皮亞特科夫改弦易轍得如此徹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樣，再也沒贏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將他逮捕。

清洗的開始，遠早于斯大林權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內戰時期。其時，黨的隊伍迅速增長，領導人害怕中間充斥著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對象是整個社會群體：“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富農”，等等。工人階級出身的布爾什維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會議中提出具體的指控。到20世紀20年代，清洗方式逐漸出現了轉變，變得越來越重視個別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和信念。

伴隨這一轉變出現的是一個愈益復雜的制度，即專門檢查和控制黨員的私生活。申請入黨的人，必須證明自己堅信黨的意識形態，重點放在何時投身于黨的事業。只有那些在內戰中與紅軍并肩作戰的人，才被視為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獻身精神。黨員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簡短的自述，或填寫履歷表，詳細解說自己的社會背景、教育、職業，以及政治覺悟的演變。在本質上，這些文件是某種形式的公開招供，黨員們以此來重申他們無愧于這個精英的稱號。其關鍵是要顯示，他們政治覺悟的提高全虧了革命和黨的監護。 [(77)](#_76_2)

列寧格勒礦業學院的悲慘事件，更力挺了黨對黨員私人生活的監督。1926年，有名女學生在學院宿舍里自殺，迫使她走上絕路的是她事實婚姻的丈夫的殘忍。康斯坦丁·科連科夫并沒被送上法庭，然而因為“對同志的自殺，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他受到了共青團組織的排斥。但地區黨組織的監察委員會——很像黨的地區法院——推翻了這一決定，認為過于苛刻，代之以“嚴厲批評和警告”。數星期后，科連科夫和他弟弟搶劫了礦業學院的收銀辦公室，刺死收銀員，刺傷其妻子。專管黨的倫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其資深委員索菲亞·斯米多維奇逮住這一案件，稱之為一種“病”，主要癥狀在于對同志的道德和行為的漠不關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著我的關心。科連科夫將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鎖起來，學生們只是袖手旁觀——好，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對她使用咒罵和侮辱的語言——也無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連科夫的房間響起槍聲，樓下房間的學生甚至覺得沒有檢查一下的必要，認為這也是私事。

斯米多維奇認為，集體的任務就是以監督和干預的方式，在成員私生活中強制執行道德標準。她主張，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真正的集體主義和“共產黨良心”。 [(78)](#_77_2)

斯米多維奇設想的監督和舉報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發明。幾個世紀以來，舉報一直是俄羅斯統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請愿來對抗濫權官員，在沙皇制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這個流行神話，只有沙皇（在沒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機構的情況下）在保護人民反對“邪惡的仆從”。在俄語詞典中，舉報（donos）被定義為一種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為），而不是自私或惡意的行為。該定義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 [(79)](#_78_2) 只不過在蘇維埃制度下，舉報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義和強度。蘇維埃公民受到極大的鼓勵，以舉報鄰居、同事、朋友甚至親戚，警惕是每一名布爾什維克的首要職責。已晉升為中央監察委員會高級委員的謝爾蓋·古謝夫主張：“列寧教導我們，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成為契卡。也就是說，他應該留心察看，積極匯報。” [(80)](#_79_2) 如果認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為在威脅黨的團結，黨員也應予以舉報。在工廠和兵營，黨員候選人的名單張貼在黨支部辦公室門外，邀請大家寫下對候選人的檢舉，指出他們各自的缺點（如酗酒或粗魯），然后再到黨員會議上討論。盡管有些黨領導人對此舉的道德屬性表示保留意見，匯報私人談話愈益成為舉報實踐中的共同特點。蘇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決定，一般不鼓勵有關私人談話的匯報，除非有“威脅黨內團結”的嫌疑。 [(81)](#_80_2)

在發展于20世紀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應邀出席舉報會議是一個關鍵。黨和蘇維埃的組織定期召開清洗會議，黨員和干部要答復群眾書面和口頭的批評。正如年輕的艾萊娜·邦納在共產國際的宿舍中所看到的，這些會議很容易演變成人身攻擊：

他們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時也會問到他們的小孩。原來有人毆打妻子，狂飲伏特加。巴塔尼婭[邦納的祖母]會說，體面人不會問這樣的問題。遭到整肅的人有時會說，他再也不會打妻子或酗酒了。還有很多人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再也不會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來，很像你被叫進老師辦公室時的情景：老師坐著數落你，你得站著，旁邊的其他老師露出鄙視的微笑。你趕緊說：“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會重犯。當然，這都是我的錯。”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點離開，好去參加其他孩子的課間游戲。而這些人更為緊張，其中一些人幾乎失聲痛哭。看到他們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肅都要持續很長時間，有時每晚對付三個人，有時只對付一個人。 [(82)](#_81_2)

在布爾什維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黨領導關注和檢舉的日益減少。每一個成員都要向集體袒露內在的自我，此種公共文化是布爾什維克所獨有的——納粹或法西斯的運動沒有如此的要求，納粹黨或法西斯運動中的個體，只要堅持黨的規則和意識形態，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布爾什維克明確拒絕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的差別。一名布爾什維克在1924年寫道：“有同志說，我現在所做的只與私人生活有關，與社會毫不相干。但我們認為，那不正確。” [(83)](#_82_2) 黨員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會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響到黨的利益，這就是“黨內團結”的含義——個人與黨的公共生活的徹底融合。

索爾茨在《政黨倫理》一書中，把黨設想成一個自我警戒的集體，每一名布爾什維克都在審議和批評其戰友的私人動機和行為。他想象，這樣身體力行的布爾什維克，方能借助黨的眼睛來認識自我。然而在現實中，這種相互監督的效果適得其反。它鼓勵人們展示自己處處符合蘇維埃理想，卻把真實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領域的暗處。蘇維埃制度要求忠誠，懲罰異議，于是這種虛偽變得日益普遍。20世紀30年代的恐怖時期，對幾乎每一個蘇聯人來說，保密和欺騙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會因此浮現。就蘇聯人口的大部分而言，這種雙重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已是現實，特別是生活在公眾視野中的黨員家庭，還有因社會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們學會了戴上面具，扮演蘇維埃忠誠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準則。

在這個社會中，談話是危機四伏的，家中的閑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復，可能招致逮捕和監禁。孩子們是危險的主要來源，他們天性愛說話，太年輕，又不懂偷聽來的談話中的政治含意，操場便成了舉報人的溫床。薩拉托夫一名中層布爾什維克官員的女兒回憶：“我們弄懂了禍從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會告訴任何外人。”

聽和說都有一定的規矩，我們小孩子必須學會。如果偷聽到大人的耳語，或是背著我們的悄悄話，我們都很清楚，絕不能轉述給任何外人。甚至讓大人知道我們已聽到他們的悄悄話，都會有麻煩。有時，大人脫口說了什么，然后告訴我們“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頭”，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憑本能學會了這些規矩。沒人向我們解釋這些話在政治上是很危險的。不知何故，我們總能猜著。 [(84)](#_83_2)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氛圍中長大。母親來自科斯特羅馬城的貴族家庭，在內戰中躲避了布爾什維克；父親是社會革命黨人 [[6]](#_5_4) ，1921年參與了在坦波夫州爆發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農民大起義，之后遭到監禁（他成功越獄，逃至列寧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處5年監禁，囚在蘇茲達爾的特殊隔離監獄）。尼娜成長于20世紀20年代，她憑本能懂得，不能在學校談及自己的父親。她回憶：“母親在政治方面有意緘默，宣稱對政治不感興趣。”從這種沉默中，尼娜學會了閉嘴。“雖然沒人定下說話規矩，但有一種感受，即家里的氣氛明確提醒我們，要避而不談父親。”尼娜也學會了對直系親屬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寫信給父親說：“我不愛其他任何人，只愛媽媽、爸爸和柳芭姨媽。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沒有任何其他人。” [(85)](#_84_2)



捷丘耶夫一家（4歲的柳博芙坐在中間），1927年攝于切爾登小鎮

加林娜·阿達西斯卡婭1921年出生于活躍反對派的家庭。父親是社會革命黨人，母親和外婆是孟什維克（三人都在1929年被捕）。20世紀20年代，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仍有可能在蘇維埃政府工作，加林娜的父母過著雙重生活。父親在新經濟政策推動的合作社管理部門工作，母親在貿易部供職。但在私下里，他們仍保留舊的政治觀念。加林娜受到刻意的保護，不碰這個秘密的政治領域，被培養成為“蘇維埃孩子”（她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政治是父母上班從事的，或用來寫作的。但在家里，他們從不談政治……把政治視作骯臟的行徑。” [(86)](#_85_2)

尼娜和加林娜所處的家庭可能有點極端，但她們憑本能學到的沉默規則，卻是眾多家庭所遵循的。出生于波蘭貴族家庭、因上教堂而被少先隊開除的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與家人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個村莊，住在一棟木房子的前半部。她回憶：“在家里，我們從不談論政治或類似的話題。父親總說‘隔墻有耳’。有一次，他甚至為我們演示，透過墻上的玻璃隔板，可以聽到鄰居的談話。我們懂了，自那以后也開始害怕鄰居。” [(87)](#_86_2)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烏拉爾地區的切爾登小鎮。父親亞歷山大是東正教神父，被捕于1922年，關在監獄里將近一年。出獄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政治警察）向他施壓，要他成為舉報人，匯報自己教民的活動，但遭到他的拒絕。為此，切爾登蘇維埃政府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并在1929年實行配給制度后拒發配給卡給他們。 [[7]](#_6_4) 亞歷山大的教堂又被宗教改革者奪走，后者尋求東正教禮儀的簡化，獲得蘇維埃政權的支持。不久，亞歷山大二度被捕，因為宗教改革者舉報他在信徒中散播不和言論（指責他拒絕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柳博芙的母親原在切爾登博物館從事圖書目錄的工作，也被辭退；兩個兄弟中年齡大的那個，也被學校和共青團開除。他們家的經濟來源全靠柳博芙當教師的姐姐。柳博芙回憶她在20世紀20年代的童年：

父母如果要談論重要事項，總是去屋外竊竊私語。有時，他們會與祖母在院子里交談，但從不在孩子們面前——從來沒有……他們從不爭論或批評蘇維埃政權——盡管他們滿腹牢騷——但我們從沒聽到過，哪怕是一次。母親老是跟我們說：“你們不要參與閑聊，不要多嘴，聽到的越少越好。”我們長大的地方，滿屋子都是耳語者。 [(88)](#_87_2)

四



巴塔尼婭·邦納與三個孫兒（左起：佐里婭、艾萊娜、葉戈爾卡），1929年攝于莫斯科

許多家庭在20世紀20年代經歷了日益加劇的代溝：舊社會的風俗習慣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優勢，論資排輩仍然行得通；但年輕人通過學校、少先隊、共青團，越來越接受蘇維埃宣傳的影響。對老一輩來說，這種情況構成了道德困境。他們一方面希望將家庭的傳統和信仰傳給子孫，另一方面又想把他們培養成蘇維埃公民。

在大多數家庭中，祖父母是傳統價值的主要傳承者。尤其是祖母，如果父母是雙職工，祖母就在養育子女和管理家務上承擔主要責任；如果母親只是兼職，祖母就承擔輔助責任。用詩人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的話，就是“在我們的年代，似乎沒有母親，只有祖母”。 [(89)](#_88_2) 祖母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她們通過管理家務，直接影響了孩子的禮貌和習慣。她們向孩子講述一些陳年往事（1917年之前的），以后既可作為蘇維埃歷史的參考或抗衡，又促使孩子對學校灌輸的宣傳生疑。她們為孩子朗讀在蘇維埃學校很少學到的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或帶孩子去劇院、畫廊、音樂廳，從而傳承了19世紀的文化價值。 [(90)](#_89_2)

艾萊娜·邦納是外祖母帶大的。她后來寫道：“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婭，而非媽媽。”她父母是黨的積極分子，常常不在家。艾萊娜在與外祖母的相處中，找到了她渴望但從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愛和親情。巴塔尼婭提供了道義上的平衡力，以抵消來自父母的蘇維埃影響。即使是個孩子，艾萊娜仍能意識到，祖母——一位豐滿且“美得驚人，既冷靜，又不卑不亢”的女性——所處的世界，不同于父母所處的蘇維埃世界。

巴塔尼婭的朋友和熟人很少來訪，我們樓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們不是黨員，但我經常陪她去拜訪別人。我看到她們不同的生活——吃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家具。（在我家，只有巴塔尼婭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擺設……）她們的談論也迥然不同，我覺得（這個印象肯定來自父母）她們應屬于不同種類，我說不出到底是更糟，還是更好。

巴塔尼婭保守的道德觀，植根于俄羅斯猶太資產階級的世界。她勤勞、嚴格、富有愛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紀20年代，巴塔尼婭曾是列寧格勒海關辦事處的“特殊人才”——“資產階級”專家和技術員雖受到很多嘲笑，卻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擔任會計，賺的比艾萊娜父母的“黨的最高限額”多。巴塔尼婭保存了節儉持家的老習慣，與艾萊娜父母帶入家中的“蘇維埃方式”老是發生摩擦。她讀很多書，卻“頑固地拒讀當代文學”，并在原則上不看電影，顯示了她對現代世界的不屑。她對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視的口吻談論黨的領導人，為布爾什維克專政的過分而責怪她的女兒。她真生氣時，會用這句話開頭：“讓我提醒你，在你們那個革命之前……”蘇維埃政府禁止東正教中最豐富多彩的懺悔節之后，惋惜舊習俗的巴塔尼婭對外孫女說：“嘿，這都是拜你們的媽媽、爸爸所賜。”毫不奇怪，艾萊娜困惑于家中價值觀的沖突。她在接受采訪時回憶：“我們孩子的教育問題引起了極大的爭執。”

外祖母從金色兒童圖書館為我借來書籍，包括各種蠢事笑話。媽媽很不以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對外祖母說什么。媽媽也帶書籍回來，但決然不同，如寫保爾·柯察金的， [[8]](#_7_4) 還是手稿，我也照讀，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歡哪一種。

艾萊娜熱愛的外祖母，是這個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認可父母和他們的世界：“我總認為爸媽的朋友是我的同類，而巴塔尼婭的卻是陌路人。從本質上講，我已經屬于黨。” [(91)](#_90_2)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在弗謝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數電影中擔任攝影師。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親利季婭·伊萬諾夫娜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薩的希臘商人家庭，在斯莫爾尼學院接受教育，學到了俄羅斯貴族優雅的風度和習慣。她將這些習性帶進戈洛夫尼亞家庭，以“俄羅斯維多利亞式”的嚴酷紀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納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異常漂亮的電影演員，來自車里雅賓斯克的貧農家庭。利季婭瞧不起柳芭的“粗俗”舉止，還認為她對昂貴衣服和家具的酷愛，恰恰體現了“蘇維埃新資產階級”（那些加官晉爵的工農）的物質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瘋狂購物后回家，與利季婭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利季婭告訴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婭自己僅有簡樸的生活習慣，總穿同樣的黑色長禮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帶柄眼鏡。她在內戰末期席卷俄國東南部和烏克蘭的大饑荒中幸存下來，盡管阿納托利的收入應付家用綽綽有余，她仍生活在饑餓的陰影之中。這家人還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兒奧克薩娜。利季婭用小筆記本，規劃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確切數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韋爾斯卡婭大街上的葉利謝耶夫店，“她會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鎮番茄汁”。回顧童年，奧克薩娜在1985年寫道：

祖母非常謙虛，嚴守紀律，儼然是個道德家，更可說是個教育家。她總想去做“正確的事”。我記得，她喜歡這樣告訴她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兒子：“如果你照我說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產主義了。”她說起話來無所畏懼，從不隱瞞她的所思所為。她堅信，思想應大聲說出來、講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騙、恐懼。她常對我說：“不要交頭接耳，這是一種無禮！” [[9]](#_8_4) 現在我才知道，她這樣做，是為了給她孫女樹立一個道德榜樣——為我示范正確的舉止。謝謝你，祖母！ [(92)](#_91_2)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實踐者和監護人。蘇維埃兒童的洗禮幾乎都是她們組織的，有時父母既不知情，也沒同意。她們帶孩子上教堂，把宗教習俗和信仰傳承下去。蘇維埃兒童的父母，縱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將之傳給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懼，萬一曝光，譬如說在學校，就有可能給家庭帶來災難。來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爾·福明，出生于列寧格勒附近的科爾皮諾。他回憶：“盡管有父母的強烈反對，祖母仍帶我去洗禮，在一個鄉村教堂里秘密舉行。父母擔心如果人家發現我受洗，他們將失去工廠的工作。” [(93)](#_92_2)

祖母的宗教信仰，會使孩子與蘇維埃學校的意識形態發生沖突。葉夫根尼婭·葉萬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師家庭，大部分童年都與祖父母在雷賓斯克度過。父親帕維爾是蘇維埃礦業理事會的總工程師，經常出差去西伯利亞；而母親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學，無法承擔幼兒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舊且虔誠，對葉夫根尼婭的成長影響甚巨。她上學的第一天，祖母給了她一個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結果被一伙男生發現，并遭到取笑。他們用手指著她大喊——“她信上帝！”給葉夫根尼婭帶來極大的創傷。她變得內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隊，她也拒絕了。在她那個年齡，這實在是罕見的抗議行動。后來，她也拒絕加入共青團。 [(94)](#_93_2) 鮑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親是資深黨員，擔任列寧格勒郊區一家工廠的經理，母親是一名教師。鮑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遺孀——帶大，她的宗教信仰給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間——我們共有5間——墻上布滿了宗教人物和帶有許愿燈的圣像，這是家里父親允許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間。外祖母去教堂，沒告訴父親就把我帶上了。我喜歡復活節儀式，只是嫌時間太長……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樂所在——她不去劇院或電影院。她只讀宗教書籍，也是我最早學著讀的書。母親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沒有時間，再說父親也不會答應。學校教我成為無神論者，但我喜歡教堂的美麗。外祖母去世時，父母已離婚[1934年]，母親鼓勵我繼續上教堂。我有時甚至領受圣餐，參與懺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認為自己特別虔誠。當然，在學校里，以及參軍[1941年]后，我從不談及自己的宗教。那樣的事必須藏掖起來。 [(95)](#_94_2)

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意見分歧制造了很多沖突。父母說的和老師教的常有矛盾，孩子們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寫道：“回家聽到一種講法，在學校里又是另外一種，我不知道誰是對的。”宗教問題特別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兩股力量的爭奪”：學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說確有上帝”。宗教問題分裂了年輕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農村，那里的老師鼓勵兒童挑戰老一輩的信仰和權威。一名農村男生在1926年寫道：“喝茶時，我與母親爭論上帝的存在。她說，蘇維埃政權打擊宗教和神父是錯的。但我向她保證：‘不，媽媽，你是錯的，蘇維埃政權是對的，神父是個騙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隊，便信心倍增，自覺成為移風易俗運動的一員。一名少先隊員寫道：“四旬齋期間的一天，我從學校回家，祖母只給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說：‘別生氣，四旬齋還沒完。’我回答：‘對你來說，可能有道理，因為你是老人。而我們是少先隊員，沒有義務遵循這些儀式。’”到了共青團，這種自信更加顯著，激進的無神論是“先進”政治覺悟的標志，幾乎是入團的先決條件。 [(96)](#_95_2)

父母必須認真考慮如何給孩子講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傾向，也往往不想讓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們知道，孩子長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須適應蘇維埃文化。這種妥協在專業人士的家庭特別常見，家長們明白，實現孩子的理想，還需依賴國家的認可。一名工程師（他父親是個建筑師）回憶：父母在革命前長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導的原則，但他自己從小就必須遵循不同的原則，如他所說的，“既要體面，又要滿足所有的社會需求”。類似情形也發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親彼得和母親瑪麗亞都是圖書館管理員，信教，經常去教堂，但從不引導三個女兒信教，其中一個女兒回憶：

父母這樣認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會與子女講上帝，因為我們生活的社會，將不同于他們所經歷的。他們無意讓我們過雙重生活，特別在我們加入少先隊或共青團之后。 [(97)](#_96_2)



福爾瑟家的農村保姆（列寧格勒）

很多家庭都過著雙重生活。他們慶祝蘇維埃公共節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紀念日），順應政府的無神論思想，但在私下場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葉卡捷琳娜·奧列茨卡婭是社會革命黨人，20世紀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贊。她與一對母女同住——母親是前鐵路工人的遺孀，女兒是共青團員，在一家紙廠工作。老婦人是虔誠的教徒，但在女兒的堅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櫥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團發現家中有圣像，女兒害怕會被解雇。奧列茨卡婭寫道：“在星期日和重要節日，她們會在晚上卷起帷幕，點燃許愿燈，通常先把門鎖上。”安東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樣神秘的家庭長大，父親從1922到1928年是薩拉托夫省的一個村蘇維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東正教信仰。安東尼娜回憶：“父母都篤信上帝，記得所有的祈禱文。父親格外虔誠，但很少談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時候。他從不讓我們[他的三個孩子]看到他祈禱。他告訴我們，必須學習學校對上帝的解釋。”安東尼娜的母親是一名簡單的農婦，在桌子抽屜里藏了一幅圣像。安東尼娜發現它時，已是20世紀70年代母親去世之后。 [(98)](#_97_2)

秘密奉行宗教儀式甚至還發生于黨員家庭，且相當普遍。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報告發現，1925年被黨開除的成員中，幾乎一半是因為從事宗教活動。在眾多黨員家庭中，共產主義理想與基督并存；列寧肖像與家庭圣像并排陳列在客廳的“紅色”角落或“神圣”角落。 [(99)](#_98_2)

在蘇維埃家庭中，俄羅斯傳統價值的另一載體是保姆，她們是祖母們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許多城市家庭，特別是雙職工的家庭。農村保姆的供應幾乎是無限的，特別是在1928年以后。其時，數百萬農民為躲避集體化而逃入城市，隨身帶來了農民的習俗和信仰。

幾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雇用保姆來照顧小孩。在國家提供普遍的托兒服務之前，對大多數女黨員來說，這是客觀上的必需，因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黨員家庭中，保姆們成為蘇維埃態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高級的布爾什維克傾向于雇用最昂貴的保姆；一般來說，她們恰恰最有可能懷揣反動的思想。例如，邦納家雇過許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謝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來自波羅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婭地主朋友的熟人），會教孩子“得體的舉止”；有的甚至曾為沙皇家庭做過事。 [(100)](#_99_2)

保姆能對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響。例如，黨員安娜·卡爾皮茨卡婭和彼得·涅澤夫茨夫，他們在列寧格勒家中的保姆瑪莎來自農村，是一名虔誠的老信徒。 [[10]](#_9_4) 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儀式，只用自己的盤子和餐具，與他人分開進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間做祈禱，也讓孩子們參與繁縟的信仰儀式。瑪莎還扮演民間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羅斯北部她的家鄉所做的，調制草藥來治療孩子的各種疾病。她善良慈愛，贏得了尊重，并在蘇維埃當局追查宗教積極分子時，獲得了雇主的保護。她的存在導致了那一家的寬松氛圍，這非常罕見。安娜的女兒馬克斯娜回憶：“家里有個老信徒，我們并不覺得奇怪。其他黨員家庭所流行的激進無神論，在我家卻不見蹤跡。雖然我們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從小學會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 [(101)](#_100_2)



娜塔莎·奧韋奇尼科娃

伊娜·蓋斯特是布爾什維克的孩子，卻深受保姆不同價值觀的影響。伊娜的父親阿隆·蓋斯特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高級經濟學家，母親拉希爾·卡普蘭也是經濟學家，任職于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來自法定猶太區。那是沙皇時代猶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羅斯帝國的西南角。夫婦倆在白俄羅斯的戈梅利鎮相遇，他們內戰時期入黨，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紅色教授研究院學習，拉希爾在紡織工會工作。像許多蘇維埃猶太人一樣，蓋斯特夫婦把希望寄托在工業化上，認為它將結束蘇聯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剝削。他們第一個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兩個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讓她搬入他們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奧韋奇尼科娃來自莫斯科以南梁贊省的農民家庭。內戰中，布爾什維克的糧食征用毀了她家的小農莊。1921年大饑荒時，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蓋斯特家很少談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歲，伊娜已經知道，保姆生長的世界與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禱，聽到她躲在自己房間哭泣，看到她梁贊親戚的貧困——也逃來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擁擠的營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視。伊娜喜歡與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沒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帶去相贈，等到父母詢問失蹤的鞋時，再謊稱自己不小心丟了。伊娜還太年輕，不會在政治上起疑，但已與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聯盟。 [(102)](#_101_2)

保姆老家的農民世界基本上還保存著家長制傳統。1926年，農民占了蘇維埃人口的80%—1.2億人（總人口1.47億），分布在蘇聯61.3萬個村莊和偏遠的定居點。 [(103)](#_102_2) 他們仍然依戀個體家庭在家庭農莊上勞作的生活。這成了蘇俄個人主義的最后堡壘，在布爾什維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主要障礙。

有些地區，特別是俄羅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滲入農村，有文化的農民子弟取代父親，成為家庭農莊的帶頭人，或脫離龐大的大家族，自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區，家長制的農民傳統仍占主導地位。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1923年出生于農家，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莊奧布霍沃位于莫斯科東北800公里處。這一古老的定居點坐落在森林中間，全由木屋組成。村莊中間有池塘，還有建于18世紀的大教堂。戈洛溫一族在奧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戶居民中有20戶是姓戈洛溫的）。 [(104)](#_103_2) 1882年，安東尼娜的父親尼古拉出生于該村，除了當兵3年，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過。像許多其他村莊一樣，奧布霍沃村是緊密相連的社會，家人和親屬的關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民認為自己屬于單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親屬名義稱呼其他成年人（姨媽、叔叔等）。布爾什維克試圖把他們劃分成對立的社會階層——富農（農村資產階級）和貧農（所謂的農村無產階級）——卻以失敗告終。內戰期間，他們在蘇俄大部分地區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來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勞、冷靜、成功，在奧布霍沃村備受尊敬。一位村民回憶：“他很安靜——不喜饒舌混日子——工作踏實、辦事得力，農民都看重這一點。”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復員回來，成為奧布霍沃村農民公社的領導人。農民公社是一個古老機構，由農民中的領頭者組成，建于農奴制時期，掌管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農奴解放宣言”發布后，其自治權力大大加強，從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職能，成為農村行政的基本單位。在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農民公社控制的農地由社區共同擁有，由農民分戶耕種。由于是長條耕種的開放制度（長條耕地之間沒有分界），農民公社必須規定種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劃分耕地——這一平等原則有助于確保耕者有其地，幫助農民公社繳納國稅。到1917年，農民公社成為農民革命的核心。農村舊秩序崩潰之后，大多數原頭面人物（士紳和神職人員）紛紛逃離，俄羅斯農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鎮革命黨的指示——再通過農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會（蘇維埃），自行分配到戶。 [(105)](#_104_2)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羅斯大多數農民一樣，他也靠租來的耕地養活家人。在俄羅斯，人口過剩和低效農業導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農民公社沒收教屬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給農民。尼古拉根據家里有多少“吃飯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頃的耕地和牧場。他現在的土地幾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種的兩倍，而且還不是租來的。但在奧布霍沃村，或俄羅斯北部的任何地區，4公頃還是不夠生活。這里的土壤貧瘠，又因森林而分散，為了確保每一個村民得到平等份額，又被分割成狹長的一條條，寬不到幾英尺，根本不適合現代耕犁。戈洛溫的耕地由80條狹長地組成，分布在18個不同的地點——這在沃洛格達地區并非罕見。為了補充收入，農民又涉足貿易和手工業——它們在北部農村經濟中一直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幾乎與農業不分軒輊，在新經濟政策下，又獲得了蓬勃的發展。政府鼓勵鄉村貿易，更通過合作社予以資助。尼古拉在他農莊的后院辦起了皮革工場。安東尼娜回憶：

我家可以吃飽，但那是我們勤奮和節儉的結果。6個孩子都在土地上賣力，即使是最小的也不例外。父親的工作時間很長，在工場里制作皮鞋和其他皮革制品。他去市場買牛，一丁點兒都不浪費。他自己宰牛，賣牛肉，鞣制皮革（本地農民都懂這門手藝)，制作皮靴，然后再去市場出售。 [(106)](#_105_2)

她回憶，熱愛勞動是“我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重心”。在最勤勞的農民家庭中，這是非常典型的，孩子們從小就在農莊上勞動。安東尼娜記得，這些農民都為自己的勞作而感到自豪：

父親喜歡說，我們要做就要盡量做好——像是行家做的，這就是他所謂的“戈洛溫方式”——這是他最高褒獎的用詞……到我們上學時，他告訴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學會一門好職業。在他眼里，好職業是醫生、教師、農藝師和工程師。他不希望孩子學習制鞋，認為這太辛苦了。他的手藝活真可媲美藝術家，我們這些孩子和訪客，都為他的手藝的美妙而深感驚訝。 [(107)](#_106_2)

尼古拉還為自己建造了住宅，一座單層刷白的長型建筑，位于奧布霍沃村中間的磨坊附近。它是整個村莊里唯一的磚房，包括一間飯廳和一間臥室，內置從沃洛格達買來的簡陋工廠家具和兩張鐵床。一張供尼古拉和妻子葉夫多基婭睡，另一張供兩個女兒睡（男孩子們則睡在飯廳地板上）。廚房是家里唯一的入口，外面有供牲畜遮風避雨的院子，內有牛棚、豬圈、馬廄和兩個谷倉，另外還有洗澡房、廁所、工具庫、工場。院子外，有一園的蘋果樹。

尼古拉是個嚴厲的父親。女兒安東尼娜回憶：“所有孩子都怕他，但害怕的根源是尊重。母親喜歡說，‘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親’。無論父親說什么，我們都視為律法，即便是四個男孩也都如此。”在這種家長制家庭里，大人與小孩之間僅有很少的溫柔和親密。安東尼娜說：“我們從來沒有親吻或擁抱過父母，不會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愛。我們從小學會尊重和敬仰他們，始終依順他們。”但這并不意味著互相之間沒有愛。尼古拉寵愛小女兒，后者還能憶起4歲時的一段溫情。父親穿上他最漂亮的節日棉紗襯衫，以強壯的手臂抱著她去村教堂。

突然，他拉著我的手，緊緊貼上他的嘴唇。他閉上眼，真情地吻我的手，我迄今還記得。現在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多想表達自己的愛。他身穿繡有棕色花朵的新襯衫，那么潔凈，那么清香。 [(108)](#_107_2)

五



1925年，維滕貝格一家人在奧爾戈諾度假區

對舊社會精英來說，如何將家中的傳統和價值觀傳給下一代，變得尤其復雜。想在新社會取得成功，便不能堅持自己的老習慣，而要適應蘇維埃的新形勢。為了維持新舊之間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過雙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內部移民”），悄悄保留舊信念，可能還要欺瞞在蘇維埃模式中長大的孩子。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雖在暗中保留舊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應了蘇維埃的新形勢。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茲卡精神病醫院擔任神父。拉斯普京抵達之前，皇后亞歷山德拉為治療皇儲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畢業于斯莫爾尼學院，曾是皇太后瑪麗亞·費多羅夫娜的閨蜜。1917年后，彼得和長子在醫院擔任搬運工；曾任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團指揮的小兒子參加紅軍，在內戰中戰死；長女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秘書；小女兒瑪麗亞放棄音樂會鋼琴家的生涯，擔任盧加地區集體農莊的稽查員，瑪麗亞的丈夫原是歌手，現在普里阿茲卡醫院當清潔工。整個20世紀20年代，全家都住在醫院后面的辦公室，從不抱怨自己的極度貧困，只是靜靜度日，認真執行新政權布置的各項任務——只有一樣例外：每天晚上，他們從秘密藏匿之處取出圣像，點亮許愿燈，以便祈禱；他們上教堂，慶祝復活節，始終保留圣誕樹，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誕樹被宣布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遺存”而遭禁止。瑪麗亞和丈夫要女兒塔蒂亞娜在項鏈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讓別人看到。塔蒂亞娜回憶：“我從小學會相信上帝，同時又要適應蘇維埃的學校和生活。”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兩個世界的邊緣地帶。彼得仍向寧愿以基督教儀式埋葬親屬的人——蘇維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數——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務。 [[11]](#_10_4) 塔蒂亞娜解釋說：“我們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見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寧格勒墳場，幫助操持圣禮，賺一點小費。” [(109)](#_108_2)

過去的專業精英們則采納另一種方式，既維持家中的傳統生活，又適應蘇維埃社會。醫生、律師、教師、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可向新政權提供自己的專業技能，以此守護自己的某些特許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當不錯，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如此。其時，新政權仍迫切需要這些“資產階級專家”的專長。

帕維爾·維滕貝格是蘇維埃地質界的領軍人，在開發科雷馬和瓦伊加奇島的古拉格——強制勞改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個孩子中排行老八。他們是波羅的海地區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帕維爾的父親原籍在里加，因參與1862至1864年反沙皇統治的波蘭起義，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釋放后，他任職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電報局。帕維爾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薩、里加和德國的蒂賓根求學，1908年來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輕、嚴肅的理工博士。他與正在圣彼得堡學醫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結婚，岳丈是鐵路工程師，也是自己的遠親。這對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蘭灣的奧爾戈諾高級度假區，買了一套寬大而舒適的木房子。三個女兒相繼出生：維羅尼卡生于1912年，瓦倫蒂娜生于1915年，葉夫根尼婭生于1922年，家人之間非常親近。葉夫根尼婭回憶，帕維爾作為一名父親，既“細心”，又富有“耐心和愛心”。大家在奧爾戈諾度假區享受“音樂、繪畫、閱讀的夜晚”，非常幸福，還有夏日閑逸的散步，以及從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準備的簡餐。維滕貝格家經常有藝術家和作家之類的訪客，例如著名的童書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們家度過好幾個夏天。整個20世紀20年代，這種契訶夫式的生活始終存在。

維滕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務精神的影響，這幾乎是19世紀知識分子的標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學得的醫術在鄰近的拉赫塔小鎮設立醫院，向患者提供免費治療。帕維爾在1917年當選為拉赫塔鎮理事會的主席，他組建學校，向窮苦勞動者的子女傳授技術。葉夫根尼婭回憶：“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沒在寫作，就在籌劃極地委員會的探索，或為地質博物館組稿。他總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維爾全力以赴投入極地考察和地質事業，雖處起步階段，但在世界上仍處于領先地位。極地勘探者在蘇維埃的書籍和電影中是英雄。20世紀20年代，蘇維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學預算，對北極區的潛在礦產做了地質調查。帕維爾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歡迎蘇維埃政權的關注，讓他在有組織有紀律的環境中追求科學成果。1927年帕維爾寫道：“過去10年是極地勘探的英雄時期，未來會有更大的成就。” [(110)](#_109_2) 過后不久，他就離開奧爾戈諾度假區，前往科雷馬勘探金礦。

以同樣方式適應蘇維埃政權的另一對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父母。西蒙諾夫本人是《耳語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屬于1917年的孩子。母親亞歷山德拉是奧博連斯基家族的后裔，那個負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現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國中占據顯赫的地位。亞歷山德拉的父親列昂尼德像許多貴族一樣，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已經商。亞歷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從斯莫爾尼學院畢業，也是“舊秩序”女子，其貴族態度經常與蘇維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頗有氣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確行為”的舊觀念，還將之傳給兒子——而他一生的紳士風度眾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權中取得高級職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們彬彬有禮——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堅持原則。她的孫子回憶，她簡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誨他人如何立身處世時，永遠不厭其煩”。 [(111)](#_110_2)

1914年，亞歷山德拉嫁給年齡幾乎兩倍于自己的米哈伊爾·西蒙諾夫——時任總參謀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誕生。 [[12]](#_11_4) 米哈伊爾是軍事防御工事的專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波蘭參戰，升為第五軍的少將和第四軍團的參謀長，卻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亞歷山德拉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蘭從事一些秘密使命，無法與蘇俄的家人接觸；或許加入了波蘭軍隊，或許加入了俄國內戰中波蘭盟友的白軍。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羅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將軍，肯定會遭到布爾什維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亞歷山德拉對自己丈夫的活動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兒子隱瞞，無疑是為了提供保護。1921年，米哈伊爾從波蘭寫信給亞歷山德拉，懇求她把兒子帶去華沙同住，他已成為波蘭公民。亞歷山德拉一直猶豫不決，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爾已經病重。但到最后，她愛國之心太甚，以致離不開俄羅斯。西蒙諾夫后來回憶：“雖然逃往國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親屬，但母親對俄國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無法理解，怎么能背井離鄉作別俄羅斯。” [(112)](#_111_2)

亞歷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年輕女性的隊伍，在新蘇維埃政府中從事打字員、會計、翻譯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趕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時正是紅色恐怖的高潮，布爾什維克發起了推翻舊精英的運動。像奧博連斯基那樣的“遺民”，即敗落的貴族和“資產階級”，都被趕出自己的家園，財產悉數充公。他們被編入勞動大軍，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監禁，在反白軍的內戰中成為“人質”。在好幾個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亞歷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離開彼得格勒，前往梁贊——位于蘇維埃首都的東南面，相隔200公里。他們與亞歷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隊長，陣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炮兵團一直以梁贊軍區為基地。與其他數以百萬計的城市居民一樣，他們在內戰中逃離饑餓的城市，走向糧食供應地。 [(113)](#_112_2)

梁贊在20世紀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鎮，約有4萬居民。其主要機構之一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軍校，為內戰中的紅軍培養軍官。教職員工中的亞歷山大·伊萬尼謝夫曾是沙皇軍隊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兩次受傷（三次受到毒氣攻擊），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紅軍，成為一名指揮官。1921年，亞歷山德拉與伊萬尼謝夫結婚。對奧博連斯基家族的女兒來說，這無疑是下嫁，亞歷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鐵路工的兒子。亞歷山德拉自己時運不濟，在丈夫的軍人作風中，她覓得了自己貴族原則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務的理想精神。在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獲得了一些慰藉。 [(114)](#_113_2)

性情溫和善良的亞歷山大卻是一名完美的“軍人”——準時、認真、有序、嚴于律己。康斯坦丁回憶，他治家就像治軍一樣：

我家就在軍官兵營，四周都是軍人，軍事方式規范了我們生活的每一步驟。我家門前的廣場上，早晚都有列隊行進的軍人。母親和其他軍官的妻子，一起參與軍隊的各式委員會。如有客人來訪，談話內容總與軍隊有關。晚上，繼父制訂軍事演習計劃，我有時陪在旁邊相助。家中的紀律很嚴，純粹軍事化。一切都按照計劃，下的命令刻不容緩。你不能遲到，也不可拒絕，必須學會閉嘴。即使最小的謊言，也會受到嚴厲地斥責。母親和父親遵循自己的服務倫理，在家里實施嚴格的勞動分工。我從六七歲起，就要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我除塵、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爐、外出領取牛奶面包。 [(115)](#_114_2)

這樣的童年生活對西蒙諾夫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從小接受的軍人價值（如他自己所定義的“服從、自覺、時刻準備克服一切障礙、必須說‘是’或‘不是’、愛憎分明”），使他全力擁護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蘇維埃準軍事制度。

十三歲時我就懂得：

說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爭辯只是徒勞。

我知道責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謂犧牲。

我知道勇氣的潛能，

對怯懦就要不依不饒！

——《父親》，1956年 [(116)](#_115_2)



1927年，康斯坦丁（左一）與亞歷山德拉、亞歷山大·伊萬尼謝夫（右）在梁贊



西蒙諾夫課堂筆記中的一頁（1923年）

西蒙諾夫崇敬繼父（“我從沒看到他不穿軍裝的時候”），從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親。他從亞歷山大的身上繼承了責任和服從的軍隊準則，從母親和她的貴族背景中獲得了公共服務的理念，兩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讀的書籍中充滿了蘇維埃的軍事崇拜，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這些原則。他深深著迷于俄國內戰的傳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Chapaev，1925年）。這是每一個小學生必讀的“蘇維埃經典”。少年時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軍人，他的筆記本上涂滿了他自己想長成的士兵形象。 [(117)](#_116_2) 西蒙諾夫很早便意識到，自己需要融入一個等級制度之中，認為自己長大后不只是軍人，而要當上為他人負責的軍官。同時，他強烈的公共責任和服從意識，又要求他服從上司。如他自己寫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誠實”和“盡責”——這一概念后來成為他擁護斯大林政權的根源。他成長時期的人際關系大都涉及權威人士，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時間都與成人相處，并善于贏得成人的認可。在學校里，他沒有密友，也從沒弄清友誼中的道德準則，以及對同伴的忠誠。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顯的另一傾向，即努力贏取上級的歡心。而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他詩作中的主題卻仍是同志間的友愛（這是他渴求的領域）。西蒙諾夫既聰明又早熟，閱讀廣泛，學習努力，他加入各式俱樂部，參與戲劇演出，是一名少先隊員。除了涂鴉，他的筆記本還顯示出他是一個嚴肅的男孩：花費很長時間來繪制地圖和圖表，像官員一樣列出步驟來籌劃自己的任務。 [(118)](#_117_2)

西蒙諾夫在世最后一年寫成的回憶錄認為，他的父母已接受蘇維埃政權。他不記得父母有任何議論，或不贊成政府，或后悔沒在1917年后移居國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員，留下為蘇俄工作是責無旁貸的，即使自己的價值觀還沒有“蘇維埃化”，但有責任把康斯坦丁培養成“蘇維埃”孩子。但這只是真相的一半。亞歷山德拉以政治忠誠的外表，掩飾了她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畢竟，新政權給她家人帶來了災難。亞歷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爾科夫省的省長，留下則會被布爾什維克逮捕），兄妹再也沒有見上面。其余家人——亞歷山德拉、母親、三個姐妹，都生活在恐懼和貧窮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贊。內戰結束后，亞歷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婭和達麗婭，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親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著回到彼得格勒。亞歷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贊，盡力適應蘇維埃環境。（她在1944年寫信給兒子說：“我出生于另一個世界。在生命的頭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來的摧毀……我洗刷、烹飪、奔波采購、整天工作。”）她除了傳承貴族的價值觀，也努力保存宗教習俗。她帶兒子上教堂，直到兒子長到12歲（他在后來寫給姨媽的信件中，繼續在東正教節日以宗教用語向她們問好）。她還告訴他，他的貴族出身太危險，如果想取得進步，必須加以掩飾。 [(119)](#_118_2) 新經濟政策有相對寬松的氣氛，但大革命所釋放的階級斗爭只是暫告停頓。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舊精英的壓力持續增加，威脅著像西蒙諾夫那樣的人家。

1927年，母親將西蒙諾夫帶去克列緬丘格城附近的農村，與繼父的親屬同住。“熱尼婭姑姑”與其丈夫葉夫根尼·列別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將軍，很久以前因腿傷而從沙皇軍隊退伍，幾近癱瘓，全得依賴年輕的妻子。老將軍是自由派，心地善良，開朗樂觀，對蘇維埃政府并沒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歡與他做伴，因為他有趣，善講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樹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時，房門已被陌生人打開。原來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人員，來抄家尋找反革命活動的罪證，試圖對老將軍實施拘捕。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回憶此事：

我進去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人員正在掀起床墊四下搜尋，而老人還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張凳子對我說：“坐下，小男孩，等在一邊。”他的態度說不上是粗魯，更近于專橫。我明白，必須坐下，聽從他的命令……兩名制服男子在執行搜索，但沒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氣，咒罵他們，威脅要去控告他們的非法行徑。在我看來，熱尼婭姑姑還比較鎮靜，只是擔心丈夫的心臟病發作，一直在勸慰他冷靜下來，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繼續搜索，依次翻閱每本書，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繡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墻，下身癱在床上，咒罵不停……最終搜索完了，離開時沒有帶走任何東西。他們顯得克制，沒有詛咒或訓斥，因為面對的是一名癱瘓老人……在我的意識中，此事并不顯得可怕、悲慘、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點正常。

該情節的有趣之處在于西蒙諾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國家鎮壓的非法行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來聲稱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將之視作一種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諾夫在20世紀30年代，以類似心態面對其他親屬的遭捕，包括他的繼父和三位姨媽。他視之為“必要”的行為，更加以合理化——應該是弄錯了，因為親戚們肯定是無辜的；但國家必須鏟除潛在的反革命分子，在這一點上又無可厚非。 [(120)](#_119_2)

1928年，西蒙諾夫隨父母遷居到伏爾加河邊的工業大城市薩拉托夫，因為亞歷山大在當地軍校擔任教官。全家仍住軍營，占用相鄰的兩間屋，與幾戶鄰居共用一個廚房。西蒙諾夫開始上中學，到1929年14歲時決定放棄中學。他不愿完成父母為他規劃的學院教育計劃，改上了一個普通教育與技術培訓相結合的工廠技校（FZU）。

像許多舊知識分子的孩子一樣，西蒙諾夫急于為自己創造“無產階級”身份，好擺脫自己的社會出身，以免在蘇維埃社會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工廠技校和更高層次的技術學院，擠滿了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他們拒絕上大學（此時優先招募工人階級出身的申請人），轉向工廠或技校，以取得“無產者”資格，為將來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礎。西蒙諾夫將母親的成分登記為“職員”，其他舊精英的許多孩子也隱瞞社會出身，或選擇性使用自己的履歷，以獲得技校和學院的錄取。其中的大多數，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的工業革命中，成為工程師或技術員，生成一種全新的專業身份，讓自己從社會階級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最重要的是他們對蘇維埃工業化的貢獻。西蒙諾夫拒絕父母為自己選擇的學院教育，這一點很重要。這標志著他已拋棄了自己降生時進入的舊文明，轉身采納“蘇維埃”新身份。

西蒙諾夫白天在技校中學車床，晚上去薩拉托夫軍火廠當學徒。他后來承認，自己并“沒有工業上的真正才能”，只是為了“虛榮”而堅持到底。他寫信給住在列寧格勒的姨媽索尼婭，雖然年僅十幾歲，卻展示了他頻繁的社會活動，以及對蘇維埃事業的滿腔熱情：

[1929年]

親愛的索尼婭姨媽！

我這么長時間才回復你的問候，望見諒。我從來沒有如此忙過。我參加了4個俱樂部：擔任其中兩個的管理委員和另一個（青年自然學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會主義者]競賽小組、閱讀小組、學校的編輯委員會、化學隊[以應付毒氣攻擊]的成員。我又是互助運動的教練、校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向技校行政部門匯報學生的政治活動和不同意見]和“工人援助國際學會”的義工。此刻，我正在幫助校管理委員會下屬小組組織反宗教的宣傳，還在負責班級的管理委員會。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學校內組織一個象棋俱樂部。我想，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況。 [(121)](#_120_2)

很難講清這些狂熱活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動機——從小浸潤于公共服務精神的少年，現在迸發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盤，冀望通過積極表現來掩飾社會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蘇維埃社會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熱烈信念。不管如何，這就是西蒙諾夫參與斯大林政權的開端。

六



拉斯金一家（從左至右）：貝爾塔、索尼婭、葉夫根尼婭（熱尼婭）和法尼婭，1930年攝于莫斯科。塞繆爾此時已流放



1927年的斯拉溫家庭。依達與父親伊利亞（左四）在一起，母親埃斯菲莉挨著父親。

商人階層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來適應新政權，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出籠之后。1922年，塞繆爾·拉斯金與妻子、三個女兒離開奧爾沙鎮來到莫斯科，全家搬進蘇哈勒夫卡市場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經濟政策下，該市場是蓬勃發展的私人貿易的代名詞。塞繆爾·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經營鯡魚和其他咸魚。像許多猶太人一樣，他來莫斯科是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業的新機遇。他在女兒身上寄托了各式夢想，希望她們通過蘇維埃學校和大學，最終變成專業人士。而身為猶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繆爾出生于奧爾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猶太區內的一個市場集鎮，全是單層木屋，沒有自來水，也無下水道。父親莫伊謝是咸魚批發商，住在一棟破敗的木房子里——房子處在通往什克洛夫鎮的交通要道上，夾在兩座教堂中間，一座屬東正教，另一座屬天主教。奧爾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羅斯人、波蘭人、白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猶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猶屠殺）。拉斯金一家講意第緒語和俄語，遵循猶太教儀式，上猶太教堂，送小孩去猶太學校，又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羅斯社會中的進步。莫伊謝有六個孩子，三個大的（西馬、索爾、塞繆爾）在家自學，年幼的三個（法尼婭、雅可夫、熱尼婭）設法避開沙皇的限制——禁止猶太人上大學和成為專業人士 [[13]](#_12_4) ——考上了大學，成為合格的醫生。這的確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對兩名女孩法尼婭和熱尼婭來說更是如此。 [(122)](#_121_2)

塞繆爾跟隨莫伊謝經商，1907年與鄰鎮什克洛夫猶太商人的女兒貝爾塔結婚。夫婦倆生了三個女兒，法尼婭（生于1909年）、索尼婭（1911年）和葉夫根尼婭（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鎮，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繆爾善良溫和，聰明務實。他對文學和國際政治抱有濃厚的興趣，全心全意擁護革命，視之為猶太人的解放良機。他一直夢想讓自己心愛的女兒獲得良好的教育，現在有了新經濟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業安居，夢想成真。

新經濟政策使莫斯科變成一個大市場。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內戰時期，私人貿易全被取締。經歷了如此的艱辛之后，大家對市場所能提供的任何東西都積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絡繹不絕地來到像蘇哈勒夫卡市場那樣的街頭市場，商人手里什么都有，從廢鐵、衣服、鍋碗瓢盆到藝術品。塞繆爾在博洛特納亞廣場上擺鯡魚攤，該廣場位于莫斯科河南，離克里姆林宮不遠，已變成菜市場，向繁忙的餐館和咖啡館供貨。在鯡魚生意上，沒人比塞繆爾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開一個咸鯡魚罐頭，馬上就能確定它的產地——伏爾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諾夫哥羅德。

開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馬什昌斯卡婭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墊直接鋪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掛起簾子，將孩子睡覺區與大人的分開，又要與樓上居民共用廁所和廚房。到1923年，塞繆爾的鯡魚生意日益興旺，便租下斯列堅斯卡婭街上一棟曾經輝煌的大房子的二樓。該公寓非常舒適，有三個寬敞的房間，一個大浴室。其時的莫斯科，有獨用的衛生間和廚房是罕見的奢侈。塞繆爾相當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錢給住在奧爾沙的父母，幫助侄子馬克一家搬來莫斯科。拉斯金一家還定期去莫斯科大劇院，塞繆爾總是租個包廂。 [(123)](#_122_2)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價格的上漲引發了無產階級對新經濟人及其財富的強烈不滿。為了撫慰大眾的騷動，市蘇維埃政府關閉了30萬家私人生意。 [(124)](#_123_2) 拉斯金一家成為該反彈政策的受害者。塞繆爾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須向莫斯科蘇維埃繳納一項特別稅。像其他小商販一樣，他被定為被剝奪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選舉權和其他公民權利。塞繆爾默默忍受這些懲罰，幾年來，一直在支付他那個鐵架商攤的高額“商業租金”——莫斯科蘇維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別稅之一，目的是為了安撫工人階級對新經濟政策的不滿。1925年，塞繆爾拒絕了將生意轉至伊朗的邀請，那里的魚工業亟需俄羅斯的專長。他希望三個女兒在蘇聯長大，充分利用他認為將會出現的眾多機遇——結果卻是錯覺。法尼婭是老大，也最實際，1926年以優異成績通過學校考試，因父親屬于被剝奪者，讀醫的申請遭到拒絕，只好去工廠上班，改在夜校學經濟。索尼婭認真嚴肅，口齒伶俐，聰明美麗，但因不幸罹患小兒麻痹癥而落下了殘疾。像姐姐一樣，她也無緣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爾尼基工業學校的夜校學習統計，到1928年又進了鋼鐵學院。像其他猶太人一樣，包括成為工程師的表弟馬克，索尼婭全心全意地擁護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項目。該計劃承諾，將使落后的農業俄羅斯變得現代化。拉斯金一家當初逃離的，就是那個反猶大屠殺時有發生的落后的農業俄羅斯。葉夫根尼婭（熱尼婭）排行老幺，更有藝術氣質，攻讀家人都心儀的文學。法尼婭回憶，拉斯金一家仿佛“總是在文學辯論中”。因是被剝奪者的子女，索尼婭在1927年申請加入共青團未果。三姐妹、馬克和鄰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組了一個閱讀小組。他們討論政治，舉辦對“文學人物”的模擬審判。有一次，他們舉行對《舊約圣經》的審判，為此找到一本《圣經》，共同研究了整整一個月。 [(125)](#_124_2)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文學作品、意識形態、宗教習俗發起公開審判是非常流行的宣傳活動。

在第一代蘇維埃猶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認同俄國革命中的國際主義。因為它承諾將消除民族之間的偏見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現代化城市，將為猶太人打開通向一般學校、大學、科學、藝術、職業、貿易的大門。僅經過1917年的一代，俄羅斯猶太人都已變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猶太區的猶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維埃猶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蘇聯11個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猶太人口，從1914年的1.5萬人，劇增至1937年的25萬人（該市第二大的族群）。 [(126)](#_125_2) 猶太人在蘇維埃興旺發達，在黨、官僚、軍隊、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雖然也有不少猶太人像塞繆爾·拉斯金一樣，因自己的社會階層和私營經濟而被剝奪公民權利，但根據此時的回憶錄，反猶太主義或反猶歧視相對較少。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確有無數的猶太教堂被關閉，那是由于布爾什維克發起了反宗教運動。家庭繼續作為猶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數家庭中，老一輩執掌傳統的祈禱和禮儀，家人同時又遵守蘇維埃的公共節日，接受蘇維埃的新信念，特別是年輕人。世俗的意第緒語文化，因蘇維埃政府的積極推動而獲得了蓬勃發展。當時有意第緒語的學校、電影院、劇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緒語國家劇院。該劇院指揮所羅門·米霍埃爾斯，還成為眾多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猶太知識分子的關注對象。在大多數都市猶太家庭中，既有對猶太傳統文化的依戀，也有對蘇俄文學和藝術的承諾，兩者并駕齊驅，進入更為廣闊的國際性世界文化。 [(127)](#_126_2)

這類復雜的多重身份（猶太人―俄羅斯人―蘇維埃人），塞繆爾和貝爾塔都予以保留。他們并不信教，從來不去猶太教堂或遵守猶太教的儀式和節日。貝爾塔只是在蘇維埃假日專門烹飪猶太食物。他們會講意第緒語，但家里說的都是俄語。女兒們聽得懂父母講的意第緒語，但自己講不好，也沒盡心去學，視之為舊時代“奇異的遺物”。對女兒們來說，身份問題比較簡單。法尼婭回憶：“我們不想把自己當做猶太人。雖然住在俄羅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當做俄羅斯人。我們自認是蘇維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認為，教育、勤奮、文化才是獲得個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繆爾積極關注蘇維埃政治，為杰出的猶太布爾什維克的成就而感到無比驕傲，例如托洛茨基。他雖沒受過高深的教育，卻在家里擺滿書籍和報紙，還喜歡討論政治事件，尤其是國外的，他在這方面的消息還特別靈通。朋友和親戚星期天前來參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會與他開起“廚房議會”。據說，貝爾塔所做的猶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獨一無二的。 [(128)](#_127_2)

有些猶太家庭，其成為“蘇維埃人”的愿望，反映在盡量抑制自己與猶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斷絲連上。例如在蓋斯特家中，猶太人的習俗微乎其微，只有猶太菜肴、意第緒語的短句、有關沙皇時代反猶大屠殺的家庭傳說，以致少年時的伊娜竟意識不到自己原來是猶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區相遇的。瑞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個猶太家庭出生。她記得自己在列寧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蘇維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猶太人習俗，偶爾講意第緒語，主要是不想讓自己聽懂。她說，除此之外，全用“現代方式，沒有宗教，沒有仍保持猶太習俗的祖父母的影響”。 [(129)](#_128_2)

依達·斯拉溫娜有類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蘇維埃法學家的家庭，父親伊利亞·斯拉溫曾在解放白俄羅斯的猶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亞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鎮，是貧窮的猶太勞工大家庭的長子，從12歲起就開始在當地藥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藥劑師的資格，他在法律上有權搬離法定猶太區。 [[14]](#_13_4) 1905年，他登記為哈爾科夫大學法律系的走讀生，盡管12歲后就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卻在第一年考試中獲得第一名，從而正式注冊，擠入政府批準的3%猶太學生的配額。大學畢業后，伊利亞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個附帶條件，即必須皈依基督教。他謝絕了，自愿回到法定猶太區，在莫吉廖夫城擔任律師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占領了蘇俄西部。伊利亞遷至彼得格勒，在城鎮聯盟的總部工作，幫助法定猶太區的猶太人遷去俄羅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亞當選為法官，任職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維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蘇維埃法律機構中繼續晉升。伊利亞英俊聰明、善良溫和，懷抱高尚理想，并將之投入蘇維埃的實踐，甚至拒絕自己的猶太身份。

從1903年起，伊利亞一直是活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會主義的無產者錫安黨的著名成員。伊利亞的猶太復國主義，來自他在法定猶太區的生活經歷，那里也是無產者錫安黨的主要基地。但一旦來到彼得格勒，接觸到歐化與社會同化的猶太人，伊利亞開始擺脫猶太復國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他贊成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從而認可猶太民族的利益必須服從于階級斗爭。在維捷布斯克鎮擔任法庭主席時，他甚至維護1919年反猶大屠殺的勞工兇手，所持理由是：這是在向猶太工廠經理表達他們的階級仇恨。 [(130)](#_129_2) 1920年，伊利亞離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短期加入猶太馬克思主義者，到1921年再轉向布爾什維克。在加入布爾什維克的簡歷表中，伊利亞承認自己的“政治錯誤”（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民族主義）。自那以后，猶太文化從他家中銷聲匿跡。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學會讀寫俄語，不許她講意第緒語，并培養自己的孩子伊薩克（生于1912年）和依達成為不帶猶太傳統的蘇維埃人。依達回憶：

父親盡量做得正確，要求自己成為一名理想的布爾什維克。我們沒有猶太習俗，從來不講意第緒語——我們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為布爾什維克，父親便在家中盡力剔除使他憶起貧民窟和法定猶太區的一切。作為一名國際主義者，他相信蘇聯各加盟國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蘇維埃的東西。他所珍愛的寶貝只是列寧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辦公桌上。 [(131)](#_130_2)

隨著新經濟政策受到進一步的攻擊，新都市猶太人的前景變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蘇維埃再次向小商販征收特殊營業稅。對塞繆爾·拉斯金來說，這真是一個尷尬時刻。新經濟政策重新確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權，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時候，他向祖博夫廣場的建設項目投入資金。建筑商正在這個莫斯科時髦公寓區的庭院建造一棟兩層樓房，塞繆爾的投資可讓他擁有樓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產的夢想——想讓三個女兒在攻讀時享有經濟保障——所以拒繳這特殊營業稅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監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諾夫哥羅德。 [(132)](#_131_2) 逮捕只是政府從1927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向私人貿易發起進攻的一部分，最終導致新經濟政策的廢除。反對新經濟政策的運動，與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敗緊密相關。后兩位是斯大林在黨內的主要競爭對手，他們繼續支持列寧在1921年引進的混合經濟政策。

在新經濟政策上，布爾什維克一直在左右搖擺，但它的無產階級支持者則表示堅決反對。他們對新經濟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場的大幅波動而愈益加強。一旦農村發生商品短缺，農民不愿向城鎮輸送食品，市場價格就會攀高。第一次市場波動發生于1923至1924年，蘇維埃為了安撫不滿物價上漲的工人階級，首次向新經濟人發動攻擊。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市場回歸穩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費品欠缺，又發生了第二次市場波動。隨著工業制品的價格上漲，農民減少了出售給國家倉庫和合作社的糧食，因為采購價格太低，農民換來的錢還不夠用來購買日常用品。所以，農民不愿賣給國家，寧可自己多吃，喂養牲畜，存儲在谷倉，或運去私營市場自售。如何找到應付這場危機的正確方法？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意見紛紜。為了維護市場機制以及與農民的聯盟（列寧稱之為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布哈林贊成提高采購定價，但也承認國家因此會增加開支并減少對工業的投資。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聯合反對派），在向農民作出更多讓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們擔心這會推遲蘇維埃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在他們看來，國家應采取臨時征用，確保糧食存有量和消費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復農業市場機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蘇共十五大擊敗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后他轉而反對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將糧食危機斥為“富農罷工”，呼吁回到內戰時的征購，以支持蘇聯工業化的五年計劃。他在發言中措辭激烈，要求鏟除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后殘余（小商販和自耕農），不允許它們阻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辭——呼吁返回革命和內戰時的階級斗爭——迎合了黨內廣大的無產階級。他們漸漸形成這樣的觀念：資產階級正在回潮，打著新經濟人、“資產階級專家”、“富農”的旗號。許多人認為，布爾什維克理想是社會正義，而新經濟政策卻是一種倒退。他們擔心，它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辟。一名布爾什維克回憶：“我們年輕共產黨人從小就養成這樣的信念：金錢將被永遠廢除。如果金錢重現，富人也會重現嗎？我們在滑回資本主義嗎？我們以焦慮的心情自我追問。”

斯大林呼吁重返內戰時的方法，對年輕共產黨人特別有吸引力——他們出生于20世紀的前20年，太年輕，沒能參與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戰爭，但一直接受源于內戰的“斗爭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爾什維克（生于1909年）在回憶錄中認定，他同代人的好戰世界觀，使他們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觀點：必須重新發起反對“資產階級專家”、“新經濟人”、“富農”以及其他“資產階級走狗”的階級戰爭。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解釋，年輕共產黨人曾經心灰意冷：

我這一代的共青團員——十月革命時僅10歲或更年輕——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惱火。不管是在共青團，還是在工廠，我們感嘆沒有重大事業留給我們來完成：革命已經結束，艱苦但浪漫的內戰歲月，不會再一次光臨；老一輩給我們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沒有斗爭，也沒有激奮。

阿列克謝·拉達琴科在1927年的日記中寫道：

今日的進步青年沒有投身運動的真正興趣或焦點——現在不是內戰時代，只是新經濟政策時期——它是革命過程中的必要階段，但很無聊。大家所關心的只是個人私事和家庭瑣事。我們需要新鮮東西來震撼自己，打破這沉悶的氛圍（有人甚至在期盼戰爭）。 [(133)](#_132_2)

斯大林充分利用這類浪漫概念：內戰是“英雄時期”，蘇聯國家正與國內外的資本主義敵人展開恒久的斗爭。他捏造了1927年的“戰爭恫嚇”，讓蘇聯報刊充斥英國“間諜”和“反蘇入侵計劃”的假新聞，用這種恐懼來呼吁搜捕大批的潛在“敵人”（保皇分子和“遺民”），呼吁人們全力支持五年計劃和擴軍。他認為，把新經濟政策當做工業軍備措施則實在太慢了，當做戰爭中購糧措施又不可靠。與敵人開展不懈的斗爭是斯大林五年計劃概念的出發點。1928至1929年，為取得黨的控制權，他與布哈林展開政治斗爭。他指責布哈林竟然相信階級斗爭將隨時間的消逝而愈益減少，“資本主義元素”與社會主義制度將獲得調和（其實，布哈林認為經濟領域的斗爭將會持續）。斯大林認為，這種觀念將削弱黨對資本主義敵人的防御，將讓敵人滲入蘇聯制度，從內部發起顛覆。斯大林堅持認為，隨著蘇聯邁向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反抗一定會愈益強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斷“肅清和鎮壓剝削者的反抗”。 [(134)](#_133_2) 這像是一個前兆，他在后來的大恐怖時期，也作過類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漲的鎮壓浪潮變得合理化。這個呼求激勵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證了對布哈林的勝利。恐怖是五年計劃的靈感，并不是它的產物。

向私商發起的進攻是再一次革命戰爭的首役，數千名新經濟人遭囚禁，或被趕出家門。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冊的40萬民營企業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稅或警方行動而被關閉；到1929年底，存留的僅占十分之一。對被剝奪者的新限制，使新經濟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為艱難，沒有資格獲得配給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僅剩的私營商店購買價格急劇上漲的食品。他們的家庭被逐出國家住房，他們的孩子不得上蘇維埃的學校和大學，此類事件比以前更為常見。 [(135)](#_134_2)

恰好在這場階級斗爭的高潮，塞繆爾·拉斯金從下諾夫哥羅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們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廣場的新家。塞繆爾和貝爾塔住一間，索尼婭住另一間，法尼婭和熱尼婭擠在客廳。過不多久，塞繆爾擁有自己住房的夢想徹底破滅。新經濟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廢除。莫斯科蘇維埃將拉斯金的住房國有化，使之成為共用公寓。一對老夫婦（知名的警方舉報人）搬了進來，占了兩間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擠入一個小間，還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國家又征用了塞繆爾的鯡魚生意。塞繆爾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爾基監獄幾個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羅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開始了蘇維埃水產業雇員的新生活。 [(136)](#_135_1)

塞繆爾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運一樣，默默承受自己淪落的處境，從沒抱怨蘇維埃政權。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是熱尼婭在20世紀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關斯大林年代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塞繆爾：

熱尼婭的父親是名小商人。事實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販，養育三個女兒，專做咸鯡魚生意。俄國革命曾使他歡欣鼓舞，因為它宣布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使他有機會實現三個聰明女兒接受良好教育的夢想。新經濟政策推出時，他當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鯡魚生意，以求培養女兒——最后卻因付不起稅而遭到沒收。毫無疑問，他一定打過算盤，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納雷姆地區或類似的地方，但沒有為此或之前的入獄而悲痛欲絕——他入獄時，當局引進了比原始毆打更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對付“沒收貴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時，他給妻子和三個女兒寫了如此悲痛而柔腸百結的家書，以致她們決定不讓任何外人讀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復復的流放中度過。后來，同樣的命運落到他的那些女兒和女婿的頭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勞改營的風雨路。如果沒有身處中心、堅韌不拔的父親，這家人的命運真可成為典型蘇維埃生活的縮影。他是猶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約伯一樣，擁有神秘的靈性和善良。 [(137)](#_136_1)

[[1]](#_1_5) 臨時政府由自由派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組成，旨在維持俄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憲政大會的民主選舉。但工人、農民、士兵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員會，尤其是蘇維埃，以推行激進的社會革命。臨時政府的政治權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奪取權力，就是以蘇維埃的名義。起義前夕的布爾什維克，約有35萬名成員，代表了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派，該黨的溫和派孟什維克則支持臨時政府。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

[[2]](#_2_5) 有大量例證可供選擇，如亞歷山大·法捷耶夫（未來著名作家的父親），在1905年為了投身于“人民事業”，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不顧。還有拋離丈夫和兩名年幼女兒的柳芭·拉達琴科，她在日記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責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_3_2) 仿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鑒創造了眾多的蘇維埃新名字。其他常見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爾·列寧）、恩格列娜、寧格、馬列（馬克思和列寧）、馬恩列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十月革命）。

[[4]](#_4_2) 內戰期間俄羅斯南部的白軍領袖。

[[5]](#_5_2) 義務勞動就是始于內戰的周六勞動，征召學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參加體力勞動，譬如清除街頭垃圾。它很快變成蘇維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標志，呼吁人們投入義務勞動，不止是幾天，甚至是幾個星期。

[[6]](#_6_2) 社會革命黨人是1917年俄羅斯最大的黨派，憑借農民的支持，在制憲大會中擁有多數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爾什維克的取締。

[[7]](#_7_2) 他們屬于被剝奪者——主要是舊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神職人員，沒有公民權和選舉權。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的歧視日益加重，許多家庭不能住國家配給的住房，領不到配給卡，孩子不能去蘇維埃學校上學。

[[8]](#_8_2)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敘述了蘇維埃政權的創建和共青團斗士保爾·柯察金的英勇事跡。它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激勵了眾多的蘇維埃兒童。

[[9]](#_9_2) 艾萊娜·沃爾孔斯卡婭1924年出生于羅馬，并在那里長大。她使用同樣的語句，回憶自己的母親。艾萊娜的母親出生于1893年，是俄羅斯1906—1911年的總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兒，她也畢業于斯莫爾尼學院。（根據對艾萊娜·沃爾孔斯卡婭的采訪，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納）

[[10]](#_10_2) 17世紀50年代的教會改革，使俄羅斯東正教的儀式向希臘正教靠攏，但老信徒仍堅持遵循改革之前的舊規矩。

[[11]](#_11_2) 政府提供免費的火葬，以鼓勵人們采納世俗的蘇維埃儀式。但根據20世紀20年代早期任職于太平間的一名員工所說，“俄羅斯人或是信教，或是過于迷信，都不愿偏離東正教的喪葬傳統”。（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_12_2) 他的教名是基里爾，人們也始終如此稱呼他。20世紀30年代，他開始文學生涯，感到基里爾的發音比較尷尬，遂改名為康斯坦丁。為清晰起見，我們在本書中只用康斯坦丁一個名字。

[[13]](#_13_2) 法尼婭和雅可夫上了愛沙尼亞的塔爾圖大學（當時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猶太學生的少數沙俄大學之一。

[[14]](#_14_2) 允許搬離法定猶太區的猶太人包括：一級商會的商人、技藝出眾的工匠、大學生和合格的藥劑師。

# 第二章 大轉變（1928—1932）

一



葉夫多基婭、尼古拉和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謝·戈洛溫（1940年代）

1930年8月2日，奧布霍沃村民舉辦盛宴來慶祝古老的宗教節日伊林（Ilin），一是標志夏季的結束，二是祈禱美好的收成。從教堂回來后，村民聚集在該村最大的家族戈洛溫家，分享自制的餡餅和啤酒，孩子在室外撒歡。傍晚時分，村民舞蹈開始，帶頭的是三角琴手和手風琴手，后面的是排成兩行的少男少女，身穿節日棉紗服，離開戈洛溫家，沿著村里的街道載歌載舞。 [(138)](#Di_Er_Zhang__Da_Zhuan_Bian__1928_1)

這一次過節已經籠罩在激烈爭執的陰影之下。蘇維埃政府下令成立集體農莊，但村民的意見嚴重分裂。大多數農民不愿放棄世代耕耘的家庭農莊，不愿與他人共用自己的財產、牛馬、農具。在集體農莊里，所有的土地、牲畜、工具歸集體所有，合并的大片土地可以使用拖拉機，農民變成賺取工資的勞工，只允許保留小菜園來飼養家禽和種植蔬菜。奧布霍沃村的村民本來就棧戀個體勞動和私人財產的原則，復又聽到其他北部村莊的可怕故事，更被嚇壞了。譬如，士兵逼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實施大規模的逮捕和驅逐，殺人放火，農民逃離自己的村莊或屠宰牲畜以躲避集體化。尼古拉·戈洛溫在7月的公社會議上曾告誡大家，“在自己的農莊，我們辛苦是為自己；在集體農莊，我們將再次成為農奴”。 [(139)](#_138_2) 奧布霍沃村的許多老農，出生于1861年廢除農奴制之前。

尼古拉在1917年領導了農民的土地革命，組織沒收了教會土地（那里沒有紳士階層），再通過公社和蘇維埃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劃分，使耕地面積與家庭規模相匹配。自耕家庭農莊的數量因土地革命而有所增加，村民尊重尼古拉，經常向他討教農業上的見解，看重他的智慧、誠實、勤奮、節制、謙虛。他較能吃透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并作出淺白易懂的解釋，從而贏得了村民的信任。他房子外面的老石磨是個非正式的聚會場所，夏日傍晚，村民都聚集于此，聆聽尼古拉對本地事件的意見。 [(140)](#_139_2)

戈洛溫家族是農民傳統的捍衛者，其家庭農莊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長制，所有孩子都在父親的指揮下參與農活，從小學會了服從他的至高無上權威（“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親”）。像其他農民一樣，戈洛溫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權利，這本來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導原則。內戰中，尼古拉幫助組織北方的紅軍。他認為，蘇維埃政權將捍衛農民此類權利，所以給予積極的支持（整個20世紀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掛的就是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的肖像）。但這些權利遭到布爾什維克越來越頻繁的攻擊，在奧布霍沃村領導集體化運動的，是激進的共青團積極分子。他們在村校召開會議，向奧布霍沃村最富裕的農民發出激烈的指控——主要針對戈洛溫家。村民從沒聽到過如此的宣傳，共青團干部的滔滔不絕給很多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這些會議上，村民被告知他們屬于三個相互敵對的階層：作為無產階級盟友的貧農、中立的中農，以及作為敵人的富農。 [[1]](#_1___Cong__Quan_Tou__Yi_Ci_Pai_S) 全由共青團員開列的三個階層的名單，貼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沒有社會階層的概念，一直以為自己屬于一個大家庭。對戈洛溫那樣的最成功的農民，最貧窮的農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畢恭畢敬，但在村校的會議上，特別在酒精的影響下，也加入了對“富農戈洛溫”的控訴。 [(141)](#_140_2)

駐在奧布霍沃村的共青團工作隊有12名青少年，攜帶槍支，身著軍便服，在村莊里四下活動，令村民望而生畏。他們的負責人是科利亞·庫茲明，18歲。他父親很窮，又好酗酒，他家骯臟破爛的房子就坐落在貧民集聚的村莊盡頭。還是小男孩時，科利亞就被家人派去村中其他農戶乞求幫助。尼古拉的女兒安東尼娜回憶，他經常來自己家乞討“火柴、鹽、煤油、面粉。這類生活必需品，在庫茲明家老是青黃不接，等不及來年”。尼古拉可憐他，讓他來自己的皮革工場工作。他工作多年，直到1927年加入共青團，就對戈洛溫家反戈一擊。 [(142)](#_141_2)

在許多村莊，特別是像奧布霍沃村那樣的偏遠村莊，布爾什維克尚未設立黨支部，宣傳鼓動工作必須依靠共青團。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村共青團員的人數是農村黨員的4倍。離奧布霍沃村最近的黨支部，設在7公里外的烏斯秋扎納鎮。由于奧布霍沃村的蘇維埃掌控在戈洛溫家族的手中，村里坐立不安的共青團年輕人，便成了開展集體農莊運動的領頭人。從1928年秋天起，黨領導呼吁大規模的集體化。庫茲明和他的伙伴四下串聯，鼓動最貧窮的農民加入戰斗，以抵制“富農”和教會的反革命影響，還向鎮黨支部投送匿名控告信。到1929年春，尼古拉遭到奧布霍沃村蘇維埃開除，又作為“皮革生意的資產階級老板”而被剝奪公民權。11月，村共青團和鎮官員前來尼古拉家里搜查，向他的“富農”農莊征收800盧布的重稅。這項征稅只是全國性政策的一部分，為了“榨干富農”和沒收其財產，光在沃洛格達一地，就毀了近4000個農戶。 [(143)](#_142_2)

為了繳稅，尼古拉被迫出售兩頭奶牛、制鞋機械、鐵床和一箱衣服。那年冬季，他甚至與他四兄弟中的兩位，前往列寧格勒的建筑工地，以賺取額外的現金。這三人意識到農業集體化的不可避免，甚至想離開奧布霍沃村，試探城市生活的可行性。他們睡宿舍的長椅，吃食堂，省下幾百盧布寄回家中，但數月后仍決定返回。尼古拉在給家人的信中解釋說：“如果什么都要從商店購買，面包、土豆、白菜，這樣的日子沒法過。” [(144)](#_143_2)

尼古拉在1930年春天返回，與共青團的關系也瀕臨破裂。一天晚上，他與來自鄰村的兄弟伊萬·戈洛溫一起吃飯，坐在廚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庫茲明及其追隨者，能清晰看到兄弟倆被煤油燈映出的身影。這幫年輕人顯然喝醉了，高喊“富農”“走出來”，然后朝窗開槍。伊萬被擊中頭部，當場死于血泊之中。

數星期后，庫茲明又來尼古拉家，還帶來兩名鎮上的黨干部。那晚，尼古拉家正好有個聚會，主屋里擠滿了朋友和親屬。庫茲明指責他們舉行非法集會，一邊猛烈拍門，一邊喊道，“一幫富農，開門，中止你們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并朝天開槍。尼古拉來到門廊上擋著，不讓他們進去。庫茲明威脅要槍殺尼古拉（有人聽到他說：“我要把你打死，像干掉你兄弟一樣，沒人會來懲罰我”），隨即動起手來，卻被尼古拉推倒在地，才和伙伴們悻悻而去。幾天后，他寫信給烏斯秋扎納鎮政治警察（OGPU）的主管，控訴尼古拉是個富農剝削者：

與十幾名富農分子一起，在我們村里散布反蘇維埃的宣傳。他們聲稱蘇維埃政府在搶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煽動人們反抗，破壞集體化。

庫茲明很清楚，這足以讓他的前雇主被捕，特別是他的控告還獲得了兩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他們添油加醋，稱尼古拉咒罵蘇維埃時“始終是醉醺醺的”。 [(145)](#_144_2)

果然在8月2日，即宗教節日結束時，客人們正準備離開戈洛溫家，兩名官員前來逮捕尼古拉，他被關押在烏斯秋扎納鎮。三人組成的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圖”（將庫茲明打翻在地），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島嶼的索洛韋茨基監獄。安東尼娜最后一次看到父親，是透過烏斯秋扎納鎮監獄的鐵欄。她和母親、兄弟姐妹步行到鎮上，為了能在尼古拉奔赴索洛韋茨基勞改營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之后的三年中，父親身陷囹圄的形象不斷出現于安東尼娜的夢魘中。 [(146)](#_145_2)

尼古拉被捕幾星期之后，奧布霍沃村的農民被迫出席村莊會議，通過決議，廢除自己的家庭農莊，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體農莊。

集體化是蘇維埃歷史上巨大的轉折點。它摧毀了數世紀以來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農莊、古老的農民公社、獨立的村莊、教堂、農村市場。在布爾什維克看來，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障礙。數以百萬計的人背井離鄉，散布蘇聯各地，包括逃離集體農莊的、因集體農莊糧產的過度征用而造成的饑荒逃難者、孤兒、富農及其家人。這批流動人口成為斯大林工業革命的主要勞動力，充斥于城市、工業建設基地、勞改營、古拉格（勞改營的主要管理機構）的“特殊定居地”。創立苦役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出了一種全新的社會革命（自上而下），鞏固了斯大林政權。它打破舊式的關系和忠誠，鏟除舊道德，推行（蘇維埃）新價值和新身份，使全體民眾從屬、依賴于國家——住房、教育、就業、口糧——全受計劃經濟的控制。

消滅家庭農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開端。布爾什維克對農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農村缺乏影響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農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來破壞舊政權。但他們一直公開表示，其長遠目標是掃除小農制度，代之以大規模的機械化集體農莊，將農民改造為“農村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導布爾什維克，農民是舊社會遺留下的“小資產階級”殘余，說到底，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互不相容。農民與俄羅斯父系家長制的習俗和傳統牽連太緊，在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的原則和習慣上受了太深的影響，太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無法變得完全社會化。

布爾什維克認為，農民只要控制食物供應，就會對革命構成潛在的威脅。如內戰時所顯示的，農民如果不把糧食運去市場，就可以把蘇維埃政權帶到崩潰的邊緣。1927至1928年的糧食危機，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擔心“富農罷工”。斯大林為此重新啟動糧食征用，為了替這一對策辯護，更營造了“富農在威脅內戰”的氣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產糧區西伯利亞，敦促當地積極分子對涉嫌囤糧的富農毫不手軟。他的戰斗口號更配以一系列緊急措施，指示當地政府以刑法來逮捕拒絕上繳糧食的農民，沒收其財產（這是刑法的濫用，在政府內遇到相當的抵制）。數十萬“惡意的富農”（像尼古拉·戈洛溫那樣的普通農民）被捕，被送去勞改營，他們的財產遭到毀壞或充公。政府尋求打破“富農罷工”，更將監獄的人滿為患轉化成一個勞改營網絡（很快被稱作古拉格）。 [(147)](#_146_2)

隨著糧食爭奪戰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轉向大規模集體化的政策，既加強國家對糧食生產的控制，又一勞永逸地消除“富農威脅”。斯大林在1928年說過：“我們必須制訂一套程序，一旦威脅撤回國家的補貼和信貸，集體農莊就會向國家和合作機關交出所有的商品糧。” [(148)](#_147_2) 斯大林對大規模機械化的集體農莊的潛力，抱有日益增加的樂觀。有統計顯示，已有的此類農莊所生產的商品糧盈余，遠遠超過絕大多數家庭農莊所能生產的。

對集體農莊的熱情是這時才興起的，之前，黨對集體化并不十分重視。根據新經濟政策，國家只是通過財政和農藝上的援助，鼓勵集體農莊的成立。黨內普遍認為，集體化只是一個漸進自愿的過程。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農民并沒有接受集體化的原則，集體農莊的增長實屬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壓力——向集體農莊提供信貸，向“富農”農莊征收重稅——集體農莊因此得到了較為迅速的增長。但它不是土地和財產都匯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農具仍屬私人的小型合作社。它們屬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數農民的興趣。第一個五年計劃并沒有改變政策的跡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則的變動，只預測集體農莊的耕地量將有適度的增長。

該政策的突變是斯大林在1929年強行通過的，對布哈林是致命的打擊。布哈林還想在五年計劃中，拼命保留新經濟政策的市場機制。該計劃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過，不過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設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目標，雖稍嫌樂觀，卻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業增長率，1929年秋天訂下的五年計劃，其目標大大調高，要在1932年結束時，投資額增加到3倍；煤炭產量翻一番；生鐵產量翻兩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廣大黨員普遍懷有瘋狂的樂觀，蘇維埃報刊提出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 [(149)](#_148_2) 這些烏托邦式的增長率，迫使黨接受斯大林的大規模集體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獲得廉價和保證的糧食供應，以養活迅速擴充的工業大軍（還必須保證換取外匯的農產品出口）。

該政策的核心是黨向農民的宣戰，農業集體化的矛頭直指在俄羅斯根深蒂固的舊觀念，譬如農民對村莊和教會的依戀、家庭農莊、私人貿易、私人財產。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文章《大轉變的一年》，稱五年計劃是在蘇聯反“資本主義元素”的最后一場偉大革命斗爭，讓社會主義工業為共產主義社會打下基礎。斯大林向高爾基解釋，他的“大轉變”是指“徹底摧毀舊社會，熱火朝天地建設新社會”。 [(150)](#_149_2)

從1919年夏季起，數千名黨的積極分子被派去農村，鼓動宣傳集體農莊的優越性。像奧布霍沃村的村民一樣，大多數農民都不愿放棄沿續數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個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說服農民的集體農莊好榜樣，卻寥寥無幾。1929年在西伯利亞工作的一名德國農業專家，將集體農莊描述成“死亡申請者”。它們中很少擁有拖拉機或其他現代設施，經營不善，其管理人員的農業知識匱乏，犯下“淺陋的錯誤，給集體化的全過程抹黑”。根據政治警察所說，農民擔心加入集體農莊將“血本無歸”——他們的土地、奶牛、馬匹、工具、家園和家人。一位老農說：“講師來了一個接一個，告訴我們應忘記私人財產，應與他人共享。然而，對私產的熱望為何仍在我們的血管中燃燒不已？” [(151)](#_150_2)

積極分子無法說服農民，便開始采取強制措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滅富農階級”。從那以后，促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變成了一場大戰。黨員和共青團員動員起來，全副武裝，再加上當地民兵、軍隊及政治警察的特種單位、城鎮工人、志愿學生，他們奔赴農村，肩負的嚴肅使命是如果辦不成集體農莊，就休想回去。上級告訴他們：“最好超越目標，不可功虧一簣。記住，我們不會怪罪你們的過分，但如果你們不夠努力——當心！”一名積極分子記得，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孟德爾·哈塔埃維奇向伏爾加河地區80名黨員發表了如下講話：

你們必須以共產黨員強烈的責任感挑起重擔，沒有嗚呼哀哉，沒有腐朽的自由主義。把你們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扔出窗外吧，成為無愧于斯大林同志的布爾什維克。無論富農代理人在哪里抬頭，就在那里把他打倒。這就是戰爭——你死我活。腐朽資本主義農業的最后殘余，必須消滅，不惜一切代價。 [(152)](#_151_2)

1930年的頭兩個月，蘇維埃農民的一半（約6000萬人，超過10萬個村莊）被迫加入集體農莊。在投票參加集體農莊的村民會議上，積極分子耍弄各種恐嚇手段。例如，西伯利亞某村的農民，對集體農莊的議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決時，積極分子卻帶來全副武裝的士兵，要求反對議案的人發言，大家噤若寒蟬，于是宣布議案獲得了“一致通過”。在另一村莊，農民投票反對集體農莊之后，積極分子要求知道誰投了反對票，并解釋說，加入集體農莊是蘇維埃政府的命令；沒人愿意承認自己反對政府，積極分子便將投票結果改為“一致通過”。在其他村莊，只有少數村民（由積極分子挑選的）獲準參加會議，表決結果卻對全體村民都具約束力。例如，科米地區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戶農民，出席村民大會的僅52人，18人贊成，16人反對；然而在此基礎上，整村加入了集體農莊。 [(153)](#_152_2)

發言表示反對集體化的農民，遭到了毆打、折磨、威脅、騷擾，直到最終同意。還有很多人被當做富農逐出家和村莊。將農民趕入集體農莊，與猛烈攻擊教會相伴相隨，教堂是農村舊生活方式的焦點，在布爾什維克的眼中，又是反對集體化的潛在源頭。數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壞，數百萬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對強行集體化的農村黨員和官員，被開除黨籍，鋃鐺入獄。

在斯大林看來，向“富農”開戰與集體化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爾什維克提出，可以讓“富農”中立化，或使之成為集體農莊的勞動力。但斯大林認為，這樣做是沒有任何好處的。他辯稱：“腦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為頭發哭泣了。” [(154)](#_153_2) 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農可以一箭雙雕：一是消滅反對集體化的潛在力量，二是殺雞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體農莊，以逃避與“富農”一樣的厄運。

有關“富農”的討論眾說紛紜，卻沒有一個客觀定義。該名稱用得如此廣泛隨意，幾乎每一個農民都可被冠以“富農”的帽子，從而遭到剝奪。向“富農”開戰就是為了制造恐怖，這種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據列寧主義思想，“富農”是雇用勞工的資產階級農民，但1929年后，實際上作為“富農”遭受迫害的農民中，符合上述定義的寥寥無幾。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通過自己的勞動致富，像戈洛溫那樣的農民，依靠自己的勤勞，在家庭農莊中創造了相當的財富。 [[2]](#_2___Ge_Luo_Wen_Jia_You_Liang_Ge) 但新經濟政策對雇用勞工一直有嚴格控制，不管怎么說，1927年后的農民納稅大增，多數像戈洛溫那樣的富有農民，已失去私人財富的大部分。資產階級農民的“富農階級”，其實只是一種幻想。所謂的“富農”中，絕大多數是像戈洛溫那樣的勤勞農民——村中最為清醒、節儉、進步的農民——他們相對較多的財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結果，“富農”的勤勞在農民當中又是公認的。一名集體農莊員工在1931年說，反對“富農”的運動意味著，所有“最好、最勤勞的農人”都被趕出了集體農莊。 [(155)](#_154_2)

對蘇聯來說，消滅“富農”是巨大的經濟災難，使集體農莊失去俄國最勤勞農民的專業知識和工作倫理，最終導致蘇維埃農業部門的持久衰退。斯大林發動對“富農”的戰爭，沒作經濟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體化農莊的潛在反對力量，因為“富農”是農村的個人主義者，又是農村舊生活方式最強大的領導者和支持者，必須讓他們消失。

“消滅富農”在全國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定出配額：6萬名“惡劣富農”送去勞改營，1.5萬名其他“富農”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亞、烏拉爾和哈薩克斯坦。這只是整體計劃的一部分，最終將要求剝奪100萬“富農”家庭（約600萬人）的財產，把他們送去勞改營或“特殊定居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負責配額的實施（又將“富農”配額提高到所有農戶的3%至5%），其具體執行再分配給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黨組織（許多地區故意超額，相信這樣做能顯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級）。 [(156)](#_155_2) 每村都有地區當局鎖定的配額，共青團和黨的積極分子開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農”名單，等他們被驅走后，再盤點清算他們家中被充公的財產。

令人驚訝的是，迫害“富農”的運動僅遇上零星的農民反抗——尤其應考慮到的是，俄羅斯的村莊團結具有濃厚的歷史傳統（反“富農”運動在內戰時期無法分裂農民）。當然也有抵制配額的村民，堅持認為他們之中沒有“富農”，或所有的農民都很窮。也有村民拒絕交出“富農”，甚至在積極分子前來拘捕時予以保護。但大多數農民，對于鄉親的突然失蹤，只是戰戰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莊，農民舉行村民大會來選擇“富農”（孤立無助的農民、寡婦、老人特別容易受到傷害）。也有的地方，“富農”是通過抽簽選出的。 [(157)](#_156_2)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亞庫爾干地區的農民大家庭。他講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選定為“富農”并逐出家園：

他們沒有調查或慎重考慮，只是趕來通知：“你們要走”。驅逐我們的村蘇維埃主席謝爾科夫解釋：“我收到命令[來自區黨委]，找出要驅逐出去的17戶富農。我召集貧農委員會，連夜開會，討論人選。但村里沒人富得夠格，也沒有很多老人，只好拼湊出17家，你們正好被選上了。”他還說：“這不是有意要針對你們家。我也是沒辦法啊！” [(158)](#_157_2)



1930年代早期被流放的烏克蘭“富農”

作為“富農”受到迫害的統計人數很難確定。在“反富農運動”的高峰時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幾個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國的道路上滿是被驅逐之人形成的長隊，每人攜帶自己僅剩的財產——可憐的幾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車拖著這些家當。烏克蘭蘇梅地區一名目擊者看到一長列人群，“朝兩個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頭，沿途還有人不斷加入”，向鐵路旁的聚集點行進。那里有載牛的車廂，把他們運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鐵路無法應付這么多人，許多“富農”必須在簡陋的拘留營中等待數月。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老人和兒童像蒼蠅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萬“富農”抵達“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另有更多的人走進了附屬于古拉格工廠和建筑工地的勞改營；還有人仍在遷徙的旅途中。總而言之，從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園的至少有1000萬“富農”。 [(159)](#_158_2)

這些統計數字的背后是無數的人間悲劇。1930年1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一家被逐出庫爾干地區的巴拉巴，他們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毀——農具、推車、馬匹、奶牛轉到集體農莊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如衣服、床單、鍋碗瓢盆——則分給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爛燒毀。德米特里的祖父母，其四個兒子中的三位和他們的家人（總共14人），被禁止與其他村民交往，暫居牛棚，等待鎮上的驅逐命令。6個星期后，他們被流放至烏拉爾的木材營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內死去）。德米特里的父親尼古拉與家人仍留在巴拉巴的老家。尼古拉是內戰時期的紅軍老兵，曾組織村里第一個集體農莊（TOZ），他的農業知識是集體農莊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與他一起的還有妻子安娜和六個孩子。但到1931年早春，他們被告知也“中選”當上了“富農”，加入巴拉巴的第二波驅逐。被押送出村之前，他們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來收拾簡單的行裝，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遠不得歸來。 “我們失去了一切”，德米特里回憶：



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左二）和她的姐姐（右二）以及她們的三位堂兄妹，攝于1939年

一小時之內能收拾什么呢？父親要帶走手杖（其中一根飾有銀頂），但警衛不準。他們還拿走母親的金鏈和金戒指，簡直就是大白天搶劫。一切都被留下了——我們的家、谷倉、牲口、床單、衣服、瓷器，只能帶上幾件隨身衣服——父母的、小孩的、兄弟姐妹的——成了我們合家的全部家當。 [(160)](#_159_2)

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1930年出生于白俄羅斯的貧農家庭，到了1932年，卻作為“富農”遭到迫害。瓦倫蒂娜最早的記憶是與父母從燃燒的家中逃出，此次縱火是村里共產黨人下的命令，特意選在家人都已睡著的半夜。瓦倫蒂娜的父母差一點沒有時間拯救兩個女兒，他們帶著嚴重的燒傷，從被火焰吞噬的家中逃出。當晚，父親被捕，監禁之后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阿穆爾地區，在各式勞改營中度過之后的6年。他們的住房和谷倉被燒；奶牛和豬充公給了集體農莊；庭院里的果樹被砍；地里的農作物遭到摧毀；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袋豌豆。瓦倫蒂娜的母親名叫葉菲米婭，不識字，不準加入集體農莊。她帶著兩個幼女度日，以前的家現在已是一片廢墟。葉菲米婭只能從廢墟中覓尋殘片，在村邊搭起一個小窩棚，幫人做清潔工，勉強維生。瓦倫蒂娜和姐姐都沒上學——“富農女兒”好幾年都不準上學。她們是在大街上長大的，跟隨母親到處做清潔工。瓦倫蒂娜回憶：“所有的童年記憶都是悲傷的，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饑餓，從沒離開過我。” [(161)](#_160_2)

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1913年出生于伊爾貝伊地區——位于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家里務農，在11個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的母親1924年死于難產，父親伊利亞一人帶大所有的孩子。父親積極進取，抓住新經濟政策的機遇，由務農轉行做園藝。他種植自己年幼的孩子容易照看的罌粟種子和黃瓜，因此被冠為“富農”，遭到逮捕和監禁，后被送去勞改營，把孩子們留給17歲的克拉夫蒂婭照看。父親的財產全被剝奪：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現屬于村蘇維埃；馬、奶牛、羊、農具都被集體農莊拿走。好幾個星期，孩子們住在澡堂里，直到官員把他們帶去孤兒院。克拉夫蒂婭帶上最小的孩子，前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賴莎。走之前，她們向其他村民出售最后的財產。克拉夫蒂婭回憶：“我們只是孩子，沒有多少東西。一條毛皮襯里的毯子、一張老羊皮、一個羽絨床墊、一面鏡子，都是從自己家里救出的，便是我們擁有的一切財產。” [(162)](#_161_2)

向農民開展殘酷斗爭的男男女女，其動機到底是什么？大多數推行集體化的人是應征的士兵和工人——他們急于執行上級的命令（在某種情況下還從中漁利）。“富農寄生蟲”和“吸血鬼”是危險的“人民公敵”這樣的反復宣傳，再加上上級的灌輸，培養了他們對“富農”的仇恨。庫班地區一名年輕的共青團領袖回憶：“我們接受培訓，不把富農當人，而是當做害蟲和虱子，必須予以消滅。”另一名集體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寫道：“如果沒有集體農莊，富農可能早已掐住我們的喉嚨，活剝了我們的皮！” [(163)](#_162_2)

其他人則因共產主義的狂熱而失去理智。五年計劃的宣傳激發了浪漫的革命熱情，他們因此相信，有了布爾什維克，人類的絕對意志可以創造任何奇跡。當年的一名學生回憶道：“我們堅信，我們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它將通過若干個五年計劃得以實現，我們愿意付出任何犧牲。” [(164)](#_163_2) 這種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熱，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輕的一代從小就接受熏陶，“崇拜斗爭”，向往內戰的浪漫。這些年輕人愿意相信，繼續斗爭是他們的天職，借用《國際歌》的話就是要創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約有2.5萬都市積極分子大軍奔赴農村、開展集體化運動，其中的一員回憶：“不斷的斗爭、斗爭，更多的斗爭！這就是我們受的教育——沒有斗爭，就沒有成果，這是社會生活的規則。” [(165)](#_164_2)

根據這好戰的世界觀，創造一個新社會不但是要與舊社會力量進行一場苦戰，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對五年計劃的宣傳加強了這一邏輯，它喋喋不休地談論，要在社會、經濟、國際、國內等“戰線”上，發起“運動”、“戰斗”、“攻勢”）。理想的共產黨人以這種方式將“反富農”的恐怖與烏托邦的信念調和起來。有人震驚于野蠻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們無法辯解自己的一無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們都相信，如果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

列夫·科佩列夫參與了對烏克蘭農民的最慘無人道的暴行之一，當年他是個年輕的共產黨員，他解釋了當年行為的出發點。1932年，科佩列夫自愿參加向“富農”征用糧食的共青團分隊，奪走一切食物，不留下一個面包。他在20世紀70年代反思時，尚能記得孩子們的尖叫和農民們的表情——“宛如驚弓之鳥，哀求，充滿仇恨，遲鈍的冷漠，絕望，激怒，幾近瘋狂的兇悍”：

看到和聽到這一切，會令人痛苦。更糟糕的是，還必須參與其中……我盡力說服自己，盡力自我解釋：絕不能向憐憫讓步。我們在實施歷史的必然之途，在履行革命義務。我們征糧是為社會主義祖國，是為五年計劃。 [(166)](#_165_2)

大多數村莊默許對“富農”的迫害，對集體化卻有廣泛的抵制。從1929到1930年，警方登記了44779起“嚴重騷亂”。有數百共產黨人和農村積極分子被殺害，受到襲擊的有數千。這些騷亂包括農民的示威和暴動，對蘇維埃機構的襲擊，對集體農莊財產的縱火和破壞，對關閉教堂的抗議，簡直是回到了內戰尾期。其時，烽火四起的農民起義迫使布爾什維克放棄征糧，并引進新經濟政策。但這一次，蘇維埃政權已經強大，足以粉碎農民的抵抗（事實上，在1929至1930年的農民起義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為了引蛇出洞，以鎮壓“造反的富農”）。農民認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轉向傳統的“弱者武器”，宰殺自己的牲畜，以防集體農莊征用。從1929到1930年，蘇聯的牛數量下降30%；從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 [(167)](#_166_2)

斯大林眼看蘇維埃農村行將變為廢墟，便要求暫停集體化運動。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報》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責當地官員頭腦發熱，對農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強行成立集體農莊。數百萬農民視之為退出集體農莊的許可，紛紛以自己的雙腳投了票。從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體農莊的蘇維埃農戶從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區，從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體農莊談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財產、農具、牲畜幾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戰持續了6個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發起了集體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標是至少80%的農戶加入集體農莊——第一次只是50%——還要在1931年底消滅所有的“富農”。中央政治局指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在北部、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的偏遠地區，準備1000個“特殊定居地”，每個接收多達300戶“富農”家庭。從1930到1931年，流放到這些地方的共有200萬人。 [(168)](#_167_2)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中，奧布霍沃村成立了集體農莊，取名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變成了該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奧布霍沃”。村口掛上紅旗，表示它已集體化。村莊中心古老的木結構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鐘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圍觀的一群農婦邊看邊哭。

原先農民的自家土地，現在合并成集體農莊的大田。集體農莊帶走耕地的馬匹，將村里所有奶牛圈養在集體的奶牛棚，但原來講好的吸奶器沒有兌現，不得不將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擠奶，只是每戶都需要繳納牛奶稅。共青團干部科利亞·庫茲明成了集體農莊主席，他從鄰村娶來新娘，搬進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沒收來的，原先屬于瓦西里·戈洛溫——因是“富農”而遭到流放。庫茲明也許是全村中經驗最少的農民，卻負責集體農莊的日常管理。他經常醉酒，喜歡動粗。他們第一個冬天就遭遇了災難。集體農莊向國家交付了很高指標的糧食和牛奶，但一半馬匹死去，每名集體農莊工人每天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繼續抵抗。庫茲明率領武裝人員前來搬走財產，常常出現憤怒的場景，很多農民寧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體農莊。戈洛溫家族作鳥獸散，1929年的奧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溫家族的人，到1931年僅剩71人（20人逃去他鄉，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農”，16人不準加入集體農莊，徑自搬去孤立的荒園）。

尼古拉的直系親屬全被打散，兩個兄弟流放，母親逃到最近的城鎮。他的長子被捕，被送去白海運河充當古拉格的勞工；另外兩個孩子瑪麗亞和伊萬，離家出走以避逮捕。妻子葉夫多基婭和三個最年幼的孩子想加入集體農莊，因是“富農分子”而得不到批準，更為鄉親們避而遠之，只有與老朋友普日寧家還有來往。安東尼娜記得：“氣氛非常可怕，媽媽經常哭泣，我們不再去外面玩，鄰居不再來串門。一夜之間，我們都長大了。”葉夫多基婭和孩子獲準留在自己家里，保留一頭奶牛和一小塊土地，再加上親戚的暗中幫助，得以維持數月。但庫茲明搶走了奶牛（牛奶是她們的主要食物來源），生活變得難以為繼。1931年1月，庫茲明宣布“榨干富農戈洛溫家”的政策，村蘇維埃向葉夫多基婭征收重稅（1000公斤糧食）。安東尼娜回憶：“庫茲明和他的團伙不會甘休，不斷回來索取，貪得無厭。拿走所有糧食之后，就來沒收家里的雜物、農具、大車、家具、鍋碗瓢盆，留給我們的只有一張鐵床、舊床單和幾件衣服。”

然后是驅逐的命令。5月4日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葉夫多基婭和孩子們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流放去西伯利亞。她們僅有一小時的時間來準備長途旅行的行裝。普日寧搬走鐵床以便保存。這張床是戈洛溫家僅剩的財產，是他們家所有孩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們家族在奧布霍沃村扎根幾百年的最后遺存。安東尼娜這樣回憶她們離家時的情景：

媽媽仍保持平靜，讓我們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我們一家四口：媽媽、當時15歲的阿列克謝、10歲的托利亞和8歲的我……媽媽給我裹上羊毛圍巾，但前來監督我們的庫茲明命令解下圍巾，說那也是被沒收的物品。媽媽苦苦哀求，因為等待我們的是寒冷的天氣和漫長的旅途，但他置若罔聞。托利亞給我一頂帶耳瓣的男帽，他曾嫌它破舊，早想扔掉。我雖戴上，但感到羞愧：這是男帽，不是圍巾[農村女孩傳統的頭飾]。媽媽在家庭圣像前鞠躬，劃十字，帶我們走出家門……我記得像灰墻一般的沉默人群，看著我們走向大車，佇立不動，一聲不吭……沒人擁抱我們，沒人說再見。他們害怕伴隨在我們旁邊的士兵，對富農表示同情是不允許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視……媽媽向人群道別，“婦女們，如果我曾冒犯你們，請原諒”。她一邊鞠躬，一邊劃十字。之后，她轉過身來，再一次鞠躬、劃十字。如此一共做了4次，跟大家道別。最后，我們坐在車中出發。我記得站列兩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們的朋友和鄰居——與我一起長大的人，但沒人走近，沒人告別。他們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條線的士兵。他們心存恐懼。 [(169)](#_168_2)

二

作家莫里斯·興德斯1931年6月回到自己在白俄羅斯的家鄉，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他移民去了美國。他看到，作為集體化的結果，人們身上透出“從未有過的懶散。房屋、庭院、圍欄一片頹圮，亟須修葺”。圣三一村莊馬上就要到了：

但沒有一扇窗戶或百葉簾有新油漆的痕跡，沒有一個屋頂有新敷茅草的跡象。這種疏忽只是意外嗎？我簡直不敢相信。集體農莊甚至已傳至國外的傳聞，給大家帶來了遲疑和觀望，毫無疑問，更打消了改善家居的任何念頭。 [(170)](#_169_2)



1933年，西伯利亞西部“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

興德斯幾乎可在所有的集體化村莊得到相同的觀察結果。農民曾把家庭農莊視作自尊和立身的根本，現在沒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就不再有依戀感；一旦變為集體農莊工人，也就不再有方法或動力來作任何的維護和改善。

農民在集體農莊工作，所得報酬采用口糧的形式（預計他們還會在自留地上種植蔬菜，飼養豬雞，貼補家用），一年領取現金一至兩次（平均下來，夠買一雙鞋）。集體農莊的大部分產品，通過強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價出售給國家。集體農莊的管理者不得不進一步壓榨農民，以擠出日常運行的經費。農民抱怨集體化是“第二次農奴制”。他們的祖先淪為農奴，受地主的剝削，現在自己也被綁在土地上，受國家的剝削。

在經濟上，集體農莊是令人沮喪的失敗，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機來取代遭農民屠宰的馬匹（最初幾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體農莊經營不善，像庫茲明那樣的管理者，其當選靠的是對黨的忠誠，而不是農業技能。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取代所謂“富農”的主動性和精力，他們是集體化之前工作最勤奮的農民。集體農莊的新工人對工作沒有興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體農莊的便宜。集體農莊的眾多農民，難以忍受自己私人財產的損失。他們認識自家的馬和牛，盡量選用它們來耕地或擠奶。 [(171)](#_170_2)

奧莉加·扎普里加耶娃1918年出生于克里沃舍伊諾村——地處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地區，家里務農，在六個孩子中她排行老四。1931年，克里沃舍伊諾村集體化。集體農莊拿走她家的大宗財產（3頭奶牛、3匹馬、農具、大車和兩個裝滿干草的谷倉），只留下雞和山羊。13歲就輟學下地的奧莉加回憶：“我們沒有得到集體農莊的任何補償，必須依靠自留地、雞、山羊來維持生活。”該集體農莊沒有拖拉機，耕地仍要使用馬匹。集體農莊辦事處旁邊設有特殊的馬棚，保管所有的馬匹。但奧莉加的母親，像很多村民一樣，擔心自家的馬在那里受委屈，經常將它們牽回家，以確保它們得到梳洗和喂養。為了鏟斷農民與牲口之間的關聯，該區集體農莊主席采用了調動工作的對策。奧莉加的父親允許留在克里沃舍伊諾村集體農莊，但奧莉加的母親和孩子們要去不同的集體農莊——8公里之外，靠近索科羅夫卡村，只能租房而居。奧莉加回憶：“我們在那里工作兩年，只看到父親一兩次，因為大家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常常與父親的休息日錯開。”1935年，全家終于在托木斯克獲得團圓，父親在建筑工地的馬廄工作，母親得到一份肉類工廠的工作。他們與其他十幾個家庭一起住在宿舍，都是背井離鄉的前農民。 [(172)](#_171_2)

1930年是個豐收年，1931和1932年的收成非常糟糕。然而，國家在1932至1933年的采購量，反而是1929和1930兩個豐收年的兩倍多。黨的采購計劃以1930年的好收成為基礎，再加上地方官員為求政績，虛報了1931和1932年的產量。1932年的實際收成，與官方數字相比，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實際上，它是自1921年那個荒年以來最差的一年）。無可避免的后果是普遍的饑荒，始于1932年春天，在第二年達到高峰。生活在饑荒地區的高達7000萬人（將近蘇維埃的一半人口），死亡人數無法計算，因為其中很多人的死亡并未登記在冊。但據最可靠的統計估測，從1930到1933年，死于饑餓或疾病的高達850萬人，最少也有460萬人。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那里的農民抵制集體化特別頑強，糧食征收量也特別高。這種巧合使某些歷史學家生疑，羅伯特·康奎斯特即認為，饑荒是“故意釀造的”，是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動機，“對男人、婦女、兒童的大屠殺”。這并不完全準確，蘇維埃政府無疑要為饑荒負責，但其政策并不等同于“饑荒恐怖”，不能視作康奎斯特等所暗示的種族滅絕。 [(173)](#_172_2) 看到饑荒的規模，政府也大吃一驚，但沒有可向饑民提供的儲備糧。它仍向受災最重的地區征糧，只是到了1932年秋季才減少征購數量，這實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晚了。饑荒開始肆虐，政府卻盡量隱瞞，阻止人們從受災地區逃至北方城市。 [(174)](#_173_2)

然而，還是有數百萬人逃離了土地。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當中，每30人中就有10人永久離開，大多變成了賺取工資的產業工人。到1932年初，數百萬人朝外流竄，擠在火車站，拼命逃離饑荒地區。 [(175)](#_174_2) 城市無法應付這一人群的洪流，疾病到處傳染，住房、食品、燃料承受愈益增長的壓力。為了尋找更好的環境，災民從一個城鎮移至另一個。中央政治局擔心，工業重鎮將充滿叛逆的饑民，遂實施國內護照制度，限制農民遷入城鎮。新法律規定，成人必須擁有在警方備案的護照，方能獲得在城鎮就業所必需的居留證。1932年11月，該制度在7個大城市推出，第二年又擴展至其他城鎮。警察以此來控制人口流動，還把潛在的反政府“社會危險分子”（富農、商人、心懷不滿的農民），從城鎮中清洗出去。結果，數百萬無家可歸的農民，在各城鎮之間流竄，在工廠和建筑工地非法打工，直到國內護照制度最終把他們逮住。 [(176)](#_175_2)

隨著年輕農民離開家園、奔赴城市，家庭逐漸解體。那些年間，數百萬兒童遭到遺棄。許多農民逃離集體農莊，放棄留在家鄉的孩子。“富農”寧肯將子女送給他人，也不愿把他們帶上漫長的旅途，前往“特殊定居地”或其他流放場所，因為聽說那里的條件惡劣，小孩活不長。一名西伯利亞“富農”解釋，“讓他們流放我好了，但不會帶上孩子，不想貽害他們”。在饑荒受害者中，遺棄兒童的人太多了。母親將孩子留在人家門口，或送去蘇維埃辦事處，或遺棄在鄰近城鎮。孤兒們在建筑工地和街上游蕩，在垃圾堆里翻尋人家丟棄的食物。他們以乞討、小偷小摸、賣淫為生，不少人加入在車站、飲酒場所、繁忙大街等聚乞活動的兒童幫派。有些遭到警方的圍捕，被送去“接收中心”，再轉運至兒童之家和勞教營。根據警方的數字，從1934到1935年，送到接收中心的共有842144名無家可歸的兒童。到1934年底，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孤兒院注冊的就有329663人，還有更多兒童住在警方控制的特殊家庭和勞教營（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營地）。1935年4月又頒布新法律，將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降至12歲。自那以后，古拉格系統中的兒童人數開始穩步上升。超過10萬名12歲至16歲的兒童，在后來的5年中，被各式法院判了刑事罪行。 [(177)](#_176_2)

葉夫多基婭·戈洛溫和3個小孩離開奧布霍沃村后，先去了最近的佩斯托沃火車站——約56公里的路程，再在那里的拘留營等待。3天后，她們被裝上載牛的車廂，前往西伯利亞的克麥羅沃，整個旅途歷時6個星期。車廂里坐滿各式家庭，男女老少，年齡各異。每節車廂配備一只木桶，權作廁所，一天清空一次。車廂門打開時，外面的警衛分發面包，一人一條。抵達克麥羅沃后，戈洛溫一家被帶到暫時看管了數百家庭的疏散中心。那是一片曠野，周圍是高高的帶刺鐵絲網，他們只能睡在自己的行李上。一個月之后，他們被轉送至專為“富農”設置的“特殊定居地”沙爾鐵地區，地處遙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

“特殊定居地”是原始且孤立的營地，大多數僅有簡陋的營房，是流放者來了之后自己建造的，可容納數百人，大家睡在木板上。另有不少“特殊定居地”，“富農”們挖穴而居，或住入廢棄的教堂、牛棚、谷倉等。居住條件十分惡劣，摩肩接踵，擁擠不堪。沃洛格達附近的普里盧茨基修道院，住有7000名流放者，沒有正常的廁所或盥洗設施，也僅有一個廚房。在沃洛格達當地，2000人擠入一座教堂。一名見證人如此描述2.5萬名流放者在科特拉斯勞改營的生活：

容納250人的營房里，幾乎是一片黑暗。分散的小窗，讓光線只能照見低層的鋪位。居民使用室外的篝火煮食，公共廁所——只是柵欄圈起的一塊地方，水——下面有一條小河，盡管仍在結冰。當地居民鎖上水井（“你們會感染我們，你們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并按瓶銷售。

“特殊定居地”嚴格說來不算監禁（大規模驅逐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庭的執法），從1931年春天起，劃歸負責勞役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管控。“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每月必須向警方匯報一次。古拉格系統的主管馬特維·伯曼說，定居地的條件比勞改營的還要惡劣。男人在伐木營和采礦區從事繁重的體力工作，婦女和兒童的工作稍輕，只有很少食物（一月領取幾條面包），如果生病倒下，就只好聽天由命了。1931至1932年的冬季，這樣死去的有幾十萬人。 [(178)](#_177_2)

沙爾鐵定居地有5座沿河的兩層木造營房，其居民（約1000個農民）來自蘇聯各地，其中最大的群體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伏爾加德裔和西伯利亞人。男子赴鄰近的伐木營砍樹，每個周日回來。葉夫多基婭的兒子阿列克謝·戈洛溫，雖然僅15歲，也名列其中。9月1日，她的小兒子托利亞和女兒安東尼娜開始上學——定居地所有的兒童組成一個班級，教室設在營房之中。女孩被迫剪掉辮子（農家姑娘結婚之前的傳統發型）——似乎在拋棄她們從小濡染的農民文化。為了慶祝新學年的開始，定居地指揮官作了講話，要孩子感謝蘇維埃政權——“那么好，那么善良，甚至允許我們富農的孩子上學，長大成為蘇維埃的好公民”。早期的古拉格系統，即使像沙爾鐵那樣的偏遠、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識形態的重點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蘇維埃人格”的人，通過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抵達沙爾鐵定居地的第一個冬天異常寒冷，鵝毛大雪壓坍了兩個營房，迫使許多男孩，包括其時10歲的托利亞，挖地穴而棲。由于沒有強壯的男子——他們都在伐木營過冬——只好動員學生清晨起來清理積雪。整個定居地困在深雪中長達數星期，沒有糧食補給，全靠從家鄉帶來的干糧度日。數百人患上斑疹傷寒而倒下，被隔離在單獨的營房，因為沒有藥品，死活全憑天命。葉夫多基婭也患上斑疹傷寒，安東尼娜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每天去看媽媽，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她躺在木板上。她的頭發被剃光了，眼睛睜得很大，目光游移。她已失去記憶，根本不認識我們。托利亞一邊敲窗，一邊流淚，哭著叫：“媽媽，媽媽，不要生病，快起來吧。”

葉夫多基婭活了下來，但有很多斑疹傷寒患者死去。指揮官決定，因為沒時間埋葬所有的死者，只能讓尸體凍成一垛，等到春天解凍時，再扔進大河。

第二年冬天甚至比前一年還要惡劣。流放者得不到食物，這似乎是蓄意為之的政策，要把定居地居民削減四分之三。流放者只好搗碎樹皮和馬鈴薯的爛根，再做成菜餅，結果腸胃急劇膨脹，因此而死去許多人。到了春天，每一個人都患上痢疾。戈洛溫一家全靠運氣才活了下來。指揮官視察營房時，發現葉夫多基婭正在讀福音書。他需要識字人，專管前往岑特拉爾尼―魯德尼克送信和收信——那是古拉格的采礦定居地，單程就有12公里。她被選上了，每次去送信，就會帶上孩子在鄰近樹林收集的漿果，到岑特拉爾尼―魯德尼克的市場出售，再買回食物和衣服。安東尼娜回憶：“指揮官當然知道，但裝作沒看見，因為沒有其他人選。”有一次，在郵件中收到一包土豆種子，葉夫多基婭帶領一組人去播種。安東尼娜回憶當時的喜悅：

真像是一個節日！我們很高興參與種植土豆！不管是成人，還是孩子——我們都很努力。我們是真正的農民，我們的祖先耕耘土地都有幾百年了，現在獲準重操舊業。媽媽是大隊負責人，西伯利亞人斯內吉列夫是我們農莊的主席。我們因為是富農，不能自組集體農莊。媽媽擔心，不施肥，土豆恐怕長不好——在種植土豆方面，我們也沒有任何經驗。到秋天，我們卻挖出一個大豐收。那個冬天，再也沒人餓死，土豆是我們的救命菩薩。 [(179)](#_178_2)



克拉夫蒂婭展示的兩張照片。左：列昂尼德（年長者）和亞歷山大，1930年；

右：克拉夫蒂婭站在右側，納塔利婭站在中間，賴莎與丈夫在左側，1930年攝于坎斯克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和家人，要在雪地里跋涉幾天才抵達第一個流放地。那是一個被人遺棄的大地窖，位于庫爾干。幾百戶“富農”家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遠親，領不到任何食物或飲用水，只得自生自滅。如果沒有庫爾干的親屬和別人的食物援助，他們肯定會餓死。整整一周，他們被關在地窖里，睡在自己的行李或光溜溜的地面上。后來他們被裝入載牛的車廂，前往彼爾姆北部的烏索勒鎮。到了那里，他們在武裝衛兵的監護下，行軍150公里，到達波日瓦工廠城鎮。他們被安置在一個工場里，大家睡在水泥地上。德米特里回憶：“父親很痛苦，一夜之間老了很多，說他的一生完蛋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即使別無選擇，聽從吆喝，仍想維持自己的尊嚴，不愿成為當局的奴隸。”為了在喬爾莫茲鎮附近建立“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的父親被派去伐木，其家人與另外3戶人家擠住在木工車間樓上的小房間。半年后，他們搬入“特殊定居地”，才與德米特里的父親重聚。那里有10座營房，每一座可容納500人睡在木板床上，四周聳立著高高的帶刺鐵絲網。定居地坐落在松林的中間，男子出外伐木，每周只能回來一次。每日的面包定量僅200克，所以死亡率非常高。但斯特雷勒茲基一家，憑借農民的勤儉得以存活下來：孩子們采集蘑菇，到喬爾莫茲鎮出售；母親晚上悄悄去集體農莊的地里偷土豆；父親與附近屠宰場的工人達成交易，幫他們建造木屋以換取牛血（不比肉和骨頭，當局比較不在乎）。到1933年的大饑荒，每天口糧減至50克面包，“特殊定居地”的居民一半死于饑餓和疾病，但斯特雷勒茲基一家全靠牛血活了下來。 [(180)](#_179_2)

斯特雷勒茲基一家很幸運，他們始終能聚在一起。對許多人來說，流放就是家破人亡的代名詞。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的父親被捕于1930年，她的7位兄弟姐妹被送去各式各樣的兒童之家，從此失去聯系，音信杳無。克拉夫蒂婭和妹妹納塔利婭，搬去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賴莎。克拉夫蒂婭去醫生家當保姆，后來因為國內護照制度的推行，作為“富農”的女兒，她不得不逃。她留下納塔利婭由賴莎照顧，自己趕去伊爾庫茨附近的切勒姆霍沃鎮，投奔時任高級森林督察的叔叔，并在當地的蘇維埃注冊于叔叔的名下。1933年11月，叔叔收到克拉夫蒂婭的父親伊利亞的來信。原來他已經出獄，現住在2000公里之外的塔什特普“特殊定居地”，離中國邊境不遠。克拉夫蒂婭先乘火車，再搭便車，趕到塔什特普時已是1934年1月，到處是厚厚的積雪。她在那里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她的注冊文件上沒有父親的名字，沒人愿意聘她。但她又不敢透露真相，重回“富農”女兒的身份。最終，塔什特普的蘇維埃主席雇她做保姆，并安排她去一家服裝廠打散工。有一天，在與主席的嫂子閑聊時，她拿出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她的兩個兄弟列昂尼德和亞歷山大，另一張是她自己與兩個姐妹。

她[主席的嫂子]立刻說：“倫卡[列昂尼德]，我認識他！”我非常驚奇，她竟然認識我的哥哥。我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忙問：“他在哪里？他在哪里？”……當時，我很怕自己說漏嘴，很怕讓人發覺自己父親原來是一名流放者。

克拉夫蒂婭在塔什特普找到哥哥，通過他才發現，父親就在附屬于基洛夫礦區的“特殊定居地”，位于哈卡斯自治州。克拉夫蒂婭回憶道，父親再婚，與第二任妻子開始了新生活：

我去探望，抵達時已是傍晚，他們正好從礦區下班回來，還牽回一頭奶牛，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驚訝。父親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剛剛見過我。我與他們一起坐在營房外幾分鐘，然后我就離開了。 [(181)](#_180_2)



奧熱姆伯羅斯基一家。左：1914年婚禮那天的亞歷山大和謝拉菲瑪；

右：1937年，謝拉菲瑪與薩沙（左）、安東（右）從流放地返回

這是克拉夫蒂婭最后一次看到父親，他后來再次被捕，槍決于1938年8月。

許多“富農”家庭逃離“特殊定居地”，冒險在外漂泊。根據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資料，到1930年夏天，從“特殊定居地”逃走已成普遍現象，數以萬計的“富農”在外漂泊，逃跑人數在饑荒期間達到高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統計，從1932至1933年，逃離“特殊定居地”的竟有422866名“富農”，之后抓獲的只有92189人。 [(182)](#_181____MP__f_4__op_5__d_2__ll_3)

奧熱姆伯羅斯基一家是波蘭裔的小貴族，1917年之后，失去了在白俄羅斯的土地，但仍住在自己的村莊奧勒什科韋齊——地處明斯克的普霍韋齊地區。他們繼續務農，只是家境降至當地小農的水平。亞歷山大和妻子謝拉菲瑪有4個孩子，兩男兩女，最大的生于1917年，最小的生于1928年——那一年，奧勒什科韋齊集體農莊成立。亞歷山大向集體農莊交出所有的牲畜和農具，只留一頭奶牛自家享用，但他拒絕加入集體農莊，希望像當地其他波蘭人一樣，移民去美國或法國。然而，謝拉菲瑪爭辯道：“誰會碰我們呢？我們做了什么錯事？我們已交出所有的財產！”亞歷山大在1930年春天被捕。幾天以后，政治警察又找上門對謝拉菲瑪說：“準備行李，你和孩子都將被流放。”謝拉菲瑪用毯子裹起幾件衣服，設法藏入幾件金首飾，再與孩子們擠上大車，趕去另外數百個“富農”家人集聚的教堂。幾天之后，她們的男人被帶回來相聚，再一起坐上大貨車，趕去3000公里之外北方的科米地區定居地。索菲亞回憶，到了那里，他們被告知在空谷倉里安家，“但什么都沒有——沒有床板，沒有刀子、勺子。我們只好在樹林里收集樹枝，自制床墊”。

流放者漸漸在定居地為每一個流放家庭造起木屋，就像家鄉的村莊一樣。奧熱姆伯羅斯基家以隨身帶來的金首飾買回一頭牛，重新開始新的家庭生活。但不久，大饑荒來臨，生活變得難以為繼。他們想出一個逃生計劃，因為小兒子在生病，所以決定女人先逃，讓亞歷山大照顧小男孩，承擔再度被捕的風險。謝拉菲瑪帶上9歲的索菲亞和5歲的艾萊娜，晚上趕路，白天躲在森林中睡覺，主要以漿果為食。謝拉菲瑪鑲有幾顆金牙，有時會拔出來一顆以備急需，用它搭乘農民的大車或賄賂官員。最終，她和女孩們回到白俄羅斯，藏在普霍韋齊地區的娘家，長達一個星期。但她的父母怕得不得了，建議女兒向警方自首。謝拉菲瑪只好去見普霍韋齊地區的警察，聽了她的逃生經歷，他們反而生出同情之心，讓她在24小時內再次逃走。謝拉菲瑪把艾萊娜留給父母，自己去附近的奧西波韋齊鎮，向一對老夫婦租房，讓索菲亞入學，自己再趕回科米地區，試圖找到丈夫和兒子。索菲亞回憶道：“媽媽走了，沒留下一句話——沒有說再見，也沒提供我何以為生的建議。”

整整一年，索菲亞與老夫婦同住，沒想到這對老人竟是惡人。“他們咒罵我，稱我為人民公敵的女兒，并威脅如果不聽吩咐，就要把我趕走。我整天哭泣，沒有錢，無處可去。”索菲亞實在忍受不了，逃去外婆家，發現他們自己也已被趕出家門，暫住一間舊澡房里。不過，他們還是將她收下，與艾萊娜做伴。

與此同時，謝拉菲瑪抵達科米的定居地，發現亞歷山大已經不在。原來，自己逃走的第二天，他又一次被捕，判刑3年，去附近的科特拉斯勞改營服刑。長子安東被警察招募為舉報人（他接受訓練，竊聽定居者的交談，每一次匯報可換取面包）；幼子薩沙仍然非常虛弱，由學校老師照看。回來后沒幾天，謝拉菲瑪就被捕了，也被送去科特拉斯勞改營，但她再次逃脫，在出工回來的路上從流放者隊列中逃走，潛入樹林的深處。她長途跋涉3000公里，重又回到普霍韋齊地區，與兩個女兒團聚。她們住在親屬為她們購買的小房子里，位于奧西波韋齊鎮，生活全靠自己在小菜園的種植，還喂養了一只山羊和幾頭豬。1937年，薩沙和安東（繼續為白俄羅斯警方工作）回來團聚。真正的闔家大團圓在兩年之后到來，亞歷山大獲釋于科特拉斯勞改營，返回家園。索菲亞回憶那一刻：

媽媽跑出去迎接，投入他的懷抱。爸爸說：“媽媽，孩子們在哪里？”媽媽回答：“別擔心——孩子們都好，全部四個。”爸爸癱倒在地，跪著吻她的手和腳，感謝她救了我們大家。 [(183)](#_182_2)

奧科洛科夫一家的故事更為離奇。1931年5月，阿列克謝·奧科洛科夫作為“富農”，被逐出庫茲涅茨克地區的伊琳卡村莊。那是在西伯利亞的西南部，而流放地則是在西伯利亞的北部。他從車隊中逃脫，走了一個月，回到900公里之外自己的村莊，才發現妻子葉夫多基婭、7歲的女兒瑪麗亞、9歲的女兒塔瑪拉以及自己的父母，都被放逐到800公里之外的“特殊定居地”，離納雷姆地區很近。阿列克謝懷揣偽造的文件，日夜兼程趕到那里。幾天之后，他又組織一大隊“富農”出逃，包括自己一家，有老有少。他們只在晚上趕路——母親背著瑪麗亞，父親背著塔瑪拉——17:38 2015-11-4以避開在針葉林搜查“富農”逃犯的巡邏隊。他們走了10個晚上，有時竟在兜圈子，因為當地的地形實在太復雜，直到水盡糧絕，老人們因體力耗盡而紛紛倒下。到第11個晚上，巡邏隊將他們重重包圍，還開槍打傷了阿列克謝的肚子。士兵用大車把他們帶去附近的村莊，關在一個澡堂。逃犯都要被送回納雷姆地區，只讓老人留下，包括阿列克謝的父母。之后，他們便再也沒有重逢之日。

奧科洛科夫一家再次設法逃脫。前往納雷姆地區的車隊行將出發，葉夫多基婭賄賂一名村民給巡邏隊灌酒，她和阿列克謝、兩個女兒順利溜走。他們逃向托木斯克，白天躲起來（可以看到道路遠處的警衛和狗），晚上急行軍（主要的危險是熊和狼），好幾個晚上沒有面包或其他食物，正好遇上一個克爾扎基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該部落?所有孩子都已死光，部落頭人建議，以面包、蜂蜜、小船來交換已能在部落工作的塔瑪拉。他威脅說，如果不同意，就要報警。阿列克謝勉強答應，而葉夫多基婭變得歇斯底里，但說服不了丈夫。瑪麗亞回憶：“我們在克爾扎基部落整整待了一個星期，以養精蓄銳。”

媽媽仍然哭泣不止，姐姐開始意識到情況不妙。我們離開那天，爸爸把姐姐帶入一個單獨的房間，把她鎖在里面；然后再將悲痛欲絕的媽媽、我和食物放入船中，我們劃船離開。

走了幾公里之后，阿列克謝把船停下，讓妻女躲在灌木叢，自己潛回克爾扎基部落搭救塔瑪拉。他在4天后返回，身上背著塔瑪拉。

但他們的麻煩遠遠沒有結束，在向北的旅途中他們又碰上了巡邏隊，被帶到另一所勞改營，營房周圍有高高的鐵絲網，此處距離托木斯克僅8公里。他們在那里度過了6個月，阿列克謝駕馬車向托木斯克城運送蔬菜，葉夫多基婭和孩子像其他囚犯一樣，在集體農莊工作。在托木斯克，阿列克謝漸漸認識一名鎮官員，對阿列克謝的厄運頗表憐憫，出于良心，他愿意助一臂之力。有一天，阿列克謝將女兒藏在馬鈴薯麻袋下，駕車去托木斯克，躲在鎮官員的家中。不久，葉夫多基婭跳上經過她農地的火車，也趕到鎮官員的家。他們穿上那位官員幫助買好的新衣服，坐火車返回庫茲涅茨克（此時已改名為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謝在煤礦上班，葉夫多基婭在食堂工作，全家開始了新的生活。“父親立即著手建造自己的木房子，帶一扇窗和一個爐灶。我們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傷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幾個月后，國內護照制度推行到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謝決定返回家鄉伊琳卡，希望能夠獲得注冊，但剛一到就遭逮捕，被關在勞改營。在斯大林斯克等候音信的葉夫多基婭，終于收到阿列克謝的來信，她擔心來信可能已經泄漏自己的下落，便與女兒馬上逃至國內護照制度尚未實行的鄰鎮塔什塔戈爾。不久，阿列克謝設法逃出勞改營，與她們重聚。他建起一個窩棚以避風雨，葉夫多基婭四處打散工。當她意識到自己已懷孕時，只得自行流產——用拳頭猛擊腹部，再將胎兒拖出。她險些喪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幾個月。鎮上的醫生都不敢施以援手，因為政府早已宣布墮胎是非法的，葉夫多基婭全靠吃草藥來治愈自己。

1934年，國內護照制度抵達塔什塔戈爾鎮。阿列克謝再次被捕，被送去斯大林斯克金屬制品工廠，充當刑事勞役犯。葉夫多基婭和女孩們也被捕，純粹是巧合，竟被送去同一家工廠。他們一家住在沿河岸挖出的地穴——共有幾百戶人家，緊靠工廠的圍墻。“屋頂”是與泥漿攪拌在一起的樹枝和松針，“墻壁”在下雨天會滲水。阿列克謝自制了基本的家具，還用木頭雕出杯子和勺子。他們再次拼湊出家庭生活。他們奇跡般活下來，仍維持一個家，但過去3年的創傷，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尤其是在女孩們身上。瑪麗亞和塔瑪拉噩夢連連，充滿恐懼，變得內向。瑪麗亞追憶道：“經過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習慣于沉默不言，不會說話，只會耳語。” [(184)](#_183____MP__f_4__op_9__d_5__ll_2)

三

五年計劃的許諾是建成一個現代化工業社會。斯大林在1929年說：“我們萬馬奔騰，邁向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扔掉我們俄羅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們正在變成一個金屬、發動機、拖拉機的國家，要讓蘇維埃人開上汽車，讓農民坐上拖拉機，再讓吹噓自己文明的西方資本家試圖趕上我們。” [(185)](#_184_2)

其象征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型建設項目：像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那樣的工業城，那是在烏拉爾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鋼鐵廠；像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白海運河那樣的運河和鐵路，幫助開發新疆域，向蓬勃發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內伯羅斯特羅伊那樣的巨型水壩，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1932年它的渦輪機開始啟動。對斯大林政權來說，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傳價值，因為在當時，對強制集體化和五年計劃過高的工業目標，仍有相當頑強的反對意見——不管是黨內，還是黨外。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發“社會主義進步”和蘇維埃烏托邦將臨的信念，這些信念又變成意識形態上的理直氣壯，要求人民為完成五年計劃而作出一切犧牲。阿納托利·梅蘇諾夫是農民的兒子，后來成為政治警察，在白海運河擔任獄警。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錄中，解釋了這種宣傳對數百萬“普通斯大林主義者”的影響，包括他本人：

我對五年計劃存有疑惑。我不明白，為何要迫使這么多罪犯，千生萬死地去趕建運河，為何趕得這么急？有時，我感到困擾，但有理由相信，我們正在建設偉大的事業，不只是一條運河，而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夠的。誰愿主動請纓來參加運河工作？我現在懂得，如此建設社會主義未免太嚴苛了，幾近殘酷，但我仍然認為這在當時是有道理的。 [(186)](#_185____Pravda___7_November_1929)

斯大林的工業革命不同于西方社會的工業化。正如梅蘇諾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計劃中要求的增長率，如果不用強迫勞役，根本就無法達到，尤其是在寒冷偏遠的遠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亞——那里藏有蘇聯大部分的礦產和燃料。奴役勞工的供應，開始于1929年對“富農”的大規模逮捕和流放，后來成為古拉格系統的經濟上需求的理由。該系統開始只是關押政權敵人的監獄，很快變成了經濟殖民化的工具——作為廉價且迅速的捷徑，以開墾荒野和發展蘇聯偏遠地區的工業資源，那是沒人想去的地方——這條理由是古拉格官員之間公開承認的。 [(187)](#_186_2) 歷史學家對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見解——有人把它當做斯大林鞏固政治權力的副產品，有人強調它只是一個手段，為了孤立和懲治幻想中的“階級”（比如“資產階級”、“富農”）和所謂的危險族群。 [(188)](#_187_2) 這些因素各自發揮作用，但經濟動機才是關鍵，隨著政府追求監獄的自力更生而變得愈益重要。

20世紀20年代，勞改營基本上就是監獄，囚犯參加工作來養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韋茨基特殊勞改營，1923年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島嶼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勞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該修道院在沙皇時代監禁持不同政見者，在布爾什維克的手中，又變成了關押所有敵人的普通監獄——包括被取締的反對黨成員、知識分子、前白軍，甚至還有“投機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個囚犯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猶太商人納夫塔利·法蘭克爾，因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監獄的效率低下，寫了一封有關如何運行勞改營的建議信，投入“意見箱”。不知何故，該信竟然到了快速晉升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管格里科·雅戈達的手上。法蘭克爾很快被帶到莫斯科，向熱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經濟任務的斯大林，解釋如何利用監獄勞力的計劃。法蘭克爾在1927年獲釋，并被委以重任：將索洛韋茨基特殊勞改營轉化成一個盈利企業。該監獄的人數迅速增長，從1927年的1萬人上升到1931年的7.1萬人。它贏得合同，在芬蘭邊界的卡累利阿地區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廠。新來的囚犯大多是“富農”，尼古拉·戈洛溫就在1930年12月進入索洛韋茨基勞改營。囚犯們根據自己的體能組織起來，口糧分配依照他們的產量，強者生存，弱者瘐亡。 [(189)](#_188_2)

1928年，大規模逮捕的對象包括“富農”、教士、商人、“資產階級專家”、工程師、“顛覆分子”、“破壞者”，以及斯大林強行工業化的其他“敵人”。人數之多，使蘇維埃監獄制度陷入癱瘓。中央政治局為此成立專門委員會，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長的監獄人口。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員N. M. 揚松，成員包括內政人民委員V. N. 托爾馬喬夫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管雅戈達。到底由誰來控制監獄人力，這三人爭執不下。雅戈達建議通過新設的勞改營網絡，在遠北和西伯利亞開發荒野和工業資源，顯然獲得了斯大林的青睞。那些偏遠地區有幾乎取之不盡的木材，像帕維爾·維滕貝格那樣的地質學家，還在繪制金、錫、鎳、煤、天然氣、石油的豐富礦產分布圖表，借助犯人的勞動，就可發起廉價的開采。1929年4月，該委員會建議實施“實驗營地”的新制度，每個營地容納5萬犯人，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監控。委員會強調，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勞役的成本就可從每人每年的250盧布降至100盧布。兩個月后，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關于使用監獄勞力），要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建立一個“勞改營”網絡，“以囚犯的勞力來開墾荒野[偏遠地區]、開采天然資源”。從那以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便成為蘇維埃工業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個迅速擴展的勞改營帝國，其人數從1928年的2萬人，增長到1934年的100萬。其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與內務人民委員會合并，新機構接管政治警察，再通過古拉格系統管轄全部的勞改營。 [(190)](#_189_2)

在早期的苦役勞改營中，最大的是貝爾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萬多囚犯，他們被用于挖掘白海運河長達227公里的航道，以連接白海和波羅的海。首次提出這條運河的想法是在18世紀，結果發現，其要求遠遠超出了當時政府的技術能力。此時重提，變成了宣傳五年計劃的重要部分，以顯示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這是一個極其雄心勃勃的計劃，因為規劃者不打算使用機器，甚至都沒有開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該項目的批評者（他設想雇用的是自由勞工）認為，巨大的建設成本實在劃不來，因為白海航運并不頻繁。但斯大林堅持認為只要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可以提供足夠的苦役勞工，運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實現創紀錄的速度——象征黨的意志和力量。法蘭克爾再次被委以重任，擔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將他的“索洛韋茨基特殊勞改營”方法，轉用于運河工程。修建運河的許多囚犯，也來自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為了節省時間和金錢，運河深度很快從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僅適用于淺水駁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掃尾時，南部幾段是匆匆完工的，僅有6英尺深）。囚犯們只有原始的手動工具——粗制濫造的斧頭、鋸子、錘子，沒有炸藥和機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車運土、建造木質的起重機和腳手架，還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營地。他們在嚴寒中工作得筋疲力盡，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個冬季，就有將近2.5萬人死去。雖然沒有確切數字，但根據幸存者的傳言，實際的死亡人數更高。德米特里·維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的囚犯，在白海運河的工地上擔任領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工作日結束時，工地上留下凍尸。他們的面孔上灑滿雪花，其中一人弓著腰背，臥在獨輪車下，他的手還攏在袖子里，就以這樣的姿勢凍死；有人凍死時，頭低垂，夾在自己的膝蓋之間；還有兩人背靠背，互相支撐著，一起凍死。可以想象，他們都是農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來就是近萬人。當局試圖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兒子和父親分住不同的營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下挖掘鵝卵石和大石塊的高定額的石方任務，即使在夏季你也無法完成。沒人能夠教他們，或警告他們。他們以鄉下人的敦厚實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盡，然后相互抱著凍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們的尸體。駕雪橇的人把尸體扔上雪橇，發出沉悶的聲響。沒有及時清除的尸體，到了夏天只剩下骨頭，與鵝卵石一起進入混凝土的攪拌機。他們以這種方式，鉆進了混凝土，澆鑄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臺，由此而獲得不朽。 [(191)](#_190_2)



瑪麗亞、娜杰日達、伊格納蒂·馬克西莫夫和伊格納蒂的哥哥安東（站立者），1934年攝于阿爾漢格爾斯克

除了對人命的摧殘，白海運河還給許多家庭帶來巨大的痛苦。

伊格納蒂·馬克西莫夫和瑪麗亞從小青梅竹馬，住在諾夫哥羅德省瓦爾達伊地區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瑪麗亞16歲的時候，他們結了婚，一起在伊格納蒂的家庭農莊工作，直到1927年他們搬至列寧格勒，伊格納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兒娜杰日達出生后5個月，伊格納蒂被捕（他曾參與1919年反布爾什維克的農民起義），先被送去索洛韋茨基勞改營，后轉至白海運河的北部工地。同時，瑪麗亞也被趕出列寧格勒，只好帶娜杰日達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發現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經遭毀，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沒留下一位親人。一個老鄰居勸告瑪麗亞快快逃離，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嬰兒，越境來到比鄰的特維爾省（希望諾夫哥羅德的警察鞭長莫及），遇上第一個村莊第一棟房子就急急敲門，開門的是一對老夫婦。瑪麗亞跪倒在地，懇求他們照看女兒，讓她逃生，因為沒人愿意雇用帶嬰兒的女子。這對老夫婦心地善良，撫養娜杰日達整整兩年。瑪麗亞在列寧格勒到摩爾曼斯克的鐵路上找到一份廚師工作。這條鐵路沿白海運河的北部運行，恰恰就是伊格納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當時，瑪麗亞對此一無所知。到1932年，她才從熟人處獲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區的勞改營，即運河與白海的交匯之處。瑪麗亞想找到他，便在小紙片上寫下尋人啟事，每當火車駛過白海城工廠建筑場地時，就從餐車車窗向外投擲。最終，奇跡真的發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納蒂的來信，他實際上是在凱姆鎮附近的勞改營，還要朝摩爾曼斯克的方向繼續北上55公里。伊格納蒂在1932年底獲釋，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終于在那里與妻女重聚。 [(192)](#_191_2)

古拉格不僅向白海運河那樣的建設項目提供勞工，本身也是工業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統第一座工業園區是維舍拉紙漿造紙綜合工廠，由眾多勞改營組成，位于烏拉爾的維舍拉河畔。該綜合工廠始于1926年，當初只是索洛韋茨基特殊勞改營所管轄的伐木營大網絡。到1929年夏天，拉脫維亞的布爾什維克愛德華·別爾津負責建造工廠，才在這伐木營大網絡中發展了工業。維舍拉河的水質純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選擇該地生產20世紀30年代初出現的高品質紙張。像《蘇維埃大百科全書》（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樣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維舍拉造紙廠的紙張。到1930年，維舍拉勞改營共有2萬囚犯（包括作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萬人受雇于伐木營，2000人受雇于小工廠（制造磚塊和纖維），其余的參與建造紙漿造紙廠和兩處營房定居地，分別處于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來都發展成了平民城鎮。 [(193)](#_192____MSP__f_3__op_19__d_2__ll) 別爾津設想，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業發展的實驗形式”，其文化機構將提供再教育，使囚犯變成“蘇維埃工人”。“光之城”還吹噓擁有電影和無線電的俱樂部、圖書館、食堂、衛生中心、噴泉花園、野生動物區、露天劇場、辯論場所和柱廊大廳內的“營地總俱樂部”。沙拉莫夫看到這座柱廊大廳，就會聯想起帕特農神廟，“只是更為可怕”。 [(194)](#_193_2)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統中，維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來“重塑”蘇維埃新人的想法，并不僅只是宣傳，更是許多布爾什維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紙出名的維舍拉勞改營，基本上還是一個經濟企業。別爾津的經營原則仍基于投資的預期回報，包括以精神和物質上的鼓勵來刺激囚犯完成生產計劃。1931年11月，別爾津成為遠北建設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個勞改營大網絡（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馬勞改營），地處西伯利亞的東北角——占地面積相當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間的西歐——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就躺在它的凍土之下。別爾津以管理維舍拉的經濟原則，來經營遠北建設托拉斯的眾多勞改營：驅使囚犯挖出盡可能多的黃金（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產出的黃金已超過蘇維埃1928年的黃金生產總量）。 [(195)](#_194_2) 在別爾津的治理時期（1931—1937），遠北建設托拉斯的勞改營的條件遠遠優于后續時期，許多囚犯甚至會懷念別爾津當政時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馬故事》（Kolyma Tales）中寫道：



烏戈列茨基赫一家（伊萬站在后面），1938年攝于切爾登鎮

別爾津嘗試——不能說沒有成功——解決這個難題：既要開發這一偏遠苦寒之地，又要設法改造這些囚犯的靈魂。判處10年徒刑的人，如果積累足夠的工作成績，便可在兩至三年之內獲釋。在別爾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時，夏日工作10小時。雖是囚犯，仍能領取相當優渥的薪金，得以資助家人，一旦刑滿釋放返回內地，絕無囊中羞澀的窘態……當時的墳場很少，那些科雷馬的早期居民，在后來人的眼中，似乎是長生不老的。 [(196)](#_195_2)

維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廢除，因為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的紙漿造紙廠已是工業中心，成為烏拉爾北部的經濟重鎮，吸引了大量農民進入工廠。

工業的興起需要工程師和其他技術專家。伊萬·烏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費奧多爾措沃村的農民家庭——位于烏拉爾的切爾登鎮。他父親因是“富農”，不準加入集體農莊，只好逃到切爾登鎮，在河上的駁船工作，專門向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紙漿造紙廠運送木材。父親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勞改營服刑。伊萬從小就有強烈的上進心，父親總是叫他學會一門專長。伊萬回憶：“我們的居住地很落后，沒有任何工業。我的夢想是去彼爾姆，但太遠，買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學會一門手藝，要不然就真沒有前途了。”他14歲之后仍能學習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屬于紙漿造紙廠的工廠技校。伊萬回憶，那里所有的老師都是維舍拉的前囚犯：

他們是工程師和其他方面的專家，來自勞改營，教我們學造紙和電工。我學的是電工，后來又在造紙廠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廠找到工作，因為在那個年代，像我這樣的技術工人極受歡迎。我甚至去了彼爾姆，在內河航船的碼頭工作……我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為我感到驕傲。 [(197)](#_196_2)

數百萬的農民子弟來到城鎮，為自己努力謀求全新的身份。從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萬人的速度突飛猛進。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對消費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國家窮于應付。但在五年計劃中，這并不屬于蘇維埃的優先考慮。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實施配給制。由于私營貿易受到壓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館和咖啡館逐一消失，商店櫥窗空空如也，人們衣著寒酸。亞歷山大·巴爾米訥時任蘇維埃外交官，在國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驚于首都的經濟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經歷了經濟好轉，如今卻顯現令人震驚的變化。每一張臉、每一家門面，都充滿著無可置疑的痛苦、疲憊、冷漠。幾乎找不到還在營業的商店，罕見的陳列櫥窗里彌漫著蕭條的氣氛，除了紙箱和食品罐頭，櫥窗內什么也沒有。店員在張貼“無貨”的標簽，所帶的神情與其說是輕率，毋寧說是絕望。每個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爛爛的，其質量真是難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裝讓我不知所措、無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類、黃油、脂肪類食品。 [(198)](#_197____MP__f_4__op_10__d_1__ll)

住房情況更是糟糕透頂。1928年，蘇維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間，但多數最貧窮的工人，其居住面積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國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條件：

庫茲涅佐夫與約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長、15英尺寬的木屋中。它容納500張窄床，填塞床墊的是稻草或干葉，沒有枕頭或毯子……有些人沒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時，一張床供多人輪班使用，沒有提供隱私的帷幕或墻壁……也沒有壁櫥或衣柜，因為每個人擁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 [(199)](#_198_2)

很多出身農民的工人，本來就對私人空間抱有極小的期望。在自己村莊時，一家人傳統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爐子旁的長炕上一起擠睡。盡管如此，搬進城鎮后必須與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間，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大沖擊。

娜杰日達·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農民大家庭，1929年逃離集體農莊，來到列寧格勒工業郊區的科爾皮諾，在伊若拉機器制造廠找到工作。她在工廠附近租了一棟木屋的底層房間的一角，那個房間既大，又不擋風，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爐取暖，但配有廚房、廁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達就是在此遇上了未來的丈夫亞歷山大。他來自雅羅斯拉夫爾省的雷賓斯克地區，也是農民，排行老大，新近才來到科爾皮諾，充當汽車修理工的學徒。房東是他的遠房親戚，讓他租用樓上房間的一角。結婚后，亞歷山大搬至樓下與娜杰日達同住，給床鋪圍上簾子，以求點滴的隱私。共有16人住在這一個大房間，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帶回客人；還有一名消防員，清晨4點就要去上班。娜杰日達回憶：“我們都睡不好。消防員睡在隔壁的床位，會在深夜起床，點燃火柴，察看時間。奧莉加[妓女]總是把男人帶進帶出，還威脅說，如果有人報警，她就會殺了我們，大家都變得神經兮兮的。”冬季，亞歷山大在雅羅斯拉夫爾城的親戚會來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氈靴，以補充他們集體農莊的收入。“他們都會來——姨媽、叔叔、姐妹、攜帶妻子的兄弟。”娜杰日達回憶：

我十分震驚于他們的生活方式——如此的骯臟、原始，一點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總是十分干凈。亞歷山大的親戚睡在地板上——為了保暖，女人蓋毯子，男人只蓋自己的長袍，令我們的房間聞起來像馬廄。 [(200)](#_199_2)



奧布霍沃村戈洛溫家的鐵床（2005年攝于佩斯托沃）。與安東尼娜回憶的傳奇色彩相比，它顯得平淡無奇

戈洛溫一家也走上遷徙到城鎮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終于從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獲釋，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爾鐵定居地與妻子兒女團聚，否則就會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達附近的小鎮佩斯托沃，設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樣，佩斯托沃充斥著逃亡的“富農”，其中有葉夫多基婭的弟弟伊萬·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爾什維克關閉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換姓后，開始在伐木業中充任會計。尼古拉升為工地上的工作隊長后，就搬進了護林員放棄的小木屋，家庭大團圓漸漸成形。兒子小尼古拉從白海運河來到佩斯托沃，加入父親的工作隊——運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為對他們辛勤勞動的獎勵，1.2萬名囚犯獲釋。當初遭難時，另一個兒子伊萬逃離奧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亞游蕩數年，現在也來到佩斯托沃，同樣加入父親的工作隊。下一個是女兒瑪麗亞，她在1934年尋來，當初也是潛逃者，作為“富農”的女兒流浪了3年。她擔驚受怕夠了，遂改名換姓，嫁與一名布爾什維克工人；當他發現她的真實身份后，不但拳腳相加，還將她拋棄。最后在1934年12月，經過數月向烏斯秋茲地區政治警察的書面請求，妻子、安東尼娜、托利亞、阿列克謝得以安全離開“特殊定居地”，與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護林員小木屋實在太小，但曾在營房度過三載的安東尼娜，卻把它當成了天堂：

這只是一個小房間，放著一張鐵床——即我們被逐時，鄰居普日寧為我們保存下來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們的子女出生的床。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床，確切無誤。它的床架上有同樣的鍍鎳小球和床墊，這是我們舊日生活唯一的紀念。 [(201)](#_200_2)

四

1932年9月3日，兩名男孩被發現死于格拉西莫夫克村附近的森林——位于西伯利亞的西部。據報道，他們是被親戚刺死的，因為其中年長的15歲男孩帕夫利克是少先隊積極分子，向蘇維埃舉報了自己的“富農”父親特羅菲姆·莫羅佐夫，所以親戚施以報復。事實、謊言、政治陰謀相互交叉、糾纏，很難弄清真相。從調查的一開始，蘇維埃報刊和警察就把謀殺當做一種政治犯罪：帕夫利克是少先隊模范，殺人者是“富農反革命分子”。

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一個偏遠的森林村莊，靠近塔夫達鎮——在烏拉爾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東北方向，相距350公里。這個村的周圍都是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晚上，村民們能聽到警衛犬的吠叫。格拉西莫夫克村又是一個悲慘的所在，最窮的農民擁有一頭牛，最富的擁有兩頭，擁有茶炊的只有9戶人家。簡陋的學校建于1931年的年底，只有一位老師和13本書。如同西伯利亞西部的其他農民一樣，格拉西莫夫克村的村民非常獨立。為了贏得土地和自由，他們在19世紀從俄羅斯中部東遷至此，故不愿加入集體農莊。1931年8月，沒有一家簽署協議加入集體農莊，難怪蘇維埃報刊斥之為“富農的巢穴”。 [(202)](#_201_2)

特羅菲姆·莫羅佐夫頭腦清醒、勤勞，家境一般，曾在內戰中參加紅軍，兩次受傷。他頗得老鄉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當選為村蘇維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舉報他出售假證件給“特殊定居地”的“富農”流放者，他兒子可能就是報案人。與蘇維埃報刊的宣傳相反，帕夫利克其實不是少先隊員（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沒有少先隊組織），但顯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開學后參與了宣傳鼓動工作，便與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舉報犯錯鄰居的名聲（村民數年后回憶，一直把他視為“爛小子”）。因為父親拋棄自己的家庭，喜歡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懷恨在心。帕夫利克作為長子，必須照顧母親塔蒂亞娜——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婦，似乎因特羅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燒，可能曾煽動帕夫利克打小報告。1931年11月，對特羅菲姆的審判在學校舉行。據報道，帕夫利克當眾譴責父親的罪行，特羅菲姆隨之大喊“我是你的父親”，男孩告訴法官：“是的，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已不再認他為父親。我這樣做，不是作為誰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特羅菲姆被送去遠北的勞改營，后來遭槍決。 [(203)](#_202_2)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審判中的表現不凡而變得愈加大膽，開始舉報隱藏谷物或反對集體農莊的村民。他的行為得到了9歲的弟弟費奧多爾的幫助。村民對兄弟倆的所作所為異常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謝爾蓋·莫羅佐夫禁止兄弟倆上門，其他親戚則試圖阻止他們舉報。但目前還沒證據表明，親戚參與了謀殺，很可能僅是青少年之間斗毆的結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達尼拉，雙方曾為馬具和槍支發生爭執。 [(204)](#_203_2)

謀殺事件一旦上了當地媒體，接踵而至的調查立即趨于政治化。達尼拉受到壓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謝爾蓋為兇手，支持此一指控的還有另外兩名家庭成員：為兒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亞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萬·波圖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和警察幫手，在此案中表現積極，被吸收入黨。最終，莫羅佐夫“富農家族”的5名成員在1932年11月接受審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劃謀殺；祖父和堂弟達尼拉，被控是謀殺執行人；祖母，被控將兩名男孩騙去樹林。從公審的一開始，他們的罪名就仿佛已經獲得證實（檢察官援引斯大林有關農村階級斗爭日益加劇的講話，來證明兇手的政治動機），審判不過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個被判處“最重的處罰”——由行刑隊槍決。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過此劫。 [(205)](#_204____Kelly__Comrade__pp_26_72)

事到如今，全國新聞界已得出自己的結論。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羅斯落后農民的象征，莫羅佐夫家族是家長制“富農”家庭的典型，集體化就是要將之橫掃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為英雄，一場個人崇拜的宣傳活動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爾基呼吁為這位年輕的烈士建造紀念碑，認為他“懂得血緣的親屬可能是精神上的敵人。對這樣的人，決不能姑息養奸”。 [(206)](#_205____Druzhnikov__Informer___p) 這場個人崇拜無遠弗屆，故事、電影、詩歌、戲劇、傳記、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繪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隊員，他身在家中，卻是黨的忠實崗哨。他犧牲自己父親的無私勇氣，應該成為蘇維埃全體小學生的榜樣。對他的崇拜在道德準則和情感上，深刻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們從帕夫利克的身上學到，與親人之愛及其他個人關系相比，對國家的忠誠則是更為高尚的美德。舉報朋友和親戚不是可恥的，反而是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借助于這場個人崇拜，植入千百萬人的腦子，成了對每個蘇維埃公民的切實期待。 [(207)](#_206_2)

莫羅佐夫故事的教訓，到底在誰的身上產生了最深的影響？根據采訪資料，在父母明確界定道德原則的穩定家庭中，僅有極少數孩子受到影響。不過在今天，我們是以大恐怖時代的背景來理解此類尷尬話題，記憶是靠不住的。現在看來，對在不穩定或受壓迫家庭長大的孩子來說，帕夫利克的確是積極向上的榜樣。在那些環境中，成年人的影響太弱，無法抗衡蘇維埃政權的思想。這場個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帕維爾·索洛緬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記者，他的報道首次引起蘇維埃公眾對帕夫利克的關注。他自己還是孩子時，就曾逃離殘暴的繼父，在一系列孤兒院長大成人。高爾基被逐出祖父的家——那是個殘酷且落后的所在，男人借酒澆愁，女人向上帝尋求安慰——9歲起就在伏爾加河的工業城鎮自生自滅。對具有如此不幸背景的人來說，帕夫利克就是一名英雄，因為他擺脫了自己家庭的“黑暗”生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積極投入公共事業，找到更高層次的少先隊“家庭”，加入黨和蘇維埃人民的行列，邁向“光輝燦爛的未來”。帕夫利克的故事尤其對孤兒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他們從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響，弄不清男孩舉報父親究竟錯在哪里。他們由國家帶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輸，要忠于和感謝把自己從貧困中救出來的國家。他們還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蘇聯真是三生有幸，否則就會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1932年，米哈伊爾·尼古拉耶夫3歲，因父母被捕而被送進孤兒院，并換了新名字。他從沒弄清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誰、何等人士、為何被捕以及被捕后的去向。兒童之家的政策就是擦去原來的身份，把米哈伊爾之類的孩子，重塑成“蘇維埃公民”。米哈伊爾還是小男孩時就深受莫羅佐夫故事的影響，孤兒們很小就開始反復接受此類教育。他認為帕夫利克是一名“真正的英雄”，夢想自己向他看齊，也能“抓到一名間諜”。回顧童年，他認為假如自己與家人一起長大，他少年時代心目中的英雄會有很大的不同：

與正常兒童相比，我們這些孤兒對生活只有非常貧乏的了解。我們失去家庭活動、廚房飯桌上的對話，以及一切非官方信息。在我看來，那種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它塑造了兒童對人生的看法，以及自己與外界的關系。我們的“世界之窗”只是課堂、少先隊、墻角的紅色電臺、《少先隊真理報》。它們所有的信息都千篇一律，解讀的方法也只有一種。 [(208)](#_207____See_ibid___pp_22__26_9)

帕夫利克的故事廣受歡迎，尤其在年輕人中更是如此，這更加深了家長制農村的舊世界與蘇維埃政權的城鎮新世界之間的文化代溝，并在許多家庭內造成分裂。農村人口越來越年輕化，越來越有文化。根據1926年的人口普查，農村人口的39%低于15歲（低于20歲的超過一半），20歲出頭的農家小伙識字率是父輩的兩倍多（同年齡的農家女子識字率高達母輩的5倍）。他們在蘇維埃學校接受教育，不再接受父母起人生態度和信仰。許多人通過少先隊和共青團，信心倍增，不愿再受父母的控制。他們不愿上教堂、佩戴十字架，拒絕遵循宗教的儀式，往往捧出蘇維埃政權作為此類問題的新權威，有時導致與父母起爭執。他們越來越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信息和價值觀。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隨著城鎮的流行文化蔓延至偏遠的鄉村，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不愿留在農村，希望進城。這愈加促使農村孩子認為，與農村相比，城鎮的生活方式更好，更有文化。20世紀20年代中期，共青團在沃羅涅日省農業最發達地區的調查發現，85%的共青團員來自農民家庭，但只有3%的共青團員愿意繼續務農。大多數的農村孩子想離開農村：或去城市的商店或辦公室上班，或上大學、進入工業領域，或參軍。 [(209)](#_208____M_Nikolaev__Detdom_New_Y)

梅德韋杰夫一家因老一輩與青年之間的分歧而變得七零八碎。安德烈·梅德韋杰夫1880年出生于奧布洛夫卡村——在莫斯科的東南方，相距570公里——旁邊有連結坦波夫和巴拉紹夫的鐵路線。他是一名鐵匠，冬天幫富裕農家修理金屬屋頂，夏天和5位兄弟在父親費奧多爾的家庭農莊上干活，全家共有17人。費奧多爾是農民大家長，又是虔誠的東正教徒，白發垂肩，全以舊法治家。他的孫女回憶：“我們遵守古老的習俗，大家吃飯使用同一只大碗。祖父以勺敲碗，就是大家開始吃飯的信號。他不開口，沒人敢作聲。”

1923年，安德烈與年齡僅有他一半的阿廖娜結婚。她和家人1917年逃離饑餓的彼得格勒，來到坦波夫的鄉下。阿廖娜來自貧困的勞工家庭。她的父親是鐵路搬運工，妻子去世后，一人撫養7個孩子，在坦波夫幫做農活，勉強維生。安德烈將年輕的妻子娶進門，1924年女兒尼娜出生。阿廖娜從一開始就發現很難適應夫家的家長制習俗。盡管只上了3年學，她還是當上了村蘇維埃的秘書。她開辦學校，教村里的孩子——還有許多成人——讀書寫字。安德烈對書本沒有興趣——梅德韋杰夫家的其他人也一樣。阿廖娜從當地集鎮把書籍和雜志帶回家，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1928年，阿廖娜的學校變成共青團掃盲運動中的掃盲點，這是反宗教、反家長制文化的蘇維埃運動之一。她又成為共產黨婦女部的積極分子，常常要去鎮上開會。費奧多爾對她的獨立性深感震驚，威脅說要把她趕出家門，也因此經常與安德烈發生爭執。安德烈自己是村蘇維埃的干部，即使善妒，不贊成妻子單獨去鎮上，但還是予以支持。

1929年9月，奧布洛夫卡村成立集體農莊。雖然村里67戶家庭中只有29戶同意加入，但被認為已經足夠。安德烈當選為集體農莊的主席，但費奧多爾拒絕加入，他的奶牛剛生牛犢，不愿放棄。父子之間發生了激烈爭吵。尼娜回憶：“如果母親不攔著，他倆早已把對方殺死了。他們開口大罵，并發誓分道揚鑣。”家庭農莊分給了各位成員，安德烈帶上自己的一份加入了集體農莊，而81歲的費奧多爾仍然單干。4個月后，老人作為“富農”被捕——緣于村蘇維埃的報告，奧布洛夫卡全村共逮捕了12名“富農”。費奧多爾的房子被砸，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亞，但家庭戲劇仍沒落幕。安德烈身為集體農莊主席，把前途寄托在農村，但阿廖娜向往城鎮，主要是想找到治愈女兒尼娜的好辦法。尼娜因病失明，需要特殊的照顧。1930年4月，阿廖娜離開安德烈，與尼娜一起回到列寧格勒，向親戚的朋友租借了房間的一角。尼娜回憶：“我們只有4平方米，剛好能放一張窄床、床頭柜和兩把小椅子。我睡椅子，媽媽睡床。”家人分離兩年后，安德烈也在1932年10月來到列寧格勒，親情戰勝了他對集體農莊的承諾。梅德韋杰夫一家搬去市中心一個較大的房間，阿廖娜在尼娜的學校教書，安德烈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工程部門從事屋頂修建工作。 [(210)](#_209_2)

像梅德韋杰夫家一樣，許多家庭屈服于集體化和城市化的雙重壓力。集體化只是俄羅斯農民所經歷的一系列社會劇變的最后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革命、內戰、餓死數百萬人的饑荒——但在某種程度上又是最慘痛的。因為它在是否接受蘇維埃生活方式方面，迫使父子反目，拆散了許多家庭。究竟有多少兒子真的舉報了自己的父親？這很難說，肯定有，只是沒有像蘇維埃報刊所報道的那么多。20世紀30年代，報刊給人的印象是，農村中充滿了真實生活中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據報道，一個名叫索羅金的少先隊員看到父親偷集體農莊的糧食，報警把父親給抓了起來；小學生謝廖扎·法捷耶夫告訴校長，父親悄悄囤積了大量土豆；13歲男孩普羅尼亞·科利賓舉報母親偷竊集體農莊的糧食（他獲得獎勵，前往克里米亞的著名少先隊度假營阿爾捷克，母親則被送去勞改營）。 [(211)](#_210_2)

少先隊鼓勵孩子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學習，舉報自己的父母。少先隊經常參與看管集體農莊的田園，舉報竊取糧食的農民。《少先隊真理報》登載年輕舉報人的姓名，列出他們的功績。20世紀30年代，在對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個人崇拜的高潮中，真正的少先隊員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幾乎都要揭發自己的親人。一份省級雜志警告，沒有舉報自己家人的少先隊員，應受到懷疑，如果發現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隊員自己也應受到舉報。在這種氛圍中，家長們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說話也就不足為怪了。一位醫生回憶：

我從不在孩子面前說斯大林的不好。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故事出來之后，你害怕說漏嘴，甚至在自己兒子面前也一樣。因為他可能會在學校里無心提及，有關部門就會記下，問男孩“是從哪里聽到的”。他會說：“爸爸說的，爸爸不會錯的。”你自己還渾然不知，卻已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212)](#_211_2)

亞歷山大·馬里安的父親就是這樣遇上麻煩的。亞歷山大的家鄉馬拉什蒂村在烏克蘭的西南部，靠近蒂拉斯波爾城。他是共青團干部，1932年他17歲時曾寫信給警方，舉報父親季莫費。亞歷山大是集體化的狂熱支持者，積極擁護反對“富農”的戰爭。他在1931年6月8日日記中，稱“富農”是“蘇聯最后且最大的剝削階級”。季莫費不同意，對集體化牢騷滿腹，在兒子面前也不忌諱，馬上被兒子舉報。季莫費被捕后被送進勞改營。亞歷山大在1933年10月的日記中，記下了與共青團同志的交談。后者聲稱，既然亞歷山大的父親有“反革命”思想，他就不適宜擔任干部一職。亞歷山大寫道：

我不得不向他解釋，我父親的被捕是應我的要求。他之所以持有反蘇立場，歸罪于他在奧地利當戰俘的經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帶回了對奧地利秩序的鐘愛，堅信他在奧地利看到的資產階級小農莊，才是創造農業財富的關鍵……他只是簡單地把集體化初期的錯誤當做了動亂，而不是暫時的并發癥。他如果知道辯證法，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就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并公開認錯。 [(213)](#_212_2)

這種基于狂熱意識的檢舉可能相當罕見。更為常見的是年輕人被動應付，寧可斷絕關系也不檢舉家人，而且也要等到親人已經暴露成“敵人”之后才會如此。他們接受學校和少先隊的灌輸，意識到如不與被捕的親人劃清界限，反而會危及自己的前途。左右這種行為的，往往有復雜的壓力和考慮。除非拋棄被捕的親人，以此證明自己時刻警惕著并且一切忠于蘇維埃，否則他們自己可能遭到少先隊和共青團的驅逐，不能就讀大學或就業。因此有成千上萬印在蘇維埃報刊上的公式化通告：

我，尼古拉·伊萬諾夫，與我曾是神父的父親斷絕關系。他多年來欺騙他人，宣稱上帝的存在。我要切斷與他的一切關系，這就是理由。 [(214)](#_213_2)

這些背棄可能得到了父母的鼓勵。父母很清楚，孩子如果想在蘇維埃社會謀求上進，必須與自己脫離關系。例如，1932年，一名來自克列緬丘格城附近傳統猶太家庭的16歲男孩，給當地意第緒語的報紙寫信，聲明脫離自己家庭的落后生活：

我拒絕成為這個家庭的一部分。我覺得，真正的父親是共青團，能教我學會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親是我們的祖國；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聯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根據后來對他妹妹的采訪，男孩是在父親的堅持下才寫下這篇聲明的。那個女孩回憶道：

我14歲那年，父親把我和哥哥叫進房間，解釋說他的生活方式不合時宜，不想我們重復他的錯誤，譬如遵循猶太人的宗教傳統。他說，我們必須去找學校墻報的編輯，宣布我們開始了新生活，不愿與父親的宗教過去有任何瓜葛。父親硬要我們這樣做，還說，這樣做不會給他帶來困擾，只會為我們開辟美好的前景。 [(215)](#_214____Cited_in_Geiger__The_Fam)

迫使年輕人背棄自己親人的不僅僅是野心，還有其他因素。此類斷絕關系的公開信，大多寫于離家上大學或進城工作的前夕。這是新身份的宣言，也是對蘇維埃夢想和目標的承諾。20世紀30年代初充滿了巨大的機遇和社會流動性：工人的子女有望成為專業人士；農民的孩子夢想進城。蘇維埃的宣傳對癥下藥，刻意鼓動這類抱負，把對個人成功的崇拜放到了五年計劃的中心位置。電影、書籍、歌曲，都突出無產階級“普通英雄”的功勛——工程師、科學家、勞動模范、飛行員、勘探人員、芭蕾舞演員、男女運動員——給蘇聯帶來榮耀。年輕人受到鼓勵，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工作也可取得同樣的成就，以此證明自己無愧于蘇維埃公民的稱號。

最重視這種抱負的往往是“富農”和其他蘇維埃“敵人”的子女——這個悖論恰好又是“富農”父親和他們的兒子之間沖突的癥結。子女從小就背上出身不好的烙印，一直希望成為社會上的平等成員，唯一途徑就是訣別自己的過去。有些背棄自己的“富農”親人，有些在自述中避而不談，還有些聲稱他們已“死去或消失”。這種否認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相關的記憶仍可喚起悔恨和羞恥。不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曾經舉報他人，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相對“正常”，追求各自的事業，而父母卻消失于古拉格。他們接受蘇維埃制度，從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盡管心里很清楚，該制度已將自己的家庭摧毀。

對這些悔恨情感的表達，沒人比詩人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更為有力。他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扎戈列村；父親特里凡是鐵匠，夫婦倆養育了7個孩子，生活中等，尚算舒適。亞歷山大年紀輕輕就是共產主義者，1924年加入共青團，成為村里的積極分子。他經常因政治問題與父親發生爭論，曾兩次離家出走，因為無法接受家人的農民生活方式。1927年，他加入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RAPP），搬到斯摩棱斯克，在共青團報紙《青年同志》（Young Comrade）上發表了第一首詩《寫給父親和富人》：

你家沒有缺乏，

你富裕——我觀察，

所有有墻有頂的農舍中，

最好的是你家。 [(216)](#_215_2)

1930年的春天，當局向特里凡課以重稅。他擔心被捕，逃去頓巴斯尋找工作；到秋天，兒子伊萬（當時17歲）和康斯坦丁（22歲）相繼跟來。他們認為，跑去尋找父親會減輕母親的負擔。伊萬在當年冬天回家，卻發現自己已成“富農”的兒子，無法上學。1931年3月，除了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都被逐出扎戈列村，康斯坦丁（已被關押在斯摩棱斯克）和特里凡（一從頓巴斯歸來即被逮捕）也加入了家人的流放行列，前往烏拉爾。在隨后兩年中，他們在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進進出出，四處潛逃，如果能找到國內護照制度中的漏洞，就在工廠和礦區打打零工。家人時聚時散，直到1932年秋季。其時，特里凡在烏拉爾的下塔吉爾鎮工廠找到了一份鐵匠工作。

與此同時，亞歷山大在斯摩棱斯克的教育學院學習，努力成為年輕詩人。他的第一首長詩《走向社會主義的大道》（1931年），描繪了集體農莊生活的燦爛圖景。他在學院的學生會議上發言，贊成反對“富農”的運動，但他顯然對家人的遭遇感到不安。1931年春天，他去拜訪地區黨委書記魯緬采夫，希望他能從中斡旋，以減輕他們的磨難。特瓦爾多夫斯基在1954年回憶，魯緬采夫卻說“生活當中，有時必須在家庭和革命之間作出選擇”。那次會談之后，特瓦爾多夫斯基被選為“動搖分子”，蘇維埃當局要考察他的忠誠。他在文學會議中，被攻擊為“富農”的兒子。他得以躲避厄運，全仗當地作家阿德里安·馬克多諾夫為他作了勇敢且積極的辯解（后來自己卻入了獄）。 [(217)](#_216_2)

由于擔心自己的職業生涯，特瓦爾多夫斯基刻意疏遠家人。1931年春天，父母從烏拉爾的利亞利亞“特殊定居地”給他寫信。他們并不指望經濟上的幫助——因為他們知道兒子自己也很拮據。伊萬在1988年回憶：“他們只希望，他也許想與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持聯系。”伊萬繼續講述了后面的故事：

亞歷山大回過兩次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答應幫忙，但很快寄來第二封信，內含我難以忘懷的字句：“我的親人們！我既不是野蠻人，也不是動物。我要你們堅強起來，要有耐心，努力工作。消滅富農階級，并不意味著消滅富農本身，更不會是消滅孩子……”再后來，就是這么一句話：“……我不能給你們寫信……也不要寫信給我。”

當這封信讀給伊萬的母親聽時，她——

低下頭，坐在板凳上，陷入深思，然后大聲講出話來。她不是講給我們聽，而是講給自己聽，用來說服自己仍擁有兒子的愛和忠誠。她說：“我知道，我覺得，我相信……他并不容易。我兒子當然是別無選擇，人生就像旋轉木馬，你又能如何呢？” [(218)](#_217_2)

兩個月后，即1931年8月，特里凡帶上小兒子帕夫利克逃離利亞利亞定居地，其余的人都留在原地。一個月后，他們到達斯摩棱斯克，前往蘇維埃大樓尋找亞歷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編輯部工作。特里凡叫門衛打電話給兒子，他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我知道他來信的內容，但我想：他是我兒子！至少可以幫幫帕夫拉希卡[帕夫利克]。一個小男孩，他的親兄弟，能給他帶來什么危害呢？亞歷山大出來了。上帝保佑，與兒子見面，怎么會如此擔驚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著他，他已長大，修長又帥氣！他父親的兒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著我們，然后開口，不是說“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來的？”

“修羅[亞歷山大]！我的兒子！我們正在饑餓、疾病、任意處罰中慢慢死去！” 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來的？”他突然問，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聲音，他的目光也變得異樣，似乎要把我釘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說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為帕夫拉希卡感到遺憾，他只是一個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愛，沒有想到如此的結局！

“我只能把你們送回原地，免費。”——這是亞歷山大的原話。

我知道，進一步的請求或乞求都已無濟于事。我只讓他等一等，因為我還要去斯托爾波沃鎮向朋友討債，等我回來后，聽憑他安排。他顯然有些吃驚。

“那好，你走吧。”他說。

特里凡在斯托爾波沃鎮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邊睡著了。午夜時分，警察趕來逮捕特里凡，因為亞歷山大已把他出賣。 [(219)](#_218_2)

亞歷山大再次看見或聽聞家人的消息已是4年之后。在這段時間，伊萬認為，亞歷山大只能將自己的內疚注入他從未發表的詩里：

你是誰，兄弟？

你好嗎，兄弟？

你在何處，兄弟？

在哪一條白海運河？

——《兄弟》，1933年



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1940年

1935年，伊萬前往斯摩棱斯克找亞歷山大。他逃離“特殊定居地”，在莫斯科和其他工業城鎮漂泊3年，以打零工為生，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鄉，也想讓哥哥知道家人的近況。兄弟倆僅有兩次簡短的會面，亞歷山大告誡弟弟趕快離開斯摩棱斯克：“這里沒有你要的東西，只會發現不愉快而已。相比之下，生活在這里對我很重要，這里的人都認識我！” [(220)](#_218_2)

伊萬當時對哥哥存有太多的抱怨，到了晚年，才漸漸理解亞歷山大承受的壓力：他必須留在人們認識和尊重自己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又能提供某種保護。對哥哥的選擇，伊萬不無同情：

我敢說，我的到訪激起了他的內疚和自責。他忘不了寫給流放中的我們的信，也忘不了他與父親在蘇維埃大樓的見面，我為他感到遺憾。不管我喜歡與否，我不得不承認，他的確是一名真誠的共青團員，自20世紀20年代起，矢志不渝。我現在認為，亞歷山大親眼目睹了傷害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革命暴力，雖然是不公且錯誤的，卻變成了一種考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青團員。也許他并不想向別人證明——只想證明給自己。毫無疑問，他以這種方式來自我說服：“每一名富農都是某某人的父親，他的孩子是某某人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憑什么與眾不同呢？要勇敢，要堅強，決不向抽象的人道主義和階級利益之外的情感低頭。”他的邏輯是：你如果支持集體化，就意味著你也支持消滅富農階級；在道德上，你沒有權利要求自己父親獲得例外的待遇。亞歷山大可能在心里為家人哀痛，不過，我們家也僅是眾多富農家庭之一而已。 [(221)](#_219_2)

五

1928至1932年的“大轉變”，摧毀了維系家庭和社區的舊關系和舊忠誠，創造了以人與國家的關系來定位的新社會。在這個制度中，社會階級是至關重要的：國家推崇“無產階級”，鎮壓“資產階級”。但階級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數百萬人離開家園，變換工作，在全國各地搬來遷去，很容易改變或重塑自己的階級身份。只要有助于上進，大家都學會了編造自己的階級身份。他們變得越來越聰明，或隱瞞和掩飾自己的不純出身，或文飾自己的履歷，使之顯得更像“無產階級”。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爾什維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爾什維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和個人主義的沖動，創造更高層次的人格（蘇維埃新人）。一位黨領袖在1929年寫道：“我們都是過來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們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須自我改造。” [(222)](#_220_2) 同時，人們能改變和操控自己的階級身份，又給黨領導帶來極大的焦慮。 [(223)](#_222_2) 他們普遍擔心，涌入城鎮的大量破產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富農”、商人、教士等），將稀釋“無產階級”的純度——“無產階級”是他們想象中支持專政的社會基礎——黨內會充斥隱瞞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險家。

蘇維埃報刊上有不少此類騙子故事，最有名的是弗拉基米爾·格羅莫夫。他冒名頂替，自稱是熟練的工程師和獲獎的建筑師，在1935年被判處10年勞改，去白海運河工地服刑。格羅莫夫使用偽造的文件，獲得高薪工作和莫斯科的高級公寓，甚至說服后勤人民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向他預支了100萬盧布。 [(224)](#_223_2) 對冒名頂替者的擔憂，折射出黨領導的深刻焦慮，直接影響了之后的大清洗文化。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為了要徹底揭露暗藏“敵人”的真實身份。整個20世紀30年代，黨領導鼓勵人們相信，同事、鄰居、朋友、親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這種觀念，既毒害了人際關系，又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瀾。艾萊娜·邦納的弟弟在父親被捕后曾說：“看，人民公敵到底是什么嘴臉，有的甚至偽裝成父親。” [(225)](#_224_2)

除了集體化，伴隨五年計劃的還有一場對“階級敵人”和“異己分子”的大清洗，以鏟除潛在的反對和異議。隨著國內護照制度的引入，警方奉命加強措施，把“社會不純分子”——“富農”、教士、商人、罪犯、“寄生蟲”、妓女、吉普賽人及其他族裔（芬蘭人、朝鮮人、伏爾加德裔等）——趕出城鎮。 [(226)](#_225____E_Bonner__Mothers_and_Da) 害怕自己受到社會的排斥，驅使數百萬人隱瞞自己的出身。在理論上，自我改造是可行的，但過程可能很長，很不確定。隱瞞似乎更加可靠，更是為社會接受的捷徑。20世紀30年代初的混亂時期，改變自己的身份相對比較容易，或搬去另一城市，或領取新的檔案。假檔案很容易獲得，或通過行賄，或向每個集鎮都有的偽造者購買。如果要漂亮的履歷，甚至無需花費錢財。很多人干脆扔掉舊的，換一個蘇維埃政府申請新的履歷表，填上不同的履歷，甚至還可篡改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 [(227)](#_226_2) 各省的蘇維埃官員和警察，其低效和腐敗是眾所周知的。

對于女性而言，婚姻是掩飾自己社會出身的又一途徑。安娜·杜博娃1916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農民大家庭。父親1929年作為“富農”被捕，被送去波多利斯克的建筑工地——就在莫斯科的南邊，妻子和孩子也跟了過去。母親得到兔場的一份工作，安娜就讀于附屬于面包廠的工廠技校，原以為可以回歸為“正常”人，卻沒想到安娜姐姐的共青團員朋友，站出來揭發她們在隱瞞“富農”出身。杜博夫一家全遭驅逐，丟失了所有的財產和居住權。父母帶著年幼的孩子去了莫斯科以東200公里的勒熱夫地區，住在父親親戚的草棚內；安娜逃到莫斯科。姐姐嫁給了當地人，她讓安娜睡在自己小房間里的地板上。安娜沒有居住證，純屬非法居留，卻仍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從工廠技校畢業，成了布爾什維克蛋糕工廠的糕點廚師，專門從事蛋糕的裝飾工作。她的前途開始變得光明，但危險始終存在：“富農”出身和非法居留一旦暴露，她將失去一切。她在20世紀90年代的采訪中說：

那段時間里，每當看到警察，我就很怕。因為在我眼中，他會告訴大家，我有嫌疑。所以我結了婚，只是為了能掩飾我的背景……我丈夫是個貧農，又是共青團員，在莫斯科附近的村蘇維埃擔任秘書。作為一名共青團員，他的工作就是識別和剝奪富農……我的婚姻只是一種偽裝。我沒有地方住，結婚之后，才有自己的一小間。上床睡覺時，我會自言自語，親愛的主呀，我竟睡在自己的床上。



變成“無產階級”的西蒙諾夫，1933年

安娜的丈夫很善良，就是喝酒太多。“我一直在做夢——‘主啊，要是能嫁給一位體面人，那該多好啊。’我和他朝夕相處，即便已經生下女兒，卻還在夢想有一位體面的丈夫。” [(228)](#_227_2)

被迫過這種雙重生活的人，需要不時承受曝光的威脅。有一名前秘密警察上校，還是共產黨的模范，一直隱瞞自己的貴族出身。他回憶道：“我一直處在恐懼之中，無時無刻不在擔憂，‘假如我的真相突然暴露’，我所努力的、我為自己和家人所建立的、我的生活、我的職業生涯，都會轟然倒塌。”除了恐懼，還有其他相互矛盾的沖動和情感——被動、內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對蘇維埃政權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獻身于蘇維埃事業的決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純。人陷入如此的雙重人格，變得得不知所措，其公眾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內心世界。有人這么回憶：“我開始覺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 [(229)](#_228_2)

年輕的西蒙諾夫有過類似的經歷。他隱瞞貴族出身，在薩拉托夫的工廠技校學做車床工，填在登記表上的身份是“無產階級”。西蒙諾夫擅自決定進工廠技校，而繼父希望他去高等學院或大學攻讀——在他父母的舊世界服務階層看來，那是理所當然的教育軌跡。但十幾歲的西蒙諾夫，為新工業社會的前景而感到無比興奮。他看到，無產階級是新興的統治階級，亟想加入其中。西蒙諾夫回憶：“這是五年計劃的開始，其浪漫精神徹底征服了我。我加入俱樂部，討論該計劃和它的不同版本。它對我的吸引力，遠遠超過我的中學課程。我的繼父非常惱火，我在工廠技校的第一年，他幾乎都不理我。” [(230)](#_229_2)

工廠技校籠罩在激進的、無產階級的氛圍之中。一半學生來自工人家庭，另一半來自兒童之家。作為貴族的兒子，西蒙諾夫在此出格得危機四伏，但他盡量調整，舍棄他少年時的短褲和涼鞋，換上工人的套衫和鴨舌帽，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西蒙諾夫受無產階級的吸引，其重要原因在于工人的獨立性：“我認為，成人的生活始于他開始上班，賺錢養家。我也要盡快獨立，養活自己。” [(231)](#_229_2) 西蒙諾夫加入產業工人的大軍，自然也就獨立于家庭之外，不再讓其貴族背景拖自己的后腿。

為了供自己在薩拉托夫工廠技校學習，西蒙諾夫去生產彈藥的通用工廠當學徒，上夜班，組裝突擊步槍的子彈盒。到1931年春天，他的月收入是15盧布，雖然微薄，對家庭預算來說卻是一大貢獻。特別是在4月之后，繼父亞歷山大被捕，15歲的西蒙諾夫成了家里唯一的經濟支柱。

那次逮捕進行得有條不紊。敲門聲在晚上10點鐘響起。由于亞歷山德拉感到不適，家人早已上床睡覺，亞歷山大要到穿戴齊整，方才讓警察進入自己的營房公寓。康斯坦丁醒來，發現繼父正在用放大鏡核對搜查證：

搜查持續了很久。他們做得中規中矩，在兩個房間里逐一檢查全部的物件，甚至查看我有關金屬技術的技校筆記、七年級筆記和母親的一大堆信件——她喜歡寫信，也喜歡所有的親戚和朋友給她寫信……等到他們完成搜查，理好文件和信件，好像還開出了一張被沒收物件的清單——也可能我弄錯了。我想，終于結束了。其中一人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把它遞給父親，這是對他的逮捕令。我當時沒想到，事后才意識到，不管搜查結果如何，逮捕從一開始就在計劃之中。真不忍心看到母親的反應，盡管她有堅強的性格。她顯然病了，一整夜坐著，持續發燒，渾身顫抖。父親很平靜，認真讀完那張紙——再一次從背心口袋拿出放大鏡——確定它真是一紙逮捕令，然后他簡速吻了母親一下，并告訴她，一旦弄清誤會，他就會回來。他緊緊握著我的手，一言不發，與逮捕他的人一起離開了。 [(232)](#_230_2)

像亞歷山大一樣，西蒙諾夫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他應該知道，許多專家在薩拉托夫被捕，包括繼父任教的軍事學院的好幾名軍官。像眾多失去親人的其他人一樣，西蒙諾夫也傾向于把繼父的被捕，當做一樁烏龍事件。“我認為，其他人肯定有罪，他們是我的敵人，但我無法將他們與我繼父聯系在一起。” [(233)](#_232____K_Simonov__Glazami_chelo) 這種區別幫助他維持對蘇維埃司法制度的信心。政治警察官員有條不紊的行為——不僅體現在亞歷山大被捕之時，西蒙諾夫4年前目睹繼父的親戚葉夫根尼·列別捷夫被捕的過程也是如此——更加強了這一信心。

西蒙諾夫遵照亞歷山德拉的命令，向技校老師匯報了逮捕一事。她說，不匯報反而是懦弱的表現。西蒙諾夫沒被學校開除，但被告知，最好等到繼父獲釋后再遞上他的入團申請表。亞歷山德拉和兒子被逐出營房的小公寓，所有家當被扔到街上——包括配有幾張板凳的桌子、兩個書架、一個衣柜、一張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軍用木箱和西蒙諾夫曾睡過的吊床。那天正好大雨滂沱，鄰居收容了正在發燒的亞歷山德拉，她的兒子則趕去薩拉托夫郊區尋找新的住所。他租好房間后，又找來一個貨車司機幫助搬家。終其一生，他永遠記住那一天——他第一次挑起家庭的重擔，一剎那間，他長大成人。

我沒齒不忘，沒有怨恨，甚至有點自我得意，因為我證明了我能應付一切。我有一種受傷的感覺，主要是為我的母親……她不能原諒那些將我們趕走的人。毫無疑問，我仍能記住那些人的名字，因為我對母親的受辱感同身受，即使我還只是一個男孩…… [(234)](#_232_2)

西蒙諾夫在繼父被捕一事上的反應，不是責備和質疑蘇維埃政權，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補貼家用。也許，繼父的被捕更加強了他的信念：為了保護自己，他必須夯實自己的無產階級身份。整個夏天，西蒙諾夫白天讀書，晚上打工。他獲得晉升，成為二級學徒工，工資翻了一番。這足以供奉母親，還能每周送兩個包裹給獄中的繼父。亞歷山德拉在一所中學教法文和德文，賺取額外的現金。到秋天，亞歷山大出獄了。西蒙諾夫回憶：“他擁抱、親吻母親，甚至也吻了我，這很不尋常。他好像起了變化，起初我沒注意，后來才明白，他的臉色變得陰冷蒼白，不再是以前被太陽曬得黝黑的模樣。” [(235)](#_233_2)

亞歷山大并沒透露在監獄遭受的折磨，只稱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銷，因為他在“嚴峻壓力”之下也拒絕認罪。西蒙諾夫回憶，在他看來，這件事的教訓在于堅定不移：

時至今日[1978年]，我自問：那個夏天發生于薩拉托夫的事件，是否影響了我對生活的態度？是否在我十五六歲的心靈中留下了烙印？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就繼父而言，其結果并不出乎意料。他還是原來的他——絕對是思路清晰和認真負責的典范——認識他的人全都相信他的無辜。在那可怕的歲月中，與我們交往的幾乎每個人都很友好——那也是我們所期待的。對繼父的審訊，由于他的強大和堅毅，其結局也是理所當然的。盡管如此，它卻給我帶來不安。我想，如果是一位較為軟弱的人，如果承受不了同樣的折磨，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令人擔憂的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腦中……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已經長大，這可能是潛意識的。我也已證明，自己可以應付一場危機。 [(236)](#_234_2)

“富農”子女試圖掩蓋自己的社會出身，其承受的壓力，一點也不亞于資產階級子女和貴族子女。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得就讀蘇維埃學校和大學，不得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不得參軍，不得從事較好的職業。他們往往渴望與家人劃清界限，以證明自己是“蘇維埃公民”，其實質就是害怕自己受排斥。1942年，20歲的沃爾夫岡·萊昂哈德被流放去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地區，他父親是1935年抵達莫斯科的德國共產黨人。沃爾夫岡在師范學院學習，同學中的大多數是“富農”子女，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被流放到這個半沙漠地區。他們幼時吃了很多苦，后來才獲準上學，很快就要變成教師。萊昂哈德注意到，這使他們的政治身份發生了大幅度的轉變：

我的大多數同學周末回家，回到卡拉干達周圍的[特殊]定居地。他們返校后，談及自己的父母時，經常義憤填膺。我經常聽到他們說：“他們還是不懂！我多次向他們解釋集體化的道理，但舊派人永遠都不會覺悟！”

這些富農的子女，剛流放至此時還是幼兒，隨著時間的流逝，事實上已成了斯大林主義者。 [(237)](#_235_2)

很多“富農”子女最終變為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甚至加入國家的鎮壓機關，開創出一片事業）。對有些人來說，轉變的過程涉及一個長期且自覺的“自我改造”，不無心理成本，斯捷潘·波德魯布尼便是一例。他1914年出生于烏克蘭西部文尼察地區的農民家庭，他父親作為“富農”流放至阿爾漢格爾斯克，他與母親1929年逃到莫斯科。斯捷潘在《真理報》印刷廠的技校找到一份學徒工，加入共青團，率領工人突擊隊，編輯墻報（一種宣傳鼓動），成為工廠理事會成員，似乎還被警方招募成了舉報人。那段時間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隱瞞著自己的“富農”出身。他的日記記錄了自己的戰斗歷程：如何清除身上農民老祖宗的病態心理，如何脫胎換骨當上一個蘇維埃公民。他盡量閱讀正確的書籍，采納正確的態度，以穿著整齊和學習舞蹈來提高個人修養，在自己身上培養關心公益和保持警惕的蘇維埃美德。每年年底，他制訂進度表，以便衡量自己“在文化上的進步”（猶如國家機構為五年計劃規劃每一年的經濟進步）。他的“富農”出身，一直是自我厭惡和自我懷疑的根源，一再被視作自己缺點的緣由。他還在思忖，到底能否真正成為社會的平等一員：

1932年9月13日：我已經幾次思索自己的生產工作，為何無法從容應付？為什么對我來說總是這么難？有一個念頭，我似乎擺脫不掉，像吮吸樺樹液一樣在吮吸我的血液——那就是我的心理問題。我難道真的是與眾不同嗎？這個問題使我毛骨悚然，全身發抖。我現在正處在中游，不上也不下，但很容易滑向兩端。

波德魯布尼不時擔心自己的出身會暴露出來，會在工作單位（充滿“敵人”的巢穴）受到批斗，會被解雇，甚至會被捕。最終，政治警察確實查出了他的“富農”出身，但告訴他，只要他“繼續積極配合”，就不會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魯布尼從此開始舉報他的同事。他在日記中承認，自己像是一頭困獸——厭惡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為“真正的自己”。

1932年12月8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內心的秘密——他們不允許我成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開、明確地站出來。相反，我不得不鸚鵡學舌，必須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覺中，我染上了阿諛奉承者和老狐貍的品性：軟弱、卑怯，總是屈服。

有一位同學，其“富農”兒子的身份暴露之后，卻沒有遭到處罰，波德魯布尼稱之為“歷史性時刻”。這似乎顯示，他可以不必再為自己的出身而痛感恥辱。他滿心喜悅，懷著對蘇維埃政府的感激來擁抱這種個人的解放。

1935年3月2日：我也能成為蘇聯大家庭的公民，我熱愛使之成為可能的人。我再也不是敵人圈子里的人。我一直害怕敵人，無論何時，無論何處。我再也不用擔心我的周遭。像大家一樣，我可以對各種事物發生興趣，做一個愛護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一個向主人叩頭的仆人。

6個月后，波德魯布尼被接收為莫斯科第二醫學院的學生。他一直夢想在高等學院學習，但心知肚明，他的“富農”出身將是一大絆腳石。《真理報》印刷廠的共青團支持他的求學申請，對他來說，無疑是首肯了他的蘇維埃新身份。 [(238)](#_237____W_Leonhard__Child_of_the)

對于許多“富農”子女而言，渴望被認作蘇維埃人，亟想成為社會中有價值之人，與其說與政治或個人身份有關，毋寧說應該歸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奮。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非常聰明，精力充沛，積極主動，又繼承了父親尼古拉的強烈個性。她在沙爾鐵定居地時，曾是學校里的大隊干部，輔導其他學生的閱讀。她1934年回到佩斯托沃與父親重聚，年僅11歲的女孩便下定決心要“努力學習，證明自己的價值”。 [(239)](#_238_2) 但在新學校，年齡較大的男孩把她當做“富農”的女兒加以嘲弄和虐待（佩斯托沃學校有很多“富農”子女），甚至老師們也會挑剔找碴。有一天，孩子們因行為不端而受訓斥。一名資深女教師更是把安東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特別的懲戒，大聲叫嚷：她那種人就是“人民公敵，卑鄙的富農！遭到驅逐也是罪有應得。我希望你們都在那里死絕”！安東尼娜在回憶錄（2001年）中，把此事當做她人生中的決定性時刻。她深深感到不公和憤慨，真想呼喊出來以示抗議，但更深沉的恐懼迫使她緘默不語。



佩斯托沃學校B班的優秀學生，1936年。13歲的安東尼娜（唯一沒穿少先隊制服的）站在左側

突然，我心里泛起一種感覺：我們[富農]與眾不同，我們是罪犯，很多事情都沒有我們的份。我現在明白，我當時即有一種自卑感，深深陷入恐懼之手。這個政府可以生殺予奪，因為我們是富農，沒有任何權利，只能在沉默無言中忍受一切。

同學瑪麗亞的父親也作為“富農”被捕，女教師訓斥事件發生之后，瑪麗亞低聲對安東尼娜說：“聽著，老巫婆吐出這樣的罵人話，我們來寫一封投訴信！”安東尼娜很怕，所以由瑪麗亞一人執筆寫了那封信，但是以兩人的名義。她寫道，她們的父母是富農，但不能怪罪于子女，衷心希望能有機會，以勤奮學習來證明自己。她們還在信上畫了新年樹 [[3]](#_3___1929Nian_Sheng_Dan_Shu_Zai) 作裝飾。安東尼娜將信藏在洗衣袋中（母親承擔學校的清洗工作），送去校長辦公室。校長頗表同情，把她們叫去他的辦公室，告訴她們“私下里，他同意我們的觀點，但我們不得外傳”。顯然，他后來找了那位刻薄的女教師，因為她的態度有所軟化，甚至允許這兩個女孩參與學校的話劇表演。那部戲講述農民保姆（安東尼娜飾）在“富農”（瑪麗亞飾）家受盡苦難，安東尼娜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最后的獨白中，我必須說這樣的話：“你已吸干了我的生命，我現在懂得，再也不愿同你在一起。我要離開你，去上學！”——講完這幾句，我就離開舞臺，隨即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我深深融入這個角色，我的憤慨顯得既自然，又逼真。 [(240)](#_238_2)

安東尼娜全身心投入學業，她喜歡學校，成績優秀，好幾次出現在學校禮堂的優秀學生榜上。這意味著她有資格參加蘇維埃節日的學校游行。安東尼娜喜歡這些游行——不是因為在政治上要求上進（她認為扛旗反而有失身份），而是因為代表自己的學校而感到自豪。她渴望加入少先隊，但由于“富農”出身，不能遂愿，她為此而傷心欲絕。她戴上自制的紅領巾，趕去少先隊聚集的俱樂部，渴望自己能夠參與他們的游戲。 [(241)](#_239_2) 漸漸地，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盡管有“富農”的背景，還是在1939年加入了共青團（共青團委員會看重她的主動精神和能力，對她的出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安東尼娜因此變得大膽，鼓足勇氣在1939年夏天，隱姓埋名，重訪自己的家鄉——已改名為“新生活”集體農莊。她發現，她的老家已變成集體農莊的辦公室。 [(242)](#_240_2)

安東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與日俱增，決定不再努力讓人接受真實的她，而是為自己編造全新的身份。每當填寫新表，她就開始撒謊。她回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決定重編自己的履歷。”從青年起，安東尼娜就過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談論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個認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閉口不談自己的家世，因為她害怕對方獲悉她的過去可能就會離開。之后的整整50年，她都不讓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因為她害怕，這既是為自己，也是為家人。回首往事，她記得：

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不能漏嘴，不能暴露。我一開口，就要動腦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說的話會使人生疑嗎？無時無刻不是這樣……我很怕，就會保持沉默。這種恐懼伴我一生，須臾不離……媽媽總說：“當你與狼一起生活時，就必須學會狼的習性！” [(243)](#_241_2)

[[1]](#_1_8) 從“拳頭”一詞派生出來的“富農”（kulak），最初被農民用于泛指剝削性質的行業（放高利貸的、出租土地的、投機倒把的，等等）。在他們看來，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農，也不可算作“富農”。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以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誤用此詞，將富裕農民全部劃作富農。他們有一個錯誤的假設，將農村中的雇人（這在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本來就極為罕見）視作一種“資本主義”（而不是農村勞動力短缺的彌補）。所以，富農就等同于資本家了。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想在農村挑動階級斗爭和征用糧食，便將無地農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組成貧農協會，以對抗被控囤積糧食的富農。到集體化時，反對加入集體農莊的任何農民——不管是富是窮——都被控為富農。

[[2]](#_2_8) 戈洛溫家有兩個谷倉、幾部小機械、3匹馬、7頭牛、幾十只豬羊、兩輛大車，還有一些家具，包括蘇維埃農村中象征著富裕的鐵床和茶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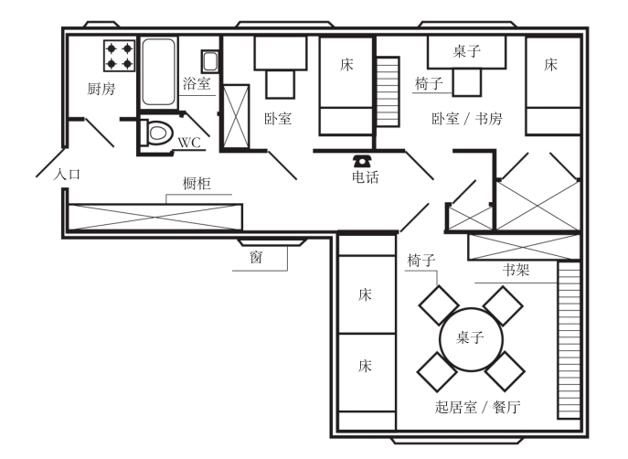
[[3]](#_3_5) 1929年圣誕樹在蘇聯遭禁，到1935年才獲得恢復，但改稱為新年樹。蘇聯的新年節日承繼了傳統圣誕節的很多活動，譬如家庭團聚、交換禮物以及類似圣誕老人的弗羅斯特叔叔（Uncle Frost）。

# 第三章 對幸福的追求（1932—1936）

一



法尼婭·拉斯金娜和米哈伊爾·沃希切斯基（結婚照），1932年攝于莫斯科



拉斯金家位于阿爾巴特地區的房子平面結構圖



左：馬雅可夫斯基地鐵站，1940年

右：斯大林工廠地鐵站，20世紀40年代

1932年，法尼婭·拉斯金娜和米哈伊爾·沃希切斯基結婚。米哈伊爾既是黨的干部，又在韋斯寧兄弟建筑師公司擔任建筑工程的行政主管，那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公司之一。法尼婭離開位于祖博夫廣場的娘家，暫時租房數月，再與丈夫一起搬入時尚的阿爾巴特區。那是一個三居室公寓，不大，總面積只有58平方米，但與絕大多數莫斯科人相比，卻顯得摩登豪華，擁有自己的廚房、浴室、抽水馬桶，甚至還裝了私人電話。 [(244)](#_243_2)

20世紀30年代初，莫斯科迅速擴展。從1928到1933年，首都人口從200萬增至340萬，主要是由于大批農民涌入工廠，這使城市的住房承受了巨大壓力。1933年以后，莫斯科通過國內護照制度以及大規模驅逐“異己分子”，得以控制城市人口。 [(245)](#_244_2) 數以百萬計的人，夢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蘇聯，莫斯科是權力、財富、進步的中心。在宣傳中，它被描述成社會主義制度下未來美好生活的見證。

斯大林對首都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濃厚的興趣，在1935年簽署了一項雄心勃勃的重建莫斯科的總體規劃。制訂該計劃的建筑師有韋斯寧兄弟、列昂尼德、維克托、亞歷山大等，接受莫斯科蘇維埃的統一指導。該計劃將莫斯科規劃成一個可容納500萬居民的城市，并在郊區廣泛建造新型的住宅區，由公路、環道、綠地、污水處理系統、通信網絡和工業世界中最先進的地鐵連接起來。計劃中一切都是大規模的。滿布中世紀窄街和教堂的市中心，被大規模拆除，為建造開闊的大街和廣場騰出空間。一條廣闊、全新的游行路線，將橫穿首都的市中心。特韋爾斯卡婭大街（已改名為高爾基大街）要拓寬至40米，擋道的舊樓只能推倒（許多建筑遺跡，包括建于18世紀的莫斯科蘇維埃大樓，只好退出主道，易地重組）。在紅場上驅除全部的市場攤位，以便聚集的游行隊伍在5月1日和革命紀念日暢通無阻地走過革命的神圣祭壇——列寧陵墓。甚至還有炸毀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計劃，以便讓陵墓前的游行隊伍可以排成沒有中斷的一長列。斯大林的莫斯科被重建成一座帝國大首都——即蘇維埃的圣彼得堡，比蘇聯任何其他城市更為雄偉，更為先進，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象征（布哈林稱總體規劃“幾近奇跡”，將使莫斯科變成“新的麥加，為人類幸福而奮斗的戰士會從世界各地趕來朝圣”）。 [(246)](#_245_2)

韋斯寧兄弟在首都的重建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其建筑理論因此而發生了戲劇性變化。20世紀20年代，韋斯寧兄弟一直走在建構主義運動的前列，嘗試將柯布西耶的現代主義理想融入蘇聯建筑。但在重建斯大林的莫斯科時，他們改用了新古典主義和紀念碑式的風格。這代表著藝術和精神上的妥協，他們是建筑師，必須仰仗客戶，而國家是其唯一的客戶。兩兄弟一直參與蘇維埃宮殿的籌建，地點就在1932年即已拆毀的救世主大教堂。該宮殿如果建成，將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定為416米高，比1931年在紐約落成的帝國大廈還要高出8米），頂上聳立一座巨大的列寧塑像（3倍于自由女神的尺寸）。 [(247)](#_246____RGALI__f__2772__op__1__d) 但蘇維埃宮殿從未建成， [[1]](#Zhe_Shi_Zui_Hou_Yi_Feng_Xin___Bu) 多年以來，該工地無形中變成了一座紀念碑，讓人記得莫斯科的允諾。

韋斯寧兄弟幫助監督莫斯科地鐵的建設——共產主義進步的另一個象征。隧道的挖鑿始于1932年，到1934年春天，共雇用7.5萬名工人和工程師，其中許多人是農工和古拉格囚犯。挖鑿是極其危險的工作，火災頻繁，更因土壤的松軟而塌方連連。100多人死于第一條地鐵線的建設，它全長12公里，連接索科爾尼基和高爾基公園。20世紀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設項目都雇用古拉格勞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勞改營）。25萬名囚犯參與了莫斯科至伏爾加河的運河開掘，為的是向首都不斷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許多人死于體力耗盡，尸體就埋在運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許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尋求靈感，像圣彼得堡一樣，也是以奴隸尸骨為地基的烏托邦文明。

第一條地鐵線在1935年啟用，莫斯科共產黨的主管拉扎爾·卡岡諾維奇譽之為無產階級的宮殿：“我們工人乘坐地鐵時，應該是歡快喜悅的，應該想象自己身處一座因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光芒四射的宮殿。” [(248)](#_246_2) 該地鐵站像宮殿一般，飾有吊燈、彩繪玻璃、黃銅和鍍鉻的飾件，墻壁由大理石（20個不同種類）、斑巖、縞瑪瑙、孔雀石裝飾而成。馬雅可夫斯基地鐵站（1938年）可與教堂媲美，它的中央大廳以橢圓形的穹頂、馬賽克的大理石地板、不銹鋼的拱門，造就了明亮崇高的氣氛。20世紀30年代后期，韋斯寧兄弟設計了斯大林工廠地鐵站，希望獲得身處大教堂之內的氣氛。落成的地鐵站（1943年），以哥特式的大理石高柱、空間和光線的巧妙利用、描繪五年計劃“成就”的漢白玉浮雕（包括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中心、斯大林工廠、蘇維埃宮殿和莫斯科至伏爾加的運河），完美地實現了這一初衷。 [(249)](#_248_2) 這些無產階級宮殿的輝煌，與大多數人生活空間的擁擠和骯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一方面，它們又發揮了異常重要的宣教功能（與歷史上教會扮演的角色沒有兩樣）。地鐵站的華美激勵了民眾的自豪和崇敬，加強了他們對公共目標和蘇維埃價值的信念。

韋斯寧兄弟也參與興建私人住宅，被要求設計兩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就像米哈伊爾·沃希切斯基和法尼婭·拉斯金娜婚后居住的。法尼婭回憶：“我們非常高興，這是我們第一次住上了帶有私用廚浴的公寓。米夏[米哈伊爾]有了自己的書房。如有來客，也還有空余的客房。” [(250)](#_248_2)

這種對私人公寓的重新重視，象征了蘇維埃住房政策的根本轉變。20世紀20年代，建造新型集體住房的烏托邦夢想主宰一切，布爾什維克優先考慮“公社房屋”——龐大的共用社區，容納數千工人及其家人的一長排房間，廚房、盥洗、洗衣設施都屬共用，讓婦女從家務瑣事中解放出來，讓居民學會集體生活。當代建筑師聯盟中的建構派，一直站在這蘇維埃運動的前列，他們要廢除一切私人領域，讓人們過集體生活。但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在1931年出現大的扭轉：盡管蘇維埃首都的住房長期緊缺，超過百萬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劇，新政策仍規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類型將是單個家庭單元的豪華住宅。

這一政策變化顯然跟政治和工業新精英的崛起有關，需要提供物質獎勵以保證他們對斯大林政權的忠誠。五年計劃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行政官員、經理人，遍布所有的經濟部門。據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的主席稱，工業部門僅在1930年就需要43.5萬名工程師和專家。斯大林的領導機構不信任舊工業精英（屬于資產階級，1928年的蘇維埃工程師中只有2%是黨員），其中很多專家一直反對工業五年計劃極端樂觀的目標。在1928至1932年的工業恐怖中，那些專家遭到了大規模地清洗（作為“破壞者”和“顛覆分子”）。其時，五年計劃引起的混亂和燃料、原料的不時中斷，使工廠不得不關閉。工人們拿不到工資，遂憤起聲討他們的主管。工業管理階層、經濟委員會、規劃機構、大專院校、教學機構，清除了身居高位的“資產階級專家”，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晉升創造了機遇。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工廠技校的全盛時期，為不斷增加的工業職業和行政職位，培養了適當的人選，其中許多人前不久剛剛從農村前來。從1928到1932年，工廠技校的學生人數從180萬躍升至330萬（將近一半是農民）；14萬工人從車間工作晉升為管理人員（其中很多人一邊上班，一邊培訓）；150萬工人離開工廠，或擔任行政職務，或赴高級院校進修。同時，還有100萬工人入黨。黨領導嘗試擴充無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以支持和實施黨的政策，因而降低了入黨要求（在許多工廠，全體員工集體入黨）。 [(251)](#_250_2)

斯大林需要可靠的支持。“大轉變”釀造了社會的混亂和廣泛的不滿，從而動搖了他的領導權威。黨和蘇維埃的檔案中充斥著來自憤怒的工人和農民的投訴信和請愿單，哭訴“五年計劃”造成的苦難。他們寫信給蘇維埃政府、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甚至直接寫給斯大林本人，抱怨集體化和過度征糧的不公、在工廠遇到的麻煩、蘇維埃官員和經理的腐敗、住房和食品的短缺。 [(252)](#_251_2) 他們并不是任由命運擺布的順民，全國各地都有起義和罷工。 [(253)](#_252_2) 在許多城市的大街上，反蘇維埃的涂鴉，幾乎與蘇維埃的宣傳一樣醒目。 [(254)](#_253_2) 在農村，反蘇維埃的牢騷體現于一些押韻歌謠之中：

五年計劃，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十年見效。

我不去集體農莊：

那里沒有面包！ [(255)](#_254_2)

就斯大林的路線而言，黨內雖然沒有正式的反對意見，卻有大量潛藏的異議和不滿，主要是針對1928至1932年的巨大人力消耗。到1932年，他們逐漸匯聚為兩個非正式的集團。一個由托洛茨基的前追隨者組成，來自20世紀20年代的左翼反對派（斯米爾諾夫、托爾馬喬夫、艾斯蒙德等），他們召開各種會議，談及如何把斯大林趕下臺。另一個由較溫和的右翼反對派殘余力量組成，帶頭的是新經濟政策支持者，如李可夫和布哈林，其中特別活躍的是莫斯科的一個前任區委書記留汀。他在1931年3月籌辦老同志秘密聚會，其結果是一份長達194頁的打印文件，題為“斯大林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危機”。該文件詳細批判了斯大林的政策、統治方法和個人品性，在黨員隊伍中私下傳閱，直到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截獲。所謂留汀政綱的全部重要成員被捕，并于1932年的秋天被開除出黨和判刑，其中大多數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槍決。其時，更多的老布爾什維克，即1917年的老革命，被控與這個集團相互勾結。 [(256)](#_254_2)

留汀集團的暴露增加了斯大林對黨內反對派的偏執猜疑。1932年11月，又發生了妻子娜杰日達·阿利盧耶娃的自殺事件，這一切讓斯大林精神錯亂，使他懷疑每一名隨行人員。1933年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對黨的隊伍實施徹底的清洗。相關的指令并不提及涉嫌加入反對派的成員，只呼吁把“欺騙黨、隱匿真實企圖，表面上發誓忠于黨、實質上削弱黨政策的兩面派”驅逐出黨，從而挑明黨的緊急任務是向黨領導靠攏，以鏟除持不同政見者。 [(257)](#_256_2)

20世紀30年代，黨的性質通過吐故納新發生了漸進的演變。老布爾什維克節節敗退，新興的黨員官僚階層崛起于工業基層，主要是晉升為行政官員的工人。他們是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兒子（極少是女兒），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受訓于工廠技校和其他技術機構。這一代行政官員成了斯大林政權的支柱，到斯大林統治落幕時，占了黨高級領導的很大比例（在1952年的蘇維埃政府中，他們在115位部長中占了57位，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羅米柯、阿列克謝·柯西金等）。 [(258)](#_256_2) 20世紀30年代早期涌現出的精英，一般來講，比較循規蹈矩，比較聽從當初提拔他們的領導干部。他們平均只接受過7年教育，很少能作獨立的政治思考，只會借用報刊上黨領導的發言，鸚鵡學舌，重復其宣傳口號和政治術語。 [[2]](#_1_13) 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際認識非常淺薄，全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8年）為準。那是斯大林組織編寫的黨史，他們卻背得滾瓜爛熟，完全認同斯大林政權，雙方的價值和利益都是一致的。他們急于實施上級的命令，以此推動自己的職業生涯。

這些新精英的特征在阿爾卡季·曼科夫的日記中得到尖刻的描繪。阿爾卡季是列寧格勒紅三角工廠的會計，父親是律師，自己在工廠上班是為了取得“無產階級”身份，并能進入圖書管理員學院求學。他在1933年日記中描述他的上司——一個25歲的年輕人，像數萬青年人一樣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他不知來自何方，現身于列寧格勒的街頭，通過勞工交流所找到一份工廠工作。數月之后，他便加入共青團，成為一名積極分子——也就是說，完成上級吩咐的一切任務——開會積極發言，炫耀他所知道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章。于是，他突然晉升為勞工經濟學家，轉到行政部門工作……他取得的成就，既有一個重要的稱號，又有很豐厚的薪水（每月300盧布）。他給人一個成功人士的印象，很滿意自己的成績和地位，臉上掛著甜蜜的笑容，身穿一塵不染的英式白襯衫、領帶和黑色新夾克，面帶自信甚至傲慢的神態。他雖身居高位，卻沒有具體工作，凈管些瑣碎小事：留心員工的行止，檢查賬目，設置工作的規范。他認為自己什么都要管——為了表達工廠的意見——有時堅持，有時大聲嚷嚷，有時施加威脅。他收集信息，填寫從來沒人查看的無謂的表格和卡片。他熱衷于調查車間內的技術革新是否合法，老是在翻閱工人的規則手冊。 [(259)](#_258_2)

這種行政官員為了物質和政治的獎勵，會很容易攻擊其在蘇維埃等級制度中的對手。1932年，龐大的工業集團特蘭斯瑪西科技公司的經理，寫信給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說：

蘇維埃政權的問題在于，最卑鄙的人反而得心應手，官運亨通——他們刻板地執行最高權威的宏觀設計……這種官員從不講實話，因為不想讓領導受窘。看到對手管轄的地區或病房正在遭受饑荒和瘟疫，他卻幸災樂禍。他絕不會動一根手指頭來幫助近鄰……我在周圍看到的，都是可惡的政治權術、骯臟的伎倆和因口舌而被毀的人。舉報不止，看不到盡頭。你隨口吐一口吐沫，都很難不招惹聲討者或騙子們的攻擊。我們都變成什么了？都快透不過氣了。越是無才的混蛋，他的誹謗就越是寡廉鮮恥。當然，清洗共產黨與我無關。我只是認為，尚存的體面人士將會被趕盡殺絕，這就是它的最終結局。 [(260)](#_259____A__Man__kov__Dnevniki_tr)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1936年）概述了他的“蘇維埃熱月”理論。他指出，斯大林的權力依賴于龐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數約在500萬至600萬。 [(261)](#_260____Stalinism_as_a_Way_of_Li) 這新興的執政階層并未繼承老布爾什維克的民主本能，或對斯巴達的崇拜。老布爾什維克因此擔憂，新經濟政策的資產階級影響將會腐蝕廣大的黨員。該執政階層又希望成為蘇維埃的新資產階級，其興趣集中于舒適的家居生活、對物質財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愛好和舉止。他們的社會意識是反動的，緊緊抱住家長制家庭的習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產主義，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舊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捍衛蘇維埃制度，他們物質上的福祉和社會中的地位全靠這個制度。

反過來，這個制度又確保了他們的滿意。之前，消費行業為了趕建新廠新鎮而資金短缺，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中，獲得了政府的追加投資。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食品、衣服、家庭日用品的供應明顯改善（當時的數百萬孩子都能記得，他們穿上第一雙新鞋的時間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從1935年秋天起，配給制逐步取消。根據蘇維埃的宣傳，隨著商店櫥窗的充實，消費者的樂觀情緒高漲。照相機、留聲機、收音機大批量生產，以滿足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的需求。甚至奢侈品的生產（香水、巧克力、白蘭地、香檳）也有穩步的上升，其主要顧客是新精英，其價格在蘇維埃節日有所下調。以前只有富人享用得起的奢侈品，現在的勞工大眾，只要努力工作也能買得起。這樣的印象，對維持“美好生活”的蘇維埃神話非常重要。新的消費雜志向蘇維埃顧客提供日益多樣化的時裝和家具設計，百貨公司和豪華商店的開張獲得媒體的大肆渲染。葉利謝耶夫食品店改名為第一食品商店，1934年10月在莫斯科的高爾基大街重新營業。《莫斯科晚報》（Evening Moscow）宣布：“新店將出售1200多種食品。”

食品部有38種香腸，包括之前從未在任何地方出售的20個新品種。該部門還將出售3種奶酪——卡門培爾奶酪、布利乳酪、林堡芝士——都是商店特地訂制的。糖果部有200種糖果和糕點……面包部有50種面包……

第二天來店里參觀的共有7.5萬人（有人猜測，大部分只是來看看）。 [(262)](#_260_2)

對照于革命后前10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禁欲主義，這種對蘇維埃消費文化的提倡，可算是意識形態上的急遽撤退。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仍在呼吁共產黨人為黨的事業犧牲自己的幸福。到如今，蘇維埃領導卻發出決然相反的信息：消費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兼容。斯大林在1934年爭辯，社會主義“所意味的不是貧窮和貧困，而是貧窮和貧困的消亡，并為社會所有成員提供豐富多彩的生活”。斯大林這個想法，起源于1935年的集體農莊勞工會議。當時，他批評嘗試取消家庭財產的集體農莊，要求讓集體農莊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們對集體農莊的興趣。斯大林還告訴與會代表，“人就是人，想擁有自己的東西”，這不算“犯罪”——想要私人財產是人的本能，“改變人的心理和教人過集體生活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263)](#_262_2)

從革命禁欲主義撤退回來的另一跡象，是黨開始重視個人的外觀和禮儀。早期布爾什維克認為，關心如此小事是反社會主義的。但從20世紀30年代起，黨宣布年輕共產黨員必須具有文雅的舉止和良好的儀表。《真理報》在1934年宣稱：“我們贊成美麗、別致的服裝，漂亮的發型，整潔的指甲。女孩應討人喜歡，香水和化妝是優秀女共青團員的‘必須’，男共青團員剃須更是強制性的。”香水和化妝品的銷售，無論是數量還是品種，在20世紀30年代都有顯著增長。大家還開會來討論服裝時尚和個人衛生。 [(264)](#_262_2)

追求樂趣也成為新的重點。斯大林在1935年宣布：“同志們，生活變得更好了。生活也帶來了更多歡樂，而當生活充滿歡樂，工作就會順利。”早期布爾什維克斥為輕浮追求的跳舞，獲得斯大林政權的正式鼓勵，很快風靡一時，到處涌現新開的舞蹈學校。莫斯科的公園出現了嘉年華會，大街上有了慶祝蘇維埃節日的龐大的游行隊伍。蘇維埃電影界拍攝了一些歡樂的音樂劇和浪漫喜劇。人們還沒有很多面包，卻有大把的馬戲團。

斯大林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等級制度的建立緊密相連，該制度又以物質獎勵為基礎。對金字塔頂端的人來說，勤奮和忠誠能帶來即時的獎勵；對底部的人來說，只有獎勵的許諾，兌現則還須等待共產主義的實現。所以，該政權又與理想中的社會的建立相連。該社會的核心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其成員包括黨和工業的精英、技術精英、專業人士、軍警人員以及艱苦奮斗贏得聲譽的勞動模范（the Stakhanovites）。 [[3]](#_2_13) 該社會等級制度的原則就是對國家的服務。在每一個機構內，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口號（“干部決定一切！”）旨在扶植國家忠實的仆人，他們的忠心耿耿可獲得優渥的回報，例如較高的薪酬、特殊的消費品、蘇維埃的頭銜和榮譽。

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蘇維埃政權鼓勵傳統的（“資產階級”）家庭價值觀，進一步推動了中產階級的涌現。這也是一個戲劇性的逆轉，因為從1917年以來，黨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這一轉變部分原因是為了因應“大轉變”對人口造成的影響：出生率出現災難性的下降，嚴重威脅到國家的勞工供應和軍事實力；離婚率增高，遺棄兒童已成普遍現象；家庭變得支離破碎，留給政府來應付殘局。回歸到傳統的家庭價值觀，也反映出工業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久前還屬于農民和工人的階層。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寫的，政策變化只是蘇維埃政權坦率的認輸，它“強攻舊家庭”的烏托邦嘗試——鏟除私人生活的習俗，培植集體生活的本能——已經一敗涂地。 [(265)](#_264_2)

同樣，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黨對家庭和私人住宅采取了更為寬松的措施。私人生活的概念（chastnaia zhizn’）——即不受國家查控的封閉且獨立的領域——仍在意識形態上遭到否定，但個人生活的概念（lichnaia zhizn’）——即接受公眾監督的個人或家庭的領域——卻得到國家的積極推廣。在這種公私分別的配置中，私人和個人的東西只表現在個性上，公共領域仍占統治地位，仍要求了解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實際上的效果是解放出一個四面墻包裹的空間，容許家庭私事的自由表達（消費口味、生活方式、家庭習慣等），但又保留了對私人行為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于共產黨人。婦女黨報《女工》（Rabotnitsa）在1936年宣稱：“黨不干預共產黨人的日常瑣事，也不為之設立標準。它并不要求每一位黨員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為規則，只要求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以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重。” [(266)](#_265_2)

建設私人住宅作為新的重點，是政策改變的標志。所有主要的部委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公寓街區，分配給自己的領導。曾在20世紀20年代樸素度日的布爾什維克家庭，現在享受了相對奢侈的生活。他們得到各式獎勵，例如新住宅、特供的食品商店、帶司機的公家車、郊外別墅，以及在特別的政府度假勝地和療養院度假。對很多此類家庭來說，20世紀30年代是他們第一次獲得自己的生活空間和自主權。向蘇維埃精英授予郊外別墅——自20世紀30年代起才有大規模的實施——在鼓勵私人家庭生活方面尤為重要。住在郊外別墅，遠離警惕之眼和竊聽之耳，親戚們可以暢談，要是在公共場所，那是不可思議的。此外，簡單鄉村生活的日常活動——游泳、爬山、采蘑菇、讀書、院子里的閑逛——讓家人得以暫脫蘇維埃社會的約束。

在家庭內部，斯大林政權提倡回到傳統的家庭關系。婚姻變得光榮，婚姻登記處布置得漂亮光鮮，婚姻證書都印在優質紙張上（來自維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裝紙。戒指作為基督教遺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現于蘇維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強蘇維埃家庭的辦法出籠：收緊有關離婚的法規，大幅提高離婚費，導致離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撫養費，取締同性戀和墮胎。在蘇維埃的精英當中，性態度開始回歸傳統，甚至變得相當拘謹。優秀的斯大林主義者應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獻于自己的家庭。根據對他個人崇拜的宣傳，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樣。 [[4]](#_3_10) 布爾什維克在親密關系中的行為也受到密切關注。如被認作壞父親或壞丈夫，因而被開除黨籍之事，也時有發生；同時又希望黨員妻子，重回在家撫養孩子的傳統角色。

推動家庭成為國家的基本單位，迎來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復名譽。1935年，一名教育家寫道：“家庭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細胞，其撫養子女的職責來自其培養良好公民的義務。”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權愈益通過家庭的比喻和象征，來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時，千百萬人發現自己雖然身處全新的陌生環境，而家庭的價值體系卻是他們所熟悉的。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那幾年蓬勃興起，把他比作“蘇維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羅斯人民的“沙皇父親”（tsar-batiushka）。各式社會機構，如紅軍、黨、共青團甚至“無產階級”，都被重新想象為大家庭，通過同志關系來提供更高形式的歸屬感。在這個家長制的黨國，父母的角色此時上升為權威人物，在家里堅持蘇維埃的道德準則。《共青團真理報》在1935年宣稱：“年輕人應該尊重長輩，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個人必須尊重和熱愛父母，即使他們老派，并不喜歡共青團。”相對于當年對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個人崇拜，鼓勵蘇維埃兒童舉報反對政府政策的父母，這真是戲劇性的變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詮釋對莫羅佐夫的個人崇拜，低調處理帕夫利克的舉報，改而強調新的理念，如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紀律。 [(267)](#_266_2)

這些年中長大的蘇維埃精英的孩子，對此非常懷念，尤其是對“正常的家庭生活”。瑪琳娜·伊萬諾娃1928年出生于高級黨員家庭，父親在列寧格勒東南50公里外的姆加鎮擔任黨委書記。她家在那里有一棟寬敞的鄉間房子（dacha），但多數時間住在曾是貴族的祖父在列寧格勒的公寓。瑪琳娜回憶：

那套公寓太豪華了，有10個大房間，我這個孩子可以任意跑來跑去。房間里的天花板很高，窗戶很大，可以望見花園……列賓和列維坦的油畫[復制品]掛在墻上。三角鋼琴和臺球桌分別立在兩個會客室里……這公寓是我童年回憶中最幸福的所在。我記得熙熙攘攘的聚會，親戚、朋友，加上他們的孩子，都來我家慶祝新年。孩子們穿上化裝舞會的服飾，爸爸裝扮成弗羅斯特叔叔，給每個人帶來巧克力和禮品，放在新年樹的周圍。 [(268)](#_267_2)

伊娜·蓋斯特的父親阿隆，1932年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農業部門主管，全家就搬進了專為蘇維埃高級官員保留的莫斯科著名公寓（河堤大樓公寓），面對克里姆林宮。他們的公寓很大，裝飾有政府提供的最新式蘇維埃家具，還有一個藏書數千冊的家庭圖書館。全家享受有教養的俄羅斯生活，既有共產主義理想，又有蘇維埃精英的特權。他們有莫斯科大劇院高級包廂的通行證，還有頻繁的假期，可以前往克里米亞和莫斯科郊區的特別度假村。但伊娜最美好的回憶，還是他們在尼科利納·戈拉的鄉間房子里度過的夏日：

鄉間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巒的美麗松林中，就在莫斯科河拐彎處的上方。這個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是莫斯科最美的地段之一……我們的房子就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俯視莫斯科河。那是兩層的大房子：舅舅韋尼阿明掩飾不住他的羨慕，稱之為“別墅”（villa）。樓上樓下各有三個大房間，還有一個大陽臺。房間里經常擠滿了人，總是有父母的親戚來訪——主要是我的表親。周末，父母的朋友從莫斯科過來……我有鄰近鄉間房子的自己的朋友，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河上。爸爸建了從房子走下河邊的樓梯，讓祖母更容易走到水邊。那是一條蜿蜒陡仄的樓梯，至少有100個臺階。我們離開后，人們仍把它稱作蓋斯特的樓梯。它的下端有一個小小的木碼頭，可供游泳，但周圍的水奇深，只有與父親一起，我才被允許在那里游泳。朋友和我都喜歡克爾任采夫鄉間房子的碼頭，那里的水淺，很適合游水。 [(269)](#_267_2)

但這種美好的回憶并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福分。對許多家庭來說，20世紀30年代是緊張氣氛愈演愈烈的時期。傳統關系的恢復，經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間制造摩擦。對蘇維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政權背叛了當初布爾什維克革命家的允諾，即把婦女從家務羈絆中解放出來。有關工人家庭中家務分配的統計數字，證明了他的判斷。從1923到1934年，職業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對于女性而言，20世紀30年代沒有帶來任何變化——她們在工廠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飯、打掃、照顧孩子，平均每晚5小時——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現代化，即自來水和煤電的供應，得以解脫于傳統的家務（劈柴、挑水、準備火爐），從而有更多時間追求文化和政治。 [(270)](#_269____I__Shikheeva_Gaister__Se)

托洛茨基也考慮到家庭中的性別政治：

有關蘇維埃的偉大史籍，其戲劇性章節之一就是蘇維埃家庭的解體和破裂：丈夫作為黨員、工會會員、軍官、經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負家務瑣事的重壓而原地踏步。在兩代蘇維埃官僚的人生軌跡中，妻子最終遭到遺棄的悲劇比比皆是。同樣的現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現，最可怕的粗魯和殘酷，恐怕就在官僚機構的頂端——那里相當大的比例是暴發戶，很少文化修養，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檔案和回憶錄總有一天將暴露對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惡者憑借自己的高位卻無懼起訴，往往還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強制性的“母親的快樂”。 [(271)](#_270_2)

弗拉基米爾·馬赫納茨1903年出生于烏茲達村的貧農家庭，位于白俄羅斯的明斯克以南60公里。母親在生他時去世，父親在1906年移居美國，把弗拉基米爾交與姑媽撫養。他14歲時逃離家鄉，加入赤衛隊，參與了1917年10月在明斯克的奪權戰斗。之后的4年中，他作為紅軍，又與內戰中入侵蘇俄的波蘭軍隊交戰。弗拉基米爾在1921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開始在莫吉廖夫農業學院學習，在此遇到并愛上了瑪麗亞·喬索娃。瑪麗亞1904年出生于克里切耶夫小鎮的農民商人家庭，位于莫吉廖夫城以東100公里。她是六姐妹中的老幺，又是家中第一個讀大學的孩子。瑪麗亞1925年從農業學院畢業，在農學和經濟學方面尤其卓越。弗拉基米爾與瑪麗亞作為事實上的丈夫和妻子（恰似20世紀20年代的許多蘇維埃青年，他們拒絕登記結婚，視之為反抗資產階級習俗的標志），在莫吉廖夫城同居。弗拉基米爾自農業學院畢業后投入研究工作，1928年搬去莫斯科加入泥炭研究所（泥炭被布爾什維克視作重要的能源），在伊萬·拉達琴科的輔導下撰寫論文。拉達琴科是布爾什維克的老將，又是列寧的朋友，其時擔任該研究所的主管。弗拉基米爾無可挑剔的履歷、無產階級出身、對斯大林工業計劃的熱情，很快引起莫斯科黨組織的關注，1932年便要他與拉達琴科合作，為莫斯科發展新的能源供應。弗拉基米爾成為莫斯科煤氣托拉斯——新成立的工業園區——的首任主管，向迅速擴展的首都提供天然氣。 [(272)](#_270_2)



1934年的弗拉基米爾·馬赫納茨



瑪麗亞和列昂尼德，20世紀40年代

瑪麗亞跟著弗拉基米爾來到莫斯科，在農業委員會擔任經濟學家，直到1933年兒子列昂尼德出生。弗拉基米爾進入莫斯科煤氣托拉斯之后，全家即從原先的共用公寓小房間搬到麻雀山（1935年改名為列寧山）寬敞的獨用公寓。他們享有斯大林時代新精英的所有特權：帶司機的政府高級轎車，銀松林專區的私人鄉間別墅（dacha），專為黨干部保留的秘密商店——難買的消費品在那里一應俱全。列昂尼德描述他早年的記憶：

雖然記憶零零碎碎，但仍有豐裕的感受，還有神奇童話般的氛圍：我騎在父親結實的肩膀上，看到海洋一般的燈光閃爍，以及大理石的斑斕璀璨（肯定是在莫斯科新落成的地鐵站）……　 5月1日，我們還去了紅場的列寧陵墓。 [(273)](#_272_2)

瑪麗亞雇了一名保姆，住在馬赫納茨公寓的儲物室里。瑪麗亞的意圖是想返回農業委員會工作，但弗拉基米爾強烈反對（他告訴瑪麗亞“黨的高級領導的妻子應該待在家里”），當妻子試圖說服時，他大發脾氣。像許多男性黨干部一樣，弗拉基米爾認為，家庭生活應服從于他對黨的責任。因為對黨來說，他的工作比妻子的更為重要，她的職責就是組織“秩序井然的共產黨家庭”，以免除他的后顧之憂。1935年11月，他出差去列寧格勒，在旅途中寫信給瑪麗亞：

我親愛的！我要離開幾個星期。我會寫信告訴你我的近況和要麻煩你的事項。暫時，我只要這幾本書[下附書單]……裝飾一下我們的大廳是個好主意，它有點偏暗。就講這些了。確保我們的小家伙安全健康，照顧好自己，出去時穿得暖和些……忘掉你想回去工作的幻想吧，現在你的崗位就在家里。 [(274)](#_272_2)



左起：還是契卡的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1919年；柳芭·戈洛夫尼亞，1925年；鮑里斯·巴別茨基，1932年

重回“資產階級”的物質價值觀，有時變成家庭關系緊張的又一來源。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是蘇維埃電影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弗謝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攝影師，兩人合作密切。普多夫金導演了幾部經典電影，例如《母親》（1926年）、《亞洲風暴》（1930年）、《逃兵》（1933年），五次榮獲斯大林獎。戈洛夫尼亞1900年出生于克里米亞的城鎮辛菲羅波爾，他兩歲時，身為小貴族的父親就已去世，全靠母親憑借小額養老金把他和弟弟彼得帶大。全家搬到了赫爾松城，兩兄弟獲得貴族議會的贈款，就讀于第一預備學校——相當于普通中學。10月革命后，阿納托利加入契卡，彼得卻加入白軍。1920年，阿納托利率領一小隊契卡，向駐扎在附近的白軍發起伏擊。該白軍的首領恰恰是他最要好的同學，其父親是貴族議會的主席。阿納托利不忍下手，他讓部下暢飲伏特加，自己悄悄越境告誡白軍逃走。這段經歷——記載于他的日記，從未出現在他的履歷中。之后3年，阿納托利在外漂泊，躲避紅軍。一開始，他在塔什干定居，有志于成為一名農學家，卻遭到農學院的開除，只好逃去莫斯科。1923年9月，他在國家電影技術學院學習攝影，那是蘇維埃首都新建的電影學校。他在此遇到并愛上了柳芭·伊萬諾娃——一名非常漂亮的年輕演員，來自烏拉爾的車里雅賓斯克城，剛剛抵達莫斯科。她1905年出生于農民家庭，在14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他倆很快結婚，但聚少離多，各忙自己的電影工作。女兒奧克薩娜經常坐火車去赫爾松城與祖母同住，或去車里雅賓斯克城與姨媽做伴。

1933年，阿納托利和柳芭分配到第一套公寓——共用公寓中的兩個小房間，那是一座附屬建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住宅區的大院里。其時他們的女兒奧克薩娜7歲，她在回憶錄（1981年）中這樣描述他們的公寓：

地板漆成了紅色[因為沒有地毯]……今天追求物質享受的年輕人，會以為自己走進了一個出售遺棄家具的舊貨商店，甚至是一個垃圾場。我們公寓中最珍貴的是斯拉夫式的五斗柜，所有廚房用品都放在一個漆成白色的自制櫥柜里，還有兩張彈簧床墊、爸爸的寫字臺、三個帶玻璃面板的芬蘭式書柜——那是我最喜歡的家具，里面有很多書……我睡一張折疊行軍床，位于客廳的一角，躲在瓷器立柜的背后。那張行軍床是唯一“屬于”我的東西，我會在晚上跟它交談，我曾以為，我的夢都是它講的故事。 [(275)](#_273_2)



沃利克·巴別茨基、柳芭和奧克薩娜在克拉托沃的鄉間別墅，1935年

這就是蘇維埃電影界兩位重要人物的簡易居所。其時，柳芭是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的當家花旦，已演過幾部默片。阿納托利漠視個人財產，經常稱自己強烈反對奢侈和優裕是基于“原則”。奧克薩娜回憶：“他擁有相當數量的只有白襯衫和領帶。”阿納托利的樸素植根于自己階層的價值觀（很多重要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革命家來自俄羅斯的破產貴族），以及母親的節儉習慣。他母親只有微薄的寡婦養老金，全憑自我犧牲才支撐了孩子的求學。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之所以吸引阿納托利，正是這種努力工作和紀律嚴明的精神。他的孫女說，“他的性格中總有契卡的影子。作為祖父，他很嚴肅，也很嚴厲，從來沒有寵愛過年幼的我”。 [(276)](#_274_2)

柳芭則不同，開朗熱情，情感豐富。她在家里是最年輕最漂亮的，一直受寵，并渴望享受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她穿的是昂貴的服裝，擁有很多珠寶。1934年，柳芭愛上了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英俊且富有魅力的主管鮑里斯·巴別茨基，隨即拋棄阿納托利，搬去莫斯科郊外克拉托沃的鄉間別墅，與巴別茨基以及他的兒子（沃利克）同住。到秋天，柳芭和鮑里斯回到莫斯科，搬進共產國際酒店（即勒克斯酒店）的寬敞公寓（樓上就是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辦公室）。該公寓非常豪華，沿著走廊有4個鋪著木地板的大房間，另有一個大廚房——管家和保姆就睡在那里。奧克薩娜回憶：“這是一座宮殿，一家博物館，一個童話。”她在1935年也搬去那里。室內裝飾由共產國際一名法國工人設計建成，家具——珍貴的古董、青銅花瓶、皮椅、波斯地毯——都是從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倉庫廉價購入的。列寧格勒黨的負責人謝爾蓋·基洛夫在1934年12月遭到刺殺，依照斯大林的命令，不少貴族和資產階級被捕，并被逐出自己的住宅，那些家具就是這樣被沒收來的。奧克薩娜回憶：“媽媽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收購，喜歡將買下每一件東西的故事告訴我們。” [(277)](#_276_2)

阿納托利的母親，即強勢的利季婭·伊萬諾夫娜，始終堅持自己舊貴族的價值觀，認為柳芭沾上了“資產階級的矯揉造作”，還嘲笑她的衣服和家具“低級趣味”。在利季婭的眼中，它們只是反映出了“蘇維埃新精英的物質占有欲”。她認為兒子娶了門不當戶不對的女子，一度在激烈爭持中稱他們倆婚姻的結晶奧克薩娜是“革命中的最大錯誤”。她相信，柳芭投入巴別茨基的懷抱，是因為他更能滿足她的嬌貴口味。阿納托利因柳芭的離去而變得心煩意亂，利季婭解勸他，如果有更大的公寓，或許能誘使她回心轉意，但阿納托利不愿在原則問題上作出妥協。奧克薩娜在回憶錄中回顧這些事件，歸納出引起家人爭吵的三種相互矛盾的財產觀：貴族的舊姿態，布爾什維克革命家的斯巴達式，以及蘇維埃新精英的物質享受。奧克薩娜同情母親，認為她之所以喜歡鄉間別墅，與其說是為了占有，毋寧說是在找回童年生活：

媽媽常說，我們去“我們的鄉間別墅”——好像它是屬于我們的。我記得這些，是因為爸爸常說他反對私人擁有財產的想法。在那個年代，我沒有財產的概念，不能理解母親擁有自己的東西的心愿。今天，我理解得更深，才知道這不光是財產的問題。媽媽不只是在建造一棟鄉間別墅——而是想建立一個家庭。她為家人做出了實在的安排，就像她的農民祖先歷來所做的。她愛鮑里斯，她愛我，她愛沃利克，這種愛是她的家庭重心。 [(278)](#_276_2)

二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亞那樣的生活方式。對大多數蘇維埃人來說，20世紀30年代是物資短缺的時期。新的官僚階層，即使可以光顧特殊商店，也得不到豐富的商品供應。據估計，在20世紀30年代的前期，有資格領取特殊供應的家庭共約55500家（蘇維埃新權貴階層的可靠估計），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約有45000家。所獲得的特殊供應，僅允許他們比絕大多數人生活得大為舒適，但按西方的標準，他們的生活水準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員家庭每月的配給清單，時間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腸/ 1.5千克黃油/ 2升油/ 6千克鮮魚/ 2千克咸鯡魚/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雞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魚子醬/ 50克茶葉/ 1200支香煙/ 2塊肥皂

這些家庭還可憑政府發給的優惠券，從特殊商店購買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進了高級食品或是生活消費品，他們又享有優先權。但享有如此特權地位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斯大林的行政官員，只能過溫飽的生活，可能有幾套額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間。曼科夫在日記中不無諷刺地指出：“任何人能夢想的最多是：兩三套不同的服裝，其中一套是進口的；進口的自行車（或摩托車）；無限制地購買每千克11盧布的葡萄（正好有貨時）。” [(279)](#_277_2)

貨物的分配與社會政治等級制度中的權力或地位有直接的關聯。蘇維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財產——大多數人只有一兩套衣服，大家能吃飽就已不錯了。即便分配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個嚴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員之間存在數不清的等級，以工作場所的地位、技術水平、經驗多寡、地理位置為衡量標準。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資，就要高于省級城鎮和農村的。盡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實上，這仍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即使都是窮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級。

私人貿易部分地補償了計劃經濟的不時短缺。人們在跳蚤市場出售或交換他們的日用品，如果負擔得起，還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數幾家菜市場，購買集體農莊工人在自留地種植的農產品。人們允許在國營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貴重物品，或在外匯商店（Torgsin）以首飾和外幣交換高級食品和消費品。外匯商店出現于20世紀30年代初，為的是吸收居民的儲蓄，向五年計劃提供資本。在計劃經濟的邊緣，黑市蓬勃發展。國營商店缺貨的商品卻在柜臺底下以高價出售，或被調給私商（向經理支付賄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隨即涌現出一種“互惠的經濟”，通過后臺和顧客的非正式網絡（blat），來應付供應的短缺。如果沒有這些私人關系，蘇維埃經濟在許多方面都不能正常運作。辦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鐵路客票、護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關系——家人、親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這種黑市原則也應用于蘇維埃的工廠和機構，那里許多商品和服務的提供和交換，也以私人關系和人情為基礎。蘇維埃的宣傳視之為一種腐敗（鏟除這種非正式小網絡的口號在大清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贊同這一觀點。但大多數人感到非常矛盾：他們承認這樣做在道義上不對，肯定屬于不合法，但像每個人一樣，都要憑此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以應付一個他們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沒有非正式小網絡，就不可能在蘇聯過得舒服。正如諺語所說的：“一個人必須要有的，不是一百個盧布，而是一百個朋友。” [(280)](#_279_2)

擁擠的城鎮中，住房緊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們幾乎愿意做任何事來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間。由于大量農民涌入工廠，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壓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間；到1940年，該數字又降至稍稍超過4平方米。新興工業城鎮的情況更糟，因為那里的住房建設遠遠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281)](#_280_2) 例如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工人階級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間。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廠營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圍掛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擁有的唯一的隱私。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一名女工，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繪出一幅生動的畫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沒有單獨的房間。廚房很小，轉身都難，灶臺上擺滿了鍋碗瓢盆。身穿滿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鋼鐵廠沒有淋浴設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隊取水，還有些可憐的“家具”——金屬床、床頭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營房有意沒建廚房或廁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顯然不贊同私人生活的集體化，反而喜歡住在地棚（zemlianki）里，盡管條件原始，但好歹還有些許的隱私。1935年，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的居民中，約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廠和礦區的荒地上，布滿了大批的地棚區。蘇維埃嘗試消滅私有財產的最后領域，但工人表現出頑強的抵制。 [(282)](#_280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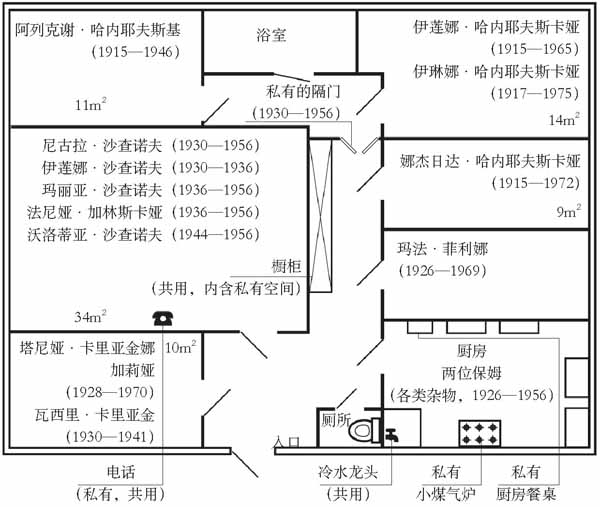
在斯大林的俄羅斯，圍繞人際關系的是對居住空間的爭奪。根據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所說：

后代人永遠都弄不明白，我們的“生活空間”到底是指什么。為了它，無數罪行已經發生。人們與它綁得那么緊，放棄它是永遠無法想象的。誰會放棄這珍貴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間？沒人會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別墅、不動產一樣，傳給主人的子孫。討厭看到對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兒子和女兒、成功占了廚房旁邊儲物室的前傭人們——都要與他們的生存空間結成連理、永不分離。無論是結婚，還是離婚，頭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間的問題。我聽聞，拋棄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間的男人，被稱作完美的紳士。 [(283)](#_282____S__Kotkin__Magnetic_Moun)

有人假結婚，以此獲得一個住所；離婚夫婦仍住同一間房，為的是不放棄各自的生活空間；鄰居互相舉報，希望能夠贏得對方的空間……這樣的故事無窮無盡。 [(284)](#_282_2)

特維爾省農家遺孀的19歲女兒娜杰日達·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讀于列寧格勒的鐵道學院。她住在學生宿舍，與其他幾個女孩共用一個小房間。像許多來自農村的新移民一樣，娜杰日達未能在列寧格勒登記戶籍。由于國內護照制度的推行，她面臨被驅逐的危險。她通過一個熟人，找到一名年輕的烏克蘭士兵。他在一棟共用公寓中擁有一間房（8平方米），自己即將前去頓巴斯歸隊。娜杰日達付給了他500盧布與他結婚，便可搬進他的房間。為籌得這筆錢，她母親賣掉家里最后一頭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倆一起搬了進去。娜杰日達只見過丈夫一次：

在他歸隊前一天的傍晚，我們去與他見面，付完款，就去結婚登記處，再到房管所注冊我倆[娜杰日達和母親]的居住許可。一切順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員朝我們微笑，當然心知肚明——我們鉆了空子。他們確認，所有的細節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媽媽和我終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當然，我從沒想與他一起過，他是很單純的鄉村小伙子，大字沒識幾個，過后給我們寄來一兩封信——“你好嗎？”之類的問候。他把頓巴斯（Donbass）寫成了“達巴斯”（Dobas），天哪！這樣簡單的單詞，他都不會拼。 [(285)](#_283_2)



哈內耶夫斯基家房子的平面結構圖（共用公寓），位于普列切斯坦卡大街，33/19，25號公寓

蘇維埃城市最常見的生活空間是共用公寓，好幾戶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運，會有合用的廚房、廁所、浴室（許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 [(286)](#_284_2) 20世紀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這種方式的生活，在整個斯大林時期，都是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常態。 [(287)](#_286____Jie_Xia_Lai_De_Bu_Fen_Ji) 隨著其他的轉變，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實質性變化。20世紀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決住房危機、打擊私人生活。現在，它變成了一項重要措施，可讓國家的監控進入家庭的私人空間。1928年之后，蘇維埃愈益加強其“摻沙子”政策，故意讓黨的積極分子和忠誠的工人，搬進前資產階級的家庭，以便監視。 [(288)](#_287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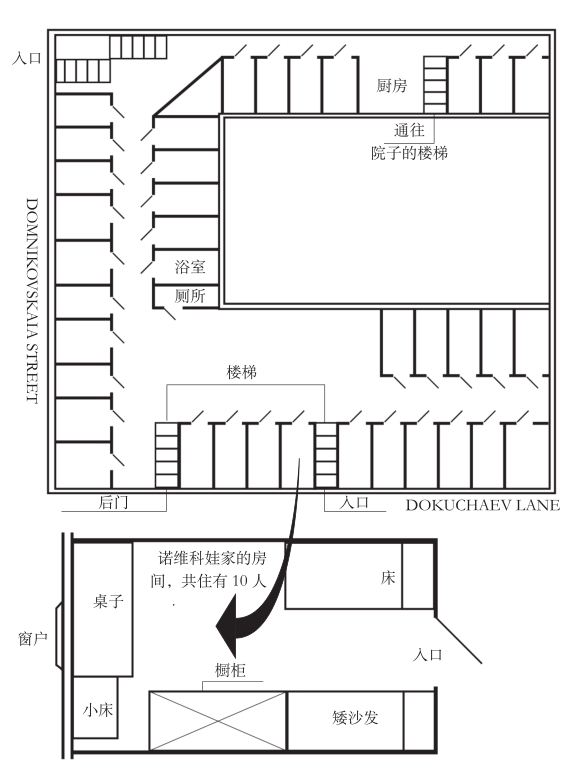
哈內耶夫斯基一家經歷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階段。阿列克謝·哈內耶夫斯基來自沃羅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來莫斯科學醫，成為一名軍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表現優異而晉升為中校，并獲得貴族頭銜。1915年，阿列克謝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適、寬敞的公寓，與妻子娜杰日達和兩個小女兒伊琳娜（1917年生）、艾萊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蘇維埃對他實施強行的“摻沙子”政策。最先搬進來的是工人瑪法·菲利娜，接著是裁縫瓦西里·卡里亞金一家，最后是老紅軍尼古拉·沙查諾夫——出身于無產階級，現已晉升為共產主義學院的教授。當沙查諾夫的第二任妻子與她母親在1936年搬來時，20世紀20年代僅住三個大人和兩個小孩的公寓，已經總共擠進了14個人。他們一起共用走廊、廚房（供兩名保姆睡）、廁所和沒水的浴室（用作儲藏室），唯一可以洗滌的地方是廚房的冷水龍頭。哈內耶夫斯基家為避開新鄰居，豎起一道門，將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開。鄰居喜歡這道門，因為他們自己的隱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區蘇維埃下令要安裝浴室——當時正在開展加強個人衛生的蘇維埃運動——于是把這道門拆下。但沒門的生活證明是麻煩多多，哈內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諾夫家老是發生爭吵。為此，阿列克謝向地區蘇維埃行賄，讓他們拆走洗浴裝置，使之變回儲藏室，再重新裝上這道門。不過，沙查諾夫家與哈內耶夫斯基家的關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狀態不正常，經常在走廊叫罵，指責別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這些沖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階級差別。娜杰日達擔心沙查諾夫家會偷她的銀器，不愿看到他們半裸著出現在走廊，還說他們的氣味難聞，要他們勤快清洗。 [(289)](#_288_2)

許多公寓舊主人認為，搬進的新鄰居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成員，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維拉·奧爾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兒搬進一個單間，女兒如此講述該公寓在20世紀30年代的惡劣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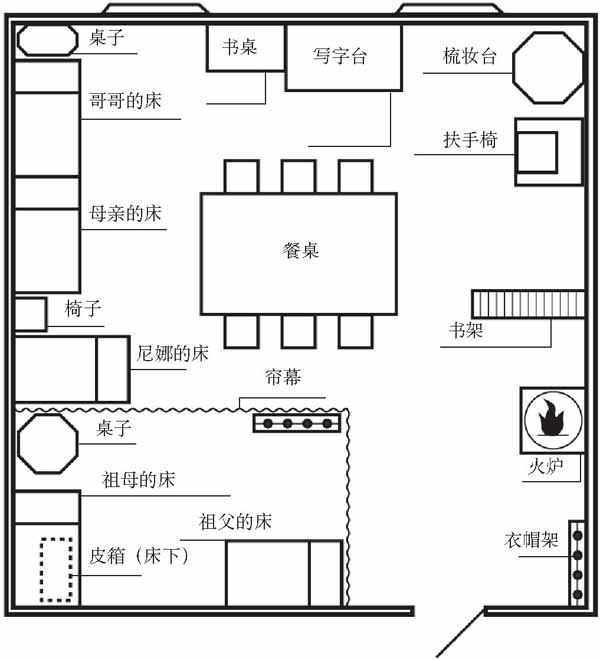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戶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塊的公共空間。母親因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價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議。他們聲稱，那些東西占了太多空間，應該搬進自己的房間，因為走廊不是母親的。這些“鄰居”計算我們待在浴室里的時間。還有些共用公寓，給廁所[電燈]裝上了定時器，以保證大家耗用相同時間的電力。 [(290)](#_288_2)

與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多數共用公寓相比，哈內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還不算人滿為患。葉夫根尼·馬姆林長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戶家庭（54人），每戶住在自己的房間，共用一個廚房，還有兩個廁所和兩個冷水龍頭，但沒有浴室。 [(291)](#_290_2) 米諾拉·諾維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長大，共有36個房間——每個房間至少住一戶人家——全由圍繞整棟樓三面的一條走廊相連。她家的房間只有12.5平方米，卻住上了10個人。“我們怎么睡覺，真是很難講清”，米諾拉回憶：

房間里有一張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歲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門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發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墊打地鋪。姐姐（當時16歲）、表妹（10歲）和我（11歲）設法擠在她們的中間——我都記不得具體方式了。我們孩子喜歡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樂趣。我無法想象成年人對此也會生出樂趣。 [(292)](#_290_2)



共用公寓及其“走廊系統”圖示，莫斯科Dokuchaev Lane，1930—1964年



莫斯科蘇維埃第三號樓中賴夫施賴德爾家的房間（38平方米）

尼娜·帕拉莫諾娃住在列寧格勒一個類似的“走廊系統”，該共用公寓占據整整一層。那棟樓房曾屬于一位德國男爵，1925年被貿易學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寧格勒鐵路管理部門擔任會計，與身為船舶設計師的丈夫一起搬入該公寓。它有17個房間，每間至少住一戶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一個淋浴間（只有冷水）。 [(293)](#_291_2)

在社會階層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蘇維埃第三號樓的政府工作人員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個“走廊系統”。斯大林的內弟費奧多爾·阿利魯耶夫，就與其母親住在那棟樓二層的一個房間。住在樓下9個房間之一的是尼涅利·賴夫施賴德爾，她父親是老布爾什維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會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親、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間。使用同一走廊的這9個房間，其居民總數是37人，共用一個大廚房。廚房內的一邊是淋浴龍頭和浴缸，藏在屏風背后；另一邊是一個廁所。在走廊的另一端，還有兩個廁所。走出院子，可見一個共用的木棚，儲有用于爐灶燒火的柴薪。該公寓當初就被當做集體生活的實驗地，但有蘇維埃精英想要的服務。它專設了兒童游樂場，在地下室還建了俱樂部和電影院。每一條走廊，都配有清潔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費用由住戶集體分擔。 [(294)](#_292_2)

共用公寓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縮影。布爾什維克相信，迫使人們分享他們的生活空間，可促使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行為上更加共產主義化。私人空間和財產會逐漸消失，家庭生活將為共產黨人的友愛和組織所取代，私人生活將受到社區的相互監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責任的分擔，由居民們自己組織安排。公共服務的賬單，如煤氣、電力、電話，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電話，每個房間內裝了多少燈泡）或房間、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維修費用也由集體支付，但經常會有爭議，其解決通常需要召開居民大會。公共空間（大廳、入口、廁所、浴室、廚房）的清潔工作，由大家輪流承擔（通常張貼在大廳里）。每個人都有洗衣的規定日期，早上排隊上廁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順序。在這個小型國度內，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則。馬姆林回憶：“我們的分配盡可能公平，父親是我們共用公寓的寓長，算起賬來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應付多少。” [(295)](#_293_2)

寓長（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職稱始于1929年。其時，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確認為一種社會機構，需要遵守具體的規則，向國家承擔責任，譬如執行衛生的法規、征收稅款、維持治安、向警方匯報居民的私人行止等。 [(296)](#_295_2) 寓長按規定應由居民選出，但事實上他們大多是自薦，再通過自己的魅力或社會地位，獲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諾娃記得，他們的寓長“非常嚴格，管起來活像一個獨裁者。我們尊重她，同時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規規矩矩做清潔工作”。 [(297)](#_295_2) 根據1933年的新法律，寓長變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長。他們與警方的聯系得以加強，全權領導公寓的清潔工。那些清潔工是臭名昭著的舉報人，平時打掃樓梯和院子、巡邏公寓的領地，晚上負責給大院鎖門、留意人們的進出。公寓管理制度通過寓長和清潔工，變成了警方監視和控制的基本單位。

到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內務人民委員會建起了一個秘密舉報人的龐大網絡，警方舉報人遍及每一個工廠、辦公室、學校。 [(298)](#_296_2) 相互監督的想法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這個國家幅員太廣，治理不易，布爾什維克政權（與沙皇政權沒有不同）還得依靠民眾的自我監管。從歷史上看，俄羅斯一直擁有強大的集體規范和集體機構，從而為這種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紀的極權政權試圖發動民眾參與警方工作，通過集體安全來控制統治下的全體人口，其中有那么一兩個得以滲透到社會的幾乎每一層次，例如東德的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蘇維埃政權60年來的成功。

在這集體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居民對鄰居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個人習慣、訪客和朋友、買了什么、吃了什么、電話（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說了什么、躲在房間里講了什么——隔墻非常薄（許多房間中間的隔墻還沒跟屋頂連接上）。在20世紀30年代的共用公寓當中，竊聽、刺探、舉報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勵，隨時提高警覺。鄰居會開門查看走廊上的訪客，或竊聽他人的電話交談。如果夫婦之間發生爭吵，他們會進來當“證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為、暴力，他們就會干預。一般認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們常說“一人闖禍，大家遭殃”。米哈伊爾·巴伊塔爾斯基記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親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鄰居特別警惕：“她一聽到開門聲，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機，記牢你的外貌。那位親戚還向我們保證，他的訪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記錄。” [(299)](#_298_2)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環境中，個人財產的爭執時有發生——放在共用廚房的食品不見了，自己房間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鬧哄哄的噪音或音樂。一位居民回憶：“氛圍很差，每個人都懷疑別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證據，只好在背后竊竊私語。” [(300)](#_299_2) 每個人都處在緊張狀態中，相互的爭執不需要很多理由，便會轉化成向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舉報。此類爭執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蘇維埃的忌妒文化應運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這種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貧原則的社會制度中，如果某人擁有更多，超過大家，一般會認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質上優越的任何標志——新服裝、更好的廚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發他人的仇恨。他們會懷疑這些物品是通過非正常關系獲得的。鄰居結成聯盟，為這些他們眼中的不平等，持續糾纏爭斗。一名女子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 [[5]](#_4_7) 她講述了自己母親與一個清潔工的妻子之間的宿仇。母親在面包店工作，那個清潔工的妻子是眾所周知的舉報人。每當廚房里出現了蛋糕或面包，清潔工的妻子就以盜竊或破壞的罪名指控她母親，還威脅說要向有關當局舉報。 [(301)](#_299_2) 米特羅凡·莫伊謝延科是個工人，他幫助列寧格勒共用公寓的鄰居修理家具和窗戶，或做些零工賺點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與鄰居發生爭吵。對方指責他的維修費太高，為此向警方報案，謊稱他在地下室工場里窩藏托洛茨基分子。隨即，米特羅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進馬加丹附近的勞改營。 [(302)](#_300_2)

廚房是許多爭吵發生之地。傍晚時分，廚房里人頭攢動，很容易頭腦發熱。廚房雖是共用空間，但在大多數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飪爐灶、用來吃飯的自家廚桌以及貯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貯存處或在櫥柜里，或在貨架上，或在內窗和外窗的中間——冬天那里的氣溫與冰箱無異。自家和共用地帶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斷的源泉，使用別人的爐灶、餐具、佐料足以激發一樁丑聞。米諾拉·諾維科娃回憶：“都不是惡毒的爭吵，我們都是窮人，沒有值得偷的東西。但空間永遠不夠，每個人在廚房里都緊張兮兮的，小爭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婦女同時做飯的場景！” [(303)](#_301_2)

缺乏隱私是緊張的最大來源。即使在自家房間內，也沒有某個人的私人空間。一個房間發揮多種功能——臥室、餐廳、客廳、孩子做功課的書房，有時甚至充當廚房。尼涅利·賴夫施賴德爾回憶：

在我們房間里，沒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沒有屬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只是將他們的床用帷幕圍起來，遮擋一點隱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邊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許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風、書柜、衣柜的后面，以避開大人和晚上的來客，稍得一點寧靜（還可避免他們看到成人脫衣上床）。父母必須等到半夜才悄無聲息地做愛。 [(304)](#_302_2)

擠在方寸之間，鄰居的生活幾乎一切盡在目前，無需想象。大家已習慣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鄰居，還會目睹鄰居的最壞行狀——醉酒時，或毫無戒備時——沒有通常為了自保在公共場合中戴上的面具。他們從門鈴的聲響獲悉鄰居來了訪客（前門電鈴給每個房間配上各自的號碼或次序）。發生最私密行為的房間（浴室、廚房、廁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從留下的證據作出推斷。廚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個人物品、夜間的如廁——可以向鄰居披露一切。在這種“公開的隱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斷接受集體的審視。 [(305)](#_304_2)

鄰居之間缺乏隱私，體現于各種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闖入——鄰居擅自進入他的房間、在浴室里老聽到敲門聲、來客總是受到監視。其他人則不滿于經常的噪音、不講衛生、老頭對女孩的好色窺視。廁所和浴室永遠是摩擦和焦慮的源頭。20世紀30年代，艾萊娜·巴伊格羅娃的列寧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個人，卻只有一個廁所。大家自帶肥皂和衛生紙，平時則留在自己的房間。1936年，有一位鄰居嫁給了一個黑人。艾萊娜回憶：“他第一次出現時就引起一場非議。人們不愿與他共用一個廁所或浴室，認為他太臟，因為他生得那么黑。” [(306)](#_304_2)

私人交談是一件頭痛事。在相鄰的房間，能清楚聽到鄰居的交談，大家因此學會了竊竊私語。人們非常小心，不與鄰居談論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內，男人們都默不作聲）。 [(307)](#_306_2) 具有資產階級或貴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隱瞞自己的出身。沙皇軍官的外孫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長大，所有的鄰居都是工人及他們的家人，即她所謂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親已經入黨，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來隱瞞自己的過去。阿利娜回憶：“如果鄰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許人，肯定會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們保持緘默，像住在墳墓里一樣。” [(308)](#_307_2) 在共用公寓中交談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在哈內耶夫斯基家，娜杰日達幾近失聰，她心存反蘇維埃的想法，卻直言不諱。她會向女兒解說，沙皇統治下的生活其實更好，越講聲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謝害怕隔壁房間的薩佐諾夫家，趕緊提醒她：“噓，請用耳語。不然我們都要去坐牢了。” [(309)](#_307_2)

人們為爭取點滴的隱私而戰斗。他們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廚房鍋罐、盤碟餐具、鹽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間；盡量在自己的房間洗滌、烹飪、進餐、晾衣。共用空間也漸漸私有化：各家都會把貨架的某層、走廊中的某處、廚桌的某角、門廊里的某個掛鉤或鞋位占為己有。這些安排鄰里之間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進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會手足無措。人們夢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間，無須面對自己的鄰居。葉夫根尼·馬姆林的女兒回憶，父親“渴望自己房間有個相連的小廚房，好讓他單獨做飯、吃飯，無須踏進共用廚房。但這僅是一個夢想”。對有條件擔負租金的人來說，夏季去鄉間別墅短住，無疑是一種解脫，可以暫時釋放共用公寓的壓力。 [(310)](#_308_2)

從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愛和打成一片的感覺。很多人以懷舊之心，回顧自己在共用公寓度過的日日夜夜，還記得那是鄰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戰爭之前，我們相處和諧”，一位居民回憶：

大家互相幫襯，沒有爭吵，在金錢上也從不吝嗇——拿到工資，很快花光。那時的日子充滿樂趣，一點也不像戰爭之后——那時，人們開始把錢留給自己，并關上自家的門。

從某種角度看，這種懷舊與幸福的童年有關。當時，盡管物資短缺，院子里干凈安全，很適宜孩子游戲，共用公寓還具有擴展了的“家庭”的氣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間的交往遠遠超過父母的。他們一起玩耍，總是在串門，所以更有這種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紀30年代在列寧格勒共用公寓長大的加林娜·馬爾克洛娃回憶：

我們生活得宛如一個大家庭。那些時日，每家都敞開著大門，孩子能在整棟房子里東跑西竄。我們在走廊玩耍，從一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同時，大人們聚在一起玩紙牌，或多米諾骨牌。他們不是賭錢，只是為了好玩，總有很多笑聲。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輪流玩，沒輪上的就站在旁邊觀戰。我們像大家庭一樣，一起慶祝蘇維埃節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獻的。過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戲和歌曲。 [(311)](#_310_2)

但過分親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紀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長大的電影導演羅蘭·貝科夫記得，當時的生活非常壓抑，泯滅了任何個性。貝科夫回憶，共用公寓中盛行“集體法則”，抗議根本沒用——只會招致“大家團結起來”，群起而攻之。葉麗薩維塔·切奇克對從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帶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嚴厲的布爾什維克。我怕他們，在他們面前會感到渾身不自在。現在回顧，我意識到我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覺，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議。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沒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這份恐懼。 [(312)](#_311_2)

共用公寓會在長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創傷。在采訪中，許多長期居民承認，非常擔憂自己的無依無靠和自生自滅。 [[6]](#_5_7) 共用公寓幾乎造就了新型的蘇維埃人格。孩子特別容易接受集體價值和習慣的影響。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對所撫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往往不堪一擊，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則所取代。米諾拉·諾維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維偏向“我們”，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沒有任何私密。我們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個樣。我已經習慣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記得參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為地質學家]，我買了糖果，與大家共享。小組長對我說：“你應該寫下花了多少錢，以便以后報銷。”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讓人震驚的念頭。從童年起，我一直是與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長大的人認為，共同生活讓他們學得蘇維埃政權的公共價值——熱愛工作、謙遜、服從、配合。但謹慎和自我意識從未遠離，一位居民回憶道：“要不斷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這種感覺不同于我所經歷的鎮壓、逮捕、監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卻更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識，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卻是內心自由和個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進廚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審視，就會感到這種窒息，就要啟動自我控制。成為真正的自己，那是絕不可能的。 [(313)](#_312_2)

三

蘇維埃公民很快開始奮起抗議物品的短缺和不公平。數以千計的人寫信給政府，抱怨腐敗和低效，并將之歸罪于新官僚的特權。然而，同時又有許多公民在忍辱負重，期望自己能親眼看到共產主義烏托邦。這一想法在20世紀30年代，幫助維持了蘇維埃政權。數百萬人被說服，為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眼前的日常艱辛是必要的犧牲。今天的勤勞將得到明天的回報，到那時，大家都可享受蘇維埃的“美好生活”。

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29年）中提到，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傾向于認為，在通向真實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經歷“一系列戰略階段”。這個未來既是當前的考慮因素，又規定了歷史進程，從而將特殊意義賦予日常生活。蘇聯有關階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烏托邦預測；對布爾什維克來說，1917年10月在人類歷史上開創了新紀元（猶如1789年標志了雅各賓派創建的新世界）。蘇維埃的宣傳立足于當下，投射到未來，描繪出革命運動不斷向前，最終抵達共產主義烏托邦（歷史的進軍）。它歡呼五年計劃取得的成就便是實證：這個烏托邦已隱現于地平線之上。 [(314)](#_312_2)

五年計劃在這個烏托邦規劃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計劃的構想是，加快整個經濟的步伐，爭取社會主義的早日到來（因此有“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事實上，該計劃是在征服時間本身，使之服從于無產階級的意志。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按嚴格且合理的時間分配來安排各項工作。但在蘇聯，工作安排必須遵照五年計劃的目標，完成目標總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擊”生產、作出短暫而瘋狂的努力，實現目標后再作休整，這種做法便不無道理。斯大林主義的經濟，以這種“突擊”生產為基礎來完成五年計劃。眼前的艱辛將在共產主義烏托邦中獲得回報，又成了整個制度的思想基礎。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行政官員，后來升至黨的高位。他回憶道：“我們蘇維埃人自覺地禁絕享受。”

我們對自己說：“今天，沒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們明天就會有。”我們堅信黨的事業，這就是力量！我這一代的年輕人，為這種信念而感到幸福。 [(315)](#_314_2)

回首20世紀30年代，很多人還記得，他們當初活著是為了未來，而不是眼前。在1917年之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當中——像帕托利切夫一樣的年輕人，全身心沉浸于蘇維埃政權的價值和理想——這種感覺特別強烈。對于這一代而言，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實實在在、指日可待的現實。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蘇維埃學生的想象中，共產主義即是當前現實的轉化（高產奶牛和忙碌的工廠），絕不是遙遠的科幻想象。 [(316)](#_314_2) 他們如此看待蘇維埃的未來，緣于從小接受的蘇維埃宣傳，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根據1934年作家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官方定義是“在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具體地去描寫現實”。而藝術家的功能是描繪出一個新世界，不是它目前的形態，而是它在共產主義未來（正在變成的）的樣子。

根據柳德米拉·埃利亞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馬克斯娜（1923年生）所說，這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概念，在她們列寧格勒學校的朋友中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我們接受教育，期待一個幸福的未來。我記得，妹妹摔破了我們最心愛的瓷娃娃。我們沒有錢，但仍去了百貨商店，櫥窗里有瓷娃娃在陳列。馬克斯娜說：“共產主義來臨時，我們就能得到這個瓷娃娃了。”在我們的想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屆時，什么都是免費的，大家都會過上最幸福的生活。我們很高興，都在等待這個美好未來的降臨。 [(317)](#_316_2)

20世紀30年代，賴莎·奧爾洛娃在莫斯科長大。她回憶起當年“飛速奔向未來”的感受，反而視當時的實際情形為幻象：

我有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在這幾堵舊墻中的生存[她長大的地方，即莫斯科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公寓]，只是在為即將到臨的真實生活做準備。新生活將在一棟閃閃發光的白色新房里開始，我會在清晨起來做早操，理想的秩序將統治一切，我所有的英雄業績也將開始。我同代人中的大多數——不管當時住在哪里，帳篷、地棚、共用公寓或是被視為豪華的私人公寓——都持有這種臨時、馬虎的生活態度。快點，再快點，朝著宏偉的目標，邁向新的生活。一切都能夠且應該改變：街道、房屋、城市、社會秩序、人類靈魂。這似乎并不困難。首先，積極分子在紙上勾勒出藍圖；再推倒舊的（不打破雞蛋是無法煎蛋的），清除瓦礫；然后在清理出的空地上建起社會主義的美夢。俄羅斯就是如此重建的。我們認為，也可以照樣重塑新人。 [(318)](#_316_2)

莫斯科是這個烏托邦的建設工地。在共產黨人的想象中，“即將”和“現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作為一個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義。這個城市充滿了動人心弦的美夢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來的住宅區，教堂的拆除標志了文化宮的聳立。德國共產黨人沃爾夫岡·萊昂哈德在1935年與父母一起抵達莫斯科，他描述了他們使用地圖時遇上的困惑：他們手上1924年的地圖已經過時，但新地圖標出的總體規劃的新建筑，實際上要到1945年方能竣工。萊昂哈德寫道：“我們出去散步，只好帶上兩張地圖，一張是10年前的莫斯科，另一張是10年后的莫斯科。” [(319)](#_317_2)

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蘇聯的變化速度令人陶醉。正在創建一個新世界的錯覺，導致許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對斯大林政權產生幻想。年輕的法律系學生尼娜·卡明斯卡婭，在父親被蘇維埃銀行開除、黑暗現實的證據不斷涌現時，依舊相信這個新世界。她在回憶錄中記下一首歡樂的歌曲——有關將臨的幸福生活，她和朋友們至今依然會唱。這首歌曲象征了她們那一代的樂觀，以及對父母輩正在經歷的悲劇的漠視：

信任在我們國家是多么容易，

呼吸在我們國家是多么自在：

我們光榮、心愛的蘇維埃大地……

我們蘇維埃生活是如此精彩

未來的孩子

夜晚可能會在床上哭泣

因為沒能出生在我們這一代。 [(320)](#_319_2)

許多蘇聯知識分子也受到這種樂觀氣氛的席卷，對斯大林政權以進步的名義所犯下的恐怖行徑，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在1935年4月寫信給奧莉加·福雷登貝格說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對正在開展的活動信得越深，這便是事實。雖然很多行為給人野蠻的印象，[但]人們從未如此高瞻遠矚，如此富有自尊，懷揣如此良好的動機，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回憶，她和丈夫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有時也懷抱同樣的想法。他們曾一度擔心，如果“未能關注眼前發生的大事”，革命會把他們拋棄。奧西普1934年向朋友朗讀有關斯大林的鼓動性詩篇（《謀殺犯和農民殺手》），隨即被捕。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觀察，相信在共產主義烏托邦名義下的所作所為，要比丈夫的堅持面對現實容易得多：“你不可能以將來的磚瓦，建造今日的大廈。但明白這一道理的人，事先一定抱了注定一死的心態，隨時準備面對行刑隊。” [(321)](#_319_2)

接受這種對未來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態，使自己能夠順利滑向與政權的合作。這意味著接受“黨是真理源泉”的說法。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信念涉及不間斷的思想斗爭：一邊是觀察現實得來的真理，另一邊是黨的更高層次的革命真理。他們被迫生活在這兩種真理中間的夾縫地帶——既承認蘇維埃體制的失敗，又相信未來的美好生活——他們只有通過政治信仰的自覺行為，才能做到這一點。年輕黨員列夫·科佩列夫，曾在1932至1933年參與向“富農”施暴，他回想起當年如何努力讓自己的道德判斷（他稱之為“主觀真理”）從屬于黨的崇高道德目標（“客觀真理”）。科佩列夫和同伴被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嚇壞了，但仍在遵循黨的路線。如果要作撤退，理由又是他們從小學會鄙視的“良心、榮譽、人道主義”，即所謂的“資產階級”理想，這會使他們陷入恐懼。科佩列夫回憶道：“我們最害怕的，是喪失自信、放棄我們神圣的信念、陷入疑惑或異端邪說。” [(322)](#_321____The_Correspondence_of_Bo)

沃爾夫岡·萊昂哈德也感受到了雙重的現實。他加入共青團時，“已意識到現實中的蘇聯，完全不同于《真理報》所描繪的”。母親在1937年被捕，朋友和老師也被帶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兒院。如他所說，西方讀者讀到他加入共青團時的喜悅，可能會覺得詫異。

不知怎的，我把這些事件乃至自己的印象和經驗，與我的基本政治信念決然分開，仿佛分屬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層關于日常的事件和經歷，我持批評態度；第二層關于黨的偉大路線，即使有猶豫，我當時出于那套大道理，仍認為是正確的。 [(323)](#_321_2)

甚至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時期，仍有許多堅持信仰的人。他們以抽象的準則（“砍伐森林時，木屑肯定會四處飛濺”；或者，“不打破雞蛋是無法煎蛋的”），為大規模逮捕作出辯護。

相信“向共產主義的進軍”，需要接受相關的生命成本。黨告訴追隨者，他們正在國內外與“資本主義元素”進行殊死的斗爭，直到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最終勝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這場斗爭的關鍵轉折點。據稱，它還進一步證實了斯大林理論的正確。斯大林認為，蘇聯越接近共產主義，敵人的反抗就會越強烈。黨改持更為強硬的立場，迫使懷疑者拋開疑慮，加入反法西斯的斗爭（不然就會被譴責為法西斯的走狗）。從1933年起，黨內清洗愈演愈烈，仔細審查個人行為，以清除消極的黨員和“隱藏的敵人”。有的社會階層被整體定為“敵人”和“異己分子”，列寧格勒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殘余首當其沖，其中數千人在1934年12月黨的領導人謝爾蓋·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資本主義舊社會的余孽”（前“富農”、小商販、吉普賽人、妓女、罪犯、流浪漢、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建設的障礙而遭到清洗。從1932到1936年，數萬名此類“社會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圍捕和驅逐出境， [(324)](#_322_2) 其中大多數被送去古拉格。

四

1933年8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改營指揮官謝苗·菲林，安排120名蘇聯主要作家“組隊”前去考察白海運河。運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會議，會址是高爾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幾位著名作家與幾位政治局委員一起開會討論文學任務，斯大林也在場。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學說的最早闡述之一，高爾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學來匹配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將蘇聯作家比作“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斯大林，提議以這一運河之旅激發作家的創作靈感，一切均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安排。作家亞歷山大·阿夫杰延科不無諷刺地說：“一旦成為契卡的客人，馬上進入共產主義。我們有求必應，吃喝全包，一切免費。熏香腸、奶酪、魚子醬、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蘭地——供應充沛。要知道，這還是饑荒的年代。” [(325)](#_324_2)

作家們先住進列寧格勒的阿斯多里亞豪華酒店，再坐火車去白海運河，考察大壩和升降臺，參觀文化中心，觀賞囚犯的文藝演出。他們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勞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談。對許多作家來說，他們看到的只是營房生活的凈化版。塔瑪拉·伊萬諾娃在1989年回憶：“在我看來，這很明顯，只讓我們觀看‘波將金村’ [[7]](#_6_7) 。”但是就算作家們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達出來。旅途當中，作家們有機會詢問充當向導的菲林。據阿夫杰延科稱，唯一詢問強制勞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爾斯基——他曾是王子，內戰時期參加白軍，后來移民去英國，在那里加入共產黨，1932年重返蘇聯，因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羅斯“將在世界歷史中發揮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爾斯基的追問使其他作家感到尷尬。他顯然對運河建設的保密滿腹狐疑，并告訴阿夫杰延科：“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壩、每一個升降臺，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場所的地下的尸體。米爾斯基即使生疑，仍參與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負責的一個圖書出版任務，以慶祝運河的竣工。36名蘇聯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爾·左琴科、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瓦倫丁·卡塔耶夫）和藝術家亞歷山大·羅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擊創作、匯編成了《白海運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書，而菲林和高爾基則擔任了此書的主編。這本書成了“蘇維埃作家準備為布爾什維克事業服務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發給蘇共十七大代表。它雖是建設運河的歷史，但其主題和宣傳意義在于：體力勞動具有救贖和解放的功能。據稱，罪犯和“富農”通過參與這一偉大的集體工程，“開始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經過勞役，他們脫胎換骨，變成了社會主義者。 [(326)](#_324_2)

參與這種使古拉格合法化的舉措，作家們自有不同的原因。毫無疑問，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過勞役來改造人們的靈魂。左琴科為《白海運河》寫了一個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羅登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過運河工地上的勞役而改邪歸正。他在給《列寧格勒文學》（Literary Leningrad）寫的文章中解釋，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實依據：

以懶惰、欺騙、偷竊、謀殺為生的人群，我一直饒有興趣。我也一直關注他們的再教育。說老實話，一開始，我很表懷疑。猜想這個著名的“重新做人”，只是囚犯冀望獲得自由或獎金的偽裝。但我必須說，我錯了。我這次[白海運河之旅]看到了真正的“重新做人”，看到了建筑工人身上的真正自豪，看到了許多同志（他們現在的稱號）心理上的確鑿變化。 [(327)](#_326_2)

高爾基也是一名信徒。他從未到過白海運河，但并不妨礙他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負責的那本書贊不絕口（茫然不知也阻擋不了外國社會主義者的贊揚，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麗斯·韋伯夫婦。他們在1935年稱之為“一項偉大的工程壯舉……一次人類再生的勝利”）。高爾基的20世紀20年代是在西方度過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蘇聯，之后又有數次在夏季回國，直到1931年開始永久定居。這位“偉大的蘇聯作家”獲得交口稱贊，莫斯科著名的里亞布申斯基豪宅配給他作住所，另外還有兩座寬敞的鄉間別墅、仆人（其實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間諜）和警察部門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這同一警察部門。因此，也許這并不奇怪，高爾基看不到五年計劃“偉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犧牲。1929年夏天，高爾基在他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向導的引領下，參觀了索洛韋茨基勞改營，所看到的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寫了一篇文章，聲稱許多囚犯通過勞動得到了改造，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刑期滿了之后仍想留在島上。高爾基寫道：“對我來說，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更多像索洛韋茨基那樣的勞改營。” [(328)](#_326_2)

另有一些作家出于好奇而參加了這個運河之旅，如米爾斯基。還有人擔心，如果拒絕參與這一項目，可能會遭到報復，如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文學理論家兼小說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他哥哥也被關在勞改營），雖沒有參加集體運河之旅，但是自己單獨去了。他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組織撰寫的那本書以及他的其他幾部作品中，拔高了“重新做人”的理念。他甚至還寫了關于白海運河的宣傳影片的劇本。什克洛夫斯基的寫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運河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位官員問他的感覺如何，他反諷道：“就像一只鮮活的銀狐，走進了皮草店。”）在他女兒看來，這只是他“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價”。他哥哥1933年獲釋，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遠消失于古拉格。 [(329)](#_328_2)

追求職業發展的動機也在發揮作用，阿夫杰延科就肯定與此有關。他出身于無產階級，參加運河之旅時仍是一個無名小卒。兩年后的1935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在蘇聯媒體中獲得贊譽。阿夫杰延科后來承認：“此行幫助我攀上頂端，我的生活從此騰飛。我曾是一名工人突擊手，投身于文學！一下子，我在蘇維埃神廟中躋身享有盛譽的作家行列。”阿夫杰延科經常向《重新做人》投稿——那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部的白海運河勞改營雜志——稱贊勞役是重新做人的好途徑。 [(330)](#_328_2)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是另一位借助白海運河而一舉成名的“無產階級作家”。1933年，他在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充任技師——是鮑里斯·巴別茨基手下數百名技師之一。午休時間，西蒙諾夫和其他技師去看普多夫金和戈洛夫尼亞一起拍攝的電影《逃兵》（他聲稱這一經驗激活了他對藝術的興趣）。西蒙諾夫回憶：“那些年里，我沒接受過正規的教育，但讀了很多書，尤其是歷史書籍。我還嘗試寫作，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白海運河的宣傳啟發了西蒙諾夫，他在筆記本里寫下不少關于勞役者重新做人的“歪詩”，不知何故竟引起了國家出版社（Goslitizdat）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注意。這些詩篇中的精粹《白海運河》，被收入1933年蘇聯青年作家的詩歌集。1934年4月，西蒙諾夫借這一次成功的東風，向國家出版社申請許可，讓他訪問運河，收集勞役者重新做人的原材料，以創作贊頌勞改營的詩歌集。國家出版社予以批準，并支付他一個月的花費，在白海運河的梅德韋熱戈爾斯克勞改營，擔任《重新做人》雜志的記者。囚犯們與他同住一個營房，并不把這位年僅19歲的詩人當做一回事（“當我告訴他們，我在寫關于白海運河的詩，他們只是笑笑”）。出于這個原因，在西蒙諾夫看來，囚犯們“與我的關系還算自然”。 [(331)](#_329_2)

到1934年的初夏，白海運河的建設已大體完成。西蒙諾夫所觀察的勞役者只是在修建道路和相關設施——與1931至1933年挖掘主渠、數萬人累死的體力勞動相比，僅屬相對輕松的任務。隨著工程的結束，勞改營行政部門向勞役者頒發獎金、榮譽、獎牌，并向部分輕罪囚犯宣布提前釋放的命令。這些獎勵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兌現“重新做人”的神話，讓囚犯努力工作以改造自己（至少給人以改造成功的印象），爭取獲釋或物質上的好處。西蒙諾夫年少天真，易于輕信。他在回憶錄中回憶，從白海運河回來，“就準備暢寫通過勞動重新做人的新詩”：

雖然待的時間不長，但我相信，親眼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實際發生——如我所相信的——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除了勞動，還有什么可以救贖個人罪孽呢？

西蒙諾夫聽到有關一名工程師的故事，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該工程師與臨時政府有密切的聯系（實際上是冬宮最后一位指揮官）——

根據第58條規定，他就算沒被判上10年，至少也判個8年。他在白海運河擔任工程師，工作非常努力，因此服刑3年就獲釋。然后，他自愿擔任莫斯科―伏爾加運河某建筑工地的首席工程師。我在旅途當中獲得的印象，也佐證了這樣的故事。 [[8]](#_7_7)

事實上，確有某些專家獲釋后愿意繼續在古拉格系統中工作，但很少是改造的結果。但西蒙諾夫認為，他在白海運河所看到的，符合他所聽說的以及在蘇聯媒體中讀到的。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表示：“在我看來，白海運河工程不只是在建造一條運河，而是一座人道主義學校，使壞人變成好人，使普通罪犯變成五年計劃的建設者。” [(332)](#_331_2)

就西蒙諾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貴族，自覺參與重建自己的身份，希望變成“無產階級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頗能激起他特別的共鳴。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講述了自己的感受，“富農和資產階級破壞者”的重新做人，“對整個社會來說大有希望”，他自己也大受激勵，因為它顯示了“埋葬過去、走上新路的可行”。1934年，在蘇共十七大（勝利者的代表大會）上，前反對派獲得重新做人的機會。在他眼中，這也是一大鼓舞。作為一名青年作家，他正在黨嚴密監控的藝術領域努力開創自己的事業。在這次大會上，一直反對斯大林極端政策的黨領導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亞特科夫等）被允許發言，他們收回了自己的舊有立場，以黨內團結的名義，對斯大林歌功頌德。從他們被接受的方式來看，黨領導已讓他們改過自新。西蒙諾夫看到如此的榜樣，心里感到非常舒坦。在他看來，接受悔改的反對派就是一個證明，像他那樣的人，即使有不光彩的過去，也會得到黨的寬恕。西蒙諾夫明白，自己的重新做人將取決于自己政治人格的重建。他像前反對派一樣，必須背棄過去，表明自己是個當之無愧的共產主義者。他有關白海運河的著作，就是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從運河回來之后，西蒙諾夫第二次申請加入共青團。上一次，由于繼父在1931年被捕，他被要求自行撤回申請。這一次，他是應邀申請的，在他眼中，接受他入團真是“一大寬慰”。他在回憶錄中記錄，1934年是他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一年：

我不能代表同齡的其他人，但對我來說，1934年是我青年時期最充滿希望的一年。一般認為，國家已經度過困難時期，雖然仍有問題，但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生活都將變得更加容易。我很高興能參與建設這一個新生活……在我眼中，斯大林的正確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正在領導我國的工業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我看來，他與對手爭辯，指出他們的錯誤，這都是正確的態度。 [(333)](#_331_2)



西蒙諾夫，1936年

1934年夏天，西蒙諾夫從白海運河回來不久就寫了《地平線》一詩，描述刑事犯在勞改營的重新做人。這首詩受到大刀闊斧的編改——編改者來自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所屬的文化教育廳，他們認為這首詩非常糟糕（自命不凡、笨拙、喧鬧、機械、傷感），但仍有宣傳價值，值得發表。 [(334)](#_332_2) 西蒙諾夫將之收回重寫，到1938年易名為《帕維爾·丘爾尼》（Pavel Chyorhy）予以發表。后來，西蒙諾夫看到這首詩會有“恐怖的感受”，堅持將之排斥在他的“作品全集”之外。 [(335)](#_333_2) 但這首詩對他的職業生涯大有裨益，顯示他有能力創作有助于斯大林政權的詩歌。西蒙諾夫受到鼓勵，申請就讀高爾基文學院。他在國家出版社和政治保衛總局文化教育廳的政治擔保人，還愿意為他推薦。 [(336)](#_334_2)

高爾基文學院成立于1933年，坐落在特維爾大街上的前赫爾岑宮殿，旨在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作家（直到1936年，仍被稱為“工人夜間文學大學”）。上課是在晚上，這就允許西蒙諾夫在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繼續上班掙錢，作為他200盧布助學金的補充。文學院的大多數學生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出身，他們像西蒙諾夫一樣，出生于貴族或資產階級家庭，先讀工廠技校，或在工廠上班，以此取得入學資格。學生中一半是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來自27個不同民族，可算是一個世界大雜燴。 [(337)](#_335_2) 在眾多的猶太學生中，有兩名年輕女子先后嫁給了西蒙諾夫：納塔利婭·季波特是劇院名人之女，1935年與西蒙諾夫結婚；遭殃的新經濟政策人塞繆爾·拉斯金的小女兒熱尼婭·拉斯金娜1936年入學，1939年與西蒙諾夫結婚。

西蒙諾夫承認，自己并不特別鐘愛文學，只是由于他的出身欠佳，才變成了他的職業。他告訴納塔利婭：“如果不是因為貴族出身，我才不會對文學發生興趣，我真正喜歡的是政治和歷史。” [(338)](#_336_2) 他在文學院中不是最有才華的（1936年，他在優秀學生名單上排名第七，排在榜首的是詩人瑪格麗塔·奧列格），但以自覺出名，并且組織有方（他精心安排花在工作、閱讀乃至社交上的時間），準時完成任務。同學給他的綽號是“鐵屁股”，因為他學習非常努力，持之以恒。詩人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優秀學生名單上排名第二）回憶道：“他就坐在那里，寫個不停。”奧列格記得，西蒙諾夫一開始就像個干部，通常穿皮夾克，像內戰中的布爾什維克；或穿夾克和襯衫，還系上領帶。對文學院其他學生的波希米亞文化，西蒙諾夫保持一定的距離，他的業余時間都花在共青團活動上，或撰寫書評，而不是用來玩臺球。理所當然，文學院的行政部門對他非常重視，把他當做黨的忠實信徒，給他布置了許多任務（1937年，他在揭發文學院“反蘇維埃分子”的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蒙諾夫既嚴肅，又挑剔，與其說像一位年輕詩人，毋寧說像一名文化官僚。他在1945年回憶：

我沒有寫出自己的作品，卻寫了不少對其他人作品的評論。我非常苛刻、急躁。這顯示，寫出最粗暴、最負面的評論的人，往往是尚沒寫出或無法寫出這樣一本書的人。 [(339)](#_337_2)

西蒙諾夫是文學院的詩人，正在摸索如何寫作才能取悅于自己的政治上級。重新做人的主題，在20世紀30年代已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的常客，重復出現于他有關白海運河的早期詩歌。但五年計劃的希望，以及體現于西班牙內戰的英勇斗爭，漸漸在他的詩歌中占據顯著的地位。同時，西蒙諾夫深受詩歌老師弗拉基米爾·盧戈夫斯科伊（1901—1957）的影響。在文學院年輕詩人的眼中，盧戈夫斯科伊頗有魅力。他的房間里擺滿了刀槍，還有來自內戰和1931年征伐巴斯瑪奇穆斯林起義的紀念品。在《將軍》那樣的詩篇中，西蒙諾夫嘗試探索陽剛、英勇的主題。匈牙利共產主義者馬特·扎爾卡（又叫魯卡契將軍），在西班牙內戰中遇難，賦予了《將軍》一詩靈感。西蒙諾夫的基本價值觀來自繼父的軍人精神，在他看來，像扎爾卡那樣的勇敢和自我犧牲，在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進行殊死斗爭的世界中，不但是“人類的美妙素質”，而且是“必需的第一美德”。西蒙諾夫1960年向外國記者解釋：“任何人，如果想象我們未來的勝利輕而易舉，無須流血，從而流露出沾沾自滿，都會受到我們20世紀30年代年輕共產主義者的強烈憎恨。”那是沉浸在斗爭觀念中的一代——隨時準備投入戰爭的一代。1973年，西蒙諾夫回顧自己的學生時代，為整個時代發言：

開設文學院的同一年，納粹上了臺。我們的學習年代一直籠罩在陰影之中，那就是即將發生的反法西斯戰爭。那些年頭，在考慮文學和自己的前途時，一定會自然想到，我們遲早會被迫參加這一場隱隱逼近的反法西斯大戰——尚未確定的只是手中握的是筆還是槍。

1936年1月1日，西蒙諾夫的第一首詩《新年祝酒》發表于《消息報》（Izvestiia）。這是青年詩人——當時只有20歲——將獲黨領導青睞的先兆。在詩中，西蒙諾夫想象一場光明與黑暗的最終搏斗：

朋友，我們今天提高警惕！

豺狼正在將共和國圍困！

我們就此舉起酒杯，

在默默祈愿中痛飲

為站在機槍旁邊的人，

為只與步槍為友的人，

為懂得“戰斗”這一動詞的人，

一個悲哀的動詞，必須承認。

為能夠離開緘默房間

走進未知的大火的人…… [(340)](#_339____RGALI__f__632__op__1__d)

西蒙諾夫為職業生涯拼搏之時，他的三位奧博連斯基姨媽正在奧倫堡的流放地凋零。那是一個地處伏爾加草原東部的城市，在莫斯科的東南方，相距1500公里。她們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大規模鎮壓中，被逐出列寧格勒。西蒙諾夫喜歡三位姨媽，從小就定期給她們寫信。他母親的大姐柳德米拉，嫁給來自俄化家庭的德裔炮兵隊長馬克西米·泰德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留下柳德米拉和三個孩子，困守于炮兵團駐地梁贊。柳德米拉1922年回到彼得格勒，曾在殘疾兒童學校擔任教師。她1935年被捕時，三個孩子已經長大，兩個跟她去了奧倫堡，長子留在列寧格勒——他在紅三角廠擔任經理，受到上級的高度重視，得以讓自己免受逮捕的噩運。中間的姨媽是達麗婭，又叫“桃莉”，嚴重殘疾，身體左側畸形，部分癱瘓，使她走路頗不方便。個人的不幸，使她養成了古怪脾氣，終身未嫁。她在宗教上很虔誠，幾近教條，并不隱瞞自己對蘇維埃政權的仇恨，堅持貴族的傳統。1927年，桃莉到梁贊拜訪亞歷山德拉，兩人在宗教事項上不斷發生爭執，西蒙諾夫因此而變成了無神論者（不過，他后來給姨媽寫信，仍表達宗教上的情感）。西蒙諾夫在列寧格勒時，曾多次拜訪桃莉，但他認為自己只是在盡職。他更喜歡小姨媽索尼婭，經常與她同住。索尼婭長得豐滿，西蒙諾夫記得她“圓臉，笑得慈祥”，充分體現了“她的善良和開朗”。與桃莉不同，索尼婭盡量適應蘇維埃制度，盡管她的舉止、價值觀、信仰，仍保有19世紀貴族文化的痕跡。她當初讀的是師范學校，卻當上圖書館員，在共用公寓里獨住一間大房。她對自己的命運既不訴苦，也不抱怨。恰恰相反，西蒙諾夫記得，她是三位姨媽中最具活力、最有意思的。由于沒有自己的孩子，她喜歡外甥和外甥女來與自己同住。她對康斯坦丁最為疼愛，因為他是她最年輕的外甥，他的讀書熱情也是她幫助培養的。她寫信給西蒙諾夫：“我親愛的寶貝基柳雄切克，我希望你長大后，成為我們的依靠和安慰，我們都非常愛你。我希望你永遠有足夠的食物，就像我們從前的歲月。” [(341)](#_340_2)

西蒙諾夫最后一次看到索尼婭是在1933年秋天。他寄宿于她在列寧格勒的住所，在她房間里寫下了他一生最初的幾首詩。1935年2月，索尼婭、柳德米拉、桃莉被流放到奧倫堡。西蒙諾夫的母親在莫斯科獲悉“三姐妹和從小在圣彼得堡就認識的許多人，都被送去流放地”，西蒙諾夫回憶她當時的反應：

她坐在那里，手捧信件[她剛收到，來自奧倫堡的]，眼淚嘩嘩流下。她突然說：“如果我當時與柳利婭[柳德米拉]一起從梁贊回到彼得格勒，現在我自然與她們一同受苦了。”我記得，她說話的方式使我震驚。她講到，自己沒與姐妹同住一個城市，所以逃脫了姐妹正在承受的厄運，語氣中滿含內疚。然后，她問繼父：“也許，我們會被從這里送去流放地？”她說的“我們”，不是指我們一家，而是指她自己、她的出身，以及整個奧博連斯基家族。 [(342)](#_340_2)

西蒙諾夫并沒解釋他為何感到震驚。也許，他驚訝于母親的內疚，但還有其他原因。西蒙諾夫從小就把自己看作“蘇維埃人”，繼父的被捕絲毫沒有動搖他的信念。恰恰相反，反而增強了他為自己塑立無產階級身份的決心。他努力改造自己，先成為一名工程師，再充當一名“無產階級作家”，更加強了他對蘇維埃制度的認同。但母親對姨媽被捕的反應——似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他聽到她以蘇維埃的語言把自己稱作“異己分子”——迫使他面對現實。

西蒙諾夫的母親和繼父，每月向奧倫堡郵寄食品和衣服，他也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來作資助。1936年，亞歷山德拉前去看望她的三個姐妹。西蒙諾夫回憶，她很害怕，擔心去了再也回不來（許多人擔心，如果看望流放的親屬，自己也會被捕）。總是很現實的繼父認為最好還是別去，如果去了被捕，就更難向她們施以援手了。但亞歷山德拉堅持要去，并宣稱“如果不去，就不算是真正的自己了”。亞歷山德拉從奧倫堡回來，西蒙諾夫記得：“漫長的旅途和當地可怕的情景，使她筋疲力盡、悲涼凄楚、身心交瘁。但她并沒有放棄希望……因為她認為，不會有更壞的遭遇了。” [(343)](#_341_2)

然而，更壞的事還是發生了。1937年，索尼婭和桃莉在奧倫堡遭到囚禁，索尼婭被槍決，桃莉后來死在勞改營，存活的只剩柳德米拉一人。西蒙諾夫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回顧這些事件，還憶起自己對最喜愛的姨媽之死的反應：

我發現，她已被關押，之后就杳無音信。然后，他們告訴我們，她已死去——但不講明死于何處和如何死去。我記得，當時之所以感到這種強烈且痛苦的不公，全與她[索尼婭]有關，或主要與她有關。這一感覺永遠伴隨我的靈魂——我不怕這樣說出——這是國家和蘇維埃政權對我本人的嚴重不公，它將永遠留存于我的記憶之中。這一感覺讓人特別痛苦，因為我知道，如果索尼婭還活著，一旦我能有所作為，第一個想幫的就是她。

西蒙諾夫的遺憾是基于他以后獲得的認知——他一直在與摧殘自己姨媽的迫害制度攜手合作。他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初獲悉她們被捕時的反應是不同的。他為姨媽感到惋惜，但設法找出理由，使她們的遭遇變得合理，甚至合法：

我已不記得當時[1937年]的想法，不記得如何判斷和自我說服的……但我知道，我不可能無動于衷，因為我非常熱愛其中的一位[索尼婭]……也許我心想：“不磕破雞蛋是無法煎蛋的。”與當初的感覺相比，這一托詞在今天聽來，更具諷刺意味。其時，大革命和打破舊社會，仍縈繞在人們的心頭；大家交談時，不用這一熟語的人猶如鳳毛麟角。 [(344)](#_342____Simonov__Glazami__pp__46)

與白海運河的際遇，讓西蒙諾夫更靠近政權；但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卻產生了決然相反的效果。曾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伊利亞·斯拉溫是一名重要的法學家，任職于莫斯科的蘇維埃法學院。1929年，他被調到列寧格勒，以援建那里的共產主義學院法律系。在同年的清洗中，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被關閉，它的“資產階級”學者被開除，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學院法律系。它亟需值得信賴的如斯拉溫那樣的布爾什維克，以對抗蘇維埃法律界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后者在列寧格勒仍頗有影響。 [(345)](#_343____Ibid___pp__48_9) 斯拉溫已成為蘇維埃法律領域的領軍人物，除了擔任司法委員會的顧問，還參與編纂了1926年的《蘇維埃刑法》，那是1917年刑法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在列寧格勒，斯拉溫家與另外一家分享一套大公寓，他家占了兩間房（在莫斯科，他們的共用公寓有15戶人家）。后來，他們又搬進一套三室公寓，位于列寧格勒的蘇維埃大樓，那里住有很多政府行政官員、科學家、藝術家。伊利亞的女兒依達回憶：

相對來說，我們享有特權。兄嫂有自己的房間，父母也有自己的房間。同時，父親又在自己房間內工作。我睡在餐廳，如有客人，就先去父母房間睡覺，等父母要上床了，再把我搬回餐廳的沙發床……但是，沒有一絲一毫的奢華——絕對是斯巴達和幾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遵循父親的社會主義理想……我們與窮苦的朋友和親戚分享額外的配給食品——父親對此感到羞愧……書籍是我們唯一的奢侈品。 [(346)](#_344_2)



1931年，列寧格勒共產主義學院法律系師生合影（滿頭白發的斯拉溫坐在第二排左邊第一位）

斯拉溫受共產主義學院的委托，寫書攻擊蘇維埃主要法學家的“資產階級傾向”，從而為政治上司提供自己的貢獻。1931年，蘇維埃政權對法律學術界發起清洗運動。斯拉溫所寫的《對蘇維埃刑法戰線的破壞》（Sabotage on the Front of Soviet Criminal Law），只是其中一部分，篇幅雖短，卻很惡毒。他選出幾名重要的學者律師，將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章與其在1917年之前的相互比較、逐一對照，以揭露他聲稱的確鑿的“資產階級”觀點。斯拉溫在政治上堅信舊法律思維必須被鏟除，所以譴責這些法學家正企圖顛覆蘇維埃法制的基本原則。他挑出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批評它一直在訓練“昨日的神父和白軍衛士”，卻假扮成“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明日的共產主義者”。受到斯拉溫攻擊的幾名法學家，隨即離開他們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學教職，被迫奔赴外省，尋找工作。 [(347)](#_345_2)

斯拉溫家庭檔案中有一張伊利亞·斯拉溫的照片，時間在1931年，他的周圍都是共產主義學院的同事和學生，照片背面寫著：“斯拉溫同志！深切懷念你——布爾什維克衛隊的堅定共產黨人、我們的老師、思想戰線上的堅強斗士、橫掃學術界寄生蟲的鐵掃帚。”在依達的記憶中，父親卻是一名柔和溫情的男子。這兩個形象，確實很難調和在一起。也許，斯拉溫太軟弱，無法抗拒黨的要求，被吸進了這個迫害制度。也許，他覺得曾卷入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易受攻擊，需要寫書來證明自己仍屬“布爾什維克衛隊”。也許，如依達所認為的，他“陷入迷途”，受了自己的信仰的誤導。

斯拉溫相信“重新做人”，1917年之前就已在從事改造人的實驗，為莫吉廖夫城地方監獄的囚犯設立工場和文化中心。其時，他只是一名法律助理，但與監獄長關系良好。改造人的想法，重現于他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律著述，特別是他關于同志法庭（tovarishcheskie sudy）的文章。他當時堅決主張，工作場所的法庭可迫使囚犯參與社區服務以改造自己。 [(348)](#_346_2)

1933年，共產主義學院領導分配給了斯拉溫新任務——寫一本書，暫名為“勞役者的重新做人——以白海運河為例”。 [(349)](#_348_2) 事實上，他被要求為古拉格勞改營賦予法律和哲學上的正當性。也許，斯拉溫先前關于“重新做人”的著作起了作用，為他贏得了這一份可怕的差事。但他被選中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他撰寫的《對蘇維埃刑法戰線的破壞》顯示，他已做好準備，愿意尋找和構建法律上的論證，來支持現政權的壓迫制度。

相信“重新做人”是一回事，目睹它的實際操作卻是另一回事。從1932到1933年，斯拉溫去了幾趟白海運河和其他勞改營，包括莫斯科至伏爾加的運河、西伯利亞東北部的科雷馬勞改營。他所看到的，反而摧毀了他對蘇維埃“重新做人”的信念。依達還記得父親出差回來時的“疲憊和沮喪——好幾天啞口無言，好像處于休克狀態”。斯拉溫訪問兒童勞教營時，尤其感到震驚，他看到那里的獄警使用殘忍的紀律來“重新鍛造兒童，以培養蘇維埃精神”。斯拉溫實在寫不出關于白海運河的書，一推再推，延后數年。好幾章的草稿被他撕得粉碎（其中有一章題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變”），因為他漸漸明白，“重新做人”在勞改營中并不存在。

斯拉溫知道自己已陷入困境。基洛夫被刺殺之后，共產主義學院一半的工作人員遭到清洗，斯拉溫一直擔心下一個入獄的就是自己。依達記得，父母鎖上房門：“徹夜不眠，坐著竊竊私語。”黨的檔案證實，斯拉溫的名字在1934年12月被列入政治嫌疑犯名單（“未來的逮捕對象”）。榜上有名的人都曾屬于其他黨派，只是到后來才加入了布爾什維克。 [(350)](#_348_2)

共產主義學院領導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斯拉溫無奈，只得呈上有關白海運河的幾章草稿。他在這幾章中，對古拉格系統的日常運作提出若干批評，卻只字不提“重新做人”的政策，因為實在找不到證據。他曾命名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變”的一章，此時改稱“重新做人政策中的畸變”。這是很勇敢的舉動，斯拉溫因此在1935年5月受到共產主義學院編輯委員會的嚴厲批評，這是一個道德轉折點。他深感自己的布爾什維克信念難以為繼，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中的熟人恢復了聯系——這是一個絕望的嘗試，借用依達的話，他“想讓時光倒流，并彌補他的政治錯誤”。但斯拉溫一定知道，為時已晚。他身陷絕境，完成此書才有可能自救，但他在道義上無法做到，只好不斷推諉，他心里很清楚，推遲得越久，入獄也就越近。1937年3月，斯拉溫在共產主義學院的黨員會議上說：“我完蛋了，我在政治上已經破產。” [(351)](#_349_2)

五



1931年，吉娜和帕維爾·維滕貝格在凱姆勞改營（白海運河）

20世紀30年代中期，古拉格人口急劇膨脹。集體化和饑荒的受害者，都被送入勞改營，成為蘇維埃工業經濟的一部分。從1932到1936年，勞改營、勞教營、“特殊定居地”的人口已達240萬人（另有50萬監獄人口）。 [(352)](#_351_2) 這批奴隸勞工在北極區的伐木、建筑、采礦中，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那里根本招收不到自由勞工。即使在古拉格系統內，也有職業生涯的上升通道：既有獄警和管理人員，又有一定數量的囚犯——前者憑借自己的盡職，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內部獲得晉升；后者只要他們身懷古拉格所需要的技能，并承諾追隨或愿意適應黨的路線。

在蘇維埃北極礦區的勘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帕維爾·維滕貝格，被捕于1930年4月。他是科學院清洗出的數百位科學家之一，監禁于列寧格勒，因為忍受不了審訊和威脅而漸漸屈服，最終承認屬于一個曾幫助組織1927年雅庫茨克叛亂的保皇組織（維滕貝格曾赴西伯利亞東北部，勘探科雷馬金礦）。審訊人當著他的面站起來打電話，下令逮捕帕維爾的妻子吉娜（季娜伊達），從而迫使他只得屈服。在帕維爾監禁時期，吉娜一直在擔心自己會被捕，她與女兒被迫搬入奧爾戈諾度假區鄉間別墅中的一個房間，其他房間則由一名政治警察舉報人占用，負責張羅沒收他們的財產。帕維爾的女兒葉夫根尼婭回憶，她每周陪同母親前往列寧格勒戈羅霍娃街的政治保衛總局辦事處，詢問有關帕維爾的近況：

她會把我，一個年僅8歲的女孩，留在海軍部花園的噴泉處（當時沒在噴水），讓我在原地等候。如果她一去不回，就意味著她也被捕了。我就應從口袋里拿出一張小紙條，按上面的地址自行去找，塔吉娜·勒沃夫娜住在那里，會收留我的。

1931年2月，帕維爾被判處槍決，臨到最后一刻又獲緩刑，改判勞改10年。他在奧爾戈諾度假區的房子充公（變成政治保衛總局官員的鄉間別墅）。他自己先被送去馬伊―古帕伐木營，為白海運河提供木料；后來被送去白海運河北部入海處的勞改營——靠近凱姆鎮，充當污水處理的工程師。同時，吉娜帶上女兒葉夫根尼婭和瓦倫蒂娜，搬進列寧格勒一座共用公寓的單間（長女維羅尼卡已搬去達吉斯坦）。該共用公寓共住16人，其中有原主人——住在正房的一對老夫婦，還有他們充滿“階級仇恨”的前女仆，住在走廊的帷幕背后。到夏天，吉娜把兩個女兒送去基輔親戚家寄宿，自己前去凱姆鎮的勞改營充當志愿醫生，旨在靠近丈夫。 [(353)](#_351_2)

1931年8月，吉娜剛剛回到列寧格勒，帕維爾就作為地質學家參加政治保衛總局的一支特別考察隊，前往瓦伊加奇島，評估在當地開采貴重礦產的可能。帕維爾很幸運，憑借自己的地質學專長而獲得拯救。他雖是囚犯，仍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揮專長，為古拉格服務。率領瓦伊加奇島考察隊的是整個古拉格系統的主管費奧多爾·艾希曼斯，他1930年6月離開莫斯科，親赴位于喀拉海的這個偏遠北極島，籌辦第一個勞改營。1500名犯人中，近一半是地質學家、地形測繪員、工程師，雖然探測到了島上豐富的鋅和鉛礦藏，卻找不到艾希曼斯真正冀望的黃金和鉑金。住在島上的涅涅茨人（Nenets）為考察隊提供運輸服務，其古老傳說中的“金女”應是一個純金的圖騰娃娃。勞改營條件很差，尤其是在營房建成之前的幾個月，大家住在帳篷里，人工開采鋅和鉛，紀律非常嚴苛——稍有違規，便遭槍決——許多人死于嚴寒，該島冬季的溫度通常跌至攝氏零下40度。 [(354)](#_352_2)

維滕貝格抵達時，尋獲黃金的前景已變得渺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叫他也來幫忙。帕維爾很快被委任為總地質師，完成了對瓦伊加奇島的勘測，到1934年更開啟了古拉格的采礦設施，成為北極圈內的第一個采礦區。他在政治保衛總局的內部期刊上發表了幾篇有關考察隊的文章，甚至為海島的自然歷史作了剪貼記錄。盡管是一名囚犯，帕維爾享有特權，他領取特殊口糧，住在專家住宅，甚至有自己的辦公室。1932年3月，他的家人獲準來訪，陪他在夏天勘探瓦伊加奇島。1933年夏天，吉娜將瓦倫蒂娜托付給列寧格勒的朋友，帶上葉夫根尼婭來與帕維爾同住。其時，已在1932年10月取代艾希曼斯的勞改營新指揮官阿列克謝·季茨克蘭，允許專家的家人前來團聚。吉娜的家書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瓦伊加奇島。

1933年8月26日

我親愛的小女兒，維羅尼切卡[維羅尼卡]和柳森卡[瓦倫蒂娜]：

24日夜深時，我們終于抵達爸爸的住地。路上一共花了6天，其中3天都遇上了徹骨的5級大風。古連卡[葉夫根尼婭]非常勇敢，要知道我們的四周大部分乘客都暈了船……爸爸上了我們的船，將行李搬上他的摩托艇。晚上11點，我們就到了家。爸爸看起來很棒，體重有所增加，臉色極好，沒有一道皺紋。他的心情甚佳，充滿活力，喜愛自己的工作，一如既往……我們的專家住宅很好，如果你停下來想一想這里已是北緯70度，那么確實算是相當不錯。我們有兩個賞心悅目的房間，每一間有3扇窗，雖然面向東北和西北，仍然光線充足。房內有一個巨大的爐灶，帶烤箱的。所以，我必須改進我幾乎全忘了的持家能耐。下一次航船，我會寄上爸爸的照片，你們將親眼看到這里的條件多好、爸爸長得多壯……我們昨天晚上聚會，歡送返回大陸的[囚犯]，歡迎新來定居的。會上的發言我們都很喜歡；勞動英雄普受好評。看來，瓦伊加奇島考察隊在全蘇聯社會主義競賽中獲得了第一名。這里有美好的“重新做人”：所有返回大陸的囚犯，都已成為有文化有覺悟的合格工人。真希望我們能有更多這樣的“重新做人”……晚會的最后節目是“活墻報”[ 一種宣傳鼓動] 和精彩的音樂會。這就是我在此地一天半的見聞…… [(355)](#_353_1)



1934年，瓦伊加奇島勞改營，帕維爾·維滕貝格在自己的辦公室

在勞改營的樊籬之中，維滕貝格一家的生活漸漸回歸正常家庭的作息。吉娜在勞改營的診所當醫生，葉夫根尼婭就讀于專家和管理人員的子弟學校。葉夫根尼婭回憶：“我們的生活圍繞著媽媽和爸爸的工作。”

每天早晨，不管氣溫如何，爸爸總是打上一盆冷水，在我們房間內洗身，吃完早飯后，就去地質部門上班。他下班回來之后，我們共進晚餐。然后，他又要埋首案前。媽媽下班回來總是很累，即使是傍晚的閱讀，她都感到吃力。我放學后承擔所有的家務，因為我的時間最多。我去食堂領晚餐（兩份是志愿勞工的，一份是囚犯的），廚師都是中國人，非常稱職，教我如何烘焙。一般來講，與我們在列寧格勒時相比，這里的食物似乎太豐盛了。 [(356)](#_354_1)

這種對古拉格的樂觀，到底是真還是假？根據葉夫根尼婭所說，吉娜的樂觀乃至對“重新做人”的信念，都是由衷的，不只是寫給信件檢查員看看的。 [(357)](#_355_2) 毫無疑問，家庭得以重新團聚，由此而生的幸福感發揮了效用。同樣重要的是專家的相對特權，庇護了他們免受勞改營生活的最壞待遇。另一個可能是，他們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接受讓他們維持現狀、不致失眠的任何解說。

1934年，瓦伊加奇島上發生叛亂，在島另一端工作的一幫囚犯殺死獄警，發動起義。但他們無處可逃，最終不是被擊斃，就是被抓回營地。吉娜是勞改營的醫生，必須檢查那些俘虜的傷口，以決定他們是否適合繼續工作。她看到可怕的毆打的證據，但對“重新做人”的信念絲毫不曾動搖。同樣絲毫未變的是她的積極配合，正如她在雇傭合約中所允諾的，她愿意減少囚犯的病假時間，去貫徹勞改營的勞動紀律。吉娜在叛亂善后工作中表現優異，因此獲得“突擊手”（udarnitsa）的光榮稱號，還登上了勞改營的“紅書”光榮榜。她幫助囚犯學習文化和一門手藝，認為這將有助于他們改造人格、成為新人、重返社會。她甚至參加黨校學習，還寫信告訴女兒，非常喜歡所學到的東西。 [(358)](#_356_2)

據葉夫根尼婭說，帕維爾也愿接受有關古拉格的官方觀點。在她看來，他為科學而活，“對政治則興趣索然。他感謝蘇維埃政權讓他有機會繼續自己的專業，并讓家人來瓦伊加奇島與他團聚”。如果他相信“重新做人”，在女兒看來，那是因為“他天性非常真誠，也許有點天真，具浪漫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這興許是真的；只不過這個見解來自深切懷念父親的女兒。從不同角度看，帕維爾的行為可被視作一種道德上的委曲求全。他的事業顯然在勞改營的環境中蒸蒸日上，他所需要的，在那里應有盡有。帕維爾在日記中寫道：“在瓦伊加奇島擔任指揮官，該有多痛快。紀律是半軍事化的，工人完全聽從指揮。”1935年7月，帕維爾因自己的杰出貢獻而獲得提前釋放，整整早了6年。但他希望完成對瓦伊加奇島的地質研究，所以與行政當局簽署了一份合約，以自愿性質繼續這項工作。現在看來，這是很關鍵的轉折點。他不再是一個被迫為古拉格工作的囚犯，已經變成了古拉格系統的合作者，以此推進自己的研究。

他完成瓦伊加奇島的地質研究后，又去德米特羅夫勞改營，成為莫斯科至伏爾加的運河的地質學家。同時，吉娜和葉夫根尼婭返回列寧格勒，發現“生活變得較為舒適”。她們搬回曾住過的共用公寓——瓦倫蒂娜和維羅尼卡也來團聚，很快分到額外的一間房。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列寧格勒恐怖中，該共用公寓的原主人已經被捕。但她們無法取回自己的舊家具，因為內務人民委員會仍在使用她們在奧爾戈諾度假區的鄉間別墅，但她們因此受邀前去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倉庫，自行挑選列寧格勒恐怖時沒收來的家具。瓦倫蒂娜和維羅尼卡選了一對古董扶手椅、一張沙發床、一面鏡子、一個書柜和一架三角鋼琴。 [(359)](#_358_1)

帕維爾1936年回到列寧格勒，在隨后的兩年當中，繼續為古拉格的北冰洋行政部門工作，數次率隊遠征北地群島地區。1936年，帕維爾寫信給葉夫根尼婭說：“如何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讓我們作為一個緊密相連的家庭舒服地住在一起，似乎是我無法解決的難題。”他通過在古拉格的工作設法爭到了特權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感到不安全，擔憂自己的家人。

你們曾經陪伴我一起受苦受難，理應得到一份舒適的生活。但我卻無能為力，叫我情何以堪！我所能做的，就是自建一所小房子，但媽媽聽也不愿聽。可以幫我的強人，卻將我拒之門外。何時我才能恢復1930年之前的影響力，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帕維爾努力讓自己蘇維埃化，上課學習黨史，衷心接受個中的“真理”。到1936年的年底，他已經照單全收有關“托派”和蘇維埃政權其他“敵人”的教義。帕維爾在日記中寫道：“這真是一個恥辱，我從不知道這種事情。要是我早一點知道，閱讀歷史可以拓寬視野，使自己正確理解黨的總路線，也許我的生命便不至于卷入流放和監禁的舛途。我的生活遭到摧殘，到底是為了什么？成千上萬的人淪為迷途的羔羊，全怪那個混蛋托洛茨基！” [(360)](#_359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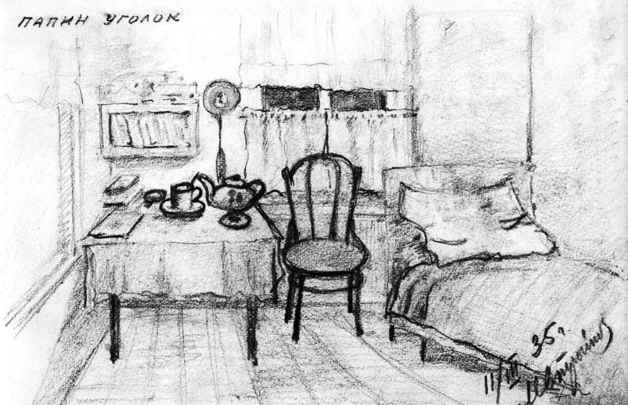
帕維爾的故事提醒我們，古拉格遠遠超越監獄營地本身。它是蘇維埃工業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雇用了大批專家和技術員——工程師、地質學家、建筑師、研究員甚至飛機設計師——向他們提供獨特的機會，讓他們發展各自的事業。

帕維爾·德羅茲多夫1906年出生于切爾尼戈夫地區的農民家庭，父親在1917年之前便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父母都在內戰中喪生后，帕維爾來到莫斯科，就讀于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之后又接受電工培訓（最后在負責首都電氣化的發電站上班）。1925年，帕維爾因參加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組織而被捕，判處3年徒刑，流放到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地區。他在那里的伐木營工作，附屬于其時仍處設立初期的維舍拉。刑滿前一年，即1927年，帕維爾即已獲釋，自愿選擇留在原地，繼續他的會計工作。他娶了勞改營鄰近農村的女孩亞歷山德拉，育有兩個孩子，一起住在勞改營的管理員宿舍。1929年，“開明”的古拉格主管愛德華·別爾津抵達維舍拉，帕維爾的命運由此而發生巨變。別爾津大力提倡囚犯“重新做人”，他相信他在德羅茲多夫的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實例。別爾津賞識帕維爾的才干，特別是他的過目不忘（別爾津喜歡說，帕維爾的腦袋里安有一臺計算器）。他在勞改營管理系統中迅速提拔帕維爾，與維舍拉高級官員交談時，經常提及這位前囚犯，視之為“重新做人”的典型。1929年，帕維爾變成伐木營的首席會計；1930年，又晉升為整個維舍拉的首席會計。之后，他作為親信，跟隨別爾津離開維舍拉，前往西伯利亞的東北部，幫助籌辦遠北建設托拉斯的勞改營網絡。他在新的古拉格中心馬加丹，成為遠北建設托拉斯規劃部門的首席會計，還須督察屬下的各個勞改營。他晉升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中將，分得一套四室的公寓，大得足以容納自己一家再加上妹妹一家。他還在莫斯科獲得一套公寓，亞歷山德拉和孩子可去那里過冬。這家人享有特權，能使用專為斯大林精英保留的特殊商店和療養院，遇上蘇維埃節日時，還可以領到遠北建設托拉斯制造的禮物。 [(361)](#_359_1) 要知道幾年前，他還是古拉格一名普通囚犯，現在已是天壤之別。

米哈伊爾·斯特羅伊科夫1901年出生于伊萬諾沃城附近的老信徒家庭，地處莫斯科的東北，相距300公里。1925年，他就讀于莫斯科建筑學院，并與年輕藝術家艾萊娜結婚。他的妻子在工人補習學校（專門培養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為高等學院做準備）上課，女兒朱莉婭出生于1927年。在女兒呱呱墜地之前，米哈伊爾就已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因為他屬于一個反對布爾什維克農民政策的學生組織。艾萊娜也被工人補習學校開除，只得去紡織廠上班。1930年，米哈伊爾重返莫斯科的建筑學院，兩年后再一次被捕，囚在布提爾基監獄兩年。米哈伊爾被認為是才華橫溢的學生，被逮捕之前尚未完成他的學位論文，由于教授的干預，他獲準在布提爾基監獄繼續攻讀，甚至回到建筑學院作了論文答辯。要是沒有政治警察的幫忙，米哈伊爾這樣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兩個叔叔在政治保衛總局供職，他的老朋友菲利浦·巴扎諾夫，即艾萊娜的第一任丈夫，也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擔任高職。在米哈伊爾服刑期間，巴扎諾夫盡力幫助艾萊娜（意圖說服她重回他的懷抱）。1934年，米哈伊爾流放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盡管有親戚在當地，其中一人還曾擔任摩爾曼斯克的副省長，但米哈伊爾沒去探望，因為不想連累他們。

米哈伊爾全靠自己的建筑知識獲得拯救。在內務人民委員會幾個重大建設項目中——工廠和橋梁，他受雇為規劃建筑師，附近的勞改營則提供古拉格勞工。他很快成為阿爾漢格爾斯克的總建筑師之一。即便是一名流放中的囚犯，米哈伊爾的生活條件，仍然好過身在莫斯科的艾萊娜和朱莉婭。米哈伊爾賺取高薪，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程師和技術員食堂里每天吃肉。而生活在莫斯科的朱莉婭和艾萊娜，全靠粥和面包度日，她們要靠米哈伊爾匯錢才能買肉。朱莉婭體弱多病，迫切需要營養。1930年的年底，艾萊娜干脆把她送到父親住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希望她受益于米哈伊爾相對舒適的生活。朱莉婭上次見到父親（她唯一的記憶）是在兩年前的布提爾基監獄，那次探監造成如此大的困擾，以致6歲的她竟然想到了自殺。米哈伊爾向老婦人艾萊娜·彼得羅夫娜租借了房間的一角，并承包他們的一日三餐。朱莉婭以眷眷之心回憶那這些菜肴——肉片通心粉、裹肉餡的薄煎餅、雞腿和冰淇淋。

晚上，爸爸下班回來就會問我：“我們讓艾萊娜·彼得羅夫娜做什么菜呀？你想吃什么呀？”我非常喜歡她的美味食物，總是會說[她煮給我們吃的第一道菜]：“通心粉和肉片！通心粉和肉片！”有一天，爸爸實在吃膩了，央求我：“柳森卡，想想別的，我不想再吃了。”但我對其他的菜連想都不想。



1935年，米哈伊爾·斯特羅伊科夫畫下的“爸爸的角落”



1934年的波洛茲家庭，拉達站在姨媽奧莉加和外祖母費奧克蒂斯塔之間，男孩是奧莉加的兒子沃洛蒂亞

在朱莉婭看來，從1934到1937年，她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度過的歲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她在學校里得心應手，茁壯成長。她喜愛芭蕾舞，父親帶她去劇院觀摩，并買回留聲機，讓她在自家小空間隨音樂翩翩起舞。艾萊娜將這小空間取名為“爸爸的角落”，僅有7平方米，是米哈伊爾以膠合板自建的，有墻有門，與艾萊娜·彼得羅夫娜的住處分隔開來，給人以單獨房間的錯覺，米哈伊爾為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的角落”只能容納一張單人床和一桌一椅，還有墻上的書架。不管如何，它仍算是一個家。朱莉婭與父親在此生活，非常愉快。

1937年1月，艾萊娜也趕來阿爾漢格爾斯克。米哈伊爾的刑期即將結束，她想闔家一起返回莫斯科，但當局不讓她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等待，只好帶著朱莉婭先回莫斯科。幾星期后，即同年3月，米哈伊爾重又被捕，被以“反革命煽動”的罪名判處勞改5年（1938年遭槍決）。艾萊娜對此次逮捕一無所知，只是一直收不到丈夫的音信。到第二年的夏天，她返回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艾萊娜·彼得羅夫娜，方才獲悉真相。 [(362)](#_360_1)

維滕貝格家、德羅茲多夫家和斯特羅伊科夫家的遭遇均屬特例。古拉格人口的絕大多數，不是充作奴隸勞工，就是羈留在勞改營和偏遠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機會獲得正常生活，或緩刑減刑，所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32到1936年，超過15萬人死于蘇維埃的勞改營。 [(363)](#_361_1) 而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通常還被視作1937至1938年大風暴之前的平靜（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甚至稱之為“素食年代”），這個死亡統計折射出了迥然不同的色彩。對飽受大恐怖摧殘的人來說，有關“平靜”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如有家人早早陷入古拉格系統，對這樣的數百萬人來說，30年代中期已是最痛苦的年代。

閱讀這些囚犯寄給家人的信件（寫信人無時無刻不在提防審查人員），會驚訝地發現，古拉格大大改變了很多囚犯的價值觀和選擇順序——尤其是為自己的理想犧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們可能在職業中或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中，尋求自己的滿足和幸福；現在，勞改營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們重新考量，轉而愈加重視家庭的價值。

塔蒂亞娜·波洛茲（娘家姓米亞赫科娃），1898年出生于坦波夫省鮑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區的律師家庭。她母親費奧克蒂斯塔是神父的女兒，又是社會民主黨成員；1903年，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產生分裂時，該黨與前者站在一起。母親鼓勵塔蒂亞娜投入政治。1919年，塔蒂亞娜加入布爾什維克，在內戰的南部戰線即鄧尼金白軍的腹地開展宣傳工作，并在那里遇上未來的丈夫米哈伊爾·波洛茲。他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的領導成員，又在獨立的烏克蘭政府軍事委員會供職。該黨是烏克蘭境內唯一獲得大量農民支持的政黨，內戰結束后并入布爾什維克。烏克蘭接受蘇維埃的統治，波洛茲變成烏克蘭駐莫斯科的政治代表。塔蒂亞娜在高級黨校學習，聽取托洛茨基的演講。1923年，米哈伊爾在蘇維埃烏克蘭政府中被任命為財政人民委員。他和塔蒂亞娜定居于哈爾科夫城（1934年前的蘇維埃烏克蘭首府），1924年，他們的女兒拉達在那里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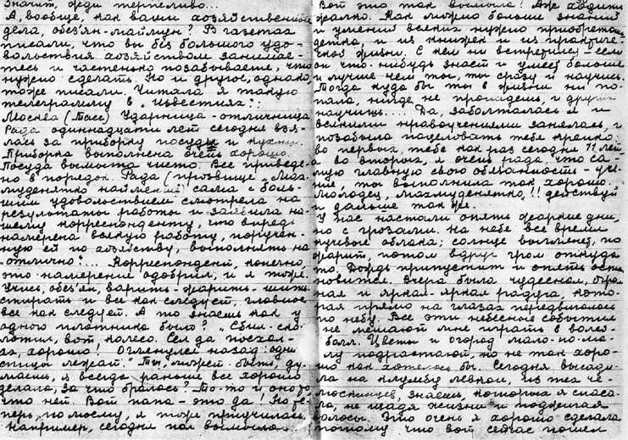
3年后，塔蒂亞娜先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1929年再流放至哈薩克斯坦的切爾卡地區。她被控是積極的反對派，與斯米爾諾夫集團有染。在1927年其領導群被開除出黨之前，那個集團一直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中一個重要派別。1929年秋天，米哈伊爾前去看望身在哈薩克斯坦的塔蒂亞娜，懇求她為了其時寄養于外祖母處的女兒，放棄她的反對派活動。據一名也流放于切爾卡地區的反對派同伴說，米哈伊爾曾在她耳邊低語，“像是某種秘密信息，令她陷入徹底的沮喪，現出一敗涂地的模樣”。也許米哈伊爾告訴她，斯米爾諾夫一伙正在與斯大林當局談判投降條件，以便恢復名譽，重回黨內。1929年11月3日，斯米爾諾夫的文章出現于《真理報》，他宣稱自己已拋棄托洛茨基立場，全力支持五年計劃和“黨的總路線”，并呼吁追隨者“克服猶豫不決，返回黨內”。斯米爾諾夫集團的400名成員隨即簽署一項聲明，轉而支持黨的總路線，其中就有塔蒂亞娜。她因此獲釋，從流放地返回自己的家。 [(364)](#_363____S__Rosefield___Stalinism)

1930年，全家從哈爾科夫搬到莫斯科。波洛茲成為蘇聯預算委員會副主席，塔蒂亞娜在汽車工業界擔任經濟學家。他們帶上塔蒂亞娜的母親費奧克蒂斯塔和一個管家，一起住進專供政府人員使用的著名的河堤大樓，就在克里姆林宮的對面。由于浪漫的革命家一直為理想而活，他們一家并不很看重自己的特權生活。盡管丈夫堅信反對斯大林是徒勞的，母親又全心擁護斯大林，塔蒂亞娜仍堅守自己的托洛茨基立場。1933年，塔蒂亞娜連同斯米爾諾夫集團的其他成員再次被捕，獲刑3年，被送去烏拉爾地區的上烏拉爾斯克特殊隔離營。數月后的1934年，米哈伊爾也被捕，罪名是試圖建立資產階級的烏克蘭政府，判處10年，被送去索洛韋茨基勞改營。拉達和外祖母被趕出河堤大樓，搬到莫斯科郊外一個配有家具的公寓。不久，拉達的姨媽奧莉加和她兒子沃洛蒂亞也搬來同住，她的丈夫也在3年前被捕。拉達回憶，費奧克蒂斯塔“嘗試教育我尊重和熱愛自己的父母”。

但同時，她又希望我熱愛和尊敬蘇維埃政權。這不是一件易事，但不知何故，她竟然做到了。外祖母堅信，斯大林自己不清楚逮捕的規模……她認為，既然有這么多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要查出到底誰有罪，確實很難。在我們的房子里，經常能聽到“不打破雞蛋就無法煎蛋”的感嘆。 [(365)](#_363_1)

從1933到1936年的6月，塔蒂亞娜共寫了136封信給費奧克蒂斯塔和拉達，平均每周一封，這是古拉格尚存私人信件中最大收集之一。 [(366)](#_364_1) 早期信件反映了塔蒂亞娜在政治上的執著，要求給她寄去馬克思著作，還會具體評論最新的政治事件。例如在1934年6月，塔蒂亞娜的信件對“切柳斯金號”的船員贊不絕口，因為他們剛剛完成跨越北冰洋的首航——從列寧格勒到白令海峽。不幸的是，這一航程以災難告終。1934年2月，該船被堅冰撞破，沉沒于楚科奇海。好在船員們安營扎寨于冰山之上，最后獲得蘇維埃飛機的拯救，返回了莫斯科。那里的宣傳機構，將之譽為英雄生存的壯舉。塔蒂亞娜在6月24日寫道，“切柳斯金號”船員向全世界展示了“布爾什維克是何等人物”；4天后她的信又回到了同一主題：

作為蘇維埃公民的驕傲，可能從沒像今天這樣全面而強烈。這一驕傲來自蘇維埃人民的“優良品質”、蘇維埃的先進飛機、蘇維埃的杰出科學家和船員以及其他一切，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在冰山上顯示出了其思想和組織的至高無上。對兒童教育來說，那該有多大的說服力！



塔蒂亞娜寫給拉達的信（1935年6月12日）

拉達的政治教育是這些信件中不斷呈現的關注點。拉達回憶，“媽媽老是在寫如何建設共產主義”。

她希望我成為一名工程師和作家……她的信件對我影響很大。我雖是外祖母帶大的，但我覺得，我也是媽媽通過這些信件撫養長大的。 [(367)](#_365_1)

塔蒂亞娜希望拉達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她費盡筆墨，點評拉達在家里的行為（謊稱是在報紙上讀到的，以免透露真正的消息來源，即外祖母費奧克蒂斯塔）。

1935年6月12日

我的小猴子，我們的家務活做得怎樣了？他們在報紙上寫，你做家務并不心甘情愿，經常丟三落四的，但也寫上了其他訊息。我在《消息報》上讀到這樣一份電訊：“莫斯科（塔斯社）——11歲的突擊工人兼模范學生拉達，今天被要求清洗碗盤、收拾廚房。這個任務完成得很好，碗盤非常干凈，一切都收拾得整齊。拉達檢查自己的勞動成果，表示滿意。她還告訴我們的記者，從現在起，她將以同樣的高標準，履行所有的家務職責。”記者當然對你表示贊許，我也有同感。小猴子，按照吩咐去做你的烹飪、清洗、打掃，最重要的是聽從吩咐。

塔蒂亞娜羈留在獄中愈久，她的信件就愈加牽掛家人。米哈伊爾不得與莫斯科通信，卻能寫信給塔蒂亞娜。由此，夫婦之間的信件成了父女相互了解的唯一途徑。拉達在反思母親的信件時認為，它們讓塔蒂亞娜保持家庭聯系，而她的生存又有賴于這一聯系。拉達在回憶錄中寫道，那些信“充滿樂觀，總是提醒我們歲月如梭，也一直在期盼家人重聚的快樂時光”。塔蒂亞娜的許多監獄來信都夾有小禮物——碎布縫的娃娃、玩具動物甚至小衣服——都是她在勞改營中為拉達做的。 [(368)](#_366_1)

1936年，塔蒂亞娜于上烏拉爾斯克特殊隔離營獲釋，又流放至烏拉爾斯克城，之后再轉至阿拉木圖。1936年3月，費奧克蒂斯塔赴烏拉爾斯克城，與女兒共度了兩個星期。對塔蒂亞娜來說，這兩周的時光實在太珍貴了。她后來描述兩人坐在一起的親密：“我的頭靠在你肩膀上，一起回顧逝去的光陰。” [(369)](#_367____MSP__f__3__op__1__d__2) 費奧克蒂斯塔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塔蒂亞娜寫道：“媽媽！我回到家里，但這已不能算是家了。你不在，就沒有‘家’[用英文寫的]——再也沒有溫暖。”4月，塔蒂亞娜搬去阿拉木圖，開始寄望于拉達能前來跟她一起生活，因此投入所有的精力為實現女兒的遷移奔走。她這段時間的信中充滿了希望和興奮。拉達寫道：“她的倔強和執著聚焦于找到一份工作，以及與女兒同住的小房間。”但到最后，此行還是落空。1936年6月，拉達正要離開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圖與母親團聚，塔蒂亞娜卻再次被捕，被送去另一個勞改營。拉達回憶：

我們買了赴阿拉木圖的火車票，找好路上可照看我的旅伴，打好包裹，發送電報，告知我的抵達信息。回電卻說：“收件人已不住在這里。”只好退掉車票。我留在莫斯科，再也沒有見到母親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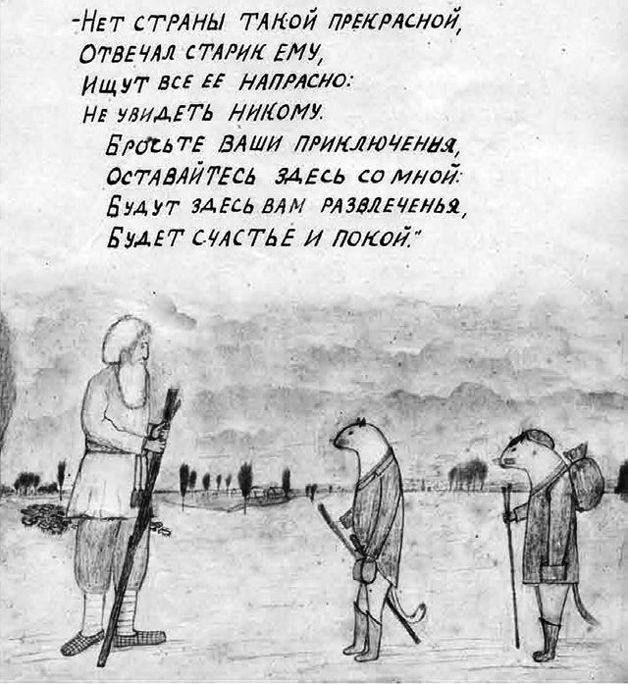
塔蒂亞娜被送去科雷馬——那是斯大林古拉格系統中最糟糕的營地之一，并于1937年11月遭槍決。同月，米哈伊爾也被槍決于卡累利阿。他與妻子（托洛茨基分子）的通信，都被記錄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文件中，足以讓他被判處死刑。 [(370)](#_368____MSP__f__3__op__1__d__2)

拉達對父母的去世茫然不知。她盡量不去想，因為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但有一次，她在夢中看到母親：

一開始，我在大洋中一條船的甲板上，手中是兩本包有褐色膠紙的教科書。我打開其中一本，看到母親的筆跡。第一句很奇怪：“當你讀到這幾行字時，我已在海底……”我繼續往下讀，記不得讀了多少行。突然，恐懼襲入我的心，海水從巨大的管道噴薄而出。我的恐懼驟漲，將我緊緊攫住，直到我驚醒過來。 [(371)](#_369____MSP__f__3__op__1__d__2)



1926年，尼古拉和艾萊娜·康德拉季耶夫



童話《沙米不尋常的冒險記》里的畫面

拉達堅信這個夢所傳遞的“信息”——母親已經淹死——開始對她朝思暮想。后來，她從科雷馬勞改營的幸存者那里聽到有關囚犯船沉沒的故事，更加確信母親的厄運。多年來，她一直相信自己的夢；盡管后來收到當局的死亡證明，說母親是被槍決的，但她仍然認定母親是淹死的。

監禁之后轉向家庭的狂熱社會主義者，不單單是塔蒂亞娜·波洛茲。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出生于科斯特羅馬省的農民家庭，該省地處莫斯科的東北方向，相距400公里。他在圣彼得堡大學攻讀經濟學，加入了社會革命黨，并在1917年的土地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是一名杰出的經濟學家，向蘇維埃政府提供咨詢。他全力支持新經濟政策，提倡農業和消費品的生產應該優先于重工業，同時還推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長周期理論（“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并因此聞名于世。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逆轉，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一切職務。1930年7月，他被捕，罪名是他屬于一個非法的 “農工黨”（很可能是子虛烏有的）。斯大林寫信給莫洛托夫說：“一定要槍斃康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幾個歹徒。” [(372)](#_370____MSP__f__3__op__1__d__2) 但到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被判處8年徒刑，始于1932年2月，囚禁在蘇茲達爾鎮的一個特殊隔離營——14世紀時曾是斯帕索―葉菲梅耶夫修道院。

康德拉季耶夫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頻繁進出監獄醫院，癥狀有劇烈頭痛、頭暈、間歇性耳聾、腿部的慢性風濕、腹瀉、嘔吐、失眠和抑郁。1936年，他幾近失明。然而，康德拉季耶夫仍致力于研究工作，并籌劃撰寫5本新著。他給妻子葉夫根尼婭寫的信超過100封， [(373)](#_371_1) 幾乎每一封都附有小字條，專給出生于1925年的女兒艾萊娜（“阿廖娜”）。康德拉季耶夫內心的離別痛苦，在這些信件中表露無遺，最牽掛的就是自己的女兒。他是一名如此慈愛的父親，此情此景因而變得愈加凄美。他渴望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發揮積極影響，做不到這一點又成了他內心最痛苦的煎熬。他在1932年3月寫給葉夫根尼婭的信中說：“真可怕，她將在我缺席的情況下長大。這帶給我的折磨遠超過任何其他的。” [(374)](#_372_1) 尼古拉將所有的父愛，注入寫給艾萊娜的信中。她沒寫回信時，尼古拉就會責備她不夠孝順。尼古拉會不斷向她提醒，自己被捕前父女共同生活中的小小軼事。他在信上繪畫，給她講修道院周遭野生動物的故事——小鳥飛來探望，還有他看到的小狐貍。在許多信件中，尼古拉還附上從修道院四周采來的花草。他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女兒的智力發展，給她寄去謎語和字謎，為她開列推薦的書單，要她寫讀后感。他還鼓勵她記日記，糾正她來信中的錯誤，不厭其煩地提醒她：“書寫要工整，凡事都要盡力而為。” [(375)](#_373____RGAE__f__769__op__1__d) 他許多來信的尾部都有小孩寫的“爸爸”二字。這就是艾萊娜所擁有的有關父親的一切。她長大后，成為一名植物學家，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也許，父親的信件最終還是激起了她對植物學的興趣。

1935年，為了紀念她的命名日， [(376)](#_374____RGAE__f__769__op__1__d) 尼古拉給艾萊娜寄去一則他自編自畫的童話《沙米不尋常的冒險記》（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Shammi），講述一只小貓尋找理想家園，其間的“人們、動物、植物，都生活在幸福與和諧之中”。沙米與朋友公貓瓦夏一起出發，后者很懦弱，也很勉強。在旅途中，它倆遇上各種動物，都試圖勸阻它們，并允諾，如果它倆放棄尋找，就會后福無量。但沙米依然一往無前，反倒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山羊、驢、馬、母雞——它們都在“努力工作并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很快，它們一伙迷了路，開始互相爭論，有的被鱷魚吞食，有的被森林中的獵人捕殺。

1938年8月31日，康德拉季耶夫寫信給女兒：

我甜蜜的寶貝阿廖努什卡（艾萊娜）：

興許，假期已經結束，你已重返學校。你的夏季過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強壯、體重增加、皮膚曬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親吻你許多許多次。我自己還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這個冬天不會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學習。要閱讀好的書籍，做一個聰明乖巧的小女孩，聽母親的話，永遠不要讓她失望。如果你沒把我——你的爸爸——徹底忘了，我也會很高興。好吧，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個不停。

你的爸爸 [(377)](#_375____RGAE__f__769__op__1__d)

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隊槍決。

[[1]](#_1_11) 它的地基滲水，即使以莫斯科墓地的墓碑來堵塞，仍然無效。兒童們爬過圍欄，在地基的積水潭中游泳，或釣鯉魚。該宮殿的建造因1941年戰爭的爆發而停工，之后再也沒有復工。但它的效果圖繼續印在火柴盒上，附近的地鐵站名（今天的科洛波德站）仍叫蘇維埃宮殿，只是工地本身后來變成了游泳池。

[[2]](#_2_11) 帕維爾·加利斯基（生于1911年）還記得自己在1932年清洗期間，曾受列寧格勒紅色軍火廠黨主管的質詢。加利斯基是神父的兒子，擔任工廠墻報的主編，新近入黨，家庭背景使他易受攻擊。工廠清洗委員會的負責人，既是地區黨委主席，又是工廠董事，當場要求加利斯基介紹“列寧的著作《反杜林論》”的摘要（事實上，該著作不是列寧的，而是恩格斯的，它詳細闡述了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加利斯基對此書根本一無所知，但他回憶：“我想，反的意思就是反對。所以我就回答，列寧寫這本書就是要批駁這個杜林。他們說：‘正確！干得不錯，聰明的小伙子！’”（MSP, f. 3, op. 53, d. 2, l. 6）

[[3]](#_3_8) 1935年8月，頓巴斯的礦工阿列克謝·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挖出的煤炭創了紀錄，贏得了全國媒體廣泛的表揚。他的成就引發了一項群眾運動，專門獎勵熟練且盡職的工人，因為效率是第二個五年計劃規定的目標。斯達漢諾夫運動很快發展成一種“突擊勞動”，超出生產配額的人可獲得獎金、消費品、較好的住房，甚至可晉升為行政干部（尤其是警察）。就斯大林政權而言，該運動是提高生產標準、降低基本工資的措施。它使工人更依賴計件的報酬，又對經理和官員施加了強大壓力。燃料或原材料發生短缺時，或模范工人無法完成指標時，經理和官員就要承擔全部的罪責（常被指控為破壞者和顛覆分子）。

[[4]](#_4_5) 1935年10月，斯大林探望他在第比利斯的母親，受到廣泛的宣傳，由此啟動了一場宣傳運動，以顯示他是家庭觀念濃厚的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花園與他的孩子們在一起的場景也被拍了照，這在以前是絕不允許的（大多數蘇維埃人甚至不知道斯大林育有子女）。

[[5]](#_5_5) 出于這個原因，她希望匿名。

[[6]](#_6_5) 精神科醫生發現，共用公寓的長期居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癥和妄想癥。

[[7]](#_7_5) 俄國將領波將金（1739—1791）為使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對他的領地留下好印象，在女皇必經之路旁建起一批繁榮村莊。其后，“波將金村”作為弄虛作假的代稱聞名于世。——編注

#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一



20世紀20年代后期，奧西普、朱莉婭（坐在臺階前面右側）與兒子伊戈爾（奧西普的身邊）、弗拉基米爾（朱莉婭的膝上），以及幾個鄰居小孩，在莫斯科附近他們的鄉間別墅

1937年7月7日晚，丈夫被捕時，朱莉婭·皮亞特尼茨卡婭都不知作何感想。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是老布爾什維克，創立初期就是其成員，又是列寧最信賴的同志之一。1932年1月，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祝福皮亞特尼茨基50歲生日的《真理報》文章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一切奉獻給黨，全為黨的利益而活”。朱莉婭實在想不明白，奧西普何以變成了“人民公敵”。她是一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現在卻變得手足無措，不知道究竟應該信誰：已將皮亞特尼茨基定為“叛徒和間諜”的蘇維埃媒體，抑或自己近20年的愛人？奧西普是她兩個孩子的父親，他被捕后，她都不敢確定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丈夫。朱莉婭在日記中寫道：“誰是皮亞特尼茨基？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抑或一個歹徒？……兩者可能都是真的。我實在弄不清楚，這才是最痛苦的。” [(378)](#_376_1)

1920年朱莉婭遇上奧西普時，自己還只有21歲，他39歲。朱莉婭出生于弗拉基米爾城的俄羅斯波蘭家庭。她母親是一名波蘭貴族，不顧自己階層的習俗和宗教，沒有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竟嫁給了一名俄羅斯東正教神父。母親在朱莉婭6歲時去世，卻把自己浪漫和反叛的氣質，遺留給了女兒。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熱情而美麗的朱莉婭僅16歲就離開父親的家，成為俄羅斯軍隊的一名護士。與她結婚的一名年輕將軍，消失在1917年的一次戰斗中。內戰時期，朱莉婭加入布爾什維克，充任紅軍間諜，潛入時任東線白軍領袖的高爾察克海軍上將的總部。她最終泄露真實身份，僥幸逃離，來到莫斯科，因精神崩潰而病倒。她在醫院中治療時，遇上了前來探望朋友的奧西普。朱莉婭高度緊張、情緒不穩，又滿懷激情，有些詩人氣質。由于從小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她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大大影響了自身的政治觀點。據奧西普一位朋友的女兒說，朱莉婭心地善良，待人熱誠，很招人喜歡：“在她面前，我們這些孩子總是很安靜。她一來，我們就把憂愁拋到九霄云外，她總是充滿活力。” [(379)](#Di_Si_Zhang__Da_Kong_Bu__1937__1_1)

相比之下，奧西普嚴肅認真，沉默寡言。他身體結實，五官清秀柔和，是職業革命家的模范。他很謙遜，幾近大公無私，很少談及自己的私生活（很多黨內老同志都不知道他已成家）。1917年之前，奧西普就是地下馬克思主義者中最重要的積極分子之一，負責在俄羅斯和歐洲之間偷運非法印刷品。他住在國外的時間頗長，尤其是德國，在那里化名為“弗賴塔格”（Freitag，即星期五），翻回俄文便是皮亞特尼察，這也是他名字皮亞特尼茨基的來源（他真正的猶太姓氏是塔爾希斯）。與朱莉婭結婚時，奧西普是莫斯科的黨委書記，但很快調到共產國際，負責至關重要的組織部，實際上成了整個共產國際的掌門人。皮亞特尼茨基督導共產國際迅速擴張，試圖將革命傳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他的《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Bolshevik，1926年）其實是一本黨的工作手冊，介紹組織和道德的原則，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皮亞特尼茨基工作非常勤奮，常常筋疲力盡。他回憶：“我在共產國際工作，從早到晚。” [(380)](#_378_2) 20世紀20年代中期——僅40歲出頭，他的頭發已全部變白，然后日益稀疏。

奧西普的繁忙工作給家庭生活添加了重負，其在河堤大樓的公寓永遠是外國賓客滿座。他錯過了兩個兒子的童年——伊戈爾（生于1921年）和弗拉基米爾（生于1925年），還與朱莉婭頻起爭執，起因就在于自己時常不能在家。20世紀30年代，朱莉婭因黨的資產階級化和斯大林的獨裁而愈益感到失望。伊戈爾回憶父母之間的一場爭論——肯定是在1934年——她以憤怒的語調，大聲朗誦19世紀初詩人德米特里·韋涅維季諾夫的煽動性詩句：

污物、惡臭、蟑螂、跳蚤

到處都有其留下的手筆和杰作

還有這些嘮嘮叨叨的俄羅斯人——

而我們必須把這一切稱作我們神圣的祖國。



1935年，莫斯科，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

奧西普嚇壞了，擔心鄰居偷聽，趕緊請求妻子：“朱莉婭，小聲點！” [(381)](#_379____Ibid___pp__8_9)

到1935年，由于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都知道皮亞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國共產主義者哈利·波利特曾說，皮亞特尼茨基就是共產國際）。這一時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與西方民主國家加強聯系，以遏制納粹德國（即“集體安全”）；1934年，蘇聯甚至加入了兩年前曾攻擊為“帝國主義陰謀”的“國際聯盟”，而共產國際必須服從于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亞共產主義者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接任總書記一職，他率領的共產國際，任務就是與歐洲社會黨人建立聯盟，鼓勵他們與中間派組成聯合政府（“人民戰線”），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脅。該政策在法國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當地的人民陣線政府在1936年當選。但在共產國際當中，仍有人批評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亞特尼茨基。許多共產黨人，包括20世紀20年代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前成員，認為這樣做是對國際革命事業的背叛。在他們看來，只有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組成的“人民陣線”，才能推進國際革命事業，而資產階級的中間派不在其內。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為首的較為溫和的右翼反對派，其前成員對斯大林的濫用權力也越來越反感。這兩個團體找到了共同的目標：都把斯大林當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產國際充斥著不滿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竊竊私語。左派們把斯大林對西方列強的和解，與蘇維埃精英的資產階級化掛起鉤來。他們仍然對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滿信心，擔心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不再是對西方無產者的鼓舞，反而變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護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斯大林并沒向捍衛共和國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夠的援助，他們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將軍的國民軍——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大規模援助之下——挺進馬德里郊區。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誠支持者，有時也發現很難認同自己目睹的對革命國際主義的背叛。一名老布爾什維克在1935年向美國駐蘇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釋：“你必須明白，世界革命是我們的宗教。歸根結底，要是我們覺得斯大林在放棄世界革命事業，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反對斯大林本人。” [(382)](#_380____V__Piatnitskii__Zagovor)

斯大林對共產國際越來越不放心，擔心失控。他在1935年8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對其領導班子作了大規模整頓。皮亞特尼茨基不再從事共產國際的行政工作，而被調去中央委員會一個新設部門，專管黨的監督工作。1936年8月，前反對派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分別登上做秀公審的被告席。這無疑是斯大林向批評者發出的明確警告：所有政策的決定權只得留給黨的最高層。它的矛頭直指共產國際，其反對意見被斯大林視作“外國間諜”的挑撥離間。斯大林在1937年2月寫信給季米特洛夫：“你們共產國際的所有人都上了敵人的當。”數千名共產國際的官員和外國共產主義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德國、波蘭、南斯拉夫、波羅的海的共產黨，幾乎清洗殆盡。在共產國際的總部，以及許多共產國際官員寄居的莫斯科勒克斯酒店，風聲鶴唳，一片肅殺。一名官員說：“很多人已經半瘋，因為時時處在恐懼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 [(383)](#_382_2)

皮亞特尼茨基被斯大林斥為托洛茨基分子，后來又被指控卷入了一個“共產國際的法西斯間諜組織，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所組成”。但他兒子相信，他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的勇敢發言，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 [[1]](#_541) 很顯然，皮亞特尼茨基在中央委員會的新工作中發現了什么，感到無比震驚。對斯大林巨大的個人權力，以及他肆意借用內務人民委員會來消滅政敵，他更是憂心忡忡。據信，皮亞特尼茨基在6月的全體會議上，指責內務人民委員會捏造“人民公敵”的罪證，并呼吁建立特殊委員會，以監督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所作所為。這無疑是自殺性的發言，皮亞特尼茨基自己也有所察覺。他說完后，大廳里一片死寂，緊張氣氛，一目了然。數名黨領導人，包括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承從斯大林的指示，試圖說服皮亞特尼茨基撤回發言，從而保住自己的頭顱。莫洛托夫還懇求他，要為自己的妻兒著想。但皮亞特尼茨基不愿退縮，宣稱自己很清楚將會遇上怎樣的噩運，但“共產黨人的良心”不允許他收回自己的話。據卡岡諾維奇說，皮亞特尼茨基告訴他，他的抗議活動是有意為之的，是有計劃的。“他還說，為了黨的團結和道德純潔，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甚至愿意踏過自己妻兒的尸體。”斯大林一聽到如此匯報，領導班子馬上決定休會。第二天早上，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尼古拉·葉若夫率先發言，指控皮亞特尼茨基是沙皇間諜，受資本主義列強的派遣前來滲透共產國際，隨即要求就彈劾的動議實施表決。彈劾獲得通過，僅3票棄權，其中一票就是克魯普斯卡婭的。她拒絕相信內務人民委員會對皮亞特尼茨基的指控，直至他被捕（“他是最誠實的人，列寧非常愛護和尊重他”）。 [(384)](#_382_2) 朱莉婭在日記里記載，從全會回來，皮亞特尼茨基顯得“精疲力竭，頹唐神傷”。她問他是怎么回事，皮亞特尼茨基只談及：“所有的孩子和無辜者，被迫生活在永久的心理重壓之下。” [(385)](#_383_2)

在隨后的兩個星期中，皮亞特尼茨基待在家里，把自己鎖在辦公室。他吃得很少，整天打電話，試圖與葉若夫取得聯系。朱莉婭無法承受這樣的緊張，去了鄉間別墅幾天——后來甚是后悔。她在1938年3月的日記中寫道：“我不清楚他當時所承受的，其實應該留在他的身邊。我不夠聰明，也不夠強大。作為他這樣的人的妻子，那就意味著要為他服務，永遠堅守崗位。” [(386)](#_384_2) 在這兩個星期中，奧西普為被捕而做準備。他將存款和貴重物品轉給朱莉婭，銷毀了自己的私人筆記和信件。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革命家，曾多次被捕，知道做出何種準備。7月5日，他被開除出黨。從鄉間別墅回來的朱莉婭注意到，他如此沮喪，以致考慮過自殺，因為他無法想象沒有黨的生活。第二天，他們一起去拜訪老朋友。奧西普告訴他們，他已改變主意，為了黨的團結，愿意接受懲罰：“如果一定要為黨作出犧牲，不管這犧牲有多艱巨，我都愿愉快地承擔。”奧西普先行提醒兒子們，自己即將被捕。他解釋說，他因與黨的領導發生了爭執而受到指控；但他否認罪名，將盡一切可能證明自己的無辜；如果被捕，那他們都不應期望能夠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親。伊戈爾還記得：“他警告我不要與斯大林斗，這是他要告訴我的重點。” [(387)](#_385_2)

7月7日晚上剛過11點，內務人民委員會來找奧西普，葉若夫親自出馬。他們闖入公寓，朝朱莉婭扔來一件晨衣，叫她穿上。她開始叫喊，并咒罵他們。葉若夫告訴她：“蘇維埃公民與當局代表講話，不可使用這樣的方式。”奧西普為妻子的失態表示歉意，便跟他們離去，隨身只帶了裝有晨衣和牙刷的小手提箱。他們離開時，朱莉婭昏了過去，等她蘇醒過來，他們已經不見蹤影。她在日記中記下：“我只有一個念頭——壓倒一切，那就是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更感到自己的孤立無助，太可怕了。”第二天，朱莉婭還在上班，內務人民委員會又一次闖入公寓。他們搜尋奧西普的文件，并帶走家里的貴重物品。現金、存折、收音機、自行車、大衣、床單、亞麻桌布，甚至像茶杯那樣的小東西，統統不見了。通向奧西普辦公室的大門被用蠟封住，沒人敢于打破，如果真做了，倒會發現大量的書籍，皮亞特尼茨基的家人還能將之出售，來幫助她們應付未來數月的困苦。像所有“人民公敵”家庭一樣，他們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貧困的泥沼。 [(388)](#_385_2)

奧西普的命運，很可能在他6月全會的抗議之前就已被裁定。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萬人因危害國家罪而被捕——共產國際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標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謎的關鍵。

即使以斯大林政權的標準看，大恐怖仍屬異乎尋常。它不是慣例的大規模逮捕，比如斯大林統治期間不時席卷全國的那種，而是大批殺戮的既定政策。斯大林不再滿足于關押他真實或想象的“政治敵人”，而是下令警方把他們從監獄和勞改營提出，統統槍斃。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37和1938這兩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國家罪”而被槍決（姑且借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統計數字，在1921到1940年之間判處死刑的政治犯中，這占了91%）。這兩年中，古拉格勞改營的人數從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該數字不包括至少14萬死于勞改營的人和數字不詳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蘇維埃歷史上的其他階段也見證了對“敵人”的大規模逮捕，但從未有這么多的處決。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過半數后來被槍決。相比之下，1930年被捕的人中，槍決的不到10%——處決的死刑犯是20201人，那也是斯大林時期的第二處決高峰。在1929至1932年的“反富農行動”中，被捕人數很高（586904人），但只有6%（35689人）遭槍決。 [(389)](#_387_2)

大恐怖的起源不易解釋，更不易弄清為何如此集中于這兩年。為了開始這個理解過程，我們絕不能把大恐怖看成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即隨時可爆發的斯大林政權的混亂產物——這是有人提出的解釋 [(390)](#_389_2) ——而要看成斯大林精心操縱的行為，為了應付他體察的1937年的具體情況。

有些歷史學家把大恐怖的起源，追溯到列寧格勒黨主管謝爾蓋·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害——據說，此舉導致政權對暗藏的敵人實施殺氣騰騰的追捕。但該理論捎出一個疑問，為何大規模的逮捕和殺戮，沒在1934至1935年開始？為何在1937至1938年大風暴之前，又出現了兩年的平靜？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列寧格勒的確有大批的逮捕行動。除此之外，蘇聯其他地區的政治人物，在1935和1936年并沒看到明顯的恐怖。事實上，經過了1928至1934年的混亂，政權已在蘇聯檢察長亞歷山大·維辛斯基的領導下，有意識地返回了更穩定更傳統的法律秩序。 [(391)](#_389_2) 又有歷史學家把大恐怖，與斯大林擔憂國內特別是農村的威脅掛起鉤來。他們認為，如果蘇維埃選舉照原計劃進行，如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所允諾的，農村的普遍不滿將會轉化為政治訴求。 [(392)](#_391_2) 但內務人民委員會有關國內不滿的報告是不可靠的（“反蘇情緒和動亂威脅”往往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炮制的，以便獲得預算和人員的增加）；斯大林或其他領導人是否當真，又是不明確的。不管如何，這些報告并沒傾向于認為1937年的國內威脅要大于先前年代。從1928到1932年，也有很多不滿和反對的報告，但那些年份的國家處決遠遠比不上1937至1938年的強度。

還有其他歷史學家建議，最好把大恐怖理解為“幾個相關但分離的現象”，每一個都能自作解釋，而不是單一事件的組成部分。 [(393)](#_391_2) 事實上，大恐怖真是不同元素組成的復合物：針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做秀大公審”、政治精英的清洗、城市中的大規模逮捕、“富農行動”，以及針對少數族裔的“國家行動”。分析大恐怖的各個組成部分可能有好處，但不爭的事實是，它們都在同時開始，同時終結。這顯示，它們只是統一運動中的部件，需要解釋的就是這個統一運動。

要了解整體的大恐怖，關鍵也許在于斯大林對將臨戰爭的恐懼，以及他所感受的國際上對蘇聯的威脅。 [(394)](#_393_2) 希特勒的德國在1936年占領萊茵蘭，以及日本人占領滿洲里，讓斯大林確信蘇聯正在兩條戰線上面對軸心國的虎視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東京聯合起來，簽訂了反共產國際的協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隨后加入），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懼。他雖然繼續支持“集體安全”，但對蘇聯與西方聯合起來遏制軸心國，并沒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國家沒在西班牙干預，似乎指望以綏靖政策應付納粹德國；據說在斯大林看來，西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隊引向東方，引向蘇德戰爭，而不是在西方針鋒相對。到1937年，斯大林確信，蘇聯已與歐洲的法西斯聯盟和東方的日本處于戰爭的邊緣。蘇聯報刊通常描繪蘇維埃國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脅，又因法西斯在社會每一角落的滲透——“間諜和暗藏的敵人”——而變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訴作家羅曼·羅蘭：“我們來自資本主義各界的敵人正孜孜不倦，其滲透無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觀念——如同許多布爾什維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當初擊敗沙皇政權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會革命。他擔心，如果發生與納粹德國的戰爭，蘇維埃政權將面臨類似的內亂。出于同樣的考慮，西班牙內戰更加劇了他的恐懼。斯大林密切關注西班牙的沖突，視之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未來歐洲戰爭的有效的劇情概要”（他的大多數顧問都持同一見解）。 [(395)](#_394_2) 斯大林將1936年西班牙共和國的軍事失敗，歸罪于西班牙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團體之間的內訌，因而得出結論：在反法西斯戰爭爆發之前，亟需在蘇聯進行一次政治鎮壓，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縱隊、法西斯間諜和敵人”，而是所有的潛在反對力量。

現在看來，對“敵人”的偏執性恐懼本來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這種恐懼又因妻子娜杰日達1932年的自殺、斯大林聲稱視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強化。他女兒斯維特蘭娜寫道：“也許，斯大林從來就不太信任別人。自他們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 [[2]](#_1_16) 斯大林將基洛夫的遇刺，歸罪于季諾維也夫派（列寧格勒的反對派），盡管沒有證據，他仍下令逮捕列寧格勒前主管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終被裁定犯了“道德上的共謀罪”，所依據的理由是，他們造就了反對派氣氛，從而鼓勵了對蘇維埃領導人的暗殺。謀殺后的兩個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寧格勒親自督辦調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諾維也夫派，其中大多數被流放到遙遠的定居地。20世紀20年代，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參與聯合反對派，與托洛茨基結盟來反對斯大林，此時雙雙被捕，季諾維也夫被判處10年監禁，加米涅夫被判處5年。一旦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員顯得手軟，不愿逮捕這么多黨的忠誠追隨者，斯大林便把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雅戈達召來，告誡他要提高警惕，否則就“會把你也拉下馬”。雅戈達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進一步的削弱。其時，負責黨內清洗的葉若夫聲稱，破獲了一個“外國間諜和恐怖分子”網絡，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組織的，已鉆進克里姆林宮的心臟，而內務人民委員會對此卻茫然不知。斯大林終于對雅戈達失去耐心，讓葉若夫取而代之。葉若夫是一個殘酷的劊子手，毫無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場合捏造“反革命陰謀和間諜圈子”的證據，以滿足斯大林的偏執狂。好幾年來，葉若夫一直在推銷這一理論：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執行托洛茨基從國外發來的命令，策劃了對基洛夫、斯大林以及黨領導其他成員的謀殺。以此為基礎，斯大林重啟了對刺殺基洛夫一案的調查。1936年8月，以叛國罪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黨干部。結果，他們與涉案的另外160人全都被判處死刑。 [(396)](#_394_2)

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審”，其目的是為了揭露和鏟除由前反對派組織的“間諜和恐怖分子”網絡。1937年1月的第二批做秀公審，見證了重工業副人民委員格奧爾基·皮亞特科夫、卡爾·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業破壞和間諜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級軍事指揮官，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副國防人民委員）、烏博列維奇將軍（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和亞基爾將軍（基輔軍區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國和間諜罪，在鏡頭前接受公審。據稱，他們獲得德國和日本的資助，結果均在同一天被槍決。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審發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達、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級干部被判處槍決，罪名是參與了季諾維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暗殺蘇聯領導人、破壞經濟并充當法西斯勢力的間諜。據推測，因為有雅戈達的卷入，所以需要歷時這么長久才予以揭發歸案。

領導人一旦被捕，他的社會圈子里的每一個人都變成嫌疑人物。典型的外省城鎮掌控在一幫資深官員的手中——地區黨主管、警察局局長、廠長、集體農莊主席、監獄長和地方蘇維埃主席——他們在城鎮機構中，又各有自己的后臺和依附者的網絡。只要他們的權力圈子完好無損，這些人便官官相護。只要有人被捕，內務人民委員會查出他們之間的牽連，其圈子里的所有成員，乃至他們的下屬，都逃不脫身陷囹圄的厄運。例如，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在烏克蘭東部拘捕了尼科波爾城的黨委書記：

隨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爾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爾軍區司令也落入獵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檢察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爾城的蘇維埃主席……當地的銀行、報紙、商業機構都被“清洗”……甚至禍及共用公寓委員會的經理、消防隊長、儲蓄機構負責人…… [(397)](#_396____S__Allilueva__Twenty_Let)

領導階層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級黨組織、蘇維埃機構和社會各界。據估計，從1937到1938年，遭到處決或監禁的黨員有116885人。黨內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為屬下隨時準備揭發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102人遭槍決，5人自殺；此外，還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獄。對紅軍的摧殘更為徹底：在767名高級軍官中（旅長以及更高軍銜的），412人被處決，29人死于監獄，3人自殺，59人羈留在監獄。 [(398)](#_396_2)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絕大多數是完全無辜的。但在戰爭時期，發動一場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敵人”。在斯大林看來，為了鏟除這些“暗藏的敵人”，逮捕數百萬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說過，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敵人，“那也是一個好結果”。證據只是次要的考慮。據其時擔任莫斯科黨領導的赫魯曉夫稱，斯大林曾說：“如果報告[舉報]中有10%的事實，我們就應將整個報告當做是真實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每個人都知道，為了抓住一名間諜，斯大林愿意逮捕數千人。他們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額，就會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煩。葉若夫警告他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手下：“太多好過不夠，如果[在一次行動中]多殺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 [(399)](#_398____V__Rogovin__Partiia_rass)

對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來說，大恐怖是在為未來戰爭做準備。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至死都在捍衛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釋，“斯大林只是想萬無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單”——領導階層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會在戰爭中制造麻煩的“動搖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敵人”。莫洛托夫承認確有失誤，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領導畏縮不前，允許內訌，我們將在戰爭中遭受更大損失——也許會被打敗”。

我們有義務確保戰爭爆發后沒有第五縱隊的存在。要說這些人都是間諜，令人懷疑。但……更重要的是，在決定性的時刻，不需要依賴他們……如果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在戰爭時期加入反對派，就會有殘酷的斗爭和巨大的損失……每個人都會遭到摧毀！

在20世紀80年代，卡岡諾維奇以同樣的理由來為大恐怖辯護：領導階層已意識到，戰爭即將來臨，國家需要“抽干沼澤（boloto）”——即“摧毀不可靠者和動搖者”。這并不是卡岡諾維奇的馬后炮。1938年6月，他就告訴頓巴斯黨組織，戰爭威脅使大鎮壓成為必須，如果“內部敵人和間諜”沒在“大清洗”中遭到摧毀，“國家可能早已陷入戰爭的泥沼”。 [(400)](#_399____Istochnik__1994__no__3)

“大恐怖”由克里姆林宮統籌，由內務人民委員會具體執行，以一系列群眾運動的形式席卷整個社會，旨在清洗“反社會分子”和戰爭時可能的“反蘇維埃分子”。這些群眾運動中最大的一次是臭名昭著的第00447號命令，即“富農行動”。從1937到1938年，它占了一半的逮捕人數（669929人）和過半的處決人數（376202人）。幾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農”及其家人，他們剛剛服完標準的8年徒刑，從“特殊定居地”和古拉格勞改營歸來。那些徒刑是1929至1930年的集體化運動中判處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動”。斯大林擔心，不滿和怨恨的“富農”會在各地泛濫成災，一旦發生戰爭，可能構成威脅。他特別關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報告，聲稱保皇黨組織俄羅斯軍事總盟（ROVS）正在策劃“富農起義”，以配合日本對西伯利亞的入侵。數萬被指控的俄羅斯軍事總盟成員在“富農行動”中遭到槍決，往往并不算在官方統計之中（例如，阿爾泰內務人民委員會曾針對他們在1937年槍決22108名軍事總盟成員，呈送過一份單獨報告）。“富農行動”又與地方蘇維埃的大批清洗直接相連，這在邊境地區特別殘酷，如西部各省、頓巴斯、西伯利亞的西部，因為政權最不放心那里的居民。 [(401)](#_399_2)

另有大規模的“全國行動”，驅逐和處決蘇維埃的少數民族——被視作戰爭爆發時的潛在“間諜”：德裔、波蘭裔、芬蘭裔、拉脫維亞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朝鮮人、中國人，甚至從哈爾濱返國的俄羅斯人。俄羅斯人的返國是在1935年之后，其時，日本1932年扶植建立的偽滿洲國，從蘇聯手中買下了中東鐵路。斯大林對蘇維埃西部地區的波蘭裔尤為猜疑，這始于俄國內戰時期波蘭入侵烏克蘭，紅軍隨即對華沙發起反攻，卻一敗涂地——這一軍事失敗給斯大林帶來羞辱，因為他就是前線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斯大林把蘇維埃波蘭裔（包括他認為是波蘭裔的很多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當做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半法西斯”波蘭的第五縱隊。蘇聯領導人擔心，波蘭會與納粹德國聯合起來，向蘇聯再一次發起進攻。1937年8月推出的第00485號命令，就是針對波蘭裔的“國家行動”。結果，截至1938年11月，近14萬人或遭槍決，或被送去勞改營。 [(402)](#_401____Tragediia_sovetskoi_dere)

從1937到1938年，許多人消失，特別是在都市的黨和知識分子的圈子里時有發生。逮捕似乎是隨意的，黑色警車游蕩在深夜的街道，任何人好像都有可能被抓。監獄里的囚犯是全國人口的橫截面；大多數囚犯不知道自己為何入獄。到1938年秋季，幾乎每一戶人家，或自己失去親人，或認識親人被押的朋友。人們總是在憂懼深夜的敲門聲，睡也睡不好，一聽到車子停下就會驚醒。他們躺在床上，靜聽腳步聲漸行漸遠，或走上樓梯，或移至走廊上的別家，知道不速之客不是來找自己的，才敢重新睡去。創辦列寧格勒木偶劇院的柳博芙·沙波利娜，在1937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日常生活的快樂。我早晨醒來時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謝上帝，昨晚沒事。他們不會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卻沒人知曉。這就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羔羊——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理由被捕，流放去天曉得的鬼地方。我很幸運，心里一片平靜，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數人，卻生活在徹頭徹尾的恐怖之中。 [(403)](#_402_2)

奧西普的兒子弗拉基米爾·皮亞特尼茨基，如此回憶父親被捕之前河堤大樓的氣氛：

這座陰郁的大樓內，有500多套黨的精英干部的公寓，逮捕的事經常發生。我老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玩，親眼目睹過好幾次。晚上，天黑了，大樓變得冷清、沉寂。居民們像是在守候災難，都躲了起來。突然，幾輛車子沖進院子，身穿制服或便衣的男子跳出來，走向樓梯口——他們中每個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看到幾套公寓的燈亮了。我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即可算出誰是逮捕對象。如果公寓里所有的燈都亮了，這意味著正在抄家。那些時日，許多人擔心被捕，但不知道何時輪到自己。 [(404)](#_402_2)

大家都在等待自己的噩運。許多人拾掇了一個小包，放在床邊，等待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人敲門，隨時就可上路。這種消極心態是大恐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其實有很多逃避的機會——逃離城市，再在黑市上購買假身份，那是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因為內務人民委員會不善于追捕流竄的人口。 [(405)](#_403_2) 俄羅斯人本有逃離國家迫害的悠久傳統——從老信徒到逃亡的農奴——這也是數百萬農民逃離集體農莊和“特殊定居地”的戰術。但城市居民大多留在原地，沒作任何抵抗，只是束手待斃。

被捕于1943年的電影編劇瓦萊里·福雷德（1922—1998），回首往事，認為大多數人因恐懼而陷入癱瘓。他們相信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法力無處不在，像是處于催眠狀態，實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我在人類歷史上想不出類似的情況，只好去動物界尋找例子：震懾于蟒蛇的兔子……我們都好比是兔子，承認蟒蛇吞下我們的權利。不管是誰，一旦處于這樣的注視下，便會噤若寒蟬，嘴里塞著對命運的無奈。 [(406)](#_404_2)

維亞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講述了他父親深夜聽到汽車在住宅外面停下時的恐慌——他父親只是列寧格勒的一名工人。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覺——等候汽車發動機的聲響。如果確有，他就會在床上坐起不動，一副嚇壞了的模樣。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卻能嗅到他的恐懼、手心捏著汗，能感覺得到他渾身顫抖。他聽到車聲，總是說“他們來找我了”。他確信，自己將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罵布爾什維克。他聽到發動機熄火和車門關閉聲，就會從床上爬起來，在恐慌中摸索自以為最需要的東西。這些物件始終放在床邊，以備“他們”的到來。我記得放在床邊的有面包干，他最擔心餓肚子。很多個夜晚，父親幾乎徹夜不眠——等候一輛始終沒有出現的汽車。 [(407)](#_405_2)

面臨逮捕的布爾什維克精英顯得特別消極被動，他們中的大多數接受黨在思想上的灌輸。向黨證明自己清白的深層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試圖抵制的想法。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是喀山一名資深黨干部的妻子，自己也是黨的積極分子。丈夫被捕后，她也失去工作，無時不在擔心自己被捕。金茲伯格回憶，她婆婆是一個“簡單的文盲農婦，出生于農奴制時代，卻很有深刻的哲理，談到生活問題時往往一針見血，切中要害”。這個老農婦勸她逃走：

“常言道，‘眼不見，心不煩’。你跑得越遠越好，為什么不去我們的老家波克洛夫斯科耶村莊呢？”……

“老祖母呀，我做得到嗎？我怎么能放棄一切，孩子們、工作？”[金茲伯格回答]

“但他們已把你開除了。至于孩子嘛，跟我們在一起，是不會吃苦的。”

“但我必須向黨證明我的清白。我是一名共產黨人，怎么能逃避黨呢？” [(408)](#_406_2)

相信自己的清白，讓許多布爾什維克變得束手無策。他們設法說服自己，真正有罪的才會被捕，而自己的清白最終會提供保護的。艾萊娜·邦納回憶，她曾無意中聽到都是忠貞黨員的父母因親密朋友的被捕而在深夜交談。艾萊娜半夜醒來，非常焦慮，因為這一逮捕使她意識到：“快輪到我們的頭上了，劫數難逃，而且會來得很快。”

飯廳里漆黑一團，但父母房內仍有聲息。我走近他們的門口，能聽到母親在抽泣。然后，她開始講話，復又哭起來，我以前從沒見過她哭。她不斷重復“我的一生”，抽抽噎噎的……爸爸輕聲作答，但我聽不清。突然，她大聲喊出：“我從小就認識斯捷潘，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我認識他的時間是認識你的三倍。明白嗎？你明白嗎？”接下來只有嗚咽，還有嘎吱一聲，以及拖鞋走在地板上的聲響——爸爸已經起床。我從門口跳開，怕他出來。但他開始在房間內踱步——朝窗口五步，再朝床五步，好像一個鐘擺。他擦燃一根火柴，媽媽又開始講話：“告訴我，你信不信？你相信這個噩夢嗎？”她停止哭泣。“你相信，阿克斯他……你相信帕維爾他……修卡他……你相信他們都……”她只講半句，但意思已經很明顯。然后，她冷靜地輕聲說：“我知道，你其實也不信。”爸爸發出一種陌生且哀求的聲音：“但是，魯法―占恩[他對艾萊娜的母親露絲的昵稱]，我怎么敢不信呢？”他停頓一會，又說：“畢竟，他們還沒來逮捕你我。” [(409)](#_407_2)

還有其他布爾什維克，包括皮亞特尼茨基，如此獻身于共產主義信仰，以至于明明知道自己是無辜的，如果黨有要求，他們也愿意承認對他們的指控。 [[3]](#_2_16) 根據共產主義道德，被控危害黨的布爾什維克，應該悔改，跪下接受黨的判決。這也就是皮亞特尼茨基在被捕前夕所說的：如果黨需要有人作出犧牲，他愿意“愉快地承擔”。

許多布爾什維克讓家人為自己的可能被捕做好準備，盡力保護家人。卡馬河上的運輸官員彼得·波塔波夫，在1937年8月被捕的前幾天，讓家人去下諾夫哥羅德探親。他女兒回憶：“我們已有5年多沒有休過假，他感到前景有點不妙，為我們擔心，希望內務人民委員會來抓人時，我們正好不在。”摩爾曼斯克鐵路上的資深官員列夫·伊林，預先從列寧格勒的寬敞公寓搬至一座合作小公寓，以避免自己一旦被捕，家人必須與人分享生活空間的難題。他還讓從未外出工作的妻子先去紡織廠上班，保證以后能夠養活女兒。他懇求妻子與自己離婚，希望能因此脫嫌，逃脫一起被捕的噩運。但她拒絕了，視之為“可恥的背叛”。夫妻之間時常為此發生激烈的爭持，直到列夫被捕。 [(410)](#_408_2)

雙雙在1937年被捕的斯坦尼斯拉夫和瓦爾瓦拉·布德克維奇夫婦，試圖讓14歲的女兒瑪麗亞自力更生。他們訓練她自己外出購物，教她遇上父母被捕時一言不發，還強迫她閱讀報紙上的做秀公審，讓她懂得父母雙雙被捕的威脅意味著什么。瑪麗亞回憶：“我什么都懂。父親與圖哈切夫斯基走得很近，在總參謀部一起工作。我們大樓里都是軍人，一個個地被捕，所以我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瑪麗亞的父親7月8日被捕，母親的被捕是在7月14日。

那一夜，媽媽覺得他們會來抓人。我們坐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就我們倆，沒有安德烈[瑪麗亞的弟弟]。盡管媽媽知道我第二天早晨還有考試，依然到了午夜時分才對我說：“夜深了，你還是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瑪麗亞醒來發現母親已經不見了——她就在那個深夜被捕——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人員也搜過瑪麗亞的房間。在她的床頭，母親留下了告別的字條和一些零錢。 [(411)](#_409_2)

法學家伊利亞·斯拉溫在1937年11月5日晚上被捕，他沒寫內務人民委員會要的為古拉格勞工在白海運河“重新做人”正名的書。被捕當天，伊利亞還被叫到列寧格勒的黨部，接受法學院院長的任命——前院長剛剛被捕。斯拉溫得到一種解脫，他原先在期待最壞的結果，現在看來似乎獲救了。他心情愉快，回到家里。當天晚上，斯拉溫一家慶祝了依達的16歲生日。依達回憶：

媽媽在餐桌上擺滿美食。哥哥為我家墻報“哈利路亞”[斯拉溫家的宣傳布告欄]編出了特別的“生日版”，還兼任當晚的鋼琴師。我穿上講究的新衣，歡迎學校里的朋友……爸爸處在最佳狀態：活像一個小男孩，與我們一起玩耍，跟所有的女孩跳舞，喝了不少，甚至還唱起他最喜愛的歌曲《夜鶯》。

客人走后，伊利亞開始談論他來年暑假的計劃。“他希望我們全家好好聚聚，還談及一起去高加索和黑海度假。”

凌晨1點，內務人民委員會光臨。依達記得：

突然，明亮的燈光和陌生人的聲響把我驚醒，叫我迅速穿衣服。站在門口的是一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軍官，只稍稍移開目光，避開匆匆穿衣的我，然后把我帶去爸爸的辦公室。爸爸坐在房間中央的凳子上，驟然變得蒼老。媽媽、哥哥及他懷孕的妻子和我都坐在沙發上。清潔工站在門口，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軍官十分隨意，像是在自己家里……

我只記得那天晚上的一些點滴：

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軍官（我會永遠記住他的名字：貝伊戈爾），環顧父親的辦公室，不時發出感嘆：“你有這么多的書。我是一名學生，沒有這么多。”他翻看那些書，每當發現題詞，就會停下來以拳擊桌，大聲喝問：“這個作者是誰？”

然后出現一個幾乎哭笑不得的場景。貝伊戈爾叫我拿出我的德文課本，戲劇性地翻到課本尾部，那是一篇卡爾·拉狄克的文章（他顯然曾在許多家庭中，向我這樣年齡的孩子表演過此幕）。卡爾·拉狄克當時已被捕，但尚未判刑或在報刊上被列為“人民公敵”。貝伊戈爾故作姿態，將那幾頁撕下，用火柴點燃，裝成一名高尚的英雄，說：“謝天謝地，這個證據已被銷毀，帶走你爸爸時，我就不必把你也帶上。”我太害怕了，不敢作聲。隨即，父親打破沉默說：“謝謝你。”

除了這個多管閑事的貝伊戈爾，記憶中銘刻最深的是父親兀立的身影。我從未見過如此頹喪的他——徹底的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對自己承受的屈辱，好像漠不關心。他都不像自己本人了……我朝他看，他臉上全無表情。我的注視，他既沒看到，也無感受，只是坐在房間中央——紋絲不動，默不作聲。這是他——卻又不是他。

搜查持續了整整一夜，他們從辦公室走到飯廳，再到哥哥房間。從碗柜和玻璃書柜取出書籍和手稿，撕下的書頁狼藉滿地；還從箱子里翻出精心保存的家庭相冊，照片也散落一地。這些東西，他們大多拿走了，外加一臺照相機、一副雙筒望遠鏡（充當“間諜”的證據）和一臺打字機——父親寫所有文章時用的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機……

在這漫長的夜晚，他們在翻閱父親人生經歷的章節，父親在想什么？這足以摧毀他的信仰嗎？貝伊戈爾（一條微不足道的蠕蟲！）記錄他的黨員生涯細節，來充作犯罪證據，他會有怎樣的恐懼感？

搜查結束時已是早晨，一切都登記在冊，將被沒收。父親被帶到走廊，我們跟在后面，父母房間的門已經被封。他們叫爸爸穿好衣服，媽媽已為他準備了一只小箱[內含一副眼鏡、盥洗用品、手帕和100盧布的現金]。

然后，父親打破沉默說：“再見。”媽媽抱著他慟哭，父親撫摸她的頭，口中不斷重復：“別擔心，會弄清楚的。”



1937年，依達·斯拉溫（左）和她的父母

那個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對這個世界的和諧與意義的信念。在我們家里，父親曾是大家崇拜的對象。在我們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現在他倒下了，讓人感到整個世界似乎也已結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讓他看出我的恐懼。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軍官把爸爸帶向大門，我緊跟在后。突然，他回頭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覺到我內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著朝他撲去。他在我耳邊低聲說：“小鬼，我心愛的女兒，歷史上總會有錯誤的，但請記住——我們開創了一個偉大的事業。你要做一名優秀的共青團員。”

貝伊戈爾呵斥道：“安靜！”這時就有人走上前來，把我拉開了。

“告別了，我的親人，請相信正義……”——他本來還想說什么，但已被他們帶走，下了樓梯。 [(412)](#_410_2)

依達也可能被捕，這絕對不是內務人民委員會軍官的空洞威嚇。16歲的她，已經可以像成年人一樣遭到逮捕和監禁，甚至槍決。1935年，蘇維埃政府把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降至12歲——部分原因是為了威脅囚犯，如果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會被捕（當年的第二個法令，允許逮捕和監禁犯了危害國家罪的囚犯的親屬）。事實上，這無疑宣告了人質制度的建立。許多布爾什維克，在做秀公審之前的審訊中，都受到逮捕親人的威脅。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脅要處決他的兒子，于是同意在供詞上簽字，以換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個人保證。季諾維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萬·斯米爾諾夫在審訊期間，看到女兒受到警衛的粗暴對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頂住了殘酷的刑訊，等到16歲女兒被帶進房間，當著他的面遭人強奸時，才棄守投降。 [(413)](#_411____MSP__f__3__op__12__d__2)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審之前作了何種承諾，一旦這些老布爾什維克遭到處決，他就下令逮捕他們的許多親戚。加米涅夫的兒子1939年遭槍決（一個小兒子被送去孤兒院，改名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處刑事流放，1938年重審，1941年遭槍決。季諾維也夫之子1937年被槍決；他妹妹被送去沃爾庫塔勞改營，后來也被槍決。他另外三個姐妹、兩個外甥、一個外甥女、一個表弟、一個妹夫被送去勞改營，三個兄弟和一個侄子遭槍決。斯米爾諾夫的女兒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勞改營被槍決。在1936到1938年之間，幾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格殺。他們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亞歷山大、妹妹奧莉加、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兒子列夫和謝爾蓋，以及女兒季娜伊達（于1933年自殺）的兩位丈夫。 [(414)](#_412_2)

斯大林執著于懲罰敵人的親屬，也許是從格魯吉亞學來的。家族之間的仇殺，向來就是高加索地區政治的一部分。在布爾什維克精英中，家庭氏族與政治忠誠相互交織。婚姻造就聯盟，如果與反對派或敵人有血緣關系，也會葬送前途。斯大林認為，家庭應該為其個別成員的行為承擔集體的責任。如果某人作為“人民公敵”被捕，他的妻子自動有罪，除非她奮起揭發。因為大家假定她與丈夫持有相同的觀點，還會予以保護，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認為，鎮壓親屬是一項必要措施，可從社會中鏟除不滿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問及為何要迫害斯大林“敵人”的家屬，他解釋說：“他們必須被隔離開來，不然，就會四下傳布各式的牢騷和投訴，整個社會將因此變得士氣低落。” [(415)](#_413_2)

朱莉婭·皮亞特尼茨卡婭活在對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奧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開始寫日記，以傾吐自己的焦慮。現在除了恐懼，她還須應付一連串的日常麻煩。她的小兒子弗拉基米爾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亞的少先隊阿爾捷克營，現在需要領回。朱莉婭擔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沒有安排好親友收養他，內務人民委員就會把他送進孤兒院。她的大兒子伊戈爾剛滿16歲，在父親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團內有所作為，現在一切都變了，更有被捕的危險。朱莉婭一方面試圖應付伊戈爾的復雜情緒——對父親的憤怒和對自己不幸際遇的悲痛、失望、羞恥——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類似的困惑。朱莉婭在7月11日的日記中注意到“伊戈爾整天都在床上看書”。

關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為，他不發一言。有時，我會表述怨恨和惡毒的想法，但他作為一名共青團員，不允許我有此類批評，有時還會說：“媽媽，你這樣做，叫我實在忍受不了，我可能會把你殺死。” [(416)](#_414_2)

朱莉婭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許多妻子一樣，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計，如此受傷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沒時間思忖自身的安危。 [(417)](#_415____Getty_and_Naumov__The_Ro) 朱莉婭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貴重物品，現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資，實在養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兩個兒子，年邁的父親、繼母和他們無業的女兒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師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湯和麥片粥。她曾是資深布爾什維克的妻子，習慣于特權生活，發現極難適應貧困。她一肚子苦水，顧影自憐，甚至去黨部抱怨，卻被告知應該鍛煉自己適應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業余時間，她在市內尋找薪資較高的工作，但都無果而終。鋼鐵建設托拉斯不需要“專家”（那里的官員告訴朱莉婭：“我們不是法西斯德國。”），甚至布提爾基監獄也不需要“她那一種”員工（即“敵人”的妻子）。朱莉婭在日記中寫道：“工廠官員看都不看我的資料，也不想問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說‘沒有’。”同事也拒絕幫助，朱莉婭寫道：“每個人都躲著我，而那時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絲一毫的關心或忠告。”同時，家里情況不斷惡化，緊張氣氛日益升溫。朱莉婭同父異母的妹妹和繼母，經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將之歸罪于奧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婭趕出公寓。幾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與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亞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說：“如果不能解救每一個人，就讓那些能夠自救的另謀出路吧。”朱莉婭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但她對此表示懷疑：

這真是可恥，整整7年，他們受皮亞特尼茨基的供養，一起住在舒適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還是一所好學校。一旦我們遇上了麻煩，他們就想盡快地逃離我和我的孩子們——逃離我們的不幸。 [(418)](#_415_2)

他們搬出去沒多久，朱莉婭和兒子們就被逐出，搬到樓下較小的公寓，與一戶亞美尼亞布爾什維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時就被捕了。朱莉婭感到絕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潰，甚至想到自殺。在絕望之中，她去拜訪河堤大樓中唯一不怕與她說話的鄰居，傾訴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訴她，不必為自己感到難過，好多官員現在住著更小的房間。此外，老太太還說，沒有皮亞特尼茨基，朱莉婭可以過得更好，因為“你倆本來就相處得不融洽”。現在，她可以只為自己和兒子考慮，不再為丈夫擔驚受怕。朱莉婭事后反思這段話，當夜在日記中寫道：“這倒是真的，他沒花多少時間與我們在一起，總是在工作。那些來占我們便宜的人——幾乎每一個人——都看得出，我們之間相處得并不好。” [(419)](#_417_2) 在隨后一年中，朱莉婭對丈夫還產生了其他疑惑。

二

作家米哈伊爾·普里謝維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記寫道：

我們俄羅斯人，就像大雪壓頂的樹木，不堪生存的重負，亟想與人談談心事，實在憋不住了。但一旦開口，遇上第三者偷聽——他馬上就灰飛煙滅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談話可以給人帶來極大的麻煩，所以與朋友達成共識，刻意保持沉默。我親愛的朋友……很高興在擁擠的[火車]車廂里發現我，等到座位空出，就來與我同坐。想說點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覺得很不方便。他變得緊張兮兮，每次準備發言，就先看看我們這一排的人，再看看對面一排的人，到頭來卻只是說：“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這樣，整整兩個小時，我們從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爾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

“是的，格奧爾基·愛德華多維奇。” [(420)](#_418____Golgofa__pp__31__34__35)

即使在蘇維埃時期的最好年月，交談也是危險的。到了大恐怖時期，幾句話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遠消失，舉報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薩克·巴貝爾曾經說過：“如今，一個人只能與妻子講心里話——晚上，把毯子拉過來蒙上頭。”普里謝維恩在日記中寫道：在朋友當中，他無須擔心惡意謠諑或舉報、可以暢所欲言的，總共僅有“兩三個老頭”。 [(421)](#_418_2)

大恐怖讓蘇維埃人民閉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澤達·泰西娜的父親于1936年被捕，她回憶道：“我們從小就學會了閉嘴。”

“舌頭會給你帶來麻煩”——這是大人一直叮囑我們孩子的，我們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發表意見。媽媽常說，兩人之中必有一名舉報人。我們害怕鄰居，特別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講話，也不敢為自己辯護，或是在公共場合發言。我總是讓步，沒有一句抱怨。這已滲入我的性格，都與我從小受的教育有關。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會怕得發抖。 [(422)](#_420_2)

瑪麗亞·德羅茲多娃在特維爾省嚴守宗教戒律的農民家庭中長大。1930年，德羅茲多夫一家逃離自己村莊的集體化，使用假證件，搬至列寧格勒附近的紅村。瑪麗亞的父親在家具廠上班，母親安娜在醫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識字的農婦，深信布爾什維克就是反對基督者，他們的特工能聽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門，也不敢在自己房間之外講話。當她父親——一個教堂看門人——于1937年被捕時，安娜更被嚇得陷于癱瘓。她不愿出門，害怕講話，擔心鄰居偷聽。晚上，她不敢開燈，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廁所，擔心自己用作手紙的報紙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 [(423)](#_421_2)

熟人之間達成一個默契，大家均不談政治。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會受警方的脅迫來匯報這樣的談話，當做熟人“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在這種氣氛之下，主動與最親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討論政治，只會引起懷疑，反被視作舉報人，或尋釁滋事者。

維拉·圖爾金娜記得，她的朋友和鄰居均以沉默來回應她父親的被捕。其時，她的父親擔任彼爾姆省法院主席。

對面房子住著三個女孩，她們的父親也已被捕……我們大家盡量避免這一話題，我們所說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親就是因為“嘴快”而受害——這是我們家人的理解——他過于坦率，直言不諱，說得太多，超越他應該說的。我們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這讓我們自己更為沉默。 [(424)](#_421_2)

沉默的堅忍是失去朋友和親戚之后的常見反應。艾瑪·格施泰因在1937年寫到詩人曼德爾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業已死去的朋友。那個時代，沒人提……只有眼淚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 [(425)](#_422_2)

許多家庭的主調是靜默。人們避而不談被捕的親屬，或銷毀那些親屬的來信，或不讓孩子看到，希望以此來獲得保護。即使在家里，談論這一類親戚也是危險的，即所謂的“隔墻有耳”。丈夫謝爾蓋·克魯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納斯塔西婭和兩個孩子搬去一個共用公寓，其鄰居供職于內務人民委員會，將兩家隔開的只有一道薄墻。塔蒂亞娜·克魯格洛夫回憶：“能聽到一切聲響。他們能聽到我們打噴嚏，甚至能聽到我們最低聲的耳語。媽媽總叫我們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們不敢講話，因為她們相信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鄰居一直在匯報她們的一言一行（事實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懼，為了想要安靜、聽話的鄰居）。 [(426)](#_423_2)

父親被捕后，納塔利婭·丹尼洛娃跟母親回娘家住，即奧索爾金家。在新的住處，涉及父親的談話都是被禁的。奧索爾金家是個貴族家庭，好幾名成員已經入獄，包括納塔利婭的姨媽馬尼婭的丈夫。馬尼婭個性堅強，掌管全家的一切。納塔利婭回憶：“她敵視我的父親，也許因為他是農民和社會主義者。她似乎覺得，他是罪有應得，被捕也是活該，而且以自己的行為給家庭帶來麻煩。她將這一觀點強加于我們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權利談論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異議，只得竊竊私語。” [(427)](#_424_2)

家庭逐漸生成了談話的特殊規則。他們學會運用迂回的語言，以暗示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外人、鄰居、傭工即使聽到，也會不得要領。艾瑪·格施泰因回憶起堂哥的妻子瑪格麗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資格的反對派，曾來莫斯科與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時間。有一天，瑪格麗塔在談論反對斯大林的毫無意義，正講到句子的一半（“當然，我們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門開了，我們的女傭波利亞走進餐廳。我打了一個寒戰，嚇壞了。但瑪格麗塔絲毫不改她的慵懶姿態，以完全相同的語調和語音，接下去說：“所以葉莫奇卡，趕快去買絲綢，不要猶豫。你做得那么辛苦，應該給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傭離開后，瑪格麗塔解釋說，永遠不能給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縮頭縮腦，也無須一臉不安、環顧左右。” [(428)](#_425_2)

天性健談的孩子特別危險。許多父母認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東尼娜·莫伊謝耶娃1927年出生于薩拉托夫省的農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劃為“富農”，流放至烏拉爾的“特殊定居地”。他們在1936年返回彼爾姆附近的丘索沃鎮，安東尼娜的母親鄭重告誡孩子們：

她總是說：“你們不能發表意見，否則就會被抓起來。”我們排隊領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對我們說：“你們不準發表意見，政府沒有面包，不關你們的事。”媽媽還告誡我們，發表意見是一種罪過。每當我們出門，她總會說：“管住你的嘴！” [(429)](#_426_2)

維爾格爾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長大，他9歲時，即1938年，父親在一次“國家行動”中被捕。據他回憶，母親和祖父母并沒提供具體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應對，但他能感受到恐懼的氛圍：

我下意識地明白，必須保持緘默，不可講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們乘坐擁擠的電車，心知肚明，必須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說我在窗外看到的東西……我也覺得，每個人都在這樣做。所以，像電車那樣的公共場所，總是很安靜。如果開口，也只講一些瑣碎小事，例如去了何處購物。從來不談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嚴肅話題。 [(430)](#_427_2)

奧克薩娜·戈洛夫尼亞記得一次與父親阿納托利——電影攝影師——同乘一輛擁擠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亞叔叔”（電影導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邊低語：“你在公共場合，千萬不要說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轉而大聲說：“看那些小餃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邊偷聽！爸爸的教訓對我的人生大有裨益。 [(431)](#_428_2)

普里謝維恩在1937年的日記中寫道，人們變得如此善于隱藏自己發言中的含義，可能會喪失講真話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處世之道：不能說任何東西，也不能與任何人交談。行為的奧秘在于：什么也不說，卻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傳遞該意思的又是誰。你必須鏟除“講心里話”的任何殘痕。 [(432)](#_429_2)

阿爾卡季·曼科夫在日記中提到類似的現象：

談論公眾情緒是毫無意義的。只有鴉雀無聲，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人們在竊竊私語，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場合表達意見的，都是醉鬼。 [(433)](#_431____GFA__O__Golovnia___Dom_n)

人們越來越趨于內向，社會領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縮小。普里謝維恩在10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人們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傾訴衷腸。”社會正在變成一個耳語者的社會：

社會低層的廣大民眾，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語。有些人甚至沒有任何想法，無需耳語；對他們來說，“一切本該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獨中自言自語，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還有不少人，學會了保持絕對的沉默……就像躺在墳墓里一樣。 [(434)](#_432____Prishvin___Dnevnik_1937)

隨著真實溝通的結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個社會。人們戴上公共場合的面具，隱瞞真實的自我。表面上，他們符合蘇維埃正確行為的公共規范，內心里，卻躲進私人思想的領域，不為公眾視覺所穿透。在這種氛圍中，恐懼和恐怖愈益增長。沒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設，外表是正常蘇聯公民的人，實質上可能是間諜或敵人。以這個假設為基礎，揭發舉報“暗藏的敵人”于是變得可信，不僅對普通公眾來說是這樣，在同事、鄰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們只好在真實的私人世界中尋求避難所，還有些人在大恐怖時期開始寫日記。盡管有各種各樣的風險，寫日記能開拓出一個不受解剖的私人領域，也能在禍從口出的時期傾訴自己的疑慮和恐懼。 [(435)](#_433____A__Man__kov__Dnevniki_tr) 作家普里謝維恩在日記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懼。1936年，他在新年晚會上作了尖銳的評論，受到作家協會官員的攻擊，他擔心會失去人身自由。他寫道：“我非常害怕，這些話會被歸檔，歸檔人又是監視作家普里謝維恩品行的舉報人。”普里謝維恩由此而撤出公眾領域，退入自己的日記世界。他寫日記用細小的草體，即便用放大鏡也難以辨認，為的就是預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對普里謝維恩來說，他的日記是“對個性的肯定”——成為一個伸展內心自由、暢訴衷腸的場所。普里謝維恩若有所思地寫道：“一種是為自己寫日記，挖掘自己的內心，與自己交談；另一種是以寫日記參與社會，秘密表述自己對社會的看法。” [(436)](#_434_2) 就普里謝維恩而言，這兩種功能都在發揮作用。他的日記充滿了異議的思考，所針對的有斯大林、蘇維埃大眾文化的惡劣影響，以及個人精神的不屈不撓。

1926年，劇作家亞歷山大·阿夫爾諾戈諾夫開始寫日記，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評，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產主義覺悟的想法。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與當?局發生了沖突。他的無產階級戲劇的心理視角，不再能獲得文學當局的青睞，此時占據主導地位的變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他的戲劇《謊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擊，認為劇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業的共產主義正面英雄。他所屬的文學組——以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前主席利奧波德·阿韋爾巴赫為首——被說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學代理人”，正在蓄謀推翻蘇維埃政權。1937年春天，阿夫爾諾戈諾夫被開除出黨，又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爾基諾地區的鄉間別墅，與妻子女兒過著幾乎完全隱居的生活，不與任何人說話。老朋友紛紛與他劃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車上無意中聽到兩名軍官的對話，津津樂道于“日本間諜阿韋爾巴赫”終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爾諾戈諾夫”正在監獄候審。阿夫爾諾戈諾夫日益收縮進自己的內心世界，他的日記也變了樣。他依舊批評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試圖成為更純潔的共產主義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覺，更頻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記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難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開日記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筆寫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覺得很有必要與人談論正在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我對溝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記本中實現，因為沒人愿意與我交談。 [(437)](#_435_2)

1937年12月，葉夫根尼婭（熱尼婭）·葉萬古洛娃開始寫日記。那一年她父母雙雙被捕，日記本成為她傾訴衷腸的場所，幫助維持了她所謂的“內心交談”，對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雙親。她在扉頁上寫道：“有一天，我的親人會讀到這本日記。這一熾烈的愿望不會離我而去，所以我必須盡量使之成為現實。”葉萬古洛娃是列寧格勒技術學院的學生，她擔心自我將泯沒于學院的集體生活，所以日益看重與自我相連的日記。她在1938年3月8日寫道：“也許我的表述不夠正確。我內心的自我并沒消失——人格的內涵永遠不會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認為，自我個性的表達，需要通過與他人的真摯溝通——但現實生活中又沒有。同學們把她當做“人民公敵”的女兒，不予信任；她所擁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記本。她在1939年12月寫道：“有時，除了這本沉默的日記，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讓我傾訴所有的痛苦。” [(438)](#_436_2)

像葉萬古洛娃一樣，阿爾卡季·曼科夫也渴望與他人的溝通。他決定將自己的日記，展示給他在列寧格勒公共圖書館上課的同學。曼科夫的日記充滿了反蘇維埃思想，卻披露給一個自己不很熟悉的人，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為，幾近愚蠢。他在日記中承認，此舉源于“孤獨，在這無窮盡的孤獨中，我每天鬼混度日”。 [(439)](#_437_2)

普里謝維恩也屈服于與人溝通的誘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幫他找一名秘書，協助他編輯日記。他意識到，“讓陌生人走進我的實驗室，了解我的全部”，該有多危險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噩夢：他在穿越一個大廣場，突然丟了帽子，覺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詢問帽子時才突然想起，“曾讓一個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細節，失掉帽子的掩飾無疑讓自己曝了光”，這些分析都一一記在日記中。幾天后，前來面談的女子抵達普里謝維恩的住所，聽聞要整理她不認識的人的日記，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議，開始工作之前，兩人應先了解彼此。他們在一起談了整整8個小時，中間都沒有休息，之后很快墜入愛河，一年之內結為夫婦。 [(440)](#_437_2)

三

舉報人無處不在——工廠、學校、辦公室、公共場所和共用公寓。據估計，在大恐怖的高潮時期，數百萬人在舉報他們的同事、朋友和鄰居。但很難得到精確的數字，因為只有零星的數據和傳聞的證據。據一位資深警官說，蘇維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舉報人。另一人聲稱，經常性的舉報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5%（普遍的看法是比這個比率更高）。監視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懸殊較大。據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前官員稱，在管轄嚴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戶家庭中至少有一名舉報人。相比之下，84萬人的哈爾科夫，僅有50名舉報人（每16800人有一名舉報人）。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古比雪夫市也許更能代表整個蘇聯：1938年，40萬居民當中，警方聲稱有1000個舉報人。 [(441)](#_438_2) 這個數字只代表警方經常使用和獎勵（包括金錢、就業、住房、特殊配給和免受拘捕）的注冊舉報人，并不包括數百萬在社會每一角落充當警方耳目的“可靠分子”（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人、學生積極分子、看守員、門衛等）。 [(442)](#_441_2) 警方也不計算每天收到的匯報和舉報——那都不是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動要求的——使警察國家如此強大的，正是那些自發行為。每個人都知道，“忠誠的蘇維埃公民”應該報告所聽到的可疑交談，“缺乏警惕”所招致的處罰迫使很多人參與此舉。

舉報人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質獎勵、政治信仰或是對受害者的憎恨；一類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脅或因幫助被拘親人的承諾而身陷困境。要譴責第二類舉報人很難，很多人發現自己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壓力。

1943年，作家西蒙諾夫的文學院前同學“X”前來拜訪。他在自己父親被捕后就受到將被文學院開除的威脅，除非他同意匯報所聽到的同學的交談。從1937年起，“X”就成為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舉報人。但他心懷內疚和悔恨，所以來找西蒙諾夫，透露自己曾經匯報他們之間的交談。西蒙諾夫說，“X”真是“悔恨交加”。他興許還有點懼怕，因為到1943年，西蒙諾夫已成為著名作家，與克里姆林宮關系良好，可能已經獲悉前同學的匯報。“X”告訴西蒙諾夫，如果有人因他的舉報而承受苦難，他寧可自殺。他還解釋，曾經盡可能讓他的匯報避重就輕，但仍覺得這種行為 “使他的生活不堪忍受”。 [(443)](#_441_2)

沃爾夫岡·萊昂哈德回想起1939年與一位同學的一次碰面。他一直認為，可與這位女孩進行開誠布公的交談。他們會一起去莫斯科的公園散步，討論其時重要的政治話題。她有一天承認，自己屈服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壓力，正在匯報同學的言論。但她感到悲哀，備受良心的責備，所以想預作警告，雖然還沒被要求匯報萊昂哈德的言論，但最好以后兩人不再見面。 [(444)](#_442_2)

瓦萊里·福雷德回憶了自己如何在1941年被招募為舉報人。他是共青團員，在蘇聯國家電影學院（VGIK）學習。其時，該學院從莫斯科疏散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當地的糧食供給形勢非常緊張，福雷德涉入一個偽造配給卡的小騙局。一天，他被叫去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室。審訊員對他的配給卡把戲了如指掌，隨即警告他，除非他同意舉報同學，證明自己是“蘇維埃人”，否則將被逐出共青團和電影學院。他在整夜的審訊中受到暴力和公審的威脅，最終低頭，簽署了愿意配合的協議。審訊員馬上笑逐顏開，握起他的手以示友好，還宣稱他的配給卡把戲不會再有麻煩——事實上可以依然如故——并給了他一個求援的特殊電話號碼，以應付可能的警方行動。他返回宿舍，泣不成聲，整整三天無法入睡或進食。最后，他只匯報了三位學生，只是普通情況，并無具體的犯罪事實。收到這些匯報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軍官身材矮小、滿嘴金牙，頗不滿意。1943年，蘇聯國家電影學院遷回莫斯科，福雷德才得以逃脫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懲罰。 [(445)](#_443____K__Simonov__Glazami_chel)

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成為舉報人時只有17歲。她出生于奧西波韋齊鎮的波蘭貴族家庭，離白俄羅斯的明斯克不遠。父母在1917年革命后成為農民，又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作為“富農”被流放去了北方的科米地區。1937年，全家返回奧西波韋齊鎮，又在針對波裔的“國家行動”中再次被捕，流放到彼爾姆附近的“特殊定居地”。索菲亞決定逃走，她解釋說：“我必須逃離，給自己一個機會。”索菲亞進了一所工廠技校就讀——獲得無產階級出身的最快途徑——然后進入庫季姆卡城的醫學院，位于烏拉爾，離彼爾姆不遠。沒人問她有關“富農”的問題，甚至都沒查看她的護照。其實，她根本就沒有護照。6個月后，她被叫去內務人民委員會辦公室。索菲亞回憶：“我以為他們要把我關進監獄，因為我是一名逃犯。”結果她被告知，如果不想因隱瞞社會出身而被醫學院開除，必須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她的任務是與同學們談論政治事件，然后匯報他們所說的一切，索菲亞因此而領到了自己的護照。由于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保護，她從醫學院畢業，在彼爾姆的救護服務中心享有成功的職業生涯。她回顧往事，并沒為自己的行為自責，即使她很清楚自己的匯報導致了許多學生被捕。她認為，自己的行為只是“富農”女兒在斯大林時代謀求生存的必需代價。索菲亞嫁給了內務人民委員會一名資深軍官的兒子。在孩子們成長之時，她閉口不談自己的舉報活動；到20世紀90年代，“有了自由氣氛，不再心存恐懼”，她才決定和盤托出。

我決定將這一切告訴我的兒孫們。他們都非常高興。我的孫子說：“哦，奶奶，你很聰明，能記住這一切。我們將永遠銘記——你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我們的父母受到的迫害。” [(446)](#_443_2)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在回憶錄中講到一個年輕舉報人的故事。他的布爾什維克父親在大恐怖中被處決，他的任務是與其他父母被捕的孩子混熟，然后匯報他們吐露出的不滿字眼，以及所提及的疑惑和問題。這些報告的結果是他的許多朋友被捕。奧莉加自己在1949年被捕，在布提爾基監獄里遇見那些朋友中的一部分。她詢問他們對那個男孩作何感想。很奇怪，他們都表示理解。普遍的看法是，他是個“好孩子，有點天真，相信聽到的每一個口號，也相信在報紙上讀到的每一個字”。那個男孩的母親是一個極好又誠實的女子，向奧莉加堅稱，她的兒子這樣做，所基于的不是惡意，而是最高尚的信念。“她多次談及他異常善良、聰明、誠實。”也許，那個男孩覺得，為蘇維埃事業舉報自己的朋友是愛國行為——就像舉報父親的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 [(447)](#_444_2)

毫無疑問，很多人真誠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寫下舉報信是在盡蘇維埃公民的愛國義務。他們接受關于“間諜”和“敵人”的宣傳，主動揭發敵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們沒有參與舉報，就要擔憂自己會受牽連。要知道，隱瞞自己與敵人的接觸，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數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懼的氣氛中，大家都想趕在被他人舉報之前，先行下手。這種爭先恐后的舉報，也許并不能解釋大恐怖時期的大量逮捕——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大多數受害者被捕于“國家行動”和“富農行動”的大批網羅，所依據的是預設的名單，并不依靠舉報——但確實解釋了為何這么多人成為警察制度的舉報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現身于內務人民委員會和黨的辦公室，羅列可能是“人民公敵”的親戚和朋友，寫下有關同事和熟人的詳細信息，列出自己與他們的每一次見面，因為他們可能與“敵人”有牽連。一位老太太寫信給自己工廠的黨組織，舉報自己的姐姐在擔任克里姆林宮臨時清潔工時，曾打掃后來被捕的某人的辦公室。 [(448)](#_445_2)

恐懼促使人們盡量洗清自己——讓自己更加清白——抹去與潛在“敵人”的任何接觸。在最狂熱的舉報人當中，很多人自己有“歷史污點”（富農、階級敵人或前反對派的子女）。與大多數人相比，他們更加害怕自己被捕，舉報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蘇維埃公民”的證明。內務人民委員會就有蓄意謀劃的政策，專門向弱勢群體招募舉報人，經常挑選已在擔心自己命運的被捕者親屬。亞歷山大·卡爾帕特寧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官員，自己在1938年被捕，他講述了在招募舉報人方面所獲得的訓練：

你要尋找有可疑背景的人，比方說丈夫已被捕的女子，可使用這樣的對話：

“你是真正的蘇維埃公民嗎？”

“我是。”

“大家都說自己是好公民，你愿意證明嗎？”

“是，我當然愿意。”

“那么，就向我們提供幫助，要求不會太多。如發現任何反蘇維埃的行為或言論，就讓我們知道。我們每星期見面一次，你應事先寫下你所留意的：說了什么，誰說的，說話時還有誰在場，這就夠了。然后，我們就會知道你是不是優秀的蘇維埃公民。如果你在工作中遇上問題，我們會幫你。如果你被解雇或降職，我們也會幫你。”

這就是全部。之后，該女子就會表示同意。 [(449)](#_446_2)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在盧比揚卡監獄遇到一名年輕的女數學教師，名叫吉娜，來自高爾基城。吉娜的罪名是沒有舉報自己的老師，他是辯證唯物主義講師，每星期一次從莫斯科到高爾基城，與吉娜交談時曾公開批評斯大林政權。他住在高爾基城的宿舍，所以借用吉娜的公寓來招待朋友，并寄存了一箱書。內務人民委員會搜查時發現，原來都是托洛茨基派的書籍。吉娜認罪，決定向內務人民委員會舉報其他“敵人”，以贖罪和“洗刷[她的]良心上的污點”。她告訴審訊員，她的學院另有一名講座教授，正在做實驗時遇上停電，一時又找不到蠟燭，于是：

她[吉娜]劈開一把木尺，像農夫一樣，將之點燃，以供照明。教授以此完成了他的實驗，臨別時說[對斯大林名言的嘲諷]：“生活變得更好，生活也帶來更多歡樂。感謝上帝，我們進入了火把時代！”



1930年代，馬利金在謝斯得羅列茨克城的房子

該教授因此被捕。吉娜并沒有覺得自己的舉報有何不對——只是有點尷尬，因為她必須在對他的審訊中當面作證。奧莉加問，這樣一件小事卻“摧毀了那位教授的一生”，有何感想？吉娜回答：“政治上沒有小事。我和你一樣，起初尚不理解他那句話的罪惡，后來才開始懂得。” [(450)](#_447_2)

許多舉報出于惡意。刪除對手的最快方式，就是舉報他是“敵人”。社會低層對布爾什維克精英不滿，更為大恐怖火上澆油。如果領導辦事過于嚴厲，工人會舉報主管，農民會舉報集體農莊主席。仆傭經常受聘于內務人民委員會，舉報他們的雇主。一位美國記者的俄羅斯妻子馬爾庫莎·菲舍爾，雇用了一名堅信“敵人”之說的保姆。馬爾庫莎寫道：她“真正代表了普羅大眾的心態，把官方的每一句話都當做真理，沒有一丁點的政治疑慮”。 [(451)](#_448_2) 有些家庭，無時不在擔憂自己的仆人。

1935年，內務人民委員會在許多列寧格勒黨干部的家中安置新的仆人，作為基洛夫遇刺后加強監視的措施。列寧格勒高級干部安娜·卡爾皮茨卡婭和彼得·涅澤夫茨夫，被迫解雇了老管家瑪莎，即會調制草藥的虔誠老信徒。其時僅12歲的安娜的女兒馬克斯娜回憶，新管家格魯謝是一個“令人不愉快的嚴肅女人，她是警方派來的，以便監視我們”。馬克斯娜和她同母異父的弟弟本能地意識到，不可在格魯謝的面前交談。馬克斯娜回憶：“我們幾乎沒有與她說過一句話。”格魯謝睡在廚房，與家庭住房分開；與家人相處多年的保姆米利婭，仍可待在家庭住房。格魯謝只被視為仆人，不像米利婭或老管家瑪莎，她們已被當做家庭的一員。安娜和彼得對斯大林懷有敵意，馬克斯娜還記得他們的竊竊私語，懷疑斯大林應為基洛夫的死亡負責。如果瑪莎仍在，他們可能會無所顧忌——她的老信徒背景可確保她的沉默——有了格魯謝，表露這種情緒就會非常危險。1937年7月，馬克斯娜的父母被捕（槍決于同年秋季），弟弟被送去孤兒院，馬克斯娜和保姆米利婭搬去一個公共公寓，格魯謝就此銷聲匿跡。 [(452)](#_449_2)

在這種不信任、仇恨和惡意的氣氛當中，小小的爭執和嫉妒很容易演變成舉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一名軍官，找上了來自高爾基城的鄉村醫生鮑里斯·莫洛特科夫，因為是老朋友，他要鮑里斯幫忙為他的情婦墮胎，但鮑里斯表示拒絕（當時墮胎是非法的）。這名軍官便安排一系列舉報人，舉報他為“反革命”。鮑里斯因此被捕，關押在地區監獄，他的妻子也以莫須有的罪名入獄，被指控涉及當地醫院一樁工人謀殺案。 [(453)](#_450_2)

性和愛往往在這些致命的爭執中發揮作用。大恐怖時期，大量被拋棄的戀人、妻子、丈夫，成了舉報人的受害者。尼古拉·薩哈羅夫是一名工程師，父親是神父，在1937年遭到處決。尼古拉因自己的工業專長而受到重視，自忖這會保護自己不受逮捕。沒想到后來有人看中了他的妻子，便舉報他是“人民公敵”。另有一位莉帕·卡普蘭，因拒絕工廠主管的性要求而惹上麻煩。該主管安排舉報人，舉報她3年前的言論，其時剛剛發生了基洛夫遇刺案。當時，她得以虎口逃生（舉報內容被認為太荒謬），但到了1937年，卻被送去科雷馬勞改營10年。 [(454)](#_451_2)

職業私心和物質獎勵，幾乎是所有舉報人的動力。這些動力往往又以復雜的形式，與政治信仰和恐懼混在一起。成千上萬的低級官員舉報他們的上級，以此在蘇維埃的等級制度上攀爬（政府鼓勵他們這樣做）。伊萬·米安契恩為了促進自己的前途，從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舉報了不少于14名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米安契恩后來辯解說：“我們認為，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每個人都在寫。”也許，米安契恩認為是在顯示自己的警惕性；也許，他因破壞上司的前途而獲得惡意的快感；也許，他因幫助警方而感到自豪。還有一種勤奮忙碌的舉報人，給自己的報告仔細編號，簽上“我們中的一員”或“游擊隊員”，以示他們的忠心耿耿。但個人的晉升、更高的薪俸、更多的配給、更大生存空間的允諾，都在發揮各自的作用。公寓住戶被捕后，空出來的房間經常被內務人民委員會接管，或由斯大林政權的其他仆從瓜分，如辦公室工人和司機。毫無疑問，其中有些人憑借舉報以前的住戶而獲得酬報。 [(455)](#_453_2)

伊萬·馬利金在列寧格勒北邊的謝斯得羅列茨克城擔任工程師，他技藝高超，素受尊敬。他廠里的工人們稱他為“沙皇工程師”，甚至在內務人民委員會將他逮捕之后，仍愿意幫助他的家人。馬利金是當地名人，編寫過教科書和小冊子，并為蘇維埃報刊寫文章。他們夫婦和兩個孩子，一起住在郊區自建的大木房子里。不出意外，他的財富和名氣招致了旁人的嫉妒。舉報的工廠同事其實是在妒忌他的成功，聲稱馬利金使用自己的房子與芬蘭人保持秘密聯系，馬利金因此而被捕。原來，這項舉報還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一幫人精心策劃的，目的是想迫使馬利金以7000盧布的價格向他們出售自己的大木房子（當時剛做的估價幾近50萬盧布）。那幫人還威脅，如果拒絕出售，還要逮捕他的妻子。到頭來，馬利金遭到槍決，妻子和孩子都被趕走，大木房子分給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軍官及其家屬， [(456)](#_455_2) 其后代至今仍住在里面。

在大恐怖時期，事業中的進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協，如果不是赤裸裸的舉報，就是與斯大林政權默默勾結。西蒙諾夫的職業生涯正是在這個年代騰飛的，他以非凡的坦率和自責，寫出蘇維埃沉默的大多數在大恐怖中的攜手合作。他在1979年臨危時口述的回憶錄中自責道：

讓我們直面那個時代吧，你不能原諒的，不但有斯大林，還有你自己。這并不是說，你做了壞事——也許你什么錯事也沒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習慣于邪惡。1937至1938年發生的事件，現在顯得離奇且狠毒，但對當時二十三四歲的你來說，反而成了一種規范，幾乎是習以為常。你身處這些事件當中，對一切都裝聾作啞。當你周圍的人被槍決、打死或突然銷聲匿跡時，你卻什么也沒看到，什么也沒聽到。

西蒙諾夫為了試圖解釋這種冷漠，回憶了自己對米哈伊爾·科利佐夫1939年被捕的反應。科利佐夫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作家，他的西班牙內戰報道對西蒙諾夫投身的青年文壇產生了很大啟發。西蒙諾夫在內心深處從不相信科利佐夫是一名間諜（1949年曾向作家法捷耶夫袒露過這種懷疑），但不知何故，當時卻成功地吞咽了自己的疑慮。無論是出于恐懼和怯懦，或是相信國家的愿望，還是躲避異議的本能，他在內心做了調和，以符合斯大林政權的需求。他重新校正了自己的道德羅盤，穿越大恐怖的道德泥沼，得以維護自己的事業和信念。 [(457)](#_455_2)

西蒙諾夫不是舉報人，但確實曾承受此種壓力，蘇維埃當局可能希望他作出這方面的努力。1937年春季，西蒙諾夫收到作家協會總書記弗拉基米爾·斯塔夫斯基的邀請，與文學院其他三名青年散文作家一起，前去參加高加索地區的工作度假。他們準備撰寫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生活經歷——他是著名的格魯吉亞人，在內戰中與斯大林并肩戰斗，曾擔任重工業人民委員，前不久剛剛自殺。他們快要動身時，斯塔夫斯基把西蒙諾夫叫到辦公室，要西蒙諾夫坦白“他在文學院[一直在散布的]所有反蘇維埃言論”。他希望西蒙諾夫認罪并悔改，從而使自己難以拒絕當局的進一步要求，但西蒙諾夫否認有過那樣的談話。斯塔夫斯基隨之聲稱已掌握“相關資料”，告誡西蒙諾夫“最好還是說實話”。西蒙諾夫回憶，斯塔夫斯基“因我的不夠真誠和實事求是，顯然變得十分惱火”。斯塔夫斯基的指控和西蒙諾夫的否認持續了好幾輪，由于西蒙諾夫的拒不合作，雙方呈膠著狀態。最后，斯塔夫斯基指責他散布“反革命詩歌”，并禁止他參與這次工作度假。西蒙諾夫逐漸弄清了斯塔夫斯基的“材料”來源。原來，文學院的學生中掀起一股讀吉卜林詩歌的熱潮，西蒙諾夫因此卷入與一名青年教師的對話。該教師隨即詢問他對尼古拉·古米廖夫（作為“反革命”槍決于1921年）的詩歌有何看法。西蒙諾夫回答，雖然他更喜歡吉卜林的詩，但也喜歡古米廖夫的部分詩作。在該教師的鼓舞下，他還背誦了幾段古米廖夫的詩句。西蒙諾夫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懼。他知道已有被捕的危險，這不僅緣于他對古米廖夫的看法，也因為自己的貴族出身。看來，該教師向斯塔夫斯基匯報，將西蒙諾夫對古米廖夫的喜愛與他的出身聯系起來。在那個學期剩下的時日，西蒙諾夫故意躲避那位教師。同一年晚些時候，該教師自己入了獄（為了拯救自己，他最后的努力就是充當舉報人，試圖坑害西蒙諾夫）。 [(458)](#_455_2)

到1937年春天，文學院已進入高度焦慮的狀態。像其他蘇維埃機構一樣，文學院在突然發動的大恐怖面前措手不及，其中更有一種恐慌感，認為驚訝恰恰證明了自己“缺乏警惕性”。在一系列整肅會議上，學生和教師歇斯底里地呼吁，要有更多“布爾什維克的警覺和真正的自我批評”，要從文學院鏟除所有的“形式主義者”和“阿韋爾巴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好幾名學生被捕，有些是因為自己的詩歌里含有自由或宗教的主題，有些是為了幫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因個人主義風格，已受蘇維埃報刊的批判）講話。大約有十幾名學生，交由共青團做工作（即召開學生會議，給予嚴厲批評，再讓他們自己發言，背棄舊作）。其中之一被文學院開除，移交給了內務人民委員會，因為她拒絕背棄自己的父親——一個過氣的詩人。她還勇敢地告訴聚集的指控者，“我父親是蘇聯最光明正大的人”，為此她被流放去科雷馬10年。 [(459)](#_456_2)

西蒙諾夫在文學院的好朋友中有兩位在大恐怖中遭受迫害：詩人瓦倫丁·波圖帕契克，被捕于1937年2月，因為有同學向警方匯報了他的言論；同年4月，作家協會主席團譴責了富有魅力的教師弗拉基米爾·盧戈夫斯科伊，指責他竟然重新發表（1935年）“政治上有害”的20世紀20年代的舊作（關于俄羅斯大自然的浪漫詩）。盧戈夫斯科伊被迫撤回自己的詩，寫了10頁自卑自責的檢討《我的錯誤》，承諾清洗“所有的陳舊思想”，“緊跟歷史進程”。 [(460)](#_458_2) 盧戈夫斯科伊被嚇壞了，在之后幾年中再也不發表詩作，除了1939年《關于斯大林之歌》的配詞。 [(461)](#_459_2) 平時的盧戈夫斯科伊輕聲細語，態度溫和，卻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發言，要讓敵人血債血償。他在10月告訴一群莫斯科作家：“現在正是時候，要把這些壞蛋敵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從我們國家清洗出去，要用鐵掃帚掃除所有的叛國賊，要在我們隊伍中肅清這些異己分子。” [(462)](#_459_2)

西蒙諾夫的反應也是出于恐懼。斯塔夫斯基辦公室事件發生之前，他一直被視作模范學生和蘇維埃的衷心擁戴者。到如今，這種聲譽卻變得疑竇重重。西蒙諾夫回顧斯塔夫斯基事件，感到“驚愕和震驚，與其說是突如其來的危險感……毋寧說是一種感悟：他們不再相信或信任我了”。他接著在文學院一系列整肅會議上，奮起攻擊“形式主義者”和其他“敵人”，以此證明自己的價值。 [(463)](#_460_2) 最不尋常的是他在5月16日文學院公開會議上對朋友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的尖刻聲討：

[文學院里]經常聽到，有些人只是樂此不疲地談論自己。具體講，我記得多爾馬托夫斯基同志在4班會議上的一次惡心的講話。他沒說“文學院和我們”，而說“我和我的文學院”。他的立場是：“像我這樣的個人，文學院并沒給予足夠的重視。成立文學院，就是為了教育兩三個天才，就是像我多爾馬托夫斯基這樣的。做到這一點，就能使它的存在變得合理，富有價值。對于像我這樣的人才——多爾馬托夫斯基——文學院應該提供最好的，甚至不惜犧牲其他的學生。” [(464)](#_461_2)

也許，西蒙諾夫只是在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包括批評自己最親密的朋友）——那一直是共青團的風尚，學生應證明自己是忠誠和警惕的。也許，他沒有傷害朋友的意思。但很顯然，他在嫉妒多爾馬托夫斯基因才華而獲得的重視，文學院主任經常如此表示（他把西蒙諾夫放在較低等級，只能勝任“教學、新聞、編輯”的工作）。 [(465)](#_462_2) 西蒙諾夫在這一事件中的指責，對多爾馬托夫斯基的損害相對較小。后者1938年從文學院畢業，作為一名記者被派去遠東——這一職位遠不相稱于他的文學才華，被他描繪成一生中最艱難的工作。但他或許已很幸運，因為生活本來可能變得更糟。兩人繼續保持友好關系，經常在寫作中贊美對方，但在西蒙諾夫的朋友當中，總有人懷疑多爾馬托夫斯基對他懷恨在心。 [(466)](#_463_2)

大恐怖的年代，對許多朋友來說是災難性的，但對西蒙諾夫來說，卻是一鳴驚人的好時機，他成為了受斯大林政權青睞的詩人。1937年，他寫了幾首詩，奉獻給對斯大林的崇拜，包括一首《游行》（Parade），配以管弦樂團及合唱團：

這是一首有關他的歌，

有關他的真心朋友，

他真正的朋友和同志。

全體人民都是他的朋友：

你數也數不清，

就像大海中的浪花水滴。 [(467)](#_465____RGALI__f__632__op__1__d)

西蒙諾夫在《冰之戰》（Ice Battle，1938）一詩中，將13世紀俄羅斯王子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率軍擊敗條頓騎士團的民族英雄故事，與蘇維埃反對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也是同年史詩電影《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主題，導演是謝爾蓋·愛森斯坦）呼應對照起來。該詩是宣傳工作的一部分，讓蘇聯為可能的抗德戰爭做好準備，也是西蒙諾夫第一次真正的文學成就，為他帶來了“名譽和聲望”——這是盧戈夫斯科伊1938年9月推薦他加入作家協會時引用的贊詞。 [(468)](#_466____E__Dolmatovskii__Bylo__z) 西蒙諾夫當初拒絕充當舉報人，可能對自己前途造成損害，但憑借之后創作的愛國詩篇，似乎贏得了徹底補救。他得到斯塔夫斯基的全力支持，成為作家協會的最年輕成員。

在大恐怖的瘋狂氣氛中，西蒙諾夫對多爾馬托夫斯基的背叛，并不是異乎尋常的。一位舉報人回憶，內務人民委員會找他舉報自己的朋友（他父親被捕后，那些朋友也嫌棄他），他的良心處于掙扎之中。他自問：“誰是我的朋友？我沒有朋友。忠誠吧，我不欠任何人，除非他能從我身上榨取——我只欠我自己。” [(469)](#_466_2) 恐懼扯斷了友誼、愛和信任的紐帶，也撕裂了凝聚一個社會的道德關系。人們在混亂中爭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競斗，反目成仇。

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于1937年被捕，遭到許多朋友的出賣。他們被迫在喀山監獄的審訊中當面指控她（內務人民委員會經常安排這樣的“對質”），其中就有作家沃洛蒂亞·季阿科諾夫，在她供職的報館里擔任編輯。金茲伯格回憶：

我們還是老朋友，我們的父親是同學。我幫他找到這份工作，并且很樂意、很熱情地輔導他干好這一行。他比我小5歲，經常說喜歡我，愿把我當做姐姐。

在對質中，審訊員（俄語都說不好）朗讀了季阿科諾夫的聲明，舉報金茲伯格是報館“反革命恐怖組織”的成員。季阿科諾夫試圖改口，聲稱他只是說她在編輯部門擔任重要職務。但審訊員堅決要求他簽署一份聲明，證明這一組織的存在。

“沃洛佳，”我溫和地說，“你知道這是個花招，你從沒說過這樣的東西。如果你簽了，就會造成數百位同志的死亡，他們一直待你不錯。”

[審訊員的]眼珠子幾乎要蹦跳出來了。

“你竟敢對證人施加壓力！我要直接送你去最底層的懲罰牢房。你，季阿科諾夫，昨天獨自一人時，你都簽了這些文件。現在，你竟敢反悔！我馬上以提供偽證的罪名將你拘留。”

他做了一個按鈴姿勢——沃洛佳，像蟒蛇面前的兔子，慢慢寫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抖個不停，好像中了風，完全不同于他簽署新時代道德準則文件時的大膽利落。然后，他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請原諒我，熱尼婭。我們剛生了一個女兒，我必須活下去。” [(470)](#_467_2)

四

在大恐怖時代，人們如何因應同事、朋友、鄰居的突然失蹤？如蘇維埃報刊所聲稱的，他們真以為那些人是“間諜”和“敵人”嗎？那些人，他們已認識多年，會相信嗎？

就真正的共產黨人而言，黨領導告知他們的是毋庸置疑的。這無關乎他們是否相信圖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間諜，而在于他們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黨的判決。可信的朋友和戰友突然變成“敵人”，隨之出現的問題，可以各種方式予以應付。基輔的紅軍軍官阿納托利·戈爾巴塔夫回憶，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級軍官被指控為間諜時，他與軍隊中的多名同仁不得不作出調整。

在擊潰外國干涉軍隊和國內反動派時發揮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怎么會……突然變成人民公敵呢？……最后，在反復考慮一系列的可能解釋之后，我接受了其時最為普遍的答案……當時很多人都這么認為，“顯然，他們出國時，墜入了外國情報機構的羅網”。

亞基爾將軍的被捕，真是一個“可怕的打擊”。

我很熟悉亞基爾，很尊重他。我衷心希望這只是一個誤會——“會弄清楚的，他將獲得自由”——但諸如此類的說法，也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在小圈子里冒著風險暗自嘀咕。 [(471)](#_469____A__Granovsky__All_Pity_C)

顯然，亞基爾愿意接受黨的判決，他面對行刑隊時的最后一句話是：“共產黨萬歲！斯大林萬歲！” [(472)](#_469_2)

斯大林的監獄充滿了相信黨是正義源泉的布爾什維克。有些對指控供認不諱，為的是保住這樣的信仰。為了取得布爾什維克囚犯的供詞，酷刑也是經常使用的。據一名前囚犯（不是共產黨人）所說，他們投降的關鍵因素不是刑罰，而是因為：

大多數堅定的共產黨人，愿意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自己對蘇聯的信念。要背棄這個信念，已非他們力所能及。在某種情況下，長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使已經不靠譜，如要予以放棄，仍需要巨大的道德力量。 [(473)](#_471_2)

娜杰日達·格蘭金娜1938年在喀山監獄遇到的許多黨員，仍然信奉黨的路線。她告之以1932年的饑荒，他們卻說，“這只是謊言，我只是在夸大其詞，以詆毀我們的蘇維埃生活方式”。她還告訴他們，她被無端趕出家園，國內護照制度在摧殘家庭，他們會說：“沒錯，但這是對付像你這樣的人的最佳方式。”

他們認為我是罪有應得，因為我反對過激的行為。然而，當同樣的事發生在他們身上，卻被認為這只是一個錯誤，會被糾正的——因為他們對上級頒布的任何指示，從不心存疑問，總是歡呼雀躍，貫徹到底……他們被開除黨籍時，沒有站出來互表支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舉雙手表示擁護。這真成了普遍的精神病狀。 [(474)](#_472_2)

對廣大人民來說，現實有兩種：一種是黨的真理，另一種是基于經驗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蘇維埃報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審以及“間諜”和“敵人”的邪惡言行，真能看透宣傳的人寥寥無幾。要給新聞報道打折扣，要質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設，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會牽涉不同的價值體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納批判性觀點的是宗教或國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黨的信條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們的年齡（他們在俄羅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護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歲以下的人，從小長大只知道蘇維埃世界，又沒從家里承繼到其他價值觀，要想逃離宣傳并懷疑它的政治原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年輕人特別容易輕信——他們在蘇維埃學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傳。里亞伯·比德爾回憶：

在學校里他們說：“看，他們如此不愿我們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看，他們如何炸毀工廠、造成火車出軌、殺害民眾——都是人民公敵的所作所為。”我們的大腦受到不斷地灌輸，以致沒有自己的思考。我們到處看到“敵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監視并報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間諜。當局、黨組織、我們的老師——每個人都說同樣的話，我們還能有其他想法嗎？

比德爾1937年離開學校，在工廠找到工作，經常聽到工人對“人民公敵”的詛咒。

工廠遇上故障，他們就會說：“同志們，這里有破壞和背叛！”他們會尋找有歷史污點的人，稱他為敵人，將他投入監獄，上刑，直至他招供。在公審大會中，他們會說：“看，這就是潛伏在我們中間的混蛋！” [(475)](#_473____F__Beck_and_W__Godin__Ru)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敵”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將之與“主管們”（黨干部、經理和專家）聯系在一起——他們已將自己的經濟困苦，歸罪于那些“主管”。事實上，這種對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釋清洗為何在部分民眾中具有廣泛的吸引力。他們將大恐怖視作“主人之間的爭吵”，與己無關。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代廣泛流傳的笑話中，獲得完美的詮釋：半夜里，內務人民委員會猛敲一戶公寓的大門，屋里的男主人問：“是誰呀？”“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快開門！”男主人一下子心寬了，回答說：“不，你們弄錯了——共產黨人住在樓上！” [(476)](#_473_2)

近親的被捕不足以動搖大多數人對“敵人”的信念，在許多情況下，反而予以加強。依達·斯拉溫娜的父親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堅守自己的共青團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親是人民公敵，當然認為他是無辜的。同時我又相信，人民公敵確實存在。我確信，正是人民公敵的破壞，才使像父親那樣的好人蒙冤入獄。在我看來，這些敵人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我在報刊上讀到有關的報道，跟所有人一樣，也對他們恨之入骨。我與共青團員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議人民公敵，高呼：“處死人民公敵！”報紙提供這些口號，讓我們的頭腦裝滿了做秀公審。我們讀到布哈林和其他黨干部可怕的供詞，被嚇壞了。如果這樣的人也是間諜，那敵人真是無孔不入啊。 [(477)](#_475_2)

羅扎·諾沃塞爾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從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敵人”，卻愿意懷疑布哈林這樣的高級干部，如她當時所說，總要“有人為我家的悲慘遭遇承擔責任”。在蘇維埃外交官家庭長大的弗拉基米爾·伊耶寧，相信對“人民公敵”的所有指控——認為葉若夫是個“偉人”——盡管自己的父親、姐姐和6位叔叔姨媽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親入獄，他才開始產生懷疑，他寫信給斯大林，聲稱母親是完全無辜的；并發出警告，她的被捕證明內務人民委員會已被“人民公敵”接管。 [(478)](#_476_2)

甚至斯大林的受害者，也相信“人民公敵”的存在，或承認自己的被捕是罪有應得（犯了“反革命破壞罪”），或推定自己被誤定為“人民公敵”。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是“富農”的兒子，家人作為“人民公敵”遭到流放，但他自己相信斯大林政權的宣傳，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回憶：“與其放棄對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繼續相信他，認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敵的欺騙。這樣做，使我們[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懲罰中存活下去。”

我們從沒想到，我們的痛苦得歸罪于斯大林，只是感到奇怪，他怎么會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騙……父親說：“斯大林被蒙在鼓里，這意味著我們遲早會[從流放中]獲釋”……也許，這只是一種自欺欺人。但在心理上，相信斯大林的公正，使人更容易忍受苦日子，并消除我們心里的恐懼！ [(479)](#_476_2)

在勞改營度過多年的地質學家帕維爾·維滕貝格，支持對“人民公敵”的大恐怖。1937年2月，他遠征北地群島地區時給妻子寫信：

你問我，是否聽到電臺上有關皮亞特科夫的公審。我全聽到了——現在才明白，自己的身敗名裂就因為那些流氓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試圖摧毀我們的[蘇維埃]聯盟，其見不得人的手段，導致了這么多無辜的黨外人士被送去流放。 [(480)](#_477_2)

有些人對這么多“人民公敵”的存在存疑。就他們而言，引起懷疑的不是做秀公審（很少人質疑檢方的誠實），而是同事、朋友、鄰居的突然失蹤，似乎很難相信他們有罪。

不去想它，便是應付這種疑惑的共同對策——避開所有政治，徹底退到私人生活。許多人對政治事件視而不見，設法度過大恐怖年代。甚至還有政治精英，緊閉雙眼來應對自己圈子中的失蹤事件。米哈伊爾·伊薩耶夫是杰出的蘇維埃法學家，又是蘇維埃最高法庭的成員，帶著妻子和4個孩子住在莫斯科，養尊處優。據妻子瑪麗亞的回憶，在整個大恐怖時期，雖然大規模逮捕波及許多朋友，但家里從來不談論國事。伊薩耶夫似乎對世上發生的事渾然不覺，即使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也是如此。他1937年12月寫信給女兒，抱怨年老未婚的女管家突然失蹤，好幾天沒來上班，家里亂糟糟的，其“突然消失和毫無預警”顯然讓伊薩耶夫非常惱火。他弄不懂管家為何消失，還在猶豫是否要將她解雇，絲毫都沒想到管家可能已經被捕——確實如此——根本沒人替她給她的東家捎信。 [(481)](#_478_2)

這些精英家庭的許多孩子受到庇護，對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卡明斯卡婭是律師和憲政民主黨人的女兒，對政治不聞不問——家里從來不談政治。甚至在父親被蘇維埃銀行解雇之后，尼娜仍然在法學院過著“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她是1937年入學的。多年之后，她與朋友討論此事。他們都同意，在大恐怖年代仍有愉快的經歷，無憂無慮，甚至意識不到當時發生的大事：“我們根本察覺不到攫噬我們父母一代的恐怖和絕望。”尼娜的朋友講述過1937年的一件事，她參加朋友聚會，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鑰匙：

別無他法，她只好按門鈴叫醒父母。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回應，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聽到腳步聲，門打開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親。他不像剛剛起床，反倒像剛剛回家，或正要出門，身穿深色的西裝、干凈的襯衫，配以整齊的領帶。看到自己的女兒，他在沉默中注視著她，然后一言未發，打了她一記耳光。

尼娜認識這位朋友的父親，他受過良好教育，沒有粗暴的傾向。他對深夜敲門的反應，顯然基于他對“他們”前來逮捕的恐懼。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驚：

她自覺委屈，一下子淚水漣漣，怪罪于父親。過了一會兒，便將之忘得一干二凈。多年之后，她才憶起父親蒼白的臉色、沉默和那記耳光——毫無疑問，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打人。她帶著極大的痛苦告訴我這個故事，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諳世事深感歉疚。 [(482)](#_479_2)

人們以各種方式來應付疑惑，或予以壓制，或加以合理化，來維護他們共產主義的基本信念。他們當時并非刻意為之，只是數年之后方才意識到這一點。瑪婭·羅德克的父親1937年被舉報為“人民公敵”，因為他無意中說出的一個短語，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寫給蘇維埃當局的信件中用過的。父親被捕后，瑪婭曾嘗試將大恐怖引起的疑惑，與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調和起來——這是她現在的理解。

這么多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應是迫使自己循規蹈矩。這是當時發生的，不過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規蹈矩”一詞——這不是一種游戲，而是一種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歡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錯，即使在我們的內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斷改進，以剔除內心的任何疑慮。 [(483)](#_481____TsMAMLS__f__68__op__1__d)

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講述了自己對一個親戚（舅婆的弟弟）被捕的反應。他是一名資深軍官，涉及1937年對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級將領的公審。西蒙諾夫回憶，自己還是小男孩時就崇拜圖哈切夫斯基（經常在伯父的莫斯科公寓中遇見），所以對被告的有罪存有疑惑。西蒙諾夫的母親非常憤慨，堅信那位親戚的清白。西蒙諾夫因此對相關的證據認真地加以甄別，最終仍決定接受蘇維埃報刊的解釋。像當時大多數人一樣，西蒙諾夫猜想，如果沒有確鑿的叛國證據，沒人膽敢處決如此高級的將領：

要懷疑那個可怕陰謀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任何質疑都是不可想象的——別無選擇。我在講那些時代的精神：除非他們有罪，不然就無法理解。

西蒙諾夫以同樣的邏輯接受了親戚有罪的認定。該親戚之前曾被捕一次（1931年），因證據不足而獲釋；在西蒙諾夫眼中，他的再次被捕必然意味著已經找到了他有罪的新證據（他的繼父曾于1931年被捕，卻沒有遇上麻煩，可作佐證）。 [(484)](#_481_2) 換言之，西蒙諾夫的解讀傾向于加強自己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放棄信念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另一種方式將朋友和親戚的突然失蹤，與蘇維埃正義的信念調和起來。那就是告訴自己，好人被捕只是一個“錯誤”。根據這個道理，要找出真正的“人民公敵”，出錯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有太多的“敵人”，隱蔽得又太好。基于這種思維，真正的敵人總歸是他人——監獄門口排隊送包裹的女人的兒子和丈夫——永遠不會是自己的朋友和親戚。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回顧丈夫1936年的被捕，如此總結自己的反應：

不，這不可能。它不可能發生在我和他的身上！當然有傳聞[僅是傳聞——當時還是1936年初]，要出事了，已有逮捕事件發生。但這一切肯定只與別人有關，當然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485)](#_482_2)

奧莉加的丈夫在遭到內務人民委員會拘捕時認為，這只是一個“誤會”。像數百萬其他人一樣，他在告別妻子時說，很快就會弄清楚（“肯定是一個錯誤”），很快就會回來。他只帶了在外過夜的小包裹。斯拉溫和皮亞特尼茨基也是如此。

許多人相信弄錯了，便寫信給斯大林，吁求釋放自己的親人。安娜·謝苗諾娃從小就是共產主義者，在父親1937年6月被捕之后，就曾寫信給斯大林。她現在回憶道：“我想，幾天后，斯大林就會收到我的信，讀完后會說：‘這是怎么回事？為何要逮捕一個誠實的人？立即釋放他，并向他道歉。’”3個月之后，安娜的母親也被帶走，她又一次告訴自己，“肯定又弄錯了”。 [(486)](#_483_2)

這一想法，因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葉若夫的倒臺而獲得加強。1938年秋天，身為大恐怖干將的葉若夫因私生活的各式丑聞（并不完全是虛假的）而落馬，其中有同性戀曖昧、雙性戀狂歡、大肆酗酒、妻子已成英國間諜的虛構故事。但葉若夫落馬的真正原因，還在于斯大林愈益察覺到，大規模逮捕不再是可行策略。如果繼續下去，不用很久，全體蘇維埃人都要入獄了。斯大林明確表示，內務人民委員會不能單單依據舉報，不予查證就徑自抓人。他還指出，要警惕專靠舉報來促進自己地位的野心家。葉若夫的解職是在1938年12月，新主管拉夫連季·貝利亞馬上宣布，全面審查葉若夫治下的逮捕案件。到1940年，150萬宗案子審查完畢，取消了對45萬人的判罪，封存了12.8萬宗案卷，3萬人獲釋出獄，32.7萬人走出古拉格勞改營。這恢復了許多人對蘇維埃司法的信心，讓疑惑者把“葉若夫恐怖”看作一時的畸變，而不是制度的濫用。據聲稱，大規模逮捕都是葉若夫的所作所為，斯大林糾正了他的錯誤，并揭露了葉若夫的“人民公敵”真面目：一直在逮捕官員，散布不滿，以破壞蘇維埃政府。1940年2月，最高軍事法庭公審葉若夫，他的罪名是策劃恐怖分子陰謀，為波蘭、德國、英國、日本從事間諜活動，被槍決于他自己專為槍決“敵人”建造的特殊建筑內，離盧比揚卡不遠。 [(487)](#_484_2)

貝利亞的任命讓人松了一口氣。馬克·拉斯金記得：“我們欣喜若狂，在我們眼中，貝利亞似乎是純正的理想人物。”像很多其他人一樣，他希望“所有的無辜者將獲得釋放，監獄里只留下真正的間諜和敵人”。 [(488)](#_486_2) 西蒙諾夫回憶，貝利亞的審查恢復了他對蘇維埃正義的信念，消除了他因親屬被捕而可能生出的疑惑。事實上，西蒙諾夫因此而加強了自己的信念：沒有獲釋的，或之后被捕的，一定是有罪的。他如此回顧自己對1939年兩個文人被捕的反應——分別是作家伊薩克·巴貝爾和戲劇導演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

盡管這兩人在文學界和戲劇界已占據重要地位，盡管他們的突然失蹤引起了巨大的震蕩——那時已是如此——然而，這兩起逮捕來得那么突然，涉及如此不尋常的圈子，又在糾正葉若夫錯誤的貝利亞當政之下——這一切讓我覺得，他們也許確實有罪。在葉若夫當政時期被捕的人中，很多也許是無辜的。但這兩人沒有受到葉若夫的迫害，現在又是撥亂反正之時，卻被突然逮捕。因此，逮捕他們似乎應有很充分的理由。 [(489)](#_487_2)

對梅耶荷德和巴貝爾的指控引起許多人的懷疑，其中之一是作家協會前總書記弗拉基米爾·斯塔夫斯基——他曾試圖招募西蒙諾夫做舉報人。他出生于奔薩省城的工人家庭，如果沒有學會在道德原則上的妥協，也不可能晉升至蘇維埃文學界的頂層。他身為斯大林的“蘇維埃文學界劊子手”，批準逮捕了許多作家，并親筆寫下導致曼德爾施塔姆1938年春天被捕的檢舉信。 [(490)](#_487_2) 但在這段時間內，斯塔夫斯基深受懷疑和恐懼的折磨。他在日記中承認自己的絕望，他的日記像普里謝維恩的一樣，也用微小潦草的筆跡，別人很難辨認。他為聽到的一則故事深感不安，說一個黨干部將自己帶司機的汽車，改裝成一個賣淫場所。該司機說：“我實在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一個普通男孩，我們中的一員，然后跨過一條分界線，就變成了一頭豬，滿面污穢。一個普通工人，一輩子都不會這么骯臟。” [(491)](#_488_2) 也許是由于喪失信心，斯塔夫斯基開始狂飲，發胖，生病，因酩酊大醉而好幾天不去上班。他躲避批斗作家的會議，或只作最溫和的發言。為此，他終于在1937年11月受到作家協會黨委的痛斥：

斯塔夫斯基同志，身為作家協會的領導，大聲嚷嚷要在文學界提高警惕，要開展揭露敵人的運動。但在現實中，他卻在幫助隱瞞托洛茨基分子，不發起真正的進攻，不繳除人民公敵和黨內異己分子的武器。對自己與敵人保持聯系的錯誤，他仍然默不作聲。 [(492)](#_489_2)

斯塔夫斯基承受著來自政治主子越來越大的壓力，最終在1938年春天被免去作家協會的領導職務。

像斯塔夫斯基一樣，很多人對大規模逮捕存有疑問，但公開反對者極少。無論如何，如皮亞特尼茨基在全體會議上的抗議所顯示的，有效反對的可能性極低。不管是團體還是個人，雖然在向黨領導寫信表達他們對大規模逮捕的憤慨，但幾乎都是匿名的。一個無名團體在1938年6月寫信給莫洛托夫說：“數十萬無辜人士在監獄中凋萎，沒人知道為什么……一切都以謊言為基礎（我們沒有簽名，請原諒，因為抱怨是遭禁的）。” [(493)](#_490_2) 地方上確有一些黨員的抗議，特別是老布爾什維克，其政治道德在斯大林崛起之前就已經定形。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講述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故事，名叫阿爾圖寧，是她1939年在科雷馬勞改營遇上的。他來自沃羅涅日省，入黨前是一名皮革工人，已到中年，但仍英俊，留一把紅胡子。他曾經強壯，但因礦區工作而變得孱弱。與奧莉加見面時，他被調到馬加丹的婦女工程隊，幫助制造工具。他告訴奧莉加：

這一切開始于1937年，先說這位同志是敵人，再說那位同志是敵人，把他們都開除出黨。我們舉手表示同意，然后把他們打死，那都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啊。

起初，我假裝生病，逃避參加會議或舉手擁護。到后來，我覺到需要采取行動，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在摧毀黨，殺害善良誠實的人。我不相信他們都是叛徒，我認識這些人。

一天晚上，我坐下寫了一封信，謄了幾份，一份給當地黨組織，一份給斯大林，一份給[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我寫道，我們這是在殺害革命……我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都傾注入這封信中。我讓妻子看，她說：“你這是在自殺，你寄出的第二天，他們就會將你投入監獄。”但我回答：“讓他們把我關進監獄吧。我寧可身陷囹圄，也不愿舉手殺害自己的同志。”

嗯，她說得對。我寄信3天后就入獄。他們將我痛打一頓——我被流放來科雷馬勞改營，為期10年。

當被問及是否后悔，阿爾圖寧回答確實有一次，當時他的勞動小組因嚴霜冰封而未能清除森林的樹根，自己因此被關了禁閉：

我突然顧影自憐。其他人沒做什么，也判了刑，但我是自投羅網啊。我寫的信到底有何作用？什么都不會改變。也許索爾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負責人]會感到有一丁點慚愧，但老胡子[斯大林]——才不在乎呢！無法打動他。而現在，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里，與老婆孩子圍坐在暖和房間的茶炊旁。一念及此，我就以頭撞墻，制止這個想法進入我的腦海。那一整夜，我在牢房內邊跑邊咒罵自己怎么能有這樣的后悔。 [(494)](#_492_2)

真正有影響的反對是在迫害制度之內。當地法庭的法官，往往能實施有效的減刑，甚至以證據不足的理由不愿受理案件。但在1937年夏季之后，大規模逮捕的幾乎所有受害者，改而面對三駕馬車的簡易程序，即三人特別法庭（通常來自內務人民委員會、檢察院和黨組織），以便繞開正規法庭。 [(495)](#_493_2) 即使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中，也有勇敢人士講出自己對大規模逮捕的反對，特別是對“富農行動”，因為它讓內務人民委員會許多地方官員聯想起1928至1933年的血腥混亂。斯大林和葉若夫在1937年7月召開“富農行動”會議，鄂木斯克省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愛德華·薩利在會上說他所在的區域：

只有少量的人民公敵和托派，不值得發起一場鎮壓行動。總的來說，我認為，事先決定多少人被捕和槍決完全是錯誤的。

會議結束后不久，薩利被捕，審判之后遭槍決。 [(496)](#_493_2)

米哈伊爾·施賴德爾是反對大規模逮捕的另一名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他在20世紀70年代所寫的回憶錄中，描述自己是一名“純粹的契卡人”。契卡成立于1917年，其創始人是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他的列寧主義理想一直是對施賴德爾的激勵。施賴德爾寫回憶錄是為了辯解自己在契卡的工作，稱自己為大恐怖的受害者。根據他的說法，在20世紀30年代，他已觀察到內務人民委員會同事的腐敗，轉而對斯大林政權感到失望。曾是體面、誠實的同志，如今為了自己加官晉爵，不惜使用任何酷刑來折磨“人民公敵”。施賴德爾也因逮捕的規模而感到不安，實在不信有這么多的“人民公敵”。但他不敢透露心里的疑惑，怕被舉報，而且很快發現許多同事都有這一恐懼，但沒人敢于打破這合謀的沉默。一名廣受信任的同事消失了，其戰友最多會說他可能是個“老實人”，而沒人敢說他可能是無辜的。因為這樣做，會承擔遭人舉報的風險，會被控對清洗運動存有懷疑。施賴德爾回憶：“沒人弄得清楚，為何有這么多的逮捕。但沒人敢于開口，因為這會引起懷疑是在幫助人民公敵，或是在相互勾結。” [(497)](#_494_2)

好幾個月，施賴德爾默默看著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被捕和槍決，但無法表示反對，他慢慢蛻變成了某種形式的良心抵制者，拒不出席在盧比揚卡院子對內務人民委員會同事的槍決。到1938年春季，施賴德爾被調至阿拉木圖，成為哈薩克斯坦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斯大林的連襟）的副手。施賴德爾和雷登斯成為好朋友，兩家住在緊鄰隔壁，相互串門頻繁。施賴德爾注意到，雷登斯對手下的酷刑手段愈益厭惡，他認為雷登斯是一個性情中人。另一方面，雷登斯也感受到，施賴德爾對大恐怖中的操作方式與自己一樣抱有懷疑。一天深夜，他倆乘車出城，停車后開始步行。到達司機聽不到的地方時，雷登斯對施賴德爾說：“如果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還活著，我們當中有很多人會因現在的工作方式而被他槍斃。”施賴德爾裝作聽不明白，如果輕易對此類思想表示贊同，足以保證自己即刻被捕，而他不能肯定他的上司說的話不是一種試探。雷登斯仍在繼續，施賴德爾終于弄清他說的都是肺腑之言。隨之，施賴德爾也敞開自己不安的靈魂。一旦這種信任獲得建立，這兩個男人得以傾訴心聲。雷登斯感到遺憾的是，所有體面的共產黨人都被消滅了，而葉若夫之流卻逍遙法外，毫發未損。但仍有更危險的話題，他也不敢涉及。施賴德爾回思這些低聲交談，認為雷登斯對大恐怖的了解，遠遠超過他所談及的。“他的地位和當時情境，迫使他和我們一樣，即使在知心朋友面前也不點明真相；有些事情，也只好避而不談。” [(498)](#_495_2)

與雷登斯的談話給施賴德爾壯了膽，他因此而感到懊悔和憤怒。他寫信給葉若夫，為內務人民委員會一名老同事以及他妻子的一個表弟（仍是在莫斯科的一個學生）被捕之事抗議，愿意擔保兩人的清白。幾天后，即1938年6月，雷登斯收到葉若夫的電報，命令他逮捕施賴德爾。他在雷登斯的辦公室中獲悉此一消息，便懇求雷登斯向斯大林求情：“斯坦尼斯拉夫·弗蘭采維奇，你很了解我，你畢竟是他的連襟，這里肯定有錯。”雷登斯回答：“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我會為你緩頰，但我擔心恐怕無戲可唱。今天是你，明天無疑就會輪到我。”施賴德爾被關入莫斯科的布提爾基監獄，到1940年7月，被判處10年勞改，外加3年流放。雷登斯被捕于1938年11月，1940年1月遭槍決。 [(499)](#_496_2)

五

1937年5月，艾萊娜·邦納的父親被捕的那個晚上，母親叫她去與姨媽安雅和舅舅列瓦暫住，以避開內務人民委員會抄家。14歲的艾萊娜穿越列寧格勒的大街，去敲親戚家的門。艾萊娜回憶：“門馬上開了，他們好像在等我。”隨之她向姨媽和舅舅作了解釋。舅舅變得驚恐萬分，又氣又惱，開始詢問有關她父親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進他們的公寓。安雅說了什么，列瓦幾乎朝她大叫：“安雅，該死的，你總是這樣……”他伸出右臂，擋住門道，不讓我進去，然后以大聲且快速的耳語說：“我們不能讓你進來，我們做不到。為什么？你難道不明白嗎？”他如此重復好幾次，唾沫四濺。安雅又說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動，但聽不到聲音，只有列瓦的耳語，卻聲如吶喊，蓋住了一切。我退出來，直到我的背脊頂上了走廊的欄桿。門砰的關上了，我站在那里，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臉，開始下樓，還沒走下樓梯又聽到開門聲。我轉過身來，列瓦就站在門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沒說，又開始慢慢關門。我朝他喊“壞蛋”，看見他的臉瞬間變得蒼白。 [(500)](#_497____Ibid___p__91)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鄰居甚至近親的遺棄，這樣的故事不計其數。人們害怕與“人民公敵”的家屬接觸，寧可穿過馬路避開他們，在走廊上遇見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與他們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們收起已經消失的親屬和朋友的照片，有時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們的面孔。正如索爾仁尼琴所說：

最溫和同時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壞事，只是漠視旁邊的倒霉人，不給予幫助，畏縮不前，轉身離開。他們已經逮捕你的鄰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卻保持沉默，裝作一無所知。 [(501)](#_498_2)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回憶丈夫的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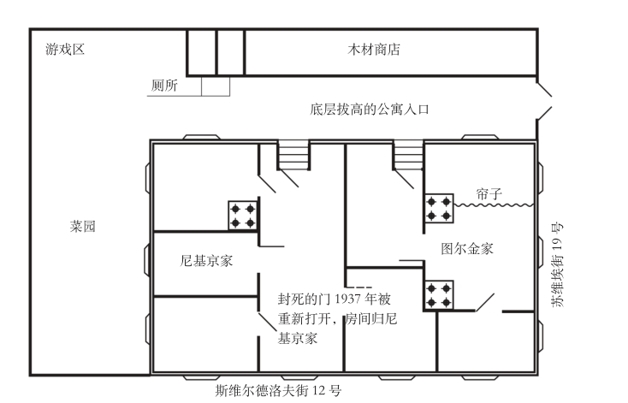
人們以特殊的語調跟我講話，變得怕我。見我走過來，有些人特意穿到馬路對面。但也有人對我特別注意，這是他們的勇敢，大家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502)](#_500____Bonner__Mothers_and_Daug)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蓋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納·戈拉的鄉間別墅。遵從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們帶去詩人亞歷山大·別茲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親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會收留這兩個女孩。但詩人開車把她們送到最近的火車站，讓她們坐上開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車。伊娜回憶說：“他太害怕了，不愿牽涉其中。以前，他經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現在，他和妻子剛有一個嬰兒，恐懼壓倒了他的義氣。” [(503)](#_501____A__Solzhenitsyn__The_Gul)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爾瓦拉·布德克維奇夫婦于1937年7月被捕，女兒瑪麗亞和她的弟弟馬上被趕出列寧格勒共用公寓的兩個房間，轉而分配給他們的鄰居——一對帶3個小孩的夫婦。這兩戶鄰家曾友好相處，直到1937年鄰居的妻子向內務人民委員會舉報布德克維奇夫婦是反革命分子和間諜（斯坦尼斯拉夫有波蘭血統）。她甚至聲稱，身為歷史研究學者的瓦爾瓦拉其實是一名妓女，會把客人帶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兒院，剛剛14歲的瑪麗亞只得自生自滅。最初幾天，瑪麗亞住在學校朋友的家里，后來總算找到一個居所。一名布爾什維克官員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議瑪麗亞去詢問前鄰居有無父母的消息。瑪麗亞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卻受到敵視：

我的上帝，他們竟然怕我，甚至不讓我走進公寓。你能想象嗎？占用我們房間的女人，看到我顯得非常惱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還是在擔心他們會來逮捕她丈夫，我已記不得了。也許，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煩。不管如何，他們不愿幫忙。那個女人只是說：“我什么都不知道，沒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嗎？請不要再來這里！” [(504)](#_501_2)

鄰居一夜之間竟成陌路人。將近30年，圖爾金一家與尼基京一家隔鄰而居。他們共用一棟三層木樓的底層，位于彼爾姆的蘇維埃街和斯維爾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圖爾金家7口人（亞歷山大、維拉和他們的兩個女兒，維拉的母親、弟弟和妹妹）占用右側的3個房間，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側的3個房間。亞歷山大·圖爾金是一名老布爾什維克，在彼爾姆的地下活動時期，曾是斯維爾德洛夫的戰友。像全家人一樣，亞歷山大也在莫托韋利哈鋼鐵廠工作，還是當地報紙的記者，又在地區法庭擔任法官。1936年，他作為托洛茨基分子入獄。他的妻子也是該廠工人，對政治不感興趣，將他的罪行認作“已獲證明的事實”。維拉的母親非常強勢，掌管圖爾金家的一切，也認為亞歷山大有罪。她從客廳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臉，并說：“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敵人，就必須將他清除出去。”維拉在事故中受傷（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無權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韋利哈鋼鐵廠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頭報亭賣報。維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廠辭退。其時，妹妹瓦利婭已經懷孕，其丈夫立即拋棄了她，并以政治理由獲得離婚批準。家里入不敷出，掙扎于貧窮困苦的深淵，從來都填不飽肚子。據維拉的女兒說，最難承受的還是朋友和鄰居的排斥：



位于彼爾姆的圖爾金家和尼基京家的公寓格局圖

大家都怕我們，害怕與我們交談，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們身上有瘟疫，會傳染給他們……我們的鄰居避開我們，禁止他們的孩子與我們一起玩……在1936年[亞歷山大被捕時]，還沒有人談及“人民公敵”——只是保持緘默。到1937年，每個人都把我們叫做“人民公敵”。

尼基京一家也嫌棄自己的鄰居。阿納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韋利哈鋼鐵廠擔任資深會計，也許是害怕被解雇，便與圖爾金家庭斷絕一切交往。兩家曾在共用廚房一起進餐，兩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現在，他們則各管各家，聲氣不通。尼基京甚至寫信給蘇維埃，背棄老鄰居，因此而獲得獎勵，分得原屬圖爾金家的一個房間。為了騰出這個房間，瓦利婭和嬰兒只好搬進弟弟和母親共用的隔壁房間。阿納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婭的房間，重開了一道門，與自己家這邊的公寓相通。 [(505)](#_502_2)

奧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亞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樣的排斥。他們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幾乎都沒有糊口的錢。朱莉婭轉而求助于黨內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奧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爾茨。朱莉婭去敲他家的門，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這里，他就會把我攆走。他要我告訴你，他不認識你。”朱莉婭然后去找1917年以來的熟人采采利婭·博布羅夫斯卡婭，她也是一名老布爾什維克。起初，她也拒絕，后來同意讓朱莉婭進去“談幾分鐘”，因為她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聽朱莉婭的故事，只含淚告訴她：“直接去找有關當局，找葉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沒人會幫你，也沒人能幫你。”幾天后，朱莉婭在地鐵站遇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維克托·諾根的遺孀：“她看看我，一言不發……然后拉佩夫——與皮亞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鐵路員工——走進車廂，看到我，馬上轉過身子，臉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婭的兒子伊戈爾和弗拉基米爾，同樣遭受了朋友們的遺棄。弗拉基米爾最要好的朋友葉夫根尼·洛吉諾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親是斯大林的秘書。事實上，沒人再上門。弗拉基米爾在學校里變成受眾人欺凌的對象。他回憶：“他們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敵，還偷我的東西，諸如書籍和衣服，因為他們知道我不能保護自己。”朱莉婭處在隔離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棄，她開始反思人類關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這些日子，人際關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顯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態，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質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們失去了一切，沒有住的，沒有吃的，但沒人愿意伸出一個相助的手指。我們正在慢慢死去，但無人問津。 [(506)](#_503_2)

如艾萊娜·邦納所發現的，即使是親戚，也會嫌棄“人民公敵”的家庭。阿列克謝·葉夫謝耶夫和妻子納塔利婭是活躍的共產黨人。阿列克謝是一名醫生，在性病方面擔任紅軍的高級顧問，納塔利婭是遠東木材托拉斯的經濟學家。他們和女兒安吉麗娜一起住在遠東地區的哈巴羅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謝和納塔利婭被開除出黨（阿列克謝與瓦西里·布柳赫爾元帥有牽連，后者的遠東軍是清洗的主要對象，其在中國的化名為加倫將軍）。當時15歲的安吉麗娜記得父親被開除出黨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飛魄散，回到家，戰戰兢兢地說：“他們會來抓我。”我只是一個15歲的蠢姑娘，順口回答：“如果你被捕，這意味著它是必需的。”因為父親以前總對我說：“如果他們被捕，這意味著它是必需的。”我的這句話一生都回蕩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實在弄不明白，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謝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參與了“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法西斯陰謀”（1938年3月在哈巴羅夫斯克遭槍決）。他被捕后，納塔利婭和安吉麗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納塔利婭害怕自己被捕，趕緊帶著安吉麗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兒留給娘家的親屬。15歲的安吉麗娜面臨一個危險：一旦母親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兒院。但納塔利婭的親戚中沒人愿意幫忙，他們都是狂熱的共產主義者。納塔利婭的妹妹是共青團積極分子，被問及能否收留安吉麗娜時說：“讓蘇維埃政權把她養大吧，我們不需要她。”納塔利婭的媽媽更為敵視，當面告訴她的外孫女：“我恨你的父親，他是人民公敵。我也恨你。”好幾天，納塔利婭和女兒只能睡在公園長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謝在莫斯科大學學醫時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倆。格里加洛夫一家冒著極大的風險將安吉麗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離克里姆林宮僅一箭之遙。安吉麗娜沒有在蘇維埃首都的居住護照，但共用公寓的鄰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視而不見：因為最好還是與醫生為鄰。納塔利婭把女兒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羅夫斯克，幾星期后被捕。 [(507)](#_504_2)



1937年，古爾契拉·塔吉羅娃和孩子們（中間是列澤達）。這張照片是在薩拉普爾鎮照相館拍的，寄給了監獄中的沙姆蘇瓦利

沙姆蘇瓦利和古爾契拉·塔吉羅夫夫婦在巴爾達的韃靼地區擔任教師——該地位于彼爾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蘇瓦利是革命的積極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體農莊中發揮主導作用。他作為穆斯林民族主義者被捕于1936年（槍決于1938年），同時遭殃的還有34位巴爾達地區的韃靼教師和宗教領袖。古爾契拉只得獨自撫養6個孩子，老大11歲，老幺才出世幾個星期。她是村里少數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韃靼文和俄文），所以頗受村民的尊重，獲得足夠的糧食來養活家人。前來執行逮捕的警察，為逮捕像塔吉羅夫那樣的好人而滿懷悔恨，主動幫助古爾契拉一家。他送來牛奶，或讓孩子們去他家吃飯。他每星期為古爾契拉和囚禁在巴爾達的沙姆蘇瓦利傳遞一次郵件，自己也給沙姆蘇瓦利寫信：“請原諒我，我別無選擇。他們強迫我執行逮捕，我知道你是無辜的。我現在要贖回我的罪，幫助你的家人。”古爾契拉繼續在阿克巴什村小學擔任教師，只是她教的課經常有內務人民委員會人員的監視，審查她說的話中有無穆斯林民族主義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蘇維埃主席的舉報，古爾契拉和6個孩子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全部家當放在一輛馬車上，他們走了20公里，來到沙姆蘇瓦利的母親及其長子住的葉克舍爾村。他們有一棟兩層樓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間。沙姆蘇瓦利的母親受過教育，篤信宗教，房內擺滿書籍，但拒絕收容他們。她在兒子被捕一事上責怪古爾契拉，她已聽到兒媳婦與那位警察的謠言，也許在懷疑古爾契拉參與了沙姆蘇瓦利被捕之事。古爾契拉的女兒列澤達認為，父親的親屬擔心古爾契拉是“人民公敵”，對丈夫的被捕負有責任，還有可能危及親屬。沙姆蘇瓦利的母親告訴古爾契拉，她的房子已經住滿，不能讓她搬進去，甚至不愿向長途跋涉之后的孩子們提供食物。當天晚上，沙姆蘇瓦利的弟弟全家搬進二樓的房間（他是一個商人，正在搬家，剛好賣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絕后，古爾契拉和孩子們只好向一名集體農莊工人租得一個村邊房間。沙姆蘇瓦利的母親曾來看望過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從此再沒出現。古爾契拉和孩子們在葉克舍爾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絕往來的塔吉羅夫一家。古爾契拉回憶：“最痛苦的是看到他們走過我們的街道——肯定沒人在監聽——仍然不跟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招呼都不打。”古爾契拉的孩子們與他們的堂兄弟，在同一村莊一起長大，但很少相處。列澤達回憶：“我們和他們一起上學，但從沒在一起玩，也從沒去過他們的家。他們對我們總是很冷淡，我們也以牙還牙。” [(508)](#_505_2)

恐懼誘發出人身上最糟糕的東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鄰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極大的風險，以非凡的善良幫助“人民公敵”的家人。他們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錢，安頓被趕出家門的人。還有布爾什維克和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員，憐憫受害者的家人，盡力協助他們：或警告將臨的危險，或幫助查尋被捕的親人的下落。 [(509)](#_506_2)

1937年3月，建筑師米哈伊爾·斯特羅伊科夫，在流放地阿爾漢格爾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萊娜和10歲的女兒朱莉婭，獲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爾采烏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屬流放者，帶著妻子塔蒂亞娜和10歲的兒子奧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鎮，與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從小學的是藝術，被捕之前曾在蘇維埃空軍擔任飛行員，此時在莫扎伊斯克無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亞娜支撐兩個家庭。朱莉婭回憶：“為了不讓我們忍饑挨餓，他們賣掉一切財物。收留我們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母親外出尋找工作，朱莉婭就由阿爾采烏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鄰居的舉報，說他窩藏“人民公敵”的女兒，再次被捕，監禁一段時間后被槍決。他的妻子塔蒂亞娜繼續庇護朱莉婭，但小心翼翼，不讓惡毒的鄰居知道。最終在1938年，塔蒂亞娜把朱莉婭悄悄帶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暫時代為照料，直到她母親找到工作。艾萊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帶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鎮普什季諾。康斯坦丁的關系幫她在莫斯科藝術家委員會找到了工作，負責制作蘇維埃領導人的畫像。艾萊娜最終成為蘇維埃領導人的重要肖像畫家之一。對這位“人民公敵”的妻子來說，這真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 [(510)](#_508_2)

奧列格·柳波琴科的父親是一名烏克蘭記者，被捕于1934年，槍決于1937年。住在基輔的奧列格和母親維拉遭到流放，最后來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鎮馬洛亞羅斯拉維茨。他們雖然沒有莫斯科的居住護照，卻經常去阿爾巴特地區的共用公寓。維拉的家庭曾是梁贊知名的地主，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住在那個共用公寓，況且，維拉的妹妹一直都沒離開。從1936到1941年，奧列格和母親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盡管這也可算作窩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風險。寓長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婭·科伊丘娜，她對此尤表支持。內戰結束時，最開始邀請維拉家人住入該公寓的就是她。其時，她從梁贊來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維拉家人。她在梁贊時就認識奧列格的父親，知道他被槍決是一樁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們的做法，她常說：“我們有法律，但沒有合法性。”居民委員會主席是一名積極的共產主義者，但也有惻隱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奧列格回憶，他或母親偶爾走進庭院，或是該主席偶然看見他們從側門進來，她都會“以嚴肅的表情，將目光移開，似乎在盡量回避我們”。 [(511)](#_509_2) 阿爾巴特的住宅區是首都的顯赫地區，深受大恐怖的沖擊，卻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亞·斯拉溫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兒依達被逐出他們在列寧格勒蘇維埃大樓的三室公寓，搬進一個共用公寓的小房間，僅8平方米，沒有水電，位于列寧格勒的偏遠郊區。5個月后，埃斯菲莉也被關入克列斯蒂監獄，判處8年，前往專為祖國叛徒的妻子而設的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ALZhIR），位于哈薩克斯坦。16歲的依達曾是教授的女兒，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現在突然要自生自滅。她回憶道：“我對日常生活的瑣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價格或如何洗衣。”依達在列寧格勒沒有親屬，無法養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學和他們的父母，他們輪流收容她，每次僅持續幾天（如果時間偏長，鄰居就會起疑，就會舉報他們窩藏“人民公敵”的女兒）。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額外的住宿和食物確是實實在在的負擔。對依達來說，這種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們不僅給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達學習努力，力爭通過考試進入十年級。那是中學的最高年級，讀完就可申請高等學院。她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一份清潔工作來支付小房間的租金。每天，上學的通勤時間是3小時，做清潔工作的通勤時間是1小時。每周兩個晚上，她還在監獄前排隊，試圖找出父母關在何處、是否還活著。

幫助依達的還有她學校的校長克拉夫蒂婭·阿列克謝耶娃。她是頗受尊敬的老黨員，一直在學校里抵制黨的清洗，盡一切可能悄悄保護那些父母已被定為“人民公敵”的孩子。譬如，她組織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達，還有許多其他孤兒。有一次，阿列克謝耶娃勇敢地駁回共青團要開除一名15歲女孩團籍的決定，因為她“沒有揭發”自己作為“人民公敵”被捕的母親。依達回憶，克拉夫蒂婭選擇了一個相對簡潔的戰術。斯大林有一條著名的“指示”：“兒子無須為父親負責。” [[4]](#_3_13) 她在遵循該指示時，故意顯得“天真”而“迂腐”。

我們學校里有許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虧了克拉夫蒂婭，沒人被開除。沒有發生在其他學校的那些可怕的會議——孩子在會上不得不背棄自己的父母……母親被捕后，我去上學。克拉夫蒂婭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告訴我，我在學校的伙食費用將由家長委員會支付，直到學年的結束。她還建議我寫信，以健康理由申請免于考試[從而使依達自動升入十年級]。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婭·亞歷山德羅夫娜，我的身體很好。”她聳聳肩，微笑著向我眨眨眼。

依達獲得考試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艱辛，多次瀕臨退學：

我考慮退學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婭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告訴我：“你父母將會回來——你必須相信這一點。如果你未能完成學業，讓自己成為有用之人，他們將不會原諒你。”這激發了我繼續求學的決心。 [(512)](#_509_2)

依達最終成為一名教師。

依達·斯拉溫娜不是唯一獲得校長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學艾萊娜·邦納也獲益匪淺。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萊娜晚上從事清潔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學費（1938年在中學推出的新規定）。她決定離開學校，找一份全職工，再上不用付費的夜校。艾萊娜將申請表格交給阿列克謝耶娃，請求她的批準。

克拉夫蒂婭·亞歷山德羅夫娜拿過表格，讀完后站起身，關上她辦公室的門，然后輕聲說：“你覺得我會收你的學費嗎？去吧！”

為了獲得免費資格，艾萊娜必須向黨干部，即共青團組織者，提出申請。他的職責是“留心學生和教師的政治道德態度，把學校里的每個人都嚇得要死——儼然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代表”。邦納嚇得不敢提出申請，她的學費結果是某個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婭自己。艾萊娜回憶，她班上共有24名學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們知道自己是誰，但都不說，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樣處世行事……我幾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學生都與我一起讀完了十年級——都是我們校長救下的。 [(513)](#_511____O__Liubchenko___Arbat_30)

對于像依達·斯拉溫娜那樣的孩子來說，在所有的職業當中，教師這一角色最為頻繁地擔當了他們的保護人，甚至是大救星。許多教師，特別是在斯拉溫娜就讀的精英學校，都曾接受舊知識分子人道主義的熏陶。依達回憶：“我們的老師中的大多數，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富有仁愛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們的體育老師曾是沙皇軍官，在內戰中投入紅色騎兵軍的戰斗。他能流利使用3種歐洲語言……我們有劇團和詩歌俱樂部，都是我們教師鼓勵籌辦的。我現在才意識到，這些活動讓我們接觸到“蘇維埃教室”所沒有提供的19世紀文學。我們的歷史教師馬努斯·諾德爾曼，既是精彩的說書人，又是歷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規蹈矩，無論是想法，還是穿著，都有點古怪，趨向于波希米亞風格。他在上課時小心翼翼地避開當時歷史課所必需的斯大林個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 [(514)](#_512_2)

父母在1937年被捕時，斯韋特蘭娜·切爾卡索娃只有8歲，與叔叔同住，在列寧格勒上學。她的老師維拉·葉利謝耶娃教導其他同學要善待斯韋特蘭娜，因為她是“不幸人”（19世紀慈善機構的用詞）。斯韋特蘭娜回憶：

我們班上沒有人民公敵——這是我的老師講的。她還有心幫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個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總是臟兮兮的，沒鞋沒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錢給他買了一件外套，把他帶回家，幫他清洗。 [(515)](#_513____Bonner__Mothers_and_Daug)

維拉·葉利謝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也曾受到學校教師的善待，從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喬爾莫茲鎮。他的物理教師拿出自己的錢讓他買午餐，因為他家里負擔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謝，但她把錢塞入他手里時將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聲。她不想讓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幫助“人民公敵”的兒子，以免自找麻煩。德米特里回憶：

一句話都沒有，我從沒機會向她道謝。她會在餐廳的外面等我，塞給我3個盧布。我走過時，她也許會低聲說上一言二語——鼓勵我的話——僅此而已。我從沒跟她講過話，她也沒跟我真正交談過，但我心中充滿了極大的感激，她能心領神會。 [(516)](#_513_2)

伊娜·蓋斯特的學校（第19學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蘇維埃領導人居住的河堤大樓，學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學生。如果他們在附近的莫斯科實驗學校（MOPSh，很受布爾什維克精英的青睞）上學，就會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當地開除，或被迫發表背棄的聲明。但在蓋斯特的學校，氣氛決然不同，教師對自己的學生采取自由和保護的態度。父母1937年6月雙雙被捕后，伊娜回校開始新的學期，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告訴教師。伊娜解釋，“我們從小長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學習”，擔心也要像這位少年英雄一樣，揭發自己的父母。但是，當她最后鼓起勇氣坦陳一切時，老師只是說：“好吧，那又怎么樣？現在讓我們去上課。”伊娜的父親是備受矚目的布哈林公審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師也不在乎。學費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師掏出自己的薪水幫她代付（同校的奧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爾，獲得了另一位教師的資助）。由于有這一批勇敢的教師，第19學校成了“人民公敵”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勵，保護自己的同學。伊娜憶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惡劣的男孩（他是父母從孤兒院領養的，伴有嚴重的行為缺陷）。那個男孩編制一份名單，列出班級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敵”的孩子），貼在教室墻壁上，結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擊。伊娜還記得一起與圖哈切夫斯基公審有關的事件。其時，蘇維埃學校奉命從教科書上清除這名“人民公敵”的相片。蓋斯特的學校則有不同的對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課本里圖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須，或加上一對牛角。我們的老師拉希爾·格里加洛夫娜說：“我已告訴女生，現在再告訴你們男生。我給你們每人一張紙，貼到書上，整整齊齊的，蓋住圖哈切夫斯基的臉，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壞人，是人民公敵。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會回來，被我們重新當做好人。到那時，你只要掀起這張紙，一點也不會損壞他的臉。” [(517)](#_514_2)

六

1937年10月14日，索菲亞·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在黑海度假勝地蘇呼米鎮被捕。當時，她還不知道丈夫弗拉基米爾已于3天前在莫斯科被捕。弗拉基米爾是索菲亞的第二任丈夫，而索菲亞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夫婦倆1927年在布拉格相遇。其時，弗拉基米爾是蘇維埃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來改任駐波蘭大使和駐西班牙巴塞羅那的總領事）。他是一名老布爾什維克，曾在1917年10月領導向冬宮發起的強攻。1937年，弗拉基米爾被召回莫斯科，改任司法人民委員。其時，夫婦倆依然非常相愛，現在索菲亞的被捕似乎改寫了一切。她被帶回莫斯科，在牢房中給弗拉基米爾寫信，乞求他相信自己是無辜的。但索菲亞有所不知，讀到此信的弗拉基米爾，已身陷莫斯科的另一間牢房。

[莫斯科]，16/X. 監獄。



1936年，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與妻子索菲亞（右）及繼女瓦倫蒂娜（瓦莉奇卡）

親愛的，不知你能否收到此信。不知何故，我覺得，這是我最后一次給你寫信。我們總是說，如果有人在我們國家被捕，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和確鑿罪證的——總歸是有理由的，你還記得嗎？毫無疑問，我的案件中也會有理由，但我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的一切，你都知道，因為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琴瑟和諧。無論發生什么，我將永遠感謝我們見面的那天。我生活在你的光環之下，并為之而感到驕傲。在過去3天中，我一直在回顧自己的一生，為死亡做好準備。我想不出任何東西（除了將人與“天使”區分的普遍缺陷）可被視作犯罪，無論是與他人的關系，還是與我們國家和政府的關系……我的想法和你的完全一致——對我們的黨和國家，還有人比你更敬業嗎？你深知我的心，知道我的行為、思想、文字的真諦。我入獄這一現實，無疑表明我已經有了錯——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忍受你不再信任我的念頭……它蠶食我已整整3天，在我腦子里灼燒不已。我知道，你不能容忍一切不誠實。即使是你，也有可能弄錯。似乎，列寧也有失誤。所以，當我說沒做錯事時，請相信我。我的愛人，相信我……還有一件事，現在是瓦莉奇卡[索菲亞第一次婚姻的女兒]申請加入共青團的時候，這無疑會造成障礙。她會把母親當做一個壞蛋，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充滿悲傷。我處境中最恐懼的，是人們不再相信我，我無法如此生存下去……我向我愛的每一個人請求寬恕，因為我帶來了這些不幸……原諒我，我的愛人。我真想知道你仍愿意相信和原諒我！你的索菲亞。 [(518)](#_515_2)

大恐怖破壞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懷疑丈夫，丈夫懷疑妻子。在各種家庭關系中，率先斷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紐帶。20世紀30年代的孩子，從小學習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英雄榜樣，接受諄諄教誨，篤信斯大林、蘇維埃政府及蘇維埃報刊上讀到的每一個字，即使這些文章將自己的父母稱作“人民公敵”。孩子一直在承受來自學校、少先隊、共青團的壓力，一定要背棄被捕的親人，否則就會在教育和事業中自食其果。

列夫·采爾莫拉夫斯基18歲那年，即1938年，他父親——曾是突擊工人和軍事工程師——在列寧格勒被捕。他自己是共青團員和見習飛行員，一直夢想加入紅軍。父親被捕后，列夫沒有經受審判就作為“社會異己分子”，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城。他在當地的工廠上班，母親和兩個姐姐住在500公里之外的卡扎林斯克地區。1938年9月，列夫寫信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背棄自己的父親，同時呼吁廢除兒子因父親的罪行而受懲罰的原則：

關于我父親的幾句話。母親告訴我，他作為反抗者，被流放去了北方勞改營。我本人從不相信，因為我親耳聽到他曾告訴他的姐妹他與白軍在北方的浴血奮戰。他還告訴我們自己以前的戰功。基洛夫遭到暗殺時，他哭了……這也許是很聰明的偽裝。好幾次，他倒是告訴過我，曾去過華沙……我想，父親應有機會為自己作出解釋，但我不愿承受他所鑄成的恥辱。我想在紅軍服務，成為一名享有平等權利的蘇維埃公民。我覺得，自己一直在蘇維埃學校接受蘇維埃精神的教育，配得上這一稱號。因此，我的思想顯然完全不同于他的。但我必須攜帶異己分子的證件，這太令人心碎了。 [(519)](#_516_2)

父親和叔叔——都是哈爾科夫的工人——在1937年被捕時，安娜·克里夫科才18歲。她遭到哈爾科夫大學開除，又作為異己分子被共青團踢出。她到處尋找工作，以供養母親、外祖母和尚是嬰兒的妹妹。她在養豬場工作了一段時間，不久遭到解雇，因為他們發現了她父親的被捕。之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其他就業機會。1938年1月，安娜寫信給蘇維埃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弗拉斯·丘巴爾，與自己的父親斷絕關系，懇求丘巴爾幫助她的家人。安娜揚言，如果不能在蘇聯過上正常生活，就要殺死妹妹和自己。安娜的背棄信頗為極端，因為她極想證明她是忠誠的斯大林主義者，值得救贖。也有可能，她確實憎恨自己的父親給家人帶來這么多災難：

我不知道我父親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絕對相信，無產階級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們被判了刑，那就意味著他們是罪有應得。對父親，我沒有作為女兒的感情。對祖國、教育我的共青團，以及共產黨，我有蘇維埃公民更高層次的義務。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決定，那是1.7億無產者的聲音，我為它的判決感到歡欣鼓舞。我父親自己承認，曾被征入鄧尼金的軍隊，在1919年擔任白軍衛兵3個月，為此在1929年被判刑兩年半[在勞改營]。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察覺到他反蘇維埃的任何舉措——盡管他是我的父親——我也會向內務人民委員會揭發，沒有片刻的猶豫。丘巴爾同志！請相信我。稱他為父親，我都感到非常羞愧。人民公敵不配做我的父親，只有教我無情憎恨全體惡棍和敵人的人民，才能承當這種稱號。我滿懷希望，無產階級、列寧的共青團、列寧和斯大林的黨，將取代我的父親，把我當做他們真正的女兒，在人生道路上為我指引方向。 [(520)](#_517_2)

有些家長在被捕后，鼓勵孩子背棄自己，以免危及他們在社會或事業上的前途。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1937年在喀山監獄遇見一位名叫麗莎的女子——她在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長大，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大街上度過的，因為母親行乞為生。1917年之后，麗莎在工廠上班，入黨，嫁給工廠管理委員會一名布爾什維克官員。他們的生活舒適，培養兩個女兒成為模范少先隊員，大的叫卓婭，小的叫列婭列婭。麗莎告訴奧莉加：“有時，我們在工廠安排兒童之晨的活動。”

我們的小妞妞卓婭身穿絲綢連衣裙，頸系少先隊紅領巾，站起來引吭高歌。我丈夫對我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我們卓婭更棒的女孩了。她長大后將成為一名人民藝術家。”我隨即會想起自己童年時挨家挨戶的乞討日子……我熱愛我們的蘇維埃政府，愿為它獻出我的生命。

麗莎的丈夫作為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被捕。（麗莎說：“如果我早知道他背叛了列寧，我會用自己的雙手掐死他。”）不久，她自己也被捕。有一天，麗莎收到卓婭的來信。其時，麗莎正好在給卓婭寫信，那天恰好是囚犯獲準寫信的周六。

親愛的媽媽，我現在15歲了，計劃加入共青團，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罪。我一直在想，你怎么可以背叛我們的蘇維埃政權？畢竟，我們過得很好，你和爸爸都是工人。我記得，我們生活得不錯，你為我們做絲綢連衣裙，買糖果。你真的拿了“他們”[人民公敵]的錢？假如你當初只讓我們穿棉布裙，豈不更好。但也許，你根本就是無辜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不會加入共青團，并將因為你的遭遇而永遠不會原諒他們。如果你確實有罪，我不會再寫信給你，因為我愛我們的蘇維埃政府，恨它的敵人。如果你是其中一員，我也會恨你。媽媽，告訴我真相。我寧可你是無辜的，我就不想加入共青團了。你不開心的女兒，卓婭。

為了給卓婭寫信，麗莎已用掉配給的4頁信紙中的3頁。她思忖片刻，然后以大寫字母在最后一頁上寫下：

卓婭，你是正確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團。這是我最后一次給你寫信。祝你和列婭列婭快樂。母親。

麗莎讓奧莉加看那些信件，然后頭撞桌子，哽咽著說：“讓她恨我好了，沒有共青團，那她怎么活呀——異己分子？她會恨蘇維埃政權的。還是讓她恨我吧。”奧莉加回憶，自那以后，麗莎“再也不談自己的女兒，也不再收到來信”。 [(521)](#_518_2)

就許多孩子而言，親人的被捕引起種種疑問。他們作為“蘇維埃兒童”所篤信的原則，突然與他們對自己親人的了解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父親作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時，維拉·圖爾金娜都不知道相信什么好。父親在彼爾姆是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母親和外祖母都相信了他有罪，蘇維埃報刊也在登載他的犯罪活動。無論走到哪里，維拉都會聽到人們在嘀咕她這個“人民公敵”的女兒。維拉回憶：“父親成了奇恥大辱的根源。”

人們對我說，如果他被捕，一定是做了壞事。大家都說：“無風不起浪。”母親前往內務人民委員會辦事處詢問父親的案情，他們回答：“等著瞧吧，他會坦白一切的。”我也設想他有罪，不然，我還能信什么呢？ [(522)](#_519_2)

埃爾加·托爾欽斯卡婭是蘇維埃的模范學生，熱愛斯大林，崇拜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堅信有關“間諜”與“敵人”的一切宣傳。雖然父親于1937年10月被捕，她仍信念不改。父親是一名老布爾什維克，日益不滿斯大林的政策，但從不與女兒談及自己的政治觀點。在列寧格勒托爾欽斯基的家中，像許多其他家庭一樣，在孩子面前從來不談政治。因此，埃爾加對大規模逮捕的理解，全部來自她在學校里學到的——沒有其他途徑來了解父親被捕的原因，也無法來質疑它的發生。1938年，埃爾加的兩個叔叔也被拘捕。其中一位1939年從勞改營返回，向埃爾加透露自己在內務人民委員會手中所承受的酷刑。但這仍不能動搖她的信念：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是“由于他的所作所為”。1939年，到了16歲，她在共青團的申請表格中老實填寫父親是“人民公敵”，但謊稱他已與母親離婚，這是某種程度的背棄。埃爾加現在承認，她當時非常困惑，不敢存有任何懷疑，對父親的背棄只是出于無知。“我們都成了僵尸——這是我的想法。我的上帝，我們只是小女孩，一直接受共青團的教育，篤信我們被告知的一切。” [(523)](#_520_2)

啞巴吃黃連，加上新聞或信息的缺乏，都加劇了家人的焦灼不安。親人沒有被捕之人的消息，沒有證明清白的證據，也就尋覓不到救命稻草來抗衡公眾的有罪推定。

尼娜·科斯特利娜是老布爾什維克的女兒，有一個模范的蘇維埃童年，1936年底加入共青團。其時，大恐怖的第一波震撼已開始觸及她的政治意識。等到伯伯被捕，尼娜便想弄明白個中的緣由。她在1937年3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

發生了可怕且難以理解的事件。他們說，米沙伯伯牽涉于某種反革命組織。這是怎么回事呀？米沙伯伯——自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是黨員——突然變成了人民公敵！

她家的房東被捕后，尼娜思忖，如果逮捕發生在家里，自己會作何種反應：

發生了怪事。我思索再三，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父親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成為國家的敵人，我不會為他感到遺憾！我雖這樣寫，但（我承認）仍心存疑惑。

1937年12月，尼娜的父親也被開除黨籍并解除官職，他估計自己的逮捕即將到來，便寫信提醒尼娜：“你必須確信，你父親從來就不是一個壞蛋……從未以骯臟或卑鄙的行止來玷污自己的名譽”，此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父親最終被捕于1938年9月，尼娜雖陷入迷茫和絕望，但仍堅守父親是清白的這個信念。她在日記中寫道：

9月7日

籠罩我生命的是如此不祥的黑暗。父親的被捕又是如此沉重的打擊……在此之前，我一直理直氣壯，意氣風發，但現在……現在艾哈梅特夫[一個同學]可以對我說：“我們成了不幸命運中的同志！”想想吧，我是如何鄙棄他以及他那托洛茨基分子的父親。這個噩夢日夜折磨著我：父親也是敵人嗎？不，這不可能，我不相信！這是個可怕的錯誤！

尼娜的父親在獄中度過兩年，等待三人特別法庭的“審判”，最終作為“社會危險分子”被判處5年勞改。1940年11月，他寫了第一封家書。尼娜讀了美好的來信而深受感動，盡管有勞改營的艱辛，她仍能感受到父親的精神、力量和熱情。但母親很惱火，只是問：“他是有罪還是無罪？如果是無辜的，為何不去上訴？”下一封來信有效地回答了母親的疑問，尼娜的父親寫道：“關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講，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個肥皂泡，卻吹得像一頭大象。現在不是、過去不是、從來就不是的東西，叫我如何去反駁。” [(524)](#_521_2)

在一個家里，父親和丈夫的角色的突然消失，給家人帶來了巨大壓力。妻子背棄被捕的丈夫，不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的配偶可能是“人民公敵”（這種想法可能存在），而是因為這樣做，使生存下去比較容易，得以保護家人（許多丈夫為此而建議妻子背棄自己）。“人民公敵”的妻子承受國家的壓力，要公開背棄自己的丈夫，不愿照辦的，會面對嚴重后果。有些婦女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被送進勞改營，或帶上孩子，或與孩子分離。其他的被趕出家園，遭到解雇，喪失口糧和公民權利。經濟壓力也在發揮作用：工資停發、儲蓄凍結、房租提高。離婚費用通常是500盧布，為了鼓勵婦女背棄丈夫，與囚犯離婚的費用降至只需3個盧布（相當于食堂的一頓飯錢）。 [(525)](#_522_2)

頂住這些壓力，站在丈夫一邊，光憑一點勇氣是不夠的，還需要非凡的韌性。瓦西里·杜達列夫被捕于1937年，其時，他與伊琳娜的婚姻已持續約15年。20世紀20年代早期，他們相遇于斯摩棱斯克，一起接受教師的訓練。瓦西里是內戰時期的布爾什維克，后成為奧廖爾城的資深黨干部。1933年，他被調去羅斯托夫附近的亞速鎮——靠近頓河入海處，擔任當地的黨主管。伊琳娜在針織廠工作，不熱衷政治，但出于對瓦西里的愛而入黨，變成了“黨的妻子”。瓦西里被捕后，伊琳娜到處找他——不單是在監獄里找，還會去30公里之外的羅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鐵路站。每個星期日的晚上，都有滿載囚犯的火車駛向勞改營：

我會走在火車旁的軌道上，希望找到丈夫，讓他帶點生活用品上路。我看到很多列火車，結滿冰霜的貨車都已釘牢，甚至頂部的窗口也全以金屬條封死，只留下小小的縫隙。從貨車廂的內部，我能聽到低沉的嗡嗡聲。我一邊沿著火車走，一邊喊叫：“有杜達列夫嗎？”嗡嗡聲消失了，有時會有答復：“沒有”……后來有一天，有個聲音回答：“杜達列夫嗎？有的。”這是一名火車警衛……我拿出準備好的干凈衣服，裝入一個小包，交給警衛。他讓我寫一張紙條，說是“公事公辦”。我很高興，瓦西里現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沒有消息，他會以為我已將他背棄……我在紙條上列出交給警衛的東西，并簽署：“我很好，吻你。”幾分鐘后，警衛把包和紙條還我，紙條的背面已寫上瓦西里的筆跡：“都已收到，謝謝。”

伊琳娜從不懷疑丈夫的清白。內務人民委員會多次傳喚她，向她提供犯罪活動的“證據”，要她檢舉揭發，否則就要予以拘捕，但她每次都表示拒絕。伊琳娜還記得一次工廠的黨員會議，她被要求揭露丈夫的反國家罪行。在類似的情況下，大多數妻子只會聲稱自己從不知悉丈夫的罪行，但伊琳娜卻勇敢地否認丈夫犯了罪：

我獨自坐在會議桌的一端，其他人坐在另一端，擠在黨干部的周圍，沒人跟我說話。一位書記通報說，杜達列夫作為人民公敵已經被捕，現在要決定我的命運。黨員逐一發言，除了口號，他們沒什么好說的。在我的問題上，也沒說什么，只指責我欺騙黨。他們要我坦白丈夫的罪行，并解釋為何要隱瞞，但沒人朝我看。我試圖保持冷靜，字斟句酌，只作簡潔的回答。我說，與丈夫住在一起，已超過15年，只知道他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我入黨就是由于他的影響；我從不相信他參與了任何壞事。這引起很多人的輕聲低語，有人喊道：“但他已經被捕！”仿佛這就是有罪的證據。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試圖說服我站出來揭發杜達列夫的罪行，以履行一名黨員的職責，但沒人敢于說出對他的指控……只是一再要我揭發杜達列夫為人民公敵。但每一次，我都予以拒絕。

伊琳娜被開除黨籍，失去工廠管理委員會的職位，轉到會計部門，從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幾天后，鎮蘇維埃向她的公寓征收大筆稅款，所給的解釋是，她和丈夫幾年來使用了“額外的生存空間”，這是欠下的差額。1938年7月，伊琳娜因“未能檢舉丈夫的敵對活動”而被捕。同年12月她被釋放，得以返回斯摩棱斯克。 [(526)](#_524____The_Diary_of_Nina_Koster) 杜達列夫于1937年被槍決。 [[5]](#_4_10)

丈夫被捕后，朱莉婭·皮亞特尼茨卡婭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她愿意想到他的好，但奧西普留下的爛攤子讓她耿耿于懷——兒子們也有同感——他給家人帶來了不幸。16歲的伊戈爾覺得父親對不起他，父親的被捕使他承受了共青團朋友的排斥。12歲的弗拉基米爾指責父親摧毀了他加入紅軍的夢想。朱莉婭在日記中寫道：“沃爾卡[弗拉基米爾]對父親深惡痛絕，也為伊戈爾感到惋惜。”弗拉基米爾以前的朋友，現在反而要欺負他。他在學校經常遇上麻煩，更震驚于少先隊的一次沖突：少先隊隊長詢問他父親的情形，因弗拉基米爾拒答而當眾宣布：“你父親是人民公敵，怎么確定你與他的關系，就是你的責任。”

朱莉婭和弗拉基米爾之間不斷發生爭吵。有一次，母親拒絕寫信給葉若夫，以索回內務人民委員會抄家時帶走的玩具槍和軍事書籍，弗拉基米爾因此而大發脾氣。他氣憤地說：“這真是一個恥辱，至今還沒槍斃爸爸，他已是一個人民公敵。”另一次，他從學校回家，得了一個很差的分數，朱莉婭發了脾氣，當場咒罵他。她在日記上寫，她告訴他：“他的不良行為顯示，他就是人民公敵的兒子。”弗拉基米爾一邊大哭，一邊回答：“我生而為敵人的兒子，那是我的錯嗎？我不要你做我的母親了，我要去孤兒院。”朱莉婭威脅他，只讓他吃塊面包就去睡覺。弗拉基米爾回答，他會“割斷她的喉管”。結果，朱莉婭打了他兩記耳光。 [(527)](#_525____M__Baitalsky__Notebooks)

朱莉婭已是黔驢技窮。她被逐出自己的公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愈加懷疑自己的丈夫。朱莉婭問自己：“我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皮亞特尼茨基到底是誰？”

1937年7月20日

……昨天傍晚，我想起了皮亞特尼茨基，心中充滿了苦澀：他怎么會讓我們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他與那些人一起工作，知道他們的方法，卻沒有預見到他們會逼迫我們忍受一生的折磨和饑餓……對皮亞特尼茨基懷恨在心，也是入情入理的。他讓孩子受到摧殘，失去本來就不多的全部錢財。但是，偷走我們所有東西的人，到底又是誰呢？現在的當局等同于隨心所欲的恐怖——人人害怕。我都快要瘋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528)](#_525_2)

整整6個月，朱莉婭在日記中進行自我審訊，試圖弄明白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人。1938年2月7日被告知丈夫已受指控犯有間諜和反革命的罪行，朱莉婭便在日記中寫道：

他到底是誰？如果他是一名職業革命家，如他自稱的，也是我17年來所認為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圍都是特務和敵人，破壞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卻沒看出來……但很顯然，皮亞特尼茨基從來就不是一名職業革命家，而是一個職業歹徒和間諜。這解釋了他為何如此封閉，如此嚴厲。很顯然，他不是我們想象的人……我們大家——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對他來說，都毫無意義。 [(529)](#_526_2)

伊戈爾1938年2月9日被捕。兩名士兵來抓人時，他還在學校的教室里，后來監禁在布提爾基監獄。朱莉婭因擔心自己的兒子而陷入徹底的絕望。據弗拉基米爾說，她精神崩潰了——整天躺在床上，經常想到自殺。 [(530)](#_527_1) 唯一支撐她的是必須為兒子們而活的想法，她在日記中一再重復提及，已成了她的口頭禪。她在3月9日寫道：“最好還是去死，但我的沃爾卡和伊戈爾，將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親人。我是他們的一切，這意味著我必須活下去。”然而，朱莉婭有時感到如此沮喪，她能想象的唯一救贖就是斷絕一切關系，甚至是與兒子的聯系：

1938年2月17日

昨晚，我想，已找到了解決方法，但不是自殺。由于我薄弱的意志和深刻的絕望，這原本是最簡單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現在改成這一種新的思路：孩子不是必要的，把沃爾卡交給國家，自己只為工作而活——持續不斷地工作，停下來只是為了閱讀，活得更貼近自然……冷漠以對任何人。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只投身于工作，再也沒有會被帶走的親人。我為何要留住沃爾卡，于他何益？我已被埋在大山之下，無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無法幫助沃爾卡。他想要活下去，想要朋友、陽光、溫馨的家、有意義的生存，而我——只是反革命的妻子。 [(531)](#_528_2)

朱莉婭一直在揣摩奧西普和伊戈爾被捕的原因。她不同于弗拉基米爾，無法把奧西普當做“人民公敵”，也恨不起來。她在日記中指出：“沃爾卡在折磨我，因為我無法憎恨皮亞特尼茨基。起初我還以為我終究會恨他的。但到頭來，我還是有太多疑惑。”她嘗試與弗拉基米爾講道理，認為父親“可能是無辜的，他們弄錯了，父親上了敵人的當”。 [(532)](#_529_2) 但朱莉婭相信“人民公敵”的存在，經常在日記中指出“可疑”人士，更對蘇維埃法庭的公正深信不疑。她在布哈林公審時期堅信，槍斃“惡人”是很正確的。她在政治上很天真，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弄懂吞噬自己的現實。讓布哈林充當摧毀她家的替罪羊，她欣然接受。布哈林和他的共同被告于1938年3月被處決，朱莉婭的評論是：“與黨所承受的苦難相比，這些惡人所流的血實在是小小的代價。”

今天，他們會從地球上消失，但還不足以減輕我的仇恨。我愿給他們一個更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館里，為他們建立一個特殊的籠子，讓大家來參觀，怔怔地盯著他們……公民把他們當做動物一樣圍觀，叫他們難以忍受。我們對他們的仇恨將永不休止。讓他們看看，我們如何建設更美好的生活，如何聯合起來，如何熱愛我們的領袖，是那些不是叛徒的領袖。讓他們看看，我們如何與法西斯主義作斗爭，而他們什么也不做，只是養肥自己，像動物一樣，根本不配“人”的稱號。

朱莉婭想象未來的“美好生活，只有誠實人才可生活和工作下去”，由此看到些許的曙光：

也許，伊戈爾會回家。皮亞特尼茨基嘛，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誠實的，當然是說，他沒有牽涉這么多敵人犯下的罪行，沒有疏于職責，沒有上這些爬行動物的當。如果他的意圖是誠實的，當然會回家。我多么想知道！皮亞特尼茨基——你會有罪嗎？你不贊同黨的總路線嗎？你是否反對過領導人，哪怕其中的一位？假如我知道真相，我的生活將變得多么容易。至于伊戈爾，我想起了他父親的話——“真金不怕火煉，經不起考驗的，我們也不需要”。 [(533)](#_530_1)

朱莉婭決定寄希望于真金不怕火煉，如果奧西普是無辜的，他也能幸存于大恐怖。

皮亞特尼茨基被囚禁在布提爾基監獄，也是他兒子身陷其中的監獄。1938年4月初，列夫·拉茲貢在一個擁擠的牢房與他相遇（建造時定為可供關押25人，其時關押67人）。拉茲貢看到一名“消瘦、佝僂的老頭[皮亞特尼茨基當時56歲]，滿臉創傷”。

他[皮亞特尼茨基]看到我在注視他的臉，便解釋說，這些傷疤是審訊人的金屬皮帶扣所留下的。1937年的頭幾個月，我曾看到皮亞特尼茨基……現在站在我面前的他，與我以前見過的相比，判若兩人，完全無法辨認。只有眼睛，仍保持同樣的明亮和活力，只是變得更加悲哀，暴露了他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煎熬。

皮亞特尼茨基詢問了拉茲貢的案情，以及如何受到牽連的。接下來，拉茲貢反問了他的情況：

他先是沉默，然后稱，對自己的命運不抱幻想。他的案件即將結束，他已做好準備。他還告訴我，他們在審訊中如何無盡無休，如何嚴刑折磨，如何以死相逼，如何屈打成招。但還沒說完，他們又來找他了。 [(534)](#_531_1)

4月10日，皮亞特尼茨基被轉移到列福爾托沃監獄，從4月12日到7月底的公審，每天晚上都接受系統地拷問。主要審訊人否認使用刑罰，聲稱皮亞特尼茨基表現得“冷靜而克制，但有一次，因某種原因而變得煩躁，要求喝水，拿起水壺后，卻用它猛擊自己的頭部”。 [(535)](#_532_1) 7月17日，奧西普與137名其他囚犯一起，接受最高蘇維埃軍事法庭的公審。他被指控為法西斯間諜團伙的首犯之一，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組成，潛伏在共產國際。葉若夫送交斯大林一份定罪人的名單，被克里姆林宮總統檔案館保存下來，名單頂端寫有一行簡短的手令：“槍斃所有的138人。約·斯[大林]。V. 莫洛托夫。” [(536)](#_533_1)

朱莉婭對此一無所知。她在布提爾基監獄外排隊給兒子送包裹，甚至不知道皮亞特尼茨基也關押在此。越是聽不到奧西普的消息，她就越難堅持他是無辜的。每個人都叫她忘記奧西普，只為自己和兩個兒子著想。4月12日，即奧西普在列福爾托沃監獄開始重新受刑的那一夜，朱莉婭做了一個噩夢，夢見自己受到一只貓的折磨。她認為這個夢很重要，懷疑兒子伊戈爾是否在布提爾基監獄遭受刑罰（在監獄外排隊時曾聽到其他婦女講起類似的傳聞）。有關伊戈爾受苦的想法改變了朱莉婭對奧西普的情感，她在日記中記錄：

我的生活已變成無止境地陷落的漩渦。我以耳語與自己對話，對皮亞特尼察[皮亞特尼茨基]和伊戈爾的命運感到徹底的絕望，尤其是我那可憐的孩子。他的第17個春天是在悲慘、黑暗、骯臟的牢房中，與陌生人一起度過的。他是無辜的，這最重要。皮亞特尼茨基已經有過自己的生活——他沒有辨認出周圍的敵人，或自甘墮落了，這并不讓人震驚，因為是他自己要投入政治的。但伊戈爾…… [(537)](#_534_1)

已經幫不了奧西普的想法使朱莉婭下定決心，要盡一切可能來幫助尚有很長生命旅程的伊戈爾。她接受了丈夫有罪的可能，但不愿接受16歲的兒子也參與了犯罪。朱莉婭決定背棄丈夫，希望以此挽救兒子。

她拜訪莫斯科的檢察官辦公室，被告知皮亞特尼茨基已犯了反對國家的重罪，便回答：“如果真是這樣，他對我來說已毫無意義。”檢察官建議朱莉婭開始新的生活。她回答，她很愿意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他鼓勵她提出正式申請，并允諾會提供支持。朱莉婭把檢察官看作自己的同情者：

我熱情地握著他的手，也許流露了太多情感，這是我一直未能控制的——我感到，這個人還是可親近的。他的任務很艱巨，但又是必需的。作為一個同志，我想表達對他的尊重。對那些從黨內鏟除蠢豬的同志，我更想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再次強調：盡管自己要忍受痛苦，盡管無辜者可能被犧牲（希望我的伊戈爾不是其中之一），我一定要堅持原則，一定要維護紀律、保持耐心，一定要——絕對必須——找到做出積極貢獻的途徑。否則，人民中間便沒有我的位置。

朱莉婭一旦決定拋棄丈夫，便開始想到他的壞，她在4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哦，我實在無法理解！如果真是這樣，我就鄙視他，我恨他卑劣、懦弱的靈魂，我實在是無法理解！……哦，他扮演得多好！現在我才明白，他為何讓自己陶醉于這些間諜、挑釁者、官僚的“溫暖友情”之中。他肯定沒有真正的朋友，基本上是個悲觀者，從沒向我敞開心扉……也許，他從不愛黨，從未把黨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我們呢，我和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538)](#_535_1)

3個星期之后，伊戈爾被拽上三人特別法庭，被控以組織反革命學生組織——如此荒謬，以致特別法庭都不予受理，但還是以反蘇維埃煽動的含糊不清的罪名，判處伊戈爾5年勞改。 [[6]](#_5_9) 朱莉婭在5月27日被告知兒子的判決結果，頓時變得歇斯底里，要求檢察院逮捕自己：“如果他有罪，那么我也有罪。”當晚，朱莉婭反思一連串事件，探索對大恐怖的理解：

皮亞特尼茨基也許真是壞人，我們將因此變成他的陪葬品。但是，我既不知道皮亞特尼茨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伊戈爾究竟犯了什么罪，真是死不瞑目啊。伊戈爾沒做什么錯事，為什么會被抓走？也許，他只是一名潛在的罪犯，因為他是人民公敵的兒子……也許，這只是對部分居民的強制征調，他們是國家不予信任的，卻又能充作勞動力？我不懂，但聽起來合乎邏輯。如果確是這樣，伊戈爾和其同類再也不會回來。他們將為國家發揮有價值的作用，但不會回歸正常生活。不管如何，遭到遺棄是非常可怕的——只得等待，不知所以。 [(539)](#_536_1)

朱莉婭本人被捕于1938年10月27日，時年39歲。警方實施逮捕時，沒收了她的日記，把它當做她和丈夫同謀反對政府的定罪證據。她被送去偏遠的坎達拉克夏勞改營，位于摩爾曼斯克的遠北地區。弗拉基米爾隨她同行，事實上，他病得厲害，剛剛動過手術，是從病床上給帶走的。在坎達拉克夏勞改營，朱莉婭出工，幫助建造附近的尼瓦-GES水電站；弗拉基米爾留在營房，由內務人民委員會一名獄警照看，每天喂食兩次。過后不久，弗拉基米爾設法逃脫，溜回莫斯科。他借宿于學校朋友的住所，包括葉夫根尼·洛吉諾夫——其父親在斯大林私人秘書處任職。早先，洛吉諾夫一家鄙棄皮亞特尼茨基一家，但現在有所改變，興許是良心發現。弗拉基米爾在洛吉諾夫家待了3個月，有一天晚上，他偷聽到洛吉諾夫家人的交談，才知道葉夫根尼的父親因收留自己而惹上了麻煩。弗拉基米爾不愿讓他們為難，主動去莫斯科蘇維埃投案，碰上的官員恰好是皮亞特尼茨基1917年10月的老戰友，他先叫了三明治招待弗拉基米爾，之后才去報警。弗拉基米爾被帶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達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敵”的孩子都是從那里被發配去蘇聯各地的孤兒院。 [(540)](#_536_1)

1939年3月，朱莉婭受到3名尼瓦-GES的同事的舉報。他們聲稱她曾說：丈夫的被捕是錯誤的，丈夫是無辜的，只是認為斯大林不宜擔任無產階級領袖。朱莉婭被裁定犯了反蘇維埃煽動罪，判刑5年，被送去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勞改營。伊戈爾正巧也在同一勞改營，隸屬于另一個工業部門。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朱莉婭得以與他見面。伊戈爾回憶：“我們一起度過了十分美好卻又異常悲傷的一天。”最后，她只得悻悻而回[婦女營地]。朱莉婭體力不支，精神失常，根本承受不了勞改營的艱辛。她依然美麗，引起營地指揮官的垂涎（這也許可以解釋她何以被允許探訪伊戈爾），但她予以拒絕。指揮官惱羞成怒，把她送去大壩建設工地，充當體力勞動者，以示懲罰。她必須站在齊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時。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個無法確定的時辰。

伊戈爾從勞改營獲釋后，在1958年接待了家庭老熟人吉娜。她也是卡拉干達勞改營的囚犯，在那里見過他的母親。吉娜告訴伊戈爾，朱莉婭已死于勞改營醫院，葬身于一個萬人坑。1986年，已是80歲的吉娜再次來訪，告訴伊戈爾，她上一次的消息并不全部屬實，因為去世前的朱莉婭要她承諾，不得透露她臨死的可怕細節（吉娜現在承認，當時自己也不敢袒露真相）。但最近，吉娜夢見了朱莉婭——在夢中問詢伊戈爾的消息——視之為一個啟示：她應將朱莉婭的最后遭遇告訴伊戈爾，她并沒死于醫院。1940年12月，吉娜去卡拉干達勞改營看望朱莉婭，但沒人愿意透露她在哪里。最終，有個婦人手指草原上的羊圈，叫她去那里找。吉娜走進羊圈，羊群當中，躺在冰凍地面上的就是朱莉婭：

她快死了，渾身燒得發燙，顫抖不已。羊群站在她身邊，像是在作警衛，但仍擋不住寒風和飛雪。我在她身邊蹲下，她試圖抬起身子，但沒有力氣。我拉起她的手，試圖以我的呼吸給她些許的溫暖。

她問：“你是誰？”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訴她，只說是你叫我來的，你讓我幫忙找到她……

她一下振作起來：“伊戈爾——我的兒子。”她挪動凍僵的嘴唇，低聲說道：“我的小男孩，幫他一把。我求求你，幫他活下去。”我讓她冷靜下來，滿口答應我會照顧你，仿佛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的手中。朱莉婭低聲說：“請答應我……不要告訴他，他母親是怎么死的，答應我……”

她已經神志不清，我蹲在她身旁，也一口答應。

然后，身后傳來獄警的喝問：“你從哪里來的？怎么跑到這里？”那個獄警一把抓住我，將我雙手反綁在身后，押出羊圈：“你是誰？”

我解釋，我是工具車間的小組長，只是路過，意外發現這名女子。但我仍被扣留，他們告訴我，不許透露我所看到的：“閉上你的嘴，不準說一個字！”

朱莉婭死于羊圈。她病倒后被扔在那里，不許任何人探望，后來就葬在她去世的地方。 [(541)](#_538_1)

[[1]](#_1_14) 沒有皮亞特尼茨基講話記錄，6月全體會議的速記沒能保存下來。但有證據顯示，皮亞特尼茨基所說的，已被從記錄中抹去（中央委員會檔案館的慣例），以免鼓勵其他的持不同政見者。最后一次會議在6月29日閉幕，斯大林最后宣布：“就皮亞特尼茨基而言，調查仍在進行，將在未來幾天內完成。”該頁底部有斯大林秘書的筆跡：“這一段落是斯大林同志劃掉的，因為它不應存入速記機。”（RGASPI, f. 17, op. 2, d. 622, l. 220）在封存的檔案（如克里姆林宮的總統檔案館）中，可能還有該事件的其他記錄。在相關證據披露之前，皮亞特尼茨基反對老布爾什維克大批被捕的立場的唯一記錄，來自他的兒子弗拉基米爾。他聲稱，根據他父親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個人文件、其他檔案館的零碎證據以及卡岡諾維奇所稱的回憶錄，他已重新確立了6月全體會議的具體事件。該回憶錄的內容是卡岡諾維奇的秘書處主管塞繆爾·古貝爾曼轉述給他的。[《反對斯大林的陰謀》（Zagovor），59—70頁；對弗拉基米爾·皮亞特尼茨基的采訪，圣彼得堡，2005年9月。支持皮亞特尼茨基說法的還有B. Starkov的《老黨衛軍的自衛》（Ar’ergardnye boi staroi partiinoi gvardii），載于Oni ne molchali，莫斯科，1991年，215—225頁]

[[2]](#_2_14) 斯大林很可能涉及謀殺基洛夫。這位列寧格勒黨領導很受歡迎，要比斯大林溫和得多。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基洛夫有可能成為自己強勁的競爭對手。至于斯大林是否在謀殺中扮演角色，還沒發現確鑿的證據。但斯大林肯定利用了這一謀殺，堅持對內部威脅的強迫妄想，迫害自己的“敵人”。

[[3]](#_3_11) 阿瑟·庫斯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年）里的老革命魯巴肖夫可視為這類人的縮影。由于仍想為國家服務，他在審訊中愿意承認受控的叛國罪——而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無辜的。

[[4]](#_4_8) 1935年12月，在黨員和聯合收割機手的會議上，一位年輕的聯合收割機手表示，盡管自己是“富農”的兒子，但也要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斗。斯大林回答：“兒子無須為父親負責。”記者抓住了這一條虛偽口號，慢慢又演變成了斯大林的“指示”。

[[5]](#_526_1) 伊琳娜從未得知他的死訊，她繼續尋找，向蘇維埃當局寫了上百封信，直到自己1974年去世。1956年之后，伊琳娜受邀重新入黨，但她拒絕了。

[[6]](#3Ge_Xing_Qi_Zhi_Hou__Yi_Ge_Er_Be) 1941年，伊戈爾再一次遭指控與其他“人民公敵”的孩子策劃了“反革命陰謀”，他的刑期因此延長5年。他在1948年回到列寧格勒，很快又被捕，罪名為“反革命煽動”，判處5年，被送進諾里爾斯克勞教營，實際上服刑8年。

#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一



1937年，安吉麗娜·布舒耶娃和奈莉·布舒耶娃

1938年7月28日，那是一個溫暖的夏日傍晚，奈莉的外祖母去園子里采摘覆盆子，讓她照看妹妹安吉麗娜，母親季娜伊達·布舒耶娃在給弟弟斯拉瓦喂奶，并準備晚餐。父親被捕于9個月之前，自那以后，僅有4歲的奈莉已習慣于幫做家務。季娜伊達正在哺乳，前門突然打開，出現兩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士兵。他們告訴她，穿好衣服，帶上孩子，前往內務人民委員會在彼爾姆市中心的總部。幾分鐘后，奈莉的外祖母摘得覆盆子回來，已是人去樓空。

在內務人民委員會大樓，審訊人將兩個女孩安排去兒童之家。他向奈莉解釋：“你媽要去遠方，參加長期工作，你再也不會見到她。”季娜伊達即刻變得歇斯底里。兩名警衛來帶走女孩時，她開始尖叫，甚至噬咬攔阻她的其他警衛。奈莉被帶走時，回頭一瞥，正好看到母親被抽耳光。兩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奈莉去了一個猶太孤兒院（因為她的膚色較深），安吉麗娜去了鄰近的兒童之家。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政策規定，“人民公敵”的家庭要被拆散，孩子要領取新的身份。

季娜伊達被允許保留斯拉瓦——他得了肺炎，需要母親的哺乳。整整3個星期，母親和兒子被關在一間擁擠的牢房。季娜伊達被控不愿檢舉丈夫，判刑8年，被送去專為祖國叛徒的妻子而設的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是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勞改網的一部分。1938年9月，她隨一大隊女囚犯，從彼爾姆趕去阿克莫林斯克。離開那天，她們被迫跪在城市廣場數小時，等待馬車把她們一批批送去火車站。彼爾姆的居民站在旁邊圍觀，沒人試圖幫助囚犯。季娜伊達的母親看到她和斯拉瓦在廣場中間，想讓警衛給遞一件套衫。該警衛說“滾開，老太婆”，用他的槍口把她趕走了。在火車站，大家被塞進載牛的車廂，走了10天，才抵達阿克莫林斯克，一共1500公里的旅程。季娜伊達與普通罪犯關在同一車廂，起初，受到她們的騷擾。她們試圖搶走她的嬰兒，認為以此可得到提前釋放。幾天后，她們看到斯拉瓦的病情加重，反而對母親生出憐憫，嚷著要求警衛為嬰兒尋求牛奶。她們抵達勞改營后，季娜伊達被迫將斯拉瓦留在多林卡鎮的孤兒院，之后的5年她都沒見過自己的兒子。該鎮當時是卡拉干達勞改營的行政中心。季娜伊達是一名合格的會計，被安排在營地辦事處工作，很受囚犯的羨慕，但她懇求從事最艱苦的農活。季娜伊達向營地指揮官解釋：“如果有時間思考，我就會發瘋的。我已失去3個孩子，讓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忘卻自己吧。”

季娜伊達的母親看到女兒和外孫跪在廣場之后，便去尋找安吉麗娜和奈莉，在兩個兒子的幫助下，她幾星期后就找到了奈莉，但卻要等到1940年春天才找回安吉麗娜。其時，安吉麗娜已有4歲，還能記得那一次際遇：

我的表哥基拉，即維佳舅舅的兒子，就住在孤兒院的附近。有一天，我們孤兒院的孩子在河邊走，兩兩一排，排成長隊，我排在最后。基拉和他父母也在河邊，他一下就認出我，大聲喊：“看，我們的安卡（安吉麗娜)在這里！”每個人都停下，大家都很好奇。孤兒院的帶隊婦女不讓我的親戚靠近，維佳舅舅與其中之一作了交談。她說，我的名字叫阿列，也可能叫安吉麗娜，但她們不能確定。

外祖母開始向孤兒院書寫申訴，然后有一天，她來接我……我還記得那一天，她帶來一雙紅鞋，上面有閃閃發光的鞋環，讓我穿上。我伸出腳，看看鞋底——它是如此光滑、干凈、鮮紅。我撣去沾上的灰塵，真想脫下，去舔這鞋底，因為它有這么漂亮的顏色。但外祖母說：“夠了，穿好鞋，讓我們去找你的姐姐奈莉。”我仍然記得當時的困惑——什么是姐姐？奈莉是誰？我一點都不懂。我們離開孤兒院時，看到門口有一個女孩在等。老太太說：“這就是奈莉，你的姐姐。”我說：“真的嗎？”我當時只弄懂她叫奈莉，但弄不懂“姐姐”是什么意思。那女孩走了過來，黑色短發，穿著一件灰色雨衣，嘴巴在嚼著衣領。我問：“她為何咬衣領呀？”外祖母隨即罵她：“你怎么又在咬衣領了！” [(542)](#_540____Interview_with_Vladimir)

安吉麗娜的童年記憶主要是饑餓。孤兒院的日常飲食一直很差（枯干的黑面包和灰色的稀粥），安吉麗娜看到鮮亮的紅鞋，第一反應就是把它當做番茄，試圖去吃。回家后，與奈莉和外祖母住一起，情況并沒有明顯的改善。外祖母既老又有病，不能工作。季娜伊達于1938年被捕，過后不久，外祖母也被逐出自己的家，只好搬入共用公寓一個小房間，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到1941年，彼爾姆（自1940年起，改名為莫洛托夫城）瀕臨饑荒。許多中央街道改成蔬菜自留地，分配給選定的居民，但安吉麗娜的外祖母與之無緣。安吉麗娜回憶：“我們學會吃各種東西：春天的椴樹葉、青草、苔蘚，還有晚上從較富人家垃圾箱收集來的土豆皮。”安吉麗娜意識到，受饑挨餓給她帶來了恥辱和落魄。在她心里，更多的是饑餓讓她淪為低等人，而不是父母作為“人民公敵”被捕——那時她還太年輕，無法弄懂這些概念的內涵。安吉麗娜經常受到街對面工人住宅區一幫男孩的欺負，他們知道，安吉麗娜老是來翻檢自家的垃圾箱，在大街上遇見她，總是予以嘲笑。安吉麗娜學會按捺自己，從不回嘴。但有一天，這幫人中領頭的，即來自工廠干部家庭、個頭最高的那位，故意拿出一塊黃油面包給街上的乞丐。安吉麗娜回憶：“他故意做給我看，就是想要羞辱我。我實在忍不住，那黃油面包的樣子實在太誘人了，我真想自己要，不忍看到它落入乞丐之手，便朝男孩們大喊：‘你們在干什么啊？那面包上有黃油！’引得他們一場大笑。” [(543)](#_540_1)

像許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樣，安吉麗娜并不清楚自己的損失。她都記不起父母了——他們被捕時她只有兩歲——不同于仍能記住父母的奈莉。父母消失時，她也沒有痛苦的感受。等到學會了閱讀，安吉麗娜才想入非非，自編父母去世的幻想，均來自她讀過的書籍，尤其是她最喜愛的拿破侖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她回憶起戰后的一次談話，其時她約10歲：

外祖母的朋友來訪，談起我的父母。外祖母在我們房間的墻上掛有她所有孩子的照片。那位女士依次指著每一張照片，問我分別是誰。

“那是誰？”

“尼娜舅媽。”我回答。

“這個？”

“三亞舅舅”

“那個？”

我說：“那是奈莉的母親。”

“你是什么意思呀，奈莉的母親？她也是你的母親。”

但我回答：“不，那不是我的母親，只是奈莉的母親。”

“那么，你母親在哪兒呢？”

“我母親死于莫斯科大火。” [(544)](#Di_Wu_Zhang__Da_Kong_Bu_De_Yu_Bo_1)



1940年代，艾萊娜與她的外孫女們在阿克―布拉克鎮居住的房子



艾萊娜·列別杰娃與她的兩個外孫女納塔利婭（左）、艾萊娜，1940年攝于阿克―布拉克



1939年，維羅尼卡和瑪麗亞在基洛夫地區的斯洛博茨卡伊鎮

安吉麗娜的生活中真正的母親形象，便是她的外祖母。她把安吉麗娜和奈莉救出兒童之家，最終讓她們與她們的母親團聚。當時，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見慣。從大恐怖的一開始，將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維系在一起的責任，往往落到她們的肩上。她們不為人知的英雄行為，實屬蘇維埃歷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跡之一。

納塔利婭·康斯坦丁諾娃和姐姐艾萊娜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父親被捕于1936年10月，槍決于1937年5月；母親柳德米拉被捕于1938年9月，判處8年勞改，被當做“人民公敵”的妻子送進馬加丹附近的勞改營。其時，納塔利婭10歲，姐姐12歲，都被送進孤兒院，到最后，都獲得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慈祥溫和，卻有鋼鐵般的意志，與內務人民委員會達成協議。艾萊娜·列別杰娃187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個商業望族，幼時上學4年，17歲那年結婚，生下7個孩子，其中柳德米拉出生于1903年，排行老四。艾萊娜向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提出申訴，要求釋放她的外孫女們，但被告知：如果要領出女孩，必須帶她們同去流放地；如果讓女孩們待在孤兒院，她自己仍可留在列寧格勒。艾萊娜毫不猶豫，領出兩個女孩，變賣財產，買了3張火車票，直奔奧倫堡和哈薩克斯坦之間偏僻的草原小鎮阿克―布拉克（到達后才獲悉，所有流放者的出境火車票本來應由內務人民委員會支付）。

阿克―布拉克是連接俄羅斯與中亞主要鐵路干線上的小站，塵土飛揚，當地7000名居民中的許多人都在鐵路上供職，主要是俄羅斯人和哈薩克人，另外還有不少失業的政治流放者。58歲的外祖母肯定找不到工作，列寧格勒的親屬定期給艾萊娜寄來少量的現金和小商品，讓她在市場上出售，或進行物物交換，對象是她一直在努力培養友誼的當地婦女。艾萊娜無法租到房間，只好與外孫女住在她買下的小窩棚，后來又隔開與另一戶流放家庭合用。那是該鎮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可追溯到19世紀，其墻磚是駱駝糞做成的，屋頂是黏土的。冬天，她們在土灶中燒烤牛糞取暖。第一年，即1938至1939年，當地發生饑荒，這真是一場生死考驗。兩個女孩沒鞋穿，只能打赤腳去流放者子女的鐵皮棚學校上課。鐵路職工的孩子另有分隔開來的磚房學校。但姑娘們學習努力，第二年就獲準轉學到其他學校，甚至還加入了少先隊。流放者和鐵路職工之間的關系很好，納塔利婭回憶：“沒人把我們叫做流放者。”到了1941年，兩名女孩申請加入共青團，才有人指出她們的父親是“人民公敵”。發言人不是當地居民的孩子，而是來自莫斯科的疏散者，視之為不得入團的理由。 [(545)](#_542_2)

納塔利婭回首自己在阿克―布拉克度過的歲月——即從1938年到1945年，她傾向于認為，盡管經歷了這么多艱辛，她和姐姐仍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我們很幸運，在外祖母的小世界中長大。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飽飯，幾乎沒有一樣自己的財產，但我們很愉快，因為我們有外祖母的愛，誰也無法偷走。”學校的朋友經常會問納塔利婭父母在哪里，她都試圖回避。她從來不談自己的父母，擔心人家會猜疑“他們已經被捕，一定做了什么錯事”。對納塔利婭來說，他們的被捕是恥辱和困惑的來源。她不明白他們到底做了什么、為何消失，但從來沒有懷疑父母的清白。納塔利婭認為，在維持這一信念上面，外祖母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她，她會投降于來自少先隊和共青團的壓力，會背棄自己的父母，視他們為“人民公敵”。納塔利婭回憶：“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蘇維埃政權的實質，不會輕易相信。革命爆發時，她已近40歲。”

艾萊娜的價值觀形成于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但她明白，外孫女需要在蘇維埃世界中生存下去，所以沒將自己的反蘇維埃思想強加于她們。她告訴她們，父母都是好人，被捕只是一個錯誤，總有一天都要回來。她給她們講述她們的母親年輕時的故事：當年，她那么美麗，那么熱愛網球，吸引那么多英俊的年輕崇拜者，又如何遇上她們的父親，如何組成幸福家庭。她還告訴女孩們，她們的母親就像她們現在一樣。兩個女孩通過這些故事得以了解自己的母親，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艾萊娜說，“外祖母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母親更為重要……她承擔了母親的職責，甚至在我們回到列寧格勒[1946年]和重逢真正的母親[1951年]之后仍是如此。” [(546)](#_543_2)

對祖輩來說，照顧孫輩可能是沉重的負擔。子女被捕和變成“人民公敵”之后，父母經常被剝奪住房、就業、儲蓄、退休金和口糧。也不是所有的孫輩都能獲得拯救。維羅尼卡·涅夫斯卡婭的母親于1933年去世，父親被捕于1936年8月，被送去沃爾庫塔勞改營。6歲的維羅尼卡和弟弟瓦倫丁，都被送進孤兒院。父親的姨媽瑪麗亞決定收養維羅尼卡，她已經收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警告，如要收養，必須要去基洛夫地區過流放生活，那地方位于瑪麗亞現居地列寧格勒的東面，相距1200公里。瑪麗亞是一名虔誠的教徒，已經70歲出頭，把照看家人的孩子視作自己基督徒的責任。丈夫已經去世多年，她獨自一人生活，沒有自己的孩子，卻發現外甥的子女羈留在孤兒院之中。瑪麗亞一直特別喜愛維羅尼卡，為她買禮物，喜歡朗讀經典作品給她聽，但她已太老太弱，無力照看麻煩、任性的瓦倫丁（他先天膀胱缺陷，小便失禁，需要特殊照顧）。瑪麗亞從孤兒院領出維羅尼卡，留下弟弟，之后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到1941年，她們收到一封電報，通知她們瓦倫丁已死于孤兒院的醫院——當時只有7歲。維羅尼卡回首往事，認為祖母（她如此稱呼父親的姨媽）實在應付不了瓦倫丁，但又認為祖母心里還是充滿悔恨。收到電報幾天后，瑪麗亞就去世了。維羅尼卡由遠房親戚收留，很快又被轉給其他親屬，再被轉給他人，沒人對一張額外的嘴感興趣。因此，在隨后的5年中，她變成遠親家里不受歡迎的住客，直到1946年赴沃爾庫塔與父親團聚。 [(547)](#_544_2)



1939年，伊娜·蓋斯特（14歲）與妹妹瓦萊里婭（3歲）、納塔利婭（8歲）在莫斯科。拍這張照片是為了寄給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母親

父母的被捕使許多孩子一夜之間長大。尤其是最年長的孩子，突然要履行大人的職責，幫做家務，照料弟妹。 [(548)](#_545_2) 1937年夏天父母被捕時，伊娜·蓋斯特才12歲，與妹妹納塔利婭（7歲）、瓦萊里婭（1歲）、表弟伊戈爾（9歲）和外祖母一起住在莫斯科河堤大樓的自家公寓。伊娜一下子要承擔許多新職責，如果不算是一名主要家長，至少也變成了一名家長的助手。伊娜寫信給內務人民委員會，要求領回自家公寓中已遭查封的財物。她組織安排送給父母的包裹，通宵在布提爾基監獄的門外排隊，發現母親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之后，她又找到一份晚上的工作，給孩子做課后輔導來積攢些錢，以便每月向阿克莫林斯克寄一次包裹——自(1939)年夏天起獲得這一準許。父母被捕后不久，蓋斯特家的孩子們被趕出自家公寓。4個孩子與外祖母搬進一間出租房，還要與其他8名親戚合住——都是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僅20平方米的房間住上了13人（12個孩子，加上外祖母）。作為最年長的孩子，伊娜不得不做洗滌工作，還要幫著做清潔和烹飪。從她的新家到學校，伊娜乘坐電車至少需要一個小時，晚上回家后還要洗晾衣衫，因為第二天還要再用，她為此而心力交瘁（照片中的她，黑眼圈十分明顯）。伊娜回顧這一段時間，認為這有助于她學得必要的生存技能：

這是一種訓練自我奮斗的生活。我總是在力爭生存下去——不只是為我自己，還為瓦留西卡[瓦萊里婭]和納塔利卡[納塔利婭]。父母被捕時，我只有12歲。但一夜之間，我仿佛已經長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經走到盡頭。先是我們的保姆辭職——她無法與外祖母相處，照顧嬰兒瓦萊里婭變成了我的工作。我記得保姆臨走之前說的最后一句話：“你必須每天晚上給她洗澡！她的尿布會變得很臟。”我被嚇壞了……發現自己進入了全新的環境，必須承擔這大家庭的洗滌工作。我如果不想斷送自己一生，還需努力學習，還得撫養伊戈爾和納塔利卡。納塔利卡會問，為什么人家都有父母，而我們沒有。我告訴她，我們有非常熱愛我們的外祖母。在很多方面，我成了納塔利卡和瓦留西卡的母親；在其他方面，我自己又還是一個孩子。 [(549)](#_546_2)

像艾萊娜·列別杰娃一樣，伊娜的外祖母也經常向孩子們提及他們的父母，希望他們知道父母并沒有拋棄他們，仍然愛他們，將會回到他們的身邊。但也有其他祖母們持不同的看法。

伊拉伊達·法伊韋索維奇的父母是烏拉爾奧薩鎮（位于彼爾姆的南面）的理發師。他們于1939年的春天被捕，據說策劃了反蘇維埃政府的政治陰謀，因為美容院的顧客舉報：聽到法伊韋索維奇夫婦在抱怨物資的短缺。4歲的伊拉伊達先由鄰居收留，然后再轉給各式親戚，沒人是心甘情愿的，直到最后才獲得外祖母瑪法·布留霍娃的拯救。她是個簡單的農婦，又是虔誠的東正教徒，一共帶大16個孩子，其中5個還不是她自己的。她將被捕一事歸罪于女婿，指責他說話太多，因此要求伊拉伊達學會閉嘴。所以，伊拉伊達在“強迫沉默的氛圍”中長大，不得討論或詢問父母的事。她的自卑感植根于自己在學校里的孤兒身份，又因這強加的沉默而愈益加深。這一切迫使她深深埋藏內心的恐懼以及對父母的渴望，甚至會在夢中聽到父母的聲音。伊拉伊達的母親關押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勞改營，每周給住在奧薩的女兒寫信。但瑪法收到后，拆都不拆就予以燒毀。瑪法把伊拉伊達父母的照片藏起來，讓外孫女忘記他們。她對外孫女說：“我們會活下去，就我們兩人，不再分離。” [(550)](#_548_2)

祖母、外祖母們成了家庭和勞改營之間的重要通訊者，她們既是寫信人，又是讀信人，維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重要連結。數百萬家庭，就憑這種連結，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奧列格·沃羅比約夫的父母分別于1936年和1937年被捕，他和妹妹娜塔莎獲得了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娜杰日達·米哈伊洛夫娜既勇敢又聰明，1905年革命之前，已是第比利斯取得行醫資格的首批女醫生之一。她聽說內務人民委員會將把孩子送進孤兒院，急忙把他們帶到圖拉的鄉村，與孩子的教父母一起將他們藏匿好幾個月。后來回到莫斯科，她與丈夫帶著兩個孩子，在工薪階層集中的郊區租房而居，搬了好幾次家。她認為，與他們以前居住的首都中心相比，這里更為安全。一般情況下，工人對鄰居的政治背景不太感興趣（他們的敵視更可能來自階級或種族的理由）。 [(551)](#_549____MSP__f__3__op__37__d__2) 為了保護外孫和外孫女，娜杰日達收養他們，替他們改名換姓。每個星期，她寫長信給他們的父親（在索洛韋茨基勞改營）和母親（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勞改營），介紹孩子們的日常起居：

1939年1月25日

……奧列格熱愛上學。外公讓他在早上7點半起床——只需說時間到了，他就自己起來。我們打開電水壺，準備新鮮的三明治、蛋、魚和香腸。他吃時，再配上熱巧克力、咖啡、茶、牛奶，然后去上學。他對食物非常挑剔，吃得不多。半截面包卷和一杯牛奶，他就已經飽了。他帶去學校的也只有半截面包卷。 [(552)](#_549_2)



1940年，奧列格和娜塔莎。照片是為了寄給身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的父親米哈伊爾而拍攝的

很多細節不是真的（奧列格記得，沒有雞蛋、魚、香腸，只有面包，偶爾才有黃油），但這些信件給他的父母提供了安慰，即使他們不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仍在繼續，等待他們的歸來。

奧列格的父親米哈伊爾是一名高級工程師，被捕之前，曾在莫斯科的國防部工作。1940年，他從索洛韋茨基調至北極圈的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國家急切需要像他那樣的專業人才，以創建龐大的綜合工業，那里不久將成為鎳和鉑金的主要產地。米哈伊爾作為一名專家，允許收到包裹，每星期可寫一次家書。他憑借與娜杰日達的通信，了解到奧列格的心態，從而對他的學習、閱讀、興趣愛好、朋友，提供了作為父親的忠告。奧列格回憶：“他的信件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假設在我成長過程中，他就在我的身邊，我對他的遵從可能還比不上我對這些信件的遵從。因為我渴望一個父親，盡量以想象中他會贊同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至少我從信件中知道了他的想法。

奧列格是幸運的，能與父親建立聯系。信件是父母之愛的書面證明，孩子眼見為實，還能讀出父母的無辜。有時，信中夾有繪畫、詩歌、枯萎的花朵，甚至小片的刺繡，以傳達出受過審查的詞句所不能表達的情感。正是這些零碎的東西建筑起父子之情。 [(553)](#_550_2)

米哈伊爾在信件中，一直敦促奧列格快快長成一位“小大人”。

1940年8月25日

我親愛的兒子，為什么這么久沒給我寫信？我知道你在度假……但我促請你，至少每5天要寫一封信……在信中附上你的圖畫，讓娜塔莎也寫上幾句……永遠不要忘記，你是她的保護者。她還小，有時任性，你要跟她講道理。我已經寫過多次，你是一個男人，理應保護娜塔莎、外公和外婆，確保他們的安全，直到我回來。你是我的副手，我們小家庭的家長，我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盡管只有10歲，奧列格覺得收到這封信后，自己已長成大人了。他認為，自己應對娜塔莎負責。這使他不再以孩子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借用他自己的話即是：“我在一夜之中長大了。” [(554)](#_551_2)

二



米哈伊爾·米羅諾夫和他的畫（摘自他寫給母親的信）



卓婭·阿爾謝季耶娃，1941年于哈巴羅夫斯克

布舒耶夫家、蓋斯特家、沃羅比約夫家的孩子都是幸運兒——他們獲得了親人的拯救。父母的被捕，讓數百萬的其他孩子自生自滅。許多人走進孤兒院——適用于未滿16歲的孩子——其他的則在大街上游蕩，或乞討，或加入少年幫派。那些幫派在大城市的車站、市場和其他繁華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輕罪和賣淫。1935年通過的新法律，將刑事責任的年齡降至12歲，主要是為了打擊兒童犯罪。1935至1940年，蘇維埃法庭給10.2萬名12到16歲的兒童定罪，其中許多最終被送進由內務人民委員會管理的勞教營。 [(555)](#_552_2)

有些孩子溜到制度外，自食其力。1936年父母被捕時，米哈伊爾·米羅諾夫只有10歲。他父母本是來自烏克蘭的工人，在內戰中參加紅色游擊隊；被捕前在黨內獲得逐步的晉升，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寧格勒。米哈伊爾的姐姐莉利亞早已離開列寧格勒的家，前往莫斯科學醫。因此，米哈伊爾只得獨自一人生活。他曾在各式親戚家寄居一段時間，成為他們的額外負擔。他們都是工人，有自己的大家庭，都在為生存而掙扎。1937年9月，米哈伊爾進了列寧格勒少先隊之家設立的繪畫學校。之前幾個月照顧他的姑姑貝拉將此視為擺脫他的良機，就叫他搬去少先隊之家的學生宿舍。米哈伊爾失去父親的所有音信（槍決于1938年），也得不到姐姐的消息，因為她擔心如果寫信給親戚，會泄露自己的污點履歷，會遭到醫學院開除。他唯一保持聯系的親人是身在沃爾庫塔勞改營的母親，經常寫信給她。他非常孤獨，沒有朋友和家人，急切需要母親的愛（他的信往往以此結尾：“我吻你1000000000次”）。1941年的春天，米哈伊爾被繪畫學校開除——理由是缺乏天賦——轉而入讀工廠技校。他被趕出少先隊之家的學生宿舍，只好借住在營房的一個小房間。15歲的他在7月份寫給母親的信中說：“我在此感到非常無聊，沒有其他人，每個人都走了，全靠自己。”9月，德國軍隊包圍列寧格勒，米哈伊爾逃到莫斯科。他到達那里時，姐姐已跟隨醫學院疏散到中亞，其他的莫斯科親屬也不愿收留他，所以只好流落街頭。1941年10月，他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遇難。 [(556)](#_553_2)

父親在1937年6月被捕時，瑪婭·諾爾金娜才13歲。一年后，內務人民委員會又抓了母親，瑪婭也被列寧格勒學校開除。她在列寧格勒有姨媽和舅舅，但沒人愿意收留她。瑪婭說：“他們都怕丟掉飯碗，其中有些是黨員——他們顯得最為害怕，斷然拒絕。”大家都以為瑪婭將被送進孤兒院，卻沒有人來找她。于是，她繼續住在自家的3間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親戚為了搶奪這寶貴的居住空間，讓一個舅舅登記為該處居民。但他從沒在那里住過，事實上，仍與妻兒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瑪婭回憶：“我自食其力，完全獨立。”這一位14歲的女孩子，會向學校里的老朋友借書，走一小時去姨媽家吃飯，用親戚給的零用錢購買食品，有時享用共用公寓鄰居的殘羹剩飯。每天，她會在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前排隊，希望送包裹給父親。該處官員收了一段時間的包裹，然后告訴她，父親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這意味著他已被槍決——不過她好幾年都不知道）。給身在波特馬勞改營的母親送包裹更加艱辛，需要排隊整整兩天兩夜。瑪婭這樣的生活，持續到1941年8月。其時，她年滿18歲，加入了保衛列寧格勒的人民志愿軍。她沒有接受正規學校的教育，實在是別無選擇。 [(557)](#_554_2)

卓婭·阿爾謝季耶娃1923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父親是一名船長，1937年11月25日駕船前去勘察加半島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卻在途中被捕。同一天，母親被捕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家中。卓婭只有14歲，但看起來比較成熟，所以沒去孤兒院。她繼續待在從1926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共用公寓，自力更生，沒有其他親戚。母親的妹妹住在哈巴羅夫斯克，只有夏天才能來符拉迪沃斯托克，因為她在此地有一套鄉間別墅；父親的家人都在列寧格勒。卓婭從小享受養尊處優的生活，母親不上班，全身心照顧這唯一的孩子。現在，卓婭什么都要自理。她自己去學校，在共用公寓的走廊上用普里默斯煤油爐煮食。她在鄰居的幫助下賣掉一部分家庭財產（金表，母親的銀戒指，父親的老望遠鏡、照相機，書籍，雕塑），來購買食品和附近工廠食堂的飯菜。如此籌得的錢，大部分用于為父親上訴（被控參與“跨太平洋的反革命組織”）。他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監獄，每周給她寫含有復雜指令的信，為她解釋法律的晦澀含義和取出銀行存款的方式。每周一次，她寫回信，報告案件的進展；同樣每周一次，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監獄外連夜排隊，送包裹給母親。她的迅速成長，以及對家庭危機的妥善應對，給父親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5月，他寫信給在西伯利亞的亞亞附近勞改營的妻子說：

我已從濟濟卡[卓婭]那里收到兩封信。我覺得對不起她，但也為她的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興。她生氣勃勃，身體健康——不久就有17歲了，完全獨立自主。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她的勇敢值得大加稱贊——她在14歲的年紀，就能完全自力更生，全不害怕。她甚至還能自得其樂。我把她想象成家里的小小女主人，完全掌控著家庭和學校的事務。 [(558)](#_555_2)

但從卓婭的角度看，自力更生并不是愉快的經歷。她在若干年后說：“有一天，媽媽被捕。第二天，我就開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她不愿在信中讓自己面臨的麻煩驚擾父母。有人冒充是她父母的朋友，試圖來占便宜，幫她賣掉貴重物品，卻扣下一半的所得。1939年的春天，在市蘇維埃擔任秘書的母親的熟人，把自己的物品搬到卓婭的房間，聲稱這樣做卓婭就無須與他人分享生活空間。事實上，幾個星期之后，該女子就報警把卓婭抓起來送到孤兒院，從而鳩占鵲巢。卓婭在孤兒院里絕食抗議，最終通過一名孤兒院工人與哈巴羅夫斯克的姨媽取得聯系。她恰好來避暑，剛剛抵達自己的鄉間別墅。卓婭不得不在孤兒院住了3個月，等待姨媽設法收回她的房間。16歲生日那天，卓婭終于獲準返回。她半工半讀，傍晚上課，完成中學的最后一年，然后上了哈巴羅夫斯克鐵道學院。1940年冬天，她父親獲刑5年，被送去西伯利亞的勞改營，1942年死在那里；母親則于1944年獲釋。 [(559)](#_556_2)

1937年7月5日身為列寧格勒資深黨干部的父母被捕時，馬克斯娜·卡爾皮茨卡婭才13歲。馬克斯娜的兩個弟弟被送去不同的孤兒院——老二阿列克謝（10歲）去了基洛夫附近的兒童之家，老幺弗拉基米爾（5歲）則去了韃靼共和國的一個兒童之家。像卓婭一樣，馬克斯娜看上去比較成熟，所以沒進孤兒院。相反，她與保姆米利婭搬進了一座共用公寓的小房間。米利婭是一個簡單的農婦，以同等程度在幫助和利用她的主人。像20世紀20年代成長于共產黨人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樣，馬克斯娜很小就學會承擔責任。父母待她如一名“小同志”，叫她管教弟弟。現在，這種訓練正好派上用場：

米利婭與我在一起，但我掌管一切，包括金錢。我付工資給米利婭，到后來，她開始偷錢。所以，我告訴她不再需要她的服務，不過仍讓她睡在我的房間，因為她無處可去。 [(560)](#_557_2)



馬克斯娜，1941年于列寧格勒

就一名13歲女孩而言，馬克斯娜具有驚人的機智。她設法取回父母被捕時遭封存的個人財物，讓米利婭拿去寄售店賣出，以維持家用。寄售店是碩果僅存的私人市場，蘇維埃公民借此來買賣自己的日常用品。這一自救行動的關鍵在于黨干部兼家庭老朋友鮑里斯·波澤恩（鮑里亞叔叔）的援助，他時任列寧格勒州的檢察官，在馬克斯娜還是個小女孩時就認識她。波澤恩會派出一名士兵，打開查封的公寓，讓馬克斯娜拿出錢和財物：父親的西裝和鞋子，母親的禮服和皮草外套，毛巾、床單。“鮑里亞叔叔”為幫助孤女，承擔了很大危險，自己在1939年被捕并遭槍決。

馬克斯娜將這些財物儲存在自己房間內，一件接著一件，如果沒有賣掉，就會被鄰居們逐漸偷走。后來，米利婭又要男友搬來同住。馬克斯娜終于鼓起勇氣，要兩人統統搬走，又在門上加了鎖。此后3年中，馬克斯娜孑然一身，單獨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通過一位姑媽賣掉最后的財物。父母被捕后，那位姑媽曾不敢與她講話，但現在卻跳出來抓住機會幫助馬克斯娜出售財物。馬克斯娜住的共用公寓位于列寧格勒一個純無產階級地區，她所有鄰居都是工廠工人。他們知道，她一人獨居——對未成年人來說，這是非法的——但沒有去報警（顯然，他們愿意她住在附近，以方便他們行竊）。馬克斯娜在學校里受到一名教師的欺負，被斥為“人民公敵”的女兒，便轉學去了另一所學校，那里的班主任較有憐憫之心，幫助她隱瞞不好的出身。1941年，17歲的馬克斯娜中學畢業，所有科目都獲高分，進入列寧格勒大學的語言系就讀。1942年2月，該大學疏散撤走，她仍留在列寧格勒，在公共圖書館上班。直到城市被德國軍隊切斷之前，她不停地寫信給羈留在孤兒院的大弟阿列克謝。阿列克謝在1946年返回列寧格勒，但已深受孤兒院生活的影響。她的小弟弗拉基米爾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561)](#_558_2)

大恐怖使孤兒人數急速膨脹。從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兒童之家的人數，從32.9萬人增至大約61萬人（還不包括孤兒院調給蘇維埃農莊和工廠的人員）。 [(562)](#_559_2) 大多數兒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離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兒”（作家伊利亞·愛倫堡如此稱呼他們）。這些場所的條件如此惡劣，以致數十名官員向當局寫信，對擁擠、污濁、饑寒交迫以及兒童不時承受的虐待和忽視，表達了他們個人的憤慨。“人民公敵”的孩子們更承受特別的苛刻待遇。像馬克斯娜的弟弟們一樣，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兒童之家，因為政策規定，必須拆散“人民公敵”的家庭。他們被告知，要忘記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齡夠小，就會獲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們經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時是來自教師和管理員，因為那些人擔心：如果顯示慈悲，可能會被指控對“敵人”存有惻隱之心。 [(563)](#_560_2)

父母被捕后，伊納薩·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兒童之家，3歲的伊納薩去了列寧格勒的，11歲的梅拉則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兩個女孩都不斷得到提醒，她們是“人民公敵”的女兒——她們父母的被捕，牽涉于皮亞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審。 [[1]](#_1___Ta_Men_De_Fu_Qin_Pa_Wei_Er) 伊納薩對孤兒院之前的童年全無印象，但記得的兩年孤兒院生活，給她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傷痕：

那里的條件實在太可怕——我都沒法走進廁所：地上滿是稀屎，深至腳踝……那棟房子正對一道紅磚高墻，好像被困在地獄里……兒童之家的主管總是對我說：“要記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煩，只是靜靜坐著，不要伸出窺探的鼻子”……我變得內向，把自己封閉起來。后來，我發現很難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兒院待得時間太長，學會了對什么都漠不關心。

梅拉所在的孤兒院有“數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憶：

我們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沒人敢于談及自己的家人。他們把我們稱作“托洛茨基分子”，總把我們歸在一起。我們也形成小團體，之間并無特殊的友誼，只是想團結起來……其他孩子會向我們扔石頭，咒罵我們。我們就聚在一起來保護自己。



1940年，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第一孤兒院的女孩們，瓦倫蒂娜位于倒數第二排的中間

梅拉會寫信給列寧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時，外祖母曾拒絕照看她和伊納薩。她前不久與酗酒施暴的丈夫離婚，住在簡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寧格勒煙廠擔任質量檢查員。她擔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敵”的孩子，可能會失去自己的工作。她還認為外孫女在兒童之家可能會過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驚，她從沒想到外孫女會陷于如此惡劣的環境。1939年，她從兒童之家救出兩個女孩，帶回列寧格勒的地下室，與自己同住。 [(564)](#_561_2)

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和妻子索菲亞被捕于1937年10月，女兒瓦倫蒂娜其時15歲。1938年2月8日，索菲亞和弗拉基米爾同一天被槍決。弗拉基米爾是瓦倫蒂娜的繼父。瓦倫蒂娜的生父是亞歷山大·季哈諾夫，印刷工人，來自莫斯科的工人大家庭，后來成為莫斯科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主編，接著去布拉格的國際書店任職。索菲亞就是在布拉格遇見了身為蘇維埃大使的弗拉基米爾。瓦倫蒂娜在1934年之前見過自己的生父，但后來失去聯系。瓦倫蒂娜說：“我們返回莫斯科時，他沒來探望。我沒向母親詢問原因，她也沒作解釋。顯然，我父親不想闖入我們的生活。”索菲亞和弗拉基米爾被捕時，瓦倫蒂娜被帶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達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敵”的孩子再從那里被發配去蘇聯各地的孤兒院。瓦倫蒂娜剛到那里就病倒了，父親亞歷山大知道她的處境，但沒有伸出援手。他剛剛再婚，也許是害怕這樣做會危及他與新娘的關系，到1938年，新娘自己也被捕了。瓦倫蒂娜被從達尼洛夫修道院轉至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個兒童之家，一直待到1941年才回到莫斯科。瓦倫蒂娜回顧了這一段辛酸生活：

孤兒院造成的創傷，我從未能克服，這是我第一次與人談及此事。那是我的成長歲月，需要母親，也需要父親。我開始明白，他們都已死去，我的黯然神傷無時不在。在孤兒院，他們給我們新年糖果，有時教師還會大做文章，但我所感受的，只是這種黯然神傷。我形單影只，沒有親人。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母親可以聯系，也沒有來信的女孩。在我們團體中，只有我一個人的母親被槍殺[長長的沉默]。我為此一直痛苦不已。 [(565)](#_562_2)

她與其他孤女凝結的友誼——救她于絕望之中——又成了孤兒院的可取之處。

在孤兒院長大，雖有無數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愛和“家庭”的實例。加林娜·科舍連娃被送去孤兒院時才9歲。其父親是波德博洛熱地區（位于列寧格勒的東北）的農民，于1937年的“富農行動”中被捕并遭槍決。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來又各奔東西。弟弟去了鄰近的祖耶夫卡鎮孤兒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奧帕里諾鎮孤兒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間。加林娜剛剛抵達就患上肺炎。“我從列寧格勒來，身穿夏日的連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沒有其他衣服，腳上只是一雙涼鞋。我們離開時是夏天，到基洛夫時已是11月。”整個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兒院主任的調養。她名叫葉麗薩維塔·伊萬諾娃，是西伯利亞當地的年輕女子，她讓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為她自掏腰包向鄰近集體農莊購買牛奶，兩人關系猶如母女。葉麗薩維塔自己沒有孩子，對9歲的加林娜寵愛有加，晚上為她朗讀，遇上缺課還幫她補功課。她想收養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間不夠而無法獲得資格。然后，加林娜的母親在1945年突然出現。1937年，她逃脫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監管，帶著新出生的嬰兒四下隱匿生活。她曾在摩爾曼斯克鐵路上擔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變成德國軍隊的俘虜，被送去彼得羅扎沃茨克的芬蘭集中營。1944年，她獲得蘇維埃軍隊的解救，便到處尋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離開葉麗薩維塔和孤兒院時，顯得非常傷心。她跟母親、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熱地區，1952年又搬至列寧格勒。那些年，她不斷寫信給孤兒院的葉麗薩維塔。她回憶：“我非常愛她，使我的母親生羨。我對母親的愛，都不及對她的一半，我們母女之間的關系本來就平淡如水。” [(566)](#_563_2)

尼古拉·科瓦奇1936年出生于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父母1933年獲刑10年，被送去白海島嶼監獄。母親當時已懷上了姐姐艾萊娜，所以獲準在監獄里作為家庭一起生活。到1937年1月，內務人民委員會禁止勞改營中所有的同居。尼古拉的母親流放去了卡累利阿的勞改營（槍決于1937年11月），父親流放去了馬加丹的勞改營（槍決于1938年）。艾萊娜其時正患結核病，被送到列寧格勒南部的托爾馬喬夫孤兒院接受治療。尼古拉被送到北部的奧爾戈諾度假區，那是1917年之前圣彼得堡精英青睞的芬蘭灣度假地；內務人民委員會在王子奧爾登堡白色宮殿的一翼為“人民公敵”的孩子建立了孤兒院。

像尼古拉一樣，該孤兒院的許多孩子都沒有自己的家庭記憶，卻與廚房工人建立特殊的關系，由此而得到愛和親情，甚至家的感覺。尼古拉回憶道：“有一條通向廚房的后樓梯。”

我去那里，廚娘會說：“科利亞來了！”她們會撫摸我的頭發，給我一塊面包。我就坐在樓梯的底部吃，沒人看見。那時，大家都饑腸轆轆的——我害怕被人搶走……那些廚娘原是當地的普通婦女，可憐我們孤兒，盡力予以幫助。

孩子們還拜訪當地的老人，幫助耕耘他們的自留地。尼古拉回憶：“這很適合我們。”

如果幫助一位老大爺，他就會很高興，會對我們很親切。他可能會變得很親熱，撫摸我們的頭發。我們需要溫暖和親情，需要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我們沒有家庭，也不感到傷心，因為根本都不知道家庭為何物或家庭的存在，我們只是需要愛。

他們通常在與動物和寵物的相處中找到愛。尼古拉說：“我們有狗、兔、馬。”

孤兒院的圍墻背后有一個馬場。我們很喜歡去那里，會感到自由自在。有時在夏天，馬廄工人讓我們帶馬去河邊。我們騎著無鞍馬，在河中一起游泳，騎回來時尖聲歡叫。城鎮的草甸上夏季有賽馬，我們總在那里。沒人比我們更了解馬，我們愛上了馬。

在孤兒當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體發揮了許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齡的男孩會結幫成伙，來應付把他們罵成“人民公敵”的恃強欺弱者；年齡較大的會保護年幼的，在功課和家務上提供幫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時予以安慰。孤兒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團結，以反抗嚴厲、有時甚至殘忍的教師。 [(567)](#_564_2)

尼古拉不知道父母長得如何，也不知道他們已死去，只是在夢中見過母親：

我經常夢見媽媽，我想應該是媽媽吧。我沒見過她的臉，或她的身影。那是一些很幸福的夢，我和媽媽在天上飛，她擁抱我，幫助我飛，但我無法看到她——不知怎的，她要么在我后面，要么與我并排。我們沒有飛得很高——只是在孤兒院附近草地和沼澤的上空。那是一個夏天，她會對我說：“不要怕，我們不會飛得太高或太遠。”我們面帶微笑，在夢中笑個不停。只有在那些夢中，我才感受到幸福——渾身舒暢的幸福。即使今天，我一想到幸福，仍會想起那些夢，還有那種純粹的幸福感。

像很多其他孤兒一樣，尼古拉為父母勾畫了想象中的形象。他從沒夢見過父親，只是把他想象成一名飛行員——那是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時蘇維埃的英雄形象。他在夢中渴望有一個家，盡管如尼古拉現在回憶的，他都不知道家庭為何物。直到13歲之前，他還從沒見過一個實實在在的家庭，甚至沒見過在一起的母子。 [(568)](#_565_2)

由于沒受家庭的影響，尼古拉和他的孤兒同伴對什么是對和錯，自有非常獨特的概念。他所謂的孤兒院的“叢林法則”，塑造了他們的道德意識，要求每一個孩子為集體而犧牲自身利益。尼古拉解釋：

如果有人犯了錯，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懲罰，那個人就要去向當局坦白。我們寧可讓他一人受罰，也不愿讓整個群體一起倒霉。如果無法說服他，就會動用體罰，迫使他老實交代。我們不會去舉報——出賣自己人是被禁止的——但我們會確保他一定去坦白。

盡管出賣自己人是受禁的，但孩子和成人之間的關系卻適用不同的法則。孤兒們都敬佩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尼古拉回憶道：“他是我們的英雄。”

我們沒有家庭概念，不知道父親是什么。帕夫利克背叛父親的事實，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重要的是，他抓住了資產階級一員的富農，在我們眼中成了英雄。就我們而言，這個故事與階級斗爭有關，與家庭悲劇無關。 [(569)](#_566_2)

孤兒院的道德體系——強大的集體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聯系——使之成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和紅軍的主要招募場所之一。20世紀30年代，有數百萬兒童生活在蘇維埃機構中——孤兒院、軍隊、勞改營，他們對家庭生活一無所知。孤兒們特別容易接受蘇維埃政權的宣傳，因為沒有父母的引導以及可供選擇的其他價值體系。20世紀30年代，米哈伊爾·尼古拉耶夫在一連串兒童之家長大。他回憶，他和孤兒同伴們一直受到灌輸：蘇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他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孩子，一切都由國家供給，而領導國家的一國之父斯大林關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國家，我們將死于饑寒交迫——這是我們被告知的……當然，我們相信其中每一個字。我們在孤兒院體驗生活，學著去思索和感受——更確切地說，不作自發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們對世界的想法全來自蘇維埃政權。 [(570)](#_567_2)

米哈伊爾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傳奇的影響，夢想仿效他的成就——揭發出一個敵人或間諜，在成為少先隊員時，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許多孤兒一樣，米哈伊爾把加入少先隊，看作被蘇維埃社會所接納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恥于自己的父母，僅有零星的記憶：與父親一起騎在馬上，想象中的母親坐在燈旁擦槍（讓他覺得，她一定是一名黨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誰，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米哈伊爾·尼古拉耶夫”是剛來孤兒院時取的新名字）。他記得四五歲時發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來兒童之家探看，告訴他他的父母已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決了；然后又說，“像槍斃你父母一樣，他們也應該把你槍斃掉”。整個童年時期，米哈伊爾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隊，這個恥辱獲得了解除；這是他第一次得到蘇維埃制度的承認和重視。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米哈伊爾把斯大林當做父親，既權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來自他：“我們有吃有穿、有學可上、可以赴少先隊野營，甚至有新年樹——這一切都歸功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他的看法。 [(571)](#_568_2)

米哈伊爾所在的孤兒院的孩子們，早早投入了工作。他們從4歲起就幫助洗碗、打掃院子，7歲起去集體農莊的田野勞動，11歲起去紡織廠工作。該紡織廠位于鄰近的奧列霍沃―祖耶沃鎮——在莫斯科的東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爾又被分配到奧列霍沃―祖耶沃郊區的一家金屬廠。盡管只有12歲，但孤兒院的醫生以體檢為基礎，宣稱他已有15歲（米哈伊爾長得高大，與年齡不相稱），并發給他一套新證件——上面說他出生于1926年。當時有一條政策，有意提高孤兒的年齡，讓他們夠條件去參軍或從事工業生產。在之后的兩年中，米哈伊爾與孤兒院的其他孩子組成一隊，在鋼鐵廠上班。“我們輪班工作——這一周，晚上12小時；下一周，白天12小時；每周工作7天。”工廠里可怕的真實條件，與宣傳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別。米哈伊爾以前學的，均來自書籍和電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開始懷疑被告知的東西。孩子們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廠俱樂部的地板上，吃飯都在食堂，沒有任何報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爾逃離工廠，自愿參軍——動機是躲避饑餓，不是愛國主義——成為一名坦克駕駛員，當時年僅14歲。 [(572)](#_569____MSP__f__3__op__24__d__2)

像米哈伊爾一樣，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隊時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兒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與其他同齡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著加入共青團，成為黨的積極分子，他“最喜愛的書”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在少年時就加入紅軍，在遠東服役。復員后，他卻難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蘇維埃機構待的時間太長——轉而去內務人民委員會上班，晚上在其附屬的精英軍校進修。科瓦奇任職于內務人民委員會一個特殊單位，其主要任務是捕獲兒童之家的逃犯。 [(573)](#_570_2)

三

父母要求14歲的瑪麗亞·布德克維奇事先做好準備，以預防父母的被捕。1937年7月，內務人民委員會抓走父母，瑪麗亞得以生存下來，孑然一身，住在莫斯科的自家公寓，直到1938年夏天內務人民委員會把她帶到達尼洛夫修道院的拘留中心。她雖是自力更生，卻有父母的老朋友米利察·葉夫根涅夫娜的幫助。米利察的丈夫是一名布爾什維克官員，被捕得更早，所以米利察揣測瑪麗亞的父母可能是受了自己丈夫的牽連，因而覺得對不起瑪麗亞。但很快，她又擔心，如果繼續幫助“敵人”的女兒，自己也會吃不了兜著走，只好向內務人民委員會匯報。他們來抓瑪麗亞時，米利察對她說：“不要生我的氣……最好還是去兒童之家，之后就會慢慢習慣，不會再是人民公敵的孩子。” [(574)](#_571_2)

瑪麗亞與其他25名“人民公敵”子女一起，從達尼洛夫修道院，被轉至高爾基城附近的孤兒院。孤兒院主任是個慈父般的人，鼓勵瑪麗亞努力學習，即使出身不好，仍可爭取美好的前途。她申請加入了共青團，盡管事先受到警告，獲準之前需要背棄自己的父母。她也參加各項活動，主要是在群眾集會和游行中強烈譴責“人民公敵”，歌唱對斯大林和黨的贊歌。她回憶，之所以加入共青團，是因為堅信這是父母希望她做的：“我怎能拒絕加入呢？媽媽總是說，我一定要成為少先隊員，然后是共青團員。不加入是可恥的。”然而同時——她對導致父母被捕的政治事件茫然無知——她又認為，入團可能是錯的。她記得曾感受到對父母的愧疚，好像是在背叛他們。但后來，入團儀式并沒要求她背棄父母。盡管如此，她仍在參與共青團宣傳時覺得尷尬。如她所憶起的，只是讓人看到自己在“高歌贊美斯大林，連自己也不太相信口中吐出的歌詞”。尷尬的根源是她的直覺：父母的被捕是錯的（她甚至在1939年向斯大林書寫抗議信）。她為生存和進步所采納的政治身份，又與這信念發生沖突。作為共青團員，瑪麗亞可以就讀于列寧格勒理工學院，那是一所占處于領先地位的科技大學，學生中僅有極少數“人民公敵”的孩子。 [(575)](#_572_2)

數百萬孩子在蘇維埃制度和其“敵人”之間的灰色地帶長大，內心時常處于爭相表忠與抗爭沖動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點增強了他們證明自己是社會平等成員的需求。這意味著他們必須遵循蘇維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團，甚至共產黨。另一方面，這些孩子不禁會對給家人帶來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遠之感。

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后，熱尼婭·葉萬古洛娃百感交集。她19歲，剛剛讀完中學，留在莫斯科繼續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灰飛煙滅。于是，她搬去列寧格勒，與父親的舅舅同住。舅公是一名退休的冶金學教授，幫助她進入了工人補習學校，她希望以此升入理工學院。隨著申請理工學院的日期越來越近，熱尼婭變得憂心忡忡，知道在表格中將不得不揭示父母的被捕。她覺得自己好像一個“麻風病人”，盡管在入學考試中取得高分，仍在擔心沒有資格進入理工學院。1938年，她被接受為冶金系的新生，該系的競爭不像其他系那么激烈。整個第一學年，熱尼婭在日記中承認自己的抑郁癥，甚至興起自殺的念頭。反觀這一悲傷，她自我解釋，這是父母失蹤之后自己個性的“自我封閉”。在工人補習學校時，父母的被捕一直是她的恥辱之源，她的同學曾無情地欺負她，稱她為“祖國叛徒”的女兒。在理工學院，熱尼婭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名模范學生，以克服這一恥辱。

有時，她盡力掙脫父母的陰影，享受與同學的相處，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在短暫的瞬間幸福之后，總是涌起內疚感，使她想起身系勞改營的父母。父親被捕后不久，熱尼婭做了一個夢，夢中的父親竟是一名侵略者。這一直給她帶來困擾：

我父親從隔壁房間的薄霧中浮現，舉起手槍朝我心臟開槍。我沒有身體上的痛苦，只有無法遏止的失落感……然后，我發現自己的胸部已被鮮血浸透。



1938年的“海陸空”體操表演人員，依達位于后排的中間

在理工學院時，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心情非常愉快，那還是好幾個月中的第一次。可當天晚上，她在夢中又看到父親，第二天早上醒來，滿懷“沉重的抑郁”。 [(576)](#_573____MSP__f__3__op__24__d__2)

“奇怪孤兒”中的許多人，回顧自己的少年時代時，都記得有這樣一個時刻——他們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壓迫的恥辱突然消失，他們重被接受為“蘇維埃公民”。這種為社會所接受的渴望，幾乎是所有“人民公敵”子女的共同心聲。只有很少人對蘇維埃制度產生厭惡，或干脆反對。

對依達·斯拉溫娜來說，重被接受的時刻發生于1938年的夏天，與母親的被捕相隔不久（父親被捕于1937年）。其時，體育教師來邀她參加學校的游行。依達是一名運動員，身材健美，自14歲起就以體操運動員的身份參加學校游行，但在父親被捕后，她被逐出了游行團隊。她在回憶錄（1995年）中追憶了當時的喜悅：重被接受為“海陸空”體操表演的體操兼跳傘選手，參加游行，慶祝蘇維埃體育界所取得的成就。

我尚記得采訪人在游行運動員照片中認出我時的詫異。 [[2]](#_2___Yi_Da_Jie_Shou_BBCDian_Ying) 他們問，母親剛被發配去勞改營，我怎能參加游行？現在回想起來，我當然承認年輕時的自私。我才16歲，忍受不了痛苦，渴望幸福和愛，但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原因。參加游行是在表達一個深切的愿望：我想在破碎的世界中重返完整。我再次感到，自己從屬于一個龐大的“我們”。我與大家行進在方陣中，高唱讓人驕傲的歌曲《我們沒有國界》（We Have No Borders）。在我看來，我與任何他人一樣，都是完全平等的祖國代表。我對[歌中的話]深信不疑，“我們將高舉蘇維埃旗幟，超越世界和世紀”。我跟大家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朋友和教師再一次對我表示信任——這意味著，或者是我就因此認為，他們也一定相信我父母的無辜。 [(577)](#_574_2)

對于大多數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團象征了從“人民公敵”的孩子到“蘇維埃公民”的過渡。父親1938年2月被捕時，加林娜·阿達西斯卡婭17歲。加林娜的父母是積極的反對派，沒期望她會成為共青團員。她和母親從老家列寧格勒，流放到雅羅斯拉夫爾城。加林娜強烈地感到遭受迫害的恥辱，試圖予以克服，決定申請加入共青團。她給學校共青團委員會寫信，要他們“再看看我的材料”（即審查她的申請，盡管有父親被捕的污點）。她坦言自己在有意識地自我凈化，她公開自己的“污點履歷”，希望獲得集體的寬恕和救贖。在討論她的請求的共青團會議上，領導們裁定加林娜“作為人民的敵人沒有資格入團”。但有一位同學抗議說，如果阿達西斯卡婭被排斥在外，所有的學生都會離席。加林娜回憶：“黨員輔導老師勃然大怒，耳紅面赤。”

他坐在木凳上，大聲叫喊：“這是什么？挑釁！缺乏警惕性！”不過到了最后，我還是獲準加入了共青團，甚至當選為班級組織者。我們的組織在學校里贏得了第一名[在社會主義競賽中]。

就加林娜而言，這就是她被帶進集體生活的一刻。她回憶，自己在1941年被捕，“調查官員查閱我的共青團記錄時，眼珠子幾乎都要跳了出來”。 [(578)](#_575_2)

背棄自己家庭的傳統和信仰，通常是進入蘇維埃社會所必需的犧牲。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烏拉爾北部切爾登鎮的一個東正教神父的家庭，排行第四。柳芭的父親亞歷山大于1922年被捕，押在監獄將近一年才獲釋。政治警察要他成為舉報人，匯報自己教民的活動，卻遭到拒絕。后來，受政權支持的宗教改革者奪走了他的教堂，亞歷山大二度被捕，但于數月后的1929年秋天獲釋。柳芭的母親克拉夫蒂婭隨即被切爾登博物館解雇，她的弟弟維克多作為“階級敵人”的兒子也被學校開除。1930年，亟想保護家人的亞歷山大，帶兒子搬去喬爾莫茲鎮，讓活躍于教會的一個工人收養維克多，以此來改善兒子的前途。作為“工人的兒子”，維克托在學校讀完七年級，取得教師資格。家中的其他人也搬離讓他們家破人散的切爾登鎮，去南方100公里外的新興工業城鎮索利卡姆斯克，與克拉夫蒂婭的母親一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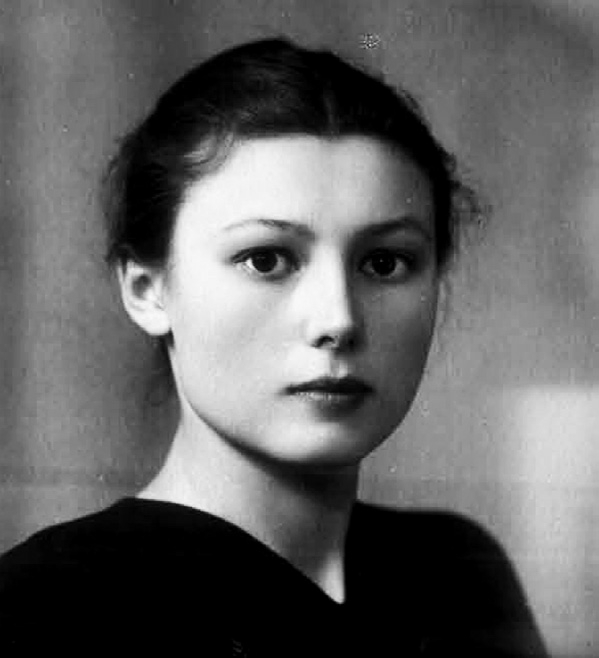
柳芭在索利卡姆斯克長大，從小學會了遵守“自己的本分”。

媽媽經常提醒，我是神父的女兒，要倍加小心，不可與他人交往，不可信任他人，不可談論自己的家事。我的本分是要保持謙虛，她曾說：“別人能做的，你卻不能。”

她家很窮。克拉夫蒂婭在成人掃盲組織擔任講師，但工資不足以養家糊口，因為沒有配給卡。她們勉強生存，多虧了亞歷山大的小額金錢援助，他仍在喬爾莫茲鎮從事神父的工作。到1937年8月，亞歷山大又一次被捕，10月遭槍決。克拉夫蒂婭和孩子們變賣最后的財物，種植蔬菜，茍延殘喘。最終，亞歷山大的農民教友送來了援助款——他們曾在集體化運動中得到教會的幫助。

自從父親移居至喬爾莫茲鎮之后，柳芭只見過他一次。她在1937年6月前曾去拜望，幾星期后，他就被捕了。柳芭回憶：“我對宗教的無知讓爸爸大為不滿，他試圖教我古教會斯拉夫語，但我沒有興趣。這是我人生中第一節宗教課，也是最后一節。”經年的壓迫促使柳芭逃離自己的家庭背景。她在索利卡姆斯克新學校的第一年，就是反宗教宣傳活動的靶子。教師一邊指向柳芭，一邊告訴其他孩子：如果他們接觸宗教，就會變得像她一樣糟糕。她回憶，自己老受其他孩子的欺負，陷入了“極端恐懼和歇斯底里”的狀態：

我不敢去上學。母親和外祖母最終決定，不再帶我去教會。她們告訴我，最好只有一種教育，讓我相信學校里有關宗教的說法。



1949年的葉麗薩維塔·德利巴什

柳芭加入了少先隊，自豪地戴上標志著受到接納的紅領巾，成為一名積極分子，甚至參加了1938年反教會的示威游行，所舉的橫幅上寫著“打死所有的神父”。柳芭最終成為一名教師——亞歷山大的4個孩子中，3人選擇了這個職業。將近50年，她教的是反教會的共產黨路線。回首往昔，柳芭充滿了悔恨，因為自己背棄了家庭的傳統和信仰。 [[3]](#_3___Gong_Chan_Zhu_Yi_Zheng_Quan) “我總想，如果父親是一名教師，而不是神父；如果像其他女孩一樣，也有父親伴我長大，我的人生會變得容易許多。” [(579)](#_576_2) 她弟弟維克多曾在共青團會議上正式背棄父親，相比之下，柳芭所做的只是在蘇維埃社會生存下去的絕對必需之事。

在“人民公敵”的孩子中間，成為蘇維埃積極分子是一條普遍的生存策略。這樣做，既可消除自己的軟肋所引起的政治猜疑，又可讓他們克服自身的恐懼。

葉麗薩維塔·德利巴什1928年出生于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城，父母在那里過著流放生活。父親亞歷山大·約西列維奇是列寧格勒印刷工人的兒子，從蘇維埃政權的一開始，他就是老布爾什維克和契卡官員。他曾是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1917年10月在斯莫爾尼學院找到父親的那個少女）的伴侶，直到愛上格魯吉亞低級官員的女兒尼娜·德利巴什，兩人在1925年結婚。兩年后，他因與政治警察的前雇主發生齟齬而被捕（他1926年離開警察系統，在莫斯科學習經濟），流放至西伯利亞，其時已懷上女兒的尼娜跟隨而去。1918年，尼娜和女兒先回到蘇維埃首都；亞歷山大獲釋后也回到莫斯科，在外貿部任職。1930年，亞歷山大再次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高爾基城附近的蘇赫貝茲沃德尼勞改營，屬于韋特拉戈古拉格系統。同時，尼娜也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一系列的“特殊定居地”，到1932年又返回莫斯科。葉麗薩維塔一直與在列寧格勒的父親的家人一起生活，偶爾去探望身在流放地或已返回莫斯科的母親，直到1935年。其時，她和尼娜前去蘇赫貝茲沃德尼勞改營，與亞歷山大同住。尼娜充任志愿者，一家人住在勞改營，葉麗薩維塔開始上學。到1936年4月，葉麗薩維塔的父母再次雙雙被捕，亞歷山大于1937年5月被槍決；尼娜被判刑10年，先被送去索洛韋茨基勞改營，后槍決于1937年11月。

父母被捕后，葉麗薩維塔獲得蘇赫貝茲沃德尼勞改營難友的收留，逃過被送去孤兒院的厄運。那位難友在1936年獲釋，把她帶回列寧格勒。葉麗薩維塔住在不同的親戚家——先是格列高利叔叔（1937年4月被捕），接著是馬戈姑媽（7月被捕），再是賴婭姑媽（8月被捕）。于是遠房親戚將她救出列寧格勒，在把她送給在第比利斯的母親的家人之前，先讓她住在莫斯科附近他們的鄉間房子里，以避開內務人民委員會。她在這些親戚當中轉來轉去，不清楚他們對警方的擔憂，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個沒人要的小孩。

葉麗薩維塔的外祖父母是純樸的老百姓——外祖父出身于農民家庭，外祖母是商人的女兒——但都受過教育，汲取了第比利斯知識界自由基督徒的價值觀。葉麗薩維塔沒去上學，只接受外祖母的家教——她在1917年以前，曾任第比利斯中學的教師。外祖父母對清洗不抱任何幻想，直截了當地告訴她，父母是無辜的，是好人，卻受到了不公的懲罰。尼娜從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給父母寫過兩次信，特地加上給女兒的安慰和鼓勵。她最后一封信寫于1937年11月2日被槍決之前，交在了執刑人手里。盡管是非法的，他還是將之付郵了。尼娜寫道：“爸爸，媽媽，我就要死去，救救我的女兒。”她還告訴葉麗薩維塔，可在夜晚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母親，就在大熊星座的旁邊。她寫道：“當你看到大熊座，就能想起我，因為我就住在那一片星空。”1937年12月，尼娜的弟弟在第比利斯被捕，尼娜的信件和所有照片隨之都遭銷毀。 [[4]](#_4___Ye_Li_Sa_Wei_Ta_Mei_You_Mu) 但最后一封信一直深入葉麗薩維塔的心靈，外祖母給她念了十幾次。她回憶道：“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的母親。即使成年后，我晚上出去，也會尋找大熊星座，思念我的母親。直到1958年[方才發現母親已被槍決]，我一直視之為她終將回到我身邊的象征。”

舅舅的被捕使葉麗薩維塔留在第比利斯變得危機四伏，此時，大規模的逮捕正席卷格魯吉亞的首都。她將近10歲，從沒進過學校，但在第比利斯，沒人愿意收留“人民公敵”的女兒。1938年1月，外祖父母送她上火車，去列寧格勒與大姨媽索尼婭同住。索尼婭任職于基洛夫工廠工會，是黨的資深積極分子和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在葉麗薩維塔所有的叔舅姑姨當中，索尼婭是大恐怖中唯一沒被捕的。葉麗薩維塔回顧那些創傷年代，認為沒有真正感受和了解到大恐怖對自己的巨大影響，親戚們往往不作透露。她到10歲時，已經歷了頗不尋常的各式事件——在流放地和勞改營長大，失去父母，避難于十多個不同的家——無論是“正常”的結束，還是“異常”的開始，對她來說都毫無意義。她現在回憶，當時感受到的只是迷惑和沮喪，既含糊又籠統，這植根于“沒人要，沒人愛”的直觀感受。索尼婭的丈夫于1938年1月被捕，姨媽家的公寓因而籠罩著冷峻、緊張的氣氛，與外祖父母家的友好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更加深了葉麗薩維塔的那一直觀感受。不久，索尼婭被開除出黨，她特地裝好一只放有替換衣服和干面包的小包，以備隨時可能發生的被捕。葉麗薩維塔越來越內向，生出“對他人的恐懼”。她回憶道：“我害怕每一個人。”她記起一件事，姨媽讓她去當地商店買東西，店員找回零錢時多給了5個戈比，她回到家里，姨媽就叫她去退還多找的零錢，并道歉。葉麗薩維塔被嚇壞了，不是因為拿了多找的零錢，而是害怕以個人化的方式與售貨員（陌生人）交流。

盡管有丈夫的被捕、幾乎所有親戚遭受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被驅逐出黨，索尼婭仍是斯大林的堅定支持者。她教導外甥女相信蘇維埃報刊上的一切，接受父母有罪的可能。她還聲稱，她父親曾屬于一個反對派組織，因此被捕，成為“人民公敵”，但尼娜很可能是無辜的。葉麗薩維塔回憶：“索尼婭很少提及我父母，我不敢向她詢問父母之事，擔心她會說出非議他們的話。我懂得，有關這一主題的談話是禁止的。”也許索尼婭認為，如果外甥女對自己家庭的命運想得太多，可能會避世絕俗，更加疏離于蘇維埃制度。在姨媽的鼓勵之下，葉麗薩維塔先加入少先隊，再加入共青團。每一次，如索尼婭所規勸的，她都掩飾真相，聲稱父母被捕于1935年（在清洗“人民公敵”之前）。葉麗薩維塔回顧自己的入團經歷：

我陷入深深的恐懼——好像重又回到父母被捕、自己孤身只影的歲月——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害怕一切的事物和人際關系。我不敢與人接觸，唯恐他們問起我的家人。世上最為可怕的，就是在共青團會議上老是提出的出身問題。

她漸漸克服自己的恐懼，被接受入團更增強了她的信心。她回憶道：“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不再覺得自己像一匹害群之馬。”她學習成績優秀，這讓她在同學之間享有真正的權威。她變成積極分子——先當選為學校的共青團書記，后成為她所居住的列寧格勒地區共青團書記。她回首往事時認為，她的積極性救了自己，讓自己獲得一定程度的主動：

當我加入共青團，成為“我們”中的一員，當我與同代人打成一片，成為他們的領袖，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可與當局進行談判，為他們的事業力爭。當然，我也是在為自己力爭。因為，越顯得堅強，就越能抑制自己內心的恐懼。 [(580)](#_577_2)



1939年9月，物理教師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坐在最右邊）、校長維克托·別茲古多夫（站在最右邊）與喬爾莫茲鎮特殊定居地的七年級學生

對于在“特殊定居地”和其他流放地長大的“富農”孩子而言，唯有擁抱蘇維埃事業，才能克服他們的出身之恥。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與“富農”父母一起流放的許多孩子已經成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收到這些青少年的無數請愿，要求獲釋，重返蘇維埃社會。有些人寫了正式聲明，背棄自己的家庭。20世紀30年代初，只有很少申訴獲得成功：一些“富農”的女兒被允許離開流放地，與享有全部權利的蘇維埃公民結婚。除此之外，政府認為“富農”的孩子只會污染社會，降低士氣。然而，從1938年的年底起，出現一個大轉折，新政策強調“富農”孩子的“重新做人”和恢復名譽。一旦達到16歲，他們就可離開流放地，恢復公民權利——但一定要背棄自己的家庭。 [(581)](#_578_2)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就是這樣一名“富農”的孩子，他1917年出生于庫爾干地區，在集體化運動中，與家人一起流放至烏拉爾北部喬爾莫茲鎮附近的“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在定居地長大，伴隨著“富農”出身所帶來的恥辱。他回憶道：“我感覺像一個棄兒，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由于父親的流放，我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玷污，變成了壞人……我并沒像敵人一樣感到內疚，但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教育是他的唯一出路。父親老是說：“學習呀，學習，孩子們。教育是蘇維埃政權可以給你的一件好事。”德米特里學習努力，成為定居地中第一個讀完十年級的男孩，1937年因勤奮而加入共青團。他最終被接受為一名平等人，感到“自豪和高興”，很快成為一名積極分子。德米特里將自己的進步歸功于黨的理想，視黨為更高形式的社區，其成員“公平且優等，洋溢著同志之情誼”，從中能贏得他的救贖。依照父親的建議，德米特里前去拜訪“特殊定居地”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指揮官，為自己赴大學深造懇求幫助。指揮官涅沃林為人善良，對這位聰明青年的處境感到惋惜。他已經知道德米特里在學校取得的成就，清楚地看出這位青年值得幫助。涅沃林頒發給德米特里一本護照和100盧布——相當于“特殊定居地”每月工資的兩倍多，讓他隨身帶上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推薦信去彼爾姆，幫助他注冊成為大學的物理系學生。

德米特里從未隱瞞自己的“富農”出身。他在入學表格中填寫自己的出身，因此受到其他同學的欺負。他最終決定離開，以為越遠越好，希望找到一個不受出身影響的學校。他先是就讀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礦業學院，然后搬去更為東部的鄂木斯克，成為農學院學生。但在那里，他的出身仍是一個困擾。到第一學期的第6個星期，系主任告訴德米特里，他必須退學，因為學校已收到驅逐“富農”、神父和其他“社會異己分子”子女的命令。他非常沮喪，決心先去仍有親戚的庫爾干地區。除了返回“特殊定居地”，似乎無路可走。德米特里前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師——他在赴流放地之前曾是該村校的學生。那位教師還記得他，邀請他回校擔任物理教師。德米特里雖沒有高等學院的學位，但在實際上，真正必需的資格是熟悉斯大林的黨史，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又是德米特里最愛讀的書籍。他教了一年書，1939年夏天回去看望仍在喬爾莫茲鎮的父母。他從父母的來信中得知，“特殊定居地”的條件有所改善。但出乎意料，比涅沃林嚴厲的定居地新指揮官卻將他逮捕，沒收了他的護照，并威脅要把他送進勞教營。再一次，德米特里因自己的優秀成績而得救。喬爾莫茲鎮學校校長記起了他的得意門生，呼吁內務人民委員會手下留情，聲稱他急需教學人才。于是，德米特里獲準留了下來。他在隨后兩年中任教于定居地學校，直到戰爭爆發時被征入勞動大軍，前去伐木營（1942年4月之前，“富農”的兒子不得參與軍隊的前線戰斗）。

德米特里即使在蘇維埃政權的手中飽受磨難，仍是一名蘇維埃愛國者，堅信共產黨事業的正義性，亟想成為它的成員。他解釋說：“我做夢都想入黨。”

我只想獲得平等人的認可，入黨就是為此。我絕不是為了職業發展而申請入黨的。就我而言，黨是誠實和奉獻的象征。他們是共產黨人，既誠實又正直。我想，我應該名列其中。

他在1945年提出申請，卻遭到拒絕，當時帶給他巨大的失望（他60年后重述此事時，仍雙手顫抖，情緒激動，哽咽難言）。到1956年后，黨改弦易轍，試圖吸收曾受斯大林迫害的團體的成員，他才得以加入渴望20多年的平等同伴的行列。 [(582)](#_580_2)

四



左圖：1936年，季娜伊達和兩兄弟。

右圖：1942年，季娜伊達（中間）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這是一張寄給家人的古拉格囚犯照片，極為罕見。3名女囚犯一起拍照是為了省錢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專為收容祖國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服刑，地處哈薩克斯坦。5年之后，她從核心的監獄區域調至外圍的定居地，那里的條件稍佳，有時可與家人同住。季娜伊達寫信給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親。她雖然亟想與女兒團聚，即安吉麗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們承受勞改營的艱辛，“糟蹋她們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擠滿了難民，他們來自飽受戰火蹂躪的蘇維埃領土，長期的饑荒隨之發生。像布舒耶夫一樣的“人民公敵”，沒有食物配給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季娜伊達的母親決定，最好讓女孩們與母親團聚。她無法想象勞改營的條件還會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為了讓孩子進入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先要把她們還給孤兒院。季娜伊達等女兒取得國家收養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們轉至勞改營。安吉麗娜和奈莉回到孤兒院3個月，再由外祖母領出，坐火車從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薩克斯坦，抵達阿克莫林斯克時，已是1月份的一個傍晚。季娜伊達到火車站迎接，發現她們正坐在上有遮頂的月臺躲避暴風雪。她自己身穿棉襖、長褲、氈靴，即囚犯的標準冬衣。其時9歲的奈莉看到母親，便奔跑過來，雙手摟著母親的脖子。但兩歲就與母親分離的安吉麗娜當時太小，已記不起來。她在恐懼中往后退縮，脫口說：“那不是我的媽媽，那只是身穿冬衣的農民伯伯。”季娜伊達經歷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氣質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麗娜從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腦海中想象的理想母親。 [(583)](#_581_2)



1942年，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里的孩子們。斯拉瓦·布舒耶夫站在后排最右邊

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是古拉格系統中專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勞改營之一（其余兩個是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勞改營和摩爾多瓦共和國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勞改營）。為了滿足政權對“人民公敵”妻子監獄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們中的大多數，被安置在內務人民委員會控制的孤兒營的前營房。到1941年，估計有1萬名婦女在勞改營。像布舒耶娃一樣，她們中的大多數從事農活，或在紡織廠制作紅軍制服。哈薩克斯坦的勞改營，與遠北和西伯利亞的相比，條件還算不錯。但對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女犯來說——尤其是那些習慣于舒適生活的蘇維埃精英——勞改營生活還是非常艱苦的，特別是在最初幾年。一開始，它被定為高度機密的刑事機構，為了開展反“叛徒妻子”的鎮壓運動，還實施了極具懲罰性的“特殊管理”。監獄的核心區域，大大不同于營房定居地，圍上了鐵絲網和 望塔，還有牽狼狗巡邏的獄警。女囚們早上4點就要起來上工，睡覺前最后一次點名是在午夜。許多囚犯回憶，獄警們不善于計數，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額方能領到口糧。如果連續10天完成不了配額，就會被送去“死亡營房”等死。一名前獄警回憶：“每天早上，死者被運走，埋在營房外的萬人坑。”對許多囚犯來說，最難忍受的是不得與親屬通信（特殊管理規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改為“普通勞改營”，條件開始有所改善。營房定居地逐步擴大，越來越多的婦女在監獄區域服完刑或因勤勞而獲得提早釋放，都轉至定居地。 [[5]](#_5___Zhan_Zheng_Yu_1941Nian_6Yue) 居住條件變得比較容易承受，不再有鐵絲網。獄警護送婦女去上工，晚上回來計算人頭，除此以外，基本上讓她們自管自。在勞改營指揮官謝爾蓋·巴里諾夫的鼓勵下，定居地的俱樂部有了活潑的文化生活。相對來說，他在人們的記憶中是一個善良正派的人。勞改營的女子當中有不少資深布爾什維克和紅軍指揮官的妻子和親人，包括作家、藝術家、演員、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劇院的獨奏家。據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副指揮官米哈伊爾·尤西佩科說，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醫生、400名合格護士、40名女演員和350名鋼琴家。哈薩克斯坦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的副手米哈伊爾·施賴德爾，回憶自己訪問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時的寢食不安，那里關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幫不上忙”。勞改營主管向施賴德爾保證，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條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個“可怕的場所”，與其他古拉格勞改營不相上下，這不是因為客觀條件，而是因為有那么多與子女分離的母親。 [(584)](#_581_2)

在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較幸運。季娜伊達的兒子斯拉瓦，剛到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時被送進了孤兒院，等到母親調至外圍的定居地后回來與她團聚，現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麗娜。她們睡在營房內一長列雙層的木板床上，安吉麗娜記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讓我們占據一個角落，像一個家庭那樣生活。我們兩人睡在上層，兩人睡在下層，再加上一個床頭柜和一個角落貨架。這都是我們私用的，可以儲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醬……我們去食堂領飯菜，回來坐在木板床邊一起吃……沒人會偷我們的東西……我們營房中有4個家庭，各占一個角落，享受些許的隱私。大家都同意，這樣的安排很好。



狄娜給格特魯德繡的毛巾（局部）

安吉麗娜和奈莉就讀于勞改營學校，甚至加入了勞改營組織的少先隊。這是當局鼓勵的，為了在“人民公敵”的孩子中培養蘇維埃精神。勞改營沒有紅領巾，所以少先隊員只得自制，他們用勞改營中到處都是的像蜂群一樣的蚊子的血，來染紅一條條棉布。 [(585)](#_584_2)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大多數婦女與家人只有很少的聯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一旦成為普通勞改營，其囚犯就可依據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與親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許每月獲得一封信和一個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大多數婦女一樣，允許每3個月獲得一封信和一個包裹。但在現實中，收到的信件數量，全取決于獄警的一時興致、勞改營的內部規矩和勞改營的地理位置（有些勞改營太偏遠，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郵件）。伊娜·蓋斯特講述了如何設法郵寄包裹給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母親。普通郵局不接受寄去勞改營的包裹，為此而設立了特別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們的地址（勞改營的存在是蘇維埃當局不予承認的），人們不得不依靠監獄外排隊中傳播的信息。1938年，發自莫斯科的所有郵遞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鎮。她擠在人群中，想方設法將包裹交到一節指定的車廂，該次特別列車專門運載囚犯去哈薩克斯坦。 [(586)](#_584_2)

對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婦女來說，剝奪通信權利無疑是某種形式的酷刑。有時，她們以敢于表達自己的不滿而被人傳誦。法學家伊利亞·斯拉溫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溫娜，1938年抵達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驚恐地發現大批少女——許多比她16歲的女兒依達還要年輕——不知何故，竟也在勞改營。埃斯菲莉擔心，依達可能也已淪入某地的勞改營，但她沒有通信權利，全無女兒的音信。事實上，依達在積極應對困境，她在列寧格勒借宿于許多學校里朋友的家，設法寄出包裹，只是沒能到達母親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絕食，這是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抗議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數是黨員，或布爾什維克的妻子——在總體上忠于蘇維埃政權，兢兢業業做事，毫無怨言。埃斯菲莉不參與政治，不關心丈夫的法律事務，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絕進食，因此被關進懲罰區。數星期后，她的身體瀕臨崩潰，勞改營的行政當局終于同意讓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絕食也許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很難想象勞改營當局會在意個別囚犯的死亡。他們本來已在準備把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由“特殊管理”改為“普通勞改營”，使囚犯有資格收到親人的信件。當局也有可能考慮到，埃斯菲莉絕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應。在通信這個問題上，囚犯情緒已經高漲，興起了頻繁的投訴。勞改營當局讓步后沒幾天，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列寧格勒總部召來依達，告訴她可以給母親寄送一個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達，當時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中幾乎沒人收到過信件，更不用說包裹了。埃斯菲莉的勝利使她成為名人，數百名婦女聚集在她的營房，檢視她包裹里的珍貴物品，這鼓勵了其他囚犯也向勞改營當局提出抗議。 [(587)](#_584_2)

隨著通信管控的放寬，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婦女將滿腔熱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還附上小禮物，以表達對兒女的愛。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一名囚犯回憶：“我們多么希望孩子擁有我們專為他們制作的小玩意。” [(588)](#_585_2)

葉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術學院校長，被捕于1937年12月（槍決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1938年獲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當時他們5歲的女兒格特魯德和弟弟被姨媽收養。狄娜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農藝師，在勞改營的農業管理方面是個資深人物——古拉格系統中的“模范囚犯”，擔任專家工作，與勞改營當局合作，以換取小小的好處，但在勞改營卻是生死攸關的。 [(589)](#_586_2) 與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許發送和接收的信件更為頻繁。她經常給女兒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禮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繡有動物的美麗毛巾——格特魯德非常珍惜，一生不減。她回憶道：“我一直將它留在床上，無論是在學生宿舍，還是我住過的其他場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話般的母親。她不在身邊，我只能構思一個母親形象，非常善良美麗，只是住得很遠。” [(590)](#_588____Interview_with_Oksana_Ko)

與渴望有一個母親相對的，是渴望擁有一個孩子，即使是在勞改營。1937年，烏克蘭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維奇21歲，被送去遠北地區的勞改營。她感到孤立、孤獨，渴望有個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愛帶來的喜悅。這是許多女性在勞改營中的渴望，她在充滿感慨的回憶錄中如此敘述：

我們對愛、溫柔、愛撫的需求如此強烈，甚至達到了精神錯亂、以頭撞墻、意欲自殺的程度。我們都想要一個孩子——所有人中最親愛最親近的，我們甚至愿意為之放棄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我真是渴望能親手懷抱的小生命，在孤獨、壓迫、屈辱的漫長歲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哈娃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發生戀情（“我并沒選擇他們之中最好的”），生下一個有著金色卷發的小女孩，取名為埃莉諾拉。勞改營沒有為母親準備特別的設施，在哈娃分娩的營房中，3位母親合住一個小房間。

臭蟲像沙粒一般從天花板和墻壁上紛紛掉落下來，我們整個晚上都用在了從嬰兒身上撣走那些臭蟲。白天，我們必須出工，找一位當天不用出工的老婦人暫時照看。我們留給嬰兒的食物，那些婦女卻拿起來，若無其事地放進自己的嘴里。

當上母親，給了哈娃一個新的生活目標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現在有了小孩，我最熱切最強烈的希望是要有一個上帝……我向上帝祈禱，如果不會與女兒分離，他可延長我的磨難一百年。我祈禱，我能帶著她獲釋，即使成為一個乞丐或殘廢。我祈禱，我能將她撫養成人，即使我必須拜倒在人們腳下，以乞求施舍來做到這一點。但上帝沒有回應我的禱告。我的寶寶剛剛開始走路，還沒聽到她咿呀學語、叫出美妙暖心的“媽媽”，我們就在冬天的凜冽寒風中，衣衫襤褸地擠進一個貨運車廂，轉去“母親勞改營”。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發小天使，很快就變成了蒼白的小幽靈，眼睛下生出藍色陰影，嘴唇上長滿瘡。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隊工作，后來去了鋸木廠。通過賄賂兒童之家的護士，她獲準在規定時間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點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飯時間。她所發現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護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們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鉆出冰冷的床被……她們以拳頭推搡，嘴里時不時發出粗魯的咒罵，脫下小孩的睡衣，用冰涼的水給他們擦洗。娃娃們甚至不敢哭，他們呼哧呼哧地吸氣，像個老頭一樣，間以低沉的嚎叫。這個可怕的嚎叫，來自各張小床，有時竟持續數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蓋頂住自己的胃，發出這些奇怪的聲音，活像鴿子的咕咕鳴叫。

一名護士要負責17個小孩，她會找竅門加快工作進度：

護士從廚房帶來一碗熱氣騰騰的粥，分到單獨的盤子。她抓住最近的一個小孩，把他的雙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綁住，然后開始一勺一勺，將熱粥灌進他的喉嚨，不留吞咽的時間，像是在填喂小火雞。

只有護士自己的孩子，她們才會給予妥善的照顧。哈娃聲稱，他們是“僅有的能活著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諾拉生起病來，渾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她如何以瘦小的雙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著：“媽媽，回家！”她還沒忘記那個臭蟲纏身的貧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陽光，與母親在一起……

小埃莉諾拉……很快意識到，她對“家”的訴求是徒勞的。我去看她時，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會在沉默中轉向別處。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當我抱起她時（他們準許我以母乳喂她），她睜大眼睛，盯著遠方某處，以弱小的拳頭打我的臉，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時，她的小床已經空出。我發現，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間成人尸體的中間。她在這世界上總共活了1年零4個月，死于1944年3月3日。 [(591)](#_589____Jiang__Mo_Fan_Qiu_Fan__J)



克捷萬、謝爾蓋和他們的兒子尼古拉，攝于卡拉干達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數勞改營辦有兒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兒童之家，共有400名4歲以下的小孩，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勞改營懷孕出生的。在其他勞改營，有些婦女亟想懷孕，以便脫離艱辛的勞動、分得較好的食物，甚至獲得赦免。攜帶嬰兒的婦女獲得赦免一事，確有發生， [(592)](#_589_2) 卻并不適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大部分女囚，因為她們犯的是“反革命罪”。她們中的大部分懷孕產子，與上述的另外兩種動機也是不相干的。據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前囚犯說，這400名嬰兒中的大多數，都是女囚遭獄警強奸的結果，特別是勞改營副指揮官米哈伊爾·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歡吹噓，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享受了數千美麗的女人，都是倒臺的黨領導的妻子”。 [(593)](#_590_2)

女犯和看守之間的性關系，并不總是基于強奸或渴望懷孕。有些女性為了獲得獄警的保護而順從對方的性要求。與一人發生性行為，好過遭多人強奸。在男女混雜的勞改營（但有男區和女區的分隔），女性也與模范囚犯發生性關系，后者的特權地位往往帶來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廚房和辦公室的珍貴工作。 [(594)](#_591_2) 除了叢林法則，很難解釋這些性關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護、騷擾或威脅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數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從女性角度看，她們的動機通常是為了生存。

葉夫根尼·米赫拉茲是第比利斯歌劇院的總監，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萬·奧拉赫拉什維利獲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服刑。 [[6]](#_6___Bei_Li_Ya_Dang_Shi_Dan_Ren) 克捷萬不知道丈夫的命運（槍決于1937年），也沒有兩個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兒院長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勞改營）。克捷萬年輕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吸引了眾多獄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員的注意，包括謝爾蓋·德羅茲多夫。她在1942年獲釋后，便與德羅茲多夫結了婚，他們的兒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達。德羅茲多夫在那里的哈薩克斯坦勞改營管理部門擔任官員。 [(595)](#_593_2)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諾娃是納塔利婭和艾萊娜的母親，畢業于圣彼得堡的斯莫爾尼貴婦學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寧格勒的普爾科沃天文臺擔任地震專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馬加丹附近的勞改營。1938年，柳德米拉遇見獄友米哈伊爾·葉菲姆夫。他是一名農民出身的機械師，剛剛服完所謂“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參與酒后爭吵而被捕），但決定留下，成為勞改營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員和獄警的定居地。他對柳德米拉產生了興趣。起初，她拒絕了他的追求，因為仍在期待總有一天會返回丈夫身邊（不知道他已被槍決）,重歸他們的家。后來柳德米拉因腎臟感染而病倒，米哈伊爾給她送來金錢、情書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沒獲得完全康復。隨著時間的推移，她慢慢放棄了與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賴米哈伊爾，也得到熱情的回報。柳德米拉獲準離婚（與“人民公敵”離婚很容易）之后便與米哈伊爾結了婚，1945年獲釋后兩人一起定居在頓河畔羅斯托夫城。 [(596)](#_593_2)

勞改營的婦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員尋求保護。勞改營外的強大保護人，有時也能決定女犯的命運。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中有一名囚犯是電影制片人阿納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亞。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處5年的勞改。4個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鮑里斯·巴別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槍決，他曾是莫斯科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的主管。柳芭后來以為，她的被捕緣于她曾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列寧格勒倉庫購買家具（這些家具是從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沒收來的，她感到深深的內疚，離開勞改營后，就將之全部賣掉）。但在事實上，她被捕只是因為她是巴別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個丑聞，導致了蘇維埃電影界幾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亞歷山德羅夫的電影《快樂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傳到美國，被制成唱片，廣受歡迎，導致1937至1938年對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的間諜指控。

柳芭被捕時，來自3次不同婚姻的3個孩子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從她共產國際酒店的公寓帶走。柳芭與巴別茨基的兒子阿廖沙才兩歲，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兒院；巴別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歲兒子沃利克，以及柳芭與阿納托利的11歲女兒奧克薩娜，則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送去古老的達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該修道院的許多牢房已擠滿孩子，其中一間扣押著奧克薩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帶到一個12歲以上孩子的特殊區域，由于已達刑事責任的年齡，將被送去內務人民委員會管理的特殊勞教營。他還做了指紋采集，拍了臉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記錄。

幾個星期后，奧克薩娜的父親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出現在修道院。奧克薩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親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著她。即使相隔很遠，但她一下子就認出他，并開始從自己的窗口大聲叫喊“爸爸！爸爸！”阿納托利走向大門正要離開，因為拘留中心的主管聲稱奧克薩娜不在那里。一輛黑色瑪麗亞——內務人民委員會用來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貨車——正好從阿納托利旁邊開過，駛出修道院的大門，發動機的噪音蓋住了他女兒的呼喊。奧克薩娜變得絕望，意識到這是最后的機會，再一次聲嘶力竭地呼喊。這一次，阿納托利轉過了身子。她又繼續大叫，并將手伸出窗戶的鐵窗欞，上下揮舞。阿納托利抬頭掃視大樓，但有那么多的窗戶和那么多探視的面孔，戈洛夫尼亞很難找到自己女兒的臉龐，但到最后，憑借他攝影師的眼睛，終于鎖定她的所在。他趕回主管的辦公室，奧克薩娜很快被傳喚到場。她告訴父親，沃利克也被帶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對比較簡單，因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納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視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納托利自己的孩子，則需要內務人民委員會熟人的幫忙。經過數小時的談判和幾次打電話給盧比揚卡，沃利克終于獲釋。至于阿廖沙，阿納托利實在無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奧克薩娜記得，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車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處卸下阿廖沙。她便與父親沿著她當時離開共產國際酒店后的路線，順利找到那家孤兒院。奧克薩娜回憶，阿納托利“走了進去，半小時后重新出現，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 [(597)](#_594_2)

3個孩子都在阿納托利的家中避難，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兩個小房間，他與高傲的母親利季婭·伊萬諾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親來找他，兩人消失于農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將阿廖沙帶去巴別茨基在克拉托沃的鄉間別墅。他們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維拉和父親，住兩個小房間；第三間最大，住著另外一戶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時到阿納托利的公寓借宿。她兩次喪偶，沒有自己的孩子，堅忍地承受艱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丟掉莫斯科馬里劇院的秘書一職；她又去莫斯科劇院博物館擔任客房服務員，工作一段時間之后又被解雇，最終改在工廠里操作機器。 [(598)](#_595_2)

整整一年，柳芭毫無音信，因為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寫信給親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隨著“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電報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馬上給妹妹回信，兩人開始了忙碌的信件往來，幾乎所有內容都與家事和撫養小孩有關。據奧克薩娜說，她們也提及其他事項，只是隱藏于暗語之中，以避開審查。波利娜一片赤誠，幾乎每個星期都給柳芭寫信。她寄去金錢、書籍、衣服，以及從雜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納托利也寫信給柳芭，但并不經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風格。他給她送去金錢、食品包裹、電影放映機手冊，讓她能學到實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運木料時摔倒，導致手掌骨折。勞改營指揮官巴里諾夫因此調她去做輕活，在收到阿納托利的請求后，更允許她管理俱樂部電影院。這并不是柳芭從巴里諾夫那里獲得的唯一特權。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帶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結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遠房親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兒院，然后發電報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柳芭。柳芭獲準前往幾百公里之外的江布爾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從孤兒院領出阿廖沙，把他帶回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營房定居地，與自己同住。這對于一個囚犯來說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通融，批準請假的巴里諾夫冒了極大的個人風險。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贏得這些通融時發揮了作用，但她的難友并不認同這樣的看法，反而強調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的影響。阿納托利在寫給柳芭的信件中，明顯沒有對審查的恐懼（他的許多信件還批評了蘇維埃電影當局）。阿納托利寫信表達自己對柳芭的愛，原諒她的離開，懇求她在釋放后回到自己身邊（“可能不會像你以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當局提出請求，還是有辦法的”）。柳芭此時尚不清楚巴別茨基的命運，便擋住了他的攻勢。但阿納托利不甘罷休，向她介紹自己電影的成功，即《米寧和波扎爾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蘇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獲得的大獎（1940年的勞動紅旗勛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獎），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宮出席的宴會。他打出情感牌，對柳芭強調他們的女兒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禱你能回來，即使只是為了奧克薩娜。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好的父親，太忙了。我們的女兒已到這樣的年齡，特別需要母親的教導，她在我面前很害羞。” [(599)](#_596_2) 阿納托利一定知道巴別茨基已不可能再回來。他想讓柳芭知道這一點，并試圖讓她明白最好還是與他在一起。他自己認為，或是想給柳芭這樣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邊，他還擁有使她盡快獲釋的影響力。

五



1939年，熱尼婭和西蒙諾夫在克里米亞度蜜月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與塞繆爾·拉斯金三個女兒中最小的熱尼婭·拉斯金娜結婚。自1936年以來，他們就是文學院的同學，其戀情開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時，西蒙諾夫與另一位同學納塔利婭·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學生界的波希米亞圈子中，民事婚姻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熱尼婭說，西蒙諾夫以一首浪漫詩（即《五頁》，最初卻是為納塔利婭寫的）開始對她的追求。也許所有的年輕詩人，都會回收利用自己的舊情詩，以發動新的征服。就西蒙諾夫當時與女性的關系而言，這種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墜入愛河，在性經驗上頗為青澀。 [(600)](#_598_2)

熱尼婭小巧玲瓏——幾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諾夫的顯然還有她的精神素養。她慷慨，耐心，對朋友掏心掏肺，幾乎與每一個人都能處得稔熟（繼承于父親的罕見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響他人。熱尼婭是文學院的學生會秘書。1937年文學院清洗會議中，西蒙諾夫曾舉報多爾馬托夫斯基，她卻勇敢地站出來為兩名外國學生辯解——他們太軟弱以致不能保護自己——她覺得，他們的作品受到了教職員不公的批評。 [(601)](#_599_2) 西蒙諾夫吸引熱尼婭的究竟是什么，很難確定。但她一旦愛上他，一生不變。毫無疑問，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瀟灑、他的詩人天賦、他的聰明才智、他的陽剛之氣，以及他鶴立雞群的領導才能。

婚禮之后8個月，即1939年8月，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謝出世。經過艱難的分娩，熱尼婭和阿列克謝一起留在醫院隔離病房好幾天。西蒙諾夫給熱尼婭寫信：“我的小寶貝，我非常愛你。我確信，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我跟醫生談過，他說一切都很好，小寶寶會慢慢康復。請寫信告訴我，你最喜歡我們兒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開始寫一首新詩。現在起，我每天都要寫……我親愛的，多想聽到你的聲音，多想看到你無疑是面黃肌瘦的小臉……請問一下，我可否給你送來猶太牛肝醬。 [(602)](#_599_2)

他們的兒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諾夫接受了作為戰地記者的第一項任務。《英勇紅軍報》（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報道日本控制的滿洲與蘇聯的沖突。他從蘇維埃軍隊集結之地蒙古寫信給熱尼婭，隨信還送上新詩《照片》：

我去旅行，沒帶上你的照片，

即便沒有，只要牽記，仍可見面。

到第四天，烏拉爾已拋離得很遠，

烏拉爾呀，我不愿讓好奇的鄰居窺見。 [(603)](#_601_2)

哈勒欣河戰役（在日本被稱為“諾門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和建立偽滿洲國以來，一直在醞釀的邊界戰爭的大決戰。斯大林一直在擔憂日本對西伯利亞和蒙古的帝國野心。蒙古在名義上是中國一部分，但從1921年以來，一直處于蘇維埃的影響之下。蒙古和日占區之間一旦因邊界爭議而爆發小規模的沖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銳部隊：5.7萬步兵、集結的炮兵部隊、500輛坦克、蘇維埃空軍的最好飛機，全部聽從紅軍后起之秀格奧爾基·朱可夫將軍的指揮。蘇維埃軍隊把關東軍從日本堅持的邊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國認定的邊界諾門罕，即向東挺進了16公里。日本驚訝于密集的紅軍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簽訂停火協定。蘇維埃聲稱獲得了巨大勝利，似乎證實了紅軍的戰無不勝——蘇維埃宣傳機器的說法。然而，實際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諾夫憑親身經驗體察到，蘇方的損失遠遠大于政府所承認的（紅軍聲稱死傷共9000人，但實際人數卻高達2.4萬人，其中7000人陣亡）， [(604)](#_602_2) 凄慘可怕的景象紛至沓來。西蒙諾夫對軍事新聞的審查感到沮喪，想通過自己的詩歌來提供較為真實的畫面。《坦克》一詩講述一排蘇軍士兵，在來之不易的戰斗勝利中遭受了重大損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毀的坦克，在詩人眼中，成了他們英勇犧牲的豐碑。西蒙諾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爾·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該詩的發表。他曾是作家協會領導，還在1937年訓斥過西蒙諾夫的“反蘇”言論。他告誡西蒙諾夫，應該提供對戰爭的樂觀瞻望，來積極配合自己肩負的宣傳任務。為此，斯塔夫斯基建議他在結尾處，以一輛全新的坦克來替換已遭摧毀的。 [(605)](#_602_2)

與日占區的邊界沖突，更加強了斯大林對腹背受敵的恐懼，擔心同時卷入反軸心國的兩場戰爭。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軍隊開進捷克斯洛伐克，并沒受到英國或法國的激烈反對。這兩個國家仍在安撫希特勒，在斯大林看來，這無疑是在鼓勵納粹和日本向蘇聯發起侵略。盡管法國和英國仍在繼續與蘇維埃政府的談判，以聯手抵抗納粹對東歐和波羅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向斯大林顯示，西方列強并不真誠行事。整個1939年的春天，英國和法國以波蘭不愿讓蘇維埃軍隊越界作為借口，拖延與蘇維埃的談判。他們只希望蘇聯能在外交上阻止納粹，但還不愿與蘇聯簽署軍事協定。與此同時，德國人卻向蘇維埃政府暗送秋波，因為如要發動計劃中的入侵波蘭，蘇聯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提出，把東歐劃分成兩個勢力范圍，讓蘇聯獲得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地區。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兩國。他相信，歐洲戰爭迫在眉睫，蘇聯無法抵抗納粹德國，特別是在那么多蘇軍駐在滿洲的時刻。他認為沒有其他選擇，只得與希特勒達成協議。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與希特勒德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說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發事件，而不是許多人以為的長遠規劃。蘇維埃領導人認為，該協定提供了喘息的時間，讓蘇聯武裝自己，也能在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創建起有效的緩沖地帶。斯大林在兩大勢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蘇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和法西斯國家——的交戰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這些國家在漫長沖突中相互耗盡，反有可能激起當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激起了俄羅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訴共產國際：“如果他們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們并不反對[戰爭]。” [(606)](#_603_2)

德國獲得了蘇維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蘭西部。兩天后，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戰。不久，按照《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將東歐分為德區和蘇區的秘密協議，紅軍進入波蘭東部。蘇聯進占波蘭之后，又開始向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施壓，要求它們接受領土變更和蘇聯軍事基地的進駐。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決定妥協，簽署了《國防互助條約》，讓蘇聯紅軍占領他們的領土。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有關部門，伴隨入侵的蘇維埃軍隊，實施了相應的逮捕和處決：1.5萬波蘭戰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內務人民委員會槍決；至少有100萬“反蘇維埃分子”被逐出波蘭和波羅的海地區。芬蘭卻不愿俯首臣服，拒絕了蘇維埃越境設立軍事基地的要求。蘇維埃在1939年11月向芬蘭發動進攻，由于有先前在滿洲、波蘭、波羅的海的勝利，覺得自己穩操勝券。結果，對芬蘭的戰爭卻一再敗北。蘇維埃軍隊沒做冬季戰斗的準備，又無法攻破芬蘭的堅強防御。4個月內，12.6萬蘇軍陣亡，近30萬蘇軍受傷。后援大軍最終突破芬蘭防線，迫使芬蘭人求和。 [(607)](#_605_2)

對于西蒙諾夫乃至世界各地眾多共產主義者來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無疑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大沖擊。反法西斯斗爭是共產主義團隊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諾夫在20世紀70年代回憶：“我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臺前后，我們當中剛滿18歲的人——始終生活在將與德國開戰的等待之中。對我們來說，那場戰爭開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內戰顯得特別重要。一個原因是，他們太年輕，錯過了激發他們英雄夢想的俄國內戰；另一原因是，他們熱切地相信，西班牙內戰只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終極大戰的揭幕，大戰的高潮將是蘇維埃和納粹德國之間的殊死搏斗。西蒙諾夫回憶：“在哈勒欣河，這場大戰不再是虛擬的，不再是我們預料中的未來事件，而是我們親眼目睹的。”西蒙諾夫聽到《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時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腦海中充滿了蘇維埃軍隊與日本軍隊的血腥戰斗。他最初認為，這是一條務實的策略，可以保證德國不會“在我們背后發起致命一擊”。他甚至歡迎蘇維埃入侵波蘭和波羅的海地區，視之為反對德國軍事擴張的必要舉措。但在道義上，他卻感到困惑。他覺得，該協議背叛了歐洲，背叛了共產主義對抗暴君、保護弱者的承諾。他特別不舒服的是意識形態的新秩序：對納粹德國的批評突然變得不被接受。西蒙諾夫回憶：“他們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們再也不能寫出或說出對他們的批評。” [(608)](#_606____G__Roberts___The_Soviet)

這種內在沖突顯現于西蒙諾夫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他第一個重要劇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寫于1940年秋天，其時他剛從哈勒欣河返回。該劇講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輕紅軍軍官，名叫謝爾蓋，曾是共青團積極分子，從西班牙內戰返回俄羅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參戰。《我城一少年》呼吁人們拿起武器，反對法西斯主義，似乎在喚起觀眾對納粹德國的敵意。但西蒙諾夫回憶，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條約，這些情緒變得不便明確表述出來。1941年3月，該劇在列寧共青團劇院首演，只是讓演員在朗讀有反德含意的臺詞時賦予更多情感，以表達他們對該條約的反感。 [(609)](#_606_2)



瓦倫蒂娜·謝羅娃，1940年

該劇還引出另一沖突，比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諾夫在文學院的朋友，即詩人米哈伊爾·盧科寧（1918—1976年），曾參與對芬蘭的戰爭。盧科寧只比西蒙諾夫小3歲，卻被認為是不同時代的蘇維埃詩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無產階級家庭，身上沒有舊文化的印記，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識分子文化。而西蒙諾夫的同輩，卻躲不開這樣的標簽。西蒙諾夫將盧科寧理想化了：這位年輕詩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廠工作，1937年加入文學院，體現了“蘇維埃和無產階級作家”的理想。西蒙諾夫一直以此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諾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給劇作家阿希諾戈諾夫過目，后者喜歡此劇，但認為它的主人公應有一個姓。西蒙諾夫一時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諾戈諾夫便問，假如能有選擇，西蒙諾夫希望給自己取什么姓。也許阿希諾戈諾夫看出，西蒙諾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傾注了自己本想擁有的全部素質。西蒙諾夫沒有片刻的猶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盧科寧。基于此，他便以“盧科寧”命名他劇本中的主人公。但盧科寧本人并不高興：“如果我寫關于足球運動員的劇本，把他叫做西蒙諾夫，你會作何感想？” [(610)](#_607_2)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個人偏好，那是特意為瓦倫蒂娜·謝羅娃寫的。她是蘇維埃銀幕和舞臺的明星，西蒙諾夫為她神魂顛倒，無可救藥。他第一次看到瓦倫蒂娜，是在列寧共青團劇院的演出當中。其時，他從哈勒欣河回來不久，雖然已婚，知道很難贏得她的芳心，但還是向該劇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圖接近瓦倫蒂娜。戲中，女主角是瓦倫蒂娜的再現——不是她現實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諾夫希望她應該展現的形象（信賴他人、有愛心、有耐心、寬容）。劇中的主人公謝爾蓋·盧科寧，也是西蒙諾夫希望自己應該展現的形象（比現實中的自己更陽剛、更勇敢、更蘇維埃化）。這兩個文學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倫蒂娜和西蒙諾夫，頻頻出現于他20世紀40年代幾乎所有的詩歌、劇本和小說。

瓦倫蒂娜年輕、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婦和電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擊的秘史。她父親瓦西里·波洛維克是水利工程師，來自烏克蘭東部的哈爾科夫地區。1930年，當時瓦倫蒂娜13歲，瓦西里在工業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進勞改營，之后于1935年獲釋，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處8年，在索洛韋茨基勞改營服刑。所有這一切，都得到瓦倫蒂娜母親的精心掩蓋。她是莫斯科卡梅爾尼劇院的著名女演員，瓦倫蒂娜在那里度過童年，扮演過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親將瓦倫蒂娜的烏克蘭的姓“波洛維克”，改成俄羅斯的姓“波洛維科娃”，設法抹去所有烏克蘭的痕跡。瓦倫蒂娜從小長大，否認父親的所有信息（以后幾年中，她還聲稱從小到大從沒見過父親）。直到1959年（他從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獲釋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氣與他見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動。 [(611)](#_608_2)

瓦倫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團，很快迷住了該組織領導人亞歷山大·科薩爾耶夫。他偏愛年輕女演員是盡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寧共青團劇院，很容易遂愿。科薩爾耶夫極力推動這位年輕漂亮門生的事業，自己卻在共青團領導人的大清洗中落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來被槍決）。斯大林指責他們未能在共青團內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薩爾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宮宴會中趨前與他碰杯，并在他耳邊低語：“叛徒！我要殺了你！”守護神的被捕，使瓦倫蒂娜陷入嚴重困境，當初因科薩爾耶夫而被拋棄的前男友，妒火中燒，趁機舉報她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戲劇工作者聯盟的清洗會議，自作解釋，并回答父親被捕一事，為了避免被逐，還必須發表背棄聲明。 [(612)](#_609_2)

到最后，搭救瓦倫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飛行員阿納托利·謝羅夫，她與他相遇于科薩爾耶夫安排的宴會。在蘇維埃的英雄神殿中，飛行員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蘇聯軍事實力和進展的尤其是空軍，激發許多年輕男子加入軍隊的也是飛機的魅力。謝羅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羅斯”外貌和完美的無產階級出身，變成了極富宣傳效應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功績是傳奇性的，遇到瓦倫蒂娜時，已是全國聞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飛行員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宮的喜愛。第一次見面后的第10天，他們即舉行了婚禮，搬進新近騰出的豪華公寓——原屬葉戈羅夫元帥，因牽連于圖哈切夫斯基公審而被捕。他們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宮的派對和酒會。但災難降臨于結婚一周年紀念日，阿納托利在一次空難中喪生，發生事故的細節不甚清楚，只知道謝羅夫和他的戰友波利納·奧西佩科在惡劣天氣中低空飛行。兩名飛行員獲得國家級榮譽，下葬于克里姆林宮墻旁。4個月后，即1939年9月，瓦倫蒂娜產下阿納托利的兒子，以父親的名字命名。她作為軍事英雄的遺孀，深受蘇維埃領導人的保護，有助于她在電影界的崛起。她第一個重要角色，即賣座電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專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壽的克里姆林宮宴會上，特地向兩個著名飛行員（阿納托利·謝羅夫和瓦萊里·契卡洛夫）的遺孀敬酒，她們當時都坐在邊遠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請瓦倫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與他碰杯。她的手顫抖得厲害，以致灑了酒。據瓦倫蒂娜說，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靜地說：“別擔心，不要緊。鎮靜點，謝羅娃同志，我們會支持你的。” [(613)](#_610_2)

到1940年夏天，西蒙諾夫愛上瓦倫蒂娜，為她神魂顛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還有自己的寶貝兒子，也不想鼓勵西蒙諾夫這個也有同齡幼兒的已婚者。西蒙諾夫、熱尼婭和阿列克謝當時住在祖博夫廣場上的拉斯金公寓。熱尼婭雖然還沒充分覺察丈夫對這位漂亮女演員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對他經常不歸家視而不見。 [(614)](#_611____N__Pushnova__Valentina_S) 整整一年，他們的婚姻不即不離，西蒙諾夫追求著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諾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倫蒂娜的那種人，他的殷勤獻得太辛苦，他過于嚴肅、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風度和信心。他們要比西蒙諾夫更為成功，更有權勢。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諾夫征詢謝羅娃對此劇的評論。她當著大家的面說，這只是“一部拙劣的劇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頻頻贈送禮物，為她量體裁衣創作相關的劇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詩給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沒帶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寫有關你的歌唱。

我的詩源于內心的悲傷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帶上……

他憑借自己的筆，漸漸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謝羅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終答應嫁給他還要等到1943年。其時，他的情詩《等著我吧》，讓西蒙諾夫一躍而成蘇聯最受喜愛的詩人，并在克里姆林宮享有真正的影響力。通過《等著我吧》一詩，西蒙諾夫和謝羅娃變得家喻戶曉。該詩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在戰爭中不畏艱辛，戰斗到底。但沒人知道他們的婚姻所達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諾夫拋棄的前妻和幼兒。 [(615)](#_611_2)

[[1]](#_1_17) 他們的父親帕維爾·布拉特是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學院的政治經濟學家，母親尼娜是工程師兼地質學家。

[[2]](#_2_17) 依達接受BBC電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訪。

[[3]](#_3_14) 共產主義政權傾塌后，柳芭成為教會的積極成員，出版了有關父親生涯的書籍[L. 捷丘耶娃，《一名東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爾姆，2004年]。

[[4]](#_4_11) 葉麗薩維塔沒有母親的照片，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檔案館所存的她母親的檔案。

[[5]](#_5_10) 戰爭于1941年6月爆發后，在監獄區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繼續于營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獲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從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獲釋。

[[6]](#_6_10) 貝利亞當時擔任格魯吉亞首都的黨領導，親自給葉夫根尼上刑，并執行槍決。克捷萬是登捷時·阿布拉達茲的電影《懺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萬·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 第六章 “等著我吧”（1941—1945）

一

1941年6月，列昂尼德·馬赫納茨在他外祖父母的家里度假，那是在白俄羅斯的克里切耶夫小鎮，離蘇波邊境600公里。那年夏天，莫斯科的氣溫居高不下，讓人窒息。他父母自己無法脫身，便讓他離開首都，獨身一人來此度假。列昂尼德的父親弗拉基米爾是莫斯科煤氣托拉斯的主管，負責向蘇維埃首都供應天然氣，由于需要向黨領導呈交一份萬一發生戰爭的能源預案，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外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克里切耶夫鎮的邊緣，已能看到厚密的橡木林和廣袤的牧場。這是一棟樸實的小木房，在整個蘇聯西部地區非常普遍，附有養豬的小院和栽滿蘋果樹的花園，房主大都是小農、工人和商販。

6月22日的凌晨，星期日，德國龐大的入侵部隊向蘇聯發起總攻擊，位于西部邊疆的克里切耶夫鎮沒有任何防御計劃，因為蘇維埃領導對戰爭全無準備。像克里切耶夫鎮一樣的其他城鎮，對將臨的入侵沒有一絲預感。一直到了那天中午，莫洛托夫方才在電臺上以囁嚅的聲音宣布開戰。之后3天中，電臺是克里切耶夫鎮唯一有關戰爭的消息來源。然后在6月26日，沒有來自蘇維埃當局的任何警報，克里切耶夫鎮遭到德國飛機的狂轟濫炸。一場浩劫降臨小鎮，居民紛紛逃進樹林，牛和豬四下狂奔，大街上尸體橫陳。

列昂尼德的母親瑪麗亞，在一片混亂中趕到克里切耶夫鎮。她在入侵的第一天離開莫斯科，期望在被德國軍隊殺死之前救出家人。此時，弗拉基米爾恰好出差，視察列寧格勒地區，要到6月底才能返回莫斯科。所以，瑪麗亞只得單槍匹馬，設法趕到已在遭受猛烈空襲的斯摩棱斯克，但搭乘不到駛向蘇維埃前線的西行列車。瑪麗亞只好朝西南方向徒步120公里，4天后抵達克里切耶夫鎮，一路上都是反方向撤離的士兵和平民。列昂尼德回憶：“她到達時蓬頭垢面，幾近全身漆黑，滿是灰塵和污垢，因長途跋涉而筋疲力盡。”

克里切耶夫鎮的居民匆匆收拾財物，朝東逃難。第一批逃走的包括該鎮將近一半人口的2000名猶太人，他們憂心忡忡于聽聞的納粹暴行。接著出走的是共產黨人，對入侵的德軍存有同樣的恐懼。馬赫納茨一家，作為資深蘇維埃官員的親屬，必須盡快逃走。瑪麗亞希望丈夫會來找自己，因此耽誤了家人的出逃。7月16日，即德軍占領克里切耶夫鎮的前一天，她仍沒有弗拉基米爾的消息，只好先給莫斯科寫信，再用馬車載上細軟，帶著列昂尼德和父母沿鄉間小路緩慢向東移動，以避開專炸主要公路的德國飛機。她不知道，弗拉基米爾正坐在專職司機的轎車中火速趕來。列昂尼德判斷：“他離開斯摩棱斯克，疾馳在公路上，與我們失之交臂時相隔不過幾公里。”弗拉基米爾到達克里切耶夫鎮時正好看到德軍進鎮，從索茲河對岸的草地，可看到鎮上木屋熊熊燃燒，也能聽到尖叫和槍聲。他以為家人將遭屠殺，試圖過河，徒步前去營救，但受到撤下來的蘇維埃軍隊的攔阻。他猜想，家人可能已經遇難，只好回到莫斯科，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妻子的來信：她會去克里切耶夫鎮以東的布良斯克地區，再轉去有親戚可投靠的斯大林格勒。瑪麗亞認為，那里會比莫斯科更為安全，因為有傳聞說莫斯科很快將落入德軍之手。回到莫斯科反而變成了弗拉基米爾的自我毀滅。不久，他因“失敗主義言論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處勞改10年。他曾與莫斯科煤氣托拉斯的同事交談，言及自己在前線親眼目睹的混亂。戰爭爆發后的頭幾個月里，這樣的談話導致多人被捕，因為蘇維埃當局在拼命壓制有關軍事災難的消息。莫斯科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將馬赫納茨的被捕，編造成市主要能源官員的“托派陰謀”，逮捕了數十人。弗拉基米爾很想讓妻子知道自己的下落，但要等到秋天——他在赴西伯利亞的漫長旅程中，從火車窗口扔出一封信，上面寫有妻子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址。一位農民路過撿起，將之付郵：

我的親人們！我還活著，什么都好。客觀情況不允許我早點給你們寫信。不用為我擔心，照顧好你們自己。瑪麗亞，我的愛人，你將會很辛苦，但不要放棄希望。我正去西伯利亞，我是無辜的，等我，我會回來的。 [(616)](#_614_2)

德國的攻擊如此強悍迅猛，把蘇維埃軍隊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國準備入侵的情報，甚至把確認龐大德軍在邊境集結的最后通報，也當做英國引誘蘇聯參戰的伎倆（竟把帶來此條消息的情報人員，當做“英國間諜”拉出去槍斃了）。蘇維埃的防御徹底亂了陣腳。《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后，蘇聯的舊防線已被放棄，另在新占領的波羅的海地區匆匆建起的新防線，幾乎沒有重炮、無線電設備、布雷區，根本擋不住德軍先鋒的19個裝甲師和15個摩托化步兵師。蘇維埃增援部隊沖向前線，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軍坦克和飛機的沉重打擊，制空權早已落入德軍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軍以巨大的鉗形運動，一方面穿越白俄羅斯，占領蘇維埃境內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直逼列寧格勒。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親眼目睹了白俄羅斯陣線的混亂。戰爭開始時，他作為軍報記者，前往第3集團軍政治部報到——地處蘇波邊境的格羅德諾城附近。他搭乘列車在6月26日一早抵達鮑里索夫城，但通向明斯克的鐵路線正在遭受狂轟濫炸。西蒙諾夫找到一名司機，用汽車把他送去明斯克，但很快遇上撤退的蘇維埃潰軍。德國飛機從頭頂飛過，以機槍掃射地面上的部隊，并朝大路投擲炸彈。士兵們紛紛逃入樹林。一名軍官站在大路中間叫喊，如果他們不轉身，他就要開槍了，但士兵們根本不予理睬。樹林里擠滿了士兵和平民，盡量躲避盤旋于樹林上空、不斷朝下掃射的德國飛機。西蒙諾夫自己也險些喪命，一架被擊中的德國飛機墜落，撞死他身邊好幾個人。它飛得如此之低，就在樹林之上，他都能看到德國飛行員的臉。天黑之后，他才跌跌撞撞回到大路，找到一名政工人員，“一個胡子拉碴的年輕人，頭戴船形帽，身穿冬大衣，不知何故卻手持鐵鍬”。西蒙諾夫介紹自己是記者，打聽去往前方總部的方向。該軍官說：“什么總部？你沒看到這里發生的事？” [(617)](#_615_2)

西蒙諾夫隨軍隊一起撤回斯摩棱斯克。一路上都是士兵和平民——婦女、兒童、老人，其中很多是猶太人——全部向東，各種類型的大車，還有背上家當的徒步逃難者。7月初，他經過什克洛夫和奧爾沙——“安靜的農村小鎮”，住有很多猶太家庭，包括他妻子的親戚拉斯金家。他在什克洛夫鎮停下要水喝，一名驚惶失措的猶太人問他應否逃離。西蒙諾夫勸他們留下，并聲稱德軍抵達什克洛夫鎮之前，就會被紅軍擊潰。幾天后，德國人占領什克洛夫鎮，殺死幾乎所有的猶太居民，共約6000名男子、婦女和兒童，槍殺后全部埋入鎮外的土坑。7月16日，德國攻下奧爾沙城，著手建立猶太人聚居區。到1943年，那里的大多數猶太人都被運去納粹死亡集中營。也有一些人設法跑走，加入紅軍，例如在奧爾沙行醫的塞繆爾·拉斯金的弟弟雅可夫。 [(618)](#Di_Liu_Zhang___Deng_Zhu_Wo_Ba_1)

西蒙諾夫回顧1941年的災難事件，逐漸省悟到其根源就在斯大林政權。20世紀50年代，他開始寫戰爭巨著《生者與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59年）時已經想通，責任都在斯大林——不單是他不了解情況，沒在1941年積極備戰；更重要的是他的恐怖統治，制造了這么多的恐懼和不信任，以致蘇聯在自衛中根本無法統一行動。西蒙諾夫當時沒看到這一點——他給什克洛夫鎮猶太人的建議，便是他相信宣傳的確鑿證據——但從1942年起，他開始在戰爭日記（后來成為《生者與死者》的素材）中面對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他越來越清楚，蘇維埃軍隊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軍隊清洗所營造的氣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壞了軍官的權威，使他們在作出軍事決策、采取主動行動時不愿承擔責任，以逃避上級的處罰和在旁監視的政委的舉報。他們被動地等待總是姍姍來遲的上級命令，無法隨機應變，以改善戰場上的軍事形勢。 [(619)](#_616_2)

當然在戰爭年代（或在1956年“解凍”之前的任何時候），這些想法是不可公之于眾的。西蒙諾夫寫在日記中的，不可能在紅軍主要報紙《紅星報》上登出，他從1941年7月起擔任該報的記者。戰爭一旦爆發，審查愈益加強。戰爭開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蘇聯新聞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報刊和電臺的報道。政府試圖向公眾隱瞞軍事災難，操控新聞，以鼓舞士氣。像西蒙諾夫那樣的記者，即使要寫前線的挫折，其寫出的報道也應有積極和樂觀的精神。他們所寫出的，幾乎總是受到審查員的刪減或修改。

西蒙諾夫當時面臨一個特別為難的處境。7月19日，即在德國占領斯摩棱斯克3天后，他抵達莫斯科，成了從白俄羅斯前線返回的第一名記者。首都居民對軍事災難的程度一無所知，為了避免造成恐慌，斯摩棱斯克淪陷的新聞遭到封鎖（直到8月13日，蘇維埃軍隊的反攻失敗，方才發布這一消息）。莫斯科人不斷向西蒙諾夫詢問有關軍事形勢的問題，但他不能如實回答，否則像馬赫納茨一樣，就會有“失敗主義言論和散播恐慌”的風險。所以，他決定緘口不言，將自己的抑郁深藏心底。他在日記中指出：“與他很親近的人誤以為那是他筋疲力盡的征狀”。西蒙諾夫的新聞報道，嘗試在他所看到的事件中努力尋找正面意義。他回憶：“要寫實際上發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它不會見報，還因為我的內心”不愿接受如此黑暗的結局，亟想在災難中找到一絲希望。他所專注的事件，發生于撤回斯摩棱斯克的混亂之中。西蒙諾夫看到兩名男子，一名上尉和一名下士，在撤退的人潮面前，反而逆流而上，奔赴前線。他們的排只剩下兩人，其余的都已葬身于德軍的轟炸。在西蒙諾夫眼中，驅使這兩名男子的似乎是先天的愛國義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從中找到未來蘇維埃勝利的種子。 [(620)](#_619_2)

蘇維埃媒體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謠言滿天飛，人們開始恐慌。有人稱：政府已經逃離，總參謀部里有叛徒，蘇維埃領導已決定放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甚至還有傳言稱，開始于7月中旬的德軍對莫斯科的轟炸，其帶隊人竟是著名的蘇維埃飛行員西吉茲蒙德·列瓦涅夫斯基——1937年，他駕駛一架飛機想飛越北極直達美國，卻從此銷聲匿跡。記者韋爾日比茨基在日記中記錄了在莫斯科街頭與一位充滿活力的老人的對話。老人說：“為什么沒人在電臺上給我們講話？他們應該有所表示——不管是好是壞。但我們全蒙在鼓里，必須動腦筋自作猜測。”斯大林未在公眾場合現身，更加強了這種不確定感。很顯然，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天，他經歷了某種程度的精神崩潰：把自己鎖在鄉間別墅，對一切都不感興趣。他回到克里姆林宮是在7月1日，兩天之后，才向全國發表他的第一場戰爭講話，其間不時停下喝水，像是處于痛苦之中。斯大林把蘇維埃人民稱作“我的兄弟姐妹們，我的朋友們”，呼吁他們為“生死攸關的斗爭”而團結起來，將之形容為一場“整個蘇維埃國家的戰爭”。這是斯大林第一次以兄弟之間、包羅全民的字眼來界定蘇維埃人民，不再提階級斗爭或意識形態。西蒙諾夫回憶該講話留給自己和前線戰士的印象：“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人那樣與我們講話了。這些年來，我們因缺乏友誼而深受危害。我記得，那個講話中，讓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的是這幾個字——‘我的朋友們’。” [(621)](#_619_2)

即使斯大林的講話激奮人心，戰爭的突然爆發見證了公開評論的大爆炸，其中也有針對蘇維埃政權的批評，誘因可能是不確定感，也可能是恐懼的解脫。10月18日，德軍離首都僅幾英里，韋爾日比茨基在日記中寫道：“僅在不久之前，聽到如此的對白，肯定會因此走上審訊法庭。”這種不滿情緒，多半來自農民和工人。他們所批評的是：對戰爭準備不足，勞動紀律過于嚴格，口糧減少，強制征兵，黨領導紛紛飛到后方，讓普通百姓面對侵略。在戰爭的頭6個月，列寧格勒一半黨員飛走。工人的反蘇情緒如此強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國勝利的前景。戰初幾個月發生了許多工人的罷工和示威，仿佛標志著向1917年革命氛圍的回歸。1941年10月，伊萬諾沃地區的黨領導試圖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罷工領袖向工人們高呼：“不要聽他們的！他們什么都不知道！他們欺騙我們已經23年了。”在工廠會議上，工人不怕將戰爭的爆發和前線的失敗歸罪于共產黨人。根據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監測，許多工人和農民歡迎入侵，因為這會推翻蘇維埃政權。普遍認為，害怕德國人的只有猶太人和共產黨人。 [(622)](#_619_2)

政府向“散播恐慌者”宣戰，以對付這公開的反對。數千人因隨意談論前線的戰情（“失敗主義”）而被捕，許多人被槍決。羅扎·韋托諾夫斯基在開戰第3天被捕，被控以叛國罪。她抵達牢房時才發現，她只是因言獲罪的眾多婦女之一。“這個說，德國軍隊更為強大；那個說，我們的莊稼收成不好；另一個說，我們像奴隸一樣在集體農莊工作。”這些婦女大都是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伊琳娜·舍博夫―涅費多維奇，7月30日被捕于列寧格勒。一星期之前，她在疫苗學院的黨員同事檢舉她“制造恐慌和散布謠言”。其實，她所做的只是告訴朋友斯摩棱斯克遭到轟炸，而且她是從蘇聯新聞社廣播那里聽來的。她被判處7年，送去哈巴羅夫斯克市附近的勞改營，1946年死在那里。伊琳娜的丈夫和女兒一直不知道她的遭遇，只猜測她死于列寧格勒的轟炸之中。到1994年，他們才獲悉她死亡的真相。 [(623)](#_621_2)

7月20日，斯摩棱斯克淪陷后，斯大林就任于最高統帥部，委任自己為國防人民委員。他派前國防部長鐵木辛哥元帥指揮西線的反攻，以奪回斯摩棱斯克。有一段時間，德軍放緩了朝莫斯科的挺進，部分原因是德軍重心已轉向南方，意在攫取烏克蘭的沃土、礦山、工業。希特勒深信經濟是勝利的關鍵，控制這些資源可幫助第三帝國立于不敗之地。8月，希特勒集中力量攻克烏克蘭，這讓紅軍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戰線獲得進展。9月6日，蘇維埃軍隊短暫收復斯摩棱斯克的郊外，但因缺乏基本的軍事裝備而不得不后撤。在北面，德軍在9月25日抵達拉多加湖，有效圍困了列寧格勒。希特勒為了保存北方集團軍以便發動莫斯科之戰，決定對列寧格勒圍而不攻，企圖餓死它的居民。從嚴格的軍事意義看，直接決定戰爭命運的是莫斯科和南部的戰事，而不是列寧格勒。但作為沙俄帝國和革命的發源地，又作為俄羅斯的歐洲價值和文化的堡壘，列寧格勒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這有助于解釋蘇維埃最高司令部的拒絕放棄，以及大多數居民的留守。1941年秋，列寧格勒幾乎所有的食品和燃料的供應都被切斷（到1944年1月解圍，死于疾病或饑餓的也許有100萬人，即戰前人口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德軍在南方的挺進也放慢下來，因為蘇維埃軍隊的大部駐扎于此，以保衛烏克蘭的工業和食品的豐富資源。德國精心策劃的巨大的鉗形夾擊運動，包圍了基輔及其東部腹地，蘇維埃軍隊拼死抵抗數星期，近50萬士兵陣亡或被俘。德軍終于在9月19日攻克基輔，盡管還有不少巷戰。基輔淪陷，列寧格勒被困，希特勒從10月起，開始集中力量前去攻打蘇維埃首都。他發誓，莫斯科將被完全摧毀，其遺址將會變成一個人工大湖。 [(624)](#_622_2)

由于德軍迅速席卷蘇聯各地，數以百萬的家庭各奔東西，不少親友羈留在淪陷區。入侵開始時，許多兒童仍在夏令營，在德軍到達之前趕不回去與家人團聚。幾十年后，父母仍想通過公共機構和廣告來找到他們。數千名兒童，或在孤兒院，或在全國流浪，或加入兒童幫派或紅軍組織（據估計，多達2.5萬名兒童在戰爭時期跟隨軍隊一起行軍）。 [(625)](#_622_2)

1941年，尤里·斯特雷勒茲基12歲，生活在列寧格勒的孤兒院。父親于1937年被捕，母親流放到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之間的維什尼―沃洛察克鎮。戰爭爆發時，孤兒院疏散到高爾基城附近的阿爾扎馬斯城。尤里在旅途中跳下火車，擅自跑掉。他不滿孤兒院生活，加入了專門偷竊鐵路旅客的兒童幫派，很快又產生反感，便去自首。警方把他交給內務人民委員會，他們派他去阿爾扎馬斯的軍用機場充任學徒。駐扎在那里的工程師，把他當做福星收養，送給他酒和香煙，替他與本單位的姑娘們牽線。1942年的春天，該地20位工程師調到第比利斯，把他也帶上了。尤里早就懇求帶隊的戰士們允許自己隨行。他知道自己出生于格魯吉亞首都，只不過家人在他年幼時就離開該市。他還記得，自己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曾去那里探望自己的教父母，而父母被捕后，姐姐又搬去那里與教父母同住。在赴第比利斯的旅程中，戰士們把尤里窩藏起來。他沒有旅行證件，如被發現，就會被捕。尤里回憶：

他們待我很好，為了把我帶走，冒了很大的風險，但沒人抱怨，還讓我分吃他們的口糧。他們愛我，憐憫我的無家可歸。快到斯大林格勒時，我們的列車被攔下檢查。兩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警衛要求看我的證件，聽說沒有，就要拘留我。但戰士們堅持我是他們中的一員，不愿把我交出去。到最后，這兩名警衛同意讓我走，代價是100克[伏特加]。



1934年，納塔利婭·加巴耶娃與父母



1939年，阿納斯塔西婭與瑪麗安娜、格奧爾基在阿爾漢格爾斯克

到了第比利斯，尤里與戰士們分手，在城市中亂轉，希望能認出教父母的住宅。后來，他去了城市辦事處，獲得自己出生證的副本，以此作為開端，經過一系列的文件追蹤，最終找到教父母。自那以后，尤里、姐姐與身為工程師的教父母得以團聚一處。尤里長大后也成為一名工程師。 [(626)](#_623_2)

蘇聯西部地區的人口疏散也把家庭拆散，撤到后方的共有800萬兒童。優先考慮的是從面臨德國威脅的各城市搶先運走工業設施，共拆除3000座工廠運去東部——伏爾加河、烏拉爾乃至更遠——從1941年6月至12月，共動用100多萬節火車車廂，工廠的工人和家屬也隨設施一起東遷。此外，還有各式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例如政府、公共機構、大學、研究院、圖書館、博物館、劇團和樂隊。 [(627)](#_624_2)

對于許多家庭而言，疏散一事喜憂參半。納塔利婭·加巴耶娃11歲那年，從列寧格勒疏散到鄂木斯克城，住在屬于藝術家聯盟的兒童之家。身為畫家的母親留在列寧格勒，為了就近照顧丈夫謝爾蓋。他曾是流放者，現住在列寧格勒附近的夏宮，在農學院工作。1941年，他搬去列寧格勒冬宮的地下室，陪伴已從博物館退休的年老多病的父親。另外，他每天還要去遙遠的郊區，探視已與父親離婚的生病的母親。納塔利婭回憶自己是一個“被寵壞的少女”，從鄂木斯克給母親寫“嚇人的信件”，乞求她來與自己做伴。“我在一封信中甚至威脅，如果母親不來，就要自己步行回到列寧格勒。”1941年9月，她遂了心愿，母親趕到鄂木斯克。她是在德軍建立封鎖線之前逃離列寧格勒的。謝爾蓋因她不在身邊而飽受苦難。圍城的第一周，他就病倒了，他寫信給朋友訴說他想看到納塔利婭的渴望。1941年10月，他本來有機會搭乘最后的航班之一離開列寧格勒，但臨時又改變計劃。作為父母的唯一支柱，他不忍心自己只身離開。謝爾蓋明白，周圍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自己也不會幸存于圍城之戰。1942年1月1日，他寫信告訴他母親，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再看納塔利婭一眼。5天后，德軍炸彈直接命中冬宮，他在空襲中死去。納塔利婭一生都為父親的去世而感到愧疚。她覺得，母親如果留在列寧格勒，有可能幫他存活下來，因此自己也是有責任的。納塔利婭回憶：“我從小就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如果父母面臨可怕的危險，我的力量只能救出其中之一，我會選擇哪一個？我無法回答，盡量從腦海中將之驅逐，但它一再去而復返。” [(628)](#_626____Interviews_with_Iurii_St)

瑪麗安娜·福爾瑟1941年才4歲，出身于阿爾漢格爾斯克城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尼古拉既是藝術家，又是音樂家；母親維拉·杰美恩是教師，娘家人都是列寧格勒著名的教育家。他們都是囚犯，1929年相遇于索洛韋茨基監獄，又一起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兒子格奧爾基生于1933年，女兒瑪麗安娜生于1937年。1941年1月，尼古拉因“反蘇維埃煽動”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勞改營。維拉1942年死于斑疹傷寒。祖母阿納斯塔西婭·福爾瑟一直在阿爾漢格爾斯克與他們一家同住，便接過照看瑪麗安娜和她哥哥的責任。戰爭的第一年，阿爾漢格爾斯克的糧食供應大幅減少，幾成饑荒地區，兩個孩子相繼病倒。到1942年春天，瑪麗安娜餓得十分虛弱，以至于無法行走，夭亡似乎是早晚的事，這讓阿納斯塔西婭實在承受不住。她咨詢的醫生名叫吉娜·格林訥，是著名的結核病專家，建議她將孫女送給有能力撫養的人家，興許還能救得一命。一開始，阿納斯塔西婭拒絕了這個建議，盼望尼古拉早早從勞改營獲釋。等她發現他已被槍決（1942年9月），才勉強接受了那位醫生的建議，將孫女送人，自己帶著格奧爾基去投靠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城的朋友。她寫信給列寧格勒的杰美恩家庭：“請原諒我，求你們不要罵我。我把馬琳卡[瑪麗安娜]送人了，這是救她生命的唯一出路。”阿納斯塔西婭沒有其他選擇：瑪麗安娜身體太弱，吃不消赴伊爾庫茨克的旅程，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又沒有其他親人可以照料。阿納斯塔西婭與杰美恩家一直保持聯系，但因列寧格勒圍城，無法向他們移交瑪麗安娜。

收養瑪麗安娜的是約瑟夫和奈莉·戈爾登施泰因夫婦，來自烏克蘭東南部馬里烏波爾城的猶太大家族。約瑟夫是蘇維埃空軍中的資深共產黨人，1942年被派駐阿爾漢格爾斯克。1942年9月底，德軍進襲馬里烏波爾，約瑟夫飛回去想救出自己的家人，但事與愿違，他反而親眼目睹了可怕的大屠殺。他走近自家的房子，聽到從院子里傳出的慘叫聲，只能從遠處眺望，希特勒的軍隊將他19個親屬排成隊列，包括他的3個孩子，再挨個朝他們的頭部開槍。戈爾登施泰因夫婦承受如此慘烈的創傷，亟想身邊有個可以疼愛的孩子，甚至是——特別是——像瑪麗安娜那樣的懨懨病人，他們也愿意給予關愛，助她恢復健康。

瑪麗安娜的外祖母維拉·杰美恩寫信給已在伊爾庫茨克的阿納斯塔西婭，詢問收養者的名字和地址。但此時發生了一個大錯：阿納斯塔西婭寫下的名字不是戈爾登施泰因（Goldenshtein），而是戈爾施泰因（Goldshtein）。等到列寧格勒的圍城解除之后，維拉一家便開始尋找瑪麗安娜。但戈爾登施泰因夫婦已遷至第比利斯，其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蹤跡均已消失。1946年，格奧爾基返回列寧格勒，決心留下上大學。他只有13歲，太年輕，記不起收養者戈爾登施泰因的真名實姓，也從沒向杰美恩一家提及失蹤的妹妹。格奧爾基讓祖母留在伊爾庫茨克，答應會去接她，但事實上他一次也沒回去。他的祖母1957年死于當地的殘疾人之家。 [(629)](#_626_2)

戈爾登施泰因夫婦很善良，把瑪麗安娜當做自己女兒一樣愛護。他們知道，她的父母作為“人民公敵”被捕，她的父親已被槍決。為了保護瑪麗安娜（也許也為了保護自己），他們決定隱瞞一切，不讓瑪麗安娜知道生身父母的信息，但鼓勵她成為像她父親一樣的音樂家（事實上，她長大后成了教師，像母親一樣）。戈爾登施泰因夫婦屬于第比利斯的共產黨軍事機構，瑪麗安娜在這優越環境中長大，接受了它的許多價值和習俗。她始終認為戈爾登施泰因夫婦是自己的父母，稱呼他們“媽媽”和“爸爸”。但到11歲左右，她才開始意識到自己曾屬于另一個家庭，潛藏于記憶深處的痛苦童年重又浮現。發生于少先隊野營中的一起事件，似乎成了催化劑：其他孩子要去森林探險，卻把瑪麗安娜摒除在外，稱她為“棄兒”。瑪麗安娜開始慢慢拼湊自己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生活的碎片，但從不向戈爾登施泰因夫婦提及。她越來越感到自己不算“家人”，更把她內心的不滿，也許還有她青春期的反叛，歸罪于嚴厲的戈爾登施泰因夫婦，也歸罪于她認為將自己拋棄的生身父母。瑪麗安娜解釋：

每天晚上，爸爸都會檢查我的學校功課。如果不夠完美，我就不能上床睡覺……媽媽病得太重，無法保護我，她患了結核病。我13或14歲時，就要做所有的家務……父母生我的氣時，我會思忖：如果我住得離阿爾漢格爾斯克不遠，就會逃走，去找我的祖母[瑪麗安娜不知道她已死去]。父母可能對我不滿，但祖母肯定不會對我如此生氣。然后，我又會想起，我其實沒有真正的父母。這讓我啞口無言，欲哭無淚。 [(630)](#_627_2)

1941年10月1日，斯大林下令將政府機構，從莫斯科撤到伏爾加河邊的古比雪夫城。隨著轟炸的日益猛烈，莫斯科市內的恐慌四處蔓延。10月16日，有報道稱，德軍已突破在維亞濟馬鎮的蘇維埃防線，離首都只有幾天的行軍路程。火車站內外一片丑陋場面，大家都想搭上火車，朝東逃難。韋爾日比茨基報道，有人愿意支付2萬盧布搭乘從莫斯科到喀山的汽車。恐慌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對內戰饑荒的記憶，事實上，糧食供應形勢迅速變得讓人絕望。所有商店前都排著長長的隊，并發生廣泛的搶劫，連大規模的逮捕都無法遏制。韋爾日比茨基在10月1日的日記中總結了民眾的情緒：

這種亂七八糟、普遍逃亡、偷盜猖獗、頭腦中的混亂，究竟是誰造成的？人們談論此事的公開方式，如在3天之前，肯定會導致他們被捕。排隊，長龍般的排隊，大家都緊張兮兮，提心吊膽。歇斯底里已從領導蔓延到群眾。人們開始想起并計算所有的侮辱、壓迫、不公正、官僚的欺凌和陰謀、黨員的蔑視和囂張、好大喜功的命令、剝奪、欺騙、報刊的自吹自擂。聽到這一切，真是可怕，人們都在直抒胸臆。充斥著這一類情緒的城市，能堅守得住嗎？ [(631)](#_627_2)

同一天，斯大林發表電臺廣播，作出堅守莫斯科的承諾，這是決定性的轉折點。人們奮起承擔首都的防衛，與其說是出于對蘇維埃政權的效忠，毋寧說是出于對莫斯科城的愛國主義。莫斯科人仍記得，當時，所有的居民都聚在城市中心——郊區幾乎空無一人——似乎是由于自衛的集體沖動，或是共同抗敵的下意識需求。25萬平民幫助挖掘壕溝，把食物和藥品運上前線，再把負傷的士兵接回自己的家。成千上萬的公民志愿軍與正規軍并肩作戰。那些正規軍也是臨時組合的，既有從白俄羅斯前線撤下的殘部，也有一到莫斯科馬上參戰的西伯利亞援軍。在朱可夫將軍的領導下，蘇軍紀律逐漸得到恢復。作為戰斗新精神的象征，斯大林決定像往常一樣，仍于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在紅場舉行閱兵游行：軍隊方陣邁步經過列寧陵墓，直接開上前線。據莫斯科指揮官K. R. 西尼洛夫說，那次游行在扭轉公眾情緒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游行前，他收到的信件大多是失敗主義的，很多人想放棄莫斯科，不讓居民暴露在危險之中；游行后，人們普遍表達的卻是憤慨和反抗。 [(632)](#_628_2)

這幾星期孤注一擲的戰斗決定了戰爭的結局。11月中旬，德軍深深陷入冬季的淤泥和積雪之中，在馬不停蹄挺進5個月后業已精疲力竭，俄羅斯的冬季讓他們措手不及。他們遭受了入侵以來第一次巨大的人員傷亡。12月，蘇維埃發動反攻，到4月，已把德軍推回斯摩棱斯克。保衛莫斯科的勝利，大大提升了蘇維埃的士氣。人們開始對勝利抱有信心，不過，國家仍面臨可怕的處境。到1941年底，它一共損失300萬兵員，相當于開戰時總兵力的一半以上；蘇維埃工業的大部分已遭摧毀；仍有9000萬蘇聯公民生活在德軍占領區，將近蘇維埃戰前人口的一半。但莫斯科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希特勒的軍隊未能攻占蘇維埃首都，也就不再有擊敗蘇聯的切實的機會。

二

西蒙諾夫投入戰斗時，胸前口袋裝有瓦倫蒂娜·謝羅娃的照片，她的模樣緊貼他的心臟。1941年的下半年，瓦倫蒂娜疏散到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他給她寄去一封接一封的情詩。詩人愛上的其實是他在詩歌中想象的女人：

我想說，你是我的妻子，

不是因為可以宣稱，我擁有你，

也不是因為我們的真正關系

長期以來遭人猜疑，眾所周知。

我既不夸獎你的美麗

也不炫耀你已斬獲的名利。

我心滿意足，一名溫柔親密的女子

悄悄走進我的屋子。 [(633)](#_629_2)

西蒙諾夫卻沒寫信給自己的妻子。1941年9月，熱尼婭·拉斯金娜與兒子阿列克謝、父母塞繆爾和貝爾塔、兩位姐姐法尼婭和索尼婭，都疏散到烏拉爾的車里雅賓斯克城。三姐妹在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工作，那是改組轉而制造坦克的工廠中最大的，該城因此獲得別稱“坦克格勒”。索尼婭和熱尼婭在采購辦事處上班，而法尼婭是規范制訂者（負責制訂工人的生產目標和報酬率）。拉斯金一家住在兩室公寓中的一間，剩下一間住著另外一戶人家。法尼婭回憶，房間“雖然局促，但很溫暖，相互友好，非常親切”。西蒙諾夫的父母也疏散到了烏拉爾的莫洛托夫城。與西蒙諾夫不同，他們與熱尼婭保持聯系，喜歡這個兒媳婦。到12月底，西蒙諾夫得到幾天新年假期，他沒到車里雅賓斯克或莫洛托夫，卻去了附近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想拜訪瓦倫蒂娜。但她拒絕見面——她即將返回莫斯科——于是，他只好飛到克里米亞，那里剛剛發動了一場主攻，試圖從德軍手中奪回刻赤半島。 [(634)](#_631_2)

瓦倫蒂娜繼續抵制西蒙諾夫的求愛，她的感情另有他屬。她似乎與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有短暫的戀情，然后又愛上了戰爭英雄羅科索夫斯基將軍。1942年春天，他倆相遇于莫斯科一家醫院，她在作慰問演出，他在療養戰傷。羅科索夫斯基是內戰時期的老兵，1937年被捕，1940年獲釋于布提爾基監獄，與妻女定居在基輔。戰爭爆發后，他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接過斯摩棱斯克附近第4軍團的指揮權，參與了1941年秋天保衛莫斯科的關鍵戰役。基輔被德軍占領時，他與妻子失去聯系。羅科索夫斯基相信——或愿意去相信——他已是單身，可以展開對謝羅娃的追求。他以為再也不會見到妻子了，但在他與謝羅娃相遇的兩個月之后，妻子和女兒在莫斯科出現。原來，德軍占領烏克蘭首都之前，母女得以逃出基輔。妻子在莫斯科很快聽說了丈夫和電影女演員的浪漫邂逅，不過，西蒙諾夫仍然鍥而不舍。這段愛情三角關系，已成為蘇維埃精英中的八卦傳聞，被美其名曰“蘇聯”（USSR，即謝羅娃、西蒙諾夫、羅科索夫斯基的聯盟）。 [[1]](#_1___Zhe_Li_De_San_Jiao_Guan_Xi) 羅科索夫斯基的妻子決心阻止丈夫的移情別戀，便向斯大林提出抱怨。后者也不贊成他的重要將領因兒女情長而魂不守舍。1942年7月，斯大林下令羅科索夫斯基接管莫斯科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軍，必須全神貫注于戰爭事務。整個夏季，瓦倫蒂娜試圖重溫浪漫的舊夢。她已愛上英俊的將軍，不顧一切飛到前線前去探望。但因有斯大林的干涉，羅科索夫斯基不愿見她。瓦倫蒂娜省悟到自己對將軍的熱情將得不到回報，于是對不斷贈送禮物和詩歌的西蒙諾夫有所軟化。她跟他上床，但仍說不愛他。有時，她還以殘忍、侮辱的方式來利用他，甚至曾讓他傳遞自己的情書給身在前線的羅科索夫斯基。 [(635)](#_633____K__Simonov__Sobranie_soc)

其時，西蒙諾夫和瓦倫蒂娜的“浪漫”已變成一連串抒情詩的主題，家喻戶曉。甚至在他們的戀情尚未成真時，在蘇聯人的文學想象中，卻已是既成事實。

這些詩歌中最有名的是《等著我吧》，寫于1941年夏季，其時的西蒙諾夫距離贏得瓦倫蒂娜的芳心還很遙遠：

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黃雨

勾起你的憂傷滿懷，

等到那大雪紛飛，

等到那酷暑難挨

等到別人不再把親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腦兒拋開。

等到那遙遠的他鄉

不再有家書傳來，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懶——都已倦怠。

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們口口聲聲地說——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縱然愛子和慈母認為——

我已不在人間，

縱然朋友們等得厭倦，

在爐火旁圍坐，

啜飲苦酒，把亡魂追薦……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萬

不要同他們一起，

忙著舉起酒盞。

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敗！

就讓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說我僥幸——感到意外！

那沒有等下去的人不會理解——

虧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

從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來。

我是怎樣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兩個人明白——

只因為同別人不一樣，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2]](#_2___Ci_Chu_De___Deng_Zhu_Wo_Ba) 。 [(636)](#_634_2)

西蒙諾夫寫出這些情詩，只為瓦倫蒂娜和自己，從沒想到發表，因為他心里明白，它們缺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歌所必需的“社會價值”。西蒙諾夫在1942年說：“我認為，這些詩句只是我的私事。”但他待在前線戰壕時，曾朗誦給其他士兵聽。他們或抄寫下來，或記在心中，想從詩句中尋找感情上的共鳴，更鼓勵西蒙諾夫向《紅星報》投稿。1941年12月，西蒙諾夫回到莫斯科，他的幾首詩先是在電臺播放，再在《真理報》刊出。其中的《等著我吧》，獲得了最為廣泛的回響。這首詩在報刊上轉載數百次，更被士兵和平民謄抄下來，四處流傳，竟有了數百萬個私人版本。隨即，它又成了風行一時的流行歌曲。1942年，西蒙諾夫創作了電影劇本《等著我吧》，由瓦倫蒂娜扮演女主角，各地劇院紛紛推出舞臺版本。士兵們將此詩抄寫在他們的相簿和筆記本上，或珍藏在自己口袋里，以作護身符。他們還將反復吟唱的疊句，刻在坦克和卡車上，甚至自己的胳膊上。給自己心上人寫信，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就會引用該詩的字句，以表達內心情感。心上人的回信，也會引述同樣的承諾。一名女子寫給前線的愛人道：“我的寶貝沃洛堅卡，好久沒有收到你的來信。但我會等著你，你會回來的。”士兵們模仿《等著我吧》，經常加入自身經歷的細節，寫出自己的情詩。 [(637)](#_635____N__Pushnova__Valentina_S)

該詩獲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它表達了數百萬士兵和平民的內心思緒和情感。一邊是自己的生存欲望，另一邊是與心上人的團聚，這首詩將這兩者緊密相連。1942年5月，一隊士兵寫信給西蒙諾夫：

每當你的詩在報上出現，我們團就有極大的興奮。由于報紙的份數有限，我們會把它剪下，抄成副本，相互傳誦。我們都想讀到你的詩，喜歡討論你的詩，已把《等著我吧》記在心里，它所表達的正是我們的感受。我們在家鄉，都有妻子、未婚妻、女朋友。我們希望，她們會等下去，直到我們凱旋歸來。 [(638)](#_636_2)

該詩所體現的普世愛情，人人都在設計自己的獨特版本——即戰爭背景下“你和我”的故事。對愛情的向往，只是其中的一半。該詩也提及對離別的妻子和女友的忠貞，士兵們滿懷憂慮。許多士兵的歌曲對此表示擔心，有一首最流行的，源于女子在男子出征后所吟唱的小曲，卻在部隊中獲得共鳴。士兵一邊唱著它，一邊上戰場：

我有很多話，想對你說，

卻沒吐出一個字。

你悄悄卻堅定地對我耳語：

“除了我，不愛其他相識！”

……

你去出征，不用擔心，

我會真心待你，

你將凱旋歸來，我的阿兵哥，我將把你緊緊抱在懷里！

《等著我吧》的各式變奏也強調忠貞。來自烏拉爾的一隊士兵唱道：

我將等你，我親愛的，

堅定等待我們的再會。

我等待，為烏拉爾的冬季，

也為春天的花開……

另一版本更添加了新的意境，如傳統俄羅斯民歌中的夜鶯：

我等待，知道你會回來。

來吧，秋天的凄風苦雨，

我將等你，我甜蜜的夜鶯，

堅信我們的幸福歡愉。 [(639)](#_637_2)

士兵們對不忠于前線丈夫的妻子非常苛刻。隨著戰爭的持續，對不忠的疑神疑鬼，給越來越多的家庭帶來壓力。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女子不得不活在戰爭的現實生活中，夠不上蘇維埃女子的理想標準（耐心等待的女友和忠誠的妻子），即宣傳影片、戲劇、《等著我吧》之類詩歌所塑造的形象。 [(640)](#_637_2)

士兵們對不忠之妻的強烈憤慨，西蒙諾夫自己也曾卷涉其中。1943年9月，他隸屬于布良斯克方面軍的第3軍團，其指揮官之一不幸陣亡。幾天后，收到一封那位指揮官的妻子的信，來自莫斯科東北部的維丘加鎮。她在信中告訴丈夫，她要出走，因為已愛上了別人。士兵打開信，感到應該作答，要西蒙諾夫代為執筆，講出他們的心聲。西蒙諾夫尚未下筆，就被派去前線的另一部門。兩個月之后，他在哈爾科夫為《紅星報》報道納粹對猶太人的謀殺，忽然想起自己對士兵的承諾。西蒙諾夫仍有該女子的名字和地址，但決定不直接回信，而是寫了一首詩《給維丘加女子的公開信》，讓士兵的情緒有廣為人知的機會。他向維丘加的黨委書記解釋，士兵當初曾告訴他如何給這位不忠的妻子回信，他的詩只是列舉了他們的原話。 [(641)](#_637_2)

我必須通知你

收件人并沒誦吟

你毫無羞恥

郵寄出的信。

你丈夫沒有收閱此信，

你粗俗的話語沒讓他傷心，

他沒有退縮或失去理智，

他也不后悔前塵。

……

你前夫已經陣亡。

一切都好，與你新人圖存。

死者不能將多余的話

寫入傷害你的信。

活著吧，沒有畏懼或內疚，

他寫不了，也就沒有回音

他不會從戰場趕回你的小鎮

看你攜手他人，厭故喜新。 [(642)](#_638_2)

詩人瑪格麗塔·奧列格說，《等著我吧》以及收在詩集《友與敵》（With You and Without You，1941—1945年）中的其他詩歌，其廣受歡迎的關鍵在于它們以強烈的個人色彩表達了普世感受。西蒙諾夫戰時的詩作充滿了激情和愛情，這樣的詩，蘇維埃讀者已很少看到。戰爭爆發之前，公和私一直作為文化和政治上的對立面。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為本的蘇聯詩歌界，容不得任何親密或私人的主題；言必稱“我們”的詩歌（在描繪代表蘇維埃公民的斯大林時，言必稱“他”），均以偉大的集體革命為主題（曼德爾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詩已不適合蘇維埃藝術，因為新的歷史時期，不再對個人命運產生興趣）。戰時的蘇維埃文化，卻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詩歌變得更加私密，表現個人的主題，談及人的情感和關系，并給自己帶來了新的地位和權威。詩人謝米昂·基爾薩諾夫寫道：

戰爭不適合贊歌

其大部也不適合書本，

但我想，人民需要

這公開日記本中的精神。

——《責任》，1942年



1944年，瓦倫蒂娜與西蒙諾夫在列寧格勒前線參觀

這種審美轉變的第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等著我吧》。它喚出了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私密世界，其創作基于個人感情，卻成了千萬民眾的必需。到處都是戰斗的噪音，譬如軍官的吆喝和政委的吼叫。但人民需要詩歌，來與自己沉默的情感進行交流；也需要詞語，來表達他們心中的悲傷、憤怒、仇恨、恐懼和希望。一隊士兵在1945年寫信給西蒙諾夫說：“你的詩活在我們的情感當中，教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尤其是女子，因此深受我們的喜愛。你獨自一人說出了我們內心最深刻的想法和希望。” [(643)](#_639_2)

除了對個人的影響，該詩的宣傳效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像《等著我吧》那樣的詩歌，在鼓舞士氣的蘇維埃運動中是強有力的武器。它們所表達的情感，有助于促進一種原始的愛國主義。它以家庭、同志友誼、愛情為中心，更為民族大團結的蘇維埃概念提供了基石。據傳，斯大林曾說，《等著我吧》一詩本來只應印兩份（“一份給他，一份給她”），但政權很快抓住機會，充分利用該詩的聲望。據紅軍政治部主管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說，由于西蒙諾夫的詩人價值，克里姆林宮甚至考慮將他調離危險之地。黨領導因為他詩中暗示殉難的一節（其實只是針對瓦倫蒂娜的浪漫姿態）虛驚一場。謝爾巴科夫特地奉命勸他格外小心。《等著我吧》獲得成功之后，西蒙諾夫迅速晉升到蘇維埃文化機構的頂端。他贏得了1942年的斯大林文學獎，1943年再次奪魁，因而獲得莫斯科一套豪華公寓，坐落在列寧格勒公路上（他之前來莫斯科都住在《紅星報》編輯部），并且人生第一次雇起了女傭。他變得富裕，因為他的新聞工作和詩歌都有豐厚報酬，他在前線又無處花錢，他的個人開支大多是公費的。只有寄錢給熱尼婭當做兒子的贍養費，或資助父母時，才需要動用自己的版權收入。 [(644)](#_643_2)

西蒙諾夫的名氣和財富愈益上升，在瓦倫蒂娜面前，變得更具吸引力。她一直偏愛有權有勢的男人，好為自己的污點履歷尋求保護傘。由于西蒙諾夫的鼎助，瓦倫蒂娜獲得了多部電影和戲劇的主要角色。到1943年春天，蘇維埃報刊經常報道這一對魅力四射的情侶，有時還在前線并肩出現。《等著我吧》中分離兩地的戀人，在現實生活中卻獲得了團圓。對政權來說，這正是鼓舞軍隊士氣的良機，不可錯過。但在事實上，兩人要到1943年10月才締結連理。所有證據顯示，瓦倫蒂娜同意嫁給西蒙諾夫只是結婚前不久的事。其時，西蒙諾夫仍是熱尼婭·拉斯金娜在法律意義上的丈夫（沒有離婚記錄），不過他倆分離已有3年。婚禮本身是倉促安排的，只有少數客人，包括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和兒子瓦西里，他們帶來斯大林的個人祝福。儀式結束后，西蒙諾夫立即奔赴布良斯克前線。除了兩次簡短的團聚，這對新婚夫婦在戰爭結束之前無法看到對方。第一次是在1943年，瓦倫蒂娜上布良斯克前線看望西蒙諾夫；第二次是夫婦倆一起參觀列寧格勒附近的前線。即使在戰爭結束后，瓦倫蒂娜和西蒙諾夫仍然過著相當獨立的生活。他們在列寧格勒公路上的大樓里各有自己的公寓和女傭，只不過處于同一層。瓦倫蒂娜開始酗酒，經常在白天喝醉。根據她朋友塔蒂亞娜·奧庫涅夫斯卡婭的回憶錄，瓦倫蒂娜結婚后郁郁寡歡，全憑飲酒度日（西蒙諾夫趁機讓她上床）。人們可能會質疑奧庫涅夫斯卡婭回憶錄的可靠性，因為她對前夫鮑里斯·戈爾巴塔夫，即西蒙諾夫的密友，抱有深仇大恨，甚至對西蒙諾夫本人也耿耿于懷。 [[3]](#_3___Gen_Ju_1998Nian_Chu_Ban_De) 也有可能，瓦倫蒂娜確實在某一時期——譬如視他為蘇維埃文化界中重要人物之時——愛上了西蒙諾夫，她的酗酒自有另外的原委。但毫無疑問，他們的婚姻像是暴風驟雨，遠非蘇維埃當局向公眾宣傳的幸福家庭。相互之間有不休的爭論，但也有熱烈的卿卿我我，至少可在西蒙諾夫從前線寫給瓦倫蒂娜的情書和詩歌中看到。但直到1950年瑪麗亞出生，他們才有孩子。其時，瓦倫蒂娜已屢屢背叛西蒙諾夫，有過不少外遇。 [(645)](#_643_2)

不是每個人都那么喜愛《等著我吧》。有人認為，它太感傷，它的私密情感并不適宜大眾的關注， [(646)](#_643_2) 西蒙諾夫的母親亞歷山德拉就有此感。她的保留態度，一方面出于對瓦倫蒂娜的厭惡和對兒子不愿顧家的反感，另一方面出于她的貴族矜持，反對情感的輕易袒露。她特別在乎詩中的這一句“縱然愛子和慈母認為——我已不在人間”，她認為，這表明作者對她和蘇聯的其他母親缺乏尊重。在莫斯科舉行的詩歌朗誦會上，西蒙諾夫向坐在前排的瓦倫蒂娜朗誦《等著我吧》，大廳里人山人海，亞歷山德拉也身列其中。之后，她在1944年12月從莫洛托夫城寫信給兒子：

基魯尼亞！我們今天在電話上稍作交談，更促使我想把這封信寫完……因為它包含了我最近興起的思念和牽掛。你的生活處于這樣一種境況，很難跟你進行坦率的交談。我們坐在專職司機開的汽車里，作斷斷續續的交流，無法訴說心里話，以及我所感受和思考的東西。但我覺得，仍須努力。

所以，我親愛的，我要講出痛苦的真相，我要告訴你，你的私人生活令我擔憂。我當時讀到就有此感，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更痛苦地忍受這種感覺……那天晚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在我看來，西蒙諾夫做了一件大事，讓青年們走近愛情，以清晰明了的話語談論愛情，這在我們的文學和詩歌中是全新的。現有的主人公的愛情和生活，都趨向于僵硬刻板……他在創作時，從自己的私密感情中汲取了靈感。但隨著謠言的興起，人們開始變得好奇。那天晚上，大廳中的觀眾并不是富有思想的人前來聆聽和反思，而是一群暴民。他們沒有任何遲疑，紛紛站起，爭先恐后，為了更清楚地看到“那個女人”——他們打量、評判、羨慕，但并不十分喜歡她。你又讓她暴露在這群暴民的面前，替她卸了裝。我并不認為她喜歡這樣的經歷……這些戲劇性的表演，不能彌補你的錯誤，反而有損于你的形象。我很痛苦地看到，如你近年來所做的，你讓這些骯臟的閑人環繞左右。你既找不到自身的力量，也找不到對生活的洞察，來看透他們……你和她，她和你，這是我們過去幾年中所聽到的……在我看來，這些庸俗的表演中，只有利己主義和任性妄為，并沒有真正的愛情。 [(647)](#_644_2)

能如此寫信的只有母親，沒人能給西蒙諾夫如此嚴厲、尖銳的訓斥。亞歷山德拉對“體面”和“正確行止”自有嚴謹的看法，宛如一名教育家，還會毫不猶豫告訴他人該怎么做。她不贊成兒子與瓦倫蒂娜的婚姻，1944年5月曾寫信給丈夫亞歷山大，聲稱“她自私、任性、喜怒無常，我簡直無法忍受”。她不喜歡兒子“爬進”蘇維埃精英的方式，根據她的祝賀信的口氣看來，她也不大在乎他獲得的斯大林獎和其他榮譽。她指責他自私，忽略她，對她把他撫養長大所作的犧牲不知感激。亞歷山德拉有一種傾向，喜歡加以夸張，像其他母親一樣，也希望從兒子那里得到更多關注，但她的訓斥確有道德上的基礎。亞歷山德拉在一封直白的信中，責備兒子兩個月不給自己寫信（“然后，突然收到一張兩行字的便條，還是你秘書打的字……太不像話了！”[原文]），還指責他只顧自己與瓦倫蒂娜的舒適和幸福，卻讓她和亞歷山大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們在車里雅賓斯克城的都是窮人，而你享受的舒適是你自己賺來的。你以前只能從歷史書籍，或長大時從我講述的早年生活中找到這種舒適。那個時候，你的福祉曾是我唯一的快樂。我出生于另一世界，在人生的開初25年[1890—1915年]，一直生活在奢侈之中，甚至無需自己穿衣脫衣。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來的摧毀。但我開始了新生活——我要為你著想。我洗刷、烹飪、奔波買東西，整天工作，都是為了你。坦率地說：我認為我的生活水平應有我撫養長大的兒子的一半，應生活在一個舒適的房間，有地方盥洗。這是我此前的付出應得的權利。 [(648)](#_645_2)

使她不以為然的主要原因還在于：亞歷山德拉一直在記掛熱尼婭和她的孫子阿列克謝。阿列克謝體弱多病，定期復發結核病，卻遭到父親的忽視，只能生活在甚少露面的著名父親的陰影之下。亞歷山德拉在1944年寫信給西蒙諾夫說：“醒醒吧，基魯尼亞，你到底怎么了？”



1944年，阿列克謝與西蒙諾夫

寬容得體曾是你幼時的標志，現在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只看你在前線的行為，你依然保有。如果看你的私人生活，以及你對本應是最親近的人的態度，你已棄之如敝屣……阿廖沙[阿列克謝]的幼兒園里有一個男生，他父親只是一名水手，每天晚上都去接自己的兒子——他只是個普通的男孩。阿廖沙的精神素質正在迅速成長……你只要多關心阿廖沙一點，就可學做一個精神上更為富有的好人……有一天，他從幼兒園回來宣布，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最好的媽媽；然后，思忖片刻后再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基魯尼亞，你的兒子依然相信你，在他可愛的稚嫩心靈中，對爸爸的信任依然存在。他希望有個爸爸，一個真正的爸爸，你還有時間來實現這一愿望。相信自己，我的兒子，就像阿廖沙相信你一樣。回歸自己，真正體面的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你生命中永遠最寶貴的工作，相信一直在愛護、信任你的我們。全神貫注于你的意志——你一直為此感到驕傲。如果想再次成為真實的自己，你現在更需要堅強的意志。 [(649)](#_646_2)



1941年的西蒙諾夫

如果說在戰爭期間西蒙諾夫與母親的關系有所惡化，他與繼父亞歷山大的關系反倒變得更加密切。亞歷山德拉在1944年寫信給西蒙諾夫：“看來，在你的心目中，爸爸和我的位置互換了。你對他的愛，超過了你對我的愛。我理解個中的原因——在戰爭時期，你需要他——我尊重這一選擇。” [(650)](#_647____RGALI__f__1814__op__9__d) 亞歷山大是個軍人，所撫養的繼子既認真聽話，又遵守紀律秩序——那些軍人價值是20世紀30年代西蒙諾夫認同斯大林政權的核心。但年輕時的西蒙諾夫，強烈地感受到自己不好的出身，一直以為自己的地位不穩。而在戰爭時期，論資排輩的標準，與其說是社會出身，毋寧說是對國家的貢獻，他因此而在體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對西蒙諾夫來說，投身軍旅本身就是驚心動魄的。他在1942年晉升為中校，以優雅瀟灑的風度，行使他的權威。作家伊拉克利·安德羅尼科夫記得，他是“一名舉止優雅的真正的俄羅斯軍官，身穿制服，腳蹬锃亮的皮靴，腰佩手槍，一臉的冷靜和自信。他牙齒潔白，面孔黝黑，戴的軍帽微微偏向一側”。戰爭年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西蒙諾夫在1942年寫道：“我迅速習慣了軍裝和軍人生活，以至于很難想象戰后我該做什么。屆時，我無須寫軍事報道，無須上前線，不再有數十個軍團中成千上萬的朋友。”瑪格麗塔·奧列格回憶，他在戰爭時期瘋狂般地忙碌。“他奔赴所有的重要前線，匆匆趕回莫斯科，趕緊寫出報道，再趕去最危險的戰場。他在莫斯科的時間，永遠不超過一天左右，往往只有數小時，足以與朋友一起相聚喝酒。”通過戰爭歲月，西蒙諾夫變得更加沉著冷靜，證實了自己的勇敢，在性方面也信心倍增。他有許多情侶，包括瑪琳娜·切奇涅娃——王牌轟炸機飛行員和蘇聯英雄勛章獲得者。據他后來的情侶說，西蒙諾夫對身穿軍裝的女子情有獨鐘，喜歡在他繳獲來的納粹旗幟上做愛。 [(651)](#_647_2)

戰爭塑造了西蒙諾夫的整個世界觀，他的價值觀基于軍事標準。他后來談及：“軍隊像一座學校。在軍隊服役，讓人們一生都記住要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沒有這種嚴格意義上的責任感，就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西蒙諾夫在履行自己職責時，仔細、勤奮，嚴守規則，幾近冷酷無情的地步。他與人交往又會有霸氣。在許多方面，他自己的行為模式變成了他的筆下人物，被引進俄羅斯的散文：即聰明的軍官，懂得當局命令的內在邏輯，認真付諸實現。戰爭結束后，他仍傾向于以戰爭時期的表現來評判他人：

不要抹黑他人的名字

但要了解其在黑暗中的行止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給了我們一把真正的標尺

如你愿意，它將一直有用，

不可讓它滑離我們的手指，

筆直鐵硬的標尺，

可用來檢查他人的百態千姿。 [(652)](#_649_2)



1943年的西蒙諾夫

西蒙諾夫將這把嚴厲的標尺應用于盧戈夫斯科伊，即自己的文學院老師，一位富有魅力、曾經鼓舞整整一代人的蘇維埃詩人。1941年的一起事件，使盧戈夫斯科伊丟魂失魄。其時，他在前線服役，遇上猛烈的炮轟，撤下后，穿越曾遭襲擊的小鎮，在被炸毀的家園中碰巧看到數名婦女和兒童支離破散的肢體。盧戈夫斯科伊因此而精神崩潰，被疏散到塔什干城。許多朋友對盧戈夫斯科伊表示同情，包括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遺孀艾萊娜·布爾加科娃，力爭解除對盧戈夫斯科伊詩歌的禁令（早在1937年即被定為“政治上有害”），但以失敗告終。索尼婭和熱尼婭·拉斯金娜，也向盧戈夫斯科伊伸出援手，以真摯的感情和友誼給他寫信。

1943年，剛從車里雅賓斯克回到首都的熱尼婭寫道：“你一定要來莫斯科，這里的人需要你。有需要，大家都會趕來的。我們不是一般外人，而是你的朋友，你總不能拒絕朋友吧。”如果他返回，搬進拉斯金在西夫切夫―弗拉熱克大街的公寓，索尼婭甚至允諾與他結婚（“我將以家庭的舒適來簇擁你”），而該公寓的3個小房間已擠進8個人。但西蒙諾夫沒有這樣的同情，認為盧戈夫斯科伊撤到塔什干，即是懦弱的標志，不再把他算作自己的密友。 [(653)](#_651_2)

這場戰爭使西蒙諾夫成為“斯大林主義者”。他開始堅信斯大林，讓斯大林成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現政權的政治和軍事的等級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現制度的價值觀和黨的領導。戰爭爆發時，西蒙諾夫還只是候補黨員，1942年轉為正式黨員。他后來解釋說，他入黨是為了想在戰爭事項上享有發言權——認為這是他作為軍官的責任——他不認為沒有黨的領導仍能贏得戰爭。黨本身“就是集體力量，能夠在戰爭條件下，作出必要的決策和犧牲”，他想成為這支力量中的一員。西蒙諾夫認同黨，特別是其領導人，甚至讓自己留起“斯大林風格”的胡須，頭發背梳，嘴叼煙斗。據多爾馬托夫斯基說，西蒙諾夫并不抽煙斗，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生活方式”。 [(654)](#_652_2)

西蒙諾夫主要通過寫作來為黨服務。他是一名優秀的戰地記者，至少可與瓦西里·格羅斯曼和伊利亞·愛倫堡平分秋色。格羅斯曼因后來創作的小說，在西方讀者中更為知名，例如《生存與命運》（Life and Fate，1980年代在西方出版），也是更為優秀的小說家，可能在道德上表現得更加勇敢。這與一般意義上的勇敢有所不同。西蒙諾夫從沒逃避過激烈的戰斗，報道了下列1942年的所有主要戰役：在刻赤半島，蘇維埃試圖從德軍手中奪回克里米亞，到了春天反成一場災難；在布良斯克前線，紅軍7月丟失沃羅涅日，德軍得以推向東南部，攫取烏克蘭和頓河的糧食供應，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在斯大林格勒，德軍在8月發動第一次攻擊，為了奪取這座蘇維埃據點，投入了激烈的巷戰；在高加索北部，德軍12月將蘇維埃部隊推至南部的克拉斯諾達爾城和奧爾忠尼啟則。他唯一沒作報道的是遭到兩年圍困的列寧格勒，但他去了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港口——1942年夏天，西方盟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補給，開始通過英國的船舶抵達那里。

西蒙諾夫作為一名軍人，親身經歷了哈勒欣河的血腥戰斗。他既能從士兵的角度，也能從執行上級命令的軍官的角度理解戰爭。他的戰爭報道以直接觀察和人道主義著稱，但也欣然接受政權分配的宣傳任務。他所有的戰爭報道，其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氣和加強紀律，培養對斯大林的愛，促進對敵人的恨。他寫道，蘇維埃愛國軍隊是為斯大林的榮耀而戰。他從敖德薩發出報道：“我們蘇維埃軍隊，依靠鐵的紀律和布爾什維克組織，緊密團結起來，給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如偉大的斯大林所教導的，他們在戰斗中沒有恐懼，沒有疲憊……為我們的敖德薩！為祖國！為斯大林！”在西蒙諾夫的報道中，斯大林的領導永遠是對蘇維埃軍隊的激勵和鼓舞。例如他寫到一名在斯大林格勒前線遇見的軍官：“我們的偉大領袖在莫斯科辦公室，指揮我們偉大事業的全部細節。他這位普通上校，因此獲得了斯大林的部分天賦和精神。這種想法成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1941年11月7日，他在紀念革命紀念日的詩中表達了同樣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聽到我們了嗎？

大家都清楚，你必然已聽見我們。

在這可怕時刻，既不是兒子，也不是母親，

我們記得的第一人就是您。

西蒙諾夫對斯大林的信念是真誠的，在以后的歲月中他從沒表示否認。他在回憶錄中承認，他的這首詩將巨大的意義賦予斯大林，但這是他的真實思想，“沒有絲毫的夸張”。 [(655)](#_653_2)

他的戰爭報道為政權敦促軍?隊頑強戰斗的運動服務。1941年8月，蘇維埃防線分崩離析，斯大林頒發無情的第270號命令，指責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國的叛徒”。好幾個高級將領被捕并遭槍決，包括西方面軍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將軍。他曾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周竭盡全力，試圖守住陣地，以穩住前線。被俘將士的妻子也是逮捕的對象（甚至連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妻子也被捕，被送進勞改營，因為雅可夫于7月被德國人俘虜）。西蒙諾夫接受并在1941年的報道中爭辯——蘇維埃防線分崩離析是“某些將領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他們充其量是一幫懦夫，而在最糟的情況下則可能是德國間諜，槍決也是理所當然的”。他還兜售這樣的說法：最勇敢的戰士，其陣亡的可能性反而最低——這只是神話一般的宣傳，以鼓勵軍隊在幾乎注定一死的情境中戰斗到底。 [(656)](#_654_2)

除了向斯大林政權提供直接的服務，西蒙諾夫還在戰地報道中追求另一目標，體現在他未發表的筆記和觀察心得中，后來用于他偉大的戰爭小說《生者與死者》。他是一名蘇維埃愛國者，又是蘇聯勝利的堅定信徒，想從人民的行動、思想、情感中找出必將勝利的征兆。他在1941年6月蘇維埃撤退的混亂中找到了第一個征兆，那就是兩名下級軍官逆流而上走回明斯克前線，以尋找自己的上級。 [(657)](#_654_2) 西蒙諾夫無法忘懷這一幕——在他眼中，它象征著普通老百姓的愛國主義精神——后來，他想方設法為蘇維埃勝利建立民粹主義的構思，寫作當中一再返回這一幕。但在當時，他對敦促人民堅持戰斗的強制力量僅有模糊的感覺。

三

西蒙諾夫1942年9月抵達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戰最激烈的時刻。最后的蘇維埃捍衛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廠區、火車站周圍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軍的坦克、大炮、飛機的轟炸下，他們的周圍一片瓦礫。蘇維埃士兵與德軍精銳，爭奪每一條街道、每一棟殘缺的建筑物。他們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諾夫無比驚訝。德軍甚至將他們推回河岸，但蘇維埃士兵仍不愿放棄城市，不愿撤退到蘇維埃主力集結的伏爾加東岸。正是這一種決心——無法以軍隊紀律或意識形態來作解釋的一種精神——扭轉了大決戰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衛委員會主席丘伊亞諾夫在9月16日的日記中，記下所聽到的一席對話，一方是新近趕到的增援部隊，另一方是撤離燃燒中的城市的一名受傷士兵：

“城里的情況如何？”[增援部隊問傷兵]

“誰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傷的手臂指向伏爾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為什么燒這么久？”援軍驚訝地問。

“一切都著火了：房屋、工廠、土地，所有的金屬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們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繼續戰斗！……”

蘇維埃軍隊的鋼鐵決心確實是戰爭的決定因素，不應作為有意宣傳的神話而受到忽視。然而，它的來源卻從來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為何這么多蘇維埃士兵，全然漠視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輔、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蘇維埃城市的浴血奮戰？

恐怖和脅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釋。戰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實施，以驅使士兵戰斗到底。蘇維埃防線分崩離析時，德軍正在威脅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頒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號命令（不準撤退一步！），要求部隊捍衛每一平方米的蘇維埃領土，“直到流盡最后一滴血”；“驚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責任，則要面對最嚴厲的處罰。 [[4]](#_4___1988Nian_Zhi_Qian__Su_Wei_A) 因此而設立了特殊的阻擊單位（zagradotriady），以加強既有的內務人民委員會。他們獲得的命令是，監督蘇維埃前線的后方，如有遲遲不愿沖鋒或企圖逃跑的士兵，格殺勿論。在戰爭期間，約有15.8萬名士兵被判處槍決（另有許多士兵遭槍決卻并無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記錄）；約43.6萬名士兵入獄；42.2萬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鮮血來贖對祖國犯下的罪”，被編入從事最危險任務的特別刑事營，譬如掃雷和向德軍防御工事發起攻堅。但第227號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對軍隊的整體影響，不應被過分夸大。強制執行該項命令往往是在絕望之時，如斯大林格勒戰役。其時，僅在幾星期之內，13500名蘇維埃士兵遭到槍決。除此之外，指揮官和政工人員經常忽略此項命令。他們從經驗中學到，大規模的嚴厲處罰無助于軍隊的團結和效率。事實上，此項命令推行之后，軍隊的逃兵持續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認，在激勵士兵堅持戰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還要開發其他的說服方法。 [(658)](#_655_2)

向蘇維埃人民發出愛國主義呼吁還是卓有成效的。絕大多數蘇維埃士兵是農民的兒子，他們效忠的對象不是將毀滅帶給農村的斯大林或共產黨，而是自己的家園和家人，以及自認的“祖國”。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爾·哈里曼指出，俄羅斯人民的拼殺是“為自己的家園，并不是為我們”。為了吸引他們，蘇維埃宣傳逐漸拋棄蘇維埃符號，改用更能影響士兵的俄羅斯母親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軍事災難時期，斯大林的畫像不再是無處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為國家的頭面人物和蘇維埃勝利的推動者）；蘇聯國歌原是《國際歌》，現由新國歌取代；新頒發的蘇維埃勛章，飾以俄羅斯歷史上的軍事英雄；教會被授予新生，國家取消了許多戰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換教會領導人對戰爭給予精神上的支持。這個政教交融的結果是宗教信仰和蘇維埃信念的奇妙組合。記者拉爾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鐵路站看到一名即將奔赴前線的西伯利亞士兵，他在聽喇叭里的廣播，認出了斯大林的聲音，他手上給自己劃著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 [(659)](#_655_2)

蘇維埃宣傳還充分利用了仇恨和報復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軍的入侵給那么多蘇維埃家庭帶來苦難，只需煽動一下對敵人的憤慨，就可驅使人們投入戰斗。年輕的士兵和人種學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對紅軍指戰員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詳細的研究。他發現，促使士兵浴血奮戰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對德國人的仇恨，超過其他一切。這種情感的力量如此強大且不可預測——包含了壓抑已久的憤怒，所針對的還有戰爭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傳機構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將它導向外國敵人。詩人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向此項仇恨運動貢獻文學才華的有好幾位蘇維埃作家，西蒙諾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伊利亞·愛倫堡和阿列克謝·蘇爾科夫等。在呼吁民眾拿起武器投入戰斗的宣傳中，最有名的詩歌是西蒙諾夫寫于1942年7月的《殺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號命令戰斗到死的精神——其時是戰爭的緊要關頭，德軍正威脅伏爾加河和高加索。軍官向即將投入戰斗的士兵朗讀此詩，以灌輸反抗精神和戰斗到底的決心：

如你珍惜

敞開胸脯喂你的媽媽，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臉頰躺下；

如你無法忍受噩夢，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邊，

抽打她布滿皺紋的臉龐，

以手指纏繞她的長辮；

……

如你沒有忘記父親，

曾用手臂當你的搖籃，

他曾是一名好戰士

倒斃在喀爾巴阡山的雪原， [[5]](#_5___Di_Yi_Ci_Shi_Jie_Da_Zhan_Sh)

倒斃是為了伏爾加和頓河，

也為了你未來的家園；

如你不能忍受噩夢

他在墳墓中反側輾轉，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搗毀在地面

再由德軍踏上一只腳

全都在你母親的眼前。

……

那就殺死一個德國人——保證殺死一個！

盡快殺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證殺了他！

西蒙諾夫的戲劇《俄羅斯人》力爭取得同樣的效果。它發表于1942年7月底的《真理報》，之后又在蘇維埃各地的劇院上演。這出戲非常單薄，卻非常及時，其主題——所有俄羅斯人聯合起來，同仇敵愾——捕獲了當時的反抗情緒（它于1943年贏得斯大林獎）。《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亞歷山大·韋斯，其時正好派駐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出：

第3幕結束時，帷幕緩緩下降，至少有10秒鐘的死寂，因為那幕戲最后一句臺詞是：“看，俄羅斯人是怎樣死的。”觀眾席中已有許多婦女在哭泣。 [(660)](#_656_2)

脅迫、愛國主義、同仇敵愾，一一發揮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戰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對犧牲的崇拜。蘇維埃人民以20世紀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戰爭。他們生活在頻繁的革命斗爭中，總被要求為偉大事業作出犧牲，他們已為戰爭做好準備。如西蒙諾夫所指出的，戰爭時期的艱辛和匱乏——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蘇聯民眾已有準備。他們以五年計劃的名義，早已承受了這一切。 [(661)](#_659_2)

隨時準備作出個人犧牲是蘇聯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戰爭第一年，絕對是蘇聯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時，蘇聯掙扎著，試圖從1941年夏天的災難中恢復過來。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為，以自身的巨大犧牲，來彌補軍事指揮的失敗和幾乎所有權威的癱瘓。“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犧牲精神尤為壯烈。他們從小就熟知為國奉獻一切的蘇聯英雄：屢破紀錄的飛行員、勞動模范、北極勘探者、內戰軍人和赴西班牙的共產主義斗士。這么多年輕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壯舉，踴躍投入戰爭，將1941年拿起武器的號召，與內戰的英勇傳統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計劃聯系起來——那是蘇維埃歷史上的兩大浪漫時期，據稱，其時的偉大事業在集體的努力和犧牲下得以實現。詩人大衛·薩莫伊洛夫（1941年21歲時入伍）寫道：“內戰——屬于我們的父輩。五年計劃——屬于我們的兄長。但1941年的衛國戰爭——屬于我們自己。”許多士兵把自己視作這個連續體的一部分，從中覓得戰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庫林在1943年寫給妹妹的信中說：“我在沿著父親的腳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內戰。”

他為我的生活而戰。現在，我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戰……索尼婭，關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為美好的未來和我們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點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須殺掉十幾個德國人。 [(662)](#_660_2)

從戰爭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無私奉獻，英勇戰斗，甚至有點魯莽，付出了極為可怕的生命代價。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 [[6]](#_6___Zai_Ge_Luo_Wen_Jia__Ni_Gu_L) 年長的男兵更為謹慎——希望幸存下來。維亞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出生于1920年，在戰爭中多次受傷，他回憶起老兵對新兵的幫助：

他們打得更巧妙，更清醒，不僅自己不會橫沖直撞，也會阻攔我們這些新兵的沖動，他們比我們更懂得生命的價值。我就有這樣一個保護者，已44歲，經常告訴我，即使在戰爭中，也必須愛惜自己的生命。 [(663)](#_660_2)

麗塔·高根1941年參軍時年僅18歲。在紅軍和游擊隊服役的婦女共有100萬人——相當于所有蘇維埃戰斗人員的8%（另有更多婦女扮演輔助角色，譬如運輸、物資、醫療）——麗塔是其中之一。 [(664)](#_661_2) 麗塔1923年出生于列奇察的猶太家庭，那是白俄羅斯一座工業小城。她說，她家是“蘇維埃式的現代家庭”。父親是工廠經理，母親是會計，麗塔和妹妹從小就受“蘇維埃時代精神”的熏陶，沒有猶太人的習俗、信仰，也不受祖輩的影響。學校、少先隊、共青團塑造了麗塔的世界觀。她回憶：“我把少先隊和共青團視為一種孩子組成的軍隊，路見不平，就會奮起開展斗爭。如果在學校里看到男生欺負女生或小男孩，我會對他很兇，以致他會向老師抱怨。”激勵她的精神，來自阿爾卡季·蓋達爾的流行兒童讀物《鐵木兒和他的隊伍》（Timur and His Team，1940年）。它講述一隊少年民兵，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鄉間別墅里，幫助守衛奔赴前線的紅軍軍官的家園。鐵木兒的故事鼓勵了許多青少年的軍事抱負，他們在少先隊和共青團受到的訓練（組織起來的游行、操練、半軍事化游戲、紀律嚴明、服從權威），本來就是參加紅軍的準備工作，即使是女孩，也不例外。宣傳機構推崇蘇維埃武裝婦女的正面形象，把婦女軍事化當做男女平等的標志。

戰爭爆發時，麗塔正在讀學校的最后一年，她與家人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后來在一所學校擔任會計。但她亟想參與直接有助于戰爭的工作，便向當地共青團提出懇求，要上軍事學校。但共青團予以拒絕（說她18歲，太年輕），只把她送去一個彈藥廠，幫助組裝飛機零件。1942年夏天，蘇維埃報刊介紹了年輕女志愿者的壯舉：她們中很少人曾碰過槍，剛走出校門就擔任狙擊手和高射炮手，參與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戰。麗塔決心以她們為榜樣，再次向共青團提出申請，又一次遭到拒絕，被告知要堅守工廠崗位。她回憶：“我氣壞了。我自愿參戰，還明確表示，時刻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卻被當做一個小女孩。我跑回家，大哭一場。”麗塔組織了一群年輕的女共青團員，一起離開工廠，申請進入一所軍事學校。該校正在培訓電報和電臺的操作人員，為發起“天王星行動”（Operation Uranus）做準備，即1942年11月針對斯大林格勒周圍德軍的蘇維埃反攻。麗塔分到摩爾斯電碼信號員的班級，學完后又與其他女孩一起被派到西南方面軍的前線總部——地處斯大林格勒和沃羅涅日的中間。12月下旬，她參與“小土星行動”（Operation Little Saturn）。西南方面軍和沃羅涅日方面軍的聯合部隊，突破防線，穿插到駐在頓河的德軍的后方。麗塔回憶：“我們在方面軍前線總部的直接上級是一個老先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沙皇軍隊任職，不知如何應付我們女生，同我們交談時非常客氣，絕無生硬的命令。但他是一流的專家，保護我們免受其他軍官的騷擾，那些人只想從我們身上滿足性需求。”1943年1月，麗塔駐扎在哈爾科夫附近的前線觀測點，沒想到德軍竟然突襲上來。她想帶著無線電設備逃走，第一次品嘗到生死搏斗，她近距離打死兩名襲擊者才得以脫身，但也嚴重受傷。康復之后，她作為報務員又曾在好幾個方面軍服務。1944年7月，她在科涅夫元帥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擔任炮手，與利沃夫附近的德軍作戰，最終在1945年1月，隨第57軍抵達布達佩斯。

麗塔反思自己抗擊德軍的決心，可算作“1941年的一代”的代表：

我才18歲，剛離開學校，以蘇維埃英雄的理想眼光看待世界。他們是為祖國作出巨大貢獻的無私先驅，我在書中讀到過他們的功勛。這一切如此浪漫！我一點也不清楚戰爭究竟是什么，只想積極參與，那是英雄的事業……我并不視之為“愛國主義”——只把它當做自己的義務——我可以也應該盡一切努力，來戰勝敵人。當然，我也可以留在兵工廠，度過整個戰爭時期，但我一直希望能夠親臨大事件的風口浪尖：這是我從小學到的少先隊和共青團的態度。我是一名積極分子……沒有想到死亡，所以不怕，因為我在為祖國而戰，就像我的蘇維埃英雄一樣。 [(665)](#_662_2)

西蒙諾夫在《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1944年）中試圖解釋的也是這一精神，該小說基于他當年日記所記錄的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觀察。在西蒙諾夫看來，促使士兵戰斗的既不是恐懼，也不是英雄主義，而是更為本能的東西，與保衛自己的家庭和社區有關。這種感覺因敵人的迫近而愈益強烈，讓人們釋放出能量和主動性：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基本上是一個路障鏈，連在一起便成了一個大戰場；分隔開來，每一個路障又必須依賴自己小團體的眾志成城。他們很清楚，必須站穩腳跟，守住陣地。如果德軍在某處突破，整條防線都會受到威脅。 [(666)](#_663_2)

如斯大林格勒所顯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奮戰是為了什么，自己的命運又與之緊密相連，這樣的士兵才是最厲害的。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證明，地方愛國主義是強大的動力。如果把一個特定社區和人際關系網的防衛（而不是“蘇維埃祖國”的抽象概念）認作蘇維埃事業，人們更愿意投入戰斗，更愿意犧牲自己。蘇維埃的宣傳援引了保衛“羅迪納”（rodina）的概念（即家園，既指地方上的，也指全國性的），旨在充分利用這一情緒。

戰時的民族團結只是一個蘇維埃神話。事實上，戰爭時期的蘇維埃社會是內戰以來最為分裂的。蘇維埃國家加劇了民族分裂，讓某些少數民族充當替罪羊，如克里米亞的韃靼人、車臣人、伏爾加德裔，將他們流放到不受歡迎的地區。戰爭前，反猶主義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戰爭時期反而四下傳播，尤其蓬勃發展于希特勒軍隊的占領地區。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納粹種族主義宣傳的影響。而類似的偏見，又由蘇維埃士兵和撤離西部地區的人士帶入哈薩克斯坦、中亞、西伯利亞。許多人將斯大林政權的濫權迫害歸罪于猶太人，又借用納粹的宣傳，稱布爾什維克都是猶太人。據《紅星報》主編大衛·奧滕貝格所說，士兵們常說猶太人“推卸自己當兵的責任，逃去后方，在舒適的蘇維埃辦公室上班”。 [(667)](#_664_2) 一般來講，在大眾政治意識中，兵役責任的不平等與普遍的不平等逐漸掛起鉤來；前線軍人和后方“老鼠”之間的鴻溝，更成了民眾和精英之間愈益擴大的分歧的焦點。

雖然沒有真正的民族團結，但人民確有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社區。到1941年，400萬人志愿參加公民國防。他們自愿挖掘戰壕，守護建筑物、橋梁、道路，一旦遭到襲擊時，還運輸食品和藥品上前線，撤回傷者，或直接參戰。在莫斯科，公民國防有16.8萬名志愿者，來自30多個民族，另有50萬人幫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寧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萬男女參加公民國防，另有10.7萬名工人參與軍事活動。 [(668)](#_665_2) 他們的愛國主義高漲，卻沒有獲得適當的訓練，所以雖然奮勇作戰，但在初期戰役中死傷慘重。

對軍隊的凝聚和戰斗力來說，同志友誼也是至關重要的。據軍事理論家稱，如果自己屬于可以信賴的戰友團體，即“弟兄們”，士兵往往會在戰斗中表現得格外勇敢。 [(669)](#_666_2) 從1941到1942年，紅軍傷亡率非常之高，以致其小的戰友團體大多歷時很短。前線步兵的戰斗時間，平均下來不超過數星期，不是陣亡，就是受傷。從1942到1943年，部隊開始穩定下來。士兵們發現，相互之間的同志友誼變成了激勵他們堅持戰斗的決定因素。這些友誼的親密無間，自然是來自他們共同面臨的危險。小團體內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又是他們生存的關鍵。一位士兵給陣亡的戰友的未婚妻寫信說：“前線生活讓人迅速親近。”

在前線與他人共度一兩天，就會發現他全部的素質和情感。如果是在平民世界，你一年也弄不清。再也沒有比前線友誼更深厚的，它牢不可破，甚至死亡本身也無法將之打碎。



1937年，伊萬·布拉金和家人

退伍軍人以理想主義和懷舊之心，回顧戰時友誼的親密無間。他們聲稱，當時的人有“更寬大的胸懷”，“遵循靈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變成了“更好的人”。與充滿妥協和應急的共產主義制度相比，小團體內的同志友誼仿佛具有更純真的道德關系和原則。他們經常談及，從戰友團體當中找到了一種“家”的感覺，那是他們戰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漸漸消失了）。 [(670)](#_667_2)

到1943年1月，“天王星行動”和“小土星行動”將德軍趕回斯大林格勒以西360公里的頓涅茨河，更把其25萬先鋒部隊團團包圍。被困的德軍，既要抵御他們的蘇維埃敵人，又要應付寒冷和饑餓，但仍作出了激烈的抵抗——他們非常害怕變成俘虜——他們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最終在2月2日投降。蘇維埃人歡呼這次勝利是重大的轉折點，大大鼓舞了士氣。愛倫堡寫道：“在此之前，人們只是對勝利抱有信念。到了現在，已經毫無疑問，勝利有了保障。”蘇維埃軍隊從斯大林格勒，推進到庫爾斯克，集中了40%的士兵和四分之三的裝甲部隊，在7月擊敗德軍的主力。庫爾斯克戰役決定性地摧毀了德軍在蘇維埃土地獲勝的奢望。紅軍把士氣低落的德軍趕向基輔，9月份抵達烏克蘭首都郊外，最終在11月6日奪回基輔，恰好趕上第二天莫斯科的革命紀念日慶典。 [(671)](#_669_2)

紅軍指戰員的勇氣和韌性是蘇維埃軍事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另一因素是在災難性的第一年之后紅軍權力結構的轉型。斯大林終于承認，黨的干預（他自己就擔任最高統帥）使軍事指揮的效率降低，最好讓指揮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權。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為最高副統帥——讓斯大林退居幕后，不再掌管軍隊的日常管理——為黨和軍隊的新關系放出了信號。戰略規劃和戰爭運行，逐步從軍事委員會的政治家手中，轉至總參謀部。后者此時扮演領軍角色，只需隨時向黨領導匯報。政委和其他政工的權力，本是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的遺產，現在在軍事決策過程中受到大幅度的削減，在低層部隊中干脆消失，讓指揮官掌管一切。軍事指揮不再受黨的嚴密控制，發展了全新的自信。自主鼓勵了主動，遂造就了一支穩定的軍事專家隊伍。他們的專業素養，對1943至1945年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加強專業精神，黨領導在1943年1月恢復沙皇的肩章制度。那曾是舊政權受人憎恨的符號，摧毀于1917年。同年7月，“長官”的稱號也起死回生，以取代一律平等的“同志”稱呼。肩章的金穗帶從英國進口，英國官員因此而感到憤慨，在他們看來，那是無用的俗艷裝飾，但在事實上，金穗帶自有它的重要性。 [(672)](#_669_2) 各式勛章作為對軍事專家的獎勵，也發揮了利害攸關的作用。從1941到1945年，共有11萬枚勛章授予蘇維埃軍人——相當于美國授出的8倍。戰斗結束之后，蘇維埃士兵只需等待幾天就可領到獎勵，而美國士兵往往要等6個月。為了鼓勵戰功卓著的士兵申請入黨，黨組織專為軍人降低了要求。

工業經濟中的變化也促進了蘇維埃的軍事復興。1941至1942年，與敵人相比，紅軍的裝備很差，因此蒙受了巨大損失。到1942至1943年，坦克、飛機、汽車、雷達、電臺、火炮、槍支、彈藥的生產，都有顯著的改善，從而組建了新的坦克師和機械化師，打得更加有效，兵員犧牲更少。蘇維埃工業的迅速重組，讓計劃經濟（斯大林制度的基礎）獲得茁壯成長。沒有國家的強制，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完成必要的調整。成千上萬的工廠和工人被疏散到東部；幾乎所有的工業生產都面向軍事需求；或建新鐵路，或作新調度，將東部的新工業基地與軍事前線連接起來；工廠實施戒嚴法，以加強勞動紀律和提高生產力。新頒布的工作紀律，嚴厲懲罰疏忽、曠工、擅自離崗、遲到（上班遲到20分鐘以上就算“勞動戰線的逃兵”）。戰爭年代，法庭判定的這些罪行竟高達750萬件。 [(673)](#_670_2) 大多數工廠內，每周工作70小時已成常態。由于擔心早上遲到，許多工人干脆都在工廠吃睡。實施綜合的配給制度，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保證人們堅守工作崗位（要在那里領口糧）。最后，通過大規模的逮捕，動員龐大的古拉格勞工隊伍，以提供國家急需的燃料和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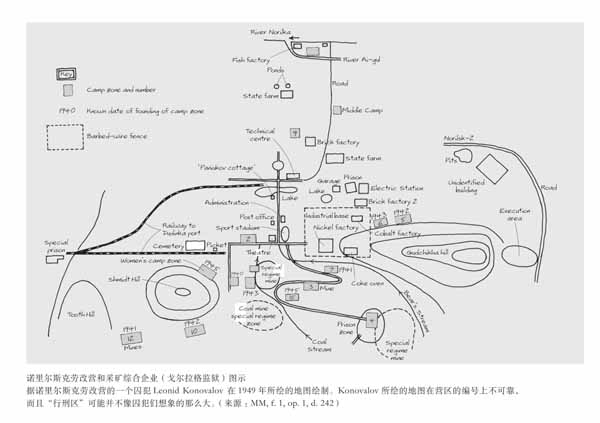
在蘇維埃的戰爭努力中，最不為人所知的是所謂的“勞動大軍”（trudovaia armiia），所征入的人數超過100萬，執行自由勞工不愿做的各項任務。官方文件從來不提“勞動大軍”，只委婉談及“勞工服務”和“勞工儲備”。這兩個詞掩蓋了背后的強制特征，其實他們就是無償勞工，其處境等同于古拉格囚犯。他們在獄警看管下列隊出工，從事同樣的苦力（采伐林木、建筑、車間勞作、農活）。與古拉格囚犯不同，勞動大軍中很多人從沒經過法庭的逮捕或判刑。其中的大多數只是被驅逐的少數民族，遭到內務人民委員會和軍隊的圍捕。尤其是蘇維埃德裔，戰爭一爆發，就被從伏爾加河地區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勞動大軍也包括大量的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人、卡爾梅克人、芬蘭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和朝鮮人。

魯道夫·戈特曼1922年出生于克里米亞的路德教德裔家庭。戈特曼一家被定為“富農”，1931年流放去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城附近的荒野。戰爭爆發時，內務人民委員會把魯道夫當做“德國人”抓起來（事實上他祖先自1831年以來，一直住在俄羅斯），再送到頓巴斯的煤礦。在那里，他被征入勞動大軍，與100名來自“德國人”家庭的年輕男子，前去烏拉爾北部的索利卡姆斯克食品加工廠。1942年秋天，他們改赴附近的伐木勞改營，從事伐木工作，晚上睡在營房木椅上，只有極少量的口糧。由于要在嚴寒中工作，第一個冬天就有超過一半的勞動大軍成員死去。監管他們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獄警，對“德國”男孩毫不手軟，斥責他們為“法西斯敗類”。魯道夫因受傷被送去醫院，反而撿得一條小命，否則肯定會死于體力耗盡。在之后的14年中，他一直留在勞動大軍，曾在工廠、蘇維埃農莊、建筑工地工作，甚至奔赴高加索地區，為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建造鄉間別墅。1948年之前，他沒有得到任何報酬，也不準離開勞動大軍；直到1956年古拉格囚犯獲得普遍大赦，他也沾上了光。 [(674)](#_671____R__Overy__Russia__s_War)

征入勞動大軍的不只是“非俄羅斯人”，原“富農”也在劫難逃。伊萬·布拉金來自烏拉爾的蘇克孫地區，1943年秋天被動員加入勞動大軍。10年前，他作為“富農”流放到“特殊定居地”，附屬于彼爾姆附近的克拉斯諾卡姆斯克紙漿造紙廠。伊萬因工廠的化學溶劑幾乎失明，又因風濕病而幾近癱瘓，卻被送去科特拉斯城附近的伐木勞改營。他在造紙廠工作，因沒領到足量的口糧而有所抱怨，卻因此受到懲罰，被征入勞動大軍。但他無法適應伐木勞改營的重活（幾乎看不清要伐的樹木），很快在嚴寒中病倒。他給在克拉斯諾卡姆斯克的家人寫信說：“我的腿腫得厲害，都穿不上褲子了。”勞改營的食物很糟，不足以維持他的體力，工作又非常辛苦。1943年秋季的一天，伊萬實在筋疲力盡，癱倒在地，被送去醫院。他在那里慢慢恢復，1944年1月寫信告訴家人，他的雙腳終于顯示出“生命跡象”。他希望很快出院，作為一個傷殘病人，他將能獲準回家。但從科特拉斯勞改營到1000公里之遙的蘇克孫地區，冬季的旅程太危險了。伊萬害怕在春天之前動身，擔心萬一他“因寒冷空氣而頭暈目眩，倒在冰上”。但他下了決心，一旦體力恢復，就要跋涉回家。“我只需一雙大氈靴就能回家。”伊萬1944年2月從勞改營獲釋，根本不宜開始漫長的旅途。他再沒回到家，離開醫院僅幾百米，腳下一滑，就在結冰的路面上倒下凍死了。 [(675)](#_672____J__Erickson__The_Road_to)

古拉格勞工也在戰時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生產了蘇維埃彈藥的15%、大部分軍服和大量糧食。從1941到1943年，勞改營人口有所下降，因為50萬名囚犯獲釋，奔赴前線參戰以“贖罪”；但從1943年底起，又有大幅增加，因為蘇維埃軍隊挺進德軍放棄的領土，內務人民委員會緊隨在后，逮捕了幾十萬涉嫌投敵者和反蘇民族主義叛亂者。戰爭期間，對古拉格勞工的剝削愈益酷烈。在采礦和伐木勞改營，為增加燃料的供應，囚犯們被驅趕到了死亡邊緣，其口糧又降到最低限度。1942年，古拉格勞改營的死亡率達到驚人的25%——換言之，這一年每4個古拉格工人當中就有1人死去。 [(676)](#_672_2)

除了伐木勞改營和礦區，一種新型古拉格經濟在戰爭時期獲得蓬勃發展。內務人民委員會掌控了大型工業區（古拉格城市），其中的工廠和建筑工地長期配備囚犯勞工。地處北極圈的諾里爾斯克綜合企業，就是新型古拉格經濟的一個典例。那里鎳、鉑、銅的儲量非常巨大，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地質學家發現。但要到1930年，工業化使珍貴礦石變得必不可少，才完成第一次大勘探。諾里爾斯克擁有世界上已知鎳儲量（用于生產高級鋼材）的四分之一、已知鉑儲量的三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煤炭可用作冶煉和運去喀拉海的能源，該區的自然條件非常有利于開采和加工礦石。另一方面，該區幾乎無法居住，冬季氣溫能下降到攝氏零下45度，暴風雪持續不停，一年中倒有數月暗無天日。到夏季，地面變成沼澤，蚊子肆虐，奔赴諾里爾斯克的沒有一個是自愿的。



1935年，該區的發展移交給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古拉格管理部門。該部門專門在偏遠地區管理大型的建設項目，尤其是民用部委不愿經營的（負責冶金的重工業部拒絕接受諾里爾斯克項目），名氣越來越大。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和采礦綜合企業，剛開始有1200名古拉格囚犯，挖掘凍土時只用手鎬和推車。到1939年，盡管更多的人在同一時期死去，囚犯人數仍上升到1萬人。但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部門，仍對進展的緩慢表示不滿。1939年，諾里爾斯克的首任主管弗拉基米爾·馬特維耶夫被捕，被送進勞改營15年。接替他的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采礦綜合企業的前主管阿夫拉姆·扎韋尼亞金，這項任命是政權重視諾里爾斯克項目的標志。對高級鋼材的軍事需求，使諾里爾斯克的鎳產在戰爭中變得至關重要。諾里爾斯克的工作強度加劇，從1941到1944年，A組囚犯（從事生產或建筑的）每月休息不滿3天（許多前囚犯，根本不記得還有休息日），所有的囚犯每天工作11小時，再惡劣的天氣也要出工（他們在暴風雪中攀扶繩索，步行上班）。扎韋尼亞金引進獎勵制度，超額完成任務的“勞動模范”（1943年，5人當中即有1人）可獲得好處——較好的宿舍、衣服、口糧甚至少量金錢。他還增加自由工人和“志愿者”的數量（戰爭結束時，約有1萬人），讓他們就任管理和專家的職位。但增長最大的是監獄勞工數量，到1944年已達10萬人。 [(677)](#_675____MP__f__4__op__11__d__2) 諾里爾斯克的囚犯來自蘇聯各個角落，特別是烏克蘭、北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地區。在那里，大肆搜捕“民族主義者”和“與敵合作者”，就是為了向古拉格提供勞工。通往諾里爾斯克的漫長旅程先要乘火車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那是西伯利亞行政區的首府，位于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的南部，相距2000公里。囚犯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上船，沿葉尼塞河，到諾里爾斯克綜合企業的港口杜金卡下船，然后再坐火車抵達勞改營。諾里爾斯克周圍的北極荒原極為遼闊，根本就沒有必要為勞改營搭建鐵絲網。正常心智的囚犯都不會嘗試逃走，事實上確實沒人這樣做過（盡管有不少傳說稱，有人橫渡北冰洋，逃至5000公里之外的阿拉斯加）。 [(678)](#_676_2)

瓦西里娜·德米特魯克15歲時被送到諾里爾斯克。她出生于烏克蘭西部捷爾諾波爾地區的農民大家庭，她與數十名婦女一起，被指控為烏克蘭民族主義游擊隊的同情者。1943年，紅軍重新奪得她的村莊，附屬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把她們帶去當地小鎮（紅軍征召了村里所有的年輕男子），予以審訊和毆打，直到女孩供認“叛國罪”（她們中許多人都弄不懂這一指控是什么，因為不懂俄語）。之后，她們上了軍事法庭（再一次使用俄語），被判處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服刑10年。她們參與興建諾里爾斯克機場。盡管天寒地凍，她們唯一的住所只是一頂大帳篷，同住的還有數百名以同樣方式來到諾里爾斯克的烏克蘭婦女。 [(679)](#_676_2)

安娜·達爾維娜作為“志愿者”被送到諾里爾斯克。當時她年僅16歲，還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以東120公里的烏伊阿爾鎮學校念書。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共有約1000名所謂的“共青團志愿者”，在1943年9月被強迫送到諾里爾斯克。安娜回憶：“一大群人在諾里爾斯克火車站歡迎我們，還有合唱團和樂隊。”

走出火車時已經很冷。來時還穿著涼鞋，到了這里看到地上已有積雪。當地人很窮，衣衫襤褸。他們給我們發了毛毯和氈靴，把我們當做志愿者。他們被告知，我們都是陣亡士兵的孤兒。但事實上，我們都是被軍隊抓來的，別無選擇。我們面對一場戰爭，軍隊需要我們中的每一人充當勞工，不管身體有多虛弱。 [(680)](#_677_2)

1943年，18歲的謝苗·戈洛夫科來到諾里爾斯克。他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羅波爾地區，在11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是哥薩克，在集體化運動中被定為“富農”，因此失去所有財產。謝苗的父親和哥哥均是紅軍，1941年6月都陣亡于斯摩棱斯克附近。作為幸存的最年長的男性，謝苗成為一家之主。他放棄學業，在集體農莊擔任拖拉機駕駛員，以此養活母親和9個弟妹。德軍在1942年9月占領北高加索，謝苗隨即加入紅色游擊隊，但不幸被俘。德軍強迫他加入輔警，否則就要槍斃他的家人。4個月后，紅軍奪回該地區。謝苗作為“與敵合作者”被捕，流放到諾里爾斯克。他從事采礦和工廠的各式工作，很快成為大隊長，甚至當上勞動模范。作為古拉格勞工，他因為對戰爭的貢獻而贏得好幾枚獎牌。 [(681)](#_677_2)

奧莉加·洛巴切娃是著名的礦物學家，1944年被送來諾里爾斯克。她丈夫于1938年被捕，稍后，自己也因“反革命煽動罪”獲刑8年，最終淪落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她在勞改營里生下一個兒子，被送去孤兒院。1943年秋天，奧莉加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選為專家，分配到諾里爾斯克礦區。整整6個星期，她被囚禁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以西350公里的馬林斯克鎮，等待來自西伯利亞各勞改營的其他地質學家和采礦專家。之后，奧莉加轉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準備北上，卻被醫療委員會定為不適宜旅行（她得了肺炎），反被送去東面400公里的泰舍特勞改營。在囚犯的眼中，泰舍特是“死亡集中營”，有很多等死的殘疾人和老人。她來到泰舍特不久，再次被內務人民委員會選中，即使有肺炎，仍被送去諾里爾斯克。為了加快速度，她和工程師、電工、冶金專家、建筑者，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搭乘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專機。奧莉加最后在技術部門擔任地質研究員，與大學里的許多朋友重聚。 [(682)](#_679____Interviews_with_Vasilina)

這些大學的朋友中就有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即1917年10月在斯莫爾尼學院食堂認出失散多年的父親謝爾蓋·古謝夫的年輕姑娘。1936年12月，葉麗薩維塔作為“托派”被捕，判處5年，在雅羅斯拉夫爾監獄服刑。到1939年，她的刑期延長至15年，被送來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前3年，她在煤礦上班，隨后轉到技術部門，從事進口書籍和手冊的翻譯工作。葉麗薩維塔基于內心的愛國精神，工作起來活像一名真正的勞動模范。她覺得，通過在勞改營的工作，也在為蘇維埃經濟作出貢獻。從1941到1945年，她前后4次申請參軍奔赴前線，均遭拒絕。盡管如此，葉麗薩維塔仍因自己的勤奮工作在專家區獲得自己的房間，與丈夫亞歷山大·達尼埃茨同住。亞歷山大的父親是受鎮壓的老布爾什維克，被捕于1938年。夫婦倆以前在列寧格勒時就是朋友。他們在諾里爾斯克的鄰居記得，兩人很安靜，養了一條狗。德拉布金娜因礦區事故已成聾子，很難與人應酬。他們有朋友的小圈子，自組了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勞改營圖書館里有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但對外人非常小心。1945年，圈子中有人被捕，后來以“反革命煽動罪”遭到槍決。他們因此懷疑，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囚犯已滲透到他們的圈子，便解散學習小組，轉入地下，只是在遛狗時，才與朋友在通向墓地的道路上偷偷見面。葉麗薩維塔和丈夫精通幾種語言，他們在家里都用

法語交談，以防隔壁房間的偷聽。 [(683)](#_679_2)

四

20世紀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瑪托娃與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在列寧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說：“想想吧，我們生活中最美好的歲月卻是戰爭時期。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餓，我兒子參加強制勞役。”20世紀30年代的恐怖，給阿赫瑪托娃那樣的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在他們眼中，戰爭反而成了一種解脫。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的尾聲中寫道：“戰爭爆發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脅，相比于謊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種福分。它又成了一種解脫，因為它打破了一紙空文的魔咒。”這一解脫是溢于言表的，人們以戰爭前不可想象的方式處世行事。他們出于必需，尋回自己的主動性——相互交談，相互幫助，不再擔憂可能的政治危險。從這種自發的活動中，又涌現出了全新的國民意識。出于這個原因，人們以懷舊的心態來回憶戰爭年代，視之為“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即是，“每個人都覺得，社區意識得到了歡快且不受拘束地復蘇”。 [(684)](#_681_2)

對作家維亞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來說，那種從屬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

我們為那些年感到驕傲。對前線生活的懷舊，使我們大家都激動起來。并非因為那是我們喜歡回顧的青春年華，而是因為我們當時覺得，自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民。這種感覺，之前沒有，之后也沒有。 [(685)](#_683_2)

復蘇的責任感隨處可見，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尤其是從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權的基礎因德軍的入侵實際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來作出相應的決策。當時擔任軍醫的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將那幾年視作“自發的去斯大林化”時期：

就在我們的眼前——受命運擺布的個人，面對死亡，卻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為目擊者和歷史學家，我可以證明：1941和1942年眾多的情形和決定，其實是自發的去斯大林化的進程……我們仍是俄羅斯人和蘇維埃人，但在那些年頭，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們的心田。

阿達·列韋多娃在醫療機構度過戰爭年代。在她看來，這種自發的去斯大林化體現在一種權力移交上——從刻板地控制醫院的共產黨官員，轉到醫生和護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實例，當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等不及當局的授權。我們顧不得正式的規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動，或作出即時的調整。” [(686)](#_683_2)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戰爭援手。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有所作為，這種參與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個人責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記錄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學家的對話。該科學家說，戰爭是“我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期”，然后向驚愕的朋友們解釋：

因為在那段時間，我們覺得與政府貼得很近，超過了我們人生的其他任何時候。不再是他們的國家，而是我們的國家。不再是他們要求我們做這做那，而是我們自己想做。不是他們的戰爭，而是我們的戰爭。所保衛的是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自己的戰爭援手。

據曾是沙場老將的康德拉季耶夫說，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時不斷受到指揮官的虐待和鄙視，一旦在戰場上發起進攻，即變成了他自己的將軍：

沒人可以指揮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時也是一樣，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否則，德軍就會突破進來……你覺得，仿佛俄羅斯的命運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沒有你，一切可能變得不同。平時在我們社會中，什么都不取決于個人。但在戰爭中就不一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直接參與了勝利。 [(687)](#_684_2)

“1941年的一代”從小就崇拜斯大林和黨。對他們來說，新興的自由無疑是對制度的一大沖擊。文學史家拉扎爾·拉扎列夫回憶：“1941至1942年的軍事災難，迫使我們第一次質疑斯大林。”1941年，他從中學直接上了戰場：

戰爭之前，我們沒有任何質疑。我們相信所有關于斯大林的宣傳，相信黨是正義的化身。但我們在戰爭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東西，因而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 [(688)](#_685_2)

朱莉婭·奈曼寫下《1941》一詩，其時的氛圍已預示1956年（赫魯曉夫“解凍”的第一年）的價值觀變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戰……

數不清的挫折、失敗、消耗！

然而，那年的戰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閃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閃耀！

遁詞一一墜落，恰似紛紛剝落的石膏，

泄露無遺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實效；

透過燈火管制和迷彩偽裝

我們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馬腳。

我們曾用來測量的曖昧標尺——

表格、問卷、資歷、級別、倚老賣老——

都被唾棄，我們現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標尺是信念和勇驍。

我們曾經歷和目睹這一切，

記憶猶新，神圣照舊，仍然記牢

監視哨、屋頂、防空氣球，

當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亂囂，

穿上迷彩服裝的建筑物，

空襲的交響樂和解除警報的信號——

到最后，顯得貨真價實的卻是

我們公民的驕傲，純粹閃亮的驕傲。 [(689)](#_686_2)

隨著公民對新的自由的索求，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戰爭年代，黨員人數幾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戰前的革命精神，因為最為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戰斗中喪失殆盡。到1945年，600萬黨員中一半以上是軍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戰爭中新近加入的。這些黨員，大大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主義的黨。他們更加務實，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沒有受訓于馬列主義），不愿以階級覺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煩于官僚主義。 [(690)](#_687_2) 《真理報》總結這一新氣象，在1944年6月主張，“評判黨員的個人素質”，與其看他的階級出身或思想的正確性，“倒不如看他對戰爭努力的實際貢獻”。這與黨的戰前原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軍隊里入黨的拉扎列夫說，布爾什維克思想在戰爭中幾乎沒有發揮影響，戰前的口號鼓吹對斯大林和黨的崇拜，但到此時，已喪失了說服力和針對性：

有傳說稱，士兵發動攻擊時高呼“為了斯大林！”，但在事實上，我們從沒提到斯大林。我們沖鋒時，叫喊的是“為了祖國！”，其余的打仗口號都是罵人的臟話。

戰爭帶來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詩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親愛的約瑟夫·斯大林！

時至今日你已丟棄塔林！

我們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將失去列寧格勒城！ [(691)](#_688_2)

許多人在戰爭時期解脫了對政府的恐懼。他們被迫不顧政治后果，徑自采取行動，這也許是他們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戰爭的“真正恐怖”攫奪了他們的全部注意力，而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潛在恐怖，反而變得不那么張牙舞爪，或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應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記錄的交談中，一名猶太科學家憶起戰爭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間睡覺……半夜里，契卡的人來把我叫醒，我卻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門，把我吵醒，而我卻一點也不怕。如果發生在30年代，我早就嚇得半死。如果發生在戰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會把人嚇得膽戰心驚……但在戰爭期間，我絕對不怕，那是我們歷史上的獨特時期。 [(692)](#_690____Guan_Yu_Dang_De_Si_Xiang)

在很大程度上，新興的自由感來自1941年之后政權放寬對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敵”的子女。他們如愿意或勝任在戰時急需的領域中工作，污點履歷不再是一大障礙，與戰前沒法比。雖然沒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務實的官員通常會對申請人的社會背景視而不見。

葉夫根尼婭·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官員家庭。父親兩年后作為“德國間諜”被捕并遭槍決；母親獲刑5年，被送去科雷馬勞改營。葉夫根尼婭只得去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與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與姨媽一起生活，獲準成為學校的借讀生。她的老師們賞識她的潛質，刻意予以保護。1944年夏季的一天，葉夫根尼婭經過莫斯科大學，看到一張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報該校的物理系。她從來都不喜歡物理，也不特別擅長，但很清楚，這是她進入蘇聯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學的良機。在姨媽的鼓勵下，她決定試試。葉夫根尼婭回憶：

我僅16歲，在申請表格[一定要填寫的]中并沒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寫父親已死……我想，他們還是會收我的，因為想學物理的人太少了，而當時，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學家。 [(693)](#_690_2)

戰爭年代向安東尼娜·戈洛溫娜提供了類似的機會，她就是那位掩飾自己出身的“富農”的女兒。安東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寧格勒醫學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請，盡管高中成績完全符合醫學院的要求，仍被拒絕。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會出身。戰爭的爆發結束了她的夢想，因為列寧格勒已陷入圍困之中。安東尼娜在佩斯托沃鎮的村校擔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該校一名學生曾是她的老同學，建議她去試試，因為該校需要醫生，已放松了錄取標準。盡管有“富農”出身，安東尼娜還是考上了這所大學，很快成為其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教授們全力支持她，為她的社會出身保密。她回顧道：“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憑自己的能力來取得進步。”列寧格勒的圍城解除后，安東尼娜在1944年1月申請列寧格勒兒科研究院，以繼續深造。她沒有列寧格勒居民的護照，雖然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的老師們幫她寫了熱情的推薦信，但“富農”出身仍使她喪失資格。其時，列寧格勒急需兒科醫生，以照看圍城造成的數萬名孤兒病人。建議錄取安東尼娜的官員聲稱：“這個時候，拒收這樣的學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沒有護照，安東尼娜無法正式注冊為兒科研究院的學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為“非法居民”，安東尼娜不能領取助學金、借出圖書、在學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當女服務員來養活自己。1945年，這14名學生總算變得合法，領到護照，正式注冊。兒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務實的共產黨人，代表他們向列寧格勒黨委提出請求，堅稱列寧格勒急需這些學生。對安東尼娜來說，正式注冊大大加強了她的自信，減輕了她在戰前感到的恐懼，讓她認真考慮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以及帶給她家人的影響。 [(694)](#_691____Merridale__Ivan__s_War)

政權在宗教領域的讓步帶來了更廣泛的影響。從1943到1948年（到那時，最重要的讓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寬了對教會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現了急劇的復蘇。數百座教堂重新開放，上教堂的人數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禮、受洗、葬禮都有顯著的復興。

伊萬·布拉金的家庭與教會有密切聯系，他親戚中有幾個神父，妻子拉麗莎也是神父的女兒。20世紀30年代，他們作為“富農”遭到剝奪，流放去了克拉斯諾卡姆斯克，這些家庭關系都被加以嚴密地遮掩。伊萬和拉麗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將圣像藏在箱底，門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則掛上了斯大林肖像。為了避嫌，他們鼓勵子女加入少先隊和參加反宗教活動。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莊的教堂里受洗。該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啟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麗莎從箱底拿出她最珍貴的圣像，掛在房間一角，一半有窗簾的遮掩。她進出房間時，都要在圣像面前畫十字。女兒維拉回憶：

漸漸地，我們開始慶祝宗教節日，媽媽告訴我們個中的道理。她會準備一份特別的菜肴，這在戰爭期間并不容易。她總是說：“我們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懺悔節。如果沒有，那就是大齋期。”我們慶祝圣誕節、主顯節、圣母領報節、復活節及三位一體節。 [(695)](#_691_2)

戰爭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興許是新的言論自由。人們公開講述自己親人的不幸，袒露內心的感受和意見。要是在以前，這種做法絕對不可想象。人們還投入政治辯論。戰爭的不確定性，包括蘇維埃政權的生存與否，消除了他們對談論政治甚至批評政權的恐懼。

維拉·皮羅茨科娃回憶1942年回到家鄉普斯科夫：“每個人都在公開討論政治，沒有任何恐懼。”她記錄了一對姐妹之間的爭論：姐姐22歲，前線軍官的妻子；妹妹17歲，“激烈的反共人士”。當姐姐否認勞改營的存在時，妹妹一臉蔑視：“你竟不知道？全國老百姓都曉得，就你一個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軍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認為一切都很好。”另一個場合中，妹妹批評姐姐對失業的視而不見，盡管幾個親屬在戰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會不知道呢？除非你結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們窮人了。”維拉評論，那位姐夫戰前與大家一起住時，沒人敢如此講話，都擔心他的舉報。 [(696)](#_692_2)

購買食品的排隊長龍是政治討論和抱怨的溫床。憤怒和挫折讓大家團結起來，鼓勵他們勇敢說出（所以排隊長龍中總是有潛伏的舉報人和警察）。一組舉報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隊，他們在1942年4月的匯報中說：“商店用品賣光后，能聽到公開的反蘇議論。”買煤油的隊列中，有一名老漢這么說：“到處都是黨員寄生蟲，都是混蛋！他們擁有一切，而我們工人什么都沒有，只有用于絞刑的脖子。”其中一個女人添油加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面對一個爛攤子。”莫斯科另一排隊中的舉報人，匯報了下列對話：

德羅寧[士兵]：我們現在的生活如果與1929年前的一樣，豈不更好。集體農莊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問——我們打仗，到底圖個什么？有什么需要捍衛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現在才明白，我們其實只是奴隸。像李可夫[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那樣的人，想為我們做點好事，卻被他們撤了。為我們著想的人，還會有嗎？

卡列林[木匠]：他們告訴我們，德國人衣衫襤褸，虱子滿身。德國人確實到了我們的村莊，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們卻看到他們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們都在挨餓，但共產黨人說一切都是欣欣向榮。 [(697)](#_693_2)

舌頭有了明顯的放松。羅扎·諾沃塞爾茨娃回憶起1942年與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剛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從沒質疑過蘇維埃政權。她相信父母是無辜的，但也準備接受“人民公敵”確實存在，以及清洗“異己分子”的必需，這是她1938年的想法。對這位鞋匠的造訪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觀，他在修鞋時大罵蘇維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慘都歸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對羅扎這樣的陌生人，卻以這種方式交流，顯然不考慮其中的危險。他的坦率——她以前從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來，認真思索這些事”。 [(698)](#_694_2)

軍人之間也是批評和辯論的重要舞臺。前線士兵組成的互信的戰友團體，是暢所欲言的安全環境。一位老軍人回憶：“我們大罵領導，為何沒有飛機？為何炮彈不夠？混亂的起因在哪兒？”另一位老軍人記得，士兵不怕講出心里話：“他們很少顧忌……天天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爾·拉扎列夫從前線回來，待在古比雪夫醫院：

像其他士兵一樣，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講什么。我談起軍隊中我認為是丑聞的事，醫院里的醫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頭”。我很驚訝，像其他士兵一樣，已為蘇維埃國家拼死拼活了，應該有發言的權利……我經常聽到來自農村的士兵抱怨他們的集體農莊，聲稱贏得戰爭后，有必要將之廢除。言論自由已達如此地步，發表意見已成家常便飯。 [(699)](#_695_2)

基于這樣的言論，新政治社團的輪廓開始應運而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長，幫助塑造了復蘇的公民精神和國民意識。這種轉變的中心所在，是價值觀的根本變化。戰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氣氛，沒有黨的領導，社團便無法形成。所有公民義務的履行，都要依靠國家的指令。但在戰爭期間，公民義務涉及實打實的東西，即保衛祖國。它讓人們聚在一起，獨立于國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態度。

很多人對此變化發表過見解。作家普里謝維恩在1941年日記中指出：“戰爭開始之后，人們互相變得親近，為祖國的擔憂團結了每個人。”他還認為，戰爭中興起的民族精神已經抹掉了階級的分化。他在1942年寫道：“我現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見的東西，而是我們內心深處的東西。‘人民’不單是農民和工人，甚至不單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那樣的作家，而是我們大家的內在。”其他人通過工作場所中新的團隊精神，來感受這個戰時的民族大團結。阿達·列韋多娃在列寧格勒醫療機構的同事之間發現了新的“親密”，打破了舊的職業等級制度：

醫療機構變成了我們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擔共同的事業和責任，為了我們的機構、病人和同事。這讓我們變得親密無間。幸存于列寧格勒圍城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們屬于一個大家庭。戰爭結束后，它仍與我們同在。

一個步兵排的指揮官聲稱，戰爭使他重新思考人的價值和關系：

在前線，能很快發現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質。戰爭就像一個測驗，所測試的不只是膂力，還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頃刻之間就會顯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憑直覺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弄清他人的真實面目——要是在和平時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難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戰爭變成了一種精神凈化。前幾年，“謊言的不人道”扼殺了所有的政治討論，現在則受到猛烈的沖洗。拉扎列夫評論道：“戰爭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和輕重緩急，使我們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現實。” [(700)](#_697_2)

隨著戰爭接近尾聲，蘇維埃大軍開進歐洲，士兵見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反思變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蘇維埃已集結600萬軍隊，超過東線德軍數量的兩倍。1944年6月，盟軍發動對法國北部的侵入。與此同時，紅軍擊潰白俄羅斯前線的德軍主力，7月3日奪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達普魯士邊境；烏克蘭前線的蘇維埃軍隊，席卷波蘭東部，直撲華沙；在南部戰線，德軍很快崩潰，紅軍橫掃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1944年9月抵達南斯拉夫。蘇維埃的進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烏克蘭方面軍已深入到西里西亞；朱可夫的白俄羅斯方面軍已達奧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蘇維埃士兵去過歐洲。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農民子弟，參軍時只有狹窄的世界觀、蘇維埃農村的習俗和從宣傳中得來的世界形象，他們對將要發現的毫無心理準備。西蒙諾夫觀察到：“歐洲和我們蘇聯在生活水準上的對照，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沖擊。它改變了數百萬軍人的看法。”士兵們看到，普通百姓住著更好的房子；盡管有戰爭和紅軍搶劫，商店里依然貨物充沛；他們在趕去德國的途中看到的私人農莊，即使處于荒蕪之中，仍遠遠勝過蘇維埃集體農莊。任何宣傳都無法讓他們漠視親眼目睹的證據。

與西方的碰撞，幫助塑造了士兵們對自己祖國的期望。農民士兵們相信，隨著戰爭結束，集體農莊將被一掃而光。軍隊里流傳許多此類的傳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對部隊的承諾。士兵們給家人寫信，無數次地重復此事。這些期望傳遍整個農村，導致了農民對集體農莊的一系列罷工。其他士兵還談到重新開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廢除黨支部。導演亞歷山大·多夫任科記得與軍車司機的一席討論，他是一名“西伯利亞小伙子”，時間在1944年1月。該司機說：“我們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變化和改善。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沒有掛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記中記下：“聽到這些話，我感到非常驚訝。人民強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隨處可以聽到，唯一聽不到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領導人圈子。” [(701)](#_699_2)

軍官站在這項軍隊推動的改革運動的前列，公開批評蘇維埃制度，期望改變。1945年，一名中尉寫信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要求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下次會議上，考慮一系列改革”。他去過納粹在波蘭的邁丹尼克集中營，看到德國獨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蘇聯也結束任意的逮捕和監禁。他說，蘇聯有它自己的邁丹尼克集中營。他還要求撤銷集體農莊，因為手下士兵告訴他，那是一場災難。此外，還有士兵要他向主席傳達其他的不滿。 [(702)](#_700____M__Prishvin__Sobranie_so)

很自然，黨領導對心懷改革主張的軍人回國不無憂慮。對喜歡回顧歷史的人來說，它與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侖戰爭有明顯的比照。其時，歸國的軍官人員把西歐的自由主義思想帶回沙俄，隨即激發了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1945年2月，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出席會議的積極分子強烈呼吁，要堅決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戰爭之后，我們的士兵看到法國的生活，拿來與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當時，法國的影響是進步的……十二月黨人看到了反沙皇獨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許東普魯士的莊園優于集體農莊，這種印象可能導致落后人士得出結論：莊園經濟勝過社會主義經濟。但這是一個倒退，因此，必須對此展

開無情的斗爭。 [(703)](#_700_2)

西方思想對黨員的影響引起了特別的擔憂。1945年，蘇聯黨員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軍人。黨領導假設，他們的復員，勢必將危險的政治改革思想傳染給平民組織。

事實上，這些思想早已在民眾中傳播，尤其是在關心政治和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與英美的結盟，讓蘇維埃社會在戰爭結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響。在多年的隔絕之后，蘇維埃城市此時已充斥著好萊塢電影、西方書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國進口貨。數百萬人見識了真正的西方生活——興許不如好萊塢所標榜的，但遠遠超越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宣傳中的慘淡。餐館和商鋪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現，或許在暗示可能恢復像新經濟政策那樣的局面。這一切均在推高人們的期望：一旦戰爭結束，蘇聯的生活將變得更加容易，將對西方更加開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傳專家弗謝沃洛德·維什涅夫斯基，在對外文化關系協會發表講話：

戰爭結束后，生活將會變得非常愉快……與西方將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觸，每個人都可閱讀自己喜愛的，將有學生交流，蘇維埃公民到國外旅行也會變得更加容易。

知識分子公開討論政治改革，不再擔心審查（也許是黨領導批準的，故意提供這樣的誘惑，以維持人們的斗志，直到戰爭結束）。西蒙諾夫回憶：“大部分知識分子贊成自由化，在意識形態上普遍感到樂觀。”對其中大多數人來說，自由化意味著與政府開展有關改革的“對話”。很少人愿意向共產主義專政提出公開挑戰，大多數人只希望在政治決策中能有更多的參與，在內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開放。詩人大衛·薩莫伊洛夫表達了這樣的心態：

在我們的心目中，公民責任包括為政治任務服務。我們相信這些任務的效用……我們感到，如果承擔了公民使命，就有權利獲得政府的誠信……政府的所作所為，需要有一個解釋，讓我們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們當然不希望政府隨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執行人。

甚至經濟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討論主題。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廠是蘇聯最大的汽車制造者，其主管伊萬·利哈喬夫提倡在工業經濟中引進國內市場，讓地方掌握較多的財政自由，通過高工資來刺激工人的生產率——它會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的性質。一些經濟學家也公開批評計劃制度，提出在戰后重返市場，以刺激生產。 [(704)](#_701____GARF__f__9041__op__2__d)

人們在這開放氣氛中變得理直氣壯，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質疑起蘇維埃政權的原則和價值觀。

埃爾加·托爾欽斯卡婭在戰前是個少年斯大林主義者，她記得讓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體事件。在1941年的列寧格勒保衛戰中，她作為共青團的積極分子，與一群大學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戰壕，晚上就睡在戰壕中。其中一人對客觀條件不滿，向領導提出抱怨，結果遭到了懲罰、欺負、共青團會議上的舉報，最終被捕入獄。對埃爾加來說，這種迫害是一大覺醒。她父親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權關于“人民公敵”的宣傳，以為他一定做了錯事。如今，她親眼看到有人無緣無故被捕。她加入一組學生，抗議對朋友的逮捕，卻無濟于事。從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團和共產黨：它們不是民主機構，只是濫用權力的精英小集團。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團，不再參加它的會議。新看法也影響了她對共用公寓的態度。整個列寧格勒圍城時期，她都在那里住：

這是一個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間很少爭吵。但有一個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間，老是與酒鬼丈夫吵，還會遇上家庭暴力。后來，她加入共產黨，突然變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們的房間，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實上，我曾當面告訴她，并不贊同黨的做法。我記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 [(705)](#_702_2)

馬克斯娜·卡爾皮茨卡婭在列寧格勒公共圖書館工作，自從父母被捕以來，一直在共用公寓獨自生活。內務人民委員會傳召她去總部，逼迫她參與對一名退休沙皇軍官的舉報，使她猛然覺醒。那位退休軍官為了取暖，喜歡待在圖書館幫著做些瑣事。由于馬克斯娜的拒絕，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審訊員轉而把矛頭指向她，說這沒什么奇怪，因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敵的女兒，是在同病相憐”。這種侮辱激起了馬克斯娜心中無比的憤慨，既出于內心的正義感，也出于捍衛無助軍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卻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氣得撕心裂肺，對他說，沒人證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敵人，而他講這種話，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來，一切都豁然開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說出口！只是年輕氣盛才讓我這么勇敢！他一躍而起，向我走來，似乎想揍我。毫無疑問，他已習慣于打人。我站起來，抓住自己的板凳準備自衛。如果沒有那條板凳，他一定會動手的，他慢慢冷靜下來，在桌旁坐下，詢問我的證件。

幾天后，馬克斯娜收到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勒令她離開列寧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馬克斯娜回憶：“列寧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離開是不可思議的。我想，為何要走？我只有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內]，讓他們來抓我好了，我才不會離開。”第二天，馬克斯娜得到了資深圖書管理員柳博芙·魯比娜的幫助。她是一名勇敢的黨員，在戰爭期間和戰后保護了許多列寧格勒居民避開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恐嚇。魯比娜認識馬克斯娜的繼父——原區委書記——認為他是個好人。她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猶恐怖中失去更多親人）。馬克斯娜回憶，她直言不諱，“批評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時毫不顧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動物’”。魯比娜在自己辦公室里為馬克斯娜設立了簡易床鋪，讓圖書館人員別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來是一個很勇敢的舉動，很可能使魯比娜入獄。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馬克斯娜躲了將近一年，卻沒有人透露半點風聲。馬克斯娜回憶：“她照顧我，把我當做自己的孩子。”對馬克斯娜來說，她們在辦公室里的交談仿佛是政治教育課，讓她與父母的價值觀重新連接起來，而父母從未如此暢所欲言過：

魯比娜是個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堅強，滿心共產主義理想，熱衷于為大家伸張正義。她對我開誠布公，無話不談——不僅僅是關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訴我，集體化是可怕的錯誤，毀了國家。她談到，白海運河和其他建設項目全靠囚犯建成……她還談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說我父母都是無辜的。我不理解的東西，她會逐一解釋。有時她會談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會背叛她，不會向人透露一個字。她對我說的都是心里話。 [(706)](#_703____Seniavskaia___Dukhovnyi)

五

西蒙諾夫趕到柏林，為了戰爭的最后一役。他在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坦克，更多的坦克，裝甲車，喀秋莎火箭炮，數千輛貨車，各種口徑的大炮。”

在我看來，不是某師或某軍團，而是整個俄羅斯武裝部隊，從四面八方攻進了柏林……在碩大卻沒有品位的威廉一世紀念碑面前，一組官兵正在拍照。一次5人、10人、百人；有的挎槍，有的沒有；有人筋疲力盡，有人在哈哈大笑。 [(707)](#_704____T__Dunmore__Soviet_Polit)

5天后，西蒙諾夫在卡爾霍斯特鎮報道德國投降條約的簽署，然后返回莫斯科，參加勝利慶典和游行活動。

莫斯科的市中心擠滿了士兵和平民，趕來參加5月9日的慶祝活動。塞繆爾·拉斯金的侄子馬克，看到美國大使館外的鼎沸人群而變得目瞪口呆。他們聚集在馬涅斯廣場上，高舉自制的標語牌，表示對盟國的支持，看到美國外交官和士兵（其中多人還拿著威士忌酒瓶）從窗戶和陽臺向外揮手致意，更發出歡愉的狂呼。在他看來，這是自1917年以來最近似于“爭取民主的街頭游行”的一件事。之后，馬克返回位于西夫切夫―弗拉熱克大街的拉斯金公寓，參加家人的慶祝活動。拉斯金一家——塞繆爾、貝爾塔、法尼婭、索尼婭、熱尼婭和她兒子阿列克謝——1943年都從車里雅賓斯克返回莫斯科。馬克回憶：“我們為勝利干杯，為斯大林干杯（這是官方規定的），大家心中充滿了喜悅。”那天晚上，莫斯科市中心有更多的人向一國之父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致敬。該肖像升起在克里姆林宮上方，由投影機照亮，周圍數英里之內都可看到。 [(708)](#_704_2)

6個星期后的6月24日，紅場上舉行正式的勝利游行。朱可夫元帥騎在一匹白色阿拉伯駿馬上，在瓢潑大雨中率領部隊和坦克邁進廣場，軍樂隊奏起格林卡的愛國贊歌《榮耀歸你》（Slavsya！）。兩百名士兵攜帶納粹旗幟，游行至列寧墓前，轉身面對斯大林，將旗幟擲到地上。在高級指揮官的盛大宴會上，斯大林發表了著名的祝酒詞，獻給“幾千萬簡單、普通、謙虛的人……他們是偉大國家機器中的小小螺絲釘（vintiki），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的元帥、各方面軍和軍團的指揮官，都分文不值”。 [(709)](#_705_2)

蘇維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悅迎接勝利。僅在這一時刻——或許在斯大林的整個統治時期僅有這個時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團結。甚至古拉格勞改營的囚犯，也以愛國熱情迎接戰爭的結束。他們認為自己也作出了貢獻，毫無疑問，更在期待自己的大赦。一名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囚犯，在5月9日晚上寫給兒子的信中說：“我的一生從沒吻過那么多人，純粹是出于快樂和幸福。”

我甚至吻了男人。我們分離7年半以來，這還是頭一次，我全然忘卻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定居地[監獄區域的外圍]的人們奏起了手風琴，還有年輕人在跳舞。好像我們并不是羈絆于此，而是與你同在。 [(710)](#_706_2)

士兵逐漸回國，許多男女為適應平民生活而承受巨大周折。從戰場回來已是殘疾人的有200萬，他們領取微薄的津貼，很難找到工作，受到蘇維埃當局犯罪般的忽視，很多人最終淪為大街上的乞丐。更多的人自戰場返回，患有心理創傷，如戰斗造成的心理壓力、對戰爭心有余悸以及精神分裂等。但這些疾病，很少獲得蘇維埃醫學界的承認，退伍軍人自己又過于堅忍，不愿報告自己的狀況。究竟有多少患者，一直無法弄清。 [(711)](#_707_2)

就其他人而言，回歸“正常生活”帶來了諸多的失望。不再有家園和親人，難以與朋友和親戚溝通戰爭經驗，不再有同志友誼，前線戰友之間的相互理解不復存在——這些導致了戰后歲月的普遍抑郁。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紀90年代寫道：“我的大多數老戰友，要么酗酒致死，要么在戰爭結束時自殺——最近還有人自殺。”

我們覺得毫無用處，成了廢人……斯大林只把我們比作一臺機器中的“小小螺絲釘”，我們感到受了侮辱，這絕不是我們在前線時的感受。我們曾認為，我們手中掌握了俄羅斯的命運，相信自己是公民，以身作則。

康德拉季耶夫反思那些年，寫道：

我們打敗法西斯，解放歐洲，歸來時卻沒勝利者的感覺。或者說，這種感覺僅持續很短一段時間，即我們對改革仍抱有希望時。這些希望落空后，我們陷入了失望和冷漠的深淵。開始，我們還以為是戰時疲憊所引起的。我們是否真正明白，我們拯救了祖國俄羅斯，同時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權？也許，還不甚明白。即使看到這一點，我們還是會以同樣方式誓死作戰的。在自家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間，我們寧可選擇前者。因為，忍受自家人的暴力，要比忍受外國人的，更為容易。 [(712)](#_708_2)



安東尼娜·馬茲娜及她女兒瑪琳娜和瑪琳娜·伊利納（左），1944年攝于奇姆肯特

家庭的重組比士兵在家書中想象的更為艱巨。情侶不愿等待；女人與士兵一廂情愿的想象并不相符；分離和重聚的壓力導向婚姻的解體。1944年夏天，西蒙諾夫寫了劇本《無可避免》（So It Will Be），講述一名軍官從前線返回莫斯科，妻子和孩子早已消失于德軍占領區，他斷定她們已經遇難，所以與教授的女兒結婚，重建新的生活。劇本的中心思想是戰后的當事人必須隨遇而安，與《等著我吧》的主題，竟相差十萬八千里。

戰爭結束正好遇上古拉格囚犯的第一批大釋放。1937至1938年判刑8年的數百萬“政治犯”，期滿釋放恰好是1945至1946年（1945年之前期滿的囚犯，其獲釋必須等到戰爭的結束）。各個家庭開始重新拼湊，婦女們帶頭奔赴全國各地，尋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前囚犯的居住地有嚴格的限制，大多數不得逗留在主要城鎮。所以，為了全家團聚，不得不搬去蘇聯偏遠的角落。有時，他們能找到的唯一居所仍是古拉格區域。

尼娜·布拉特1945年獲釋于馬加丹勞改營，歷程1.6萬公里，才從雅羅斯拉夫爾孤兒院（女兒在外祖母死后的歸宿）接回女兒伊納薩，與自己一同住在馬加丹勞改營。她在何處定居的問題上別無選擇，釋放時的限制是“100城之外”。這意味著作為前囚犯，她不得在所列的100個城鎮定居。 [(713)](#_710____Chelovek_v_istorii__Ross)

瑪麗亞·伊利納的征途更為艱險。她曾是基輔大型紡織工廠的主管，作為“人民公敵”的妻子被捕于1937年（丈夫是一名高級黨干部），判處8年，流放到摩爾多瓦的波特馬勞改營，到1945年獲釋，就去尋找自己的孩子。她被捕時，2歲的女兒瑪琳娜和兩個兒子弗拉基米爾、費利克斯，都被送去遣散中心。他們的外祖母愛莫能助，她已在照看1936年被捕的姨媽的幾個孩子。弗拉基米爾抵達遣散中心后不久就滿了16歲，結果作為“人民公敵”獲刑5年，被送去馬加丹勞改營。費利克斯去了基輔的孤兒院；瑪琳娜去了附近的布恰孤兒院，1939年又轉去烏克蘭首都以南200公里的切爾卡瑟孤兒院。瑪麗亞從波特馬勞改營寫信給蘇聯各地官員，打聽孩子的下落，但找不到弗拉基米爾——他死于馬加丹勞改營，而且沒有記錄，時間約在1942年之前。瑪麗亞花了整整18年時間才找到費利克斯，他在戰爭爆發后，隨孤兒院一起撤到哈薩克斯坦西部的捷列克蒂地區。她在1943年獲悉，費利克斯12歲時逃離孤兒院，好幾個月在外流浪，結果到了2500公里之外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地區，在偏僻的切勒姆霍沃小鎮的一個工廠找到一份工作。

瑪琳娜的運氣不錯。切爾卡瑟孤兒院的醫生安東尼娜·馬茲娜有個妹妹，湊巧也在瑪麗亞的勞改營。通過她，瑪麗亞從孤兒院員工那里，定期了解自己女兒的健康狀況。瑪琳娜抵達布恰孤兒院后不久就患上猩紅熱病，幾近死去。她轉到切爾卡瑟孤兒院后，獲得安東尼娜的精心調養。安東尼娜甚至把瑪琳娜帶回家，與自己女兒（也叫瑪琳娜）同住，直到恢復健康，再回到孤兒院。安東尼娜給她送來食品、酥糖、甜食，告訴她這都是母親送來的，但往往不是真的——來自波特馬勞改營的只有不定期的小額匯款（尚有一些食品包裹來自外祖母，直到戰爭爆發）——但醫生懂得，小女孩如想活下去，需要有點希望，需要相信自己有一位慈母。瑪琳娜回憶：“我對母親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不懂什么是母親，但孤兒院里的大齡孩子，經常會談論自己的母親，贊美她們的慈愛——她們會談及戰前的快樂，從不挨餓，總有面包、黃油、甜食——在我腦海中，這些甜食、巧克力、酥糖，成了我想象中理想慈母的符號……這不是別人給的甜食——而是“媽媽的甜食”。 [(714)](#_710_2)

1941年，切爾卡瑟孤兒院疏散到哈薩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由于有孤兒院員工的來信，瑪麗亞仍與女兒保持聯系。瑪琳娜還太小，不會自己寫信（她要等到10歲才開始上學），所以由保育員代寫，并加入標準的措辭，以維護孤兒院的正面形象：

1944年1月1日，奇姆肯特

向瑪麗亞·馬爾科夫娜致敬！

我代你女兒瑪琳諾奇卡給你寫信：“媽媽，我仍記得你。你會馬上回家嗎？我非常想你。我的生活很好，他們讓我們吃得不錯。我會唱歌跳舞，不久就要上學了。媽媽，寄一張照片給我吧。再見，我吻你，你的女兒瑪琳諾奇卡。”

我問她，還有什么要說的，她說這就夠了。她身體健康，過得愉快，受到我們小集體中所有孩子的愛護……我們也定期寫信給她在基輔的外祖母。私人攤位的照相費是22個盧布……如果想要，請寄錢來……

保育員亞歷山德拉·扎哈羅夫娜·格拉西姆丘克 [(715)](#_711_2)

孤兒院在1945年遷回，但沒去原先的切爾卡瑟，而搬至利沃夫附近一個大莊園遺址，在烏克蘭與波蘭的交界處。安東尼娜消失了，瑪琳娜仍在等待母親的出現。她回憶：“我從沒見過她的照片，不知道她長什么樣。但我覺得，就像別人等待上帝一樣，我在等待母親，我的救世主。”其他的母親陸續來到孤兒院，領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對他們極為嫉妒，一直在夢想，下次會輪到我。”瑪琳娜并沒意識到，這些孩子與自己不同——她們的父母不是“人民公敵”，與子女的分隔只是由于戰爭——但她聽到保育員在孤兒院的“竊竊私語”，記得“人民公敵”一詞，知道它是指“不能談論的壞事”。整個1945年，瑪琳娜不斷寫信給母親。她已在孤兒院讀二年級，可以自己動筆寫信。通常情況下，老師告訴孩子寫什么，包括一些標準措辭，讓父母知道她們在孤兒院很快活。但瑪琳娜的信表達了決然不同的情緒，她在8月17日寫信給母親：

媽媽，你好嗎？媽媽，請給我寫信，只要一封就夠了，讓我知道，你已收到我的信。我已給你寫了7封，也許你一封也沒收到。媽媽，我很好，沒生病。這里已是冬天，很冷。即便如此，我們還要上課。媽媽，來看我，或盡快派人來接我，我在這里已經住膩了……其他女孩不會打我，但也有互相打架的。媽媽，我想你會在春天來接我。

瑪琳娜不知道與母親在一起將意味著什么，只是在孤兒院感到很不愉快。她推測，像其他孩子一樣，她也是因戰爭而與母親分離的，現在戰爭結束了，母親就會來接她，然后，她就能享受其他孩子講述的戰前與大人共度的幸福生活。 [(716)](#_712_2)

1945年底，瑪琳娜的母親從勞改營獲釋，但不準返回基輔，尋找孩子時，只得借宿在各地的朋友家。她侄女的丈夫是黨內積極分子和歷史學家，介紹她與詩人巴甫洛·狄青納聯系。狄青納屬于烏克蘭首都的斯大林精英團體（私下仍對現政權不滿），幫助她發現了瑪琳娜的下落。瑪琳娜還記得母親的到來，所乘坐的汽車由專職司機駕駛，那通常都是政府官員使用的。一群孩子聚集在入口處，看看誰來接這位幸運的女孩。

“有人來找你了。”每個人都來告訴我……我走了出來，看到一名陌生女子，竟然手足無措。如果奔上去擁抱她，我害怕因此而受到懲罰。我知道，保育員并不喜歡孩子熱情擁抱來接他們的人，這樣做，有損于孤兒院的名聲。我們必須讓來客覺得，這里一切都好，我們都舍不得離開……其實我也很害羞。媽媽后來說，見面時沒有喜悅，我好像有點誠惶誠恐。我確實害怕一切……我記得當時曾想，可能不會把我帶走，因為沒人告訴我她是我的母親。我不知道她是母親，從沒見過，甚至從沒看到一張母親的照片。她已經不年輕，頭上戴著舊頭巾，仿佛是借來的，使她顯得莊重。她打扮得不像貴婦人，沒有皮草、帽子、漂亮的裝飾。她看上去貧窮潦倒，落落寡歡，活像一個老太太，不像一個母親，至少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腦海中的母親該是怎樣呢？衣冠楚楚，年輕漂亮，容貌出眾，活力四射……但這個女人，卻頭發斑白。 [(717)](#_713_2)

瑪琳娜的母親把女兒帶到利沃夫城，住入酒店，早餐吃軟面包和可可飲料。瑪琳娜第一次體驗如此的奢侈，終生不忘。幾天后，她們回到切爾卡瑟，住在集體宿舍的一個小房間。瑪琳娜繼續上學，但要克服她們之間的隔閡卻非常困難。瑪琳娜回憶：“最初幾個星期，我與母親都無話可談。”

我是一個野孩子，來自孤兒院，不喜說話。她并不強迫我，反而有點怕我……也許她在我身上看到了野性的端倪，在思忖應對的好方法……母親后來說，我不但害羞，而且膽怯，猶如驚弓之鳥。她叫我時，我都不會走近，自己也從不主動去麻煩她。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會叫“您”[“你”的敬稱]，不會叫“媽媽”。內心堵著一道墻，阻止我開口。我必須要強迫自己叫“媽媽”——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她們一起住了12年，一直沒能培養親密的關系，她們受傷太深，無法向對方打開心扉。瑪琳娜的母親死于1964年，從沒告訴女兒自己在勞改營的經歷。瑪琳娜回憶：“她太害怕了，以致不敢告訴我。我也太害怕了，以致不敢提問。”她所發現的母親在勞改營的經歷，都來自瑪麗亞在古拉格的朋友。1955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另外還有哥哥。其時，費利克斯再次出現，瑪麗亞也知道了弗拉基米爾已死去。瑪麗亞沉浸在深深的沮喪之中，變得完全龜縮，對過去一字不提。瑪琳娜記得：“我們雖住在一起，卻幾乎鴉雀無聲。”

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始終不明白她為何這么害怕暢所欲言？我覺得，她不想拖累我，希望我幸福，不讓我痛心疾首于我家在蘇聯的遭遇。她知道，我們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不公正的，但不愿讓我也有同感。 [(718)](#_714_2)

[[1]](#_1_20) 這里的三角關系被稱為“Union of Serova, Simonov and Rokossovsky”，也可縮寫為USSR。——編注

[[2]](#_2_20) 此處的《等著我吧》，采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資深翻譯家蘇杭的譯文。——譯注

[[3]](#_3_17) 根據1998年出版的回憶錄，她在1937年嫁給身為知名作家、《真理報》記者的戈爾巴塔夫，希望獲得保護（她父親作為一名沙皇軍官曾在1925年入獄，到1937年，又與她的祖母一起被捕，被送進勞改營。當時她正在拍電影，卻因此被解雇，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在之后的10年中，這對夫婦享受著蘇維埃精英的奢華生活，經常出席克里姆林宮的招待會。塔蒂亞娜的美貌，受到內務人民委員會主管拉夫連季·貝利亞的垂涎。1947年，她被貝利亞強奸多次，此丑聞在蘇維埃領導人圈子中眾所周知。奧庫涅夫斯卡婭在回憶錄中聲稱，戈爾巴塔夫并沒保護她，因為他剛剛晉升為中央委員，不想制造麻煩。塔蒂亞娜變得狂野，心直嘴快，在克里姆林宮招待會上肆意酗酒，舉止輕率。戈爾巴塔夫擔心妻子被捕，懇求她申請入黨以自救，卻遭到她的拒絕。據奧庫涅夫斯卡婭說，戈爾巴塔夫為了明哲保身，遂向當局提供她的活動證據。塔蒂亞娜被捕，以間諜罪獲刑10年，被送去科雷馬勞改營（她經常出國，與外國男子的風流韻事時有所聞，包括南斯拉夫總理約瑟普·鐵托）。奧庫涅夫斯卡婭的被捕，成為西蒙諾夫夫婦頻繁發生爭執的起因。奧庫涅夫斯卡婭在回憶錄中表達了對西蒙諾夫的深刻敵意，稱他和戈爾巴塔夫都是討厭的黨內野心家。她還回憶了與西蒙諾夫的首次見面，那是1937年在佩列杰爾基諾地區。她聲稱，他曾試圖強行與她上床，把他描述成（戈爾巴塔夫的朋友中）“最叫人討厭的人，粗魯、遲鈍、缺乏優雅、骯臟、邋遢”。但這個形象，與西蒙諾夫在他人眼中的儒雅可敬，大相徑庭。[T. 奧庫涅夫斯卡婭《塔蒂亞娜的一天》（Tat’ianin den’），莫斯科，1998年，第65—66頁]

[[4]](#_4_14) 1988年之前，蘇維埃公眾一直不知道這項命令，它的公開屬于開放政策的一部分。它當初傳達至蘇維埃軍隊各單位是在1942年。

[[5]](#_5_13)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羅斯軍隊曾在喀爾巴阡山投入戰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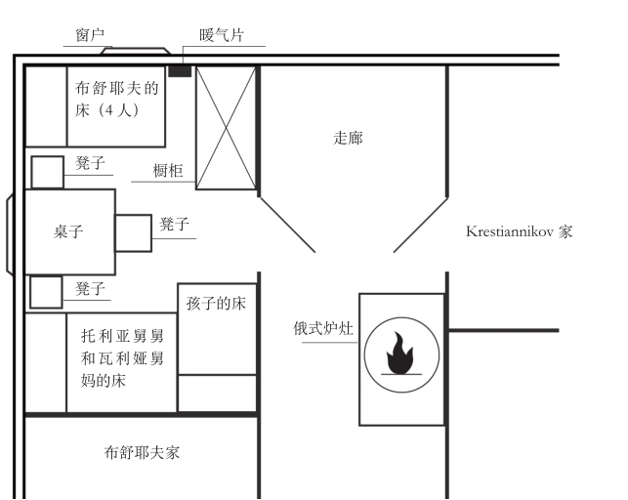
[[6]](#_6_13) 在戈洛溫家，尼古拉的4個兒子有3個死于1941年的戰斗：伊萬（當時34歲）、尼古拉（28歲）和阿納托利（21歲）。

#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5—1953）

一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從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返回彼爾姆。季娜伊達和3個孩子——奈莉、安吉麗娜、斯拉瓦——搬入蘇維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與季娜伊達的母親、弟弟托利亞、弟媳婦以及弟弟的兩個幼兒，擠在一個11平方米的小房間。季娜伊達和3個孩子睡一張單人床，托利亞和妻子帶著女嬰睡另一張床，外祖母和托利亞的另一個孩子同睡。當時10歲的安吉麗娜回憶：“我們擠在一起，真是一場噩夢。我都不知道如何熬過來的。”布舒耶夫一家從勞改營回來時，所有財產僅夠裝一個口袋。當時12歲的奈莉回憶道：“我們一無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親常說：‘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鋪的一天。’”她們居住的社區一派敗落，自戰爭爆發以來從沒任何修繕，水電全無，房頂坍塌，污水處理系統失效，到處可見害蟲。

彼爾姆遠離戰場，未遭轟炸，但像后方許多城市一樣，因大量撤入者給住房、食品、燃料帶來極大壓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變成了種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區沒有汽車，只有工廠附近有幾輛卡車跑動。城市的木道、長凳、圍欄及絕大部分的樹木都已消失，變成了柴火。 [(719)](#_716_2)



1946—1948年，布舒耶夫一家所住的角落房間圖示，位于彼爾姆的蘇維埃街77號的一座共用公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其他國家比蘇聯承受的損失更慘重。 [[1]](#Ba_Gong_Zao_Dao_Le_Zhen_Ya__Dan) 根據最可靠的估計，從1941到1945年，2600萬蘇維埃公民喪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萬士兵受傷（蘇維埃當局承認的數字遠遠低于此數 [[2]](#_1_25) ），400萬人失蹤。戰爭給蘇聯人口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18歲到45歲之間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戰爭結束時，這個年齡段的女子是男子的兩倍。在激烈戰斗的地區，如斯大林格勒、沃羅涅日、庫爾斯克、克拉斯諾達爾，這個比例高達3∶1。農村的不平衡尤其嚴重，許多農民士兵選擇不回去，留在城鎮落戶，因為那里的工廠需要人手。有的村莊，當初離家奔赴前線的士兵竟一個也沒回來。自那以后，蘇維埃農業從沒獲得真正的恢復，集體農莊里只有婦女、兒童和老人。 [(720)](#_717____MM__f__12__op__16__d__2)

戰爭對物質條件的破壞是空前的：7萬個村莊、1700座城鎮、3.2萬家工廠、4萬英里的鐵路，均遭摧毀。在德軍占領地區，一半住房受損或遭毀。1945年，尚算不上受損最嚴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沒有暖氣，48%的建筑物沒有自來水和下水道。從整體來說，戰爭造成2000萬人無家可歸。農村的生活水準逐步下降，大批農民因此遷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機，蘇維埃當局卻步履蹣跚。甚至到20世紀50年代，仍有數百萬人生活在廢墟、地下室、窩棚和地穴中。

西蒙諾夫1947年成為斯摩棱斯克地區的蘇維埃代表，收到數百份要求解決住房的申訴信，很典型的一封信來自1946年轉業的一名黨員軍官。他一家6口，包括3個幼童和年邁的母親，住在卡盧加城一間沒有暖氣的地下室，屋頂漏水，墻壁滲水。1941年，他們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蝸居于此。他申請新的住所足足花了兩年，卻面對蘇維埃當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諾夫的幫助下，他終于獲得了將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諾。但由于官僚機構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 [(721)](#Di_Qi_Zhang__Pu_Tong_De_Si_Da_Li_1)

戰后的蘇維埃經濟處于災難之中。1945和1946年的兩次歉收，將蘇聯帶到饑荒的邊緣，至少有1億人營養不良。從1946到1948年，確有饑荒發生。在受災最嚴重地區，譬如烏克蘭，約有200萬人死于饑餓。 [(722)](#_720____E__Zubkova__Russia_After) 消費品的生產在戰爭中基本停頓，工業生產全部面向軍需。盡管宣傳機構允諾將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戰的現實意味著：在未來10年中，蘇維埃工業的主要優先仍是鋼鐵、能源和軍備。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別是像彼爾姆一樣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襤褸，腳登破破爛爛的鞋靴。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在國家保險機構的辦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糧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設法讓奈莉也去上班，當一名辦公室的信差。這意味著她們可拿到第二張配給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僅能吃上面包、湯和土豆，但買不起肥皂。國營商店里根本沒有肥皂，只能去農村買，全是農民非法制造和銷售的。家里3個孩子只有一雙鞋，輪流穿了去上學。季娜伊達的工資不夠為孩子買衣服，只好去市場買碎布來自己縫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門。安吉麗娜回憶，姨媽有一次邀請她們上劇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質條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尷尬的羞澀。

我們去不了劇院，太羞愧了。我腳上是一雙花邊帆布涼鞋，四季不換，僅花了3個盧布；身上是媽媽1946年為我做的棉布連衣裙，但買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質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貨。 [(723)](#_721_2)

1945年9月，黨中央專門設置一個委員會，調查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地區國防工廠的一系列罷工和示威——當時有許多此類的工人抗議運動。該委員會的結論是：罷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費品的長期短缺，損害了工人的尊嚴。對于鄂木斯克174號工廠1.2萬名工人的罷工，委員會是這樣匯報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亞麻布。1945年，每個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雙鞋。1944年，450名兒童因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無法上學。今年，處于這種窘態的兒童上升至1300人。許多工人衣衫襤褸，無法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工人的家里沒有餐具、廚具、勺、杯、碗、凳子、臉盆、足夠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糧會有長時間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幾乎都領不到肥皂、鹽或煤油。 [(724)](#_721_2)

人們因戰時經驗而壯膽，不再害怕表達心中的不滿。1945至1946年，僅俄羅斯共和國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就收到50多萬封蘇維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國家的宏觀形勢。一名工人甚至在憤怒的信件中大膽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這就是我們得到的！這就是斯大林的第4個五年計劃中，你們所謂的國家在物質生活上對勞動人民的關心！我們現在才明白為什么沒有召開這些問題的討論會——因為，它很容易演變成反抗和起義。所有的工人都在問：“我們打仗，到底圖個啥？” [(725)](#_722_2)

在戰爭的尾期，人們堅信蘇聯的生活將有好轉。作家伊利亞·愛倫堡寫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贏得勝利，就會看到真正的幸福。當然，我們知道，國家受到了摧毀，變得貧窮，必須努力工作。我們對金山銀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勝利將帶來正義，人的尊嚴將戰勝一切。

對改革的期望，更強烈的獨立意識，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來自與歐洲的碰撞和西方書籍、電影）……這一切激發了新興政治團體的振奮和躁動。人們經過了戰爭洗禮，拋棄舊日的恐懼，交談得更加自由。在退伍軍人俱樂部、學生會議場所、咖啡館、啤酒廳，人們盡情享受自己在戰爭中初嘗的自由，談論必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層圈子中，變化也被認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資深將軍在私人電話交談中告訴另一位：“千真萬確，大家都在公開表達對生活的不滿，到處都可聽到。”這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在1946年的竊聽錄音。政治局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在回憶錄中提及，他當時相信，隨著戰爭的結束，蘇聯將返回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 [(726)](#_723____MP__f__4__op__2__d__2__l)

反斯大林的意見很少公開發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種族和職業的團體，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團結起來，有時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對政權抱有敵意。列寧格勒戰時的圍城經驗，培植了該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強烈情緒。在他們的眼中，這既是公民獨立的標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宮的象征。這種異議巧妙地體現于圍城的傳說、獻給受害者的公共紀念碑以及俚語、笑話、軼事之中。

瑪麗安娜·戈登1945年從撤退地車里雅賓斯克回到列寧格勒，其時17歲。她的父親在整個圍城期間一直留在列寧格勒。他是蘇維埃貿易代表團的翻譯，又是一名活躍的神智學者，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獄。這次回來，瑪麗安娜注意到，父親在表達對斯大林政權的厭惡時已變得更加開放。她回憶起父親1945年的一次評論，如果是在戰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絕不允許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機響著，父親躺在床上看書，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維坦出場，唱起一首當時無處不在的歌曲《光榮屬于斯大林同志！我們偉大的領袖》。爸爸說：“瑪麗安娜，掐死這個漢斯·薩克斯！” [[3]](#_2_25) 他只是要我關掉收音機，但我仍大吃一驚。到那時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勝利締造者的解釋。盡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話卻加深了我的懷疑。 [(727)](#_725_____Iz_suzhdenii_sovetskikh)

懷疑和異議在戰后的學生社團里獲得了突出的發展，公開的反對更為常見。戰爭期間長大的一代學生，與1941年之前長大的相比，思想更為獨立。在戰爭中，許多年輕人已接觸到成人世界，經常聽到對政權的批評。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但他們的親身經歷使自己養成了特殊的獨立個性，并與蘇維埃的宣傳和共青團的循規蹈矩保持一定的距離。瓦倫蒂娜·亞歷山德羅娃的父親是布爾什維克的官員，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進了列寧格勒理工學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學中的價值沖突：

我們追隨那個時代的精神，肯定是愛國者，我們偉大的祖國剛剛贏得戰爭。我們把自己當做青年近衛軍，并以此名義成立了一個俱樂部。 [[4]](#_3_22) 但我們反對在社會上親眼目睹的腐敗——某女孩學習不好，但得到好成績，因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師的女兒，諸如此類。我們不喜歡的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情形：強制我們參加黨史講座；教師讓我們在練習簿封面上寫下各自的共青團員證號；對我們的宣傳努力缺乏誠意。在我們看來，共青團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們避而遠之，在理工學院內自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討論各種政治思想。如果有人聽到談話內容，我們可能會被捕。我們之間的危險談話，讓我們團結得更加緊密。在我們圈子里，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我們團體的標志。有人喝了幾杯后會變得非常大膽，諷刺地提出干杯：“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團。 [(728)](#_725_2)

這樣的非正式學生團體有很多，大多數只是討論小組，鼓勵大家既閱讀官方批準的書籍，又作出獨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團體，信奉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新生，來對抗他們看到的“野心家”對共青團的主宰，通常受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監視。這些團體很小，只有很少的學生成員，所表達的意見卻得到許多年輕人的贊同。譬如，在車里雅賓斯克城，內務人民委員會發現一個學生小組，他們出版自己的年鑒，登載神秘詩歌和政論文章，呼吁在共青團內恢復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黨委的一份報告發現，這些態度在車里雅賓斯克的學生中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學生們都感到共青團高高在上，未能滿足他們對外國文學、性問題和哲學的興趣。 [(729)](#_726_2)

1945年，艾萊娜·舒瓦洛娃與母親從疏散地返回列寧格勒，開始上大學。20世紀30年代，由于父親與他身在德國的母親仍有書信來往，全家流放到沃羅涅日城。艾萊娜的父母于1939年離婚，在流放中長大的恥辱已給艾萊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話，使她變得更加“內向”，并“在心中抗拒蘇維埃制度”。母親是專繪斯大林肖像的藝術家，家里沒外人時，常對斯大林作為一國之父進行嘲諷，更加深了艾萊娜心中的抗拒。她從小由母親帶大，要“相信上帝，始終講真話”，感到自己越來越疏遠于大學環境，不得不隱瞞自己的過去。對她來說，開放和直率成了她堅持自己個性的代名詞。她與兩個最值得信賴而且均有污點履歷的朋友，自組一個討論小組。她回憶：“我們的初衷是相互之間必須完全坦誠，我們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如何吸引新成員，只想發展‘自己類型’的——而不是循規蹈矩的。”但該小組半途而廢，因為艾萊娜將之透露給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員，嚇了一跳，勸她趕快停止。他還透露了一個家庭秘密，以勸阻她的計劃：艾萊娜的父母在20世紀30年代受到處罰，不只是因為與德國居民通信，更是因為參加了一個秘密的宗教團體。 [(730)](#_728_2)

柳德米拉·埃利亞舍娃1940年進入列寧格勒大學。她的父親兩年前被捕、遭槍決，曾是一名資深的布爾什維克和列寧格勒著名的神經學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隨大學疏散至薩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寧格勒，于1946年畢業。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權的見解。對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響的是列寧格勒大學校長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經濟學家，通過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敵”的子女。他充滿道德勇氣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長得英俊。柳德米拉回憶，沃茲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蘇維埃人，我甚至寫信向他傾心吐膽。在某種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選的父親”。沃茲涅先斯基的講座讓柳德米拉對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權的道德基礎。柳德米拉反思：“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我聽了沃茲涅先斯基的講座，攻讀了馬克思的著作，才開始懂得：真正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思想，與我們在斯大林統治下所經歷的，完全是南轅北轍。我們的任務是返回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父親那樣的人，在那里是不會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會在肖像前，一邊畫十字，一邊自言自語，像是在做祈禱：“卡爾·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與大學朋友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每周在公共圖書館聚會一次。像19世紀地下革命者一樣，學習小組中的友誼全以政治原則為基礎。柳德米拉回憶一個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圖書館，我們幾個人站在樓梯上交談。有人說：“蘇共十九大的召開，為何遇上這么長的延遲？這肯定違反了黨的規章制度！”蘇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過5年[蘇共十九大的最后召開是在1952年]。在我們眼中，這似乎違背了黨的民主原則[從1917到1925年，規定是每年一次；從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這位女孩說：“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這就夠了！”對我來說，她作為一個“人”已不復存在。 [[5]](#_4_19)

學習小組開始閱讀課堂教材之外的文學作品，像后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樣，也想找出一種“道德準則”。如柳德米拉所說的，有了它，“即便在一個全然否定道德準則的社會，我們仍可活得更加誠實，無需口是心非”。

從馬克思那里我們學到了但丁。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銘“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我們經常討論這一條，得出的結論是，雖然不可完全忽視他人的意見，但應盡量遵循自己的道路，無須犧牲自己的原則，無須追隨大流，人云亦云。 [(731)](#_729____RGASPI__f__17__op__125)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戰后第一次重要講話中直接挑明，蘇維埃制度不會有任何緩和。當時的大背景是愈益緊張的冷戰氣氛。斯大林呼吁蘇維埃人民加強紀律，作出更大犧牲，克服戰爭的破壞，迎接資本主義制度必將帶來的全球沖突（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就會有戰爭，蘇維埃必須做好準備）。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關民主的談論廣為傳播之前，就要發起“猛烈的進攻”。審查制度收得更緊，特別是針對戰爭回憶錄，其中的集體經驗往往提倡改革。 [(732)](#_729_2) 內務人民委員會獲得加強，在1946年3月改組為兩個獨立機構：一個是內務部，以后專管國內安全和古拉格系統；另一個是國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專管反間諜和外國情報的工作。因為政權的敵人其實是“外國間諜”，國安部的任務也延伸到國內監控。戰后幾年雖然沒有達到20世紀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幾萬人被捕——被控在冷戰中站在西方一邊的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 [(733)](#_730_2)

戰爭結束后，斯大林立即在軍隊和黨的領導階層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謂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敵對的權力中心，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威構成了挑戰。斯大林的首要任務是鏟除軍隊高級領導人，他們因1945年的勝利而享有巨大聲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帥更成為改革派的寄托。 [[6]](#_5_18) 國安部開始監聽高級指揮官的電話交談，專為朱可夫建立了一個檔案，因為他的聲望氣勢已達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國的蘇維埃占領區的軍事長官，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攬下了蘇維埃勝利的主要功勞。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慚，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軍事委員會的審訊。會上，有政治局委員譴責他給蘇維埃國家帶來了波拿巴式的威脅（但除了一名將領，其余的都為他說了好話）。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職為敖德薩軍區司令，后來又被送去烏拉爾，擔任一個卑微官職（原本可以更糟，因為有謠言稱，朱可夫試圖發動反斯大林的軍事政變）。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蘇維埃的報刊，更被剔出偉大衛國戰爭的蘇維埃歷史，而斯大林成了勝利的唯一指揮者。其他普受歡迎的軍事英雄，一一難逃類似的命運：前參謀長安東諾夫元帥，外放去了外高加索軍區；羅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龍諾夫、瓦圖丁等人，被刪出官方的戰爭記錄；從1946到1948年，還有數名高級指揮官，以莫須有的叛國罪名，遭到處決或監禁。 [(734)](#_731_2)

斯大林還把矛頭指向列寧格勒的黨領導。這座城市亟想擺脫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滿了文學藝術的活力，以19世紀的歐洲價值觀為基礎，逐漸成為知識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壘。列寧格勒的黨領導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術官僚，相信蘇維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戰爭期間晉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寧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諾夫的提攜。戰后，日丹諾夫負責黨組織，還掌管意識形態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臟病時，政治局成員中的列寧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他們曾被廣泛認作斯大林的潛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寧格勒大學的校長一樣，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經濟學家，年輕有為，充滿活力，英俊瀟灑。作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他是蘇維埃戰時經濟計劃的主要策劃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經濟政策的思路， [[7]](#_6_18) 試圖讓蘇維埃工業的重建更趨合理化。當年，為振興遭受內戰破壞的國家，新經濟政策曾立下汗馬功勞。庫茲涅佐夫是負責安全事務的中央委員會書記，但他的聲譽鵲起主要歸功于他在列寧格勒圍城時的軍事業績。這是他在列寧格勒普受歡迎的主因，卻成了不斷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前去檢查列寧格勒的黨組織工作。他是共產黨書記處的主管，又是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死敵。馬林科夫的借口是調查區黨委操縱選舉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寧格勒的權力基礎，首當其沖的是“列寧格勒保衛戰博物館”。該館的展品把圍城的歷史，當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體行為，基本上獨立于黨的領導之外。結果，博物館關閉，負責人被捕，珍貴的個人文件和回憶錄全遭銷毀，仿佛是在抹去該城的獨立、英勇的印記。1949年8月，在所謂的“列寧格勒案件”中，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和其他幾位特立獨行的列寧格勒官員，包括列寧格勒大學校長，全都被捕，遭到莫須有罪名的指控（從英國間諜到花天酒地）。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審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槍決。

與戰后政治壓制配對的是計劃經濟的卷土重來。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講中警告，國際形勢的緊張不會減緩；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計劃，以巨大的建筑項目來恢復國家的基礎設施。工業生產的目標定得如此離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須成為勞動模范。蘇維埃的宣傳連哄帶騙，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時間的犧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諾，辛勤工作將獲得廉價消費品的獎勵。然而，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很難相信如此的允諾。少數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買到，也價格奇貴，無疑在降低實際的工資收入。為了應付通貨膨脹，政府在1947年推出貨幣改革，10盧布舊幣只能交換1盧布新幣，從而大大消減了農民的消費力。戰爭期間，對小額貿易的限制有所放寬。農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積累了一定儲蓄，然而遇上這次貨幣改革，卻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 [(735)](#_732_2)

在戰后的蘇維埃經濟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廚房內閣”的命令，強制勞役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隨著戰爭的結束，可供國家開發的無償勞動力得到了快速增長。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來的勞動大軍，還有200萬德國戰俘、100萬其他軸心國家戰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礦、建筑，其中懷有技能的，偶爾也會受雇于蘇維埃工業部門。在有些工廠，德軍戰俘在生產過程中變得不可或缺，拘留營干脆就建在工廠之內，管理人員更試圖阻止戰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釋放了很多人，但從1945到1950年，勞改營又收進100多萬新囚犯，主要依靠對“民族主義者”的大肆搜捕（烏克蘭人、波蘭人、白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和愛沙尼亞人）。他們的領土被紅軍奪回，卻從沒真正融入蘇維埃的政權體系。古拉格系統擴展成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擁有67個綜合企業、1萬個單獨勞改營和1700個殖民營，到1949年共雇用240萬名勞工（戰前是170萬）。就總體而言，從1945到1948年，估計蘇維埃工業勞動力的16%—18%是強征的勞工。他們主要在寒冷和邊遠的地區開采貴金屬，當地的自由勞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貴的（因此，強制勞役對蘇維埃經濟的貢獻，遠遠高于統計數字所提出的）。奴役勞動也參與了20世紀40年代末的大型建設項目。那些項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戰后的信心和蘇維埃制度的成就：伏爾加至頓河的運河、古比雪夫水力發電站、貝加爾至阿穆爾的鐵路、北極鐵路、莫斯科地鐵的延伸，以及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那些年，7棟像婚禮蛋糕一樣的大廈（“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鋪張的“蘇維埃帝國”風格在首都地區聳立起來，莫斯科大學就是其中之一。 [(736)](#_733____Pravda__10_February_1946)

戰后幾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經濟的逐步相融。每年約有50萬古拉格勞工外包給民用部門，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門抱怨勞動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約同樣數量的自由勞工，大多數是專家，在古拉格的工業部門領薪工作。古拉格系統越來越趨向于物質獎勵，即使在應付強制勞工時也是如此。勞改營的居民變得愈益不羈，難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約100萬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們的刑期或減少，或廢除。勞改營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充斥勞改營的知識分子類型，而是曾上過戰場的年輕人，例如外國戰俘、烏克蘭和波羅的海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敵視蘇維埃政權，不怕動用暴力。沒有獎勵，這些囚犯干脆拒絕完成指標，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漲成了天文數字。到1953年，內務部在勞改營雇用25萬獄警，古拉格的維持費用兩倍于古拉格勞工所創造的收入。內務部的幾位高級官員，對強制勞工的劃算與否深表懷疑，甚至在醞釀對策，或廢除古拉格某些部門，或將囚犯轉換成另一類平民。這些想法獲得了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的支持，最終仍沒得到認真地討論，因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統的堅定支持者。 [(737)](#_734_2)

諾里爾斯克綜合企業是戰后古拉格經濟和民用經濟相融的良好榜樣。從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數增長3倍，從10萬升至將近30萬。大多數新來者，不是從“過濾營”（通過審訊，篩選出“與敵合作者”）挑出的、來自歐洲和前納粹占領區的蘇維埃戰俘，就是從波羅的海地區和烏克蘭圍捕而來、權作“民族主義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時，自由勞工的人數也有穩步增長。如果加上獲釋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領薪囚犯，在諾里爾斯克綜合企業1949年的總人數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勞工。最后，還有一大批作為志愿者的共青團積極分子，以及自愿前來團聚的囚犯家人。 [(738)](#_736_2)

列夫·內托1925年出生于愛沙尼亞共產主義者家庭，他們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親是拉脫維亞步槍隊成員，在幫助列寧奪取政權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母親成為外交部官員，給兒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參加紅軍，分到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特殊游擊隊，被派去德軍防線后的愛沙尼亞作戰。1944年，列夫被敵人抓獲，囚禁在拉脫維亞的德溫斯克地區，后來被送去德國法蘭克福附近的戰俘營。1945年4月，全體戰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從隊列中逃脫，獲得美軍的解救。列夫在美軍營地中待了兩個月，雖受到不必返蘇的勸說，仍在1945年5月回到蘇聯。其時，他20歲，很想上大學，但一走進蘇維埃邊境，先被送去過濾營，接著被送進紅軍。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奪回的烏克蘭西部充當一名普通戰士。1948年4月，他在羅夫諾城被捕，被指控為美國間諜。內務人民委員會審訊員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戰爭期間向德軍出賣游擊隊，并威脅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簽署了認罪書，被判處25年勞役，外加5年在諾里爾斯克流放。 [(739)](#_737_2)

瑪麗亞·德羅茲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紅軍逮捕，被送去諾里爾斯克。4年前，即17歲那年，瑪麗亞與父母還住在列寧格勒附近的小鎮紅村時，淪為德軍的俘虜。她被帶去愛沙尼亞，在一所野戰醫院充任護士，然后去了柏林，成為納粹高官的家仆。德軍多次想征募她為間諜，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毆打——但她的傷疤不足以打動蘇維埃的軍事法庭，仍以“叛國罪”判她去

諾里爾斯克10年。 [(740)](#_737_2)

斯大林對蘇維埃經濟的戰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諾里爾斯克的貴金屬扮演著重要角色。為了刺激諾里爾斯克的勞工，勞改營管理部門采用越來越多的勞動積分和貨幣獎勵。到1952年，對諾里爾斯克的大多數囚犯來說，現金工資已成為規范，每人平均每月賺取225盧布，約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諾里爾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費”的。許多志愿工賺取特別（“北部的”）工資，遠遠高于他們在古拉格系統之外所能賺到的。 [(741)](#_737_2) 諾里爾斯克開發了奇怪的混合體：這是一個監獄，囚犯卻在領工資。但尊嚴的喪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無法彌補的，造反鬧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二

戰后幾年受過教育的蘇維埃新“中產階級”得到鞏固發展。從1945到1950年，大學和高級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一倍。技術和管理的新專業階層崛起，在此后數十年內，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主要官員和受益者。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的蘇維埃干部：他們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靈活，更穩定。他們的專業資質，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蘇維埃制度中的高級職位，而且確保自己不會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純而遭到剔除。在蘇維埃精英的治理原則中，專業能力已開始取代無產階級價值。

創造這個專業階層是斯大林政權的既定政策。它承認，蘇聯需要一個廣泛可靠的工程師、行政官員、經理的階層，既要與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又要為蘇維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1945年以后，如果不想被政治改革的廣泛需求壓垮，便需要忠心耿耿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而贏得忠誠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滿足人們的資產階級愿望。這一新興的蘇維埃資產階級所獲得的獎勵，就是安全和高薪工作、私人公寓及舒適家庭的天倫之樂。戰后初期，僅有少數消費品可滿足他們的愿望，但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卻作出了“美好生活”的大量允諾。蘇維埃的宣傳、電影、小說，描繪出個人生活的幸福形象，只要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大家都能達到。在戰后的電影和小說中，個人致富變成了勤勞和忠誠的公正報酬；追求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質享受，變成了新興的正面（“蘇維埃”）價值。 [(742)](#_738_2)

拓展高等教育體系是創造這個中產階級的關鍵。20世紀50年代初，蘇維埃大學有170萬在讀學生，高等技校和學院有200萬在讀學生。 [(743)](#_740____MSP__f__3__op__8__d__2) 學生群體基本上是一個混合體，既有知識分子的兒女，更多的是蘇維埃精英的子弟，還有不少出身卑微、戰爭中參軍晉升、此時獲得優待的年輕人。他們脫穎而出，升為管理和技術的精英，其成就并不歸因于階級出身或政治狂熱（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行政官員），而歸功于蘇維埃學校和大學的教育。他們對制度的認同，與自己的專業身份緊密相連。身為工程師、技術員、經理、計劃制訂者，自身的專業定義就是要確保蘇維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計劃經濟和計劃社會的合理性。盡管在政治上，或許因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們有理由反對斯大林政權。

為了在職業道路上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必須遵循政權的要求。一名工程師在1950年解釋：

如想取得進步，必須充滿活力、堅持不懈，還要做到閉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聲呼喊“斯大林萬歲！”……并順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國家》，那他一定會成功。

據接受本書采訪的逃亡者說，蘇維埃行政官員中最常見的，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的共產主義信徒和積極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雖然不相信黨及其奮斗目標，卻認真執行它的各項命令。 [(744)](#_741_2) 通過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即盡心盡職的數百萬技術專家和低級官員，蘇維埃政權趨于常規化，其行為變得官僚化，當初導向大恐怖的革命沖動，逐漸轉化成忠心耿耿的專業精英的四平八穩。

掩飾一直是蘇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戰后，階級出身和政治熱情逐漸讓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順應，戴上面具的藝術能耐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戰后波蘭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認為，人們已習慣于在公共場所故作姿態，開始顯得極其自然：

他與自己的角色相識太久，已變得天衣無縫，以至于不再能區分什么是模擬的自我，什么是真實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親密的親友，相互交談時也會把黨的口號信手拈來。真實的自我與必須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為一，豈不帶來解脫，可讓自己放松警惕。在適當的時刻作出適當的反應，已是真正的自動行為……這種規模的表演，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 [(745)](#_742_2)

在公共角色中完全喪失自己的畢竟還是少數，分裂的身份也許更能代表蘇維埃的心態。就像一名演員時時關注自己的表演，大多數公民明確地意識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別。為了維持這兩個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們設計出很多對策：如何壓抑具有潛在危險的想法和沖動，如何應付會讓自己問心有愧的道德困境。

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輕專業階層，與20世紀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臨著全新的難題。從父母身上繼承了污點履歷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篤信現行制度（與父母輩截然相反），但多數人被迫從中找出一條對策——復雜的戰略性游戲，涉及掩飾（自欺）、循規蹈矩和道德妥協。許多人在職業道路上所面臨的第一個道德選擇，即是在招工和申報大學的履歷表中，是否透露自己親人的被捕。講真話會有遭拒的風險，不講真話，萬一被當局識破，可能會有更嚴重的后果。

伊琳娜·亞歷山德羅娃1946年進入列寧格勒理工學院，在經濟學系注冊時就隱瞞了父親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張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認為：“時代變了，大家變得更加自由；出身對于人民公敵家庭，不再帶有任何的恥辱。”事后回顧這些事件，她認為自己受了朋友的影響，而那些朋友，都來自從沒受過迫害的家庭。理工學院的共青團組織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組織了同年級全體學生的“清洗會議”，要她解釋當初為何“隱瞞社會出身”。共青團的領導指責伊琳娜的行為“卑鄙可恥”，猶如她的“人民公敵”父親，也算是一種“反蘇維埃態度”。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建議理工學院開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為系副主任的講師。他曾于20世紀30年代初的工業清洗中被捕，最近才從前線復員回來。伊琳娜回憶：“那時，從前線回來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學院的道德基調，不容許清洗文化的回潮。他們牢牢掌控學生和宿舍，確保積極分子沒在欺負像我這樣的人。”該講師保住了伊琳娜，甚至讓她繼續參加旅行考察；伊琳娜最終以優異成績畢業于理工學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寧格勒案件”，該講師本人在理工學院的大清洗中遭到開除。 [(746)](#_743____N__DeWitt__Education_and)



1947年，伊娜·蓋斯特（中）與兩個朋友在莫斯科大學

許多人認為，在表格中聲明父母的被捕是“為人誠實”的表現。他們遵循蘇維埃的方式長大，相信私人生活應接受公眾的監督，生活在真實當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則認為，否認父母的逮捕，相當于以自我中心的理由作出背叛；反過來，接受繼承于父母的污點履歷，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們保持信心的表現。伊娜·蓋斯特1944年注冊為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總是填寫父母被捕的真相，因為她害怕如果只透露一半的真相或撒謊，等于滑到了背棄他們的邊緣。

我對此很恐懼……我擔心，在父母一事上撒謊無疑是在放棄他們……公開聲明自己是人民公敵的女兒，我覺得，反而是在保護自己，省得別人來逼迫我背棄自己的父親。即使知道他已死去，在我看來，那仍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舉動。 [(747)](#_743_2)

有些人為了不危及自己的職業生涯，選擇隱瞞自己的污點履歷。他們心中有許多辯解的理由：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公敵，所以不算是在隱瞞罪行；父母本來就希望他們在社會中獲得上進；這種隱瞞是成為誠實蘇維埃公民的唯一途徑。因此，列昂尼德·馬赫納茨1949年申請莫斯科電影學院時，稱父親弗拉基米爾（被捕于1941年，判處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服刑10年）只是在戰爭期間“消失了，無跡可尋”。 [(748)](#_744_2) 弗拉基米爾·弗拉索夫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濟科爾），改用姨媽奧莉加·弗拉索娃的姓。當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寧格勒的姨媽家長大的。1948年，弗拉基米爾在一個秘密的軍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憶道：

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寫同樣的信息。姐姐幫我準備一張答案紙，可隨時參照，每次都能提供統一連貫的答案。我總是填上虛假但一致的出生地點和日期，總是說從小就失去父母，“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至于母親，我總把她叫做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還虛構了一個故事：她曾在戰爭中贏得3枚勛章，從未結過婚，但有個來自巴黎的情人，名叫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自己當時太小，只記得他是一個藝術家，畫了很多母親的素描。我一直編造這個故事，直到1980年。其時，我終于讓已86歲的母親“壽終正寢”。 [(749)](#_745_2)



1953年，奈莉和安吉麗娜·布舒耶娃姐妹

這種謊言只有在蘇聯，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國家，才能存活這么長久。

那些想忘記自己過去的人，與其受迫害的父母的關系，一定會發生大的變化。就像伊娜·蓋斯特所擔心的，放棄這樣的父母始終是一種誘惑。安吉麗娜·布舒耶娃早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時就加入了少先隊，1946年她與母親、姐姐一起歸來，后來在彼爾姆成為共青團積極分子。她亟想成為“平等的蘇維埃公民”，克服家庭出身的恥辱，享有與其他公民一樣的權利。1951年，安吉麗娜在彼爾姆的教育學院注冊入學，很快當上共青團書記。她熱愛斯大林。她的父親1937年被捕，母親1938年被捕，還有后續的家破人離，但她不愿相信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過錯。母親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紀50年代的早期，這仍是危險的想法——所以，家里從不談論過去。安吉麗娜盡量不去思考父親的遭遇，只有通過拒絕想他才能朝前看，才能在彼爾姆的工廠追求自己的前途。她從不與身為工廠黨干部的丈夫，談及自己的父親：

我們在家里常說：“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從工廠退休、開始領取退休金之前，我從沒跟任何人談起我的父親。 [(750)](#_746_2)

列昂尼德·薩爾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親于1937年被捕。他是5個孩子中的長子，感到有責任幫助母親。母親身為郵政員，收入微薄，難以養家糊口。他雖然很聰明，讀完四年級之后，卻因自己的污點履歷而被學校開除。列昂尼德當過各種臨時工，最后隱瞞父親的被捕，設法進了工廠技校。如他所回憶的，他想成為一名工程師，在政權高度重視的職業中表現突出，以證明自己是“一流的蘇維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車里雅賓斯克的軍火工廠找到一份電氣工程師的工作，晚上還在技術學院攻讀。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報父親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戰爭年代。列昂尼德解釋：“沒人會去審查那樣的日期。”



1944年的列昂尼德

我一直堅持這個版本——直到1958年。其時，我當上軍火工廠“秘密小組”的特殊部門負責人，覺得應該厘正檔案……我害怕，在這個“秘密小組”里工作，他們會審查我的履歷，一旦發現我一直在撒謊，就會指控我是一名間諜。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親的遭遇（槍決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堅稱自己對父親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興趣是如何攀登職業階梯。為此，我不得不保守過去的秘密……父親被捕的真相會抹黑我的聲譽，摧毀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黨，最終成為自己工廠的黨委書記，手下有1500名黨員。他是一名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絕。他的辦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應為自己父親的被捕負責（至今仍堅持己見）。與此相反，他感謝斯大林讓自己從不起眼的鄉村神父的兒子，成長為工廠的高級主管。 [(751)](#_747_2)

為職業生涯而忘記過去，使許多家庭關系受損。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茲基以高分畢業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從小長大的列寧格勒攻讀理工學院的工程系，卻遭到拒絕，原因是他在申請表格中承認了父母作為“人民公敵”被捕。尤里設法在列寧格勒的多家工廠找到兼職工作，這使他能成為理工學院夜校的借讀生，但不能參加期末考試，無法拿到畢業證書。1948年，他在列寧格勒共產黨出版社擔任非正式的技術設計師，其時，該出版社剛從德國引進新技術。尤里在安裝新式機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員，沒有得到任何獎勵或認可。事實上，新式機械一旦正常運行，他就被解雇，因為他在填寫表格時坦露了父親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當了一系列的臨時工。1951年，他的母親從哈薩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寧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長的流放而備受煎熬，無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沒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資助。自己的苦澀經歷使他變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訪時承認：

我成為自我中心者，以鐵石心腸對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親。我不去想她，把她徹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種負擔，眼不見，心不煩。這很可恥，卻又是真實的。

1953年，尤里向普爾科沃天文臺申請高級技術員的工作，這一次，沒有透露自己的污點履歷——改寫成父母雙亡——因此而中選。 [(752)](#_748_2)

有些年輕人拼命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著想，心甘情愿充當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舉報人。安全機關喜歡從“人民公敵”的子女中招募舉報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蘇維埃公民。

塔蒂亞娜·葉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寧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發生之后，葉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薩克斯坦。1945年，塔蒂亞娜申請在莫斯科大學攻讀數學，雖然成績很好，但因“異己分子的社會出身”而遭到拒絕。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機電學院，該校急需優秀學生，對她的家庭出身關注較少。在莫斯科上學是塔蒂亞娜的夢想，她開始上課后不久，機電學院宣布開展一場清洗運動，以鏟除“社會出身不受歡迎者”。塔蒂亞娜因此逃到列寧格勒，進入電氣工程學院。學校當局很高興如此優秀的學生前來申請，對她的污點履歷故意視而不見。在她學習的最后一年，學生必須參與發電站的“秘密”工作；同時，鏟除不可靠者的運動也愈演愈烈。她被選中來舉報同學的活動：

他們說，這沒有什么可恥。不知何故，我設法說服自己：他們講得不錯。他們告訴我，如果聽到學生散布學院的負面消息，或在發牢騷，即使是私下交談，都要立即匯報，而且不能讓受舉報的人知道。

塔蒂亞娜使出渾身解數，盡量少作匯報，只轉述聽到的傳言，并不提及具體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體信息的壓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絕，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樣，可能會被電力部分配去偏遠的北極地區。其時，電力部正在呼吁電氣工程學院的畢業生支援邊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試前提交報告，導致3名學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電托拉斯上班。 [(753)](#_749_2)

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一直靠舉報來推動自己的職業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羅斯的農民家庭，她家在農業集體化的運動中被打成“富農”。家里的房子和農場都被摧毀，父親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親和兩個幼女，棲身于以廢墟材料建成的窩棚。由于是“富農”的女兒，不得上學，瓦倫蒂娜的童年與母親一起從事各式低薪雜活。她們先搬去伊爾庫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在阿巴坎時，她和母親重又見到父親。經過多年的勞改營苦役，父親體病心傷，只能在一所學校擔任看門人，母親也在同一學校當清潔工。瓦倫蒂娜13歲時才開始上學，之前都不識字。她回憶：

基本上，我只是一個街頭野孩子，衣衫襤褸，蓬頭赤腳……我童年的全部記憶，全以饑餓為主……我害怕挨餓，更害怕貧困。這種恐懼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學校里，瓦倫蒂娜強烈地感受到“富農”出身所帶來的恥辱。她對父母的貧窮、白俄羅斯背景、愚昧無知（父母都是文盲，不會講俄語），感到越來越強的羞愧。她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學習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她解釋，只有這樣，才“有希望逃離自己從小忍受的貧窮和饑餓”。瓦倫蒂娜長大后，相信斯大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完全接受黨有關“間諜”和“敵人”的宣傳。她甚至想成為一名律師，以便幫助政府追捕那些壞人。她回憶：“像斯大林一樣，對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點也不感到遺憾。”

1948年，18歲的瓦倫蒂娜離家出走。她先去會計學院讀書，再去薩哈林島（庫頁島）的海軍基地擔任實習會計，享受保留給軍人的較高的工資和口糧。瓦倫蒂娜嫁給一名海軍軍官，成為海軍基地中的可靠員工，在行政大樓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員的檔案。由于這一條件，內務部招募她來舉報其他軍官的妻子。她的任務是贏得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匯報她們的私生活和個人意見：



1952年，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和她的丈夫維克托

在某些情況下，我會主動接近，要求她們制作我想購買的小玩意。許多婦女喜歡在閑暇時做些縫紉和針織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會與她們交朋友，去她們的住所喝茶。還有的時候，我去她們的工作場所拜訪。我的控制人提供購買這些活計的金錢（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戶們”自己制作的）。他也給我錢購買蛋糕或其他禮物，以便我打開局面，贏得那些女人的信任。關鍵是拉上關系，這倒也不難。只是有一個規則：與人談及重要內容時，一定要單獨相處。只有如此，她們才會暢所欲言。

瓦倫蒂娜擔任舉報人好幾年，寫了幾十份舉報，涉及的人后來都遭到拘捕。她獲得優渥的報酬——足以匯大筆款子給年邁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購買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歲）。在采訪中，她仍堅持說，她是被迫的，有違自己的意愿，認為自己也是壓迫的受害者：

拒絕是不可能的，他們對我父母和富農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們曾囚禁我父親。我害怕他們也會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絕合作，我的丈夫可能會遭殃。

另一方面，瓦倫蒂娜堅持認為，她所舉報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敵，即“被裁定有罪的間諜”。她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悔恨，事實上，她為自己在“反間諜”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754)](#_751____MP__f__4__op__13__d__2)

三



西蒙諾夫，1946年

1945年之后，西蒙諾夫的職業生涯攀升到嶄新的高度。他從戰場返回，憑借自己的戰場報道，佩戴了滿胸的勛章。在斯大林青睞的知識分子核心圈子中，西蒙諾夫又是頗受信任的黨員。1946年5月，世界徘徊在冷戰的邊緣，克里姆林宮向美國派出一個資深記者代表團，讓西蒙諾夫帶隊。他在克里姆林宮聽取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簡述，斯大林布置的任務是說服美國人：蘇聯并不要戰爭。此行讓西蒙諾夫第一次領略政府的特權，動身前收到的巨額經費使他感到震驚。也許，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與他知道的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差距所帶來的不安。然而，即便如此，那種感覺也只是短暫的。西蒙諾夫陶醉于西方的享受，在美國被當做一位國際名人。他的小說《日日夜夜》已是美國的暢銷書，大家都知道他的詩歌《等著我吧》，他的劇作在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的劇院上演。西蒙諾夫自己與許多名人合影，包括加里·庫珀、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和卓別林，后來都成了他固定的通信人。 [(755)](#_752____Interviews_with_Iurii_S)

美國之旅只是西蒙諾夫戰后初期的若干出訪之一。每一次，他都身負蘇維埃政府的重任。1947年，他訪問倫敦，匯報了吸引重要作家（包括約翰·普里斯特利和蕭伯納）支持蘇維埃事業的可能性。 [(756)](#_753_2) 他在赴美國的途中逗留巴黎，想說服流亡的俄羅斯作家伊凡·蒲寧返回蘇聯。其時，蒲寧是唯一一個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羅斯人，因厭惡革命而于1920年逃離俄國，一直在國外生活。他已有70多歲，但斯大林希望愛國之心和懷舊之情還能說服他返回故鄉。1945年，許多流亡者受到蘇聯良好形象的誘惑，有些確實決定回歸故土。西蒙諾夫在巴黎一系列時髦餐館與蒲寧見面，以蘇維埃政府的錢支付賬單。西蒙諾夫強調自己的貴族血統，熱情洋溢地贊美蘇聯的生活，受到邀請在蒲寧家中用餐時更提議一次“聚餐”。瓦倫蒂娜·謝羅娃專程從莫斯科飛來，帶來俄羅斯的美食（鯡魚、肥豬肉、黑面包和各式伏特加），以增強老人的故土之思。瓦倫蒂娜甚至為他唱了俄羅斯民歌，但蒲寧并沒軟化自己的反蘇維埃態度，拒絕葉落歸根，甚至不愿作短暫的訪問。 [(757)](#_754____MP__f__4__op__7__d__2__l)

1946年，作家協會按政治局的模式重組，總書記是亞歷山大·法捷耶夫，3名副總書記中就有西蒙諾夫。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在1946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注意到：“作家協會的領導人都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最糟糕的是吉洪諾夫，可以聆聽幾個小時而臉上不露任何表情……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也嚴肅刻板，一定是由于坐慣了主席臺。”當選為作協領導的兩星期后，西蒙諾夫接任《新世界》（Novyi mir）的主編工作，那是一份蘇聯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學刊物。1950年3月，他離開《新世界》，改任蘇聯主要文學報刊《文學報》（Literaturnaia gazeta）的主編。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論，對冷戰時期的文化政治勾畫出另一種獨立視角，表面上顯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宮立場，以滿足文學知識分子的愿望，而實質上卻不偏離針對西方的強硬政策。這顯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諾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尷尬的任務。 [(758)](#_755_2)

西蒙諾夫晉入蘇維埃的精英階層，外表上也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他放棄戰爭年代的“軍人外表”，開始穿上量身定做的優雅的英國西裝，或較為隨便的美國高領毛衣、駝毛外套、戰后風行的短蓋軍帽。西蒙諾夫長得高大英俊，頗像歐洲的紳士，對生來就熟稔的貴族禮儀更是游刃有余。他喜歡尋歡作樂，愿意充當慷慨的主人，對待手下，特別是秘書和司機，非常仗義厚道。他為女士開門，幫助她們穿脫外套，以騎士式的吻手禮迎接女賓。 [(759)](#_756_2)

西蒙諾夫的生活方式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他擁有好幾個住所：在莫斯科郊外的著名文學度假地佩列杰爾基諾擁有一棟寬敞的鄉間別墅，是1946年向作家革拉特珂夫買的，價錢是25萬盧布，當時可算是一筆巨款；在蘇呼米附近的古爾里普希村有一棟房子，可俯瞰黑海，購于1949年；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有一套寬敞的公寓，1948年后與瓦倫蒂娜同住。夫妻倆雇用兩個女傭、一個管家、一個當秘書，還有為他們駕駛從美國進口的豪華轎車的私人司機。該公寓里擺滿高雅、昂貴的古董，墻上掛有珍貴的畫作，包括一幅庫茲馬·彼得羅夫―沃德金的作品，肯定來自被充公的私人收藏。該公寓又是莫斯科的文學和戲劇界精英聚會的時尚場所。西蒙諾夫自己酷愛烹飪，有時會為聚會制作精致的菜肴，但更多的時候，會叫附近著名的阿拉格維格魯吉亞餐館的主廚帶人來他的公寓安排宴會。 [(760)](#_757_2)

在《新世界》工作人員的眼中，西蒙諾夫以“封建領主”的氣派著稱。任職于詩歌部門的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對其時31歲的新任主編的年輕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她又注意到，他強大的信心給自己帶來了成熟人士的權威。工作時，西蒙諾夫非常嚴肅；向下屬發出指示時，一臉的深思熟慮，口叼石楠煙斗（西蒙諾夫的辦公桌上總備有半打不同的煙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據丘科夫斯卡婭說，西蒙諾夫與《新世界》工作人員打交道時，顯得傲慢霸道。她在日記中把編輯部比作19世紀的大莊園，一幫“爪牙和走狗”隨時聽候領主的使喚。她尤其厭惡西蒙諾夫對待兩位詩人的居高臨下的態度，他們是她1946年拉來向《新世界》投稿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剛從8年刑期的勞教營返回。西蒙諾夫同意發表他的一首詩，之后又出于政治原因逼迫他加以修改。另一位是帕斯捷爾納克，蘇維埃文壇中的巨人，當時已有56歲，在年齡上滿可充任西蒙諾夫的父親。帕斯捷爾納克的一首詩已被接受，將在《新世界》上發表，作者只是想預支稿費，但遭到西蒙諾夫的拒絕，視之為含蓄的威脅：如果不預支，作者就會要求退稿。他告訴丘科夫斯卡婭，“威脅我”是不道德的，“我已為他做了這么多。如果我在他的位置，絕對不會這樣行事的”。西蒙諾夫為了教訓帕斯捷爾納克，決定不發表這一首已接受的詩。在丘科夫斯卡婭的眼中，西蒙諾夫的行為令人震驚，因為它顯示，他贊同國家權力對藝術獨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兒，從小就接受舊知識分子價值觀的熏陶。她在日記中寫道：“他[西蒙諾夫]想當一名保護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但人們不需要施舍，只希望得到尊重。發表扎博洛茨基的詩，不是因為他曾在勞改營待過8年，而是因為他寫的是好詩。西蒙諾夫有責任支持帕斯捷爾納克，這不是在施與恩惠，而是在盡自己的責任。他是負責詩歌出版的，在這一領域，帕斯捷爾納克應是他最須重視的……西蒙諾夫不明白，預支稿費給帕斯捷爾納克，他是在為俄羅斯文化盡責，為人民盡責。他卻把它當做個人恩惠，而帕斯捷爾納克應該感恩戴德。 [(761)](#_758_2)

像戰后斯大林政權中所有的當權者一樣，西蒙諾夫也能夠行使巨大的影響力。他作為《新世界》的主管和作家協會副總書記，對蘇聯幾乎所有作家的職業生涯，都握有生殺大權。他如果勇敢地站出來，以自己的影響力與當局交涉，便可在多方面施以援手——獲得住房或工作，甚至保護他們不遭逮捕——該制度的運作就是如此。西蒙諾夫收到無數個人請求，來自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泛泛之交、戰爭期間遇上的士兵。他當然無法一一相助，只能有所選擇，從中可以見微知著。

例如，他特別保護和關心自己的私人秘書尼娜·戈登。她30來歲，小巧玲瓏，頗有魅力，1946年到《新世界》上班，曾在作家米哈伊爾·科利佐夫身邊工作——后者的西班牙內戰文章曾給青年時期的西蒙諾夫帶來靈感和啟發。她的丈夫約瑟夫·戈登出身于貴族家庭，是一名電影編輯，被捕于1937年，判處5年，在馬加丹附近的勞改營。1942年，約瑟夫獲釋上前線參戰。西蒙諾夫提拔尼娜為自己的私人秘書時，她坦承了丈夫的政治污點。其時，約瑟夫生活在梁贊的流放地，從事工程師的工作。尼娜謝絕這個提拔，但西蒙諾夫不依她，甚至自告奮勇要出面寫信給內務部為約瑟夫說情——但她堅決拒絕，因為不愿利用他的好心。她在《新世界》上班，確實給西蒙諾夫帶來了不愉快的后果。1948年，約瑟夫獲準訪問莫斯科幾天，出乎意料地出現在編輯部。《消息報》的一名記者碰巧也在那里，留心了看上去像流放者的約瑟夫。第二天，充任內務部耳目的《新世界》的特別行動科（每個蘇維埃機構都有自己的特科），把尼娜叫去問話，想知道尼娜為何隱瞞丈夫是政治流放者，并威脅要匯報她缺乏警惕。西蒙諾夫聽到此事后怒不可遏，認為自己的主編權威受到了侵犯。特科只給了尼娜一次訓斥，沒有進一步的懲罰，另外發布了一條規定：“可疑人物”一律不準進入辦公室。 [(762)](#_759_2)

如果說西蒙諾夫在個人領域經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當局力爭，那么在公共領域就沒有這么敢做敢當了。在戰后的鎮壓氛圍中，許多作家向他求助，西蒙諾夫的反應小心謹慎。他有的幫，有的不幫，全憑自己的好惡，永遠都深思熟慮，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引起他人的懷疑。例如在1946年9月，西蒙諾夫為文學院的老同學、詩人波圖帕契克寫了一封推薦信，幫助他加入作家協會。他沒提波圖帕契克的被捕（1937年）和在科雷馬勞改營的苦役，只將“7年參軍”當做沒有作品發表的理由，從而避免自己在為前“人民公敵”講情的印象。波圖帕契克1946年的申請遭到作家協會的拒絕，到1961年再次提出申請，即赫魯曉夫解凍的高峰時期。這一次，西蒙諾夫直言不諱地在推薦信中指出，其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本詩集，之所以沒在20年前問世，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逮捕”。 [(763)](#_761_2) 西蒙諾夫也寫信支持發表詩人雅羅斯拉夫·斯梅利亞科夫的作品，后者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又是拉斯金一家的密友，于1934年被捕，在勞改營待了5年，在戰爭中作戰勇敢，復員后重回古拉格，在莫斯科附近的煤礦工作。 [(764)](#_762_2) 但其他求助的作家就沒有這么幸運。西蒙諾夫拒絕幫助他文學院的老師、詩人盧戈夫斯科伊——他曾在1941年的最初戰役中失魂落魄，戰爭年代是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過的。盧戈夫斯科伊回到莫斯科后，寫信給西蒙諾夫，請求他幫助尋找新住所。盧戈夫斯科伊與妻子住在一個共用公寓，但他脆弱的心理狀態亟需隱私。他寫信給自己的學生：

我不再年輕，已是一個病人，忍受不了共用公寓的生活，隔壁房間住了一家6口……我長期神經緊張，整天提心吊膽，如果以后被送進瘋人院，也不會令人意外……向人求助是很為難的……但你是仁慈之人，從而鼓勵我向你啟齒。原諒我吧！我愛你，也為你感到驕傲。 [(765)](#_762_2)

西蒙諾夫沒作答復，在他看來，盧戈夫斯科伊并不值得幫助。第一，他已有一套公寓；更重要的，他在戰爭中不夠勇敢——在西蒙諾夫的眼中，那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西蒙諾夫堅信勇于承擔戰斗犧牲的蘇維埃理想，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他與斯大林戰后鎮壓活動的種種糾葛。首先，他參與了日丹諾夫原則的運動，那是在藝術和科學領域中肅清“反蘇維埃”傾向的官方鎮壓，領軍人是斯大林的意識形態主管安德烈·日丹諾夫。

日丹諾夫原則的運動源于1945年的軍事?勝利。該勝利導致排外民族主義在蘇維埃領導階層中的高漲，既為蘇維埃的勝利而感到自豪，又極力推崇蘇聯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優勢（其實是指俄羅斯優勢，斯大林將之描述為蘇聯最重要的團體）。蘇維埃―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取代了戰前的國際主義，成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荒謬地號稱蘇維埃科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導致了一系列的欺詐和怪誕，譬如：偽遺傳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聲稱，已開發出一種適應北極霜凍的小麥新品種；飛機、蒸汽機、收音機、白熾燈泡——無一不是蘇維埃人士發明或發現的。隨著冷戰的啟動，斯大林呼吁要以鐵的紀律，清洗文化事務中所有反愛國的元素——即親西方的元素。他認為，從18世紀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學和文化。如果蘇聯要抵抗西方，必須治愈這個“病根”。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日丹諾夫發起了激烈的運動，以肅清西方對蘇維埃文化的影響。 [[8]](#_7_10) 對于斯大林而言，該項運動的出發點就是列寧格勒。他從不喜歡這座歐洲城市，其獨立于莫斯科的傾向在戰爭中獲得了大大加強。鎮壓開始于1946年8月14日，中央委員會頒布一項法令：《星》和《列寧格勒》兩份期刊要接受審查，因為發表了兩位著名的列寧格勒作家的作品，分別是米哈伊爾·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瑪托娃。克里姆林宮挑出這兩位，旨在向列寧格勒的知識分子顯示：他們必須向蘇維埃政權低頭。阿赫瑪托娃在戰爭期間享有巨大的道德號召力，其詩歌自1925年以來很少在蘇聯發表，但她在數百萬俄羅斯人的眼中，仍象征著人民的堅毅和尊嚴，激勵了列寧格勒的民眾幸存于圍城之戰。1945年，牛津大學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抵達莫斯科，擔任英國駐蘇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他曾聽聞戰爭期間的阿赫瑪托娃——

從前線收到大量的來信，引用她的詩歌——有已發表的，也有未發表的，絕大多數是以手稿形式在私下傳閱。這些來信要求詩人簽名，或幫助確認詩歌的真實性，或對各式問題提供意見。

左琴科相信，中央委員會的法令之所以獲得通過，是因為斯大林聽說阿赫瑪托娃在聽眾爆滿的莫斯科理工博物館舉辦了一次詩歌朗誦會，讀完后又引得掌聲雷動。斯大林問：“是誰安排了這樣一次起立鼓掌？” [(766)](#_763_2)

左琴科也是獨裁者身上的一根刺，他是碩果僅存的蘇維埃諷刺作家——馬雅可夫斯基、扎米亞金、布爾加科夫都已死去——該文學傳統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向他發起攻擊的直接導火索是童話故事《猴子奇遇記》，1946年發表于《星》雜志，講述一只猴子逃離動物園，沐猴而冠，接受做人的訓練。但在事實上，斯大林激怒于左琴科的故事已有多年，在《列寧和衛兵》（1939年）中的哨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左琴科將之描繪成一個粗魯、猴急的“南方人”，留著小胡子，被列寧當做一個黃口小兒。 [(767)](#_764_2)

西蒙諾夫作為作家協會的領導成員，別無選擇，只好投入這場運動。他任《新世界》主編后的第一期，就刊出中央委員會的法令，外加日丹諾夫的講話全文。該篇講話視阿赫瑪托娃為“貴族沙龍的空虛詩歌的旗手之一，格格不入于蘇維埃文學”，并斥責她是“半個修女，半個妓女，或更確切地說，一個妓女和修女的混合體，既在作孽，又在祈禱”（蘇維埃評論家過去用過的短語）。 [(768)](#_765_2)

也許，母親一家所認同的列寧格勒知識分子，西蒙諾夫現在卻參與對他們的迫害，他有點于心不忍。但他拒絕讓心中可能存有的同情拖自己的后腿，因為他懂得，自己對國家的責任更為重要。西蒙諾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回顧這些事件，承認自己投入是因為相信“需要做出點事”，來抵消知識分子當中“思想渙散的氣氛”。如果不加以遏止，在蘇聯正需為冷戰的思想斗爭做好準備的時候，卻會引發“危險的對自由改革的期待”。這便是他當年的理由，如他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所說的：

在思想戰線上，前所未有的激烈斗爭正在全球展開。盡管如此，仍有人在散布“呼吸空間”的理論——即我們應坐在咖啡館里暢談改革。順便提一下，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需要呼吸空間，因為他們在戰爭中只付出了極少的艱辛；事實上，大多數都沒有參與……如果他們想要，我們可以提供呼吸空間，干脆叫他們中止在蘇維埃藝術領域的工作。與此同時，剩下的人會堅持自己的工作和戰斗。 [(769)](#_766_2)

對逃避“戰斗”的知識分子的蔑視——西蒙諾夫的長期觀點——尤其解釋了他對左琴科的敵意。對待阿赫瑪托娃，他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并不喜愛她的詩歌，甚至沒有真正的了解，但對日丹諾夫使用的粗暴語言頗有反感。在他看來：“所有人都不該以這種方式，對在戰爭中與人民同舟共濟的人指指點點，就像阿赫瑪托娃所做的。” [[9]](#_8_8) 相比之下，左琴科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過戰爭年代。蘇維埃報刊斥責這位諷刺作家的懦弱，聲稱他逃離列寧格勒，以躲避前線的戰斗。西蒙諾夫相信有關懦弱的指控，因為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是不愿去尋找真相。其時40多歲的左琴科體弱多病，戰爭開始時遵循當局的命令，方才離開列寧格勒。西蒙諾夫對沒有參戰的每個人，都予以苛刻的衡量標準，左琴科自然也不例外。他還將這種苛刻投射到其他知識分子身上，因為他們竟意識不到，必須積極投入冷戰的思想斗爭。最了解西蒙諾夫的戲劇評論家亞歷山大·博爾切戈夫斯基指出，西蒙諾夫急于譴責像左琴科那樣的人，完全是出于偏見。他寫道，西蒙諾夫傾向于——

不信任那些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在后方度過戰爭年代，并沒有分擔前線戰士的流血犧牲。這種寬泛的猜疑——絲毫不去察看每一個人的獨特經歷——完全忽視了數百萬人在后方的非凡努力，以武裝數百萬的前線戰友爭取最后的勝利。 [(770)](#_767____G__Carleton__The_Politic)

西蒙諾夫加入了對左琴科的攻擊，但不愿涉及對阿赫瑪托娃的誹謗。《真理報》要他撰寫譴責這兩人的文章，西蒙諾夫答稱只能針對左琴科一人，最后完稿的文章幾乎全部聚焦于這位散文作家。幾個月之后，西蒙諾夫獲悉有關左琴科疏散的真相，又從作家尤里·杰美恩那里得知左琴科很勇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奮勇作戰。他認識到自己的過錯，便作出了彌補的努力：向日丹諾夫推薦左琴科寫于1943年的《黨派故事》（Partisan Tales），雖然并不認為是上乘作品，但也親自幫助編輯，不料遭到日丹諾夫的拒絕。1947年5月，西蒙諾夫在與斯大林開會時，再次提及發表一事，并解釋說左琴科已陷入困境，亟需幫助。為一名不受蘇維埃領導人青睞的作家，越過日丹諾夫，直接尋求斯大林的幫助，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舉措。斯大林告訴西蒙諾夫，可運用自己的主編職權做主，但刊出后，他會去讀，隨后再就西蒙諾夫的決定發表自己的意見。如西蒙諾夫所回憶的，“斯大林的幽默中帶有一絲威脅”，但他還是堅持不懈，《黨派故事》問世于1947年9月的《新世界》。 [(771)](#_768_____Doklad_t__Zhdanova_o_zh)

盡管作出了彌補的努力，西蒙諾夫后來還是拒絕向左琴科表示同情。1954年，一組英國學生來到列寧格勒，要求與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見面，出席會議的還有幾名列寧格勒作家協會的黨員。愚蠢的學生們并不掩飾自己的反蘇維埃態度，詢問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如何看待1946年8月中央委員會的法令。阿赫瑪托娃回答，該法令完全正確。毫無疑問，她害怕任何其他回答的后果。但左琴科不夠小心，答稱該法令是不公正的，強烈反駁那些聲稱他怯懦的指控。作家協會的黨領導立即指責左琴科犯了“反愛國的行為”，并派出以西蒙諾夫為首的代表團，赴列寧格勒去“做他的工作”。左琴科在幾近歇斯底里的自我辯護中宣稱：他的寫作生活已經完蛋，他本人已被摧毀，只懇求控訴者讓他在平靜中死去。但西蒙諾夫拒絕左琴科的請求，以清洗會議上檢察官的方式痛打落水狗。西蒙諾夫宣布：“左琴科同志希望得到我們的同情，但他什么也沒學會，他應該感到羞恥”，再一次隱射他的戰爭記錄和1945年之后的“反愛國”行為。 [(772)](#_769_2)

對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的攻擊之后，緊接著的是一系列鎮壓措施，針對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的“反蘇維埃分子”。現代西方藝術國家博物館被關閉；在蘇維埃音樂界反對“形式主義”和其他“西方腐朽影響”的運動，導致好幾名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維奇、哈恰圖良和普羅科菲耶夫）上了官方黑名單，他們的音樂創作被控為“與蘇維埃人民和他們的藝術品味格格不入”。1947年1月，政治局頒布法令，指責中央宣傳鼓動部長格奧爾基·亞歷山德羅夫的《歐洲哲學史》（1946年），低估了俄羅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貢獻，亞歷山德羅夫很快卸職。同年晚些時候，即1947年7月，中央委員會發表了充滿不祥征兆的公開信，指斥尼娜·克柳耶娃與其丈夫格列高利·羅斯金：“在反動的外國資產階級西方文化面前頂禮膜拜，奴顏婢膝。而這種文化，根本不配我們蘇聯人民。”這兩位科學家遭到指控：在1946年訪問美國時向美國人透露了癌癥研究的資料。他們回國時，被拖上“榮譽法庭”，要在800名觀眾面前，回答充滿敵意的提問。那是一個新成立的機構，專門審查蘇維埃各機關中的反愛國行為。 [(773)](#_770_2)

隨著冷戰愈演愈烈，對外國人的恐懼四下彌漫。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回憶，他作為外國記者在1949年返回莫斯科（1944年到過蘇聯），但以前的熟人沒人認他，甚至寫信給老相識愛倫堡和西蒙諾夫，也杳無回音。在索爾茲伯里看來，1944年的蘇聯雖然貧窮，但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卻處處洋溢著嶄新的自由風氣和冀望勝利的激昂氛圍。到1949年，蘇聯又返回恐懼狀態。

俄羅斯人和外國人之間的人際關系，遭到了徹底的分割。反過來，這反映了蘇維埃政府嚴重的仇外心理，以及他們調教俄羅斯人的高效。如想拿到奔赴西伯利亞的單程火車票，或更遙遠的地方，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快的——就是與外國人產生瓜葛。



1948年12月22日，法捷耶夫在作家協會講話。最左邊為西蒙諾夫，他身旁是愛倫堡。肖像下的旗幟上寫著：“光榮屬于偉大的斯大林！”

與外國人的簡短接觸，可能會導致以間諜罪名逮捕。蘇維埃監獄中，擠滿了曾出國旅行的人。1947年2月，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蘇維埃公民和外國人的婚姻屬于非法。警方監視酒店、餐館、外國使館，專門尋找與外國男人交往的蘇維埃女孩。 [(774)](#_771_2)

以色列建國于1948年5月，在冷戰中又與美國結盟。之后，始終忠于蘇維埃制度的200萬蘇維埃猶太人，被斯大林政權描繪成潛在的第五縱隊。斯大林雖然厭惡猶太人，卻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的早期支持者，希望它成為蘇維埃在中東的衛星國。但是，這個新建國家的領導人后來被證明是敵視蘇聯的，斯大林越來越怕蘇維埃猶太人的親以色列情緒。果爾達·梅厄出任第一位以色列駐蘇大使，在1948年秋季抵達莫斯科，使斯大林的擔憂愈益加劇。她無論去哪里，都受到蘇維埃猶太人的歡呼。贖罪日（10月13日）那天，她去拜訪莫斯科猶太教堂，數千人排列在街道兩側，許多人高喊“以色列人民，存活下去！”——對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來說，這只是復國的傳統肯定；但對斯大林來說，這是“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危險跡象，會顛覆蘇維埃國家的權威。 [(775)](#_772_2)

梅厄得到的熱情歡迎，促使斯大林加緊推動已開展數月的反猶運動。早在1948年1月，既是莫斯科猶太劇院的導演，又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領導人的所羅門·米霍埃爾斯，死于內務部安排的一場車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立于1942年，旨在吸引西方猶太人對蘇維埃戰爭的援助，但對許多成員來說，包括杰出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演員、歷史學家、科學家，更為廣泛的目標是提倡蘇聯的猶太文化。要實現這一目標，戰后初期相對來說還算有地利人和。1946年，米霍埃爾斯榮獲斯大林獎，意第緒語戲劇經常在電臺上播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還投入一個重大項目，以紀念納粹對蘇維埃猶太人的殺害：讓瓦西里·格羅斯曼和伊利亞·愛倫堡編纂一個文件總匯，取名為《黑皮書》（The Black Book）。斯大林原希望利用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來博得中東的新猶太國家的好感，但現已看清，新猶太國家很有可能與美國結盟，便一改故轍。國安部奉命網羅資料，把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打成一個“反蘇維埃的民族主義組織”。《黑皮書》的出版無限期推遲，對米霍埃爾斯的謀殺發生之后，猶太劇院也被關閉。1948年12月，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百余名成員被捕，屈打成招，承認自己的“反蘇維埃活動”，或遭槍決，或被送進了勞改營。 [(776)](#_773_2)

在蘇維埃的文學界，對猶太人的攻擊采納了反“世界主義者”運動的形式。該詞最初是19世紀文學評論家維薩里昂·別林斯基所創造的，泛指缺乏或拒絕民族風格的作家（“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它在戰爭年代重現，其時，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反猶情緒均有高漲。例如，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擊猶太作家愛倫堡來自“那個知識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義理解國際主義，不愿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 [(777)](#_774_2) 1945年之后，該詞更頻頻出現于蘇維埃的文藝出版物。

1948年12月10日，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轉交一封不知名記者（納塔利婭·別吉切娃）的來信，引出了反“世界主義者”運動。該信當初是寫給內務部的，聲稱在文學機關中有一組“敵人”，列出了7位評論家和作家，作為這個“反愛國小集團”的負責人，其中6人是猶太人。在斯大林的重壓之下，法捷耶夫12月22日向作家協會發表對一組戲劇評論家的攻擊，點名批判了別吉切娃舉報的6位猶太人中的4位（奧特曼、博爾切戈夫斯基、古爾維奇和尤佐夫斯基）。法捷耶夫聲稱，他們“企圖抹黑我們的蘇維埃戲劇”。這是相對溫和的講話：法捷耶夫顯然不愿扮演斯大林的打手的角色。他曾是體面人，被迫作出道德上的妥協，而淪為一個戰戰兢兢的酗酒者。斯大林繼續施加壓力，讓《真理報》反過來攻擊法捷耶夫對“世界主義者”的心慈手軟，并散布謠言——他在作家協會的領導地位將被取代。法捷耶夫無法再作抵制，表示擁護1949年1月29日《真理報》的匿名文章（《關于一個反愛國集團》），其措辭讓人憶起大恐怖。它控告某些戲劇評論家就是“無根的世界主義者”，指責他們在策劃“資產階級的文學陰謀”，以破壞蘇維埃文學中“民族自豪”的健康原則。 [(778)](#_775_2) 所有被點名的都是猶太人，執筆人幾乎可以肯定是黨的打手兼《真理報》記者大衛·扎斯拉夫斯基。在1921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之前，扎斯拉夫斯基曾是孟什維克和活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為斯大林寫了好幾篇打手文章，用以贖罪和攀升為蘇維埃精英。 [[10]](#_9_7)

《真理報》的文章出籠之后，蘇維埃其余報刊也發表了一系列攻擊，反對“無根的世界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們競相譴責“反愛國團體”，聲稱它們在破壞蘇維埃的詩歌、音樂、藝術和電影。 [(779)](#_776_2) 在這些惡毒文章中被點名批判的猶太人面臨非常嚴峻的后果，許多人失去工作，或被驅逐出黨和協會，生計都沒有著落。有些被捕，少數人明哲保身，或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與“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劃清界限。法捷耶夫點名批判的4位戲劇評論家中，只有約翰·奧特曼一人被捕。《蘇維埃藝術》期刊發表了一篇丑陋文章，充滿仇恨和稍作掩飾的反猶太主義，向他發起攻擊：“我們以蘇維埃人民的名義宣布，奧特曼一類的壞人，像行尸走肉一樣，在污染蘇維埃文化。為了凈化空氣，我們必須擺脫他們散發出的腐臭。”奧特曼在作家協會中受到阿納托利·索夫羅諾夫的譴責，后者是一名反猶太運動的狂熱支持者，在法捷耶夫因酗酒而長期缺席的作家協會，變得舉足輕重。奧特曼遭到黨和作家協會的開除，于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之夜被捕。法捷耶夫和奧特曼是多年的好朋友，當初堅持要奧特曼去幫襯猶太劇院的米霍埃爾斯，并解釋說：“他需要一個顧問，就像一名政委，你就把它當做黨的命令。”奧特曼在審訊時被問到怎么會去幫襯米霍埃爾斯，卻只字不提法捷耶夫。他知道，如果提及作家協會領導人，可能會保住自己，但不想把法捷耶夫牽連進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毫無疑問，奧特曼希望法捷耶夫予以報答，從中干預搭救自己。結果，法捷耶夫什么也沒做，甚至缺席了開除奧特曼的作家協會的會議，沒人能在莫斯科找到他（西蒙諾夫認為，他以狂飲來逃避責任）。奧特曼再也沒能從法捷耶夫的背叛中恢復過來，1953年5月出獄，心如死灰，兩年后去世。 [(780)](#_778_2)

西蒙諾夫也被拖入“反世界主義者”運動。開初，他試圖保持溫和路線，既不公開抗議這一運動，也不配合索夫羅諾夫和其他強硬派。西蒙諾夫不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作為《新世界》的主編，他主持發表了好幾位猶太作家的作品。他前兩位妻子都是猶太人，特別是第二位妻子熱尼婭·拉斯金娜，其堂哥鮑里斯·拉斯金在別吉切娃當初交給內務部的舉報信中，被點名為“蘇維埃文學的敵人”。西蒙諾夫的溫和立場，激怒了黨和作家協會內的強硬派。西蒙諾夫有許多敵人，嫉妒他“斯大林寵臣”的地位，讓他年紀輕輕就攀升到蘇維埃機構的頂端。此外，中央委員會的某些成員認為，斯大林的保護使西蒙諾夫桀驁不恭于其他黨領導。為了在他和斯大林之間挑撥離間，這些強硬派指責西蒙諾夫試圖保護“世界主義者”。最惡毒的指控來自《蘇維埃藝術》的主編維克托·弗多維琴科，他給馬林科夫送去一份名單，列出80多名猶太人，聲稱是作家協會中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其實，大部分指控是針對西蒙諾夫的，指責他包庇猶太復國主義者。弗多維琴科還把矛頭指向《新世界》的編輯人員，聲稱里面有許多猶太人（“那些六親不認的人”），尤其指責亞歷山大·博爾切戈夫斯基——他是一名戲劇評論家，曾因批評赫魯曉夫最喜歡的作家亞歷山大·科爾涅伊奇克的一出戲而蒙受恥辱。西蒙諾夫卻非常喜歡他，稱他為“一個安靜、謙虛的人”，將他從烏克蘭調來莫斯科。據編輯部成員納塔利婭·比安基說，他的文學見解在《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西蒙諾夫沒有他，幾乎不能作出決定，他的口頭禪就是‘讓我們看看，博爾切戈夫斯基有什么要說的’。”弗多維琴科聲稱，博爾切戈夫斯基沒有“一篇作品足以使他有資格留在《新世界》”，而他在《新世界》的影響力，純粹是出于西蒙諾夫對猶太人的同情。他指出，西蒙諾夫曾與猶太人結婚，還有很多猶太朋友。 [(781)](#_779_2)

像法捷耶夫一樣，西蒙諾夫最終還是向強硬派的壓力低了頭。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階層的位置，認為必須加入反對猶太人的運動，以證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他給《真理報》主編寫信，反駁強硬派說他偏愛猶太人的指控，同時又遠離博爾切戈夫斯基和其他《新世界》的猶太評論家。 [(782)](#_779_2) 克里姆林宮敦促西蒙諾夫，以《真理報》匿名文章（《關于一個反愛國集團》）的精神為基礎，再擴充成作家協會上的一次主旨演講。法捷耶夫已墮落成一具爛醉如泥的殘骸，索夫羅諾夫對接手此事頗為熱切，但馬林科夫認為，恰恰因為其著名的溫和立場，西蒙諾夫反而可賦予“反世界主義者”運動更多的權威。法捷耶夫也在敦促西蒙諾夫接手，并警告說，如果謝絕，索夫羅諾夫就會順手牽羊。索夫羅諾夫是強硬的反猶太主義者，野心勃勃于作家協會的領導權，希望取代克里姆林宮的首選西蒙諾夫，成為法捷耶夫的繼任者，一旦得逞肯定還會從作家協會逐出更多的猶太作家和評論家。西蒙諾夫為了不讓權力落入索夫羅諾夫之手，同意發表這一次主旨演講，在1949年2月4日的作家協會全體會議上，他作出了這次發言。西蒙諾夫的第一位妻子，即猶太作家納塔利婭·索科洛娃（娘家姓季波特），在日記中描述他譴責“反愛國小集團”時的可怕氣氛：

講話持續一個半小時，中間略作休息，然后又繼續一個半小時。人們聆聽著，面色緊張，一臉警戒，沒人說話，除了偶爾的低語：“他點了新名字嗎？”……“你聽見沒有？”……“又一個世界主義者？”……“新的世界主義者？”有些人像我一樣，列出所有被點的名單。 [(783)](#_780_2)

西蒙諾夫在后來的那些年中堅持認為，他發表主旨演講，是為了防止極端的索夫羅諾夫掌控“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他雖然懊悔自己的角色，但仍堅持，他承擔領導責任是為了緩和這個反猶太作家的運動。在他朋友的回憶錄中，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馬林科夫打電話來說，斯大林希望西蒙諾夫發言。其時，戲劇評論家博爾切戈夫斯基恰好在西蒙諾夫的高爾基街公寓。博爾切戈夫斯基回憶，西蒙諾夫放下聽筒，“傷感地看著我，再朝窗外凝視，不到10分鐘便作出決定”。然后，他開口了：

“我將作演講，修羅[亞歷山大]。我自己來作，而不是讓給別人，可能會更好。”他既然已經同意發言，便想尋找理由來辯護自己的“積極參與”，意欲在這不誠實的運動中，找到誠實的見解。“一切的兇殘和粗魯必須終止。我們必須學會不同層次的爭辯，使用文明的語言。我們過去有，現在仍有形式主義和建構主義辯護士的問題。他們想讓我們成為西方文化的奴隸，我們必須談論這一切。” [(784)](#_781_2)

西蒙諾夫在演講中，并不局限于揭發淺陋粗糙的猶太復國主義陰謀，而是想讓“反世界主義者”運動，融入更為廣泛的政治和智力的背景。他后來在一系列蘇維埃報刊的文章中，更補充發揮了自己2月4日的演講，指責“世界主義者以[讓-保羅·]薩特取代馬克西姆·高爾基，以[亨利·]米勒的色情取代托爾斯泰”。 [(785)](#_782_2) 冷戰氣氛無疑左右了他的思路：必須捍衛蘇維埃的“民族文化”，反對“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對美帝國主義……以及美元的賣身投靠”。除此以外，很少有證據表明，西蒙諾夫的參與給反猶太人運動帶來了文明化，他的語言仍是煽動性的。他聲稱，“反愛國小集團”是一場陰謀，參與者是蘇維埃文化的“罪犯”和“敵人”，絕不是單純的“唯美主義者”，他們有“激進的資產階級和反動的計劃”，在冷戰中為西方服務。他把許多問題歸咎于猶太人自己，責怪他們不愿融入蘇維埃社會，又在戰后接受了“猶太民族主義”。他解雇了《新世界》所有的猶太編輯人員，甚至代表作家協會給斯大林寫信，要求將不活躍的作家排斥于作家協會之外，長長的名單當中都是猶太人。 [(786)](#_783_2)

列入該名單的有他的朋友博爾切戈夫斯基，已被挑選出來，當做“反愛國小集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從“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伊始，西蒙諾夫就與他逐漸疏遠，他心里很清楚，最終將被迫譴責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朋友。他接到馬林科夫的電話，同意發表有關“反愛國小集團”的主旨演講，隨即就向博爾切戈夫斯基解釋：“這樣做，我將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將能幫助他人，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西蒙諾夫還警告他不要出席全體會議，在這位戲劇評論家行將離開時，又補充說：“如果你來，我會覺得，必須以更強烈的詞句來譴責你。”博爾切戈夫斯基既沒有讀西蒙諾夫的演講，也沒有讀后續的文章。他被西蒙諾夫稱作“戲劇界的破壞者”、蘇維埃文學的“資產階級敵人”、“文學敗類” [[11]](#_10_7) 。他信任西蒙諾夫——視之為自己的朋友——淡然聲稱，西蒙諾夫只是在被迫演出“儀式性的思想舞蹈”。

博爾切戈夫斯基遭到黨和作家協會的開除，失去《新世界》的工作，也被他擔任文學組負責人的紅軍劇院解雇。博爾切戈夫斯基和家人——母親、妻子及年幼的女兒——都被踢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有一段時間，他們借住在朋友的場所，或睡在地板上，或寄宿于他們的鄉間別墅（甚至住過西蒙諾夫在佩列杰爾基諾地區的鄉間別墅）。博爾切戈夫斯基曾是20世紀30年代的幸存者，早學會了榮辱不驚，從容應對。他入不敷出就賣掉財產（主要是書籍），再向朋友借錢，包括西蒙諾夫。西蒙諾夫借錢給他，如博爾切戈夫斯基所理解的，“以減輕自己的良心責備”，并不讓他償還。 [(787)](#_784_2)



亞歷山大·博爾切戈夫斯基，1947年

從1949到1953年，即博爾切戈夫斯基的禁令終告解除之時，西蒙諾夫一直心懷內疚，盡量去看望這位朋友，但從不談及自己當年的演講。在博爾切戈夫斯基看來，他們相遇時，西蒙諾夫會“以焦灼的眼光看我，仿佛認為他需作一番解釋”。西蒙諾夫1950年7月支持出版《俄羅斯國旗》（The Russian Flag），那是博爾切戈夫斯基關于克里米亞戰爭的愛國小說。西蒙諾夫在送交給審查官的報告中寫道：“這本書頗有造詣，嚴肅認真，很有必要。我深信，它深刻的愛國主義內容將會打動讀者的心靈……眾所周知，博爾切戈夫斯基曾犯有嚴重錯誤，屬于反愛國的性質。但他已付出代價，并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本書終于在1953年獲得了出版許可。 [(788)](#_785_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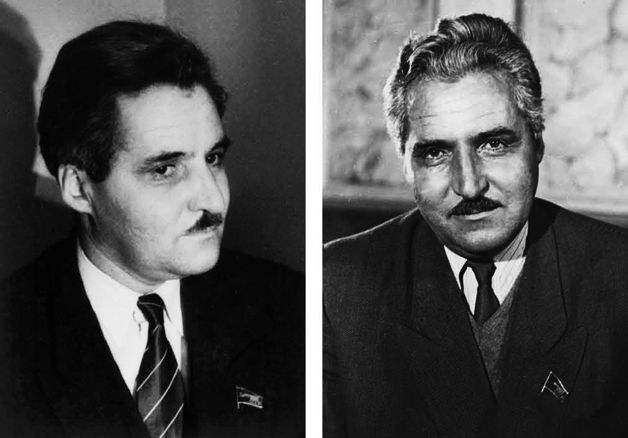
博爾切戈夫斯基在50年后的2003年接受采訪，談到西蒙諾夫對自己的傷害，仍淡然處之，只是說“人們慢慢都會習慣于痛苦”。但據他的妻子說，在最后幾年，他越來越受1949年事件的困擾。 [[12]](#_11_7) 他在回憶錄中得出結論，西蒙諾夫找不到公民的勇氣，在作家協會中對抗反猶主義強硬派，以捍衛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他并不覺得西蒙諾夫的所作所為是出于恐懼，或沒有良心。相反，他認為，西蒙諾夫的驅動力是個人野心，尤其是一種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戀于斯大林的權力光環，以致無法堅持更為堅強的立場。 [(789)](#_786_2)

戰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發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將臨，魂飛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舉報來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懼而遭受剝奪。實施戰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諾夫一樣的職業官僚和行政官員，他們并不一定非得參與其中。西蒙諾夫可能沒有被作家協會開除的風險，更不用說被捕了。如果他拒絕將自己的聲音加入對猶太人的譴責大合唱，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可能會失去作家協會的領導職位和《新世界》的主編工作。當然，他當時可能擔心得更多。但問題是，像西蒙諾夫那樣的人還有選擇余地。他們滿可以像數百萬人一樣追求自己的職業生涯，但躲避政治責任的陷阱，所損失的最多只是特權和物質獎勵。那些無法采取公開立場的人，自有更平靜的方式避免參與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則的政治決定。博爾切戈夫斯基認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選擇不發言，可以不來出席作家協會的全體會議，可以假裝生病，并不會受到黨的紀律制裁。在博爾切戈夫斯基看來，這一時期的迫害和參與者的作為，都植根于無孔不入的對斯大林政權的順從——即普通斯大林主義者的定義所在。他寫道：

無法以恐懼來解釋1949年的現象，不單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確是恐懼，那也是早已溶入人類靈魂的那種……[更為確切地]毋寧說是幫閑們湊熱鬧式的奴性。他們擁有的勇氣和道德少得可憐，以致無法違抗最基層官員的半官方指令。 [(790)](#_787_2)



1949年，西蒙諾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羅斯共和國的明斯克參加蘇維埃作家大會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諾夫

當然，在類似西蒙諾夫的主事官員中，也有人拒絕參與“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例如，科學院主席謝爾蓋·瓦維洛夫就默默頂住了巨大壓力，沒在科學院揭發“反愛國小集團”，并阻止自己下屬解雇猶太科學家（他的哥哥尼古拉是遺傳學家，1940年被捕，1943年餓死在獄中）。 [(791)](#_787_2) 在作家協會中，也有人拒絕參與反猶太人運動，譬如主席團黨委書記鮑里斯·戈爾巴塔夫。他是西蒙諾夫的好朋友，自身就是猶太人，比西蒙諾夫更有后顧之憂：他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外國間諜”的罪名判刑10年，他本人也難逃政治懷疑的陰影（1937年，戈爾巴塔夫被控在第一本小說《我們的城鎮》中，散播“托派”觀點。那是一部無產階級的史詩，描繪五年計劃如何在頓巴斯開展。最終，他勉強逃脫被開除黨籍的厄運，但他的弟弟仍作為“托派分子”被捕，槍決于1938年）。然而，盡管面對作家協會斯大林強硬派的沉重壓力，甚至被指控為“反愛國小集團的猶太同情者”，他仍拒絕參與對自己同胞的迫害。為此，他被迫放棄在黨內和作家協會的職位。博爾切戈夫斯基回憶1949年與他見面，地點在西蒙諾夫的佩列杰爾基諾地區鄉間別墅。戈爾巴塔夫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心碎欲絕，被打入冷宮”，卻保住了道德上的尊嚴和原則。 [(792)](#_791_2)

西蒙諾夫是一個更復雜甚至更悲慘的人物，顯然深受良心的責備。“反世界主義者”運動，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厭惡，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他繼承于貴族家庭的軍人精神和公共服務價值，與蘇維埃制度的道德范疇和急迫需求如此緊密相連，以致在判斷或規范自己行為時，往往別無選擇。西蒙諾夫擁有格外強烈的公共責任感，這界定了他的世界觀。西蒙諾夫曾說：“如果沒有公共責任感的自律，就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他生來就是一名積極分子，從不稱病缺席，以逃避艱難的道德抉擇。在西蒙諾夫看來，避免承擔公共責任，等同于怯懦。他也不愿與猶豫不決、軟弱無能、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他把這一切都認作人類的缺點。他欽佩人的理性和富有邏輯，這也是他文學創作中英雄人物的道德素質——即與他相似的人，只是更勇敢，能從客觀證據中得出正確結論，采取果斷行動。 [(793)](#_791_2)

西蒙諾夫將責任感提升為至高無上的美德，由此決定了自己政治上的順從。他對黨的路線歷來謙恭服從，將它混淆為公共美德，對斯大林無比敬畏。他戰后的筆記本，密密麻麻寫滿了斯大林著作的提要、斯大林發言的語錄、斯大林的短語和思想，以便他隨時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素養。 [(794)](#_791_2) 西蒙諾夫迷戀斯大林的權力，覺得他無處不在，認為斯大林幾乎在觀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護者、老師、向導、評論家、懺悔聽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時又成了他的獄卒、拷問者和劊子手。

源于這位蘇維埃領袖的最輕微的批評，會把西蒙諾夫驅入苦難的深淵。1948年，西蒙諾夫的中篇小說《祖國炊煙》（Dym otechestva）受到《文化與生活》（Kul’tura i zhizn’）的野蠻攻擊。這是一份宣傳鼓動部的主要雜志，背后有斯大林撐腰。西蒙諾夫得出結論，斯大林肯定“極不喜歡這一故事”。他既驚恐，又沮喪，實在弄不清錯在哪里，這還是他最心愛的作品之一。他后來告訴朋友：“創作時，我以為自己在向黨也是在向斯大林本人履行職責……在我眼中，他是戰爭結束兩年后至高無上的權威。”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共產黨老軍人，1947年從國外返回蘇聯，確信自己已盡了對國家的職責，只想在戰后的艱辛中重建私人生活。那篇小說準確刻畫了當時的普遍心態，絕對是一部愛國小說，對蘇聯和美國之間作了很多比較，均有利于前者，但也有些坦率的對白，特別是當時避而不談的1946至1947年的饑荒（直到赫魯曉夫的解凍，蘇維埃文學才得以直面這些社會問題）。這是引發黨的責難的關鍵所在，西蒙諾夫為之感到震撼。與此同時，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1947年）也受到攻擊，也是斯大林發動的，也刊登于這份主要雜志，從而引起猜疑這位暴君正在籌劃對作家協會領導班子的清洗。西蒙諾夫亟想了解斯大林為何不喜歡自己的作品，亟想作出修改來投合他的喜好，所以拜訪日丹諾夫征求意見。但這位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大管家，一點忙也幫不上——他反而非常喜歡這篇小說——于是，西蒙諾夫下定決心，“不會再版《祖國炊煙》”。 [(795)](#_792_2)

不久，西蒙諾夫收到日丹諾夫秘書的電話，問他關于克柳耶娃和羅斯金的劇本何時才能脫稿。這兩位科學家已被抹黑，斯大林指控他們向西方卑躬屈膝。在1947年5月的克里姆林宮會議上，斯大林曾向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提議，以此題材創作一部小說。他認為，需要更多的愛國文學作品，來揭批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崇拜。西蒙諾夫表示同意，但認為這個題材更適宜于戲劇。當時，西蒙諾夫正在寫《祖國炊煙》，所以作了推延，盡管他曾去日丹諾夫的辦公室看了有關資料，但他知道這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視之為一種拖累。在西蒙諾夫看來，宣傳鼓動部的攻擊還記憶猶新，現在卻接到日丹諾夫秘書的來電，這無疑是一個明確信號：如果及時提供斯大林在等待的劇本，斯大林就會原諒他在中篇小說中的失誤。他不顧一切，亟想贖罪，在1948年初的幾個月寫出《外國陰影》（Alien Shadow）的第一稿。這是一部粗劣的宣傳劇本，有關一名蘇維埃微生物學家，因迷戀西方而背叛自己的祖國。西蒙諾夫作出可恥的政治獻媚，將第一稿送交日丹諾夫審閱，再照他的指示，轉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審閱。斯大林打電話給西蒙諾夫，提供如何改寫的明確指示。他表示，西蒙諾夫應該強調劇中科學家的利己主義（斯大林：“他認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個人財產”），又應該在結尾處突出政府的善良，讓衛生部長落實斯大林的命令，原諒犯錯的科學家，讓他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斯大林說：“這是我對劇本的意見，你需要作出調整，如何去寫則是你的事。一旦你作了調整，劇本將獲得通過。”西蒙諾夫按照斯大林的建議，重寫了劇本的結尾，將第二稿送交斯大林，作再一次的審批。西蒙諾夫回憶：“在脅迫之下，我寫得很辛苦，逼迫自己相信這樣做的必要。當初如能足夠堅強，抵制這種自殘，我可以選擇不寫。30年后的今天，我仍為自己的缺乏勇氣而感到慚愧。” [(796)](#_792_2)

這個事件以悲喜劇的形式落下帷幕。該劇本發表于《旗幟》（Znamia）雜志，連同其他幾個劇本一起，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提名。作家協會的秘書處先行討論它們的優缺點，再遞交斯大林獎委員會。在西蒙諾夫也在場的秘書處會議上，幾位同事批評劇本的結尾（斯大林的建議），所持的理由是“原諒科學家，不作任何懲罰，這顯得過于軟弱，過于慷慨，幾乎是政治上的投降”。西蒙諾夫閉口不提他與斯大林的電話交談。“我默默端坐，傾聽同事們指責斯大林的自由主義。”該劇本后來獲得斯大林文學獎。 [(797)](#_794____RGALI__f__1814__op__1__d)

西蒙諾夫習慣于自我批評和自我審查。他寫了許多信，向蘇維埃領導承認錯誤。他曾寫下好幾個故事的草稿，然后鎖在抽屜里，因為他知道，將無法通過審查員這一關。1973年，德國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問他，是否由于承受著壓力，不得不寫自己知道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作品。西蒙諾夫承認自己身上的兩重性，有時是作家，有時是審查員，一生都在互相斗爭。他甚至承認，當怯懦占據上風時，會非常厭惡自己。 [(798)](#_794_2)

偶爾，作為作家的西蒙諾夫也會奮起反叛作為審查員的自己，詩人也會為自己的政治良心發出悲呼。例如在1946年10月，即日丹諾夫原則的運動高潮，西蒙諾夫給《小火苗》（Ogonyok）雜志的主編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寫去一封火冒三丈的信。之前，他曾向該雜志投送詩稿，受到蘇爾科夫的刪改，被刪除的人名中有外國人（以愛國的名義），也有在政治上被抹黑的蘇維埃人。西蒙諾夫表示，絕不贊同如此的做法，無論是在實質上，還是在原則上。獻給老朋友大衛·奧滕貝格的一首詩也被刪節，西蒙諾夫對此尤為不滿。1943年，奧滕貝格不愿遵循克里姆林宮開除手下猶太同仁的命令，而被解除《紅星報》的主編一職。奧滕貝格甚至勇敢地寫信給黨領導，對某些軍隊和許多后方地區的“肆無忌憚的反猶主義”，表述了心中的不滿。西蒙諾夫堅持：“我想保留這首詩，希望它保持完整。這是獻給我所敬愛的人的，我希望它維持原樣。” [(799)](#_796____RGALI__f__1814__op__1__d)

也許，隨著自己愈益牽涉對蘇維埃猶太人的文學迫害，西蒙諾夫將更多意義注入自己獻給奧滕貝格的詩。他一方面參與斯大林政權的鎮壓，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責備。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這種沖突都幾乎把他摧毀。所擔負的政治責任給他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巨大壓力，這從他的容貌變化上就有明顯的體現：1948年，33歲的西蒙諾夫似乎還是個年富力強的青年男子；僅僅5年之后，他已頭發斑白，活脫脫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經性的皮膚病，只有酗酒才能讓他鎮靜下來。 [(800)](#_796_2)

在人生最后一年寫成的回憶錄中，西蒙諾夫憶起一件事，特別困擾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對現實：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樣的官員的懦弱幫腔。那件事發生于1952年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會議，為的是評選斯大林文學獎的得主。基本上，大家都已同意將此獎授予斯捷潘·左羅賓的小說《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但馬林科夫表示反對，稱左羅賓在戰爭中表現欠佳，讓自己做了德軍俘虜。但在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左羅賓展現了非凡的勇敢，甚至在集中營里還率領一群抵抗戰士堅持斗爭。馬林科夫發言之后，會場上一片死寂。斯大林站了起來，在房間里踱起方步，從一個個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和作家協會領導人身邊走過，大聲問道：“我們應該原諒他嗎？”這既是自問，又在讓大家考慮，仍是一片寂靜。斯大林繼續來回踱步，再一次問：“我們應該原諒他嗎？”依然是一片沉默，沒人開口。斯大林還是在踱步，第三次問道：“我們應該原諒他嗎？”最后，還是他自己作了回答：“讓我們原諒他吧。”每個人都知道，一個無辜的人的命運懸在半空：他要么贏得斯大林獎，要么被送去古拉格。雖然與會的所有作家，至少都認識左羅賓，但沒人膽敢為他辯護，盡管有斯大林的一再敦促。如西蒙諾夫所解釋的：“在我們眼中，這不是原諒或不原諒一個罪人，而是要不要發言，辯駁這樣的指控。”它來自馬林科夫那樣的高官，顯然已被斯大林當做真相。在斯大林看來，他已是罪人，問題只是原諒與否。西蒙諾夫回憶這一事件，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大林一直知道對左羅賓的指控，故意提名該書，讓自己有機會安排這一出“小戲”。他很清楚，沒人會有勇氣為左羅賓辯護，他的目的就是想顯示，只有他一個人才能決定他人的命運。 [(801)](#_797_2)

四

“反世界主義者”的運動打開了蘇維埃反猶太主義的閘門。反猶太主義在俄國歷史悠久，1917年后依然存在，特別是在城市的較低階層中。對猶太商人的憎恨，就是大家不滿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斯大林在攀升到權力高層時曾充分利用這樣的大眾憎恨。社會的低層民眾對20世紀30年代的清洗抱有普遍的冷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大恐怖主要受害者的黨干部都是猶太人。但從總體來看，戰前的蘇維埃政府把反猶主義當做沙皇時代的遺物，給予了認真的清除。相對來說，蘇維埃猶太人并沒受到歧視或敵對的騷擾。這一切卻因德軍的占領而發生變化。納粹宣傳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煽起了反猶太主義的潛在力量，非猶太人口中有相當比例默默支持對猶太人的摧殘，還作為幫兇參與圍捕猶太人——或就地殺害，或送進集中營。甚至在蘇維埃后方的偏遠東部，由于西部士兵和平民的涌入，帶來了對猶太人的憎恨，反猶太主義也有爆炸性的上漲。 [(802)](#_798_2)

戰后，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成為斯大林政權的統治思想。猶太人重被認作“異己的外人”、潛在的“間諜”和“敵人”、以色列和美國的盟友。博爾切戈夫斯基回憶，在“反世界主義者”運動的借口之下，“殺掉猶太佬（Yids）”的氣氛四下蔓延：

“無根”、“世界主義者”、“反愛國”都是黑色百人團 [[13]](#_12_7) 常用的字眼——用以遮掩“猶太佬”一詞的面具。如要脫下面具，直說那甜美的原始字眼，卻又充滿風險。黑色百人團仍是膽小鬼，反猶太主義會受到刑法的嚴厲處罰。 [(803)](#_799_2)

擴大反猶運動的官方語言同樣是遮遮掩掩的。從1948到1953年，數萬蘇維埃猶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學開除、逐出家園，但從不講明（從沒在文書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種族。至少根據官方政策，這樣的歧視在蘇聯是非法的。

戰前，在俄羅斯主要城市的猶太人中，大部分只隱約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他們的家庭，已拋棄傳統的猶太小鎮生活，轉而擁抱蘇聯的城市文化。他們放棄了猶太宗教和猶太種族，轉而接受以蘇維埃國際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新身份。他們認為自己是“蘇維埃公民”，融入蘇維埃社會，攀升到1917年以前遭禁的位置，只是在家里仍保留猶太人的風俗、習慣、信念。戰后的反猶運動，迫使他們重又把自己當做猶太人。

蓋斯特一家是典型的猶太人，離開柵欄區，在蘇聯找到新家。阿隆·蓋斯特被捕于1937年，之前曾是蘇維埃政府的領導成員，擔任副農業人民委員，妻子拉希爾·卡普蘭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高級經濟師。女兒伊娜和納塔利婭從小就學做蘇維埃公民，沉浸于俄羅斯文學的普遍文化和理念之中，幾乎意識不到莫斯科家中的猶太人痕跡——僅有他們吃的食物、蘇維埃節日期間的家庭禮儀以及外祖母敘述的反猶大屠殺舊事。1944年，伊娜注冊為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學生，晚上在教授的實驗室打工，以此自給并幫助母親。1945年，伊娜的母親獲釋于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在莫斯科東北100公里之遙的科爾丘吉諾鎮定居。1948年，伊娜的妹妹申請莫斯科大學遭拒。伊娜想找出原因，黨委書記叫她到申請表格當中去找。原來，納塔利婭在民族一項填了猶太人。 [[14]](#_13_7) 伊娜說，這是她首次意識到自己的猶太出身。一名考分較低的俄羅斯男孩取代納塔利婭，進了莫斯科大學，后來成為一名教授。

1949年4月，伊娜在大學為自己畢業論文答辯時遭到逮捕，被裁定為“人民公敵的女兒”，判處5年，流放去哈薩克斯坦。她在那里的波羅沃耶地區找到一份教師工作，那是一個荒涼、偏遠的草原小鎮。兩個月之后，納塔利婭也被捕，因為她在莫斯科師范學院加入共青團的申請表格上，沒填上父母的被捕。她是在1948年被接納成為該校學生的。她保留了一張父親的照片，而不是公開背棄他，這在審訊員看來，無疑是“社會危險分子”的認罪。納塔利婭也被判處5年，流放去哈薩克斯坦。結果在波羅沃耶地區，她、伊娜和趕來相聚的母親團聚在一起。 [(804)](#_800_2)

維拉·布龍施泰因1893年出生于烏克蘭西部的猶太家庭，1907年尚是小女生時，就在敖德薩加入布爾什維克，成為地下革命活動的積極成員，曾參與布爾什維克1917年10月在莫斯科的奪權。她與一名俄羅斯工人結婚，1926年生下女兒斯韋特蘭娜，1928年離開丈夫（原來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因為他威脅要舉報她為“托派分子”。維拉在國家檔案館工作，又在紅色教授學院攻讀歷史，繼而成為歷史教授；從1938年起，她向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士兵，講授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維拉和女兒未受大恐怖的波及，一直享受著蘇維埃精英的舒適生活，直到1948年。其時，維拉因前夫的舉報而遭逮捕，被裁定犯了“反革命活動”罪，判處5年，被送去波特馬勞改營。斯韋特蘭娜此時已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兼共青團積極分子。她面臨被開除的威脅，更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要她揭發其他學生和教授為“猶太民族主義者”。但她予以拒絕，不愿相信有關“猶太復國主義陰謀”的宣傳。她很天真，甚至寫信給斯大林，抱怨大學里猶太學生受到的歧視。此舉導致自己在1952年被捕，判處10年，被送去維亞特卡勞改營。 [(805)](#_801_2)

奧莉加·洛普提娜―愛潑斯坦1913年出生于猶太家庭。全家人在1917年之后，離開法定猶太區，搬至波爾塔瓦。20世紀30年代初，她本人搬到列寧格勒，與來自法定猶太區的猶太人鮑里斯·愛潑斯坦結婚，成為列寧工廠的會計；兒子馬克出生于1937年。戰爭期間，奧莉加和兒子疏散到車里雅賓斯克。1944年，鮑里斯陣亡于白俄羅斯前錢。1945年，再婚的奧莉加和新丈夫，帶著馬克回到列寧格勒。這座城市的住房長期緊缺，幸虧奧莉加的弟弟在內務部工作，幫助找到共用公寓中一個小間。他們的鄰居大多是工人，抱強烈的反猶態度，經常會在爭論中表露出來。馬克回憶：“那座公寓像是一個種族仇恨的火藥桶，隨時都會爆炸。”

鄰居經常酗酒，每當有什么投訴，就會向我們發泄粗口、詛咒、威脅，叫我們搬去巴勒斯坦。然后，媽媽就會對純俄羅斯人的繼父說：“科利亞，為什么不去管管你那幫部落主義者？”公寓內的氣氛惡劣，有時威脅變得煞有介事，母親就會上訪黨總部[在公寓對面的斯莫爾尼學院]，但她的投訴從來沒有效果。

馬克在學校里被人欺負，其他孩子都拒絕坐在這位“骯臟的猶太佬”旁邊。他住的大樓，大門上畫有“猶太佬”的字眼。奧莉加多次向學校當局抱怨，甚至寫信給黨的領導，都無效。向內務部提出投訴，也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她的弟弟連同許多內務部的猶太雇員，都因列寧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奧莉加出于焦慮而生病，從1949到1953年，連續幾次心臟病發作，幾乎成了殘廢人。第二任丈夫死于1955年，之后，她完全依賴兒子。母子倆繼續生活于同一公寓，周圍是同樣的反猶鄰居，直到奧莉加在1987年去世。馬克65歲時才結婚，方才搬走。 [(806)](#_802_2)

反猶運動也大大影響了拉斯金家庭。1943年，拉斯金一家從戰時疏散地車里雅賓斯克返回莫斯科。塞繆爾和貝爾塔住在長女法尼婭在阿爾巴特區的公寓，再加上熱尼婭的兒子阿列克謝和妹妹索尼婭（熱尼婭仍住在祖博夫廣場的自家公寓）。塞繆爾重操貿易舊業，向國營的食品商店系統供應咸魚。法尼婭繼續在拖拉機工業的管理部門工作。索尼婭在莫斯科龐大的專造汽車的斯大林工廠上班，很快晉升為金屬和技術供應的主管。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戰后的斯大林工廠引進了新技術和高級鋼材，大批量生產輕型汽車和卡車，索尼婭對工作非常投入。她的丈夫恩斯特·扎伊德勒是匈牙利共產主義者，曾在共產國際工作，1937年12月被捕并遭槍決，沒有子女。熱尼婭擔任電臺編輯，竭盡全力照料體弱多病的阿列克謝，不愿向西蒙諾夫求助，伸出援手的反而是自己的父母。西蒙諾夫的父母時有幫忙，1947年帶阿列克謝去海邊度了長假，幫助調養他的結核病。 [(807)](#_803_2)

西蒙諾夫只花很少的時間在阿列克謝身上，每年只有一次或兩次見面。他的母親亞歷山德拉經常需要提醒他別忘了給阿列克謝寫生日賀信。1952年，阿列克謝13歲生日那天，西蒙諾夫的電報未能送到兒子手中，他只得補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阿廖沙！

我一直不舒服，也沒在莫斯科。我到今天才意識到，由于誤會，我為你生日而寫的電報竟沒有送出……我對你的未來充滿信心，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希望你會長大、成為我的一個“小朋友”。過去的一年使你更加靠近這一目標……我每周兩次走過莫斯科大學的新大樓；我一直認為，你總有一天會在那里上課。然后，你會踏上你的工作征程——奔赴國家派遣你去的地方。歡樂的召喚在等待著你，以及像你那樣的數百萬兒童。心懷喜悅，向往這一天；工作愉快，歡迎這一召喚…… [(808)](#_804_2)

對這封信的拘謹刻板，阿列克謝并無不適之感，父子之間的交往歷來如此。由于只有很少的通信，他珍惜其中的每一封。父親的信通常是打字機打的，這意味著它們是父親口述給秘書的，都是諄諄教導的口氣，與其說是父親寫給兒子的家信，毋寧說是黨干部的公函。下面這一封寫于1948年的夏天，其時，阿列克謝僅8歲：

親愛的阿廖沙：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繪畫。至于繪畫，在我看來，還真不錯，特別是那只小公雞。但目前還不是驕傲的時候，記住，父親在你這個年齡可以畫得更好。所以你必須加倍努力，迎頭趕上。我希望你對爭取高分的允諾，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會很快變成現實。我將會為此而感到非常高興。 [(809)](#_806____Interviews_with_Mark_Eps)

阿列克謝記得父親經常告訴他，“血緣”在他看來沒有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民主原則”之一，同事、下屬、家人都一視同仁。阿列克謝承擔了父親這些原則的代價。他不明白，頗受他人歡迎的著名父親，留給自己的時間卻這么少。父親僅有幾次來接他出去；阿列克謝每次都感到尷尬，長時間保持沉默，但父親從沒注意到他的不安。1947年春天，西蒙諾夫從美國帶回一套西裝（棕色的外套、短褲和一頂帽子），送給兒子。阿列克謝并不喜歡短褲——穿上時，會遭到院子里其他男孩的嘲笑，甚至毆打——所以將它藏進抽屜。幾星期后，一輛政府轎車來到祖博夫廣場的公寓前，要接阿列克謝去看一年都沒見面的父親。阿列克謝的外祖母貝爾塔特意讓他穿上棕色西裝，以示他很喜歡父親的禮物。其他男孩聚在院子里查看轎車，眾目睽睽之下，阿列克謝走出了家門，坐進轎車，被帶到西蒙諾夫包房招待朋友的大酒店。父親讓7歲的男孩面對人群，“報告”過去一年在學校的成就，聽完之后再推出一個驚喜：白衣白帽的廚師走進來，手捧盛有“驚喜蛋餅”（由冰淇淋做成）的大銀碟。阿列克謝留下來吃“蛋餅”，父親則與朋友們交談應酬。在阿列克謝眼中，父親似乎是“全能和神奇”的。西蒙諾夫后來轉向兒子，問他是否喜歡身上的西裝，阿列克謝給了一個很禮貌的回答。過不多久，阿列克謝又被送回家——如他所回憶的，“等待下一次與父親的見面，也許1個月，也許6個月，取決于他政府工作的繁忙程度”。 [(810)](#_806_2)

至于對阿列克謝的忽視，除了母親亞歷山德拉，唯一敢于批評西蒙諾夫的就是索尼婭。1947年10月，索尼婭寫信給西蒙諾夫。阿列克謝又一次發病，急需拉斯金一家無法獲得的營養品和藥物：



塞繆爾和貝爾塔，索尼婭，熱尼婭和阿列克謝，攝于1948年左右

我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你，應對兒子負責（僅是第二次？），這是很令人討厭的。你讓自己變得漠不關心，其程度令我吃驚。相信我，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孩子的必需，我和熱尼婭都不會來找你。要你幫忙，我們都感到頗不自在——完全是你的緣故——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任憑阿廖沙受苦受難。如果處于不同的情形，我會把你徹底忘掉，甚至會阻止你的兒子去愛一個不愿為他犧牲兩小時的父親。關于這一點，我以前曾向你提過。 [(811)](#_807_2)

1950年5月，索尼婭被捕，單獨關在莫斯科的列福爾托沃監獄，因斯大林工廠一案而接受審訊。該廠的猶太工人被指控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這源于1948年該廠工人組隊前往莫斯科的猶太劇院。斯大林工廠有相當數量的猶太工人，大多是工程師和行政人員，向來支持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和以色列建國。他們的文化活動，更得到了工廠副主管亞歷山大·濟蒂諾夫的鼓勵，他還讓美國駐蘇大使前去參觀。這已足夠讓國安部炮制出一個“斯大林工廠反蘇維埃集團，成員是猶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向美國透露工業機密。推動調查的是赫魯曉夫，他自1949年12月起，擔任莫斯科的市委第一書記，很有可能是在執行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已在擔憂猶太人的“間諜”和“陰謀者”無處不在。受軍事法庭的定罪，濟蒂諾夫成為后來被槍決的14名“領導者”之一。這個工廠的100多名猶太工人，外加其他工廠的數百名猶太工人，被送去各個勞改營。 [(812)](#_808____A__Simonov__Chastnaia_ko)

索尼婭被判處25年的苦役，送去遠北地區的沃爾庫塔勞改營。法尼婭和熱尼婭在塞繆爾和貝爾塔的面前隱瞞了苦役期限，只說是5年，因為擔心真相會使他們絕望。索尼婭去了沃爾庫塔的磚廠，以她一貫的充沛精力和主動性投入工作。即使身在古拉格，她仍完全致力于蘇維埃的工業事業。索尼婭獲得獎勵，成為勞改營的圖書館員，那是一個讓人稱羨的工作，但在家書中，她經常流露自己的無奈：如果不是整理書籍，而是充任資深的工業家，她本可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索尼婭的被捕給塞繆爾的健康狀況造成很大影響。據法尼婭說，在她流放期間，塞繆爾似乎承受了巨大的悲傷。索尼婭被捕時，塞繆爾71歲。以前，他一直非常開朗愉快，充滿旺盛的生命力。女兒被捕后，他變得年邁體衰，再也無法以原先的步調工作。不過，家庭傳統仍然繼續，其后5年中的每一個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仍像往常一樣，為著名的“拉斯金晚餐”而聚在一起，貝爾塔繼續準備可口的猶太菜肴，塞繆爾繼續舉行他的廚房議會。西蒙諾夫從未出現，但他的父母經常露面。法尼婭回憶：“他們與眾不同，來自不同的階層，與我們的父母倒相處融洽，他們喜愛熱尼婭和阿列克謝。”晚餐的開幕祝酒詞始終相同：“為了她的歸來！”如果索尼婭的信恰恰在過去一周收到，就會被大聲念出，聚集的客人展開討論，總是會掉眼淚。每個人都會向索尼婭表示問候，由熱尼婭執筆寫入回信。

20世紀50年代初，許多勞改營的條件開始有所改善。古拉格管理員想方設法促使囚犯作出更大努力，像索尼婭那樣的模范員工，每周一信并不出奇。審查員仍然檢閱通信，但依據較為寬松的規則，囚犯和親人的交流可能有久違的坦率。有時，索尼婭甚至獲準給家里打電話——家人太激動了，以致語無倫次。在一次這樣的電話之后，熱尼婭寫信給索尼婭：



熱尼婭（左）與索尼婭，1952年攝于沃爾庫塔

我親愛的姑娘，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尤其是媽媽和爸爸，這是何等的高興，你簡直無法理解。這使他們更容易堅持到你歸來。爸爸渾身顫抖，第一分鐘內簡直說不出一句話。他們聽到你聲音時的幸福感，無法以言語來表述……阿列克謝——長……得這么高，你都快認不出他了——跟你說話時顯得緊張，所以他的聲音聽起來怪怪的。他談及有關剃須的蠢話，隨后又為之沮喪起來。

1952年，熱尼婭去沃爾庫塔探望索尼婭。允許親屬探視囚犯是古拉格系統放寬政策的一部分。熱尼婭是沃爾庫塔首批探訪者之一，離家前夕，要求西蒙諾夫前來祖博夫廣場的自家公寓。阿列克謝無意中聽到父母的對話。熱尼婭很害怕可能會遭到勞改營的拘留（囚犯親戚中普遍存在的恐懼），便要西蒙諾夫作出莊嚴的承諾，無論發生什么，都要將兒子留在塞繆爾和貝爾塔的身邊，直到她歸來。熱尼婭是生活中的外交官，具有非凡的能力，與各種人都能友好相處，不作自己的評判。但在這個問題上，她卻非常堅定——這是一個原則問題：阿列克謝不能與西蒙諾夫一起生活。

熱尼婭從不為自己向西蒙諾夫提出要求。1951年，電臺行業出現了對猶太人的大清洗，她也被解雇，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她向幾十家文學雜志和報紙查詢工作機會，并送上自己的文章，以圖發表，但從沒向西蒙諾夫求助。不過，為了索尼婭，她什么都愿做。其時，熱尼婭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爭取索尼婭的獲釋，她寫信給所有的有關當局——包括判處索尼婭的軍事法庭、負責審查該案件的軍事檢察官甚至《真理報》編輯部，以伸張正義。到最后，熱尼婭才轉向西蒙諾夫。過去6個月當中，她數次與他見面，希望得到相關的信息和建議。但西蒙諾夫不愿介入，熱尼婭寫信給索尼婭說：

你無法想象科斯佳[西蒙諾夫]的變化，我們曾熟悉的他已不復存在。過去幾年中，我很少見到他，每次見面永遠都不會超過幾分鐘。所以他的新性格，讓我大大吃驚——你一定也會有同感……原因不在于他的年紀越來越大（他仍算年輕），也不在于他因經驗而變得更聰明，更不在于他的高級地位和收入。不，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科斯佳承諾，我們將得到需要的信息。我認為，值得等待，因為這些信息很可能是可靠的，但他迄今未做。毫無疑問，他太忙了……他本可做得更多，但——愿上帝與他同在——讓他去過安靜舒適的生活吧。我已不再尊重他。

但從西蒙諾夫的角度考慮，即使他想出手干預，可能也無濟于事。當然，這也是拉斯金家其他人的看法，所以繼續以熱情和尊敬相待。在罕見場合中，他們見到他，從不提索尼婭的事。法尼婭解釋：“我們知道，他與斯大林走得很近，可以討一個人情。但我們中沒人提起——我們只是不想讓自己走到這一步。” [(813)](#_808_2)

反正，西蒙諾夫已糾纏于斯大林的反猶運動，即使想幫拉斯金一家，可能只會讓自己陷入困境。西蒙諾夫1950年接管《文學報》，就收到克里姆林宮的指示，要在“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中，向它的立場靠攏。以前的主編太軟弱，斯大林現在要依靠西蒙諾夫將這份富有影響力的報紙改造成黨的先鋒隊，在蘇維埃文化中開展“反資產階級異己分子的斗爭”。西蒙諾夫一走馬上任，就以“工作表現差和政治錯誤”的名義，開除了該報11名工作人員（全是猶太人）。在他的掌控下，該報定期發表文章和社論，積極開展“思想斗爭”，以反對“世界主義者和對西方的奴顏婢膝”，個中的反猶太主義昭然若揭。在反世界主義者運動的初期，西蒙諾夫曾是“溫和派”，此時看來，正在變成強硬派一員。他一直堅持這個立場，直到斯大林政權的終結。1953年3月24日，即斯大林逝世的兩個多星期之后，西蒙諾夫還代表作家協會的秘書處，寫信給中央委員會，列舉需要開除的猶太作家（稱之為累贅）。之后，他還寫信給中央委員會，堅持要清洗他的老朋友和戰友亞歷山大·克里維斯基——其時擔任《文學報》的國際部編輯。根據舉報信，清洗的理由是“某些履歷事實”，以及克里維斯基對猶太民族主義者缺乏警惕。 [(814)](#_810_2)

警惕就是西蒙諾夫試圖展示的。反猶太主義者似乎得到克里姆林宮的支持，發起了一系列攻擊。西蒙諾夫面臨越來越沉重的壓力，只好作出慣常的應對：拼命證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反對西蒙諾夫的運動始于1951年，牽涉到猶太作家可否使用筆名的公開爭論。斯大林在討論斯大林文學獎的會議上詢問，作家奧列斯特·馬爾采夫為何不用自己的猶太名字（羅溫斯基）；并提出建議，從今以后，在所有正式表格中，使用俄羅斯筆名的人必須在括號內列出自己的猶太名字。 [[15]](#_14_7) 這其實是沙皇時代的官方習慣，當時的猶太人和革命者被視作一丘之貉，但1917年之后，這種做法被認作反猶主義，已經廢棄。自1949年以來，蘇維埃報刊開展了有關筆名的廣泛討論，其中的強硬派敦促重啟披露猶太名字的舊制度。1951年2月，《共青團真理報》刊登了米哈伊爾·布本諾夫的文章（《筆名仍有必要嗎？》）。這是一篇卑劣的文章，帶有公開反猶的色彩。布本諾夫嘲弄猶太作家的筆名，指責他們是“逃避社會的變色龍”。西蒙諾夫以《文學報》主編的名義作出回應，聲稱使用筆名是私人選擇，他援引20世紀20年代的相關法律，并簽上自己的名字“康斯坦丁（基里爾）·西蒙諾夫”。這是一個勇敢的舉動。《共青團真理報》隨即登出聲援布本諾夫的文章，執筆者是赫赫有名的《靜靜的頓河》作者米哈伊爾·肖洛霍夫。西蒙諾夫懷疑，真是肖洛霍夫寫的嗎？他很想打電話單獨問他，究竟承受了何等壓力，但到最后還是放棄了。相反，他在《文學報》寫了第二篇文章，指責肖洛霍夫和布本諾夫只是在作“廉價的煽情”，并聲稱就此停筆，不再多寫一字。 [(815)](#_813____Interviews_with_Fania_La)

但其他成千上萬的人繼續發表各自的見解，新聞界收到雪崩般瀉來的讀者來信，有些人支持西蒙諾夫——其中有許多猶太人，其余的則選擇匿名。但是，大多數來信贊同布本諾夫。在他們看來，在蘇聯沒有使用筆名的必要，“不管是哪一個種族，大家都一律平等”，除非猶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許多來信具有強烈的反猶色彩，指責西蒙諾夫充當“猶太人的辯護人”。 [(816)](#_813_2)

此時還興起一個反西蒙諾夫的謠言運動，有傳言稱他是猶太人。作家協會的主要成員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對反猶運動持反對態度，在1952年的年尾來找西蒙諾夫。他告訴西蒙諾夫，過去一年中，他曾參與中央委員會高層官員的幾次討論，因為收到一系列的舉報，揭露西蒙諾夫是“秘密猶太人”。有人稱，他的真名是西蒙諾維奇，實際上是“奧博連斯卡婭伯爵夫人”莊園上猶太工匠的兒子，嗣后獲得伯爵夫人的收養。還有人稱，他是來自圣彼得堡受過洗的猶太人的兒子。他們還紛紛指點他的“猶太外表”和化名（以康斯坦丁代替基里爾）。一開始，西蒙諾夫不予理會，認為這些謠言極其荒謬：他母親是公主，不是伯爵夫人，更沒有莊園。到后來，資深黨員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的舉報，也提及“西蒙諾維奇”的傳言。他指責西蒙諾夫在《文學報》提拔猶太編輯人員，其目的就是要將之改造成“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1953年1月，威脅氣氛愈益急迫。蘇爾科夫再次造訪西蒙諾夫，透露作家弗拉基米爾·克羅日科夫告訴自己，已有證據表明，莫斯科有一個文學團體，與東歐、蘇聯各地的猶太民族主義者都有聯系。據克羅日科夫所說，這個團體的負責人就是西蒙諾夫。蘇爾科夫告訴西蒙諾夫這一切，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因為克羅日科夫曾要他發誓保密。蘇爾科夫警告：“有一些王八蛋正在四下挖你的墻腳，為你挖掘墳墓。” [(817)](#_814_2)

在這一段時間，反猶活動也抵達高潮，最后一幕是荒謬的“醫生事件”，起源于1948年。當時，同時也為國安部工作的克里姆林宮醫院醫生利季婭·季馬舒克，在日丹諾夫死前兩天寫信給斯大林，聲稱有關醫生疏忽了日丹諾夫的嚴重病癥。該信并沒引起注意，被束之高閣。3年后，斯大林卻用它來指控克里姆林宮醫生屬于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涉嫌謀殺日丹諾夫和其他蘇維埃領導人。給日丹諾夫治病的醫生都不是猶太人，為了將日丹諾夫的死亡與猶太復國主義者連接起來，斯大林只得另想計策。醫生陰謀的憑空捏造，全靠雅可夫·埃廷格爾醫生的屈打成招。他是杰出的診斷專家，曾向親友說出自己的反蘇維埃思想，于1950年11月被捕。埃廷格爾供認自己是猶太民族主義者，還受到國安部主管維克托·阿巴庫莫夫的保護，后者于1951年7月被捕。之后，數百名醫生和國安部官員被捕，受盡折磨后紛紛招供。斯大林憑此編造出一個巨大的跨國陰謀，內有醫學界、列寧格勒黨組織、國安部和紅軍中的蘇維埃猶太人，外有以色列和美國。整個國家似乎要返回1937年的氛圍，讓猶太人扮演“人民公敵”的角色。1952年1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說“每一個猶太人都是潛在的美國間諜”，從而使全體猶太人成為他的恐怖運動的對象。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逮捕，被逐出工作單位和家園，成為“無根的寄生蟲”，從主要城市流放到蘇聯的偏遠地區。斯大林下令在遠東建造龐大的新勞改營，收留所有的猶太人。在整個蘇聯地區，人們都在詛咒猶太人。病人拒絕看猶太醫生，迫使他們歇業，很多人只好出賣體力掙錢。有人造謠惑眾，稱醫生在自己病房殺害嬰兒，孕婦因而躲避醫院。人們寫信給報刊，呼吁蘇維埃當局“清除寄生蟲”，“從聚有太多猶太豬的那些大城市，把他們趕出去流放”。 [(818)](#_814_2)

然而，就在這個歇斯底里的高峰期，斯大林死了。

五

斯大林中風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醫生請來，他可能還有救。但在醫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沒人敢自作主張。斯大林的私人醫生曾說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從昏迷中醒來，發現床邊的醫生，可能會視召來醫生的決定為不忠的表現。 [(819)](#_815_2) 這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諷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當晚，西蒙諾夫參與克里姆林宮的蘇維埃領導會議，列席會議的是300名最高蘇維埃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家都知道局勢的嚴重，大多數代表早早來到斯維爾德洛夫廳。西蒙諾夫回憶：“我們互相知曉，互相認識，在工作場合相遇過多次。”

我們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對視，但沒人說話，沒人向任何人問起任何事。在我看來，甚至沒人覺得有開口的必要。[會議]開始之前，大廳里一片寂靜。如果沒在那里親自坐了40分鐘，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這么近，卻能不發出一點聲響。

最后，主席團 [[16]](#_15_4) 成員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諾夫得到的強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這個小圈子的其他成員都為此松了一口氣：這可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也可從他們的語調中聽出。 [(820)](#_817____RGASPI__f__17__op__119)

西蒙諾夫從克里姆林宮直奔《真理報》辦公室，正與主編交談時，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盡管已有預料，這一消息仍令他震驚。西蒙諾夫回憶：“我內心打了一個寒戰，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經結束，說不清楚的新部分開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覺得，需用詩歌來記錄自己的思緒。他不知道是否寫得出，但他確定自己無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開始動筆：

我寫了最初兩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淚流滿面。我現在仍可否認，因為我并不喜歡眼淚，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淚，才能正確表達我當時經歷的震撼。我哭，不是因為悲傷，也不是因為對死者的遺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淚，而是震撼過后的眼淚。發生了一場革命，其影響如此巨大，必然有身體上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沉淀成了俘獲我幾分鐘的痙攣哀泣。

西蒙諾夫后來與同行們交流，發現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許多人追隨他的榜樣，寫下對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來，以廣為不同的方式經歷斯大林統治的人，都感到震驚和悲傷。斯大林去世的當晚，西蒙諾夫寫道：

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難忍的痛苦和悲泣，

無法用詞句來敘述

如何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紀30年代背棄自己家庭的“富農”之子特瓦爾多夫斯基寫道：

在這大悲痛時刻

我無法找到哀辭，

來充分表達

全體人民的損失……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遺體

甚至在大恐怖時期入獄兩年的奧莉加·貝戈爾茲，也為虐待自己的人寫下挽詩：

我們的心臟在出血……

我們自己的最親愛的人！

抱著你的頭顱，

全國都為你流下斑斑淚痕。 [(821)](#_817_2)

向大眾公布斯大林死訊是在3月6日，3天后舉行葬禮。當中這段時間，他的遺體停放在紅場附近的圓柱廳供人瞻仰。前來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擠滿了來自蘇聯各個角落的送葬者，數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諾夫中選擔任斯大林遺體的護衛，有機會觀察普通百姓走過遺體時的反應。他在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不知如何準確地描述現場——如何以文字表達。并非每一個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個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個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隊走過，第一次看到靈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剎那，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某種精神痙攣。 [(822)](#_818_2)

這種“精神痙攣”，整個蘇聯都能感受得到。馬克·拉斯金沒有理由熱愛斯大林，但聽到死訊時仍泣不成聲。他為自己的感傷感到驚訝，歸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發揮了巨大影響：

我成年后的時光都在斯大林的陰影下度過的——列寧死于1924年，當時我16歲——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時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問向他提出，他也給了全部的答案，既簡潔，又精確，沒有絲毫的懷疑余地。 [(823)](#_818_2)

在拉斯金的同齡人或更年輕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們的道德基準。不管他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際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會有迷失感，其自然反應就是他們的悲傷。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對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達·布舒耶娃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淚流滿面，盡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時光卻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度過。女兒安吉麗娜追憶母親那一天回家時的情景：

母親、姐姐、外祖母，她們都哭了。外祖母說，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豈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歲，熱愛他，經常給他寫信。她認為，允許自己寫信給女兒[身處勞改營]的是斯大林，從而使得全家破鏡重圓……外祖母不斷地說：“如果我死，他活，豈不更好。”我沒有反駁——我也熱愛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對她說：“外祖母，你都在說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這么多苦難：女兒被捕，外孫女被送進孤兒院，女婿遭槍決，作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卻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斯大林。 [(824)](#_819_2)

但對觀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輩人來說，斯大林的死亡同樣可以成為歡慶的理由。

斯韋特蘭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巴爾瑙爾。父親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槍決于1938年。母親來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參與社會民主運動。母親的16名親屬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韋特蘭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爾什維克槍斃，要么在勞改營喪生。斯韋特蘭娜對此知之甚少，從小就學做蘇維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樣，熱愛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從學校回來，頭發上系有黑色緞帶，學校里辦的哀悼儀式——孩子們以棕櫚葉和白色百合花裝飾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動了她。她回憶：“我們全都哭了，認為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韋特蘭娜爬上屋頂，那是她喜歡獨處的地方，結果發現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靜靜地哭，以我從沒見過的方式劃十字。看到我哭腫的眼睛，她說：“別擔心，親愛的，我因幸福而哭。因為他殺了我的家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斯大林把他們都殺了——只留下我和你母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些。然后，我們兩人坐下來一起哭，既為歡樂，也為悲傷。 [(825)](#_820_2)

對絕大多數蘇維埃人民來說，無論斯大林的死亡意味著什么，卻都不是擺脫恐懼。事實上，反而可能增加他們的恐懼，不知道未來將有怎樣的災難。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講述了她與她的裁縫的對話，那是少數幾個與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時間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1953年3月6日，基輔高爾基坦克工廠舉行悼念儀式

我問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給你帶來什么？”她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已學會了如何與他相處。現在怎么辦，又會發生什么，誰能知道呢？事情可能變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826)](#_821_2)

鮑里斯·德羅茲多夫與父母同住在馬加丹；父親曾是別爾津的親信，1951年獲釋于勞改營。鮑里斯回憶：“斯大林去世時，大家都嚇壞了，父親也在害怕。人們擔心貝利亞將上臺，大家都怕他。與古拉格系統相連的是貝利亞和內務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還以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勞改營的真相。” [(827)](#_822_2)

維拉·布拉金的母親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為“富農”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勞動大軍累死于1944年。維拉回憶：“斯大林去世時，母親并沒摘下他的肖像，仍掛在墻上，緊挨父親的照片。”在村民大會上：

每個人都在哭泣……人們將斯大林與戰爭的勝利、物價的降低以及配給供應的終止連接在一起，認為生活將會慢慢好轉。現在則擔心，將會變得更糟。

許多農民產生類似的焦慮。“富農”的女兒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回憶：“戰爭期間，我們的生活變得異常困難。但在最近幾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時，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 [(828)](#_823_2) 她是在勞動大軍中度過戰爭歲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集體農莊工作。

擔心斯大林的去世將導致新一輪的大規模逮捕，使許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親人的家庭。埃爾加·托爾欽斯卡婭記得：

我們家的普遍反應是，“接下來會是怎樣？”我們害怕政府，不知道應該期待什么。我們提心吊膽，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來

報復斯大林的死亡。 [(829)](#_824_2)

等到“醫生事件”被揭露為政府的向壁虛造，恐懼氣氛才開始減弱。揭示真相的決定似乎來自貝利亞，3月5日接管權力的“集體領導”以他為首——他不贊成反猶太主義運動，如果確實發生了“醫生事件”引起的國安部清洗，他自己會是潛在的受害者。盡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廣大民眾對他心懷恐懼，貝利亞卻是某種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廢除古拉格系統（以經濟效率低下的理由），結束蘇維埃警察的酷刑，扭轉烏克蘭西部、波羅的海地區、東德的蘇維埃化，鏟除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他認為，這樣一個計劃將為自己的獨裁統治贏得廣泛的支持。4月4日，貝利亞取消對“醫生事件”的調查。《真理報》宣布，“不正當調查”的負責人已經被捕，將承擔“刑事責任”，但大眾的輿論五花八門。根據《真理報》收到的工人來信樣本，許多人繼續相信：權力機構的幕后仍有“難以捉摸的敵人”；醫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猶太人影響”政府高層的標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們的政府就向猶太人低了頭”，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對猶太醫生的惡意中傷，要求對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釋。 [(830)](#_825_2)

對托爾欽斯基家來說，“醫生事件”的結論是巨大的解脫。他們視之為強有力的證據，所有的“敵人陰謀”都是國家捏造的，不必再擔心新一波的逮捕。埃爾加逃脫恐懼的羈絆，信心大增，開始仗義執言，反擊一直欺負自己的人。埃爾加在列寧格勒的民族博物館擔任助理，有一個資深同事，名叫瑪麗亞·涅斯捷羅娃。她是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又是“可怕的反猶太主義者”，極力支持“反世界主義者”運動，舉報了博物館數十名猶太員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醫生事件”的集體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羅娃對猶太人的指控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譬如，她告訴大家，猶太醫生接生的嬰兒都呈藍色，就是因為他們的血液已被猶太人吸走。埃爾加明白，與顯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羅娃爭執，毫無意義；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寧愿退避三舍。“醫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來之后，埃爾加一改常態，起而與她針鋒相對：

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挑明她是在胡言亂語，她講的一切都是鸚鵡學舌，來自排隊購物者的八卦……瑪麗亞開始威脅我：“你知道我的厲害嗎？你給我閉嘴！”然后，我不知從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氣：“得了吧，別威脅我，我根本就不怕你。” [(831)](#_827_2)

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悅的人，大多過于謹慎，不會在公共場合流露，任何的高興必須遮掩起來。克拉斯諾達爾城的工人季娜伊達·貝利科娃回憶，斯大林去世時，鎮上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醫生、教師甚至黨干部，都難以掩飾自己的興奮。“克拉斯諾達爾城的追悼會更像一個節日，他們擺出悲傷的面孔，但眼中卻閃爍著興奮，互相打招呼時卻有微笑的暗示，他們內心的喜悅昭然若揭。” [(832)](#_828_2)

蓋斯特家人聽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時，仍在哈薩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擔心受到“醫生事件”的牽連，擔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親拉希爾從商店買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內從來沒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種原因，那一天卻有供應。定居地的居民沒人敢去買，擔心被視作慶祝的證據。但拉希爾卻認為遇上了好運，應該無妨。女兒們看到她買的糖，反而嚇壞了。伊娜回憶：“我們趕緊抱住可憐的媽媽，一下子變得歇斯底里。她怎能在這種日子買糖呢？人家會作何聯想呢？可憐的媽媽！恐懼已讓我們失去了理智。” [(833)](#_829_2)

在古拉格勞改營和殖民營，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飾的歡迎。當然也有例外，有的勞改營特別警惕，或有舉報人的存在，阻止囚犯們流露他們的真情。一般來講，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發的喜悅。因塔勞改營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萊里·福雷德，3月6日與他們的朋友詩人斯梅利亞科夫見面，準備組織一次午夜聚會。他們無法獲得任何酒類（每個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買來一包糖果，“統統吃光……好像我們是參加茶會的小孩子”。在維亞特卡勞改營，維拉·布龍施泰因和難友們聽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開始載歌載舞，“我們要回家了！我們要回家了！”囚犯們普遍認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將獲得釋放，充滿了希望和期待。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聽到這個消息時，仍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流放地。她捂住臉，不讓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開始顫抖，渾身充溢著緊張的激動：“要么現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變。要么現在，要么永不。” [(834)](#_830_2)

有幾個勞改營，其囚犯的期望極為殷切，到頭來卻沒獲得開釋，因而發動了大規模的抗議和暴動。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諾里爾斯克和沃爾庫塔的勞改營都爆發了大型的罷工和抗議。1953至1954年，許多其他的勞改營也有規模較小的示威。 [(835)](#_831_2) 這些“奴隸起義”是重要的轉折點，不僅促成了蘇維埃領導早已質疑的古拉格系統的廢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規模抗議。

諾里爾斯克起義是古拉格歷史中最大的一次，涉及戈爾拉格監獄的6個營區、近2萬名犯人。那里是諾里爾斯克的采礦工業綜合企業，工作要求特別苛刻。戈爾拉格監獄的大多數囚犯，是前紅軍士兵、外國戰俘，以及來自烏克蘭和波羅的海的民族主義者。其中很多人曾在1943至1945年抗擊蘇維埃軍隊，為此而服25年刑期。他們敵視斯大林政權，隨時準備反抗，沒有后顧之憂。一大批囚犯在卡拉干達勞改營參與武裝起義之后，在1952年秋天被轉移到戈爾拉格監獄。這些叛亂分子的涌入，對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的政治心態，造成了激進的影響。戈爾拉格監獄的各區紛紛成立了專設的“罷工委員會”。囚犯列夫·內托所在的第4區，甚至出現了秘密的閱讀討論俱樂部，自稱為“民主黨”（又叫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這些囚犯研究列寧有關地下工作的思想，沿武裝斗爭的路線把自己組織起來。

斯大林的去世更增強了他們獲釋的希望。但貝利亞宣布于3月27日的特赦只適用于判刑少于5年的囚犯（主要是刑事犯）。戈爾拉格監獄的條件變得更加糟糕，每天工作時間延長，囚犯被迫在風刀霜劍中出工，而口糧又減少至最低限度。獄警開始殘酷對待囚犯，讓刑事犯向“政治犯”故意挑起械斗，然后趁機再以暴力鎮壓“政治犯”。從3月到5月，20多名“政治犯”遭到獄警的殺害。發生叛亂的還有其他勞改營，其中的獄警挑釁幾乎肯定是為了保住古拉格系統。貝利亞已明確表示，他想廢除古拉格系統，釋放最危險人物之外的全部囚犯。如果無法證明釋放“政治犯”將對社會造成危險，成千上萬的古拉格獄警和管理員將會發現自己的工作沒了。

戈爾拉格監獄罷工委員會和地下組織中的各式囚犯，意見分歧。有人贊成起義，也有人認為這是自尋死路，最后的決策是武裝起來，實施自我防衛。在車間里籌備武器的內托回憶：“我們以零碎鋼料自制刀具。”雖然沒有起義計劃，但在這高度緊張的氛圍中，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進一步的挑釁，隨時都會導致造反。 [(836)](#_832_2)

對列夫·內托來說，這些事件是自己政治上覺醒的高潮，那是一個漫長過程，始于1944年——其時，列夫空降于德軍后方，受命在愛沙尼亞組織游擊隊斗爭。他出生于莫斯科的愛沙尼亞家庭，一直把自己當做蘇維埃俄羅斯人，只是具有愛沙尼亞的背景。他完全出于愛國心而去執行這一項任務，但在父母的故鄉所親眼目睹的（紅軍參與搶劫、強奸、縱火），使他重新思考：蘇維埃軍隊究竟是不是愛沙尼亞的“解放者”。當地居民稱蘇維埃軍隊為“斯大林的土匪”，他無言以對，只得同意。

列夫遭到德軍捕獲，與數千名其他蘇維埃俘虜一起被囚禁在戰俘營。這也是一個覺醒時機。他始終相信——如蘇維埃所宣傳的，沒有蘇維埃戰俘，只有逃兵。但他回憶，在這里：

像我一樣，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成了蘇維埃政權的炮灰……我開始厭惡斯大林和蘇維埃制度，他們一直在欺騙我，不把我們[士兵]當人。

到1945年春天，他待在美國軍隊管理的戰俘營，有機會對照蘇維埃制度和美國人的態度：

美國人每次參加作戰行動，回營后交出槍支，第二天再去領不同的槍支。但[在蘇維埃軍隊中]我們每人負責自己的槍支，如有遺失，就會被拖進法庭，或監禁，或槍決。美國人更重視個人價值，但在我們這里，個人是分文不值的。

列夫返回蘇聯后，先去過濾營，再重新入伍。1948年，他被當做外國間諜遭到逮捕，被送來諾里爾斯克。他在此遇上了民主黨領袖費奧多爾·斯米爾諾夫，后者促使他將斯大林政權視為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背離。民主黨的形成，全靠非正式的信任和同志間的友情。 [[17]](#_16_4) 舉報人永遠是潛在的危險，所以沒有白紙黑字，如想參加，必須有現成員的介紹，并為新人負責。在這種環境下，像列夫那樣的囚犯，才能發展和表達自己的政治身份。 [(837)](#_833_2)

起義發生于5月25日，因為獄警朝出工的囚犯隊列開槍，抗議的罷工迅速蔓延到戈爾拉格監獄所有區域，包括女囚區，但大本營是在第4和第5區。那里的囚犯——西部烏克蘭人、波蘭人、波羅的海人——激進好戰，業已組織起來。他們的武器有斧頭、刀具、丁字鎬，但主要是靠絕食，向勞改營當局施壓。內托回憶：“我們的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我們希望獲釋，決心以死相搏來爭取自由。我們認為，寧可死于戰斗，也不愿在這種不人道的處境中茍活下去。”這是斯大林的奴隸證明自己是公民的時候。叛亂分子把自己鎖在營房里，升起黑旗，以抗議對難友的任意殺戮。每一區域各有自己的罷工領袖，但很快成立罷工總委員會，向當局提出要求。內托擔任各區域之間的通訊員、協調者，那是一項非常危險的任務，在各區域之間跑來跑去，隨時都有被槍殺的危險。 [(838)](#_834_2)

罷工者的要求都與尊重和尊嚴有關。即使有世界末日般的口號，罷工者的要求其實相對溫和，絕對沒有反蘇維埃。 [(839)](#_835_2) 他們要求獄警叫他們的名字，而不是囚服上應被刪除的編號；要求拆除營房窗口上的鐵窗欞；要求獄警終止毆打囚犯，殺人的獄警要受到懲罰；要求一天10小時正常工作，而不是大多數囚犯被迫從事的15小時輪班；要求與親屬自由通信，而不是一年兩次。罷工委員會知道，當地的主管無法做主，便拒絕與諾里爾斯克當局談判，要求直接與莫斯科政府談判。幾天后，即6月5日，貝利亞派出他的高級官員，前來與罷工領導人交涉。這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先例。以前，克里姆林宮都以暴力來回應囚犯的要求。貝利亞的使者答應將罷工者的要求轉達給政府，但呼吁迅速復工，還稱他們的工作對國家很重要，獲得了高度重視。這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因為罷工者最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認可。借用內托的話語即是：

我們已作出很大的犧牲，為國家提供鎳，為此而感到自豪。我們聽到的這些感謝詞句——那可是出自貝利亞的代表之口——好比是精神食糧，振作了我們的精神，使我們更愿妥協。只要他們把我們當人對待，當人交談，我們愿意作出更進一步的犧牲。 [(840)](#_837_2)

罷工者中出現了分歧，有人想繼續罷工，有人愿意復工，希望通過合作來爭取莫斯科作出讓步。事實上，激進者很難真正堅持下去，更不用說獲得勝利。他們被隔離在監獄區域，周圍有士兵的包圍，很難獲得諾里爾斯克其他囚犯的支持。所以，諾里爾斯克的首席檢察官在廣播系統上發表講話，要他們散開，承諾不予懲罰。大多數囚犯聽從了指揮。獄警把他們分成小組，帶走首要分子，允許其余的返回營房。但仍有幾千人不愿就范。7月7日在第6區，1000名女子圍繞一面黑旗組成人圈，里外一共4圈。士兵試圖來拖人，她們就發出尖叫、吹起口哨，持續整整5個小時，最后被救火水龍頭沖散。在第5區，1400名囚犯拒絕離開，與士兵展開近距離搏斗，士兵開槍打死了20名囚犯。據報道，最頑強的抵抗發生于第3區，幾百名罷工者把自己鎖在營房，與士兵對峙，一直堅持到7月10日。意想不到，這些叛亂分子的帶頭人竟是謝苗·戈洛夫科。他是北高加索地區的青年哥薩克，突然燃起內心的勇氣，領導了這一場殊死的搏斗。他回憶道：“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還有這樣的勇氣。一開始，士兵來敲門，揚言要開槍，我很害怕，一直在祈禱上帝。但是，一旦成了帶頭人，就不再有恐懼。”在軍隊接管勞改營之前，估計有500名囚犯被殺，270人受傷。 [(841)](#_838_2)

罷工遭到了鎮壓，但勞改營從來沒有真正的安定，囚犯對人類尊嚴的要求終究是壓抑不住的。從1953到1954年，規模較小的罷工和示威仍不時發生，直到政權最后承認古拉格系統難以為繼，開始釋放囚犯。

[[1]](#_1_23) 從比例看，波蘭遭受的損失可能更大。但從絕對數字看，蘇聯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遠大于波蘭。

[[2]](#_2_23) 蘇維埃當局認為，有工作能力的受傷軍人不算是戰爭傷殘者。它鼓勵受傷的退伍軍人尋找工作——堅強起來，有助于恢復——支付小額的退休金給300萬退伍軍人。（B. Fieseler, ‘The War Disabled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6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London, September 2006）

[[3]](#_3_20) 瓦格納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中的主角。

[[4]](#_4_17)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是一部基于現實的小說，榮獲了1946年的斯大林文學獎。它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地下青年組織，活躍于被德軍占領的烏克蘭地區。

[[5]](#_5_16) 那個人（仍然在世）后來成為列寧格勒大學的黨史系主任。

[[6]](#_6_16) 在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的勝利閱兵式中，朱可夫騎一匹阿拉伯白色駿馬，帶領部隊走進紅場。但有一個傳說稱，斯大林曾打算親自帶隊，卻在排練中被那匹駿馬甩下。這個傳說可能不是真的，卻表達了讓朱可夫推翻斯大林的普遍愿望。

[[7]](#_7_8) 沃茲涅先斯基并不提倡混合經濟的恢復，只贊成取消國家對價格的控制，使之更好地反映供求。他還主張擴大合作社企業，對紡織業那樣的消費行業追加投資。這兩項措施，當初曾為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8]](#_8_6) 經常有人認為，日丹諾夫是溫和的政治家和開明的改革者，只是在1945至1946年，隨著與西方關系的惡化而輸給了斯大林統治集團的強硬派，例如馬林科夫。根據這種說法，強硬的文化政策是日丹諾夫的競爭對手所強加的。但檔案顯示，日丹諾夫并沒有獨立的政治思想；統治集團的政策只是在追隨斯大林發出的各式信號；斯大林利用日丹諾夫，將遵奉黨的反西方立場的僵化意識形態，強加于蘇維埃的一切藝術和科學。

[[9]](#_9_5) 西蒙諾夫基于同樣的理由，奮力為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辯護。格羅斯曼的劇本《如果我們相信畢達哥拉斯學派》（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Pythagoreans），1946年9月遭到《真理報》的猛烈攻擊。西蒙諾夫寫抗議信為格羅斯曼辯護，所持的理由是評論家不該使用辱罵的語言，來批評戰爭時期一直在前線作戰的作家，即使他犯了“嚴重的思想錯誤”。（RGALI, f. 1814, op.9, d.1384, l. 2）

[[10]](#_10_5) 扎斯拉夫斯基很可能執筆寫了1936年臭名昭著的《真理報》文章“Muddle Instead of Music”，譴責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他曾在1929年舉報自己的哥哥是“托洛茨基分子”，以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經由法捷耶夫的倡議，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扎斯拉夫斯基和愛倫堡的名字，被從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上刪去。過后不久，即1948年12月，其他成員均遭逮捕。（RGALI, f.2846, op.1, dd.75, 101, 187, 310, 311）

[[11]](#_11_5) “文學敗類”（literaturnye podonki）一詞最先出現于中央委員會1946年8月14日的法令，用在左琴科的頭上。

[[12]](#_12_5) 亞歷山大·博爾切戈夫斯基死于2006年5月，享年94歲。

[[13]](#_13_5) Black Hundreds，沙皇時代反猶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

[[14]](#_14_5) 納塔利婭并不是在強調自己的猶太出身。在所有正式文件中，民族或族裔出身是必須交代的問題。

[[15]](#_15_2) 馬爾采夫（羅溫斯基）實際上是俄羅斯人，與眾所周知的《消息報》猶太主編羅溫斯基同姓（斯大林可能把他們混淆了）。后者因自己早期小說受到反猶太主義的攻擊，而把自己名字從羅溫斯基改為馬爾采夫。

[[16]](#_16_2) 1952年秋天，斯大林為清洗黨的領導階層預作準備，以25名成員的主席團取代政治局。

# 第八章 歸來（1953—1956）

一



1956年，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林斯科耶鄉間別墅。左起：熱尼婭、貝爾塔、索尼婭、塞繆爾和法尼婭

索尼婭·拉斯金娜經過長時間的延誤，終于在1955年11月，從沃爾庫塔勞改營歸來。拉斯金一家去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勞改營探望她的熱尼婭，其他人在過去5年中都沒有與她照過一次面。最終，索尼婭的火車到站。她從乘客人群中浮現，走出自己的車廂，看起來非常疲憊，面黃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繆爾和貝爾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臺上，懇求父母原諒她給家人帶來的不幸。

像許多從斯大林勞改營歸來的人一樣，索尼婭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傷痛而滿懷內疚。她在沃爾庫塔時為了寄錢回家，寧愿自己餓肚子，因此骨瘦如柴。歸來后，她只想為家人而活。她已44歲，沒有丈夫或孩子，愿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獻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謝回憶：“她愿為我們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尋藥物，或應付各種各樣的差事。她對家人的奉獻幾乎是宗教性的，充滿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盡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 [(842)](#_839_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繼承了沙皇死后釋放囚犯的俄羅斯傳統。100萬囚犯從勞改營獲釋，相當于古拉格總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還適用于經濟罪囚犯、帶小孩的婦女、青少年及已達退休年齡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蘇維埃檢察院逐個審查。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年，尤其是像索尼婭那樣的案件，其“反蘇維埃陰謀”的定罪當初曾牽涉黨的高級領導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魯曉夫）。到1955年4月底，蘇維埃檢察院審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訴（還不到自1953年3月以來所收到上訴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關囚犯獲釋。 [(843)](#_841_2)

這些決定既無規律，又沒有理由。例如，索尼婭卷入的斯大林工廠案件源于“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據說是莫斯科猶太劇院的前主管所羅門·米霍埃爾斯策劃的。但米霍埃爾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獲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蘇維埃報刊中，他經常被稱贊為忠心耿耿的愛國人士。但同年11月，總檢察長通知索尼婭，找不到復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勞改營一名囚犯——當初也因斯大林工廠案件被捕，收到一個類似的答復，他對此憤慨不已。答復信上只有一句話：“沒有理由對案件進行復查。”按理他要簽字，再把它寄回，以確認當事人已收到答復。他向難友抱怨，“這完全沒邏輯”，如果米霍埃爾斯是無辜的，為何自己卻是有罪的。一名難友回答：“現在先簽字——他們稍后會再給你一個邏輯。” [(844)](#_841_2)

釋放囚犯該走多遠，蘇維埃領導階層的內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貝利亞就提出“只要不對社會造成嚴重危險”，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萬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權的政治局集體領導中，貝利亞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權力基礎在內務部和國安部。他與馬林科夫（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共同處理國家事務。赫魯曉夫（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堅決反對貝利亞，一開始就在尼古拉·布爾加寧（新任國防部長）的支持下運籌帷幄。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肯定對貝利亞的計劃抱有疑慮。該計劃除了要廢除古拉格系統，還要在烏克蘭西部、波羅的海、東德這些新近附屬的領地上放松蘇維埃政策。1953年春天，貝利亞要求東德領導階層推動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產黨強硬派，在付諸實施時拖泥帶水，導致了東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蘇維埃坦克的鎮壓。貝利亞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甚至馬林科夫的指責。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宮的政變中就擒，策劃者是赫魯曉夫和蘇維埃首都的高級軍官。他被囚在莫斯科軍區總參謀部的地下掩體中，接受秘密審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槍決（甚至有可能在審判之前已被打死）。政變一舉沒有法律依據，對貝利亞的指控極其模糊（他所做的都獲得了集體領導的贊同），對他的判決甚至在審判之前就已在黨內公布。但沒有一位領導人反對政變，或質疑它的合法性。他們養成了斯大林的服從黨的領導的傳統習慣，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識到頂層的權力變更，便迅速調整自己的原則。政變后的赫魯曉夫變得信心倍增。西蒙諾夫回憶起公布槍決貝利亞的12月24日中央全會，赫魯曉夫對“抓獲”貝利亞“稱心滿意”，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他的敘述中，你能得出結論，赫魯曉夫本人在此發揮了主要作用……他發起了策劃，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領導人顯得更加具有眼光、才華、活力，更為果斷”，其他領導人別無選擇，只好就范。 [(845)](#_842_2)

盡管馬林科夫是蘇維埃政府的正式首腦，但在領導集體的內部，赫魯曉夫的權力日益增長。政變與政策無關，只是赤裸裸的權力斗爭。赫魯曉夫曾支持貝利亞的計劃，此時據為己有，從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該名詞在整個蘇維埃時期一直出現，卻從來沒有當真。他要蘇維埃檢察官審查自1921年以來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別是列寧格勒案件。他的對手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擔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寧格勒案件時期與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數名國安部官員被捕，顯然對馬林科夫構成威脅。赫魯曉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馬林科夫的證據，暫時還秘而不宣——他仍需集體領導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開始起而爭奪黨的領導權，先讓馬林科夫承擔列寧格勒案件的“道義責任”，再讓他從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降尊紆貴，改任電站部部長。

赫魯曉夫利用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來加強自己的地位，打擊集體領導中的對手（他1955年對付馬林科夫的手法，將在1961年的黨代表大會上，轉用于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這是一場非常危險的游戲，因為赫魯曉夫自己也深陷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鎮壓，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書記，再是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負責逮捕了至少有25萬人。如果與自己的利益發生沖突，赫魯曉夫就會限制檢察官的復查，斯大林工廠案件就屬此列。由于赫魯曉夫當初的牽涉，有關囚犯的上訴就遇上了長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對他不利的證據。1954年6月，索尼婭·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訴將在8月獲得答復；到了8月，又被告知，還要等到9月。9月后來變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獲悉，將在3月底完成復查，但案件的最后審定是在1955年9月。 [(846)](#_843_2)

像其他黨領導一樣，赫魯曉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釋放。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嚇壞了。我們擔心，解凍可能會釀成滔天大洪水，將無法控制，反把我們都淹沒了。”擔任政治局委員30多年的米高揚認為，宣布所有“人民公敵”無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將顯示“治理國家的不是一個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黨領導對加快釋放政治犯并無真正的興趣。檢察院的官員也很不情愿承認當初起訴政治犯時的錯誤，更不用說承認他們在斯大林恐怖時期曾捏造證據。1954年，為兩方面的利益服務，蘇維埃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削減了三分之二，更延長了程序上的耽擱。 [(847)](#_845_2)

拉斯金一家是幸運的家庭之一。他們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節奏，等到索尼婭從勞改營歸來，變得更加親密無間。索尼婭應邀回到斯大林工廠擔任舊職，經過幾個月的申請（向檢察機關提出的）和力爭（與蘇維埃官員的），終于收到平反證書，撤銷對她的所有指控，恢復她的公民權利，發給她少量金錢，作為她在勞改營荒廢5年的補償。索尼婭在莫斯科郊區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個小間，像拉斯金一家住過的其他場所一樣，供各式親屬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廣場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進行，公寓里總是擠滿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諾夫在文學院的老師、詩人盧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視同家庭一員。阿列克謝在索尼婭歸來時已經16歲，他回憶起拉斯金家中的氣氛：

這是一個非常熱情、好客的場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繆爾·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規矩是：走進我家大門的任何人，都會受到家庭成員式的歡迎。有一次，我想測試一下。連續幾個周日，我從大街上帶回各種各樣的女孩，但沒人說一個字，包括道德觀念上非常嚴厲的母親，因為這是塞繆爾的規矩。 [(848)](#_846_2)

親屬從勞改營歸來，使許多家庭更加親近。數年的分離使人們更珍惜天倫之樂，甚至是曾經只為政治而活的布爾什維克。露絲·邦納在1937年被捕之前，對自己兩個孩子的撫養興趣索然，全身心投入黨的工作。她從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寫信給十幾歲的女兒艾萊娜，敦促她努力學習，但措辭相當冷漠，譬如“幫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團員”。她所關心的是請求米高揚（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產國際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堅持“他一直忠于黨”。露絲獲釋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寧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寧格勒向南135公里的盧加城。她在艾萊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詩人的幫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協會少先隊營地的女舍監工作。艾萊娜曾在戰爭年代充任軍隊護士，現已返回列寧格勒，在醫學院攻讀兒科。她與幾位女友（包括依達·斯拉溫娜）合住一個房間；冬季少先隊營地關閉時，露絲會來探望。起初，她們之間的關系很緊張。艾萊娜在回憶錄中追憶：“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們戰后的歡樂，也不贊成我們的生活方式。”

現在我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她有丈夫的死、監獄、勞改營，我有自己的損失，還有當初看來是決然不同的生活。我們兩個都不知道如何敞開心懷，而且我也不愿意。媽媽仍把我當做她離家時的14歲小女孩，我為此而感到惱怒。她的詢問簡直讓我發狂：“你去哪里？”“什么時候回家？”

采訪中，艾萊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時承認：“我經常希望母親離我遠遠的，但又不能把她趕走。不過，我可以退學，逃去別處，自己謀生，只要能躲開她。”艾萊娜的女兒塔尼婭1950年出生后，露絲的關注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艾萊娜回憶：“我們找到了共同的關注點——她外孫女的成長——這使我們更加接近。”從那一刻起，露絲不再對政治有真正的興趣。她在1954年獲得平反，搬回列寧格勒，后又重新入黨，但再也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艾萊娜認為，她保留黨籍“主要是為了我們，更重要的是為了外孫”。 [[1]](#_1___Ta_Ni_Ya_He_Di_Di_A_Lie_Ke) 艾萊娜回憶：“只有孫輩[塔尼婭和她弟弟阿列克謝]才是重要的，她為他們保存了這么多的熱情和內在光輝，真叫人吃驚。”露絲逐漸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母親的價值，即艾萊娜心愛的外祖母巴塔尼婭，當初負責照顧外孫女，以便露絲自己投身于黨的工作。艾萊娜·邦納反思母親性格的驟變，回憶起了1987年12月露絲的葬禮：

我從櫥柜拿出臺布來布置守靈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塊彩色刺繡的厚臺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塊粉紅色的！現在，經過無數次洗滌，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媽媽那漂亮、精細的縫紉針腳，反以明亮的粉紅映入眼簾。我簡直不敢想象：我身為黨干部的母親，曾經反對資產階級，信奉最高綱領主義，在葉戈爾卡或我的面前從不允許自己使用甜言蜜語，竟然搖身一變，幫我縫補臺布，縫制衣服，打扮塔尼婭，成為“狂熱”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視外孫和曾外孫為“窗口最重要的燭光”和自己受苦受難的理由。我也無法想象：她喜愛和照看窗臺上的盆栽花卉，讓它們長得茂盛；她帶著一定的自豪和挑戰前去退回黨員證，不是對黨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賬……她走出了這難能可貴的一步，轉而將自己鮮活的疼愛，全部奉獻給我們。與抽象的概念和原則相比，這種疼愛更高級更偉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說，你必須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 [(849)](#_846_2)



瓦倫丁·穆拉夫斯基與女兒尼娜，1954年攝于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

家庭在斯大林統治下承受了巨大壓力，但仍保存著堅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類生存幾乎所有的傳統支柱——鄰里社區、村莊、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壞，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筍，仍是社會中的穩定單元。對于許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們可信賴的唯一關系、唯一能找到歸屬感的所在。為了能與親人團聚，他們甘愿承擔超常的辛勞。

很少人作出像瓦倫丁·穆拉夫斯基那樣重大的犧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寧格勒的無線電工程師家庭，父親作為“人民公敵”被捕并遭槍決之后，瓦倫丁、妹妹狄娜和母親1937年都流放去了烏茲別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寧格勒。戰爭時期，他們疏散到斯塔夫羅波爾附近的切爾克斯克城，淪入德軍之手，被送去奧地利和德國的多家工廠做工。1945年，狄娜在紐倫堡附近的工廠做事，獲得美軍的解放。她與一名美國軍官結婚，移民去了美國。瓦倫丁則返回列寧格勒，與母親團聚。戰爭的經歷使他重新思考蘇維埃制度以及父親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國的經歷又使他得出結論，生活在西方會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給妹妹的信中對此直言不諱，結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審訊。國安部要他去說服妹妹回到蘇聯，卻遭到瓦倫丁的拒絕。他因此被控以“反蘇維埃宣傳”，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勞改營。他母親于1948年被捕，緣于與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瓦倫丁于1950年獲釋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納帕——靠近克拉斯諾達爾城，與一名姨媽同住。他找到水泥廠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蘇維埃海軍，分配去塞瓦斯托波爾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來自塞瓦斯托波爾的19歲女孩，他們的女兒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倫丁從海軍退伍，決定搬去母親的流放地哈薩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鄉——列寧格勒，并帶上了妻子和女兒。瓦倫丁放棄了在列寧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軍的表現突出，退伍時有很漂亮的評語。但良心告訴他，應該幫助自己的母親。她已61歲，身體虛弱，更因多年的勞改營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倫丁回顧自己的決定，將之歸因于從小學得的做人原則：

母親老是告訴我要講道德，要誠實，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別是赫爾岑。我們年輕時，她曾朗讀他們的作品給我們聽……我結婚時告訴妻子，我不會隱瞞母親羈困于勞改營的事實，只會盡一切可能來幫她……別無選擇，幫她是我的道德職責。

瓦倫丁決定跟隨流放的母親，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黨人妻子的影響。那些貴族婦女，在1825年12月起義失敗后，追隨自己的丈夫，義無反顧地奔赴西伯利亞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認，他的決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見的意味，故意躲避蘇維埃制度和列寧格勒的美好前途。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和對非正義的憤憤不平。 [(850)](#_847_2)

瓦倫丁在哈薩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體農莊擔任聯合收割機的司機。蘇維埃政府當時正投資于新技術，作為“處女地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開墾出大片干旱草原，改為種植小麥的農田，開初樂觀，最終卻貽害無窮。1954年推出該運動時，瓦倫丁所在的集體農莊是先鋒之一，不少于19萬公頃的牧場成了犁刀下的試驗品。瓦倫丁帶著妻子和女兒住在條件原始的營房中，位于一個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長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母親，為她帶去衣服和食物。照顧年邁多病的母親和草原上的艱苦生活，給瓦倫丁與妻子的關系，增添了難以忍受的負擔。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1956年離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亞的娘家。瓦倫丁既要照看3歲的女兒，又要照顧自己的母親。同年，母親從勞改營獲釋。瓦倫丁把她帶回列寧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間，自己在列寧格勒的地鐵工地上充當勞工。1957年，母親去世，8年的勞改營生活把她給毀了。兩年后，妻子歸來與瓦倫丁重聚，又生了兩個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倫丁全靠自己帶大3個孩子。 [(851)](#_848_2)

瑪麗安娜·福爾瑟與家人的團聚是最不尋常的。1942年，她才4歲，病得厲害。祖母束手無策，只好把她送給戈爾登施泰因夫婦，自己帶了瑪麗安娜的哥哥格奧爾基，前去伊爾庫茨克謀生。戰爭之后，格奧爾基回到列寧格勒母親的娘家，由于失去了與戈爾登施泰因夫婦的所有聯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確姓名，他無法找到瑪麗安娜。瑪麗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隨戈爾登施泰因夫婦長大，一直把他們當做生身父母，完全記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幾歲時，事情開始發生了驟變。

1949年，瑪麗安娜第一次懷疑戈爾登施泰因夫婦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時，少先隊營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棄兒，遂勾起了她對自己幼年的痛苦回憶。她對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還記得有一個哥哥。隨著年齡的增長，她開始反叛戈爾登施泰因夫婦的嚴明紀律，愈加珍惜這些遙遠的記憶，并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繪出一幅近乎神話的圖景。瑪麗安娜還記得曾住過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一家醫院，便開始尋找自己的哥哥：

我當時16歲——那是1954年。我寫信去阿爾漢格爾斯克的醫學院，在信封上寫收信人是：第一年級，第一組，按字母順序的第一位女學生。我告訴這位女孩：小時候，我曾住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帕夫林·維諾格拉多夫大街，還有個哥哥；知道這一切的應該還有一位女醫生，能否麻煩找到她？你信不信，這個女孩還真的找到了她！這位女醫生告訴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奧爾基一貧如洗，饑寒交迫。她還通過熟人發現，我哥哥正在列寧格勒學習物理。這位女孩寫信告訴我這一切，我因此極其興奮，馬上寫信給列寧格勒的所有學院，要求他們幫助尋找一個名叫格奧爾基的學生，曾在阿爾漢格爾斯克住過。原來，他是在理工學院學習，回信給我，還附上了照片。 [(852)](#_849_2)



瑪麗安娜與戈爾登施泰因夫婦，1960年攝于第比利斯

1954年的夏天，格奧爾基來到第比利斯，與瑪麗安娜共度3個月。他還記得，他們的重聚是一個歡樂的時刻，雖然隱約能感覺到妹妹的嫉妒。他回憶：“我與祖母一起生活，她卻被送給了陌生人。”戈爾登施泰因夫婦是好人，把瑪麗安娜當做自己的女兒，從沒將真相告訴她，部分原因是保護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響，現在看來，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會離家出走。據格奧爾基說，他們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既不同于他父親一邊的藝術家和音樂家，又不同于母親一邊列寧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瑪麗安娜在列寧格勒的杰美恩家度過一星期。他們讓她看了所有親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時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的照片，但沒告訴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勞改營，只搪塞說他們死于戰爭。瑪麗安娜回顧這一次探訪，認為杰美恩一家和戈爾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對她隱瞞真相。這確有可能。 [[2]](#_2___Ma_Li_An_Nuo_De_Biao_Jie_Qi) 哥哥格奧爾基很清楚父母的命運，也對她隱瞞。瑪麗安娜嘗試解釋哥哥的沉默：“對他來說，真相只會添加麻煩。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學習，以獲成功。”他當時是列寧格勒大學的物理系學生，后來當上了教授。 [(853)](#_850_2)

瑪麗安娜就讀于第比利斯的輕工業學院，后來在格魯吉亞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實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請，出席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城的父親的畫展，父親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瑪麗安娜在嚴格的共產黨家庭長大，一直以為父親是死于戰場的士兵，到此時年近50歲，方才獲悉父親原是被槍決的“人民公敵”。這無疑是極大的震撼，使她睜開眼睛，直面蘇聯的迫害歷史。她曾懷抱天真的想法，因為自己家庭沒受影響，向來漠不關心。她講述道：“我覺得對不起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們，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會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實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有犯罪嫌疑，為何沒有調查？為何法庭不能正常運作？我開始質疑蘇維埃制度。以前長大時[在戈爾登施泰因夫婦的撫養下]，對此都是全盤認同的……我漸漸明白，即使從3歲起就與親生父母分開，我還是承繼了他們的價值觀。 [(854)](#_850_2)

斯大林去世后的歲月，除了囚犯的歸來，還見證了數萬兒童走出孤兒院和兒童之家。他們中的許多人雖已長大，卻都不知道自己的親人。

1953年，16歲的尼古拉·科瓦奇離開孤兒院時，對家庭生活一無所知。他記不得自己1歲時就被槍決于勞改營的父母，也沒有被送去不同孤兒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經驗發生于哈薩克斯坦，他被共青團派去參與“處女地運動”的第一次收獲（為了1954年的收獲，共青團共招募了30多萬志愿者）。拖拉機大隊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當成了自己的孩子，帶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個孩子，都把尼古拉當成家中的平等成員。尼古拉回憶：“這只是一個普通的俄羅斯家庭，3個孩子比我小，都愛我。我與他們一起玩游戲，也愛他們。”尼古拉與他們在一起整整住了18個月，直到1957年參軍。他說：“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觀察這個家庭的運作和各式關系的相處，這個經驗非常有用。后來，我讀到的心理學家稱，小孩子長大會像自己的家人。我還是孩子時，沒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運，遇上這些了不起的人。我結了婚[1962年]，組織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沒有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經歷，我不可能取得這些成就……它讓我懂得尊重和相愛——他們總是互相幫助，總是為對方考慮——我之前從沒見過，在孤兒院肯定是看不到的。 [(855)](#_850_2)

父親1946年來孤兒院領她出去時，葉麗薩維塔·帕里佩琴科對他一無所知。父親被捕于1935年，其時，她還只是一個嬰兒。父親在哈薩克斯坦的勞改營和流放地整整度過10年，她一直沒有他的音訊。母親已死于勞改營，又沒有其他家人，葉麗薩維塔別無選擇，只好跟隨父親去阿拉木圖城，他在那里擔任地質學家。他們住在地下室，整個住所由好幾個家庭合用。她雖還是一個少年，卻承擔了所有家務。父親沉默寡言，難以相處，已經受了勞改營歲月太多的傷害。對葉麗薩維塔來說，與他溝通，把他當做父親，實在太難了，因為自己身邊從來沒有過男性（孤兒院的所有員工都是女子）。像許多從勞改營回來的家長一樣，葉麗薩維塔的父親對她管得很嚴，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誰在一起，就不準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間發生頻繁的沖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葉麗薩維塔記得有一次：“我們面對面坐在桌旁一個多小時，因為我拒絕吃面包，我們都很固執。”父親從來不談自己的過去，她也從來不談孤兒院的生活。所以，雖在一起生活，卻形同陌路。1953年，葉麗薩維塔搬至列寧格勒，申請了內務部的工作。父親曾作為“人民公敵”遭到逮捕，她竟一無所知。他發現女兒的申請后，立即趕來列寧格勒，將自己的污點履歷，告訴她未來可能的雇主。他擔心，她可能會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懲罰。應父親的要求，內務部同意不把他的污點履歷告訴葉麗薩維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 [(856)](#_851_2)

與父母分離的子女，很自然會在自己的心目中構建父母的形象，往往與重逢后的現實情形大相徑庭。

父親亞歷山大·薩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當時的加林娜·施泰因8歲。 [[3]](#_3___Jia_Lin_Nuo_Shi_Yong_Mu_Qin) 加林娜在成長過程中，對身為列寧格勒經濟學教授的父親一無所知。父親被捕之后，母親也遭供職的圖書館解雇。她切斷與丈夫的一切牽連，恢復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戰爭期間，加林娜與母親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亞，開始燃起對父親的渴望。她回憶：

每個人都在談論他們“前線的爸爸”，或是戰斗英雄，或英勇犧牲。我開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沒有父親，甚至不知道他是誰、身在何方、從事哪種職業。我不知道他長得如何，因為媽媽已銷毀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寫信給列寧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親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寧格勒圍城之戰。她放棄了找到父親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機遇把她重新引上尋父之路的正軌。其時，加林娜在列寧格勒大學攻讀生物學，有一天在圖書館排隊，突然聽到有學生提及薩加茨卡婭的名字。原來，那個學生在談論本校一位馬列主義課講師，加林娜因此去演講廳的門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婦女走出演講廳。我很緊張，一再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問：“有沒有可能，您是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薩加茨基的親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說：“你是加林娜嗎？”原來，她是我父親的第一任妻子。 [(857)](#_852_2)

加林娜的父親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被判10年勞改，1948年獲釋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寫信給他，回郵地址用的是列寧格勒中央郵局的信箱。她解釋：“我不想讓母親擔憂。”

我每天都去郵局，查看有無父親的回信。我從秋季[1947年]開始，到了冬天仍舊沒有答復。最終，我在1948年4月決定再上一次郵局，如果還是沒有，就想作罷。結果非常幸運，全虧了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們在柜臺上遞給我4個厚厚的信封，紙質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個信封里有一封長信，寫在淡藍色的信紙上。

第一封回信充滿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諾里爾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時寄出3封信）

我親愛的女兒加麗婭！

你的信讓我充滿喜悅……我一生中最大悲劇之一，就是與我心愛的孩子分隔得這么久。你寫道：“我的信，毫無疑問，會是一個驚奇。但我希望，無論如何，它是一個愉快的驚奇。”我的回答：第一，驚奇——確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簡直是一大歡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詞造句中，即“無論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設我在寫你這樣的信，也會使用同樣的措辭。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跡，使我不覺莞爾……相信我，加麗婭，你已找到你的父親。我失去你這么多年，但對你的愛，卻從來沒有間斷。 [(858)](#_853_2)



亞歷山大與加林娜，1956年攝于列寧格勒

加林娜通過信件與父親開啟了一段熱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書本上讀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膽的科學家、無畏的探險者，以及像父親那樣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還從沒遇見這樣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親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來信熾熱、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滿他的生活細節、他的閱讀、他近年來的觀念轉變。加林娜愛上了這個文字中的人物。她回憶：“對這些年來一直向往的父親，我在心目中構建出了一個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種人：我可以敞開胸懷，暢所欲言；他總會耐心聆聽，給我建議，等等。我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盡管我比較內向，沉默寡言，但現在看來，像他一樣，我終究還是情感豐富的人。現在我明白，對我來說，在信件中表達情感，要比在現實生活中容易得多。 [(859)](#_854_2)

1956年，亞歷山大來列寧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對面的交往卻令人失望：無法重建他們在通信中培植起來的心心相連。亞歷山大剛剛從諾里爾斯克的流放地獲釋，又得到黨內的平反，忙于重啟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認為，他太投入黨的工作，以致無法與她溝通。她回憶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對我感興趣。”

我甚至覺得，他不贊成我的所作所為。我記得，他曾對我說：“你怎會變成這樣一個懶婦。”他為何有如此想法？因為我對毛澤東的詩詞沒有興趣，因為我沒讀他推薦的政治文章。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他卻須臾不可離開。

1956年，亞歷山大搬到了列寧的誕生地，即伏爾加河旁的烏里揚諾夫斯克。他在大學里教政治經濟學，為各種期刊撰寫相關的文章。加林娜回憶：“父親痛恨斯大林，卻是堅定的列寧主義者。盡管遭受了這么多痛苦，他仍繼續相信，無捷徑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蘇維埃歷史還是正確的。”這種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對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卻成了與女兒溝通的障礙。加林娜持懷疑態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辯論。“與一位信徒爭論，能有什么結果？他的見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卻成了我們避而不談的話題。”1958年，加林娜去烏里揚諾夫斯克探望父親，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詢問彼此工作的套話，兩人幾乎無話可談。出于義務，加林娜繼續給父親寫信，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但她承認：

真的沒什么可說，再也不愿向他打開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寫給我的信簡直就像政治報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黨員大會，就是他曾讀過的書籍，沒有一星半點的個人色彩。我已失去夢想中的父親。 [(860)](#_855_2)

二

布拉特·奧庫德扎亞在“自傳體故事”《我夢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敘述了自己如何遇見從勞改營返回的母親。先行被捕的是父親，他是來自格魯吉亞的共產黨干部。接下來是母親，被捕于1937年，判處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達勞改營。其時，這位未來的詩人和作曲家只有12歲，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撫養，后來又去了第比利斯與父親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歲，高中還沒有畢業，就主動請纓上前線。他1945年從軍隊復員回來，隨后成為第比利斯大學的學生。他的母親在古拉格系統內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從勞改營歸來。

奧庫德扎亞在該書中重溫了母親歸來之夜。故事敘述者是個學生，即“一名無辜的年輕人”，與室友合住一個單間公寓。他很幸福，因為墜入了愛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傷是母親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有“一雙棕色的杏仁大眼”，還一直記得她溫婉的笑容和柔美的聲音。一天，他收到一封電報，“請接501次車，媽媽”。他在赴火車站的途中想象，他們的重聚將會非常快樂、簡單：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飯，就我們兩人。她說說她的生活，我講講我的。應該為此承擔責任的人的動機，我們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好了。現在，我倆再次團聚……然后，我帶她去電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現實決然不同于想象。載運囚犯的501號專列一再誤點，他午夜再去火車站時，才得知該專列已經提前抵達了一個小時。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親，互相擁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廚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煙。他抬頭注視她的眼睛，沒有看到“一雙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沒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滯，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張開，她曬黑的手放在膝蓋上，軟弱無力。她一言不發。

她不能與人對話，不明白兒子所表達的。他問她，要不要吃點東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詢問，她回答：“我嗎？”她不問兒子的經歷，只喃喃自語；講出的孤立單詞，都是自己勞改營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兒子的室友，問他是否也是從勞改營歸來的，并懷疑他是舉報人。她也害怕出門，兒子拉她去電影院，坐了才幾分鐘，電影還沒開始，她就走了。 [(861)](#_856_2)

從勞改營歸來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幾年，就足以讓一個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時，親屬都認不出。伊萬·烏戈列茨基赫33歲那年獲釋于科雷馬，返回切爾登鎮。他在接受采訪時，回憶自己的回家經歷：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沒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婦不知道我是誰，我們坐下喝茶，她開口說，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訴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讓她在丈夫回來時不要點穿。我想給他一個驚喜。弟弟帶著干草回來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來加入我們的行列……他看到家里來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邊還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婦對他說：“你知不知道他是誰？”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誰呢？一個路過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問：“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點都認不出我。我們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萬控制不住，嗚咽起來，結束了采訪。] [(862)](#_857_2)



弗魯扎·馬蒂內利，1956年

從勞改營歸來的人，有的落下殘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魯扎·馬蒂內利的丈夫曾是達拉戈古拉格綜合企業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從哈薩克斯坦勞改營返回莫斯科時，已成殘疾人。她在勞改營中遭受了酷刑和毆打，傷痕累累。女兒艾萊娜在1960年母親去世前，從不知道這些毆打。其時，醫生看到死者身上的傷疤和瘀青，向女兒提出詢問。艾萊娜回憶：“他們說，從未見過受傷如此嚴重的身體，甚至心臟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們問：“你母親進過勞教營嗎？”他們無法想象，身負如此重傷，母親竟然還能存活下來。那時，我才終于明白，從勞改營返回的母親，為何如此粗魯殘忍，總說粗話，有一次發脾氣竟毆打我們，亂摔家什。我曾問她，是否在勞改營遭到毆打，但她拒絕回答，只稱“有些事是不能談論的”。之后，我就再也不問了。

艾萊娜發現，與母親一起生活變得越來越難。母親從勞改營歸來后，狂熱信教，并呈現精神錯亂的跡象。艾萊娜的兒子出生于1953年，從小就有殘障。弗魯扎會對這位外孫動粗，還會打碎他的玩具，竊取他的糖果，再與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窩里。艾萊娜實在無法應付母親的怪誕行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寧格勒。 [(863)](#_858_2)

格特魯德·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把身處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母親，想象成“善良、美麗的人，只是生活在遠方”。這個形象來自她從母親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禮物，例如那塊自制的繡有動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魯德14歲時，母親自勞改營獲釋，允許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區定居。她選擇弗拉基米爾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當集體農莊的農藝師。她離開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前往弗拉基米爾，途中經過莫斯科，格特魯德與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魯德到車站接她：

突然，一個女人走下火車，身穿羊皮衣，手提膠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頭發全被剃光了，身上散發出可怕的氣味，她已在旅途中過了一個星期。我們把她帶回家，她叫我幫她洗澡……我在廚房爐灶上燒水，幫她脫下衣服，真是臭氣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還有蟑螂，讓人觸目驚心。我不禁連連倒退，不能接受這個女人就是自己的母親，而只是視為外人。 [(864)](#_860____MSP__f__3__op__39__d__2)

埃斯菲莉·斯拉溫娜1943年獲釋于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不得返回列寧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亞擔任教師的女兒依達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學校空置的辦公室。依達記得母親的外觀：

她非常消瘦，膚色暗褐，受了哈薩克斯坦烈日的暴曬，更呈現瘧疾的所有癥狀。她一點也不像過去的自己，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母親。她病得很重，幾乎步履維艱，什么都要依靠我。



左圖：埃斯菲莉與女兒依達，1938年。

右圖：埃斯菲莉，1961年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兒子在莫斯科是專搞研究的科學家，獲得許可讓母親與自己同住。依達嫁給了新西伯利亞的一名教師，1945年也回到列寧格勒，與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個共用公寓。埃斯菲莉為了照看依達經常生病的新生兒，搬去與女兒住在一起，但這卻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為違反了國內護照條例（她沒有居住在列寧格勒的登記許可），被流放到東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馬拉亞―維舍拉鎮。那里的居住條件很可怕，她無法照料自己，沒有工作，又受到當地居民不斷地騷擾，在他們眼中，她這個“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馬拉亞―維舍拉鎮6個月之后，又一次被捕，這次作為“反社會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亞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鎮。她只好租用郊區最便宜的房間，沒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達的每月匯款。1951年，埃斯菲莉終于獲準回到列寧格勒。照看她的依達回憶：“她已經喪魂失魄。”

幾乎所有的時候，她都默不作聲，不敢說話；即使開口，也只是竊竊私語。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話，但一旦說出，她馬上又會后悔。她從來不講勞改營的經歷，我嘗試讓她開口，弟弟也作出類似的努力，但都無濟于事。她不敢出家門，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會奔向某棟大樓入口處，躲在里面不敢現身，直到確信警察已經消失。這一點也不符合她的個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堅強自信。她從勞改營歸來后，判若兩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復返。她歸來后的頭三年里就中風兩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誰也不想見，生命的最后幾年都是在床上度過的。 [(865)](#_860_2)

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在季娜伊達·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傷痕。她獲釋時，女兒安吉麗娜才10歲，在安吉麗娜看來，母親因此而變得冷漠嚴峻。季娜伊達不喜歡談論過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麗娜回憶道：“很難與她相處。”

她老是沉默寡言，從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為此責怪于她，我希望她開口。也許她想保護我們，不讓我們知道她受過的罪……她總是與我們保持很大的隔閡，從不流露親情，從不撫摸我們的頭發，從不把我們摟在懷里。在她看來，當好一個母親，就是要確保我們子女吃飽、上學、不生病——其他就沒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無能為力；事實上在勞改營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來了。



歸來的柳芭，1947年攝于莫斯科

安吉麗娜將母親的情感枯竭歸咎于勞改營。當年，季娜伊達要求從事體力勞動，不讓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閉自己成了一種生存機制，也被繼續用來應付歸來這一難題。這種生存本能，還表現在她的執迷性進食上，她總是隨身攜帶面包，喜歡囤積糧食，半夜也會起來吃點東西，因為她害怕挨餓。 [(866)](#_861_2)

柳芭·巴別茨卡婭1947年從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返回莫斯科，因為沒有定居首都的許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來尋找工作和親友。她的第一任丈夫電影攝影師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早先曾勸她回到自己身邊，但此時與一名年輕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雇員）。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亞娜·洛博娃，仿佛對他施加了邪惡的影響，使他疏遠了所有的親戚，尤其是女兒奧克薩娜。在女兒看來，這種戀情無疑是背叛。柳芭在體力上已筋疲力盡，其電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蕩然無存，莫斯科的大多數老朋友都避而遠之。奧克薩娜回憶：“人們只要認出她是戈洛夫尼亞的前妻、被槍決的巴別茨基的遺孀，就設法穿過馬路，避而遠之。”最終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員柳博芙·奧爾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內疚，因為她丈夫電影導演格列高利·亞歷山德羅夫與內務人民委員會關系密切，當年曾涉及對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的舉報，導致了巴別茨基的被捕。奧爾洛娃收留柳芭，建議她去找地質部副部長米哈伊爾·古列維奇，因為他能幫助柳芭找到工作，并獲得莫斯科的居留許可。奧爾洛娃還解釋“他一直都在愛你”，并馬上打電話給古列維奇，將聽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維奇問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說：“等著，我馬上就到，我們結婚吧。”多虧了他們的婚姻，柳芭獲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權利，古列維奇則因此被免職。

柳芭1938年被捕時，女兒奧克薩娜才11歲，現在歸來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為妻子和母親。奧克薩娜回憶：“我們之間的關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經存在——有了這么多的痛苦、愛、嫉妒，又與隔閡混雜在一起；既渴求親密和相互了解，同時又無法找到溝通語言。”柳芭想要控制奧克薩娜的生活。1948年，女兒與美國外交官發生曖昧關系，她很害怕，威脅女兒要向內務部舉報，除非女兒提出分手。奧克薩娜的丈夫阿爾伯特·里希特來自德裔猶太人家庭，曾是海軍軍官，駐在敖德薩，已因“間諜罪”被捕，判處10年，去了馬加丹勞改營。因此，新的舉報很可能導致女兒本人被捕。最終，柳芭利用古列維奇的關系，讓奧克薩娜充任助理，參加赴西伯利亞的地質考察隊，中止了這段婚外情。

柳芭從勞改營返回，性情大變。母親的溫柔和親情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嚴厲和麻木。她在外孫們的面前，從不袒露溫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傷，會要他們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為人生中會有“使[他們]真正哭泣、更為可怕”的傷害。柳芭把勞改營的習慣帶回家，如與食物有關，會顯得非常自私，甚至貪婪；她脾氣暴躁，有時幾近殘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孫女回憶：“她床下有一個手提箱，里面裝滿冬衣和干糧，以備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間的電話和門鈴，在街上看到警察也會嚇一跳。”這些勞改營的傷痕鐫刻在她的性格當中，她1983年臨死前在最后的筆記本上寫道：“從勞改營獲釋的人，甚至會害怕自由。一旦受過一次深刻的傷害，就會很容易再一次受傷。” [(867)](#_862_2)

很多人從勞改營歸來，帶回了神經過敏的習慣和偏執。艾萊娜·切爾卡索娃回家后，仍計算自己走的步伐，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勞改營養成的習慣，以此提高勞動效率，避免不必要的體力消耗。去勞改營之前，艾萊娜從沒工作過，勞改營繁重的勞動使她經常筋疲力竭、饑腸轆轆。特別是戰爭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攤派量提高，艾萊娜往往因無法完成任務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為了節省能量，她教會自己盡量少走路。亞歷山德拉·菲利普娃也從勞改營帶回類似的偏執：猜疑別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與女兒住在共用公寓，經常會把食物藏在房間的隱秘之處，之后自己吃了，卻忘得一干二凈，等到后來尋覓不得，就會指責女兒或鄰居偷吃了。亞歷山德拉與女兒的關系越來越僵，最后竟逼女兒搬走。 [(868)](#_865_2)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夫在兒童之家長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他在軍隊中度過青少年時期，后來又在各式勞改營待了15年。他在每一個機構都遇上過搶奪食物的爭斗——永遠是搶奪最滿的杯子或盤子——學會了全不考慮他人，能搶到就是贏。他36歲那年獲釋于勞改營，由于從沒在正常家庭中生活過，對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據愛上并嫁給他的維克托林婭·施韋策爾回憶，他身材高大，長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學界中被稱為“來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給自己的家人，卻為他的餐桌禮儀感到莫大的震驚。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顧自搶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長一段時間都緘口不言，終于有一天忍不住責備他怎可搶奪最后一個橙子，而沒有照她家習俗留給孩子。維克托林婭回憶：“米哈伊爾回答：‘我實在不懂，沒人教過我，你為什么不給我解釋？’”“他并不貪心，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只是吝嗇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經歷而變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訪時回憶，那時她才意識到，自己愛上了一個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須學會再一次愛上他。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兒院。這樣，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幫助他回歸正常生活。” [(869)](#_866_2)

從勞改營歸來的人，往往很難與親人重建親密關系。他們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樣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對這些人，沒有輔導或精神分析；對他們身體和行為上的失調，也沒人給予幫助；甚至他們一直承受的心理創傷，也得不到承認。同時，從勞改營歸來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這些年來忍受的緊張和恐怖。雙方——從勞改營歸來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離的感覺。

由于種種原因，勞改營的幸存者發現很難開口談論自己在“里面”的經歷，即便在家人面前，也會把自己封閉起來。有些人不講是害怕懲罰（囚犯獲釋時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場所討論自己的經歷。其中許多人因此而擔憂，即使在私人場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講是不想制造負擔，或擔心親人不會或無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長特別不敢告訴孩子，因為不愿讓子女游離于蘇維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煩，引起當局的注意。

即使在談論已成為常態的家庭，父母仍在敘舊時持謹慎態度。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從科雷馬勞改營歸來后發現，自己不在時，兒子已經長大，成了共青團的積極分子，對斯大林無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時詢問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屬實：

當然沒人知道，但兒子卻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夠救他，我很樂意為他而死。”我明白，這算是給我的教訓和警告，我只得閉上自己的嘴。 [(870)](#_867_2)

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的勞改營經歷，使她對政權持懷疑態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兒子知道自己所經歷的，也不能說出口。她回憶：

我在“里面”所發現的，不敢向他傾訴。也許能夠讓他明白，國家有很多過錯，他的偶像斯大林遠非完美。但兒子只有17歲，假如我解釋一切，假如他被說服了，就無法歡呼斯大林的名字，無法寫信給斯大林，無法在課堂上稱贊我國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許，他會設法過雙重生活，但我不想讓他這么辛苦。我害怕與他坦誠相見，但不知何故，我漸漸打動了他，他會認真仔細地端詳著我。幾個月后，他對我說：“媽媽，我愛你。” [(871)](#_867_2)

比較普遍的交往，恰恰與此相反。從勞改營歸來的父母，仍持守著20世紀30年代布爾什維克理想，卻發現子女已形成了決然不同的想法和態度。在赫魯曉夫解凍的相對寬松的氣氛中，政治審查逐步放寬，蘇維埃媒體重新評估斯大林時代。年輕人背離政治，開始追求個人幸福。赫魯曉夫的時代經濟繁榮，私人房屋的街區如雨后春筍，消費品更多，又從西方引進了新技術、新時尚、藝術和音樂。不可避免，共產黨員們因此擔憂，每當政權放松對私人領域的管制，個人主義就會抬頭，社會行動主義、集體主義和其他蘇維埃價值，會消亡于年輕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斷的呼吁，鼓勵蘇維埃青年加入共青團，成為“積極分子”，參與像“處女地運動”那樣的集體活動。 [(872)](#_868____MSP__f__3__op__46__d__3)

瑪麗亞·伊利納從波特馬勞改營歸來，在女兒瑪琳娜的面前就遇上這種代溝。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輔大型紡織廠的主管，丈夫曾是黨委書記，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槍決。瑪麗亞1945年獲釋，在一家烏克蘭孤兒院找到女兒瑪琳娜。上一次見面時，女兒才2歲，現已10歲。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爾卡瑟，后來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瑪麗亞孤身一人搬回基輔。瑪麗亞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倆每到假日都會互訪，但相互關系已經非常糟糕。瑪麗亞掌控女兒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為榜樣，成為一名模范共產黨員。她在1956年獲得平反，重返黨內，積極宣傳黨的事業。據她女兒說，“父母年輕時奉行的共產主義理想，她必須堅持到底。否則她會無法忍受，因為她已作出太大的犧牲”。

瑪麗亞全身心投入女兒的政治教育，制訂讀書計劃——包括蘇維埃和俄羅斯的經典著作，旨在培養正確的共產主義思想和態度。例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為安娜非常自私，“對女人來說，最主要的不是愛情，而是同志友誼，以及對社會的責任”。

她要我變得堅強果斷，勇敢無畏，成為少先隊和共青團的積極分子……她要我像蘇維埃文學中的英雄一樣，成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點，不斷提升自己。在媽媽看來，這是最重要的——成為自己的主人……她總是告訴我，即使自己不喜歡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瑪麗亞以各種方式加以干涉。女兒想學文學，成為教師，母親卻讓她入讀著名的莫斯科動力工程學院。瑪琳娜加入共青團，成為工程學院的團委主席；獲得工程師資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門上班。瑪麗亞想讓她入黨，設法安排該部門的黨委書記向女兒發出入黨邀請，自己再親自出馬，對女兒做勸服工作。但瑪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樣，她受到自赫魯曉夫解凍后的自由氣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變得自信、獨立，對政治的懷疑越來越強烈。她認為，入黨將會有太多要求——遠遠超過她愿意投入的。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爾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學院讀三年級時結婚的。伊戈爾對蘇維埃制度持批判態度，經常與瑪麗亞發生爭論。對這種政治辯論，瑪琳娜毫無興趣，她拒絕黨和政治，不是因為反思了家人的悲劇，而是因為想忘記過去，以開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興趣是音樂、電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爾的鼓勵。他擔任工程師，收入不錯，夢想著把妻子留在家里。瑪琳娜關注自己的個人形象，卻老是遭到母親反對。母親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和斯巴達態度，決不容忍這種“小布爾喬亞”的閑情逸致。瑪麗亞自己整齊清潔，也有漂亮身材，但從勞改營歸來之后從不重視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買不起衣服或化妝品。但她女兒認為，她對此興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勞改營的經歷使她陷入抑郁，特別是在1955年之后，其時她終于發現兒子弗拉基米爾已死于古拉格。瑪琳娜說：

她經歷了這么多，以致自暴自棄，從不對鏡顧盼，從不使用香水或化妝品……只有一次，她買了一件合身的大衣。從后面看，她還很年輕，身材高挑，雙腿修長，腳踝精致。男人往往會在街上超越我們，為了回頭瞟她——他們無法理解，從前面看的她卻判若兩人，頭發灰白稀疏，臉上留有傷疤。



弗拉基米爾，1956年

由于缺錢，瑪麗亞賣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樣差不多。 [(873)](#_870_2)

弗拉基米爾·馬赫納茨——負責全市煤氣供應的莫斯科煤氣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勞改營度過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蘇維埃首都。他的兒子列昂尼德已22歲，一直不滿意自己的“污點履歷”。他出生于蘇維埃精英的特權環境，父親被捕之后，只好與母親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之中。母親沒有自己的收入，他們住在共用公寓的一個小間，卻遭到警方好幾次突擊檢查，以搜尋“人民公敵親屬”的罪證。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處境，在申請莫斯科電影學院時，隱瞞了父親的被捕。父親回來時，列昂尼德正游走于電影界的波希米亞圈子——在解凍后的自由氣氛中得以蓬勃發展。他還與國安部掛上鉤，他的未婚妻塔瑪拉是納夫塔利·法蘭克爾的養女。1929年，法蘭克爾首創了古拉格系統的構想，此時隱居于蘇維埃首都，對列昂尼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弗拉基米爾堅持要對妻兒行使權威。他的歸來肯定會與列昂尼德發生沖突，這位年輕人突然多出一個嚴厲的父親，在他眼中，弗拉基米爾“很難相處”：

他沉默寡言，喜怒無常，不愿談論勞改營的經歷，在感情上自我封閉。他把自己在勞改營養成的習慣和恐懼帶回家，還期望我們作出配合。他不愿與當時僅46歲的母親同睡一張床。我還記得，她有一天含淚對他說：“在你看來，我已不再是一個女人！”

盡管在勞改營待過那么多年，弗拉基米爾仍是一名堅定的列寧主義者。他堅持認為，20世紀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強迫性的農業集體化和五年計劃的工業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他自己曾在實施這些政策時發揮了主導作用。在他看來，只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產黨人。對弗拉基米爾來說，歸來的過程是一次時光的倒流。他重新入黨，黨員資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進入原先的工作領域，1956年被任命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備了有專職司機的汽車和鄉間別墅，仍在銀松林專區，離原先擁有的那棟不遠。被捕后發生的社會變化，對弗拉基米爾沒有產生任何影響。那一代的農民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業革命中躍起而成為蘇維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員。他在政治上激進，但社會態度依舊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瑪麗亞辭職，因為他認為“資深黨干部應有一位全職太太”）。現在，弗拉基米爾滿心盼望自己再次成為一家之主，頗不滿意列昂尼德的晚歸，部分原因是勞改營使他嚴重失眠。父子之間不斷發生爭執，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參加派對，半夜才回，他們先是爭吵，后來竟至動武。弗拉基米爾狠狠一拳打在兒子的臉上，列昂尼德沖出公寓，直奔法蘭克爾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與塔瑪拉結婚。列昂尼德回憶，與弗拉基米爾關系破裂之后，法蘭克爾成了他生活中的父親角色。法蘭克爾反對赫魯曉夫的解凍，與國安部保持緊密聯系。后來，國安部委任列昂尼德為電影導演，拍攝他的第一部電影，那是一部有關冷戰中蘇維埃間諜的宣傳故事片。 [(874)](#_871_2)

勞改營幸存者的普遍感覺是自己的經歷難以言說、交流。他們與沒去過勞改營的人，始終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瑪麗亞·德羅茲多娃在諾里爾斯克整整度過20年的監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紅村的家人身邊。她寫道：“我能告訴他們什么呢？”

我是活著回來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諾里爾斯克，我實在無從說起。他們怎能理解“押送”一詞的真正含義？不管我描述多少細節，他們都難以理解。沒人能理解我們所經歷的，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和同情。 [(875)](#_872_2)



左起：艾萊娜·康斯坦丁諾娃與母親柳德米拉、外祖母艾萊娜·列別杰娃和姐姐納塔利婭，1950年攝于列寧格勒

像許多前囚犯一樣，與家人相比，瑪麗亞感覺與諾里爾斯克勞改營里的朋友更親近，獲釋后仍然與他們經常見面。一名前囚犯寫道：“勞改營中形成的友誼是一生的友誼。”許多古拉格幸存者認為，勞改營難友的相互扶持，往往勝過家里的親友。在社會上，前囚犯經常是偏見和惡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紐帶。他們不與家人談論勞改營，卻與古拉格朋友傾訴衷腸。他們互相通信，節日見面，互相拜訪，安排重聚。索尼婭·拉斯金娜有個大型聯絡網，成員都是她在沃爾庫塔勞改營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總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員，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紀念日。瓦萊里·福雷德回憶起自己在因塔勞改營的老朋友：“難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沒有任何做作，沒有漫長勸說，我們盡量互相幫忙。”福雷德認為，古拉格大作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是錯的，因為他曾寫道，囚犯在勞改營的經歷一無是處。他自己與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終身友誼與合作，借助在因塔勞改營的共同經歷而獲得大大加強。福雷德回憶：“我感謝勞改營，它教會我友誼的含義，并給了我這么多朋友。” [(876)](#_872_2)

有些囚犯歸來時，帶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別對女子來說，這些“古拉格婚姻”的動機往往是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確實基于囚犯間的理解和信任。

礦物學家奧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獲釋于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后，留下充當志愿工。她嫁給了地質學家弗拉基米爾——來自薩拉托夫大學的學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輕20歲。1956年，他們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奧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個丈夫米哈伊爾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奧莉加不知道米哈伊爾的下落，長期杳無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給弗拉基米爾。但事實上，米哈伊爾被判處10年，送進卡拉干達勞改營。在那里，他娶了難友索菲亞·奧克蘭德。她是一名年輕漂亮的匈牙利猶太人，1948年更為他生下個女兒。奧莉加和米哈伊爾的兒子深思道：“勞改營中的他們也渴望愛情和友誼，最終與別人聚在一起。這不是他們的過錯，只是我的父母都愛上了年輕的對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爾帶上新妻子和女兒搬到阿拉木圖城，設法找到奧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說服她回到自己的身邊，但奧莉加不肯原諒她的前夫，因為他在再婚之前，都沒有試圖找到她。 [(877)](#_873_2)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諾娃也嫁給了自己在勞改營遇到的人。米哈伊爾·葉菲姆夫是來自諾夫哥羅德的農民，強壯、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馬勞改營，幫助建造馬加丹小鎮。到1937年，葉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沒錢返回諾夫哥羅德，所以作為志愿者留在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見他時，正好在棉花廠充當囚犯工，而葉菲姆夫則在建造該廠的通風管道。自1937年以來，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馬勞改營。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無。她遇上葉菲姆夫后不久，因為腎臟感染而病得很重。葉菲姆夫替她買特殊藥品和食物，照顧她恢復健康。1944年，她獲悉，外祖母從孤兒院救出女兒納塔利婭和艾萊娜，又在偏遠的草原小鎮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撫養她們長大。一年后，納塔利婭、艾萊娜與外祖母返回列寧格勒，葉菲姆夫就開始給她們寄包裹和金錢。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從勞改營獲釋，決定留在馬加丹，因為葉菲姆夫無資格搬去列寧格勒。1947年，她與葉菲姆夫結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沒有消息。她向蘇維埃當局打聽，仍無結果，只好推測他已死去。 [[4]](#_4___Ta_Dao_1989Nian_Cai_Fa_Xian) 1945年獲得離婚許可之后，她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你不能讓對方永遠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現實世界當中。”

柳德米拉不愛葉菲姆夫。在給母親的信中，她將他描述成“科雷馬最初患難日子中的好同志”，強壯、善良、樂于助人。倆人的持久友誼以古拉格的共同經歷為基礎，即使獲釋后，她仍依賴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與葉菲姆夫搬到新切爾卡斯克城，離頓河畔羅斯托夫不遠，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寧格勒看望女兒和母親。有時，葉菲姆夫也會同行，但對繼女來說仍是疏遠人物，她們稱呼他時，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納塔利婭回憶：“只是在媽媽死前不久，我才開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萊娜和納塔利婭一直與親愛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們再也沒有與母親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樣一起生活。 [(878)](#_874_2)

伊利亞和亞歷山德拉·法伊韋索維奇夫婦，在彼爾姆以南的烏拉爾小鎮奧薩開理發店。他們均被捕于1939年，因為有顧客舉報他們抱怨物資短缺。伊利亞被判刑10年，進了高爾基城附近的勞改營；亞歷山德拉判處5年，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勞改營。他們的女兒伊拉伊達由外祖母撫養，直到亞歷山德拉1945年歸來。4年后，伊利亞也被釋放。亞歷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歸來，這一天終于來到。房子里坐滿了亞歷山德拉的親戚，亞歷山德拉為伊利亞的歸來準備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亞沒有出現。相反，他的妹妹利達從彼爾姆趕來告訴他們，伊利亞已與年輕的新妻子到達她的家。亞歷山德拉帶著女兒去看他，伊拉伊達還記得當時的情景：

門開了，就是父親——我們已有10年沒見到他。他給我一個擁抱和親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間當中。媽媽開始哭泣，利達試圖讓她平靜下來，勸說道：“如果10年沒有看到對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媽媽仍在哭。父親把我拉近，仿佛在說，他也無能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經醉了。媽媽開始咒罵：“你毀了我的一生！你毀了我們的家庭！”她不停地喊……“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叫我不要再等？”



尼娜和伊利亞，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附近他們家屋外，1954年

亞歷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潰，在精神病醫院住了4個月。伊利亞和尼娜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鎮定居，住入一個舊澡堂。他們是在勞改營認識的。尼娜是來自列寧格勒的猶太醫生，在醫院工作，救了伊利亞的命。他外出伐木，沒有食物，筋疲力盡，失蹤好幾天才被送到醫院，已有嚴重的凍傷。尼娜的悉心調養使他逐漸恢復健康，這位醫生最終還愛上了病人。伊利亞從勞改營歸來已是殘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幫助。他每年去奧薩一次，探望亞歷山德拉和伊拉伊達，有時也會寫信，但互相再也不親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達嘗試說服父親回到母親的身邊，但他又娶了別人。亞歷山德拉一直沒有再婚，對伊利亞的背叛，始終耿耿于懷。她女兒說，她仍然愛著他，床邊還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 [(879)](#_875_2)

季娜伊達·萊維娜是烏克蘭少先隊創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猶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進科雷馬勞改營。丈夫丹尼爾是工程師，作為人民公敵的親屬被捕，流放去了土庫曼斯坦3年（他獲釋后參軍，在前線受傷，再疏散到西伯利亞）。父母被捕時，女兒拉麗莎才4歲，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輔與別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爾從西伯利亞歸來，同時帶回了新妻子里賈納和他們的小女兒。他們搬進兩個小房間，與丹尼爾的三個姐妹同住。拉麗莎搬去與他們住在一起，與同父異母的妹妹相處得很好，但遭到里賈納和姑媽的忌恨。拉麗莎說，丹尼爾擔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敵的丈夫，從流放地歸來時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選擇離婚，與季娜伊達劃清界限。但季娜伊達的母親視女婿為好色之徒，認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機娶了年輕漂亮的里賈納，所以拒絕上門拜訪。拉麗莎因此連外祖母都見不到，在父親家的處境變得愈加困難。

季娜伊達1946年獲釋之后，依規定只能住在基輔附近的小鎮茲韋尼戈羅德卡。有一天，她出現在母親的公寓，帶了個名叫瓦萊里的小男孩，介紹他是自己的兒子。季娜伊達在科雷馬勞改營時，聽聞了1941年9月納粹在巴比雅對猶太居民的大屠殺，擔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決心再生一個孩子（當時已經37歲）。她在1942年生下瓦萊里，但一直拒絕透露孩子父親的名字（她把這個秘密帶進了墳墓），但每個人都揣測他是一個獄警。1949年，季娜伊達作為“反社會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猶太人運動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馬勞改營（后來又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瓦萊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幾個月之后，老婦人過世。拉麗莎懇求父親向瓦萊里伸出援手，覺得自己有責任保護這個行為有異的同母異父的弟弟：“有一種東西迫使我去愛他。我感覺到一種責任，來自我的內心。我沒有家人，我想保護他，把他當做自己的親人。”但是，丹尼爾的姐妹仍把瓦萊里送進了孤兒院，認為獄警的兒子應由國家來照看。瓦萊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從位于烏克蘭西部的烏日哥羅德孤兒院寫信給拉麗莎。拉麗莎前去認領，再把他帶去身處江布爾城的母親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兩年。拉麗莎回憶：

當時，我基本不了解母親，從沒真正與她在一起生活過。那段時間，從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與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傾注了無限的愛……我不知所措，很不習慣……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親情的喜悅。

1955年，季娜伊達愛上了在江布爾城流放的另一個猶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幫助照看瓦萊里，視同己出。他們在1956年喜結連理。流放解除之后，他們回到基輔，開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880)](#_876_2)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經不再有可能。他們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擔心成為他人的負擔，無法與人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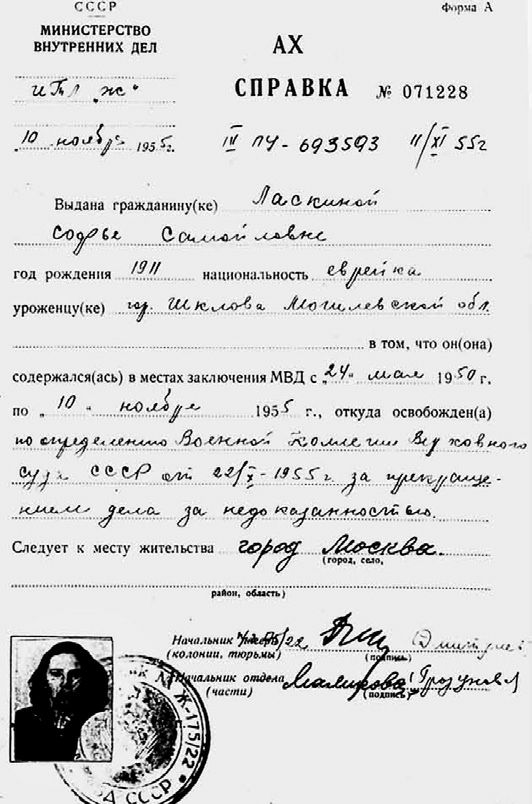
納塔利婭·伊斯納爾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師家庭。20世紀20年代，她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劇工作室，從事圖像藝術和舞臺設計工作。1932年，她與第一任丈夫離婚，嫁給格列高利·阿別孜高茲，他是教育藝術人民委員會的低層官員。1937年，阿別孜高茲遭到逮捕和槍決。納塔利婭也被捕，獲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她于1946年獲釋，卻留在多林卡鎮，在內務部的政治部擔任裝飾藝術家，參與勞改營的宣傳藝術和戲劇。納塔利婭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都有親屬，還有第一次婚姻的一個女兒。但她選擇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邊。多年羈絆于勞改營使她心碎，再也無法復原。納塔利婭寫信給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號，27號公寓

艾萊娜·莫伊謝耶夫娜·阿別孜高茲

親愛的，值得慶幸的是，柳德米拉·亞歷山德羅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朋友]將親手把這封信送給你。終于，我能以你能夠理解的方式，作出詳盡的解釋。從我獲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個星期。然而，這卻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釋呢？不得不承認，經過漫長的分隔，我們之間已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很痛苦的。在這短暫的所謂自由時期，我已認識到，再也不能感受到與你的親近。每當想及要回來見你，我就會因下列的擔憂而望而生畏：我將沒有用處，我將手足無措，我將幫不了你。我已失去當母親的信心，這么多年下來，已變成一個決然不同的人——變得更加冷靜。我要工作，努力讓自己學會隨遇而安，沒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徹底剔除這種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會滲入我的內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亞歷山德羅夫娜會告訴你一切，有關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勝過任何家人，因為她一直與我在一起，經受了勞改營同樣的坎坷。遇到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覺得，我的內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這種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這不是一件壞事，事實就是如此…… [(881)](#_876_2)

三



索尼婭的釋放證書。上有索尼婭監禁的時間，最高法庭軍事委員會“因證據不足”而終止關于她的案子的決定，并允許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婭·拉斯金娜獲釋于沃爾庫塔勞改營時，領到兩樣東西：一張由勞改營兩名管理員簽署的釋放證書，一張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車票。索尼婭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著她回來，其他囚犯就沒那么幸運。他們無處可去：家庭已經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經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經生活過的城市。許多前囚犯無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謀求邊緣性的生存，尋找能獲得居民登記的任何臨時住所。蘇維埃當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這樣的居住權。阻止他們返回自己的城鎮和家園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礙，又有制度化的歧視。克服這些障礙和歧視的斗爭，也是長期且復雜的。

1953年，78歲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奧博連斯卡婭）從流放地奧倫堡回到列寧格勒。她是西蒙諾夫三個姨媽中最年長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奧倫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頓的（桃莉和索尼婭均死于奧倫堡）。她經過多次上訪，終于從市蘇維埃獲得許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當她搬回時，居民委員會卻予以拒絕，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現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獨居。好幾個星期，柳德米拉排隊上訪派出所、當地住房部、市蘇維埃及其他各種辦事處，為了爭取獨居的權利。她寫信給西蒙諾夫：“最令人厭惡的是，各部門的人都以為我是個騙子。他們聲稱，我[在市蘇維埃的住房許可上]列出補充的名字，是想騙得更多的生存空間。”當局不讓她一人獨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許可，并聲稱“他們是不會弄錯的”，使這個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幾個月，才獲準搬回自己的老家。 [(882)](#_877_2)

西蒙諾夫的私人秘書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樣的麻煩。她的丈夫約瑟夫再次被捕，作為懲罰，被送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到1951年，尼娜隨他而去。1954年，夫婦倆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諾夫那里。尼娜和約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諾夫的影響力，仍無法登記為居民。西蒙諾夫幫這對“誠實勤勞、近年來卻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婦”出面，寫信給市蘇維埃和莫斯科民兵組織的主管。最終，他們獲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許可，然后搬進西蒙諾夫幫忙覓得的房間。約瑟夫在高爾基電影制片廠找到工作，尼娜回來為西蒙諾夫做事。但他們的居住許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廢。夫婦被告知，必須在一個月之內離開首都。西蒙諾夫只好再一次寫信，這次是給莫斯科內務部的主管：

結論非常簡單：一個沒犯過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監獄和流放地荒廢多年，終于重拾曾被冤枉奪走的工作。現在，他又要被迫離職，再一次離去。他的妻子，為了與丈夫在一起，曾放棄過自己的工作。而現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須再一次放棄工作，離開自己生長的城市。這不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虧了西蒙諾夫的申訴，夫妻倆獲準在莫斯科暫住。他們在后來的4年中，換住過8個不同的房間和公寓，最后終于遂愿，注冊成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諾夫幫助他們擠入待建公寓的輪候名單，那是為高爾基電影制片廠工人興建的，但一再的延誤，迫使約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尋找更多的臨時住所。直到1966年，即約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婦倆才終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 [(883)](#_878_2)

尋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難重重。蘇維埃官員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許多雇主繼續持懷疑眼光，視他們為潛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敵”。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離開勞改營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蘇維埃大眾不作區分。他們將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為”的增多，歸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釋放（1956年匈牙利起義之后，將重新浮現的“內部威脅和敵人”，也歸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釋放。其時的蘇維埃報刊，更作了推波助瀾的宣傳）。許多前囚犯即使獲得平反，在申請工作時仍遭到拒絕。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們產生偏見和猜疑的起源。他們都不想冒險聘用幾年前還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憶，哈爾科夫的工廠主管當面直言，“盡管我已獲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見不得人的過去”。在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公開譴責斯大林之前，公眾對待歸來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態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敵視。人們不敢與來自勞改營的前“敵人”有任何瓜葛。看到這些歸來的囚犯，往往會喚起尷尬的回憶，甚至會在許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內疚和羞恥。他們的生活相對舒適，他們的同胞卻在勞改營中憔悴凋零。對歸來的前囚犯，大多數人傾向于采取眼不見、心不煩的態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統治下，他們也只字不提失蹤的數百萬人。列夫·科佩列夫回憶，從勞改營歸來后，與避開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處，反而覺得不舒服，他寧可與“某種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這樣做，沒有與以配合迫害獲致成功的人為伍。 [(884)](#_879_2)

尋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艱難，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勞改營。1953年之后，許多勞改營以特殊經濟區的形式仍在運作，雇用名義上的自由勞工，主要是獲釋囚犯。他們領取工資，但行蹤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隨意離開偏遠的定居點。有些人選擇留在勞改營或定居點，因為他們覺得，還沒做好重回社會的準備。有些勞改營，前囚犯一直留住在舊營房，直到20世紀60年代。甚至還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觸犯小罪，為了回到勞改營，至少能有面包吃。 [(885)](#_881_2)

伊萬·烏戈列茨基赫1953年從科雷馬勞改營返回家鄉切爾登鎮，無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絕向他頒發享有居住權的必要護照。他只得動用當初在科雷馬當電工時的儲蓄，到處游走，尋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親眼看看紅場，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綴滿補丁的勞改營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驅逐出去；他本來就沒有資格進入莫斯科。接著，他去布良斯克地區的小城新濟布科夫——位于首都的東南方向，他的前妻與新丈夫帶著兩個孩子就住在那里——結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頓巴斯尋找煤礦上的工作，但無處可住，沒有居民登記，便無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諾夫和塔甘羅格遇上同樣的麻煩。經過幾個月的絕望尋覓，他來到了亞速海附近的國營農莊，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棲。即使在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農莊官員一看他的科雷馬釋放證書，就予以拒絕。伊萬最終決定返回科雷馬勞改營，在途中卻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諾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勞改營營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屬磚廠的官員。他最初的申請也遭拒絕，但一塊手表的賄賂讓那位官員改變了主意。伊萬在磚廠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 [(886)](#_882_2)

從1953到1957年，估計共有61.2萬名前囚犯獲得蘇維埃當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認的。根據蘇維埃領導人的說法，平反過程是還原真相的過程——為了重建對1917年公正原則的信心——從表面上看，確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但從爭取權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實際情況又有很大的不同。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訪。他們必須排隊，填寫表格，與往往充滿敵意的官員爭斗。前囚犯要寫十幾封信，其上訴才會獲得蘇維埃當局的恩準，這是司空見慣的。不過，1956年之后，司法審查和平反的進程有所加快。有時，上訴人會被傳喚去內務部或司法部的辦公室，這類地方很容易引發前囚犯的恐懼。他們相信自己將被送回勞改營，因此穿上冬裝，由哭泣的親屬陪同。一點也不奇怪，這種恐懼和障礙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請（很可能是當局的初衷）。相關的司法審查和官方程序，開展得非常勉強，蘇維埃官員有明顯的動機來敷衍了事。他們中的許多人，當初靠捏造證據整肅“人民公敵”而立功晉了級，現在卻要披露其中的不公，豈不要讓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嘗試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個退伍軍人1947年因“反蘇維埃宣傳”而被判處勞改10年（他講過“反蘇維埃”的笑話），在1954年提出上訴，贏得減刑5年，遂立即獲釋。調查官在審查時，判定他的笑話不是反蘇維埃的，但為了維持原訴（從而無需推翻原案，無需予以平反），聲稱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為反蘇維埃的。 [(887)](#_883_2)

最后，即使獲得平反，也得不到相應的道歉，更不用說在勞改營浪費的寶貴年華。在大多數官員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無辜，只是你的罪還不夠嚴重，但總歸是有保留的！” [(888)](#_885____A__Applebaum___After_the)

就許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黨員和篤信1917年革命價值的人，對平反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致任何障礙都無法予以阻止。承認其公民價值，關乎他們人格尊嚴的根本。出于同樣的原因，許多人希望重新入黨，只有重新領到黨員證，才會感到自己重又成為十足的蘇維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敵”的遺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度過12年，她還記得收到丈夫的養老金和恢復黨籍通知時的自豪。作為黨員的遺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無緣的特殊好處（因此對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來，最重要的是，這些優勢是她重返社會的象征：

我覺得終于再一次成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為一個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種意義上是“今日英雄”。獲得平反的黨員，其社會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隊，無論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還是財政補助和其他種種，都享有優先權。 [(889)](#_885_2)

對其他人來說，平反的重要性還在于，它給他們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帶來意義。他們盡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堅守自己的蘇維埃理想。這種信仰使他們的生命，乃至他們的犧牲，充滿了意義。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們在勞改營辛苦勞作，也為蘇維埃事業作出了貢獻，因此而感到驕傲。列寧農學院的學者亞歷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紀70年代向記者阿納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釋：

我在勞改營親手挖出那么多貴金屬，如果留給自己，早已是百萬富翁了。這是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貢獻。我在嚴苛條件下存活下來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對列寧主義黨和其人道原則的信念堅定不移，永不磨滅。黨給了我力量，讓我可以忍受這些考驗；黨振奮我們的精神和覺悟，幫助我們堅持斗爭。恢復黨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890)](#_886_2)

另一類人追求平反，因為他們相信，這將能洗刷他們名字上的恥辱。瑪麗亞·德羅茲多娃獲釋于諾里爾斯克勞改營，但在獲得平反之前，并沒覺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視他人的眼睛，滿懷榮譽和自豪，沒人再會罵我。” [(891)](#_887_2)

對圖爾金一家來說，平反是一大解脫。1936年，來自彼爾姆的老布爾什維克兼記者亞歷山大·圖爾金，作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當做“人民公敵”的親屬。20多年來，亞歷山大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一直認為，亞歷山大確實犯了反對國家的罪行：這也是解釋老朋友和鄰居敵視的唯一辦法。亞歷山大的岳母更從客廳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臉（“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敵人，就必須將之清除出去”）。從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來，亞歷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無辜的，提出申訴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證書，這對這個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大解放。最終，她們可以不帶任何恥辱感來談論已失去的丈夫和父親。 [[5]](#_5___Tu_Er_Jin_Jia_Shou_Dao_Ping) 亞歷山大的女兒維拉回憶：“一旦人們獲悉我父親平反了，便開始軟化對我們的態度。這對我們確實很重要，因為我們也曾懷疑他有罪，原來我們都錯了。” [(892)](#_887_2)

不是每個人都視平反為足夠的結果。有些人認為，他們一直知道自己是無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證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這種觀念常在老黨員中間聽到，他們是列寧的追隨者，視斯大林為“反革命”。諾里爾斯克起義領導人之一的列夫·內托，1956年從勞改營獲釋，他干脆拒絕申請平反，視之為“原則問題”。他為起義中的戰友辯解：“我們都認為，并不需要國家的寬恕。國家迫害我們，本身就是罪行，這是一個自我尊重和自身尊嚴的問題。” [(893)](#_888_2)

對許多黨員及其家人來說，光是平反，沒有恢復黨籍，還不算伸張了正義（恢復黨籍意味著他們可得到國家的額外補償）。但恢復黨籍的過程非常緩慢，特別是在地方省份，當地的許多黨組織，仍在老領導的管轄之下。他們當初捏造證據，整肅“人民公敵”，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認自己的錯誤，豈不自找麻煩！1936年，亞歷山大·圖爾金是彼爾姆作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爾什維克之一。當他1956年獲得平反的時候，當地媒體就提出給他們恢復黨籍的問題，但是盡管有他們的家人的努力，恢復黨籍一事還是被黨組織壓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開放政策時期，然而市級領導仍然處處設絆。到1991年蘇聯自身解體時，這30名布爾什維克當中仍無一人得以恢復黨籍。 [(894)](#_889_2)

如果沒有恢復黨籍，前囚犯的平反賠償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謝絕接受。季娜伊達·布舒耶娃在1957年獲得平反，領到兩個月工資——是以1938年被捕時的幣值計算的——以賠償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8年。她還領到了另外的兩個月工資，賠償其1938年遭到槍決、現因“缺乏證據”而獲得平反的丈夫。她用這筆錢買了一件大衣，讓兩個女兒共用；給兒子買了一套西裝；還有一張桌子外帶6條板凳，用來布置彼爾姆蘇維埃配給的一間屋的住房。 [(895)](#_890_2)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在1954年為自己和丈夫申請平反，等了兩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證書，聲稱她的案件已得到復查，因缺乏證據已告撤銷。她寫道：“為了這個錯誤，我付出的代價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補償是兩個月工資；她死去的丈夫的補償也是兩個月工資，此外另加上11盧布50戈比，因為丈夫死時身上還持有115盧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蘇維埃大樓的等候室收到這份證書的，前來領取類似證書的還有另外20名婦女。其中有一名烏克蘭老人，被告知她兒子的賠償金額時，一下子變得歇斯底里：

烏克蘭老婦人開始大叫：“我不要你們的錢來換我兒子的血。你們自己留下吧，兇手！”她撕毀證書，將之擲于地上。

發放證書的士兵走近她說：“冷靜下來，公民。”

這位老人又叫喊起來：“殺人犯！”并朝他的臉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過氣來。一位醫生帶著兩名助理，跑進來把她帶走。每個人都默默無言，一臉壓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嗚咽聲。我發現自己也無法遏制感傷……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將我驅走的公寓，沒人在家，可以盡情大哭。我哭泣，為我的丈夫，37歲，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卻死于盧比揚卡的地窖；為我的子女，從小變成孤兒，身為人民公敵的子女，受盡污辱；為我的父母，死于悲傷；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為活不到平反而長眠于科雷馬凍土的朋友。 [(896)](#_891_2)

數以百萬計的人奔赴勞改營后，一去不返。親屬很少被告知他們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臨一個漫長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們的歸來，或等他們的噩耗。在很多情況下，要給這個等待畫上句號，還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的開放政策時期，甚至蘇維埃政權崩潰的1991年。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槍決。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舊在世：如已死去，她會為他哀哭；如還活著，只是選擇不再回家，她可能認為他一直是有罪的。 [(897)](#_892_2)

阿夫納西婭·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還活著，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屬于彼爾姆火車站的工程車間工作，上班時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勞改營。那是專為建造貝加爾―阿穆爾鐵路的古拉格綜合企業。后來，他又被送去馬加丹附近的勞改營。他女兒尼娜在1989年獲悉，他在那里筋疲力盡，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納西婭對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張便條：“到目前為止仍然活著，這里的氣溫是零下50度。”40年來，這張褪色的小紙條支撐著阿夫納西婭的一線希望：她的丈夫將會回來。 [(898)](#_893____MM__f__12__op__20__d__2)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萊娜·切爾卡索娃一直堅信丈夫還活著。丈夫弗謝沃洛德是列寧格勒礦業學院的地質學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處死刑。行刑之前，弗謝沃洛德獲準給妻子打電話，告訴她將永遠不再見面，但沒透露自己行將槍決的消息，只說自己的判決是“無權通信”，這無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勞改營囚犯的數百萬親屬一樣，艾萊娜不知道，“無權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決的代稱。過了1953年，她推測他的刑期應已結束，開始尋覓。她查詢了列寧格勒的內務部總部，又寫信給莫斯科的蘇維埃檢察院，但沒有任何信息。艾萊娜拜訪內務部總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來訪，自稱她與弗謝沃洛德曾在同一勞改營，幾年前還見過他，鼓勵艾萊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 [(899)](#_894____MP__f__4__op__6__d__2__l)

這是內務部的伎倆，用來欺騙遭槍決囚犯的親屬。蘇維埃官員想方設法掩蓋殺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們將其時處決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續的年份，通常選在戰爭年代；并偽造發給親屬的死亡證書，聲稱那些囚犯死于心臟病發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實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槍決。

依達·斯拉溫娜1955年申請父親的平反，獲得成功，除了平反證書，她還收到了列寧格勒注冊局發出的死亡證書，稱她父親死于1939年4月的心臟病發作。依達感到困惑，因為蘇維埃當局曾在1945年告訴她，父親當時還活著。她上訪列寧格勒的內務部總部，被告知應以死亡證書為準。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詢問，得到同樣的答復。依達一直相信這個說法，直到1991年她有機會看到父親在克格勃檔案館的資料，才發現他被捕3個月之后就已被槍決，即1938年2月28日。在檔案中，她還發現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國家安全的原因”，必須誤導依達，讓她相信父親死于1939年的心臟病發作。 [(900)](#_895_2)

伊琳娜·杜達列娃從不放棄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亞速小鎮的黨委領導，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過去了，一直音信全無。伊琳娜認為他的刑期將滿，便開始寫信給內務部；還向羅斯托夫地區被捕的其他囚犯的親屬，打聽所有勞改營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寫信相詢。不久，丈夫在亞速小鎮的黨內同事來訪，聲稱曾在勞改營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繼續向有關當局寫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還活著，還在勞改營服刑，只是“無權通信”。1953年之后，她寫得更加頻繁，推測丈夫肯定已被釋放，因為從沒聽說超過15年的苦役。她以為會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種原因又延長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證書，說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兒加林娜查閱克格勃檔案中有關父親的文件，當中注明，他在被捕的當晚被執行槍決。 [(901)](#_897_2)

四

“現在，被捕的人要回來了。兩個俄羅斯人，各自注視對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勞改營，另一人則剛剛歸來。” [(902)](#_898_2) 詩人阿赫瑪托娃以這些詞句，預示一場即將上演的變劇。囚犯們從勞改營返回，遭遇當初舉報自己的同事、鄰居和朋友。

1954年，瑪麗亞·布德克維奇回到列寧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帶著她和弟弟曾住在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們的兩個房間已被隔壁鄰居占據，那是一對撫養3個小孩的夫婦，其中的妻子曾與布德克維奇一家非常友好，臨到1937年大逮捕時卻突施冷箭。她指控瑪麗亞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國間諜”（瑪麗亞的父親是波蘭裔），甚至宣稱瑪麗亞的母親是把客人帶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當年的那個女人已垂垂老矣，身體瘦弱，頭披長長的白發，一人獨居。她的孩子們已經長大，搬離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勞改營。瑪麗亞需要這個女人簽署一份文件，證明她一家曾住這里。她最近收到槍決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證書，因此需要這份文件為逮捕時沒收的住處和個人財產申請補償。那女人聽到瑪麗亞說起自己的名字，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她說：“沒想到你竟還能回來。”瑪麗亞解釋訪問的目的，保證不會來爭奪生活空間。那女人邀請瑪麗亞坐下，開始查看需要簽署的文件。瑪麗亞環顧四周，仍能認出母親收藏的瓷器、父親從明斯克帶回的皮沙發，還有靠墊、燈具、桌椅。這一切，她從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簽完文件，叫瑪麗亞挨著她在沙發上坐下，低聲說：“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那女人告訴瑪麗亞，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從勞改營寫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懼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說，他的牙齒在審訊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沒能從勞改營回來。她解釋，之所以告訴瑪麗亞這一切，只是想讓瑪麗亞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難，覺得對不起瑪麗亞的父母。 [(903)](#_900____TsAFSB__Arkhivno_sledstv)

1948年，尤里·施塔克爾貝格被控屬于列寧格勒大學一個“猶太民族主義學生團體”，并遭到逮捕。據稱，該團體是反蘇的“間諜小圈子”，其組織者兼資助者是一名德國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圖成立一個秘密印刷所，在大學里散布反蘇維埃的宣傳。這些指控沒有根據，僅基于虛幻的編造和4名大學同學簽名的舉報信。現在看來，他們當初的動機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爾貝格，是因為他的外國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親曾因“傳播德國宣傳”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寧格勒法庭判處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勞改營（他的父親1942年即喪生于此），幫助建造鐵路橋梁。1956年，他從高處摔下，身受重傷，作為殘疾人而獲釋。他先是住在盧加城，后來終于回到列寧格勒，在公共圖書館上班。尤里應克格勃的邀請，查看了自己的審判記錄，遂得知舉報人的名字。他為此一一拜訪了那4個同學。尤里回憶：“他們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

其中一名女生告訴我：即使我現在回來了，但無關緊要，什么都沒變，因為我當時是一個混蛋，現在還是一個混蛋……她還說，我應被拉出去槍斃。另一個男的——過去一直是挑釁者，而且舉止愚蠢——帶我去他的家，給我看大門口一大捆紙。這是寄售的那種，有時會在大商店出售。他說：“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許，現在正是你開印刷所的好時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訴他，這捆紙尺寸太小，并不適合印刷機，但我一言未發。 [(904)](#_900_2)

易卜拉欣·伊茲梅爾―扎德被捕時是巴庫醫學院的資深醫學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屬于一個“反蘇維埃阿塞拜疆民族主義組織”。他從科雷馬勞改營獲釋后，返回巴庫城，在同一所醫學院做些基層工作。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從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現在，只是在應付日常的臨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黨領導米爾·巴吉羅夫因涉及1938年巴庫的大恐怖而接受審判，易卜拉欣充當控方的證人，得以查閱自己的檔案。易卜拉欣發現，他最喜愛的學生當時卻在悄悄地舉報自己，后來官運亨通，升為他現工作部門的負責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馬勞改營時，這位學生經常拜訪他的妻子和女兒，被當做家庭成員之一。易卜拉欣歸來后，這位學生冷淡許多，很少再來，特別是會與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無法躲避，又與這位學生見面數次，雖沒挑明，但大家對出賣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醫學院的政治部主任來到伊茲梅爾―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簽署一份文件，說明他家并沒心存不滿，會繼續與這位學生保持友好關系。易卜拉欣拒絕簽署，如果沒有旁人的勸阻，真想把這位主任趕出家門。他女兒說，易卜拉欣為此受到了極大打擊，更羞愧于被迫在這不夠格的負責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簽署這樣的文件，無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905)](#_901____MSP__f__3__op__10__d__2)

1953年，奧布霍沃村的共青團前負責人科利亞·庫茲明，也搬到沃洛格達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鎮。他曾在1930年的集體化運動中指控戈洛溫家為“富農”，而戈洛溫一家從西伯利亞流放地歸來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亞是戈洛溫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溫的皮革作坊。當時，尼古拉可憐這位全村最貧窮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亞前來探望，請求尼古拉夫婦寬恕自己，不單指對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殺一案中的責任。尼古拉和妻子葉夫多基婭篤信宗教，不僅予以原諒，還邀請他搬來佩斯托沃。他們的女兒安東尼娜，此時在列寧格勒附近的科爾皮諾城行醫，不贊成父母的慷慨，想說服他們改變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殺害了伊萬[尼古拉的弟弟]，摧毀了我們一家。怎可原諒這樣的人？”但葉夫多基婭認為：“真正的基督教徒應原諒自己的敵人。”科利亞定居于戈洛溫家的隔壁，為過去的行為感到羞恥，經常幫戈洛溫家跑腿，試圖贖罪。周六，他與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與尼古拉夫婦一起上教堂。葉夫多基婭于1955年去世，3年后輪到尼古拉，科利亞·庫茲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們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塊教堂墓地。 [(906)](#_901_2)

還有很多前囚犯對當初舉報自己的人表示了寬容。但不像戈洛溫家那樣，他們這種寬恕極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種豁然開朗：幾乎任何人，在正常情況下無論有多好，但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強壓之下，都會變成舉報人。所有經歷過監獄和勞改營的人，都會有此同感。記者伊琳娜·舍爾巴科娃回憶莫斯科紀念學會（專為受迫害者設立的）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一次會議：

一位大約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靜的聲調對我說：“那邊那個男人，曾舉報過我。”接著她又若無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臉上的困惑，便解釋說：“當然，我們當時只有18歲，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們[內務人民委員會]也想招募我。當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覺得，她之所以這么說，不是不愿關注過去，或想把它忘卻，而是已看透這個制度對人民慣用的可恥伎倆。 [(907)](#_902_2)

到20世紀80年代，懂得這一點自然變得較為容易。隨著時間的推移，痛苦的回憶逐漸軟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歷史，對蘇維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觀的認識。不過，避免責怪個人的趨勢在20世紀50年代即已明晰。蘇維埃的海外流亡者，顯然不愿敵視普通的黨員干部，因為他們知道，那些人本身也無能為力，興許自己也是該制度的受害者。 [(908)](#_904_2)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歸來，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懼。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回憶：“所有的殺人犯、挑釁者、舉報人都有一個共同特征：他們從沒想過，他們的受害者竟然還會歸來。”

他們都以為，被送去另一個世界或勞改營的人，將從地球上永遠消失；他們從沒想到，那些幽靈還能借尸還魂，來找掘墓人算賬。因此，在平反時期，他們變得恐慌失措。他們想著，時光倒流了，那些所謂的“勞改營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啟用自己的名字。他們一下掉入恐懼的魔掌之中。

一個“可憐的女舉報人”，不斷收到檢察官辦公室的傳喚，要她撤回曾對那些已經亡故和依然活著的人所作過的各項證詞。曼德爾施塔姆回憶，每一次傳喚之后，她就會跑去她曾舉報的家庭，申辯自己“從沒說過當事人的壞話，上帝是她的證人。現在去檢察官辦公室，只是為了幫那些死人說好話，以便他們盡快恢復名譽”。曼德爾施塔姆的結論是：

那女人從未有過近似于良心的東西，但這也已超過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風，全身癱瘓。在某一時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這些平反是嚴肅、認真的，所有的造謠者和其他爪牙都會面臨審判。 [(909)](#_905_2)

曼德爾施塔姆還講述了一名內務部高級官員的故事。他任職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開始領取退休金，但“偶爾還會受到傳喚，去見僥幸從勞改營歸來的前受害者”。他實在無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爾施塔姆看過他寫給中央委員會的自殺信。這位官員寫道，他一直在為黨努力工作，從沒想到：

自己服務的對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種形式的波拿巴主義”。他試圖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他所審訊的人簽署各式假口供，從而誤導辦案官員；來自莫斯科的官員迫使自己改用“簡化的審訊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額；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舉報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對這么多的人采取行動。

這位內務部官員的自殺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殺前點了太多官員和舉報人的名。但他的女兒，決意要責怪迫使她父親自殺的人。曼德爾施塔姆指出：

她的憤怒針對激發這些噩夢的人：“他們應為辦事人設想！當時擔任官職的人，并沒有發起這些迫害，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910)](#_906_2)

自殺的還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癮的亞歷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協會的主管，但在1954年丟掉烏紗帽。他很長一段時間患有抑郁癥，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錯亂。他寫信給另一位作協成員：“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腦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諾夫坦稱，作為一名作家，他已“破產”，放棄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說。那是一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說，有關黨與工業破壞的斗爭，以20世紀30年代的審訊資料作為借鑒。他已意識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釋的，其道德宗旨是錯的，因為工業破壞根本就子虛烏有。他領導下的作家協會，參與了對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給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我竟是這樣一個惡棍。”他尤其對老朋友約翰·奧特曼感到歉疚，奧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兩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中曾舉報奧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獄時，自己又袖手旁觀。奧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飲酒買醉。他向一個朋友坦承，他批準逮捕了許多明知無辜的作家。 [(911)](#_907_2)

1953年后，法捷耶夫試圖贖罪，他請愿當局釋放那些被送去勞改營的作家，并為他們平反。他給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寫信，呼吁黨放松對文化領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來又被撤職。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學知識分子的眼中，只是一個頑固守舊的斯大林分子，其幫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卻鮮為人知。開槍自殺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寫信給中央委員會。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產黨檔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為黨領導的傲慢無知，摧毀了我奉獻一生的[蘇維埃]藝術事業……我們最好的作家，由于當權者對犯罪的默許，已被消滅殆盡，或是在巔峰未至前即已殞折……作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義。靈魂在這邪惡的生存中遭受惡意、謊言、誹謗的蹂躪。我離開這樣的人世，只會感到解放和喜悅。 [(912)](#_908_2)

到底要做一名優秀的共產黨人，還是做一個好人，兩者之間的沖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勝。許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權中服務多年，所作出的妥協和調和，逐漸摧毀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 [(913)](#_909____N__Mandelstam__Hope_Agai)



西蒙諾夫和兒子阿列克謝，1954年

盡管法捷耶夫對文學現狀態度悲觀，蘇維埃作家在解凍的初期卻發揮了主導作用。由于政權不再對作家行使直接的否決權，文學便成為關注的焦點，既強調個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絕斯大林官僚的橫加干涉。蘇維埃作家逃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公眾主題和英雄人物，開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會中的真實人物。那個年頭最大膽的虛構作品是愛倫堡的《解凍》（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釁，仿佛在試探新氣象究竟能走多遠。這部小說講述一名專制的工廠主管，即“小斯大林”，變得越來越腐敗且慘無人道，為了擴大生產、努力完成五年計劃的配額，而挪用職工的住房資金。妻子對他的鐵石心腸實在忍無可忍，春季的解凍預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氣離他而去。解凍剛剛開始的1954年，其時的政治氣氛還不容許蘇維埃讀者討論小說中的反斯大林主義，再說它本身也不甚明顯。所以，讀者關注那部小說的另一主題，即藝術家的獨立，體現在一名畫家身上，僅屬于次要情節。該畫家以制作國家需要的產品，換取舒適的生活，但與不愿向制度妥協的其他畫家相比，他承認自己的平庸。

《解凍》的發表分裂了蘇維埃文學界。登載該小說的《新世界》和《旗幟》屬自由派，希望它標志著新時代的開端，作家終于可以坦誠相見，與其反映現政權的利益，毋寧發揮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圖書館有關自己作品的討論會上，愛倫堡堅持認為，藝術的目的是表達“情感文化”、促進“個人對同胞的理解”。 [(914)](#_911_2) 蘇維埃政府的保守派震驚于這些自由派言論，開始組織一系列針對解凍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們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他是個詩人，也是“富農”的兒子。批判愛倫堡的任務，落到了西蒙諾夫的頭上，他取代特瓦爾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編。之所以選擇西蒙諾夫，是因為他被視作溫和保守派，與索夫羅諾夫那樣的斯大林主義強硬派相比，更具權威性。西蒙諾夫在《文學報》的兩篇長文中，向《解凍》發起攻擊，認為它對蘇俄的描寫過于黑暗，它的次要情節的結局又過于簡單。西蒙諾夫認為，當好一名藝術家和為國家服務，魚與熊掌，兩者可以兼得。 [(915)](#_912_2)

西蒙諾夫繼續留在斯大林主義的陣營，直到1956年他開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陰影下的許多人一樣，西蒙諾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暈頭轉向。一開始，克里姆林宮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這種不確定氣氛中，像西蒙諾夫那樣的高官，堅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場來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諾夫回憶：“那些年頭，我對斯大林的態度不斷演變，在各種情感和觀點之間左右搖擺。”1953年的大部分時間，他的主要感受是“為損失一個偉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這促使西蒙諾夫在《文學報》的驚人悼詞（《作家的神圣職責》）中主張：“蘇維埃文學的最高任務，就是為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子孫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偉大和天才。”這篇文章激怒了赫魯曉夫，堅持要把西蒙諾夫調離《文學報》。整個1954年，西蒙諾夫仍忠實于自己的斯大林主義者的出身，在辦公桌上放置一張自己特別喜愛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視伏爾加至頓河的運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勞工的紀念碑。斯大林在世時，西蒙諾夫從沒在自己辦公室或住所里懸掛他的肖像，現在這樣做是為了表達對“叛徒”和“野心家”的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著時高歌自己對領袖的愛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譴責。西蒙諾夫回憶：“促使我[擺放畫像]的不是斯大林主義，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識分子的榮譽的想法。”西蒙諾夫不愿背棄自己的過去，他還在1955年的詩集中收入一首委實可怕的《斯大林頌歌》。它寫于1943年，以前一直沒有發表，詩中稱贊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 [(916)](#_913_2)

西蒙諾夫在批判愛倫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凍中的其他先鋒作家，發起一系列攻擊。他在1954年7月《真理報》的重要文章中，譴責文學界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的排斥，愈益趨向諷刺文學。西蒙諾夫特地點了烏克蘭劇作家亞歷山大·科爾涅伊奇克的名，批評他放棄了劇院的重要職責，借用西蒙諾夫的界定，即“教育蘇維埃人民如何去愛護和珍惜蘇維埃制度”。 [(917)](#_913_2)

作為《新世界》的主編，西蒙諾夫也反對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說《不是單靠面包》，這份來稿想以連載的形式在《新世界》發表。這是有關發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師，致力于改善蘇聯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敗和蘇維埃官場的低效，他的獨具匠心遭到了扼殺和破壞。在西蒙諾夫1956年發表它之前，堅決要求杜金采夫緩和對官僚主義的攻擊，因為他擔心這部小說可能引發對整個制度的質疑。即使有了西蒙諾夫要求的改動，這本書仍被改革者歡呼為反對當權派的攻堅生力軍。該小說的第一次公開討論，吸引許多人來到作家協會，學生們為了聽到辯論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樓窗外，最后只好請來騎警驅散人群、維持秩序。 [(918)](#_913_2)

《新世界》拒絕發表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西蒙諾夫對此負有直接責任。1956年9月，他代表該雜志的編委會寫信給帕斯捷爾納克，解釋出于政治考慮的反對意見。這部小說以俄國革命和內戰為背景，是史詩般的人生戲劇。1958年，蘇維埃領導人發起運動，迫使帕斯捷爾納克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就反復引用了該信。 [[6]](#_6_____Ri_Wa_Ge_Yi_Sheng____Bei) 西蒙諾夫對這部小說評價甚低，曾寫信給兒子說，這是“一部庸俗主義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蘇維埃”。西蒙諾夫的觀點是，小說提出的核心問題——俄羅斯知識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決定是否正確——在帕斯捷爾納克的筆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識分子決定跟隨布爾什維克，卻背叛了自己對俄羅斯人民、俄羅斯文化和人類的職責。在西蒙諾夫看來，這種偏見不僅使之成為一部反蘇維埃小說，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專業人士，包括自己的母親和繼父。他們留在蘇俄，為布爾什維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選擇，而是因為他們首先是俄羅斯愛國者。 [(919)](#_916_2)

隨著解凍的深入，赫魯曉夫的改革者在蘇維埃領導階層占了上風。西蒙諾夫在莫斯科文壇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與拒絕改變觀點的斯大林主義信徒，無法相容。西蒙諾夫在1956年寫道：

主編可以要求刪除

我詩句中的斯大林，

但無法幫助我趕走

我靈魂中的斯大林。

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發言譴責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諾夫開始驅趕內心的斯大林，過程非常緩慢。 [(920)](#_917_2)

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嶺，在恐怖制度的緩慢消亡過程中，其重要性超過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來，這個恐怖制度一直在統治蘇維埃人民。赫魯曉夫的講話顯示，蘇維埃政府終于與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劃清界限，人們的恐懼和對未來的不確定也開始漸漸離去。

蘇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會，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宮召開。1355名投票代表與會，期待高層領導解釋斯大林之后的路線，論定已死領袖的地位。揭露和譴責斯大林的罪行這個決定是由領導集體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爭論。早在2月9日，另一個特別委員會曾就1935到1940年之間的黨員迫害，向中央委員會提交調查結果，讓高層領導大吃一驚——無論是逮捕和槍決的龐大規模，還是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證據捏造——臨到蘇共二十大的前夕，才決定在封閉的秘密會議上向大會代表披露真相。講話文稿是集體起草的，但赫魯曉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發言人。

赫魯曉夫的動機很復雜，但仍是勇敢之舉，因為其他的黨領導人，如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顯然都猶豫不決，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現政權的罪行。赫魯曉夫在2月9日的討論中呼吁采取大膽措施：

究竟是什么樣的領袖，會摧毀每一個人？我們必須勇敢地講出真相……我們曾與斯大林一起工作，但這并不連累我們。隨著真相的浮現，我們必須予以公布。否則，我們就在贊同他的行為……我們可以響亮發言，不以為恥，無需害怕，絕不滿足于心胸狹窄的詭辯。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魯曉夫對權力的覬覦。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擊或威脅主要的競爭對手，并在歡迎解凍和政治改革的社會群體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礎。但最重要的，像黨的其余領導人一樣，赫魯曉夫也許還在擔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將會接過發言權。在解凍的氣氛中，黨的批評者將會指責高層領導人人有責。最近剛從勞改營歸來的一名黨內老同志，向赫魯曉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告訴他們；要么，你會發現自己也在接受審查。”赫魯曉夫的講話，特地提及這位老同志的證詞。赫魯曉夫給人一個印象：黨領導只是在最近，經由2月9日的調查結果，才發現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將責任推到斯大林的頭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脫其他領導人的嫌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赫魯曉夫為1935年以來黨的不公提供了開脫罪責的解釋：斯大林個人應負全部責任，其他領導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隨者，也罪不該死）。沒有怪罪蘇維埃制度的問題——只有“克服個人崇拜”的問題。整個講話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復列寧主義。 [(921)](#_918_2)

赫魯曉夫以保密的需要來結束他的講話：

這個議題不得傳到黨外，更遑論媒體。這就是為何我們要在封閉會議中談論此事……我們絕不向敵人提供彈藥，絕不袒露我們的傷口。我相信，大會代表都明白這一點，都會遵行不悖。

他發言完畢，會場中一片死寂。大會代表之一亞歷山大·雅可夫羅夫——后來成為戈爾巴喬夫開放政策的領軍人物——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坐在樓座上，記得很清楚，赫魯曉夫發言之后，把我緊緊攫住的，如果不是絕望，那就是一種深沉的憂慮。大廳中的寂靜簡直是高深莫測，沒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沒有咳嗽，沒有竊竊私語，沒人注視旁人——或出于對剛剛發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緊張和恐懼……我們都低下頭，魚貫離開會議大廳。

離開大廳走進玄關的大會代表中就有西蒙諾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亂，一邊吸煙，一邊與中央委員會文化顧問伊戈爾·切爾諾烏索夫交談。切爾諾烏索夫回憶：“我們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驚得目瞪口呆。這是真相的全部嗎？” [(922)](#_918_2)

[[1]](#_1_26) 塔尼婭和弟弟阿列克謝在1978年移居美國后，她立即要求退黨——那正是克里姆林宮反對艾萊娜·邦納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高潮期。艾萊娜·邦納1956年入黨，1968年蘇維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繳納黨費。露絲·邦納擔心孫輩的福利，悄悄地幫她代繳到1972年（根據對艾萊娜·邦納的采訪，波士頓，2006年11月）。

[[2]](#_2_26) 瑪麗安娜的表姐卡蒂婭·布龍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當年18歲，對此未予證實。

[[3]](#_3_23) 加林娜使用母親的姓氏。

[[4]](#_4_20) 她到1989年才發現，丈夫在1937年即遭槍決。

[[5]](#_5_19) 圖爾金家收到平反證書的同時也獲悉，亞歷山大被捕幾星期后就死于勞改營，時年52歲。

[[6]](#_6_19) 《日瓦戈醫生》被偷運出蘇聯，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為國際暢銷書。帕斯捷爾納克獲得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但面臨作家協會的壓力和蘇維埃報刊的民族主義謾罵，被迫拒絕接受。

# 第九章 記憶（1956—2006）

一

赫魯曉夫的“秘密講話”沒能保密太久。講話的一份筆錄被印成小冊子，發給蘇聯各地的黨組織，在所有工作場所讀給共產黨人聽。蘇共二十大之后的數周內，在蘇維埃的工廠、辦公室、大學、學校聆聽該講話的，有700萬黨員和1800萬共青團員。該講話也被送到東歐的共產黨政府，東德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企圖遮掩，不讓東德人民知道。但波蘭領導人將它發表，副本抵達《紐約時報》，登在6月4日的頭版，再從西方反饋到東德和蘇聯的其余民眾。 [(923)](#_919_2)

該講話使共產黨陷入混亂。蘇聯各地的黨組織發生了激烈討論，有些黨員責怪領導人未能早說，其他黨員批評赫魯曉夫選了個尷尬的時機。1956年6月，中央委員會因擔憂廣大黨員中的異議，發出一個秘密通告，要求當地黨領導以清洗甚至監禁的方法，鉗制越線的批判。 [(924)](#_920_2)

在黨外，無畏之士視赫魯曉夫的講話為討論和質疑一切的信號，知識分子率先發言。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娃回憶：“蘇共二十大結束了我們對蘇維埃制度的暗自質疑。”她后來加入持不同政見者的群體，移居美國。

青年男女開始克服內心的恐懼，分享各自的見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們聚在狹小的公寓里背誦詩歌，閱讀“非官方”文章，交換各自的故事。這一切揭示了我們國家中發生的真實景況。 [(925)](#_922_2)

對許多從古拉格歸來的囚犯來說，赫魯曉夫的講話打消了他們的恐懼——現在，他們開始說出真相。拉麗莎·萊維娜回憶道：“蘇共二十大是我們內心解凍的開始。”她的母親季娜伊達1956年從流放地返回列寧格勒：

關于她在勞改營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馬勞改營，1949到1953年在波特馬勞改營]，母親幾乎一言不發……但蘇共二十大之后，她終于開口。相互的交談越多，我們思想的變化就越大——更持懷疑態度。我們之間的關系也有所改變——家人從母親的恐懼中解脫出來，相互之間變得更加親密。 [(926)](#Di_Jiu_Zhang__Ji_Yi__1956__2006_1)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負“污點履歷”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平。赫魯曉夫的講話傳達給工人黨員時，安吉麗娜·葉夫謝耶娃正在列寧格勒的兵工廠上班。有人預先通氣，她設法不讓黨干部察覺，偷偷溜進去旁聽。宣讀結束時，安吉麗娜變得情緒激動，失聲嗚咽。她回憶：

沒人知道我失態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歷表，甚至當選為市蘇維埃代表。沒人知道我父親1937年作為人民公敵被捕，我從沒泄露給任何人。我總擔心他們會查出我的秘密。我聽到這個講話時，覺得自己掙脫了這一恐懼。這就是我哭的原因，實在控制不住自己。從那以后，我開始傾訴過去的真相。 [(927)](#_923_2)

利季婭·巴布什金娜的父親槍決于1938年，在她看來，自己從父親消失時就懷有的不公正之感，終于在赫魯曉夫的講話中得到了官方的確認。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親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談論自己的感受。她們自己也對此諱莫如深，主要因為在兵工廠上班，擔心自己的污點履歷一旦暴露就會遭到解雇。有時，她們的沉默讓利季婭父親的清白產生懷疑。赫魯曉夫的講話之后，利季婭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氣，不但向母親打聽父親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訴說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裝廠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廠宿舍里告訴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敵”，因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親那樣的無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來：“小聲點，小聲點，你這樣講話，他們會把你抓起來！”但利季婭不受勸阻：“讓他們來吧。我會響亮、清楚地告訴他們，我只是在重復赫魯曉夫所說的。讓他們聽聽就會明白，這一切都是事實。” [(928)](#_924_2)

但這樣的言論仍屬罕見。即使在1956年之后，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仍過于怯懦，他們對斯大林政權仍記憶猶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婭那樣的公開批評。對赫魯曉夫解凍的普遍理解——是一個全國性辯論和政治探索的時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筆健的知識分子的回憶錄所塑造的，幾乎沒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識分子當中，開放的交談可能已成為規范，他們利用解凍來直面大恐怖的歷史。但對蘇維埃大眾來說，對塑造他們生活的力量，一頭霧水，一無所知，堅忍和沉默仍是應對過去的常見方式。

1957年，奧薩鎮的理發師亞歷山德拉·法伊韋索維奇第一次向女兒伊拉伊達講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爾漢格爾斯克附近的勞改營生活。其時，她仍羈留在勞改營附近。她剛剛收到的平反證書，讓她有勇氣向伊拉伊達傾訴自己的過去。伊拉伊達回憶她們的交談：

她告訴我，她已收到新護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獄記錄全被“抹掉”了，她是無辜的，因此可以開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親入獄是因為“嘴快”[他被人聽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獄是因為他是她的丈夫。她還說，很多人死于勞改營——“他們像蒼蠅一樣一個個倒下死去”——他們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們把我們當狗一樣對待。”這是她所說的一切。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中）和女兒安吉麗娜、兒子斯拉瓦，1958年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亞歷山德拉對自己的被捕和勞改營生涯，再也沒向伊拉伊達吐露一個字。每當女兒提出疑問，她只會說：“我有了新護照。我是清白的。” [(929)](#_924_2)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從來不提勞改營，沒有告訴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時的細節。她丈夫槍決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即20世紀80年代后期，每當有人問起她的過去，季娜伊達就會提高警惕，自我防衛。安吉麗娜回憶：

在我們家中，沒人談論母親被捕的原因，或為什么沒有父親，這已是一個封閉的話題。蘇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媽媽總是說“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許多這樣的表達方式來打斷對話。



娜杰日達的父親伊格納蒂·馬克西莫夫之墓，奔薩城，1994年

據她的女兒說，季娜伊達對政治毫無興趣，“決不允許自己牽涉其中”。她從勞改營帶回的恐懼，促使她對蘇維埃政權講的一切，采取“無條件接受”的立場。她看到了宣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親身體驗了政權的不公，但像千百萬普通蘇維埃公民一樣，從未“認真反思”所觀察到的現實。接受蘇維埃的現實是一種應對機制，幫助她活了下來。 [(930)](#_925_2)

娜杰日達·馬克西莫夫年幼時對自己的家史一無所知。她的父親是來自諾夫哥羅德地區的農民，曾在列寧格勒當木匠。20世紀20年代，他兩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達3歲時，他再一次被捕，與家人一起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娜杰日達就在那里度過童年，但對家人為何生活在北極圈毫不知情。父親在1938年又一次短暫入獄（娜杰日達以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薩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達入讀列寧格勒醫學院，后來成為醫生。要到母親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達才發現父親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監獄、勞改營、“特殊定居地”度過8年。她在報紙上看到父親的名字，連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單，在蘇維埃政權崩潰之后獲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達讓母親看這份名單，她起初的反應是：“都是陳谷子爛芝麻的事，還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達的堅持下，母親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護她，不讓她知道，她也就沒有義務來坦白自己的污點履歷。娜杰日達解釋：

我的一生，每次填寫表格，在有否親屬受到鎮壓一欄，我總能填上“無”。我不知道父親的事，所以問心無愧，毫無焦慮。如果我知道，又強迫自己撒謊，就會顧慮重重。我敢肯定，這就是我一直沒遇上麻煩的原因。



塔瑪拉和母親卡帕托莉娜，1948年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們仍然認為，把自己的過去告訴女兒，萬一她又轉述給朋友，萬一政治環境驟變，那豈不太危險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認的，娜杰日達在63歲之前很少關注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響的其他蘇維埃公民，毫無疑問也會有這種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達回憶道：

我聽說過鎮壓，但沒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們在奔薩地區的鄰村發生了大規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沒來碰我們。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發生了什么……今天，我發現很難解釋得通——在這些事件發生的同時，自己的生活卻自成軌跡，絲毫不受影響。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遠之。 [(931)](#_926____MM__f__12__op__4__d__2)

塔瑪拉·特魯比娜50多年沒有找到父親的下落。母親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為志愿工前往遠東的建設工地，一去不返，銷聲匿跡了。1935年遇見工程師康斯坦丁時，卡帕托莉娜是個年輕的醫生，受共青團的委派來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鎮蘇城，在古拉格管理機構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勞工，在附屬于古拉格的建設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遠北建設托拉斯的某個勞改營，位于西伯利亞的東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瑪拉留給在彼爾姆的母親，自己返回科雷馬勞改營，繼續醫生的工作。她與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記，又繼續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幾年得以隱瞞自己的污點履歷。最終她工作部門的古拉格指揮官查出她與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勞改營的醫生人手緊缺，遂決定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來，卡帕托莉娜繼續在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內務部擔任醫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終晉升為克格勃醫療部門的上校。她一直懷抱希望，在科雷馬勞改營巡回診病時可能會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覺得，幫助像他那樣的囚犯，如她所解釋的，至少還可與失去的丈夫保持間接的聯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槍決。

將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擔心自己的同事會發現她丈夫是“人民公敵”，甚至害怕與家人談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槍決的新信息——她視之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證據——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盡管女兒詢問得越來越頻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瑪拉回憶：

媽媽從不提及父親，但保留了他所有的來信[20世紀30年代的]，還有幾份電報，只是從不讓我看。她總是把談話引向其他話題，只會說：“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許是他的舌頭。”

塔瑪拉的母親死于1992年。之后，身為克格勃高級官員的舅舅，讓塔瑪拉寫信給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詢問有關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復是，父親屬于一個“托派組織”，槍決于1938年，但沒提及他在勞改營的監禁。于是，如同母親所告訴她的，她仍認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遠東的志愿工，他失寵于蘇維埃當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瑪拉在彼爾姆為本書接受采訪時，才獲悉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她看到文件，證明父親是古拉格一名長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絕相信，堅持認為其中有錯。因為在心態上，她不愿把自己視為蘇維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現實中，她是個教師，享有成功的職業生涯，視自己為蘇維埃機構的一員。塔瑪拉承認，她也許應將自己的成功歸功于母親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親的真相，可能會在爭取前途時猶豫不決。 [(932)](#_927____MSP__f__3__op__18__d__2)

在所有的極權主義社會，壓抑自己的創痛記憶，已被廣泛視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衛。但在蘇聯，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來忘卻過去。例如，沒人知道赫魯曉夫的解凍能夠持續多久，很快回到鎮壓也有可能。事實上，解凍是短暫和有限的。在整個赫魯曉夫時期，現政權讓大家明白，對斯大林迫害的討論不可導向對整個蘇維埃制度的批評。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初，即赫魯曉夫解凍的高潮期——其時，斯大林的遺體被從列寧陵墓移出；像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那樣的斯大林強硬派，被開除黨籍；索爾仁尼琴有關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對斯大林政權的評價發生了根本變化——對數百萬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沒有官方的承認、公共紀念碑、政府道歉及適當的賠償。就是對受迫害者的平反，也進行得非常勉強。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的相對寬松戛然而止，審查制度變嚴。在蘇維埃勝利20周年之際，斯大林作為“偉大的戰爭領袖”的榮譽得到恢復，獨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現于克里姆林宮墻附近的他的墳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爾和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上了做秀審判的被告席。為此而組織起來的抗議，催生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卻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鉗制。向異見分子發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討論斯大林罪行的強大威懾。數以百萬計的人對斯大林政權記憶猶新，本有可能認真評判蘇維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動。他們害怕給人留下自己同情異見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談及斯大林的罪行，變成了反對勃列日涅夫政權的另一種形式。人們再一次壓制自己的記憶——拒絕談論過去——在表面上加入蘇維埃忠誠而沉默的大多數。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當中，再次被捕的威脅確實存在，這足以保證1956年之后幾十年的噤聲。大恐怖的結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諸多嚴酷的懲罰手段，其無處不在的監控能力，更給敢想敢說敢做的人帶來恐懼，因為他們的行事方式隨時可被視作反蘇維埃。

伊娜·蓋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韋特梅塔夫托馬蒂卡實驗室擔任工程師，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電話，請她去盧比揚卡。伊娜回憶：“不用說，我開始全身發抖，腦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當時她在莫斯科大學作論文答辯，也以類似的方式受到傳喚。她還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歲時父母被捕的景況。伊娜隨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實驗，不能馬上就去。克格勃官員告訴她，將在半小時后再來電話。伊娜馬上瘋狂地打電話給朋友，一是要警告他們，他們可能也會受到傳喚，二是萬一她回不了家，好讓他們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電話又響了，但伊娜仍拒絕去盧比揚卡。因此，該官員開始在電話上問起她與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異見分子、作家，很快將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科佩列夫認識數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還在她的房子里開過朗誦會。不知何故，克格勃發現此事，也許竊聽了她的電話，更可能是朗誦會中混有舉報人。伊娜嚇壞了，接下來的幾天中，隨時準備被捕。她擔心克格勃的搜查，將保存在自己公寓的異見分子的文學作品統統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誦會。伊娜沒有被捕，這起事件并無進一步的發展。但這個電話激起了她痛苦的回憶，所留下的焦慮和恐懼攪擾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掙扎于這種恐懼之中，總是很怕。”恫嚇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難說。她解釋：“這不是具體的東西，更像是一種自卑，一種模糊的缺陷。” [(933)](#_928_2)

斯大林的前囚犯廣泛帶有這種焦慮。季娜伊達·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斷的焦慮之中，甚至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擔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護照，上面沒有她曾在勞改營的標記，她的恐懼才開始退卻。即便如此，據她女兒所說，她“一生都在擔憂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瑪麗亞·維特克維奇1945年被捕，在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釋說：“我無法擺脫恐懼。”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懼，現在[2004年]會感受到，臨死那天也會感受到。即使現在，恐怕還有人在跟蹤我。50年前我獲得平反，我沒做過任何丑事。憲法說，他們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還是害怕。我知道他們有足夠的資料可以把我再次帶走。

斯韋特蘭娜·布龍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維亞特卡勞改營度過3年，1955年獲釋，迄今仍會做關于勞改營的噩夢。她如有精力填寫文件、在美國大使館門口排長隊，早就會嘗試移居美國。她相信她的恐懼會在那里消失。 [(934)](#_929_2)

斯大林的大多數受害者遭受威脅，被迫沉寂，堅忍地壓抑自己傷痕累累的記憶和情感。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馬故事》中寫道：“人們用遺忘的本事來謀求生存。”曾吃盡苦頭的人不愿談論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蓋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會哭泣。斯大林的時代，大家都不哭。從那時起，我的內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決心。” [(935)](#_931_2)

這種堅忍引起眾多歷史學家的注意。英國歷史學家凱瑟琳·梅里戴爾在有關蘇俄的死亡和記憶的書中提到，俄羅斯人已習慣于壓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談身受的苦難——不是無意識的回避（否認），而是有意識的戰略或應對機制——人們可能會思忖：“心理創傷的概念真與俄羅斯人的大腦毫不相干，只是外來的異想天開，就像進口機器，一遇上西伯利亞的嚴冬酷寒就會失靈。” [(936)](#_932_2)

精神病學認為，開口說話對創傷的受害者頗有療效，而受到壓抑的情緒只會延續創傷、憤怒和恐懼。 [(937)](#_933_2) 沉默持續得越久，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覺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記憶圍困了，壓垮了。堅忍可能有助于人們的生存，但也會使他們被動認命。造就一個堅忍、被動已成規范的社會，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堅忍或認命方面，沒人能超過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歲被紅軍征召入伍，1941年當了德軍俘虜；作為囚犯，他先在愛沙尼亞的一個農場工作，后來又進過德國各個礦區和工廠。1945年，尼古拉返回蘇聯，被捕后獲刑10年，被送去科米勞改營。尼古拉1955年獲釋，但不準回到家鄉列寧格勒，于是定居于盧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寫下回憶錄《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這段開場白拉開序幕。他堅稱，其中沒有絲毫的諷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運，特別在我人生的困難時期。我很幸運，父親沒有被捕；學校教師待我不錯；沒有參與芬蘭戰爭；從未中彈；鐵窗生涯中最艱難的一年是在愛沙尼亞度過的；沒有死于在德國挖礦；被蘇維埃當局逮捕時，沒因當逃兵而遭到槍決；審訊時沒受酷刑；沒有死在前往勞改營的押送隊列中，盡管我身高1.8米，體重只有48公斤；我在蘇維埃勞改營時，古拉格恐怖已在減少。我不因自己的經歷而感到辛酸，我已學會接受既有的生活。 [(938)](#_935_2)

二



西蒙諾夫和瓦倫蒂娜·謝羅娃，1955年

1956年，西蒙諾夫與女演員瓦倫蒂娜·謝羅娃離婚，娶了第4任妻子拉麗莎·扎多娃——當時已懷了他的孩子。拉麗莎是藝術史學者，其父親是蘇維埃陸軍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她嫁給第一任丈夫、詩人謝苗·格魯津科時，父親就曾大發雷霆；謝苗死于1953年。當她宣布將嫁給西蒙諾夫時，父親揚言要把她和她的3歲女兒逐出家門（“一個詩人還不夠嗎？”）。拉麗莎是個認真嚴肅的女人，與瓦倫蒂娜相比，比較冷靜。她負責西蒙諾夫的私人生活，成為他的親密伴侶，但激發不出他的浪漫詩興。 [(939)](#_935_2) 也許，他現在只想追求生活中的秩序和寧靜。

與瓦倫蒂娜的分手，像西蒙諾夫與她的其他關系一樣，動蕩不定，風起云涌。他們的女兒瑪莎（瑪麗亞）出生于1950年，之后，兩人的關系開始分崩離析。向來是借酒澆愁的瓦倫蒂娜，已變成慢性的酒精中毒者，她的美貌褪色，她的劇場生涯持續低落。她在馬里劇院招惹的一系列丑聞，數次受到當局的訓斥，最后在1952年被解雇。瓦倫蒂娜的行為讓西蒙諾夫頗為尷尬，他當時在反猶太人運動中，正承受斯大林強硬派愈益增強的壓力。西蒙諾夫與瓦倫蒂娜不斷爭吵，她的酗酒和火暴脾氣更加厲害，因為她覺得他正在準備離她而去。1954年，他搬出高爾基大街的公寓，瓦倫蒂娜已知道他與拉麗莎的交往。為了挽救婚姻，西蒙諾夫在莫斯科蘇維埃劇院，為瓦倫蒂娜覓得一出戲的主要角色，并承諾如果她能“振作起來”，他會回到她的身邊。但瓦倫蒂娜已做不到這一點，他也肯定清楚。她是病人，需要幫助。

1956年的春天，西蒙諾夫終于決定與瓦倫蒂娜離婚，因為拉麗莎告訴他，她懷了孕。他如果拒絕與她結婚，就會承受另一樁丑聞，但瓦倫蒂娜不想離婚。像他們的許多朋友一樣，她認為自己在最需要支持的時候，卻遭到丈夫的背棄。這也許并不公平。在蘇聯，對酒精中毒的了解甚少，酗酒往往被稱作俄羅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醫學上的治療，西蒙諾夫根本幫不上忙。瓦倫蒂娜陷入絕望，喝得更兇，結果只好住院。恰好在此時，離婚獲得法律的批準，瓦倫蒂娜因此而精神崩潰。在隨后的4年中，她5次被迫住入精神病醫院。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瑪莎只好與瓦倫蒂娜的母親住一起。這位小女孩因酗酒的母親和父親的缺失而深受困擾。 [(940)](#_936_2)

1960年，瓦倫蒂娜所住醫院的精神科主治醫生季娜伊達·辛克維奇寫信給西蒙諾夫，指責他造成了瓦倫蒂娜的精神崩潰：

瓦倫蒂娜·瓦西列夫娜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了你……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在你的手中——她作為女人的自尊、她作為戲劇和電影演員的事業、她的成功和名利、她的家人和朋友、她的孩子、她的物質財富……然后你出走了。你的離去摧毀了一切！她失去所有的信心、她與劇場和電影界的關系、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的自尊……酒是她唯一擁有的，唯一可依靠的，但沒有你，卻成了對現實的逃避。

西蒙諾夫在1969年回顧這些事件，在寫給卡蒂婭（拉麗莎第一次婚姻的16歲女兒，自1956年以后一直與西蒙諾夫一起生活）的信中承認，與瓦倫蒂娜離婚時，他對酗酒的妻子已“沒有一絲一毫的尊重，更不用說友誼了”，他唯一的“遺憾”是沒在“多年之前”就離她而去，為此只能責備自己。 [(941)](#_937_2)

西蒙諾夫始終擁有這種冷酷和理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贊成某人，或核算下來某人已沒有用處，就會將其人逐出他的生活。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忠誠被認為高于個人忠誠，西蒙諾夫曾切斷許多關系。出于這個原因，1956年之后，他的苦心鉆營反過來困擾他時，他的身邊也無親密的朋友。也許這表明，在公眾生活中充當斯大林主義者，又不讓該制度的道德倫理影響個人關系，無疑是在緣木求魚。

西蒙諾夫離婚后，有意識地在生活中鏟除一切與瓦倫蒂娜的關聯——盡管他在金錢上繼續幫她，直到她1975年去世。他買了新公寓和鄉間別墅，把女兒瑪莎排除在其他家人之外，遇上生日聚會、家庭紀念日、讀書會或電影酒會，從不邀請她參加。他在1969年寫信給卡蒂婭，解釋為何她與瑪莎最好各奔前程，因為卡蒂婭要求知道為何她不能與瑪莎見面。 [[1]](#_1___Ma_Sha__Xi_Meng_Nuo_Wa_2004)

今有一名19歲女孩[瑪莎]，由母親帶大，其習以為常的看法和規則，與我的大相徑庭——因此，她雖有我的姓，但在精神上卻同外人一般。我并不把她當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來，我傾注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確保她基本上有個正常生活。這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她與母親一起生活。后者20多年來酗酒成性，治愈了再喝，喝了再治。

我從沒想要你去認識這個女孩，或跟她見面，或者與她發生任何關系，因為這會使得她和你都很不愉快。我并不認為你現在有理由去認識她，你倆都不需要。生活中會有作出困難決定的時候，一個人必須承擔責任，做他認為是正確的，而不是把負擔轉嫁給他人。 [(942)](#_938_2)

要到20世紀70年代，西蒙諾夫對瑪莎的態度才開始軟化，之后，她才現身于各式家庭活動。

對西蒙諾夫來說，與拉麗莎的婚姻和他們的女兒亞歷山德拉的出生，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西蒙諾夫1957年3月寫信給兒子阿列克謝說：“至于你的妹妹，她今天已出世8周了。”

她正在褪去暗色，慢慢變得紅潤起來——我們對她的期望是：她會很堅強，對生活有健全的認知；她會以一個人應該的方式走路、吃飯、說話——總之，她會有所成就并具備良好的品行。

他的家庭幸福正值赫魯曉夫的解凍時期。對西蒙諾夫來說，1956年的變更代表一種精神解脫，盡管一開始他對否定斯大林仍有保留意見。阿列克謝回憶，1956年后：

父親變得更加輕松愉快，不再因工作而不堪重負、壓力重重。他的雙手一直患有神經性皮膚病，我從小就記得，現在得以恢復正常。政治上的解凍似乎融化了他的心，他對親近的人更加周到熱情，因此開啟了新生。 [(943)](#_939_2)

1957年8月，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一個餐廳設宴慶祝塞繆爾和貝爾塔的金婚紀念日。慶祝活動是塞繆爾的侄子鮑里斯·拉斯金安排的，他是一個著名的幽默諷刺作家。打印出來的請帖和餐廳里的裝飾，都是嘲諷性的蘇維埃宣傳口號，譬如“50年的幸福——輕而易舉的負擔！”“你們的家庭聯盟是一所共產主義大學校！”西蒙諾夫雖不贊成嘲弄蘇維埃政權的笑話，但也參與了慶祝活動，還分擔了費用。1956年之后，西蒙諾夫改善了與拉斯金一家的關系。他與熱尼婭保持朋友關系，向她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并常聽取她在文學事務上的意見。西蒙諾夫還把經手的詩歌和散文的稿件，轉送給時任解凍期刊《莫斯科》編輯的熱尼婭，以推進她的職業生涯。 [[2]](#_2___Cong_1957Dao_1969Nian__Re_N) 西蒙諾夫對前妻的關注，可能有內疚的因素。他逐漸接受解凍精神，如果將自己在蘇維埃文學界的作用與熱尼婭的相比——她幫助發表異見作家的作品，是地下出版物的無畏擁護者——肯定會在道德上感到困擾。1964年的一個晚上，家人和朋友聚在莫斯科北部的機場地鐵站附近熱尼婭的新公寓，為她慶祝50歲壽辰，有些作家朗誦了特地為她而作的詩歌。現場的氛圍是溫暖幽默的，充滿了對熱尼婭的愛戴。西蒙諾夫作了一次尷尬的發言，拖沓冗長；面對一屋子欽佩她的道德勇氣、寬宏大度、舍身相助的作家，他明顯變得頗不自在。7歲的女兒亞歷山德拉反成了他的救星，她走進房間，朝西蒙諾夫奔來。他一把抓住她，叫她“趕快祝賀熱尼婭阿姨”。亞歷山德拉接過麥克風：“親愛的熱尼婭阿姨，50歲生日快樂，快叫阿廖沙[阿列克謝]剃掉胡子！” [(944)](#_940_2)

就阿列克謝而言，解凍標志了自己與西蒙諾夫的新關系的開始。1956年，16歲男孩寫信給父親，談到以往的隔閡（他與瓦倫蒂娜住一起時），并希望將來能走得更近：

我信任你，不只是把你當做父親，也當做優秀、睿智、值得尊敬的老朋友。這種信念是我力量的源泉，而且，假如能幫到你，哪怕只有一點點，我也會很高興。請記住，你的兒子雖然很年輕，也不強壯，但會永遠支持你……我們很少談及你的私生活——我想只有一次……在你的房子里，我從來沒有自由自在的感覺——并沒有明顯的原因。只是，如果你“外出”，有些談話我就覺得很難應對。如果你不在，我就避免上你家。我與瑪莎的關系也很麻煩——我不能把她當做妹妹……現在，這都無關緊要了。我覺得，事情會有所不同。你變得更加平和，更加愉快，這太好了。我相信，我會成為你新妻子的朋友——她給我的感覺已經很好，我們將變得更加親密。父親，我在你的屋子里，將不再是一個客人。 [(945)](#_941_2)

1956年夏天，16歲的阿列克謝完成了學業，在父親的鼓勵下，他加入科學考察團，前往西伯利亞東部的雅庫茨克地區。就阿列克謝而言，遠征是為了證明自己已是個男子漢。父親曾在相仿的年紀離開學校，開始在工廠上班，這成了他的榜樣。阿列克謝在第一封給母親的家書中寫道：“告訴爸爸，我不會讓他失望的。”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將自己的遠征比作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父親在工廠的“人生大學”。西蒙諾夫的回信送來阿列克謝之前從未見過的溫情和隨意。西蒙諾夫在阿列克謝一生都會珍惜的一封信中寫道：

在這類信件中，父親通常會給兒子忠告。一般來講，我并不想這樣做——但在你冬季遠征之前，我確有一條忠告。毫無疑問，你可能聽說過，或從我相關的寫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戰爭期間并不怯懦。這里是我想要對你說的：根據我對人類尊嚴的理解，以及自己作為男人的驕傲，我做了自己應做的。但請記住，如果你現在滿意于擁有一個鮮蹦活跳的父親，而不只是一塊墓碑或某種回憶，那是因為我從不冒愚蠢的風險。在所有真正危險的情況下，我從不逃離，但我非常仔細、克制、小心。你應該很清楚，我為何告訴你這一點……

現在，我的朋友，我必須趕去作家協會，告訴年輕作家該寫什么，不該寫什么——同時，你可幫我添加脫漏的標點，改正我的語法錯誤。好嗎？

吻你，我可愛的小子，捏你的小爪子。父親。1956年8月31日。 [(946)](#_942_2)



阿列克謝和康斯坦丁·西蒙諾夫，1967年

9月，西蒙諾夫在雅庫茨克地區與阿列克謝團聚了三天，享受原始環境和遠征隊的同志友情，使他憶起自己在戰爭時期的生活（熱尼婭向阿列克謝解釋：“他非常高興，因為他仍可背上背包，踏上征途”）。人生中第一次，他與兒子一起坐在篝火旁，邊喝酒邊談自己的生活、對政治的見解、對未來的憧憬。西蒙諾夫在文學界感到孤獨，反而在兒子身上，找到了一個知己和忠實支持者。熱尼婭遇見歸來的西蒙諾夫后，寫信給阿列克謝：“他對你的各方面都洋洋得意，滿意你的成長，無論是體格上，還是精神上。他還滿意伙伴們對你的評價看法。”至于阿列克謝，他從沒見過父親如此開心和興奮：“他滔滔不絕地談蘇共二十大、他的新家庭、他的女兒、他的新房子、他的新小說《生者與死者》。在他看來，他完全可以脫胎換骨，過全新的生活。”在雅庫茨克地區的三天中，阿列克謝愛上了西蒙諾夫。這些年來想象的父親終于成為現實，與父親的新關系更給自己帶來了獨立和成熟，自己也取得了蒸蒸日上的發展。他從雅庫茨克地區給西蒙諾夫寫信，解釋自己對文學和人生的看法，并以成人的口吻征詢父親的意見。他在1957年2月寫道：“我對將臨的見面滿懷期待，我有這么多東西要告訴你、詢問你，光靠寫信是不夠的。” [(947)](#_944____SLFA__Yevgeniia_Laskina)

但阿列克謝與父親的親近關系持續時間很短。他們在雅庫茨克地區取得的親密無間，無法在莫斯科重演，西蒙諾夫根本就沒時間，把父子隔開的是政治。解凍的民主精神征服了阿列克謝，但他的父親即使不算全然反對，也仍持懷疑態度。阿列克謝太年輕，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以致無法對父親的政治觀念提出清晰的反對意見。例如，克里姆林宮在1956年血腥鎮壓匈牙利起義時，他便沒有什么真正的思考，他的父親則支持派遣坦克，去鎮壓布達佩斯的反蘇示威。然而，阿列克謝懷抱潛在的抗議意識，也許與拉斯金家庭的歷史有關。阿列克謝在1956年申請第一本護照，在每個蘇維埃公民都要填寫的民族一欄上，盡管有資格填報父系的俄羅斯人，他卻決意要用母系的“猶太人”，這將使他的生活變得非常困難。多虧了拉斯金家人協調一致的努力——尤其是塞繆爾和貝爾塔的堅持——才勸服他打消這個念頭。在阿列克謝看來，認同自己的猶太出身是持不同政見的自覺行為，故意揚棄蘇維埃政權的價值觀。他在其他事物上的見解，也流露出同樣的態度。他厭惡共青團的虛假和偽善，深受杜金采夫《不是單靠面包》打動，那是一部猛烈攻擊蘇維埃官場的小說。阿列克謝還寫信給作者，直言那是天才作品，又是蘇聯政治改革所急需的。他的信尾簽名用了繼祖父的姓（“阿列克謝·伊萬尼謝夫”），而不是父親的姓，以免牽涉父親。西蒙諾夫批評該小說容易引發反蘇維埃情緒，在它于《新世界》發表之前，迫使杜金采夫緩和了對官僚主義的攻擊。對解凍的改革派精神，西蒙諾夫的謹慎態度遠遠超過兒子。1957年2月，他寫信給阿列克謝：“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看我們的國家和人們的精神面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1953年以來，我們已取得巨大進步。但是，如果有作家認為，有責任挑起不必要的叛亂，那我對他沒有任何的同情。” [(948)](#_944_2)

西蒙諾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進展得十分緩慢。蘇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興奮又震撼，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予以接受。對于西蒙諾夫而言，斯大林政權的道德考驗在于其在戰爭中的表現。他在創作偉大的戰爭小說《生者與死者》（1959年）時，就開始面對戰爭所提出的道德問題，即該政權對生命的肆意糟蹋。這部小說涉及許多從未見于公眾討論的問題：大恐怖對軍事指揮的巨大破壞，戰爭初期席卷蘇聯的混亂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氣氛，不稱職軍官白白犧牲了眾多生命等。西蒙諾夫憑借自己的日記和戰爭記憶，通過一系列生動場景重現戰爭歷史，其中的官兵面對各種障礙，想方設法應付突發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展現了人們因戰爭經驗而改變，在敵人面前變得更加堅強團結，暗示這種個人精神就是蘇維埃勝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諾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領導當做戰爭的關鍵因素。但在《生者與死者》中，他開始重新評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漸轉向民粹主義的觀念——他將在生命的最后歲月作進一步的闡述——贏得戰爭的是蘇維埃人民，盡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務。如西蒙諾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軍界的腥風血雨，造成了混亂和不信任，直接導致了1941年的軍事災難；像他小說中主人公那樣的普通人，卻以愛國主義精神和主觀能動性，扭轉乾坤，轉敗為勝。西蒙諾夫曾在日記中觸及這一類想法，那些從1941到1945年的日記，充滿了對戰爭的觀察。1953年之前，他也與朋友討論過，包括作家拉扎爾·拉扎列夫。但西蒙諾夫1960年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文學之夜承認，他“缺乏足夠的公民勇氣，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時公布這些想法”。 [(949)](#_946_2)

對斯大林，西蒙諾夫一生都有一種感情依附。他自己的歷史和身份，與斯大林政權緊密相連，以致無法徹底否定斯大林的遺產。出于這個原因，西蒙諾夫也無法全心全意地擁護赫魯曉夫的解凍——在他眼中，這似乎是對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同樣也是對自己過去的背叛。他無法否定自己，也就無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魯曉夫解凍的高潮，西蒙諾夫仍堅持斯大林專政的多項教條。1956年的匈牙利危機中，他就堅持強硬派立場。西蒙諾夫1957年從加爾各答寫信給阿列克謝說：“數千人喪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國在印巴分治中灑下更多鮮血，而且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諾夫認為，這是蘇維埃在布達佩斯采取行動的動機]，而是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亂。” [(950)](#_947_2)

1956年之后，西蒙諾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頑固守舊的斯大林主義者，但在頑固斯大林主義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險的自由主義者。但實際上，在整個赫魯曉夫時期，他只是一名溫和的保守派。他承認斯大林的錯誤，看到適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繼續捍衛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創建的蘇維埃制度，視之為人類進步的唯一堅實基礎。他在給阿列克謝的信中說：“我們在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犯了錯誤，但在承認錯誤的同時，不應動搖我們的信念：我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仍是正確的。” [(951)](#_947_2)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臺，西蒙諾夫溫和的保守主義獲得了官方的青睞。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轉，克里姆林宮反對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華沙條約組織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西蒙諾夫成為蘇維埃文學當權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獲得廣泛出版，并在蘇維埃學校和大學中列作標準的課外讀物。他經常出現于蘇維埃媒體，并作為蘇維埃文學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蘇維埃精英的標準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權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蘇維埃1945年勝利的25周年，西蒙諾夫接受《社會主義工業報》的記者采訪，澄清自己對戰爭結束以來蘇維埃歷史的立場：

我花了很多時間學習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歷史。我現在所知道的大大超過我在戰爭剛結束時所了解的。當然，我的理解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我的主要感覺是，我們當年的事業是正義的。今天，你周游全國看到各地的建設，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會有這種感覺。在戰爭中，條件非常艱苦，許多人喪失生命，我們的人民承擔了必須作出的犧牲。假如他們在那個艱難奮斗中失敗了，我們的國家就不會是今天的模樣，就不會有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有反殖民統治、爭取獨立和自由的世界斗爭。所有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全靠我們的勝利。 [(952)](#_948_2)

對西蒙諾夫那一代人來說，戰爭是他們人生中具有決定性的事件。他們大約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時代，在20世紀30年代漸趨成年，基本價值觀全由斯大林政權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陸續退休。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他們懷念戰爭年代，視之為自己青春時代的頂峰。那時講的是同志友愛、同甘苦共患難；那時的“人品變得更好”，因為大家必須互助互信；那時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標和意義，因為在他們眼中，國家的命運似乎取決于他們對戰爭的個人貢獻。這些老兵把戰爭歲月當做齊心協力取得偉大成就的時期，大家都為勝利作出巨大犧牲。他們回顧1945年，視之為蘇維埃歷史和記憶中幾近神圣的時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話即是：

對于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毫無疑問，戰爭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這也是我們今天的認識。因此，我們不愿以任何方式來貶低我們的人民在那可怕、艱苦、難忘的歲月中的偉大成就。我們對所有陣亡的士兵的記憶如此神圣，我們的愛國情懷如此純潔、如此深沉。 [(953)](#_948_2)



俄羅斯母親雕像，是馬馬耶夫庫爾干戰爭紀念館的一部分，位于伏爾加格勒

紀念偉大的衛國戰爭，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蘇維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誠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諾夫，1945年的勝利使蘇維埃政權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變得合情合理。但大眾對戰爭的記憶——被當做人民戰爭——又代表了對蘇維埃專政的潛在挑戰。戰爭恰恰又是“自發的去斯大林化”時期，它不同于其他時期，蘇維埃人民被迫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自發組織起來投入戰爭，往往沒有高效的領導，或黨的掌控。正如戰后政權所擔心的，這種自由和自主的集體記憶如果引發政治改革的思想，就會造成危險的局面。

許多年來，戰爭的記憶一直在蘇維埃政權的公眾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勝利紀念日甚至不是蘇維埃的法定節日，只是聽由退伍軍人團體自行操辦慶祝活動和游行。政府嚴格審查有關戰爭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戰爭小說， [[3]](#_3___Fei_Chang_Xian_Zhu_De_Li_Wa) 并從公共圖書館撤走戰時報紙。1956年之后，對戰爭回憶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寬，二戰老兵的回憶錄出現于出版物中。年輕時曾參與戰爭的作家紛紛發表往事回憶和小說，以自身經驗來描繪現實中的士兵——通常被稱為“戰壕中的真相”——成為政治宣傳版本的道德制衡。 [[4]](#_4___Zhe_Yi_Lei_Xiao_Shuo_You_4B) 但這些出版物已處在赫魯曉夫解凍允許的邊緣：黨愿意將軍事挫折歸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許對官方敘事的挑戰；仍堅持認為，共產黨的紀律和領導是勝利的保證。1962年，政治局的意識形態主管者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告訴格羅斯曼，其戰爭小說《生存與命運》的出版至少還要等200年（它最終于1988年在俄羅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說的原稿送交《旗幟》雜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獲。

勃列日涅夫政權對戰爭記憶實施更加嚴密的控制，利用蘇維埃的勝利紀念日來展示人民的忠誠和政權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勝利紀念日成為蘇維埃的法定節日，黨的全體領導出席排場講究的慶祝活動，亮點是紅場上的閱兵式。新的武裝力量博物館開幕，浩如煙海的展示品將戰爭記憶提高到崇拜的水平。兩年后，克里姆林宮墻的附近建起無名戰士墓，迅速成為蘇維埃國家的圣地，蘇維埃的新郎新娘都會例行到此致敬。伏爾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紀念場地上，站立著一座巨大的俄羅斯母親雕像，手持寶劍，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這一時期，不斷重復的“兩千萬人死亡”進入蘇維埃的政治宣傳，成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詮釋蘇聯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無可比擬的犧牲。

西蒙諾夫自己曾是一名軍人，親眼目睹過太多的戰爭現實，無意參與對公共記憶的操縱。對戰爭的意義和蘇維埃勝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這種思索更成了他對斯大林和蘇維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費這么多生命來贏得戰爭是否合理？鞭策人們堅持到勝利的到底是強力，抑或是更深層的東西，即與政治無關的愛國主義精神或堅忍耐力？西蒙諾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廣泛收集士兵的回憶錄和證詞，到逝世時的1979年，已積累大量回憶錄、書信和幾千小時的錄音采訪。 [[5]](#_5___Xi_Meng_Nuo_Fu_Zai_Sheng_Mi) 其中許多證詞用于“七個章節的詩意電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經驗的不同側面，對士兵的采訪和西蒙諾夫的作品朗誦交替出現。在某種程度上，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戰爭的恐怖與士兵的痛苦，在電影中變成了活生生的東西。那些士兵被描繪為普通人，在最困難的情況下表現出勇氣和韌性。該電影的最長章節之一闡述了士兵的受傷，其中有一名步兵，受傷7次，仍繼續朝柏林挺進。這部電影是獻給普通軍人的——數百萬受到忽視的無名英雄，以勇氣和耐力贏得了蘇維埃的勝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戰爭著作往往采取軍官的視角。據該影片的導演瑪琳娜·巴巴克（西蒙諾夫當時的情人）說，西蒙諾夫這一尊崇行為帶有強烈的個人動機，因為“西蒙諾夫認為，自己在生活中從沒表現出足夠的勇氣”。巴巴克回憶：“西蒙諾夫堅持，他自己不應在電影中出現。他還說，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邊。” [(954)](#_949_2)

這部電影還是遇上了麻煩，軍方對其中堅韌不拔的現實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戰爭理念，均不以為然（審查員堅持增加一個篇章，以獻給作為戰爭領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領導班子認為，所有紀念人民在戰爭中受苦受難的嘗試，都是對政府的挑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西蒙諾夫的許多戰爭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刪減后的版本出現。他始于1941年的戰爭日記，成書為《戰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計劃在1967年出版，盡管向黨領導發出了個人請求，仍得不到蘇維埃審查員的批準（該書最終出版于1999年）。同樣的命運降臨于西蒙諾夫的另外一部文集，關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戰爭日記——《戰爭中的不同時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減后才于1977年出版。 [(955)](#_950_2) 他的紀錄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經受了與審查員的長期斗爭和大刀闊斧的刪減，才于1966年問世。而他的小說《軍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與死者》的第二部，其電影版遭到蘇維埃審查員如此拙劣的閹割，以致西蒙諾夫在最終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說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該影片上映時改名為《懲罰》（Retribution）。

與審查員的斗爭，更使西蒙諾夫下定決心要找出戰爭和斯大林政權的真相。從這時起，他的筆記本充滿了與斯大林見面的回憶。他自我審問，躋身于這位獨裁者的侍從行列時，自己對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對斯大林的謊言和謀殺了解得越多，就越想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西蒙諾夫于1966年寫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雖有疑問，但仍熱愛斯大林。時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愛他，也不能再愛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現在才明白的，我當時就不會愛他。” [(956)](#_951_2)

西蒙諾夫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權中的所作所為。他仿佛在贖罪，盡力推介在斯大林時代受審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西蒙諾夫受妻子的鼓勵，成為蘇維埃前衛藝術的收藏家和擁護者（他為長期被遺忘的藝術家弗拉基米爾·塔特林，舉辦了回顧展覽會）。他在爭取出版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的作品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還努力策劃了雅洛斯拉夫·哈謝克的《好兵帥克》的俄文翻譯。他資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爾切戈夫斯基、維拉·帕諾娃、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并在住房、就業、重新加入作家協會等方面，仗義執言。 [(957)](#_953____V__Kondrat__ev___Ne_tol)

1966年，西蒙諾夫開啟一個過程，其頂點便是《大師與瑪格麗特》一書的發表。它是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顛覆性的社會諷刺杰作，描述一個魔鬼來到莫斯科，通過無政府式的惡作劇，引出人們身上最惡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著時根本無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屜中。1956年，西蒙諾夫成為負責布爾加科夫文學遺產的委員會主席，因為作者的遺孀艾萊娜·布爾加科娃是自己母親的老相識。西蒙諾夫將《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手稿，交給熱尼婭·拉斯金娜。其時，她任職于《莫斯科》雜志，需要激動人心的文章來增加訂戶數量（直接影響到該雜志的地位和財政補貼）。文學解凍之后，《莫斯科》已變成一份相當沉悶的出版物。但熱尼婭能否讓此書通過正在收緊的審查，西蒙諾夫深表懷疑，甚至建議艾萊娜·布爾加科娃接受某種刪減，以求發表。整個周末，《莫斯科》主編葉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鄉間別墅閱讀這份手稿。他向熱尼婭坦承，盡管知道這將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議熱尼婭將手稿轉交《莫斯科》另一位曾當過審查員的編輯——他與文學審查委員會關系不錯，改任編輯后所呈送的手稿，從未遭到審查員的拒絕。憑借這位前審查員的幫助，布爾加科夫的手稿獲得通過，只作了相對輕微的刪減，從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發表。該雜志的11月號（15萬份）過夜即售罄，大家紛紛訂購隨后兩年的雜志，為了爭睹布爾加科夫神奇小說的后續連載。在蘇維埃讀者的眼中，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壓抑氣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跡。熱尼婭和西蒙諾夫為他們的成功而感到振奮，將審查員所刪減的片斷，匯集粘成一個剪貼簿，以紀念這個歷史性事件。他們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諾夫、熱尼婭和艾萊娜·布爾加科娃各留一本。 [(958)](#_953_2)

西蒙諾夫對這些舉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開宣言。他參與搶救受壓制的藝術和文學作品，與蘇維埃政權的自由派結成了同盟。他自覺投入這些努力（他已沒有蘇維埃機構或雜志的任何公職），贏得了藝術家和作家的尊敬，并當選為文學委員會和類似組織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學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親西方和反蘇維埃的自由派的眼光來看，西蒙諾夫并沒變成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但是像勃列日涅夫時代許多共產黨改革者一樣，他愿意接受蘇維埃制度的政治文化發生根本變化。西蒙諾夫并沒公開批評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對它的許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鎮壓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機是西蒙諾夫的政治觀念演變中的重大轉折點，使他變得激進。他開始質疑，一黨制以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停滯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兒子認為，西蒙諾夫如能多活幾年，肯定會歡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當然，他作為一名資深黨員只能走到這一步。譬如，他唯有徹底打破他的黨員模式，方能站出來支持索爾仁尼琴，但他還做不到。我不知道他當時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為了克制自己又在強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變。對我來說，這是他最卓越的品質——他永遠具有改變的能力。 [(959)](#_956____RGALI__f__1814__op__9__d)

西蒙諾夫最后幾年政治觀念的發展，與審視自己的過去有密切聯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行為。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對塑造自己行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來越強烈的批評態度。據當時最接近西蒙諾夫的拉扎爾·拉扎列夫說，他的痛悔有時如此強烈，幾近于自我厭棄。拉扎列夫回憶，西蒙諾夫會在公眾場合鞭撻作為作家和作為人的自己。西蒙諾夫以自嘲、自我諷刺聞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視之為他個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時他們必然意識到，他的自我批評竟來自他更深層的沖動。1965年，中央文學家之家為他舉辦50歲生日慶祝會。有700多名賓客出席，整個晚上都是對西蒙諾夫的贊譽之聲，反而令他顯得有點不耐煩。晚會結束時，他因情緒激動而明顯有些顫抖，他走近麥克風，作了下列異乎尋常的發言：

在這樣的場合——有個人活到了50歲——當然，大家主要是記起他的好。但我想對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們說：我一生中做的許多事，自己都會感到慚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這一點——我的處世行事，并不總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則——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則，也不是人類的最高原則。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現在回憶起來感到頗不滿意；有的場合，我當時的行為缺乏足夠的毅力和勇氣。我知道這一切。可以這么說，我現在說出來，并不是為了悔改，那是個人的私事；而是為了要記取教訓，方可免犯同樣的錯誤。我將盡量不再重復過去的錯誤。從現在起，不惜一切代價，我將不重復我以前的道德妥協。 [(960)](#_957____RGALI__f__1814__op__9__d)



西蒙諾夫，1979年

這種悔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為20世紀30年代寫的關于斯大林和白海運河的文字而自責，懊悔參與斯大林政權的戰時宣傳，亦步亦趨于斯大林的謊言，以“犯罪行為”和“叛國罪”譴責1941年下令撤退的蘇維埃將軍。對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協會的可恥行徑，他也追悔莫及——回憶起那些年份，就會感到痛苦。他在有關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寫道：“如不掩飾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難以解釋。”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西蒙諾夫一直在作自我審視，嘗試弄懂自己在作家協會的行為。他審問自己的記憶，為自己在“反世界主義者”運動中的角色寫下個人的觀察，幾易其稿，至今仍鎖在他的檔案中。然而，他從未試圖捍衛或辯護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為。拉扎列夫回憶，1970年的一個夜晚，大家在西蒙諾夫的房子里慶祝他的55歲生日。作家亞歷山大·克里維斯基傳閱西蒙諾夫1946年的一張照片時，建議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詞（“如今的他，依然一如當初”），來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對其中的寓意——西蒙諾夫仍是斯大林主義者——不以為然，提出下一輪祝酒，應該為主人的勇氣干杯，因為他“并不害怕改變和告別過去”。接下來是一場激烈的爭論：西蒙諾夫是否已經改變？改變一事到底是好還是壞？第二天，拉扎列夫打電話向西蒙諾夫道歉。但是，西蒙諾夫并沒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憶：“恰恰相反，他說，那場爭論很有教育意義，因為它幫助他定下決心：一個人有所改變，只要變得更好，當然是好事。” [(961)](#_958_2)

西蒙諾夫在20世紀70年代的活動，大多出于想將功贖罪，彌補自己的過去。斯大林主義者當年對猶太作家的攻擊，他仍記憶猶新，于是他帶頭發起了一場對莉利亞·布里克的勇敢辯護。她是馬雅可夫斯基后期詩歌的繆斯，卻遭到蘇斯洛夫手下評論家的強烈攻擊。他們以公開反猶的姿態，要求在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敘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這位偉大的蘇維埃詩人的猶太因素。西蒙諾夫后悔自己1954年對愛倫堡的攻擊，組織出版了愛倫堡的戰爭新聞報道，其中收錄了西蒙諾夫寫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稱頌愛倫堡是所有戰地記者中最好的。這本書問世于1979年，即西蒙諾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諾夫在醫院里收到出版社送來的一冊書后，打電話給編輯此書的拉扎列夫，稱自己非常高興和欣慰，因為他已與愛倫堡“講了和”。 [(962)](#_959_2)

但在文學界知識分子的改革派中，還有不少人對西蒙諾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義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看來，一位資深斯大林主義者從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諾夫為某種自由事業挺身而出時，總有人懷疑其中的虛偽。索爾仁尼琴寫道：“西蒙諾夫是一個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學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時與所有官方機構保持聯絡。” [(963)](#_960_2)

有時，西蒙諾夫的表現又與自由主義的傾向大相徑庭。例如，他參與了克里姆林宮對文學年鑒《大都會》（Metropol）的迫害。它的編輯是維克托·葉羅費耶夫、葉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諾夫，同時又由阿爾季斯公司（Ardis）在美國出版（日期和地點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會》并不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出版物，如葉羅費耶夫所宣稱的，只是一個“在停滯情況下與停滯作斗爭的嘗試”。勃列日涅夫政權的年邁領導人，震怒于這種對出版物控制的挑戰，向《大都會》編輯施以報復。葉羅費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協會開除，《大都會》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協會以示抗議，或設法移民逃離蘇聯。蘇斯洛夫將西蒙諾夫拖入對《大都會》的迫害，還施加壓力，要他譴責《大都會》的“反蘇維埃”。西蒙諾夫本已牽涉其中，他22歲的女兒亞歷山德拉，愛上了維克托·葉羅費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輕的藝術史學家，剛與亞歷山德拉訂婚，兩人經常出沒于波希米亞朋友圈子，成員都是蘇維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親是一名高級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聽叛逆的搖滾樂。《大都會》的文學丑聞一經爆發，西蒙諾夫就想中止兩人的戀情，決定讓自己和家人遠離葉羅費耶夫一家。他們與持不同政見者乃至其外圍人士的牽連，可能構成對西蒙諾夫的危險。也許，如安德烈所認為的，他希望亞歷山德拉嫁入更依順蘇維埃政權的家庭。也許，他害怕《大都會》案件引出更多麻煩（它招致了西方的強烈抗議），亞歷山德拉會因此吞食與葉羅費耶夫一家交往的惡果。西蒙諾夫與蘇維埃政權打交道，內心的恐懼永遠存在——盡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蘇維埃政權的重要人物，似乎不應再有恐懼。西蒙諾夫在蘇斯洛夫的辦公室，編寫了針對《大都會》的文學報告。他所譴責的“反蘇維埃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僅有維克多，還包括安德烈。亞歷山德拉從安德烈那里獲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責他是在詆毀自己的父親，遂取消婚約。但到后來她才發現，原來他說的是實話。 [(964)](#_961_2)

西蒙諾夫由慢性支氣管炎引起的死亡過程，既緩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宮的醫生不愿為他的治療方案承擔責任（“醫生事件”之后的幾十年中，那是蘇聯的普遍問題），并沒有對癥下藥。西蒙諾夫生前的最后幾個月曾多次進出醫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過去：為何沒在斯大林恐怖時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幫助。他最后的筆記是一個劇本的草稿（《四個自我》），以對話的形式，展示現在的自己和不同歷史時期的三個“自我”。他讓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現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幫忙，你怎樣作答？”

“這取決于具體情形。他們有時會打電話，有時會給我寫信，有時會當面開口。”

“他們會要求什么？”

“這也取決于具體情形。有時，他們要我干預，去幫助別人；他們會說那人有多好。有時，他們寫信給我，說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說他們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們太了解他了，以致無法相信。”

“他們真的寫過這樣的信？”

“有時是這樣的，但更多時候，他們寫道，他們知道此事與己無關，也無法判斷真偽，或許那是正確的，但是……然后，他們嘗試寫下所熟悉的當事人的全部優點，希望有所幫助。”

“你曾試圖幫忙嗎？”

“嗯，我有幾次沒作答復，兩次吧。第一次，因為我從不喜歡當事人。不去幫助一個既不喜歡又不熟悉的人，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另外一次，我認識當事人，在前線時就和他在一起，曾經非常喜歡他。但是他們在戰爭期間把他抓起來，我認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種陰謀，但沒人提及這樣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談。他寫信給我，我沒有回答，也沒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對他說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獲釋了，我感到很慚愧。更何況，我事后發現，我認為比我更軟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卻作了回答，還在盡量幫助其他許多人——給他們寄包裹和金錢。” [(965)](#_961_2)

西蒙諾夫最后幾次住院時口授了自己的回憶錄《通過我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沒完成。 [(966)](#_962_2) 西蒙諾夫的回憶錄是另一次與早先自我的交談，他承認，不可能知道自己在過去某時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過與自己記憶的對話，來尋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釋自己對斯大林的心結、自己與斯大林政權的合作、斯大林主義的性質，審問自己時毫不退縮——評判自己時冷峻嚴厲。

西蒙諾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戰場，那是1941年6月數千人戰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報刊報道了“斯大林最喜歡的”偉大蘇維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紀80年代，西蒙諾夫的作品仍在蘇維埃的學校和大學里被視為經典讀物，并被譯成多種文字。蘇維埃政權解體后，他的文學聲譽下跌，作品的銷售量急劇下降。年輕的俄羅斯讀者渴望新鮮事物，他的文風似乎有點過時，也太“蘇維埃”化了。

三

1956年后，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斯大林罪行的數百萬人，繼續過著他們的“正常”生活。他們中有的作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或獄警直接參與其中；其他的作為各地的官僚間接參與。他們大多數人都能逃避內疚，自覺或不自覺地設法忘記自己的過去，借助意識形態或其他虛構的遁詞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來申辯自己的無罪。 [(967)](#_963_2) 很少人有勇氣以西蒙諾夫那樣的誠實，來直面自己的罪責。

根據大多數人的估計，1956年之后，生活在蘇聯的約有100萬前勞改營獄警。那些愿意講述自己過去的前獄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責。列夫·拉茲貢回憶起20世紀70年代在莫斯科醫院遇到一個名叫尼亞佐夫的西伯利亞韃靼人。尼亞佐夫原在哈巴羅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轉營擔任警衛，監督了數千囚犯的槍決。他的故事很簡單。他是個看門人的兒子，在小學里就是橫行霸道的小惡棍，到十幾歲成了小偷和幫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當獄警，后轉到古拉格擔任警衛。哈巴羅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比金中轉營，是古拉格系統中許多“特殊營地”之一，那里的囚犯關押幾天之后即遭槍決。從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轉營的短暫存在時期，估計有1.5萬至1.8萬人槍斃于此。而尼亞佐夫參與了其中的多數，開槍之前和之后都領到了伏特加。據拉茲貢說，尼亞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無辜的，但他沒有任何悔恨，也沒有任何內疚。尼亞佐夫告訴拉茲貢，他一直睡得很好。戰爭期間，尼亞佐夫參加紅軍，打到德國，在那里參與了銀行搶劫。1945年之后，尼亞佐夫負責一個軍事倉庫的安全，靠盜竊和詐騙變得富裕起來，結果遭到新任黨領導的解雇，他因此突發心臟病住進醫院，在那里見到了拉茲貢。 [(968)](#_964_2)

伊萬·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獄警。他是貧農的兒子，只受過4年農村教育，16歲那年參軍時，即1941年，都不會讀書寫字。戰爭結束后，他的部隊轉而執行古拉格的各項任務。從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為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獄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訪時已經知道，向勞改營輸送勞工的大規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對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識形態、來自生活的道德教訓、對囚犯的階級仇恨，來為自己的參與辯護：



伊萬·柯察金，1988年攝于卡拉干達

我問你，蘇維埃權力是什么？它是一種強制機構！懂了嗎？比如說，我們坐在這里，兩名警察來敲門，然后說：“跟我走！”僅此而已！這就是蘇維埃權力！他們可以把你帶走，投進監獄——無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敵人，你無法說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這些囚犯。我應相信這個命令，還是相信你呢？也許我覺得對不起你，也許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殺豬時，聽到尖叫聲，你會覺得難過嗎？即使我覺得對不起，我又能幫什么忙呢？戰爭時期，我們從前線撤下來，不得不拋棄受傷的士兵，知道他們只有死路一條。我們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勞改營看管那些帶著生病的孩子的母親們，她們哭個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們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懲罰，不過，那與我無關，我有工作要做。他們說，兒子無須為父親負責，但妻子要為丈夫負責。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敵，那妻子又會養育出怎樣的兒子？勞改營中有許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們的日子不好過，也許沒這樣的母親，反而更好。那些敵人是真正的寄生蟲，他們出國旅行，總在炫耀他們的音樂、鄉間別墅、精美服飾。窮人饑腸轆轆，沒有油腥，過得比動物還要糟糕。那么，到底誰是人民公敵呢？我為何要為別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沒有傷害他人，只是在為政府服務。 [(969)](#_965_2)



米哈伊爾·尤西佩科，1988年攝于卡拉干達

20世紀80年代的開放政策時期，公眾媒體就古拉格管理員的作用展開了辯論。許多前獄警寫信給前囚犯，要求他們確認自己在勞改營時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歷史記錄，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爾·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貧農家庭，只完成三年的農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由于父親的出征，他被迫輟學打工。父親一去不復返。20世紀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農場工人，以此養活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饑荒中失去妻子和兩個孩子，從1934年起，在哈薩克斯坦的古拉格勞改營行政中心的卡拉干達從事黨務工作。不久，他獲得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招募，擔任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副指揮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內，即從1939到1944年，涉嫌強奸了眾多女囚，但沒有刑事調查，只有滿天飛的謠言。赫魯曉夫的解凍年代，這些謠言似乎給尤西佩科帶來了麻煩。從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寫信給數百名前囚犯，包括獲釋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們幫寫聲明佐證他的良好行為。22名女子寫了證詞，證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過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其他獄警（據說，寫證詞的女子中有幾個是他的強奸受害者）。1988年，《列寧變化報》（Leninskaia smena）上有關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為此，尤西佩科將那些證詞轉寄給全國和當地的報紙，以及哈薩克斯坦的黨組織，還附上長篇生平介紹，旨在“澄清歷史真相”。尤西佩科聲稱，他“一直曉得”囚犯是無辜的；“從一開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與囚犯講話時從沒趾高氣揚，并盡量紓緩她們的負荷”；讓她們收發超過規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風險”，去呈交提前釋放的申請報告。尤西佩科寫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說我同情人民公敵，那我就完蛋了。但我當時相信，現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報紙登載前囚犯的證詞和自己的生平敘述，不但想證明自己的問心無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對“斯大林鎮壓”（開放政策時期杜撰出來的專用名詞），也是受害者。 [(970)](#_966_2)

許多前古拉格官員，為自己的過去編造相似的故事。遠北建設托拉斯規劃部門的首席會計兼督察官帕維爾·德羅茲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馬加丹的勞改營。他于1951年獲釋，留在馬加丹充當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兒。根據帕維爾告訴兒子的故事，他這位前首席會計只是不起眼的專家，在掌管勞改營的遠北建設托拉斯中，并無真正的權威。這個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因為他的靠山愛德華·別爾津——遠北建設托拉斯的負責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維爾就降職為普通會計。過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維爾在赫魯曉夫時期末開始收集資料，準備寫自己在遠北建設托拉斯的回憶錄，他想以此紀念別爾津，視其為有遠見的經濟改革者和開明的人道主義者。但是，他與遠北建設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卻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沒有意識到，或在某種程度上故意漠視了他主持規劃部門時手下囚犯受苦受難的程度。帕維爾多次發生心肌梗塞，遵照醫囑，他放棄了撰寫回憶錄。過去的真相實在太困擾他了，以致他無法面對，最終死于1967年。他的兒子繼續相信父親是無可指責的官員，在遠北建設托拉斯擔任會計，其時的主管別爾津采納了“相對人道和進步的方式”，父親也是斯大林政權的受害者。 [(971)](#_967_2)

虛構與記憶交織在一起維系每個家庭，而這在蘇聯更發揮了特殊作用，那里數百萬人的生活被沖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認為，創傷受害者如將自己的經驗納入更宏大的敘事中會大有裨益，可從中獲得意義和目的。納粹反猶戰爭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贖的敘述，而斯大林鎮壓的受害者卻有兩個集體敘述來安置自己的人生，為自己的苦難找到某種意義。第一是生存敘述，體現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憶錄文學，個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蘇維埃敘述，個人痛苦在共產主義理想、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蘇聯的成就中獲得救贖。

赫魯曉夫解凍后幾十年內出版的古拉格回憶錄，給普通人如何銘記斯大林時代的家史，帶來了強大沖擊。它們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與創傷受害者如何處理自己的記憶有關。如心理分析所顯示的，有創傷記憶的人往往會屏蔽過去的一部分。他們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只是一系列雜亂無章的情節（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園的時刻），而不是一個線性的編年表。他們嘗試回憶自己的人生時，特別是在記憶力下降的老年時期，往往借鑒自己讀到的或聽聞的，來填補自己記憶中的空白。 [(972)](#_968____Lev_Razgon__True_Stories) 亞歷山大·多爾根是美國領事館職員，1948年因“間諜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薩克斯坦的勞改營。他在20世紀70年代寫出回憶錄，開篇就解說了記憶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確實記得的，其他的則是一定應該發生過的。有些情節、面孔、話語、感覺，已深深烙入我的記憶，不管隔開多長時間，我都不會忘記。但也有些時候，我因他們不讓我睡覺而變得精疲力竭，或饑火燒腸、遭受毒打、持續高燒、生病吃藥，以致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我現在只能構想出一定應該發生的，以填補這些時期中的空白。

多爾根聲稱有非常好的記憶力。但從乘坐囚犯火車離開莫斯科，到開始在哈薩克斯坦勞改營采石場上班，這中間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他“實在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973)](#_969_2)

為了填補這些空白，人們會借用他人的記憶。斯大林時代業余回憶錄作者所描述的許多場景，與有關大恐怖的著名書籍極為相似，譬如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的《進入旋風》（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73年）。這兩部書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羅斯的正式問世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末。但它們通過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羅斯廣為流傳，幫助促進了當年民間回憶錄的繁榮。 [[6]](#_6___Ke_Zai_Ji_Nian_Xue_Hui_Dang)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回憶錄中的場景是作者自己的記憶，還是作者猜測已發生的，或想象“一定會發生的”，因為別人也寫了類似的情節。伊琳娜·舍爾巴科娃在20世紀80年代采訪了許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釋記憶的借用：

幾十年來，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無窮無盡的流言、傳說、神話，最常見的涉及據信早在莫斯科時就被槍決的著名人物——據稱，卻被人在遙遠的勞改營里看到了。同樣的主題和細節，反復出現于這樣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婦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場景：多年以后，她們終于有鏡子來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親。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就覺察到，他們向我口述的事件，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或其他回憶錄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現在[1992年]，講述勞改營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憶的記錄已經變得愈加困難。他們傾訴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犧牲自身的記憶為代價；他們如此投入，以致他們聽聞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974)](#_970_2)

許多古拉格幸存者堅稱，他們親眼目睹了金茲伯格、索爾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場景，見過這些作品所提及的獄警或內務人民委員會審訊員，早在勞改營時就知道這些作家。但相關的文件清楚地指出，這絕不可能。 [(975)](#_971_2)

古拉格幸存者以這種方式借用他人的回憶錄，有好幾個原因。20世紀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島》那樣的書籍，已通過地下出版物四下傳閱。斯大林鎮壓的許多受害者，強烈認同它們的思想立場，認為這是了解勞改營真相的關鍵，所以擱置自己的獨立回憶，讓這些書籍代替自己說話。受害者往往對自己的經歷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沒有結構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讓自己的記憶理清頭緒。這種差距更增強他們的傾向，要以這些作家連貫、清晰的記錄，來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憶。一名歷史學家在采訪大恐怖幸存者時觀察到：

你若問個看似很簡單的問題：“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嗎？”回答很可能會使你大吃一驚：“你沒讀過索爾仁尼琴的書嗎？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繼續問：“但你家有人被捕嗎？”很可能是一個停頓：“噢，不，我家沒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問：“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這次會有一個很長的停頓，接下來是：“噢，我真的記不得了。但是，有一個，伊萬諾夫，住在走廊盡頭的。是的，我現在記起來了。” [(976)](#_972_2)

這個例子顯示，從整體看，口述證詞比文學化的回憶錄更為可靠，盡管后者通常被認作更為真實的記錄。跟所有的記憶一樣，采訪時的證詞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書，它能加以盤問，可與其他證據進行比照，讓真實的記憶浮現，去掉那些聽聞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憶錄，不但影響對場景和人物的回憶，而且影響對這段經歷的理解。所有關于斯大林恐怖的回憶錄，都是幸存者重新構建起來的敘述。 [(977)](#_973_2) 他們所講述的，通常是煉獄和救贖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獄”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敘述者通過這些講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難。這種令人振奮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釋這些文學性回憶錄的積極影響，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樣方式來回憶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茲伯格的回憶錄，已成為幸存者的敘述模式。她的文學結構，更受到無數業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與她的相差無幾。金茲伯格回憶錄的統一主題是通過愛來獲得新生——這一主題使她的寫作極具感染力，成為文學佳作。金茲伯格解釋，她之所以能在勞改營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對人類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喚起的人性閃光，既幫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對人類的信念的回應。在《進入旋風》一書中，金茲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馬幼兒園的工作，照顧別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兒子，從而給她堅持下去的勇氣。在續集《旋風內》（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書中，金茲伯格從幼兒園轉至醫院，愛上了充當醫生的勞改營囚犯；盡管有反反復復的分離，兩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還保持著聯系，直到斯大林去世；獲釋之后，他們仍留在流放地，無法回到俄羅斯主要城市，隨即結婚，并收養了一個孩子。 [(978)](#_974_2) 這種敘述軌跡，在回憶錄文學中受到無休止地模仿。這類“家族歷史”和“紀錄片故事”，在基本結構、形式、道德色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統一性十分明顯，光用文學潮流是解釋不清的。也許，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有過不尋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運與同類人的命運連接起來，以同一文學模式來回憶自己的人生。

蘇維埃敘述提供另一種安慰，即讓受害者相信他們的犧牲是為了集體的目標和成就。蘇維埃的共同目標不只是一個宣傳神話，還幫助人們感覺自己參與了實現蘇維埃理想的斗爭，自己的人生因此獲得肯定，從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難。

在這方面，偉大的衛國戰爭的集體記憶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軍人認為，他們的痛苦和損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標和意義，他們頗感自豪的1945年的勝利即是一個代表。歷史學家凱瑟琳·梅里戴爾為研究戰爭中的蘇維埃軍隊赴庫爾斯克采訪老兵，發現他們談起自身經歷時沒流露半點的苦澀或自憐，全以堅忍的態度接受所有的損失，“不去重溫戰爭的最殘忍場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蘇維埃國家的語言，暢談榮譽、驕傲、正當報復、祖國、斯大林、信仰的絕對必需”。如梅里戴爾解釋的，對這些退伍軍人來說，認同蘇維埃戰爭神話是一種應對機制，能讓自己承載痛苦的記憶，頑強地存活下來：

回憶當年，即戰爭時期，讓人很容易崩潰，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淵，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堅忍接受和重視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們使用的詞匯，都是務實、樂觀的，別的只會勾起絕望。60年之后，他們很容易通過敘述恐怖遭遇，來吸引關注或博得同情。但對這些人來說，這無異于背叛自己的價值觀，那關乎他們的集體榮譽和人生原則。 [(979)](#_975____See_e_g__MSP__f__3__op)

從勞改營歸來的人，同樣也在斯大林主義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為古拉格勞工，他們也為蘇維埃經濟作出了貢獻。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親手建成的工廠、水壩、城市，油然生起無比的自豪。這種驕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們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蘇維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第二，也許，他們需要為自己的苦難找到更大的意義。在《旋風內》一書中，金茲伯格講述了自己重返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馬勞改營的難友們親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靈真奇怪！我整個靈魂都在詛咒那些始作俑者：在這凍土上建起小鎮，以無辜之人的鮮血和淚水，融化它的凍土。然而在同時，我又感受到一種荒誕無稽的驕傲……在我離去的7年當中，它長大了，變得漂亮了，我們的馬加丹！簡直面貌一新呀。我贊美每一盞路燈、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館即將演出歌劇《美元公主》的海報。我們珍惜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 [(980)](#_976_2)



諾里爾斯克，2004年7月

在諾里爾斯克，城市居民（約13萬人）中的老年群體，仍強烈感受著這種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們的后代，少數是勞改營前管理員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銷后，他們的家庭仍留在這塊北極定居地，許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為無處可去。1953年之后，工業綜合企業的管理從古拉格轉至重工業部，諾里爾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規的蘇維埃統治機構（學校、少先隊、共青團、黨組織等等），這有助于培養蘇維埃覺悟——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地方上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基于他們為諾里爾斯克感到的驕傲——以此覆蓋古拉格記憶。迄今，該城仍傳頌于歌曲和故事中，人們繼續歌唱：

這個小城叫做諾里爾斯克，

我們在此挖掘銅和鎳。

這里的人有頑強的精神，

俄國人都知道諾里爾斯克。

不少書籍和電影紀念在冰霜中建起諾里爾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飾其中大多數是囚犯的事實（在這個嘗盡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記憶仍潛存于大眾意識的表面之下）。這個小城的驕傲與北極勘探的浪漫和開拓的精神緊密相連，體現于這樣的流行觀念：要想存活于諾里爾斯克的惡劣環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瓦西里·羅馬什金，2004年

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馬逃跑。

這片嚴酷土地不屬于他們，

這里的狂風怒號，

暴風雪肆虐，

夏天終年無緣看到。 [(981)](#_977_2)

還有一個流行信念聲稱這座城鎮的居民擁有特殊的溫情和同志友愛，源于他們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經驗，以及艱苦條件下共同的奮斗圖存。但更重要的，這種公民驕傲植根于諾里爾斯克人的勞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羅馬什金，他在2004年仍與子孫堅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區的農民家庭，1937年作為“富農”被捕，從1939年起即囚在諾里爾斯克。他始終留在采礦綜合企業——先是個囚犯，后來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諾里爾斯克工作努力，多次獲得獎牌，還是囚犯時，就以真正的勞動模范出名。他為蘇維埃戰事作出貢獻，因而感到特別的驕傲，他在接受采訪時解釋：

這些獎牌都是給[社會主義競賽]優勝者的——冶金業優勝者，第9個五年計劃[1971至1975年]優勝者……那個獎牌是什么，我都忘了……這些是[諾里爾斯克]“綜合企業老兵”和“蘇維埃老兵”獎牌——是表彰勇敢和敬業的。而這個是給偉大衛國戰爭老兵的五十周年紀念獎牌，因為當時的綜合企業已納入軍事編制……我為自己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我盡了公民的愛國義務。 [(982)](#_978_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輩發言，頌揚勞改營對蘇維埃經濟的貢獻。特別是戰爭時期，他們在嚴寒中挖出的貴金屬，對蘇維埃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經常宣稱愛諾里爾斯克的“美”，在某種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成就感，這個城市是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建造起來的（似乎沒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氣里永久充斥著有毒的黃色煙霧，樹木都無法存活）。20世紀50年代初，奧莉加·伊亞斯基娜來到諾里爾斯克勞改營，從此再也沒有離開。她宣稱：“這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是我們的小列寧格勒。” [(983)](#_979_2) 許多城中心的建筑確實是圣彼得堡（另一個奴隸們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諾里爾斯克代表一個驚人的悖論：一個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業城市，其市民的驕傲，卻植根于他們向斯大林政權提供的奴役勞動。

類似的悖論又成了懷念斯大林的基礎。這位獨裁者死了半個多世紀，對他的懷念卻仍在繼續，涉及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眾意見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42%的俄羅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樣的領袖”重新出現（6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 [(984)](#_980_2) 這種懷念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并不大，在回憶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來，主要與懷舊情緒有關——那是自己傳奇般的青春歲月：商店貨物琳瑯滿目；社會秩序良好；他們的生活圍繞簡單的五年計劃的目標運轉，并因此被賦予意義；一切都黑白分明，因為有斯大林在動腦筋，大家只需照辦。就這些人而言，懷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們作為退休人員生活的不穩定。特別是蘇維埃政權1991年解體以來，許多商品價格的上漲，遠遠超過他們的購買能力；通貨膨脹掏空了他們的積蓄，猖獗的犯罪又讓待在家中的老人擔驚受怕。

屈服于這種懷舊的，包括曾占據一定地位的人士——眾多的蘇維埃官僚、基層工作人員、勞改營獄警、警察、專職司機、鐵路職員、工廠和集體農莊的主管、寓長和清潔工，他們回顧當年，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猶如“小斯大林”，沿指揮系統拾階而上，可與這位偉大領袖掛上鉤；同時也有普通的公民，他們雖在斯大林政權中沒有特別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與該政權的命運糾纏不清。米哈伊爾·巴伊塔爾斯基回憶，他在20世紀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義者——曾是20世紀20年代的共青團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廠晉升為中級工程師。該工程師仍是斯大林的狂熱支持者，他雖不想為獨裁者辯護（已知道事實），但繼續認同斯大林主義的許多假設，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敵”有罪。巴伊塔爾斯基得出的結論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對“火熱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擁有的素質的自豪”。他不愿背棄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為那些信念已成為自己個性的一部分；也拒絕承認正是這些素質，促使他“在內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槍決他最親密的戰友”。 [(985)](#_981_2)

對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來說，這種懷舊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薩爾特科夫的父親是位神父，槍決于1938年，他自己當上一家工廠的工人和工程師時，曾隱瞞了父親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黨，最終當上了該廠的黨委書記。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熱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辦公桌上擺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訪中拒絕認為斯大林應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逮捕負責，包括逮捕自己的父親：



列昂尼德·薩爾特科夫，1985年

是的，我父親遭了難，像許多其他人一樣，但斯大林仍比我們今天的領導人強。他是誠實的，即使他周圍的人不誠實……不要忘記，多虧了他，我們才贏得了戰爭，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試圖打一場類似的大戰，沒人能保證俄羅斯的勝利，絕對保證不了。斯大林建立我們的工廠和鐵路，降低面包的價格，激勵大家努力工作。我們都知道，如果學習勤奮，上高等學院，肯定會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選工廠。一切都取決于自己的勤奮。 [(986)](#_982_2)

1937年，在維拉·米諾蘇娃17歲時，她那在彼爾姆擔任鐵路工程師的父親便遭到了逮捕和槍決。如她自己所承認的，她從那時起，就一直生活在幾乎是永恒的恐懼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給了彼爾姆的高級黨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訪中，仍不敢談論與大恐怖有關的話題，有好幾次堅決要求把錄音機關掉。維拉以懷舊的心情回顧斯大林的統治時期，那時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負擔得起；與我們今天相比，那時更有紀律和秩序”。維拉50多年來一直在蘇維埃鐵路辦事處擔任簿記員，她抱怨說，人們“如今都不想工作”，她聲稱斯大林的年代較好，因為“每個人都被迫做事”。



2003年5月，維拉·米諾蘇娃在葉卡捷琳堡附近的鎮壓受害者紀念碑前。在她點燃的蠟燭旁邊，是她父親的名字（拼寫是錯的）

癥結在于紀律。你必須將人置于嚴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們應該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讓人們上班遲到，隨意回家。如果他們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規矩行事。 [(987)](#_983____Interview_with_Olga_Iask)

1939年，當伊拉伊達·法伊韋索維奇4歲時，她來自奧薩的理發師父母雙雙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勞改營。她在2003年的采訪中也認為，斯大林統治下的生活更好。“人們不會在大街上殺來殺去！那時，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達認為，在斯大林的時代，政治領導人比較誠實：“當然，有時會有糧食或衣服的短缺，但從整體看，他們兌現了承諾。”像許多在共用公寓長大的老人一樣，伊拉伊達也懷念當年的集體主義。她還記得，那是一種愉快的生活，特別是與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統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為富足——我們過得更為安寧、愉快。大家都很窮，不在乎物質條件，但有很多樂趣——朋友和家人之間一切都是開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們互相幫助。我們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間，遇上節日，與大家一起上街慶祝。今天，每一個家庭都只為自己而活。

伊拉伊達說，那時的人對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義：

我們相信，未來是美好的。我們相信，如果勤勤懇懇地工作，生活將會變得更加美好……我們并不奢想自己在創造人間天堂。但我們認為，正在建造的社會足以保證每個人的溫飽，只有和平，沒有戰爭……這個信念是真心實意的，它幫助我們堅持下來。這意味著，為了將來，我們全神貫注于我們的學習和工作，無暇顧及物質條件。我們當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驕傲，要大于今天的。沒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難過的，我們今天信什么？都沒有理想了。 [(988)](#_983_2)

四

盡管有懷舊，但斯大林受害者的后裔，在獨裁者去世幾十年之后，仍在繼續承受斯大林政權的毀滅性遺產。這不僅僅是失去的親戚、受損的人生、破碎的家庭，還有代代相傳的心理創傷。 [(989)](#_984_2)  [[7]](#_7___Zhe_Zhong_Xin_Li_Chuang_Sha)

葉麗薩維塔·德利巴什從1937年被槍決的父母那里，繼承了對蘇維埃當局的終身恐懼，更傳給了自己的孩子。她由在第比利斯的外祖父母和列寧格勒的姨媽相繼帶大，姨媽本人是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葉麗薩維塔十幾歲時加入共青團，成為學生積極分子，以此克服自己的恐懼。她努力學習，在學校里獲得優秀成績，1947年進入列寧格勒大學學習語言，但她的恐懼并沒徹底消失。她回憶：“我總是感到自卑，因父母的遭遇，自己一直缺乏信心。我的一生，都有這內心的恐懼，那是一種損耗和脆弱的感覺。我感到自己不能算個完整的人，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受到有權有勢者的欺負和侮辱。”她擔心自己在列寧格勒被捕，便放棄了繼續深造的抱負，逃到庫班的寧靜小鎮克拉斯諾達爾，從事教師工作，直到1954年。其時，她與丈夫回到列寧格勒，找到一份圖書管理員工作；她丈夫名叫約瑟夫·利伯曼，是物理系學生。

約瑟夫來自列寧格勒的猶太家庭，其家人私下里對蘇維埃政權持有異議。這與葉麗薩維塔的姨媽的正統政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葉麗薩維塔由此而獲得啟示，更受到蘇共二十大的鼓勵，開始對父母失蹤的事件持懷疑態度。1958年，她終于發現他們都已遭槍決，這是一個巨大打擊，她曾盼望母親可能還活著，并照著母親發自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的最后一封信所說的，一直遙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團聚的象征。這一發現更加劇了葉麗薩維塔與蘇維埃制度的疏離，她和約瑟夫開始與米哈伊爾·莫洛斯特沃夫發起的反對派學生團體走動。1958年，莫洛斯特沃夫被捕，從列寧格勒被送去流放地。后來，夫婦倆又加入約瑟夫·布羅德斯基的圈子。布羅德斯基是列寧格勒詩人，1964年作為“寄生蟲”上了法庭，被判刑5年，送到北部的流放地（由于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在1965年獲得減刑）。20世紀60年代后期，夫妻倆又與無法拿到離境簽證的蘇維埃猶太人建立了密切聯系，他們的抗議后來成為人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時期，葉麗薩維塔都活在恐懼之中。她為約瑟夫擔心，他在完成博士論文多年后仍沒拿到博士學位（那是領取學術薪金的資格）——這是對他參與反對派活動的懲罰，還算輕微，卻是更重的懲罰將至的威脅。葉麗薩維塔變得愈益內向，擔心自己的孩子亞歷山大 [[8]](#_8___Ya_Li_Shan_Da_1991Nian_Si_Y) （生于1955年）和安娜（生于1960年）。葉麗薩維塔只得過著“秘密生活”，嚇得要死，害怕自己的持不同政見將會招致逮捕，讓子女像自己一樣從小就失去母親。她回憶道：“失去母親是我一生中最強烈的感受，我為自己的孩子而擔憂。”

據安娜說，葉麗薩維塔作為母親的保護意識特別強烈，從不告訴女兒自己的家史。安娜回憶：“在我整個童年時期，這都是一個禁忌。”她14歲時才從哥哥那里聽說，自己的外祖父母都是在大恐怖時期被槍決的；但詢問母親時，又被告知，外祖父母喪生于戰爭年代。在開放政策時期之前，葉麗薩維塔一直不讓女兒知道真相。安娜小時候完全不知道父母參與了反對派活動：“他們保護我，讓我遠離他們的活動。”她要到20世紀80年代才意識到，父母的許多朋友都是持不同政見者，布羅德斯基曾來過他們家的公寓，父母讀的手稿都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

母親始終堅持的是女兒一定要努力學習。安娜回憶：“她一直對我們灌輸，我們必須比學校里其他孩子更為勤奮，因為我們的猶太人名字會讓我們處處吃虧。”安娜覺得，這真是一種負擔，好像自己有責任彌補母親大學后的放棄深造：“上帝保佑，讓我在學校里取得高分。我是被迫變得聰明的——別無選擇。”安娜不得與無產階級背景的孩子來往，因為母親擔心，如果家史泄漏，他們可能會構成危險。安娜回首往事：“現在才意識到，母親希望我與有文化家庭的孩子交往，他們像我們一樣，也受到迫害。”安娜從小學會謙虛謹慎，決不出風頭，循規蹈矩，政治上忠誠順從，參加少先隊和共青團。雖然她本能地意識到，這種對當局的亦步亦趨，“純粹是表面文章”。

安娜承認自己也有根深蒂固的恐懼，缺乏自信，在社會上自我壓抑。她認為，這是母親幼時教養的遺傳：

我從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難說這種恐懼究竟是什么。我害怕與官方的任何接觸……那是一種怕受羞辱的恐懼……我從小就學會，如果自己的行為可能受到當局的批評，就趕緊退卻……從十幾歲開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開胸懷，到了社會上就內向……我害怕與陌生人相處，總是不愿引人注目。

安娜的恐懼雖然咄咄逼人，卻模糊不清、難以界定，因為尚是孩子時，她從不知道家人受到的迫害。第一次獲悉污點履歷可能引發的后果時，她才恍然大悟，迄今還能清楚憶起那一時刻：她向一位老師談及自己很想上大學，但老師有所懷疑，他解釋說，不是因為她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通常不會把最高分打給像你[猶太]那樣的學生”。安娜隨即變得“歇斯底里”，這就是她所一直擔心的羞辱。

為了以后能上大學攻讀旅游專業，安娜申請蘇維埃護照時不填父親的猶太民族，改用母親的格魯吉亞民族。她加入了共青團，即使看破了它的意識形態，仍堅持參與，唯恐招惹大學當局。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從不參加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她聲稱，自己一直知道蘇維埃制度的不公，但嚴格管束自己的思想和興趣，決不讓自己以任何方式引起有關忠誠的懷疑。 [(990)](#_988_2)

這種“遺傳的恐懼”——安娜如此叫它——以多種方式影響了斯大林受害者的孩子，從他們在學校里的朋友，到他們的職業選擇。例如，弗拉基米爾·科薩科夫出生于列寧格勒的舊知識分子家庭，家人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清洗中吃了不少苦頭。他對列寧格勒的圍城仍有童年的記憶，因此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創傷。20世紀50年代后期，他拒絕了在基洛夫芭蕾舞團擔任演員的機會，改去波羅的海工廠上班，那是一個龐大的造船和機械工廠。他回憶，即使在那時，他也擔心被攻擊為“人民公敵”的兒子，所以要“投身于無產階級”，以保護自己。 [(991)](#_989_2)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阿列克謝·尤拉索夫斯基在哈內耶夫斯基家的莫斯科共用公寓長大。他的外祖父是軍醫阿列克謝·哈內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貴族地位；父親是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貴族后裔，祖父及其兄弟都曾以白軍身份參與內戰。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對周遭的無產階級鄰居非常警惕，阿列克謝也深知禍從口出，決不輕易相信他人。他回憶：“我從小就被教導要警惕這個體制。”

外祖母添加了甚多不合理的色彩，因為她的警告顯得荒誕不經，但在小孩的眼中仍頗有說服力。例如，她曾告訴我一個男孩的故事，他一只腳剛剛踏上芬蘭大使館門前的臺階，就馬上被捕——永遠不見了。這個故事真把我給嚇壞了，她這類童話般的故事太多了。

恐懼使阿列克謝變得極其謹慎。他在莫斯科大學上學時獨來獨往，與外界的唯一接觸就是通過他小學時裝配的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節目。他回避共青團和所有政治活動，感覺這一切都很討厭，他還得出結論，最明智的策略就是避免交友，省得外人懷疑自己的政治忠誠。他40歲之前都奉行著這一策略，此前他受訓成為一名考古學者和阿拉伯文化專家。阿列克謝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認為自己作出這個選擇，也是為了“逃避”蘇維埃制度的政治。他認為政治是一個“雷區”，其中的規則和危險變化莫測。他從小感覺的恐懼也在漸漸演變——借用他自己的話即是，變成了對俄羅斯和蘇維埃政權的“悲觀和懷疑”。他的謹慎也在擇偶方面發生作用，安娜是他的三表妹，她的直系親屬也受到斯大林制度的迫害。阿列克謝回憶道：“這當然有幫助，我們來自相同的背景，使我們更加親近，給我們的關系帶來特別的諒解和團結。” [(992)](#_989_2)

恐懼的承繼直接影響甚多的婚姻。例如，父母被捕的女子，有心嫁給黨干部以期獲得保護，如此的婚姻非常普遍。維拉·米諾蘇娃的父親1937年被捕并遭槍決，她就嫁給了一名比自己年長一倍的地方黨主管。她雖在外表上討厭對方，但如她母親所規勸的，她感到能獲得物質生活的保障，撫養孩子時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她回憶：“我結婚時哭得厲害，但母親不停地催促，‘嫁給他！嫁給他！’我并不愛他，甚至感到厭惡，但我有一個女兒，她長大了，我很愛她。”馬克斯娜·卡爾皮茨卡婭的父母在1937年被捕并被槍決，這個十幾歲的女孩就在列寧格勒自力更生，后來嫁與列寧格勒一位資深軍事科學家和黨干部。她把自己的家史一五一十告訴丈夫，讓他明白個中的麻煩。她堅持不去登記婚姻，如她所說的：“即使在父母平反之后，我仍讓他保留隨時離開的機會——只要有一天，他覺得實在難以充當前人民公敵的女婿。” [(993)](#_989_2)

許多有污點履歷的人，只是在即將結婚時，才向未來的配偶袒露一切。像馬克斯娜一樣，她們希望在共同生活之前，讓對方了解自己的過去。如果講得太早，可能會把對方嚇跑。利季婭·巴布什金娜交友將近3年，最后在1965年舉行婚禮的前夕，才鼓起勇氣，把父親作為人民公敵被捕并遭槍決告訴未婚夫（一位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來自一個斯大林主義者的軍人家庭）。鮑里斯·卡辛也等到婚禮前夕，才把父親作為“反革命分子”槍決于1938年一事告訴未婚妻。鮑里斯回憶：“這是很大的風險。但我信任她，不想蒙混過關，毀了她的一生。她反應平靜，并告訴我，她自己的祖父作為富農也受過迫害，所以她熟悉這類事情。” [(994)](#_989_2)

引人注目的是，好多婚姻的雙方都來自受迫害家庭，似乎有什么東西把他們牽在一起。1955年，拉麗莎和維塔利·加爾馬什，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讀一年級時墜入愛河。拉麗莎是季娜伊達·萊維娜的女兒；后者在科雷馬勞改營度過8年（1946年歸來時還帶了一個小男孩，其父親應該是個獄警），然后在波特馬勞改營度過3年，最后又去了哈薩克斯坦的流放地。拉麗莎來到莫斯科之前，與母親一起住在流放地。維塔利1949年被捕時還是個學生，剛獲得平反，他來到學院的第一天就遇上拉麗莎。她回憶，相互吸引是因為他們都感到，人生第一次可向信賴的人暢談自己的過去，對方也能心領神會。拉麗莎還記得：

演講廳里，他坐在我一旁。我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一無所知。我們開始交談……當然，知悉他被捕的莫斯科朋友也與他交談，他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剛從勞改營歸來。也許，與他們在一起時，他沒有那種與我在一起的傾吐衷腸。他的經歷突然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傾瀉出來……之后，我們的關系發展得十分迅速。我們承受著同樣的困擾，我們的家史都不簡單，這起了很大作用。 [(995)](#_990_2)



尼古拉和埃爾弗拉達·梅沙爾金夫婦與他們的女兒瑪琳娜、伊琳娜，2003年攝于彼爾姆

尼古拉·梅沙爾金1956年遇見未婚妻埃爾弗拉達·戈特曼時，并沒袒露自己家人1933年作為“富農”被逐出奔薩，當時仍生活在科米地區的流放地。 [[9]](#_9___20Shi_Ji_90Nian_Dai__Ni_Gu) 他對埃爾弗拉達的家庭也一無所知——她是克里米亞的蘇維埃德裔，戰爭時期流放到了科米地區——僅憑感覺猜測，對方可能也受了斯大林政權的迫害（科米地區有不少流放的蘇維埃德裔），從而對她產生好感，頻頻送上情書。有好幾年，埃爾弗拉達不愿向俄羅斯人打開自己的心扉。埃爾弗拉達回憶：“我想，我會找到一個不錯的德裔男孩。”但尼古拉堅持不懈，幾近30歲的埃爾弗拉達擔心自己淪作老姑娘，終于答應下嫁。慢慢地，尼古拉和埃爾弗拉達開始傾吐各自的家史，相同的經歷和相互的同情把他們緊緊擰在一起。經過將近50年的婚姻，尼古拉認為，這種相互理解是他們關系中的最重要部分：

我把這種理解稱作團結一心。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即與這個女人團結一心的感覺，因為她也承受著苦難，遭受過迫害。我認為，她也會有同感。我想我們一起擁有的不是愛，而是團結一心，對我們雙方來說，這更重要。愛情會遠去，但團結一心就只會緊緊相連。 [(996)](#_991_2)

在1992年讀到要向受迫害者作出賠償的新法令以前，尼古拉和埃爾弗拉達一直沒將自身的污點履歷告訴女兒們。之前，他們一直害怕透露家史，一是不想給女兒增加思想負擔，二是不想讓她們疏遠于蘇維埃制度。他們總是把涉及過去的話題，轉移到比較積極的歲月，譬如雙方父親都作出過貢獻的偉大的衛國戰爭。 [(997)](#_992_2)

在這一方面，梅沙爾金一家算不上特殊。即使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后幾年，即自由氣氛濃烈的開放政策時期，大多數蘇維埃普通家庭仍閉口不談自己的家史，仍不把遭受迫害的往事傳承給下一代。開放政策的影響局限于大城市，在外省城鎮，例如梅沙爾金家居住的彼爾姆，斯大林的幽靈還在四下徘徊。詩人鮑里斯·斯勒茨基在1986年臨去世前，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外省，周邊，后方，

凍得太硬，解凍也束手無策，

迄今，斯大林仍在那里活著。

不是死了嗎！但尸體仍有余熱。 [(998)](#_993____MP__f__4__op__24__d__2)

蘇維埃政權傾塌15年后，外省仍有人不敢談論過去，甚至對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999)](#_994____MP__f__4__op__26__d__2)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的污點履歷，幾乎在她的一生中都是高度機密。她向女兒坦白自己的“富農”出身時已是20世紀90年代，離她幼時流放到西伯利亞已有60多年。安東尼娜還向分別同居了20多年的兩任丈夫隱瞞了家史。她在列寧格勒兒科研究院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其時，安東尼娜為了隱瞞自己的過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沒有在列寧格勒居住的合法權利，擔心萬一當局發現她在考上研究院時曾隱瞞自己的“富農”出身，自己又會成為“反社會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那是戰后降臨于許多前“富農”的命運（包括自己的父親），其時，政權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安東尼娜憶起當時的險境：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很害怕在街上遇上警察檢查。我的護照上有很多偽造的公章和簽名，有些是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妹妹代簽的……我居住[在列寧格勒]的許可，6個多月之前便已過期。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2004年

安東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長是一名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頗有舉報人的名聲，已開始對安東尼娜起疑。有一次，鄰居拿出一雙新鞋，安東尼娜失言說出自己父親可以做得更好，因為他也是一名鞋匠（這在農村通常是“富農”的手藝）。她因此被嚇壞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這時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向她求婚，在安東尼娜的眼中，他無疑成了一大救星。與列寧格勒居民、工程師茲納緬斯基結婚，她就會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得以合法地留在列寧格勒。

安東尼娜在后來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奧爾基隱瞞自己的“富農”出身，相互之間很少談及各自的過去，說到家人時，總是謊稱他們都是貧農。她也向生理學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隱瞞真相（很久以后，她才發現，自己所有的朋友都來自受迫害家庭）。1961年，她甚至入了黨（一直到1991年），不是因為篤信它的意識形態（有好幾次，她悄悄違反黨的紀律，以幫助朋友），而是認為入黨可打消他人對自己的懷疑。她想以此促進自己的醫學生涯，并為將要申請大學的14歲女兒提供政治上的保護。安東尼娜回憶：“我很擔心女兒的未來。”

我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的過去，只想讓她覺得，她有一個正常的母親，像她所在的[精英]學校其他女孩的家長一樣。那里，所有的父母，至少是父親，都是黨員。

甚至在1968年離婚之后，安東尼娜仍繼續對格奧爾基隱瞞自己的污點履歷。她后來嫁給愛沙尼亞人鮑里斯·約翰遜。1987年，安東尼娜接待格奧爾基年邁的姨媽，后者說漏了嘴，透露他父親原是沙俄海軍的少將，忠于沙皇，曾在內戰中參加白軍。她這才弄清，格奧爾基像自己一樣，也一直在隱瞞出身。他早年也是在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度過的，決意成為一名工程師，有意識地取得無產階級身份。他申請第一份工廠工作時就在表格上編造履歷，一生都保存一張答案紙，以確保自己在填寫下一份表格時不會出現前后矛盾的破綻。格奧爾基和安東尼娜，憑借某種奇怪的直覺，竟相互找上了翻版的自己。

鮑里斯·約翰遜也來自受迫害家庭——他的父親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安東尼娜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她也不向對方透露自己的污點履歷，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即蘇維埃制度崩潰之時。其時，斯大林政權的迫害受到公開的揭發和辯論，他們因此變得大膽，終于開口談起自己的過去。與此同時，安東尼娜和格奧爾基也敞開胸懷，道破了彼此隱瞞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們仍一致同意，繼續對擔任教師、謀求上進的女兒奧莉加保密。他們認為，如果斯大林主義者卷土重來，全不知情反而能向奧莉加提供某種保護。有兩起事件促使安東尼娜逐漸沖破恐懼，鼓起勇氣將自己的“富農”出身告訴女兒。

第一件發生于1995年，72歲的安東尼娜重訪奧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她上一次訪問奧布霍沃村是在1958年，與哥哥和父親同行，幾星期之后，父親便去世了。他們的老宅已是一片空地，他們以前經常坐在其上與村民聊天的磨石，周圍雜草叢生。他們站著注視那塊空地，安東尼娜突然聽到身后的聲音：“富農回來了！富農回來了！他們以前被趕走，現在又回來了，還穿著漂亮的新衣服。”安東尼娜轉身尋找說話人，卻無影無蹤，這個記憶一直困擾著安東尼娜。她回想道：“我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仍想把它當做自己的老家。我渴望當地人認同我，與我交談，把我當做他們當中的一員。”

安東尼娜1995年8月2日回到奧布霍沃村，恰好是父親1930年被捕的65周年。古老的村莊所剩無幾，至今仍有炊煙的只有9棟房舍。像成千上萬其他村莊一樣，60年的集體化耗盡了奧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1930年，奧布霍沃村雖貧窮，卻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農業社區，總人口達317人，將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學校和合作商店。許多像戈洛溫那樣的家庭，還有自己的皮革作坊，生產皮鞋和其他日用品。1960年，奧布霍沃村的人口下降到68人，大多數是老年夫婦和養老的獨居者。到安東尼娜1995年重訪時，全村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歲。村民早已遺忘了8月2日的古老宗教節日，但俄羅斯農民的好客傳統，還不至于徹底消亡。安東尼娜到后不久，村里的婦女以她的名義，在伊萬·戈洛溫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莊里她家族中的碩果僅存者。最初的緊張氣氛一旦煙消云散，村民們開始回憶起安東尼娜的父親，稱他是一個好農民，他的勤奮正是集體農莊所缺乏的。一名老嫗回憶道：“戈洛溫一家都是誠實、正派、清醒的人，當初把他們抓起來，都是錯的。湯妮雅[安東尼娜]，你是我們中的一員，一個真正的農家女，我們需要更多像你這樣的人。” [(1000)](#_997____MP__f__12__op__17__d__2)

安東尼娜與過去達成和解的第二個轉折事件，發生于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沙爾鐵地區。1931到1934年，她與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來這個“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銷，但從路上就能看到，營房的廢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鐵絲網之后。安東尼娜在附近徘徊時，遇到一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當地婦女，她詢問可否走進定居地，隨即開始了交談。那名女子透露：她從小就住在這里，“我是富農的女兒，1930年被送來此地，我真正的家園是在巴爾瑙爾”。安東尼娜回憶當時她的反應：

我感到震撼，從未聽人公開說出自己是富農的女兒，像我一樣。我從沒想到，說出這些話語，可以不帶一絲羞恥。更何況，這個女人講出時明顯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盡力掩蓋自己的富農出身。這個女人說話時，我環顧四周，看看旁邊有無他人。后來，我開始思索，為何環顧四周察看有沒有旁人偷聽？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為自己的膽怯感到羞恥。然后，我大聲說出：“我是個富農的女兒。”這是我第一次大聲說出這句話，盡管在自己的腦海中，我曾自言自語一千次。周圍沒人能聽到我的話，因為我獨處在一條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終于大聲說出來了。我走到河邊，用河水潔凈自己，然后為父母祈禱。 [(1001)](#_998____B__Slutskii__Sud__ba__St)

[[1]](#_1_29) 瑪莎·西蒙諾娃2004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并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以及信中所表達的情緒。

[[2]](#_2_29) 從1957到1969年，熱尼婭在《莫斯科》期刊工作，后因“嚴重的思想錯誤”（發表了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的詩歌）而遭到解雇。

[[3]](#_3_26) 非常顯著的例外是維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1946年）。它生動地再現了普通士兵的戰爭，避開了通常有關黨的英明領導的陳詞濫調。令人驚訝的是，它竟在1946年贏得斯大林獎。

[[4]](#_4_23) 這一類小說有4部：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涅克拉索夫的《第二晚》（The Second Night，1960年）、奧庫德扎亞的《學生，祝你好運》（Good Luck, Schoolboy，1961年）和瓦西爾·貝卡烏的《死者無疼痛》（The Deed Feel No Pain，1965年）。

[[5]](#_5_22) 西蒙諾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試圖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國防部檔案館，建立一個士兵回憶錄專輯，但遭到軍隊高級領導人的反對。（‘O popytke K. Simonova sozdat’ arkhiv voennykh memuarov’,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3, no. 1, pp. 63-73）

[[6]](#_6_22) 可在紀念學會檔案館中找到數以千計這樣的回憶錄。該學會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成立的，為了紀念鎮壓的受害者并錄下他們的回憶，遍及蘇聯各城鎮。成立于1989年的莫斯科歷史文學協會檔案館（Vozvrashchenie）、開放于1996年的莫斯科安德烈·薩哈羅夫公共中心和博物館，都有這段時期未發表的回憶錄的豐富館藏。

[[7]](#_7_11) 這種心理創傷會以各種方式傳遞下來，譬如父母的憂慮和恐懼、對子女的過度保護、對子女的期望過高，甚至是一起玩的游戲。匈牙利精神分析學家特列茲·維拉格——專門治療反猶大屠殺的幸存者及其子女，舉了一位幼時經歷列寧格勒圍城的母親的例子。那位母親的兩歲的女兒不愿吃圣誕老人的餅干，如有人硬塞給她，就會號啕大哭，以示抗議。那位母親自己小時候曾聽聞列寧格勒圍城期間有人殺小孩充饑，留下了心理創傷。維拉格認為，那位母親以這樣的方式將心理創傷傳給了下一代——她在女兒洗澡時與女兒一起玩耍，將女嬰的腳放進自己嘴中，并念念有詞——“現在，我要吃你了”。（T. Virag, Children of Social Trauma: Hungarian Psychoanalytic Case Studies（London, 2000）, p. 43）

[[8]](#_8_9) 亞歷山大1991年死于登山事故。

[[9]](#_9_8) 20世紀90年代，尼古拉去奔薩檔案館做他自己的研究，才發現父母對他隱瞞了一個家庭秘密：他們曾擁有鄉村酒館和面包店——根據蘇維埃標準，足以被定為資產階級。

# 后記及致謝

《耳語者》有一段較長的歷史，它的醞釀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我還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時期的研究。我是專攻俄國革命和內戰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記得那段歲月的人，結果成了熱尼婭·戈洛夫尼亞的好朋友。她是電影攝影師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的孫女，她的母親奧克薩娜告訴我很多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家族故事，并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都誕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她所謂的“和平時期”。之后的幾個月中，我拜訪了大約十來個她的朋友，大多數是老太太。但她們當時太小，記不起內戰時期；現在又太緊張，不愿詳盡披露鑄造自己人生的那段歷史，即斯大林的統治時期。

我涉獵口述歷史的第一次嘗試，教我學會了珍惜家庭記憶，以制衡蘇維埃歷史的官方敘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慮就“耳語者”這個主題做一些研究并寫出一本書的可能性。其時，有關斯大林迫害的個人回憶錄，突如潮水一般洶涌出現，更激起了我的熱望。但我的直覺是，就整體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拋頭露面。他們還在等待，以確信共產黨人不會卷土重來，這可能還需時多年。從某方面來看，我錯了。20世紀90年代初，現在被廣泛認作口述歷史在前蘇聯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對照于普京時期，威權政府的復辟已驅使許多俄羅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舊習慣。從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覺又是正確的。在第一個高峰時期，人們亟想記錄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監禁、平反的細節，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內心創傷、對背叛的耿耿于懷、對失去的親情的痛苦回憶。

到2002年我完成《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一書時，覺得征服這個未知領域的時機終于來臨。在1953年之前長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產生一種緊迫感：通過普通家庭和個人的內心生活來了解斯大林時代，這可能是最后一次機會。為《耳語者》研究項目接受訪談和提供檔案的人，其平均年齡是80歲。據我所知，本書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去世（占案例總數的6%）。

一開始，我的查詢范圍是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和公共檔案館，冀望找到家庭生活的私人文件，然后再去采訪捐贈者。這涉及對收藏的信件、筆記本、日記、回憶錄進行曠日持久的搜索，結果卻徒勞無獲。那些文件通常以很難解讀的潦草筆跡寫成，雖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難得出結論（后來，本書幾乎都沒用上這批檔案）。我在這個研究階段，獲得了下列員工的幫助：卡蒂婭·布寧娜和朱莉婭·莎拉波娃與我一起處理了莫斯科的檔案；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收集了圣彼得堡檔案的資料；尼古拉·庫茲明處理了奧廖爾等處的檔案。在這早期研究中，我要感謝兩位老教授的支持：維克托·丹尼洛夫（1925—2004年）是專門研究蘇維埃農民的歷史學家，對我的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幫我打開了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的大門；特奧多爾·沙寧幫我獲得了莫斯科社會經濟科學院的支持。

在搜索檔案的同時，我也開始訪問家庭，傾聽他們講述斯大林時期的故事，詢問他們是否保存了私人文件。這個項目憑借口碑得到廣泛的傳播——仍是俄羅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開發的關系在朋友圈子里推介我的工作，漸漸引起濃烈的興趣。他們要求得到采訪，提供家庭回憶錄、書信、筆記本等其他珍貴手稿，希望得到發表（也許想賣得好價錢）。要想一一感謝在這個階段伸出援手的人是不切實際的（他們的名字列在采訪名單中），但我特別虧欠下列人士：薩沙·科濟列夫欣然同意，幫助采訪他在圣彼得堡的熟人和朋友；依達·斯拉溫娜接受我的采訪，提供了私人檔案中許多文件、照片、有關家人的文章和信息；葉夫根尼婭·維滕貝格、阿達·列韋多娃、貝拉·列維蒂娜、奧莉加·拉緬斯卡婭、加林娜·佩特洛娃也接受了采訪并提供了家庭檔案；列昂尼德·馬赫納茨以曉暢的文筆寫下自己的回憶，并提供了珍貴文件；瓦赫坦·米赫拉茲接受好幾次采訪，安排我與他在第比利斯的家人取得聯絡；熱尼婭·戈洛夫尼亞不僅謄寫、掃描了家庭檔案，而且提供了她為電影《拋棄》（Izmennitsy，1990年）所收集的訪談和文件——來自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的前囚犯和管理員。她向我解說了蘇維埃電影界的復雜歷史、傳言、陰謀和許多人的品行，并把我介紹給眾多擁有斯大林時代吸引人的故事和檔案的家庭。

我通過熱尼婭見到阿列克謝·西蒙諾夫，他是我最大的“債主”。我知道阿列克謝是電影導演、記者、人權和新聞自由的活動家（1999年成為莫斯科保衛開放政策基金會的主席），但并不清楚他家的不平凡歷史。他母親一邊的拉斯金家的故事，幾乎絲毫未見于其著名父親的傳記。為了準備與他的第一次見面，我事先預讀了這些傳記。他的公寓就在莫斯科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大街的拐角。母親熱尼婭·拉斯金娜去世于1992年，之后，阿列克謝將拉斯金家庭檔案珍藏于抽屜中，依據這些材料，他在1999年寫出了有關父母的感人肺腑的回憶錄《私人收藏》（Chastnaia kollektsiia）。從一開始，他就對我的志趣表示歡迎，并深信我會成為他所說的“家庭歷史學家”（the family’s historian）。阿列克謝允許我復制拉斯金檔案，又從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時間，為我解說他家的歷史細節，糾正我的誤解。阿列克謝是一名了不起的說故事的人，許多采訪和談話在他家的廚桌旁進行，往往持續到深夜。他像變戲法一樣，生動地再現了拉斯金家的特殊氣氛——阿列克謝和妻子加林娜成功維持了那種溫暖和隨意——我開始覺得，我不只是一名歷史學家，而在事實上成了這個大家庭的一員。我拜訪阿列克謝的姨媽法尼婭·塞繆羅夫娜時也有同感，她又叫杜西婭，是拉斯金三姐妹中唯一健在者，與兒子一起住在伊里奇廣場附近的新式大樓11層。1990年，她和索尼婭被迫搬離自己在西夫切夫―弗拉熱克大街將近60年的家。索尼婭于1991年去世，法尼婭的記憶也日益退化。她97歲時給了我最后一次采訪，當我問起老話題時，她突然又憶起先前遺忘的細節，差點成了永久的秘密。出于這個原因，更由于她的魅力，我學會了珍惜與她相處的每一分鐘。

我非常感謝阿列克謝，讓我無限制地參閱他父親在俄羅斯國家文學藝術檔案館的規模巨大的檔案。我在先前封存的西蒙諾夫個人檔案（第9和第10部分）中獲得大批文件，都是學者們從未看到過的。事實上，其中最敏感的材料，甚至連他家人都不知曉。不幸的是，我的發現激活了家庭成員的痛苦記憶。于是，西蒙諾夫文學遺產委員會的主席卡蒂婭·西蒙諾娃（原來姓氏是格魯津科），2005年10月決定禁絕研究人員參閱這些檔案，直到2025年。

除了西蒙諾夫的檔案，我還采訪了他的同事、朋友、親戚，獲悉這位作家的不少經歷和性格特征。我特別要感謝瑪麗亞·西蒙諾娃、拉扎爾·拉扎列夫、尼娜·阿爾希波娃、阿列克謝和索菲亞·卡拉加諾夫、安德烈·葉羅費耶夫、瑪琳娜·巴巴克等。另外還要感謝尤納·莫里茨、維克托·葉羅費耶夫、維克托林婭·施韋策爾、加林娜·克拉夫琴科、阿列克謝·什馬利諾夫，他們補充了我對西蒙諾夫世界的理解。

2003年的春天，我同時對十幾個家庭開展研究，覺得需要更多人手來系統地擴充我的工作范圍。2003年，我從藝術和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和萊弗爾梅信托公司領到兩筆主要資助，真是雪中送炭。沒有這些英國機構的慷慨支持，便不可能寫完《耳語者》，以及完成與本書相連的廣泛研究，我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這兩筆贈款的支持下，我聘請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爾姆的紀念學會去采訪斯大林時代的幸存者，謄寫和掃描其家庭檔案。選擇這三個紀念學會并不困難，它們先前已有口述歷史的杰出成績，只是工作性質稍有不同。我要做的，是強調個人的內心世界和家庭關系；他們先前所做的，只專注古拉格的歷史。這些學會都擁有眾多活躍的成員，涵蓋各式家庭，包括在斯大林統治下相當成功的。這雖超出了我們的自然選擇范圍（受迫害者的群體），但還是從中選出了我的大多數研究對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優勢是，有文化的人家大都保存有書面文件。彼爾姆的優勢在于，從1941到1945年一直沒受德軍占領，因此，斯大林時代的記憶不會與戰爭創傷混淆起來；此外，該地曾布滿勞改營和“特殊定居地”，居民中有大量前流放者和古拉格前囚犯。

圣彼得堡的團隊由伊琳娜·菲利格率領，她的睿智的洞察力、建議和評判是這個項目的無價之寶。我享受與伊琳娜一起工作，學到很多東西，將永遠欠她的人情。圣彼得堡的團隊還有塔蒂亞娜·科西諾娃，她是個富有同情心的聽眾，像伊琳娜一樣，不知何故總能從采訪中得到高于預期的收獲；還有塔蒂亞娜·莫爾加切娃，她以精湛的技能參與了采訪和檔案的工作。伊琳娜·菲利格和塔蒂亞娜·科西諾娃還曾率隊前往諾里爾斯克。此外，伊爾瑪還單獨訪問了莫斯科、薩拉托夫、彼得羅扎沃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斯塔夫羅波爾，從事采訪、收集材料。

阿廖娜·科茲羅娃以鎮靜的權威帶領莫斯科團隊，總能提供周到、睿智的意見。伊爾瑪·奧斯特羅夫斯卡婭、奧莉加·比金娜、納塔利婭·馬利欣娜和阿廖娜·科茲羅娃，安排采訪時保持著極高的敏感，加麗婭·布韋娜組織檔案則十分高效。我對她們表示深深的感謝。

帶領彼爾姆團隊的是能干、熱情的亞歷山大·卡利赫，外加艾萊娜·斯卡列科娃的協助。進行采訪的分別是羅伯特·拉特波夫、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斯韋特蘭娜·格列比翁希科娃、米哈伊爾·切列帕諾夫。我向他們表示感謝，特別是羅伯特和安德烈，他們做了大部分采訪，總是卓有成效，并寫出很有啟發的評論。

關于本項目的研究方法，需要作出幾項說明。研究小組電話采訪了1000多人，從而建起數據庫，我再從中選出若干家庭。我的主要關注是，確保最終的抽樣來自富有代表性的社會各階層（否則，就會偏向知識分子，特別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同時堅持每個家庭必須有某種檔案，以佐證采訪中的講述。這在彼爾姆變得尤其困難，其居民當中有不少背井離鄉的前“富農”和斯大林政權的其他受害者。我們電話采訪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沒有私人文件（許多人甚至沒有父母的照片）。但那些確有家庭檔案的，很值得深入探討。

在第一次采訪中，盡管我事先備有一份問卷，并請受訪者講述已從數據庫中呈現出來的主題，但他們可以暢談自己的經歷，只受極少的干擾（口述歷史的標準做法）。這些訪談通常持續很久，達幾個小時，分幾天完成。我先分析已整理出來的記錄，再決定后續采訪的主要方向和進一步提問，以深入探討特定的主題。通常，每個家庭會有兩至三次采訪。我與研究小組大約每月開會一次，討論采訪內容，從家庭檔案中選出相關材料來作轉錄和掃描。選擇檔案比較簡單，我們先多多益善——私人文件、日記、回憶錄、筆記本、全部的通信——只要它們寫于1960年之前，或能對斯大林時代提供啟示。另一方面，我們在訪談中遇到許多挑戰，其中的大部分，從事前蘇聯口述歷史的研究人員都很熟悉。我們需要設計特殊方法，讓受訪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直接記憶，避開后來形成的印象和意見，觀察以往時擺脫后來的影響，憶起當時的真實想法，克服對陌生人的恐懼。逐步建立起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要在訪問十幾次之后，他們才會把珍貴的文件交給我們復制（便攜式的掃描儀和數碼相機，可在當事人的家里迅速完成這項工作）。

我由衷地感謝支持本項目的所有家庭，要分別一一向他們表示感謝也是不切實際的（他們的名字都列在采訪名單中），但必須感謝下列人士：安東尼娜·茲納緬卡婭、伊娜·希赫耶娃、馬克斯娜·尼基福羅娃、葉麗薩維塔·德利巴什、安吉麗娜·布舒耶娃、瓦倫蒂娜·季哈諾娃、尼娜·費奧菲拉克托娃、瑪麗亞·維特克維奇、瑪麗安娜·巴爾科夫斯卡婭、格奧爾基·福爾瑟、瑪麗亞·庫茲涅佐娃、葉夫根尼婭·瓦西列娃、尼古拉·科瓦奇、瓦倫丁·穆拉夫斯基、拉達·波洛茲、安熱莉卡·西爾曼、卓婭·季莫菲耶娃、尼古拉·利列耶夫、弗拉基米爾·皮亞特尼茨基、列夫·內托、朱莉婭·沃爾科娃、拉麗莎和維塔利·加爾馬什、瑪婭·羅德克、加林娜·阿達西斯卡婭、羅扎·諾沃塞爾茨娃、維羅尼卡·涅夫斯卡婭、斯韋特蘭娜·赫列斯托娃、維拉·米諾蘇娃、尼古拉·梅沙爾金、埃爾弗拉達·梅沙爾金娜、列昂尼德·薩爾特科夫、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伊琳娜·米庫耶娃、列澤達·泰西娜、柳博芙·捷丘耶娃、維拉·瓦西里佐娃、納塔利婭·斯特凡茨娃、伊萬·烏戈列茨基赫、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塔瑪拉·特魯比娜和維拉·圖爾金娜。他們都向本項目貢獻了寶貴時間和珍貴資料。我要感謝艾萊娜·邦納，她參與紀念項目，在波士頓接受了伊琳娜·菲利格的采訪，又授權容我引用安東尼娜·W. 布易斯翻譯的她的作品《母親與女兒》（倫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2年）。

這些人都是《耳語者》的英雄。本書在真正意義上是他們的書，我只提供了發言機會。對我們來說，這些只是故事，對他們來說，是他們的人生。

在寫作本書的每一階段，我都強烈地意識到，作為歷史學家，我有責任如實轉述這些人的故事，并要得到當事人的認可。本書中幾乎沒有匿名者，除了一兩個例外，所有接受采訪、提供文件的人士，都同意公開自己的姓名。出于這個原因，后期的部分書稿先行譯成俄文，發給有關家庭，讓當事人作出必要的修正和建議，這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過程——因為每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傳記，往往迥異于他人閱讀回憶錄、書信、日記、談話記錄所得出的印象——重要的是，本書當事人應該有機會作出糾正。尚無一件案例，我必須被迫改變自己的整體闡釋。很多時候，我的見解因當事人的參與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和盡善盡美。只有一個家庭發生了麻煩，即希赫耶夫家（蓋斯特家）：有些家庭成員對伊娜的大女兒所說的內容不以為然，我在最后的版本中予以刪除。伊娜閱讀并糾正了所有剩下的蓋斯特資料，但后來又封存了她在紀念學會的檔案。我還要感謝：將本書一部分譯成俄文的然娜·博格達諾維奇和納塔利婭·列什琴科；校閱最后定稿的伊琳娜·菲利格、阿廖娜·科茲羅娃、伊琳娜·奧斯特羅夫斯卡婭；在斯拉溫資料一事上提供慷慨協助的列奧·維帕林斯基；校正拉斯金和西蒙諾夫的英文資料的阿列克謝·西蒙諾夫，此外，他還讓我懂得，有必要再三思索“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維奇”光碟視頻中的撲朔迷離。

《耳語者》的研究項目，所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可在網絡中找到（www.orlandofiges.com）。你會在那里發現主要家庭檔案的筆錄，以及采訪錄音的片斷，部分材料已譯成英文。如果沒有這個網站，許多檔案會因當事人的去世而銷聲匿跡，因為那些身在俄羅斯的年輕一代，對蘇維埃的過去興趣索然，而且沒有太多存儲空間來保存這些檔案。我要感謝艾瑪·畢阿、艾別克·巴拉托夫、張鼎（Ding Zhang），他們幫助設計、架構了這個網站。艾瑪在杰里·庫厄伊的支持下，試圖燃起對視頻項目的興趣，其目的是想為《耳語者》人物的采訪錄像創建一個影像檔案，讓大家在網站上瀏覽。

這個項目涉及漫長的差旅，好幾個月遠離家人，史蒂芬妮、利季婭、愛麗絲為此忍受了諸多的不便。我希望，她們現在可看到這是值得的。通過她們的愛和支持，我更加體會到家庭的真諦。

我要感謝朋友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在莫斯科的慷慨款待和阿列克謝·尤拉索夫斯基的善解人意。我還要感謝艾萊娜（海倫）·沃爾孔斯卡婭的邀請，讓我在她意大利托斯卡納的美好的家中潛心鉆研。2006年，本書第二稿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作為作家，我獲得了鼎力支持。我的代理人德博拉·羅杰斯厚道且充滿激情，一直在努力幫我；美國的梅拉妮·杰克遜也樂于助人；企鵝出版社的西蒙·文德和大都會出版社的薩拉·貝爾施泰爾，是任何作家夢寐以求的編輯團隊，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大影響了本書——西蒙以熱烈的評論和鼓勵在旁打氣，薩拉以非凡的熱情和細心逐字逐句地編輯書稿，我對他們兩位都感激不盡。我要感謝擔任校對編輯的大衛·沃森、復查俄文名字音譯的梅爾·里德、繪制平面圖的艾倫·吉利蘭、提供額外編輯支持的唐納德·溫徹斯特。我很感謝俄通社―塔斯社圖片組的安德烈·博布羅夫，幫我找到了一些很難覓得的照片。

我要感謝那些指點和提醒我的學者：瓦萊里·戈洛法斯特、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斯蒂芬·惠特克羅夫特、卡特里奧娜·凱利、鮑里斯·科龍涅茨基、喬納森·哈斯拉姆、丹尼爾·畢阿和丹尼爾·皮克。我還虧欠羅伯·佩克斯，他在應對口述歷史的挑戰上，與我分享了他的心得體會。詹妮弗·戴維斯在處理我和紀念學會的合同上向我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咨詢，在此深深致謝。拉賈·旃達瓦卡以難以歷數的方式給了我忠心的支持和幫助。我真希望他還活著，可與我討論本書。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黒宮広昭（Hiroaki Kuromiya）。他是研究斯大林時代的最好、最認真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幫助審讀了我的手稿，以嚴苛的要求剔出了書中任何可能的缺陷。如還存有任何錯誤，那都是我的責任。

倫敦

2007年4月

# [注釋]

導言

[(1)](#_1) .MSP, f. 3, op. 14, d. 2, l. 31; d. 3, ll. 18–19.

[(2)](#_2) .我的估計基于 M.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7（November 2002）, pp. 1151–72。 從1934年到1953年，Ellman提供的古拉格判刑案例是1875萬。不過在這段時期，許多古拉格囚犯的判刑不止一次。他還提供了同期的其他數據：至少有100萬人遭到處決；200萬人征入從屬于古拉格系統的勞動大軍和其他強制勞役；500萬少數民族被逐出家園。根據最可靠的估計，1928年后受迫害的“富農”約有1000萬人。所以，加在一起的總數約是3650萬，減去重復的古拉格判刑，所剩下的2500萬應該是合理的，這個數字很可能低于實際情況。

[(3)](#_3) .Interview with Elena Dombrovskaia, Moscow, January 2003.

[(4)](#_4) .MP, f. 4, op. 25, d. 2, ll. 9–10.

[(5)](#_5) .M. Gefter, ,V predchuvstvii proshlogo, , Vek XX i mir, 1990, no. 9, p. 29.

[(6)](#_6) .See e.g. V. Kaverin, Epilog: Memuary（Moscow, 1989）;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7)](#_7) .有關文獻相當豐富，例如：A.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New York, 1945）; V.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London, 1947）; A. Gorbatov, Years off My Life（London, 1964）; 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same author, Hope Abandoned（London, 1990）; 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67）; same author, Within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81）; L. Bogoraz, ,Iz vospominanii, , Minuvshee, vol. 2（Paris, 1986）; L. Kopelev, No Jail for Thought（London, 1979）; same author, The Education of a True Believer（London, 1980）; T. Aksakova-Sivers, Semeinaia khronika, 2 vols.（Paris, 1988）; Mikhail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8)](#_8) .A. Krylova, ,The Tenacious Liberal Subject in Soviet Studies,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1, no. 1（Winter 2000）, pp. 119–46.

[(9)](#_9) .有關文獻也相當豐富，其中頗有價值的有：O. Adamova-Sliuzberg, Put,（Moscow, 1993）; A. Raikin,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3）; I. Diakonov, Kniga vospominanii（St Petersburg, 1995）; Iu. Liuba,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8）;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1925–53 gg.）（Moscow, 1998）; I. Dudareva, Proshloe vsegda s nami: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 1998）; E. Evangulova, Krestnyi put,（St Petersburg, 2000）; K. Atarova, Vcherashnyi den,: vokrug sem, i Atarovykh-Dal, tsevykh: vospominaniia（Moscow, 2001）; L. El, iashova, My ukhodim, my ostaemsia. Kniga 1: Dedy, ottsy（St Petersburg, 2001）; N. Iudkovskii, Rekviem dvum semeistvam: vospominaniia（Moscow, 2002）; E. Vlasova, Domashnyi al, bom: vospominaniia（Moscow, 2002）; P. Kodzaev, Vospominaniia reabilitirovannogo spetspereselentsa（Vladikavkaz, 2002）; E. Liusin, Pis, mo-vospominaniia o prozhitykh godakh（Kaluga, 2002）; A. Bovin, XXvek kak zhizn, : vospominaniia（Moscow, 2003）. See also: I. Paperno, ,Personal Accounts of the Soviet Experience,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3, no. 4（Autumn 2002）, pp. 577–610。

[(10)](#_10) .See e.g. S.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New York, 1994）;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S.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 1997）.

[(11)](#_11) .See e.g., N. Kosterina, Dnevnik（Moscow, 1964）; O. Berggol, ts, ,Bezumstvo predannosti: iz dnevnikov Ol, gi Berggol, ts, , Vremia i my, 1980, no. 57, pp. 270–85; A. 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1953 gg.（Kishinev, 1987）; M. Prishvin, Dnevniki（Moscow, 1990）; E. Bulgakova, Dnevnik Eleny Bulgakovoi（Moscow, 1990）; N. Vishniakova, Dnevnik Niny Vishniakovoi（Sverdlovsk, 1990）.

[(12)](#_12) .See e.g. V. Vernadskii, ,Dnevnik 1938 goda, , Druzhba narodov, 1992, no. 2, pp. 219–39; no. 3, pp. 241–69; same author, ,Dnevnik 1939 goda, , Druzhba narodov, 1993, nos. 11/12, pp. 3–41; A. Solov, ev, Tetradi krasnogo professora（1912–1941 gg.）, Neizvestnaia Rossiia. XX vek, vol. 4（Moscow, 1993）, pp. 140–228; , ,,Ischez chelovek i net ego, kuda devalsia – nikto ne znaet,, : iz konfiskovannogo dnevnika,, Istochnik, 1993, no. 4, pp. 46–62; Golgofa. Po materialam arkhivno-sledstvennogo dela no. 603 na Sokolovu-Piatnitskuiu Iu. I., ed. V. I. Piatnitskii（St Petersburg, 1993）; A. Afinogenov, ,Dnevnik 1937 goda, , Sovremennaia dramaturgiia, 1993, no. 1, pp. 219–33; no. 2, pp. 223–41; no. 3, pp. 217–39; K. Chukovskii, Dnevnik 1930–1969（Moscow, 1994）; M. Prishvin, , ,,Zhizn,　stala veselei . . .,, : iz dnevnika 1936 goda, , Oktiabr, , 1993, no. 10, pp. 3–21; same author,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4, no. 11, pp. 144–71; 1995, no. 9, pp. 155–71; M. Prishvin and V. Prishvin, My s toboi: dnevnik liubvi（Moscow, 1996）; A. Kopenin, ,Zapiski nesumashedshego: iz dnevnika sel, skogo uchitelia, , Rodina, 1996, no. 2, pp. 17–29; Dnevnye zapiski ust, -kulomskogo krest, ianina I. S. Rassukhaeva（1902–1953）（Moscow, 1997）; M. Krotova, Bavykinskii dnevnik: vospominaniia shkol, nogo pedagoga（Moscow, 1998）; A. Tsember, Dnevnik（Moscow, 1997）; V. Sitnikov, Perezhitoe: dnevnik saratovskogo obyvatelia 1918–1931 gg.（Moscow, 1999）; E. Filipovich, Ot sovetskoi pionerki do cheloveka-pensionerki: moi dnevniki（Podol, sk, 2000）; 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Iu. Nagibin, Dnevnik（Moscow, 2001）; N. Lugovskaya, I Want to Live: The Diary of a Soviet Schoolgirl 1932–1937（Moscow, 2003）; M. Shirshova, Zabytyi dnevnik poliarnogo biologa（Moscow, 2003）. Extracts from ten diaries were published in translation in V. Garros, N. Korenevskaya and T. Lahusen（eds.）, Intimacy and Terror: Soviet Diaries of the 1930s（New York, 1995）.

[(13)](#_13) .歷史學家赫爾貝克（Jochen Hellbeck）率先投入對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日記的研究，特別是關于Stepan Podlubny的，載于赫爾貝克所編的Tagebuch aus Moskau, 1931–1939（Munich, 1996）。另可參見赫爾貝克對20世紀30年代4本蘇維埃日記的討論，載于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 Mass., 2006）。赫爾貝克富有爭議的見解是，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公民的思維全部遵照蘇維埃的模式，沒有替代的概念，并在日記中嘗試清除所有非蘇維埃的個性元素（所謂的“自身危機”），以蛻變成蘇維埃新人。另可參見：J. Hellbeck, ,Self-Realization in the Stalinist System: Two Soviet Diaries of the 1930s, , in M. Hildermeier（ed.）, Stalinismus vor dem Zweiten Weltkrieg: neue Wege der Forschung（Munich, 1998）, pp. 275–90. 赫爾貝克的觀點受到了其他學者的嚴厲批評，特別是A. Etkind的,Soviet Subjectivity: Torture for the Sake of Salvation？,[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6, no. 1（Winter 2005）, pp. 171–86]，以及S. Boym的,Analiz praktiki sub, ektivizatsii v rannestalinskom obshchestve, [Ab Imperio, 2002, no. 3, pp. 209–418]。

[(14)](#_14) .See e.g. J. Hellbeck, ,Fashioning the Stalinist Soul: The Diary of Stepan Podlubnyi（1931–1939）,,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 344–73; I. Halfin and J. Hellbeck, ,Rethinking the Stalinist Subject: Stephen Kotkin, s ,,Magnetic Mountain,, and the State of Soviet Historical Studies,,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 456–63; I. Halfin, Terror in My Soul: Communist Autobiographies on Trial（Cambridge, Mass., 2003）; C. Kaier and E. Naiman（eds.）, 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Bloomington, 2006）.

[(15)](#_15) .這是赫爾貝克的主要觀點（參見他的上述著作）。

[(16)](#_16) .MP, f. 4, op. 18, d. 2, ll. 49–50.

[(17)](#_17) .特別參見Catherine Merridale的兩本書：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和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這兩本書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采訪得來的資料。

[(18)](#_18) .See e.g. Golos krest, ian: Sel, skaia Rossiia XX veka v krest, ianskikh memuarakh（Moscow, 1996）; Sud, 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 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D. Bertaux, P. Thompson and A. 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V. Skultans, The Testimony of Lives: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Post-Soviet Latvia（London, 1998）; A. 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Many books have drawn from interviews, among them notably: 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19)](#_19) .第一次重要的口述歷史是針對蘇維埃社會制度的哈佛項目（從1950到1951年，分別在歐洲和美國采訪了329名蘇維埃難民）。大多數受訪者在1943到1946年之間離開蘇聯，有了在西方生活的經歷，其見解是自覺反蘇的，遂不能代表全體蘇維埃人。然而，該項目出版了好幾本社會學著作，深深影響了冷戰時期西方對蘇維埃社會的認識，分別是：R. Bauer, A. Inkeles和C. Klukhohn合著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mes（Cambridge, Mass., 1957），J. Berliner的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Cambridge, Mass., 1958），M. Field的Doctor and Patient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 Mass., 1958），以及A. Inkeles和R. Bauer合著的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特別是最后一本，專論“蘇聯社會如何影響個人，個人又如何適應蘇維埃生活的日常規范”（第3頁）。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了兩組人士，專以社會學方法從事口述歷史的研究。第一組是Daniel Bertaux和Paul Thompson，其研究成果發表于Sud, ba liudei 和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第二組是莫斯科社會和經濟學院，其研究成果見于Golos krest,ian。此外，紀念學會（http://www.memo.ru）率先投入了古拉格口述歷史研究。當然，無可置疑的是，第一部偉大的口述歷史著作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共3卷（倫敦，1974-1978年），其內容主要依據對勞改營幸存者的采訪。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20)](#_20) .RGALI, f. 3084, op. 1, d. 1389, l. 17; f. 2804, op. 1, d. 45.

[(21)](#_21) .E. Drabkina, Chernye sukhari（Moscow, 1975）, pp. 82–3.

[(22)](#_22) .S.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 2003）, p. 61.

[(23)](#_23) .RGALI, f. 2804, op. 1, d. 22, l. 4; f. 3084, op. 1, d. 1389, l. 3; Drabkina, Chernye sukhari, pp. 23–9; N. Burenin, Pamiatnye gody: vospominaniia（Leningrad, 1961）, pp. 150–51.

[(24)](#_24) .Partiinaia etika: dokumenty i materialy diskussii dvadtsatykh godov（Moscow, 1989）, p. 16; M. Gorky, Untimely Thoughts: Essays on Revolution, Culture and the Bolsheviks, 1917–18（London, 1970）, p. 7.

[(25)](#_25) .Cited in E. Naiman, Sex in Public: The Incarnation of Early Soviet Ideology（Princeton, 1997）, pp. 91–2.

[(26)](#_26) .RGALI, f. 2804, op. 1, dd. 22, 40, 1389; V. Erashov, Kak molniia v nochi（Moscow, 1988）, p. 344.

[(27)](#_27) .O. Figes, A People, 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London, 1996）, pp. 752–68.

[(28)](#_28) .I. Stalin, Sochineniia, 13 vols.（Moscow, 1946–55）, vol. 6, p. 248.

[(29)](#_29) .K.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 Mass., 1968）, p. 61.

[(30)](#_30) .L. Kirschenbaum,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New York, 2001）, p. 48.

[(31)](#_31) .O. Maitich, ,Utopia in Daily Life, , in J. Bowlt and O. Maitich（eds.）, Laboratory of Dreams: 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al Experiment（Stanford, 1996）, pp. 65–6;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p. 65–8.

[(32)](#_32) .W. Goldman, Wome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Cambridge, 1993）, p. 107; N. 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sovetskogo goroda: normy i anomalii, 1920–1930 gody（St Petersburg, 1999）, p. 272.

[(33)](#_33) .I. Halfin, ,Intimacy in an Ideological Key: The Communist Case of the 1920s and 1930s, , in same author（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Making Modern Political Identities（London, 2002）, pp. 187–8.

[(34)](#_34) .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Creat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New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London, 1973）, p. 72; 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p. 205.

[(35)](#_35)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p. 48.

[(36)](#_36) .MSP, f. 3, op. 16, d. 2, ll. 2, 7, 46–62.

[(37)](#_37) .See O. Figes, Natasha, 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London, 2002）, pp. 119–30.

[(38)](#_38) .MSP, f. 3, op. 18, d. 2, ll. 24, 26.

[(39)](#_39) .MSP, f. 3, op. 12, d. 2, l. 15.

[(40)](#_40) .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p. 40, 46, 61–2, 101.

[(41)](#_41)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 p. 131.

[(42)](#_42) .V. Maiakov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13 vols.（Moscow, 1955–61）, vol. 2, pp. 74–5.

[(43)](#_43) .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Durham, 1990）, p. 64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44)](#_44) .W. Rosenberg（ed.）, Bolshevik Visions: First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2 vols.（Ann Arbor, 1990）, vol. 1, p. 37（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45)](#_45) .MM, f. 1, op. 1, dd. 167, 169; f. 12, op. 27, d. 2, ll. 47–54.

[(46)](#_46) .MSP, f. 3, op. 47, d. 2, ll. 32–3, 59–64; d. 3, ll. 1–6; L. El, iashova, My ukhodim, my ostaemsia. Kniga 1: Dedy, ottsy（St Petersburg, 2001）, pp. 191–4.

[(47)](#_47) .OR RNB, f. 1156, d. 597, ll. 3, 14; IISH, Vojtinskij, No. 11（Box 3, file 5/b）; VO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 interview with Ada Levid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4.

[(48)](#_48) .OR RNB, f. 1156, d. 576, ll. 4, 12–19; d. 577, l. 1; d. 597, l. 51; VOFA, A. Levidova, ,Vospominaniia, , ms., p. 12.

[(49)](#_49) .V. Zenzinov, Deserted: The Story of the Children Abandoned in Soviet Russia（London, 1931）, p. 27.

[(50)](#_50) .A. Lunacharskii, O narodnom obrazovanii（Moscow, 1948）, p. 445.

[(51)](#_51) .E. M. Balashov, Shkola v rossiiskom obshchestve 1917–1927 gg. Stanovlenie ,novogo cheloveka, （St Petersburg, 2003）, p. 33; J. Ceton, School en kind in Sowjet-Rusland（Amsterdam, 1921）, p. 3. 關于幼兒園的工作和游戲，參見：L. Kirschenbaum,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32（New York, 2001）, pp. 120–23。

[(52)](#_52) .MP, f. 4, op. 18, d. 2, ll. 1–2; RGAE, f. 9455, op. 2, d. 154; L. Holmes, ,Part of History: The Oral Record and Moscow, s Model School No. 25, 1931–1937, , Slavic Review, 56（Summer 1997）, pp. 281–3; S.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Cambridge, 1979）, p. 27;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6.

[(53)](#_53) .RGAE, f. 9455, op. 2, d. 30, ll. 241–56; d. 51, ll. 113–14; d. 154, ll. 47–8.

[(54)](#_54) .RGAE, f. 9455, op. 2, d. 154, l. 397; d. 155, ll. 5, 8, 9, 15; d. 156, ll. 11–12, 171; d.157, ll. 98–103.

[(55)](#_55) .R. Berg, Sukhovei: vospominaniia genetika（Moscow, 2003）, p. 29.

[(56)](#_56) .A. 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1953 gg.（Kishinev, 1987）, p. 17; E. Liusin, Pis, mo – vospominaniia o prozhitykh godakh（Kaluga, 2002）, pp. 18–19. See further C. Kelly, ,Byt,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 in S. Franklin and E. Widdis（eds.）,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Cambridge, 2004）, pp. 157–67.

[(57)](#_57) .Balashov, Shkola v rossiiskom obshchestve, p. 137.

[(58)](#_58) .MSP, f. 3, op. 37, d. 2, ll. 8–9; op. 14, d. 3, ll. 24–6; MP, f. 4, op. 24, d. 2, ll. 41–2; op. 3, d. 2, l. 24; 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 89.

[(59)](#_59) .MSP, f. 3, op. 8, d. 2, ll. 1, 7; MP, f. 4, op. 9, d. 2, ll. 11–12.

[(60)](#_60) .C. Kelly, ,Shaping the ,,Future Race,, : Regulating the Daily Life of Children in Early Soviet Russia, , in C. Kaier and E. Naiman（eds.）, Everyday Life in Early Soviet Russia: Taking the Revolution Inside（Bloomington, 2006）, p. 262; Rosenberg, Bolshevik Visions, vol. 2, p. 86; MP, f. 4, op. 24, d. 2, l. 43.

[(61)](#_61) .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62)](#_62)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63)](#_63) .MSP, f. 3, op. 17, d. 2, l. 8.

[(64)](#_64) .P.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Cambridge, 1985）, pp. 168–9.

[(65)](#_65) .N. Vishniakova, Dnevnik Niny Vishniakovy（Sverdlovsk, 1990）, pp. 28–9.

[(66)](#_66) .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pp. 22–3.

[(67)](#_67) .V. Pirozhkova, Poteriannoe pokolenie（St Petersburg, 1998）, pp. 46–7.

[(68)](#_68) .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D. Hoffma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talinist Modernity（Cornell, 2003）, pp. 121–2.

[(69)](#_69) .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56, 68, 71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70)](#_70) .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 p. 274.

[(71)](#_71)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pp. 94–6, 161–2.

[(72)](#_72) .Stalin, Sochineniia, vol. 6, p. 46; Partiinaia etika, p. 287.

[(73)](#_73) .M. Rubinshtein, Sotsial, no-pravovye predstavleniia i samoupravleniia u detei（Moscow, 1925）, pp. 69–70.

[(74)](#_74) .Partiinaia etika, p. 329.

[(75)](#_75) .O. Kha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Berkeley, 1999）, pp. 35–74, 212–28. 同理，“無產階級覺悟”也需要證據，即在思想上對黨的事業的承諾。光是出身于無產階級還是不夠的，因為很多工人階級出身的人，養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心態。

[(76)](#_76) .L.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 1970）, p. 385.,

[(77)](#_77) .See further I. Halfi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Student Communist Autobiography DuringNEP,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5（1997）, pp. 210–36; same author, Terror in My Soul: Communist Autobiographies on Trial（Cambridge, Mass., 2003）.

[(78)](#_78) .Kha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pp. 123–5.

[(79)](#_79) .V.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A Study of Denunications and Their Bureaucratic Handling from Soviet Police Archives, 1944–195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Decem, ber 1996）, p. 867; 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 4（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p. 13.

[(80)](#_80) .XIV sezd VKP(b）: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Moscow, 1926）, p. 600.

[(81)](#_81) .Ibid., p. 615.

[(82)](#_82)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148.

[(83)](#_83) .Partiinaia etika, p. 329.

[(84)](#_84) .Interview with Elena Dombrovskaia, Moscow, January 2003.

[(85)](#_85) .MSP, f. 3, op. 48, d. 2, ll. 1, 23, 32–4.

[(86)](#_86) .MSP, f. 3, op. 42, d. 2, ll. 5–6.

[(87)](#_87) .MP, f. 4, op. 9, d. 1, ll. 4–8; d. 2, l. 13.

[(88)](#_88) .MP, f. 4, op. 12, d. 2, l. 7.

[(89)](#_89)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17., , , ,

[(90)](#_90) .V. Semenova, ,Babushki: semeinye i ,s otsialnye funktsii praroditelskogo pokoleniia, in Sud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pp. 326–54.

[(91)](#_91)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14, 15, 16, 27, 40, 78, 145;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

[(92)](#_92) .GFA, O.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mam, ms., p. 20;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November 2004.

[(93)](#_93)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Fomin,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3.,

[(94)](#_94)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Yevangulova, St Petersburg, March 2004; E. P. Evangulova, Krestnyi put（St Petersburg, 2000）, pp. 7–9, 36; RGAE, f. 5208, op. 1, d. 28.

[(95)](#_95) .Interview with Boris Gavrilov, St Pet,e rsburg, Ju,n e 2003.,

[(96)](#_96) .,Obydennyi NEP（Sochineniia i pisma shkolnikov 20-x godov）, in Neizvestnaia Rossia xx vek, vol.3（Moscow, 1993）, pp. 285–7; HP,, ,5 9 A, vol. 5, ,p, . 25; Inkeles and Bauer, The Soviet ,C itizen, p. 216. See similarly, S. Tchouikina, ,The ,,Old and ,,New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oviet State, in T. Vihavainen（ed.）, The Soviet Union – A Popular State？（St Petersburg, 2003）, pp. 99–100.

[(97)](#_97) .Inkeles and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p. 223; MSP, f. 3, op. 52, d. 2, l. 19.

[(98)](#_98) .E. Olitskaia, Moi vospominaniia, 2 vols.（Frankurt, 1971）, vol. 2, p. 56; MP, f. 4, op. 8, d. 2, l. 6. See also, MM, f. 12, op. 31, d. 2, ll. 1–2; MS,P , f. 3, op. 53, d. 2, ll. 11–12; f. 3, op. 8, d. 2, ll. 1–7.

[(99)](#_99) .Partiinaia etika, p. 437; Liusin, Pismo, p. 11; MP, f. 4, op. 32, d. 4, l. 7.

[(100)](#_100)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41, 138–9, 200–202.

[(101)](#_101) .MSP, f. 3, op. 16, d. 2, ll. 3–4, 7.

[(102)](#_102) .MSP, f. 3, op. 37, d. 2, ll. 13–15;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5–6.,

[(103)](#_103) .V. Danilov, Sovetskaia dokolkhoznaia derevnia: naselenie, zemlepolzovanie, khoziaistvo（Moscow, 1977）, p. 31.

[(104)](#_104) .MSP, f. 3, op. 14, d. 3, ll. 34–5.

[(105)](#_105) .與農民革命相關內容，參見：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Oxford, 1989）。

[(106)](#_106) .MSP, f. 3, op. 14, d. 3, ll. 8, 104; G. Dobronozhenko, Kollektivizatsiia na Severe, 1929–1932（Syktyvkar, 1994）, pp. 27–8.

[(107)](#_107) .MSP, f. 3, op. 14, d. 3, ll. 7–8.

[(108)](#_108) .MSP, f. 3, op. 14, d. 2, ll. 18, 69.

[(109)](#_109) .MSP, f. 3, op. 2, d. 2, ll. 20, 43–5.,

[(110)](#_110) .VFA, E. Vittenburg, ,Pamiati P. V. Vittenburga, ms., p. 4; 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September 2004; E. Vittenburg, Vremia poliarnykh stran（St Petersburg, 2002）, pp. 44–74.

[(111)](#_111) .RGALI, f. 1814, op. 9, d. 351, l. 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112)](#_112) .RGALI, f. 1814, op. 9, d. 2613, ll. 7, 13;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65. Family legend has it that Aleksandra blamed Mikhail for the miscarriage of a baby daughter and decided to leave him（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ne 2003）.

[(113)](#_113) .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op. 9, d. 2613, ll. 3, 13.

[(114)](#_114) .RGALI, f. 1814, op. 9, d. 2698, l. 1.

[(115)](#_115) .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1.

[(116)](#_116) .RGALI, f. 1814, op. 9, d. 353, l. 38; d. 337, l. 7.

[(117)](#_117)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11; op. 9, d. 1534, l. 31.

[(118)](#_118) .RGALI, f. 1814, op. 6, d. 70, l. 103; d. 170, l. 17; op. 9, d. 2613, l. 13; dd. 23, 24.

[(119)](#_119) .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l. 18; d. 24, l. 16; d. 25, ll. 6, 17, 26; d. 1010, ll. 9–10;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 66.

[(120)](#_120)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25–6.

[(121)](#_121) .RGALI, f. 1814, op. 9, d. 25, l. 12; d. 1010, ll. 16–19; op. 10, d. 339, l. 11.

[(122)](#_122)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2.

[(123)](#_123) .SLFA, ,Lichnyi listok po uchety kadrov, （Samuil Laskin）;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March 2005.

[(124)](#_124) .A. Ball, Russia, s Last Capitalists: The NEPmen 1921–1929（Berkeley, 1987）, p. 39.

[(125)](#_125)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November 2003, February, July 2004;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p. 20, 21, 29.

[(126)](#_126) .Y.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Berkeley, 2005）, p. 217;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7 g. Kratkie itogi（Moscow, 1991）, p. 90.

[(127)](#_127) .A. 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pp. 35–43; J. Veidlinger, The Moscow State Yiddish Theatre: Jewish Culture on the Soviet Stage（Bloomington, 2000）.

[(128)](#_128)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p. 19.

[(129)](#_129) .Interview with Rebekka（Rita） Kogan, St Petersburg, May 2003.

[(130)](#_130) .I. Slavin, Protsess v Novikakh（Vitebsk, 1920）.

[(131)](#_131)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1;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October 2003.

[(132)](#_132)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March 2005.

[(133)](#_133) .A. 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 1945）, pp. 124–5; H. Kuromiya, Stalin, 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Workers, 1928–1932（Cambridge, 1988）, p. 110; RGAE, f. 9455, op. 2, d. 157, l. 183.

[(134)](#_134) .V. Danilov, ,Vvedenie: sovetskaia derevnia v gody ,,Bol, shogo terrora,,　, , in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v 5 tomakh 1927–1939, 5vols.（Moscow,1999–2004）, vol.5:1937–1939, Part1,1937,p.9;A. Meyer, ,The War Scare of 1927, , Soviet Union/Union Soviétique, vol. 5, no. 1（1978）, pp. 1–25; S. Fitzpatrick, ,The Foreign Threat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 Soviet Union/Union Soviétique, vol. 5, no. 1（1978）, pp. 26–35; Stalin, Sochineniia, vol. 11, pp. 170–72.

[(135)](#Xiang_Si_Shang_Fa_Qi_De_Jin_Gong) .R. Dav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Russia 3: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1930（London, 1989）, p. 76; Ball, Russia, s Last Capitalists, pp. 76–7.

[(136)](#Qia_Hao_Zai_Zhe_Chang_Jie_Ji_Dou) .SLFA, ,Lichnyi listok po uchety kadrov, （Samuil Laskin）;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March 2005.

[(137)](#_137) .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551.

第二章 大轉變（1928—1932）

[(138)](#_138) .MSP, f.3, op.14, d.2, l.38; d.3, l.10.

[(139)](#_139) .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140)](#_140) .MSP, f.3, op.14, d.2, ll.102–4.

[(141)](#_141) .MSP, f.3, op.14, d.2, l.93.

[(142)](#_142) .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2, l.69; d.3, ll.7–8.

[(143)](#_143) .GAVO, f.407, op.1, d.98, l.7.

[(144)](#_144) .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3, l.9.

[(145)](#_145) .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146)](#_146) .MSP, f.3, op.14, d.3, l.11.

[(147)](#_147)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Dokumenty i materialy , 5 vols.（Moscow,1999–2004）, vol.1, pp.36, 148–50, 228–30, 742; Izvestiia TsK KPSS , 1991,

[(148)](#_148) .Cited in M.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London, 1968）, p.257.

[(149)](#_149) .R.Davies,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30（London, 1989）, pp.198–9; Pravda , 1 September,10 November, 1929.

[(150)](#_150) .Pravda , 7November1929; I.Stalin, Sochineniia , 13vols.(Moscow,1946–55）, vol.12, p.174.

[(151)](#_151) .R.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1929–1930 （London,1980）, p.111;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1, pp.702–10, 716–27; M.Hindus,

[(152)](#_152) .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218; V.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New York, 1946）, p.91.

[(153)](#_153) .M.Vareikis, ,O partiinom rukovodstve kolkhozam, , Na agrarnom fronte , 1929, no.8, p.65; Izvestiia , 19 April 1930; GARK, f.3, op.1, d.2309, l.6.

[(154)](#_154) .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198.

[(155)](#_155) .M.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Cambridge, Mass., 1958）, p.250.

[(156)](#_156) .R.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London, 1986）,pp.120–21; S.Fitzpatrick, Stalin , 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

[(157)](#_157) .GAVO, f.22, op.1, d.37, l.41; GARK, f.136, op.1, d.121, l.153; MSP, f.3, op.14, d.3, l.75;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p.66–8.

[(158)](#_158) .MP, f.4, op.18, d.2, l.44.

[(159)](#_159)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137;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15;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 p.508.

[(160)](#_160) .MP, f.4, op.18, d.5, l.15.

[(161)](#_161) .MP, f.4, op.7, d.2, l.39.

[(162)](#_162) .MP, f.4, op.5, d.2, l.30.

[(163)](#_163) .VFA, ,Vospominaniia, , ms., p.8; Komsomol, skaia pravda , 8 September 1989, p.2.

[(164)](#_164) .LFA, ,Roditeli, , p.24.

[(165)](#_165) .A.Zverev, Zapiski ministra （Moscow, 1973）, p.54.

[(166)](#_166) .L.Kopelev, The Education of a True Believer （London, 1981）, p.235.

[(167)](#_167)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1, pp.8–9; R.Davies and S.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London, 2004）, p.451.

[(168)](#_168) .Davies, The Socialist Offensive , pp.442–3;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 pp.8–9;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 pp.31, 37; Politbiuro i krest, ianstvo: vysylk

[(169)](#_169) .AFSBV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N.A.Golovina; MSP, f.3, op.14, d.2, ll.82–101, 122–3; d.3, ll.11,56–8.

[(170)](#_170) .Hindus, Red Bread , p.142.

[(171)](#_171) .E.Foteeva, ,Coping with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Well-to-do Russian Families, , in D.Bertaux, P.Thompson and A.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172)](#_172) .Interviews with Olga Ramenskaia（neée Zapregaeva） and Galina Petrova, Strugi Krasnye（Pskov oblast）, August 2003.

[(173)](#_173) .RGAE, f.7486, op.37, d.101, ll.61–2; M.Tauger, ,The 1932 Harvest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33, ,Slavic Review , vol.50, no.1（Spring 1991）;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174)](#_174) .For the link between the famin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ssport system, in December 1932, see RGASPI, f.81, op.3, d.93, ll.24–5; f.558, op.11, d.45, l.109.

[(175)](#_175)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 p.80;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237.

[(176)](#_176) .G.Kessler, ,The Passport System and State Control over Population Flows in the Soviet Union,1932–1940,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 vol.42, nos.2–4（2001）, pp.477–504; D.Shearer, ,

[(177)](#_177)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 vol.3,p.63; A.Applebaum, Gulag: AHistory of the SovietCamps（London,2003）, p.333; GARF, f.5207, op.3, d.49, l.190; f.8131, op.37, d.137, l.4.

[(178)](#_178) .L.Viola, ,Tear the Evil From the Root: The Children of Spetspereselentsy of the North, , in N.Baschmakoff and P.Fryer（eds.）, Moder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rovinces, special issue o

[(179)](#_179) .MSP, f.3, op.14, d.2, ll.25–6; d.3, ll.12–18, 125.

[(180)](#_180) .MP, f.4, op.18, d.2; d.5, ll.16–17.

[(181)](#_181) .MP, f.4, op.5, d.2, ll.37, 38.

[(182)](#_182) .Politbiuro i krest, ianstvo, pp.467–553; Viola, The Unknown Gulag , p.232.

[(183)](#_183) .MP, f.4, op.9, d.5, ll.2–7.

[(184)](#_184) .AMILO, M.A.Solomonik, ,Zapiski raskulachennoi, , ts., pp.7–34.

[(185)](#_185) .Pravda , 7 November 1929.

[(186)](#_186) .AFA, A.M.Alekseyev, ,Vospominaniia, , p.18.

[(187)](#_187) .See e.g.GARF, f.9414, op.1, d.368, l.115.另可參考曾于1954—1957年擔任諾里爾斯克采礦綜合企業主管的Aleksei Loginov的事后評論，見于：A.Macqueen, ,Survivors, , Granta , 64（Winter 1998）

[(188)](#_188) .關于古拉格制度的經典政治解釋，參見：R.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London,1992）, 以及同一作者的Kolyma: The Arctic Death Camps（New York, 1978）。強調經濟解釋的則有：M

[(189)](#_189) .Sistema ispravitel, no-trudovykh lagerei v SSSR, 1923–1960.Spravochnik （Moscow, 1998）, p.395;Applebaum, Gulag, pp.31–40.

[(190)](#_190) .GARF, f.5446, op.11a, d.555, l.32; RGASPI, f.17, op.3, d.746, l.11; Sistema ispravitel, no-trudovykh lagerei v SSSR , p.38.

[(191)](#_191) .GARF, f.9414, op.1, d.2920, l.178; Applebaum, Gulag , pp.62–5; C.Joyce, ,The Gulag in Karelia,1929–41,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 p.166; N.Ba

[(192)](#_192) .MSP, f.3, op.19, d.2, ll.1–4.

[(193)](#_193) .GARF, f.5515, op.33, d.11, ll.39–40; GASO, f.148, op.5, d.26, l.75.

[(194)](#_194) .GARF, f.9414, op.1, d.3048, ll.25–36; V.Shalamov, Vishera: antiroman（Moscow, 1989）, p.23.

[(195)](#_195) .D.Nordlander, ,Magada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alstroi in the 1930s,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 p.110.

[(196)](#_196) .V.Shalamov, Kolyma Tales（London, 1994）, pp.368–9.沙拉莫夫于1937年抵達科雷馬，他所寫的有關別爾津時期的故事，多取材于勞改營中的傳聞。

[(197)](#_197) .MP, f.4, op.10, d.1, ll.1–4, 14–17.

[(198)](#_198) .A.Barmine, One Who Survived: 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 1945）, p.196.

[(199)](#_199) .C.Ward, Stalin, s Russia（London, 1999）, p.56; A.Smith, I Was a Soviet Worker（London, 1937）, p.43.

[(200)](#_200) .Interviews with Lydia Pukhova, St Petersburg, May, October 2004.

[(201)](#_201) .MSP, f.3, op.14, d.2, ll.23–4, 26, 29; d.3, ll.20, 63–70.

[(202)](#_202) .Y.Druzhnikov, Informer 001: 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v（London, 1997）, pp.45–6, 155–6; C.Kelly,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London, 2005）, p.66.

[(203)](#_203) .Druzhnikov, Informer , pp.19–20, 30–31, 42, 114, 152; Kelly, Comrade, pp.13, 94.查閱過秘密警察檔案的Kelly，懷疑莫羅佐夫審判是否真有發生。在她看來，帕夫利克的舉報全是警察和媒體所捏造

[(204)](#_204) .Kelly, Comrade, pp.26–72.

[(205)](#_205) .Druzhnikov, Informer , pp.9–11; Kelly, Comrade, p.14.

[(206)](#_206) .Kelly, Comrade, p.156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207)](#_207) .See ibid., pp.22, 26–9, 169–71.

[(208)](#_208) .M.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89.

[(209)](#_209) .V.Danilov, Sovetskaia dokolkhoznaia derevnia: naselenie, zemlepol , zovanie, khoziaistvo （Moscow,1977）, p.25; P.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

[(210)](#_210) .Interviews with Nina Gribelnaia, St Petersburg, March, June, October 2004; AFSBTO,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F.Z.Medvedeva.

[(211)](#_211)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p.295;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 p.256.

[(212)](#_212) .Vskhody kommuny , 19 December 1932; K.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ss.,1968）, p.308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213)](#_213) .A.Mar, ian, Gody moi, kak soldaty: dnevnik sel, skogo aktivista, 1925–53 （Kishinev, 1987）, pp.55, 71,78–9.

[(214)](#_214) .Cited in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140.

[(215)](#_215) .A.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1923–1939（Bloomington, 2006）, p.61.感謝A.Shternshis向我提供了她采訪索菲亞的資料。

[(216)](#_216) .V.Baevskii, ,Syn kulaka i vrag naroda: A.T.Tvardovskii v Smolenske v 1937 g., , in Stalinizm v rossiiskoi provinstii: smolenskie arkhivnye dokumenty v pochtenii zarubezhnykh i rossii

[(217)](#_217) .Istorii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Moscow, 1997）, p.109; Baevskii, ,Syn kulaka, , pp.255–8.

[(218)](#_218) .I.Tvardovskii, ,Stranitsy perezhitogo, , Iunost, , 1988, no.3, pp.14, 18.

[(219)](#_219) .Ibid., p.23.

[(220)](#_220) .Ibid., p.26.

[(221)](#_221) .Ibid., p.27.

[(222)](#_222) .E.Iaroslavskii（ed.）, Kak provodit, chistku partii （Moscow, 1929）, p.10.

[(223)](#_223) .See S.Fitzpatrick, ,The Problem of Class Identity in NEP Society, , in S.Fitzpatrick, A.Rabinowitch and R.Stites（eds.）, Russia in the Era of NEP: Explorations in Soviet Society and

[(224)](#_224) .G.Alexopoulos, ,Portrait of a Con Artist as a Soviet Man, , Slavic Review, vol.57, no.4（Winter 1998）,pp.774–90.See further, S.Fitzpatrick, ,Making a Self for the Times: Impersonat

[(225)](#_225) .E.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317.

[(226)](#_226) .S.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Oxford, 1999）, pp.118–38.

[(227)](#_227)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p.141–2.See further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 p.133.

[(228)](#_228) .B.Engel and A.Posadskaya-Vanderbeck, A Revolution of their Own: Voices of Women in Soviet History（Boulder, 1997）, pp.29–32（translation slightly altered for clarity）.

[(229)](#_229) .Geiger, 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 , p.143; N.Novak-Decker（ed.）, Soviet Youth: Twelve Komsomol Histories（Munich, 1959）, p.99.

[(230)](#_230) .RGALI, f.1814, op.10, d.339, l.6.

[(231)](#_231) .RGALI, f.1814, op.10, d.339, l.3.

[(232)](#_232) .K.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29–30.

[(233)](#_233) .RGALI, f.1814, op.10, d.339, l.5.

[(234)](#_234)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p.32.

[(235)](#_235) .Ibid., p.33.

[(236)](#_236) .Ibid., pp.35–6.

[(237)](#_237) .W.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143.

[(238)](#_238) .J.Hellbeck, ,Fashioning the Stalinist Soul: The Diary of Stepan Podlubnyi（1931–1939）, ,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1996）, pp.350, 353–5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239)](#_239) .MSP, f.3, op.14, d.3, l.22.

[(240)](#_240) .MSP, f.3, op.14, d.2, l.31; d.3, ll.18–19.

[(241)](#_241) .MSP, f.3, op.14, d.2, l.38.

[(242)](#_242) .MSP, f.3, op.14, d.2, l.84.

[(243)](#_243) .MSP, f.3, op.14, d.2, ll.119–20.

第三章 對幸福的追求（1932—1936）

[(244)](#_244) .SLFA, letter from Fania and Sonia Laskina to Gavril Popov, 18 May 1990; M. Laskin, ,Vospominaniia,, ms., p. 31;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and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ly 2004, March 2005.

[(245)](#_245) .T. Colton, Moscow: Governing the Socialist Metropolis（Cambridge, Mass., 1995）, pp. 214, 270ff.

[(246)](#_246) .RGALI, f. 2772, op. 1, d. 93, l. 2; Colton, Moscow, pp. 280, 327.

[(247)](#_247) .RGALI, f. 2772, op. 1, d. 6, l. 24; d. 87, l. 5.

[(248)](#_248) .RGALI,, f. 2772, op. 1, d. 94, l. 55; D. Neutatz, Die Moskauer Metro: Von den ersten Planen bis zur Grossbaustelle des Stalinismus（1897–1935）,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3（Vienna, 2001）, pp. 173, 181–2; Colton, Moscow, p. 257; Pravda, 20 May 1935, p. 3.

[(249)](#_249) .RGALI, f. 2772, op. 1, d. 97, ll. 17–18.

[(250)](#_250) .RGALI, f. 2772, op. 1, d. 87, l. 87; d. 90, ll. 20–21;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251)](#_251) .E. Zaleski,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viet Union, 1918–1932（Chapel Hill, 1971）, p. 120; N. Lampert,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oviet State: A Study of Soviet Managers and Technicians 1928–1935（London, 1979）, p. 71; S.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Cambridge, 1979）, pp. 199–200; R. Davies, The Soviet Economy in Turmoil, 1929–30（London, 1989）, pp. 134–5.

[(252)](#_252) .有關這些信件的抽樣，可參見：Obshchestvo i vlast, 1930-e gody: povestvovanie v dokumentakh（Moscow, 1998） 和L. Siegelbaum和A. Sokolov所編的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New Haven, 2000）。

[(253)](#_253) .See L. 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Oxford, 1996）; same author,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talinist 1930s: Soliloquy of a Devil, s Advocate, ,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1, no. 1（Winter 2000）, pp. 45–69; J. Rossman, ,The Teikovo Cotton Workers,　Strike of April 1932: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talin, s Russia, , Russian Review, vol. 56, no. 1（January 1997）, pp. 44–69.

[(254)](#_254) .Interviews with Lev Molotkov, St Petersburg,May2003; Zinaida Belikova, St Petersburg, October 2003; MUFA, A. Golovanov, ,Tetradki, , ms., p. 16.

[(255)](#_255) .TsKhDMO, f. 1, op. 23, d. 1265, l. 43.

[(256)](#_256) .J. Arch Getty and O.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New Haven, 1999）, pp. 52–4.

[(257)](#_257) .Ibid., p. 126.

[(258)](#_258) .S.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Ithaca, 1992）, pp. 160–61; same author,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pp. 178, 246.

[(259)](#_259) .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pp. 82–3.

[(260)](#_260)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pp. 124–5（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261)](#_261) .L.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New York, 1972）, pp. 136, 138.

[(262)](#_262) .J. Gronow, Caviar with Champagne: Common Luxury and the Ideals of the Good Life in Stalin, s Russia（Oxford, 2003）, p. 36;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 224.

[(263)](#_263) .RGASPI, f. 17, op. 120, d. 138, ll. 78–9.

[(264)](#_264) .D. Hoffma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talinist Modernity（Ithaca, 2003）, pp. 126, 131; N.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Russia（New York, 1946）, pp. 317–18. 在20世紀30年代，關于文明生活對意識形態的作用，參見：V.Volkov, ,The Concept of Kul, turnost, : Notes on the Stalinist Civilizing Process, , in S. Fitzpatrick（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p. 210–30。

[(265)](#_265) .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Creat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New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London, 1973）, p. 98.

[(266)](#_266) .K. 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in the Soviet Communal Apartment, , in D. Crowley and S. Reid（eds.）, Socialist Spaces: Site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Eastern Bloc（Oxford, 2002）, p. 210;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 78.

[(267)](#_267) .S.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Oxford, 1999）, pp. 150–55; K.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Chicago, 1981）, p. 115; J. Brooks, ,Revolutionary Lives: Public Identities in Pravda during the 1920s, , in S. White（ed.）, New Directions in Soviet History（Cambridge, 1992）, p. 34;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pp. 199–200, 202; C. Kelly,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London, 2005）, p. 158.

[(268)](#_268) .Interview with Marina Ivanova, St Petersburg, March 2004.

[(269)](#_269)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15–17.

[(270)](#_270) .J. Barber, ,The Worker, s Day: Time Distribution in Soviet Working-Class Families, 1923–36, 。這篇論文于1978年提交給了伯明翰大學的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

[(271)](#_271)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156.

[(272)](#_272) .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 ms., pp. 2–5; interviews with Leonid Makhnach, Moscow, March, July 2004.

[(273)](#_273) .MFA, L. Makhnach, ,Otets, , ms., pp. 2–4.

[(274)](#_274) .MFA, Vladimir to Maria Makhnach, 29 November 1935.

[(275)](#_275) .GFA, O. Golovnia,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ms., pp. 3–4, 6, 12, 14, 47.

[(276)](#_276) .GFA, O. Golovnia, ,Mezhdu kratovym i otdykhom, , ms., p. 1;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 ms., p. 31; A. Golovnia, ,Dnevnik, ; 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March, July, October 2004.

[(277)](#_277) .GFA, ,Predisloviia k pis, mam . . ., , ms., pp. 40–43, 58–61.

[(278)](#_278) .Ibid., p. 51.

[(279)](#_279) .E. Osokina,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ia, . Raspredelenie i rynok v snabzhenii naseleniia v gody industrializatsii, 1927–41（Moscow, 1998）, pp. 128, 134;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 p. 272. See also Gronow, Caviar with Champagne, pp. 126–7.

[(280)](#_280) .A. Ledeneva, Russia, 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Cambridge, 1998）;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p. 63.

[(281)](#_281)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p. 46.

[(282)](#_282) .S.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 1997）, pp. 161, 171, 175–6, 477.

[(283)](#_283)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p. 135.

[(284)](#_284) .See e.g. MSP, f. 3, op. 36, d. 2, ll. 3–9.

[(285)](#_285) .MSP, f. 3, op. 44, d. 2, l. 57.

[(286)](#_286) .接下來的部分基于對37名20世紀30年代共用公寓中居民的采訪，參見采訪名單。

[(287)](#_287) .K. 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in the Soviet Communal Apartment, , p. 208; V. Semenova, ,Ravenstvo v nishchete: simvolicheskoe znachenie ,,kommunalok,, , , in Sud, ba liudei: Rossiia xx vek. Biografii semei kak ob, ekt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Moscow, 1996）, p. 374.

[(288)](#_288) .K. Gerasimova, ,Public Spaces in the Communal Apartment, , in G. Rittersporn, M. Rolfe and J. Behrends（eds.）, Public Spheres in Soviet-Type Societies（Sonderdruck, 2003）, p. 167; I. Utekhin, Ocherki kommunal, nogo byta（Moscow, 2001）, pp. 148–9.

[(289)](#_289)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March, June 2005.

[(290)](#_290) .P. Messana, Kommunalka. Une histoire de l, Union soviétique à travers l, appartement communautaire（Paris, 1995）, pp. 16–17. See also R. Berg, Sukhovei. Vospominaniia genetika（Moscow, 2003）, p. 140.

[(291)](#_291)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Mamlin, pp. 1–7.

[(292)](#_292) .Interview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293)](#_293) .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294)](#_294) .Interview with Ninel Reifshneider, Moscow, April 2005.

[(295)](#_295) .MSP, f. 1, op. 16, d. 2, ll. 65–6; op. 23, d. 2, l. 93; Berg, Sukhovei, p. 141; interview with Elena Baigul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Mamlin, p. 4.

[(296)](#_296) .Gerasimova, ,Public Spaces, , pp. 185–6.

[(297)](#_297) .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298)](#_298) .V. Semystiaha, ,The Role and Place of Secret Collaborators in the Informational Activity of the GPUNKVD in the 1920s and 1930s（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of the Donbass Region）,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231–44. See also P. Holquist, , ,,Information is the Alpha andOmegaofOurWork,, : Bolshevik Surveillance in its Pan-European Context,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September 1997）, pp. 415–50.

[(299)](#_299) .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 144.

[(300)](#_300) .Interview with Natalia Grigor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301)](#_301)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Moscow, March 2003.

[(302)](#_302)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Moiseyenko,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03)](#_303) .Interview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G. E. Mamlina, p. 6.

[(304)](#_304) .Interview with Nina Paramon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5;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Moiseyenko,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MSP, f. 3, op. 16, d. 2, ll. 71–2.

[(305)](#_305) .Gerasimova, ,Public Privacy, , p. 224.

[(306)](#_306) .Interviews with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Maia Rodak, Moscow, October 2004; Tatiana Vasil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Elena Baigul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307)](#_307) .Interviews with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Gavrilova, pp. 6–7; G. E. Mamlina, p. 12; MSP, f. 3, op. 16, d. 2, ll. 64–5.

[(308)](#_308)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A. A. Dobriakova, pp. 5–8.

[(309)](#_309) .Interview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March 2005. See also E. A. Skriabina, Stranitsy zhizni（Moscow, 1994）, p. 84.

[(310)](#_310) .Interviews with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Maia Rodak, Moscow, October 2004; Tatiana Vasileva, St Petersburg, May 2005; SSEES, Pahl-Thompson Collection, E. V. Gavrilova, p. 7; E. V. Mamlin, p. 12.

[(311)](#_311) .Utekhin, Ocherki, pp. 94–5, 151, 153, 166; interview with Galina Markelova, St Petersburg, June 2004. See also MM, f. 12, op. 7, d. 2, ll. 12–15; TsGASP, f. 7384, op. 42, d. 343, ll. 421–4.

[(312)](#_312) .N. Lebina, Povsednevnaia zhizn,　sovetskogo goroda: normy i anomalii, 1920–1930 gody（St Petersburg, 1999）, p. 195; interview with Elizaveta Chechik, Moscow, April 2005.

[(313)](#_313) .Interviews with Minora Novikova, Moscow, May 2005; Inna Shikheyeva（Gaister）, Moscow, May 2005.

[(314)](#_314) .K.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1991）, pp. 184, 219. See also A. Kelly, ,In the Promised Land,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8, no. 19（29 November 2001）, from which I have drawn for this paragraph.

[(315)](#_315) .N. Patolichev, Ispytaniia na zrelost, （Moscow, 1977）, p. 170.

[(316)](#_316) .V. Petrov, Byt derevni v sochineniiakh shkol, nikov（Moscow, 1927）; T. Egorov, Kem khotiat byt, nashi deti？ Sbornik detskikh pisem dlia ottsov（Moscow and Leningrad, 1929）; G. Petelin, Dadim slovo shkol, niku（Moscow, 1931）.

[(317)](#_317) .MSP, f. 3, op. 47, d. 2, l. 7.

[(318)](#_318) .R. Orlova, Vospominaniia o neproshedshem vremeni（Ann Arbor, 1983）, p. 30.

[(319)](#_319) .Izvestiia, 14 July 1935, p. 2; A. Tertz, On Socialist Realism（New York, 1960）, p. 78; Soviet Writers, Congress, 1934: The Debate of Socialist Realism and Modernism（London, 1977）, p. 157; S.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Front: 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Ithaca, 1992）, p. 217; W.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 22.

[(320)](#_320) .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pp. 18–21.

[(321)](#_321) .The Correspondence of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Freidenberg, 1910–1954（New York, 1982）, p. 154;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London, 1989）, p. 115.

[(322)](#_322) .L. Kopelev, No Jail for Thought（London, 1975）, pp. 11–13.

[(323)](#_323)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p. 81.

[(324)](#_324) .D. Shearer, Social Disorder, Mass Repression and the NKVD During the 1930s,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505–34; P. Hagenloh,　Socially Harmful Elements,,　and the Great Terror, , in S. Fitzpatrick（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p. 286–308.

[(325)](#_325) .RGALI, f. 1604, op. 1, d. 21, l. 32; A. Avdeenko, Otluchenie, , Znamiia, no. 3（1989）, p. 11.

[(326)](#_326) .C. Ruder, Making History for Stalin: The Story o,f the Belomor Canal（Gainesville, Fl., 1998）, p. 50; G.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Oxford, 2000）, p. 209; Avdeenko, Otluchenie,, p. 18; Belomorsko-baltiiskii kanal imeni Stalina: istoriia stroitel, stva 1931–1934 gg.（Moscow, ,1934）.

[(327)](#_327) .A. Starkov, Mikhail Zoshchenko: sud, ba khudozhnika（Moscow, 1990）, p. 139.

[(328)](#_328)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 ivilization？, 2 vols.（London, 1935）, vol. 2, p. 591; Ivan Chukhin, Kanal,o -armeitsy: istoriia stroitelstva Belomorkanala v dokumentakh, tsifrakh, faktakh, fotografiiakh, svidetelstvakh ychastnikov i ochevidtsev（Petrozavodsk, 1990）, p. 37.

[(329)](#_329) .Ruder, Making History,f o r Stalin, pp. 56–9.

[(330)](#_330) .Avdeenko, ,Otluchenie, p. 8; RGALI, f. 1814, op. 1, d. 944, ll. 6, 14.

[(331)](#_331) .RGALI, f. 1814, op. 10, d. 3, 39; d. 360, ll. 33, 35–6. On Simonov and Pudovkin: K. Simonov, ,O Vsevolode Illarionoviche Pudovkine, in Pudovk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9）, pp. 274–81.

[(332)](#_332)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39–41.

[(333)](#_333) .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4; Simonov, Glazami, pp. 39, 41, 45.

[(334)](#_334) .RGALI, f. 1814, op. 1, d. 1, ll. 13–14, 60; d. 848, l. 5; op. 10, d. 360, ll. 34–5.

[(335)](#_335)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4.

[(336)](#_336) .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36.

[(337)](#_337) .RGALI, f. 632, op. 1, d. 1; d. 16, l,l.　5, 12.

[(338)](#_338) .N. Tipot（Sokolova）, ,Dnevnik, private archive.

[(339)](#_339) .RGALI, f. 632, op. 1, d. 15, ll. 23–7; d. 16, ll. 7–8; f. 1814, op. 9, d. 2606, l. 6; op. 10, d. 339, l. 11;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340)](#_340) .L.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Ocherk zhizni i tvorchestva（Moscow, 1985）, pp. 18, 35; 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p. 9, 10; RGALI, f. 1814, op. 1, d. 71.

[(341)](#_341) .Simonov, Glazami, pp. 42–5; RGALI, f. 1814, op. 9, d. 25, l. 13; d. 1010, ll. 16–19, 25.

[(342)](#_342) .Simonov, Glazami, pp. 46–7.

[(343)](#_343) .Ibid., pp. 48–9.

[(344)](#_344) .Ibid., p. 47.

[(345)](#_345) .TsGAIPD, f. 1278, op. ,1 , d. 439869, l. ,4 .

[(346)](#_346) .SFA, I. Slavina, ,Tonenkii nerv istorii, ms., pp. 16–17, 30;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September 2003.,

[(347)](#_347) .I. Sl,a vin, Vredite, lstvo na fronte sovetskogo ugolovnogo prava（Moscow, 1931）, p. 76; SFA, I. Slavina,,Put na plakhu, ms., p. 29., , ,

[(348)](#_348) .I. Slavin, ,K voprosu o prinuditelnykh rabotakh bez soderzhaniia pod str, azhei, Ezhenedelnik sovetskoi iustitsii, 1922, no. 36; ,Proizvodstvennye tovarishcheskie sudi i revoliutsiia, Sovets,k 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31, no. 7; ,Nekotorye voprosy praktiki proizvodstvenno-tovarishcheskikh sudov, Sovetskoe gosudarstvo i pravo, 1932, nos. 5–6.

[(349)](#_349) .SPbF ARAN, f. 229, op. 1, d. 100, ll. 44–5.

[(350)](#_350) .TsGAIPD, f. 1816, op. 2, d. 5095, l. 66., ,

[(351)](#_351) .SPbF ARAN, f. 229, op. 1, d. 93, ll. 4, 6; d. 100, l. 67; d. 120, ll. 7–12; d. 122, ll. 6–10; SFA, ,Put na plakhu, pp. 79–81; interviews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October, 2003; TsGAIPD, f. 563, op. 1, d. 1467, l. 117.,

[(352)](#_352) .S. Wheatcroft,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German and Soviet Repression and Mass Killings, 1930–45,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1996）, pp. 1338–40.

[(353)](#1931Nian_2Yue__Pa_Wei_Er_Bei_Pan)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E. Vittenburg, Vremia poliarnykh stran（St Petersburg, 2002）, p, p. 106–12.

[(354)](#1931Nian_8Yue__Ji_Nuo_Gang_Gang) .I. Flige, ,Osoblag Vaigach, Vestnik Memoriala, no. 6（St Petersburg, 2001）, pp. 12–19.

[(355)](#_355) .VFA, letter from Zinaida to Veronika and Valentina Vittenburg, 26 August 1933.

[(356)](#_356)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357)](#Zhe_Zhong_Dui_Gu_La_Ge_De_Le_Gua)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4.

[(358)](#1934Nian__Wa_Yi_Jia_Qi_Dao_Shang) .VFA, ,Sotsdogovor ambulatornogo vracha sanotdela vaigachskoi ekspeditsii NKVD Vittenburg Z.I. ot 2 marta 1933, ; letter from Zinaida to Veronika and Valentina Vittenburg, undated [1935];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4.

[(359)](#Ta_Wan_Cheng_Wa_Yi_Jia_Qi_Dao_De) .Interviews with Yevgeniia Vittenburg,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3, S,e ptember 2004; VFA, letter from Zinaida,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3 November 1935; ,Dnevnik v pismakh P. V. Vittenburga docheri Evgenii, p. 54; Vittenburg, Vremia poliarnykh stran, p. 134.,

[(360)](#Pa_Wei_Er_Nu_Li_Rang_Zi_Ji_Su_We) .VFA, letter from Pavel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13 September 1936; ,Dnevnik v pismakh P. V. Vittenburga docheri Evgenii, ms., p. 7.

[(361)](#Pa_Wei_Er__De_Luo_Zi_Duo_Fu_1906) .MM, f. 1, op. 4, Trudovaia kniga; f. 12, op. 9, d. 2.

[(362)](#1937Nian_1Yue__Ai_Lai_Nuo_Ye_Gan) .MM, f. 12, op. 2, d. 2, l. 13; d. 3, l. 43.

[(363)](#Wei_Teng_Bei_Ge_Jia___De_Luo_Zi) .S. Rosefield, ,Stalinism in Post-, Communist Perspective: New Evidence on Killings, Forced Labou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30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6（1996）, p. 969.

[(364)](#3Nian_Hou__Ta_Di_Ya_Nuo_Xian_Bei) .MSP, f. 3, op. 1, d. 2, ll. 1–14; d. 5, ll. 1–5, 12–15; Pravda, 3 November 1929, p. 5; P. Broué, Trotsky（Paris, 1988）, p. 638.

[(365)](#Dan_Tong_Shi__Ta_You_Xi_Wang_Wo) .MSP, f. 3, op. 1, d. 5, ll. 10, 19.

[(366)](#Cong_1933Dao_1936Nian_De_6Yue__T) .MSP, f. 3, op. 1, d. 4（信件的引文可按日期檢索）.

[(367)](#Ta_Xi_Wang_Wo_Cheng_Wei_Yi_Ming) .MSP, f. 3, op. 1, d. 2, ll. 21, 59.

[(368)](#Ta_Di_Ya_Nuo_Ji_Liu_Zai_Yu_Zhong) .MSP, f. 3, op. 1, d. 2, l. 58.

[(369)](#1936Nian__Ta_Di_Ya_Nuo_Yu_Shang) .MSP, f. 3, op. 1, d. 2, l. 50.

[(370)](#Ta_Di_Ya_Nuo_Bei_Song_Qu_Ke_Lei) .MSP, f. 3, op. 1, d. 2, l. 52.

[(371)](#Yi_Kai_Shi__Wo_Zai_Da_Yang_Zhong) .MSP, f,.3, op. 1, d. 5, ll. 7, 8, 21, 25–6.

[(372)](#Jian_Jin_Zhi_Hou_Zhuan_Xiang_Jia)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edited by L. Lih, O. Naumov and O. Khlevniuk, translated by C. Fitzpatrick（New Haven, 1995）, p. 200.

[(373)](#Kang_De_La_Ji_Ye_Fu_De_Jian_Kang) .RGAE, f. 769, op. 1, d. 23–35.

[(374)](#_373) .RGAE, f. 769, op. 1, d. 25, l. 10.

[(375)](#_374) .RGAE, f. 769, op. 1, d. 31, l. 9.

[(376)](#1935Nian__Wei_Le_Ji_Nian_Ta_De_M) .RGAE, f. 769, op. 1, d. 13.

[(377)](#Ni_De_Ba_Ba___377) .RGAE, f. 769, op. 1, d. 29, l. 44.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378)](#_378) .Pravda, 31 January 1932; Golgofa. Po materialam arkhivno-sledstvennogo dela no. 603 na Sokolovu-Piatnitskuiu Iu. I., ed. V. I. Piatnitskii（St Petersburg, 1993）, p. 42.

[(379)](#_379) .Ibid., pp. 8–9.

[(380)](#_380) .V. Piatnitskii, Zagovor protiv Stalina（Moscow, 1998）, p. 198.

[(381)](#_381) .Golgofa, p. 9.

[(382)](#_382) .J. Haslam,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Stal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error, 1932–1936, ,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9, no. 2（June 1986）, p. 412. See also same author, ,The Soviet Uni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Demise of the Popular Front, 1936–39, , in H. Graham and O. Preston（eds.）, The Popular Front in Europe（London, 1987）, pp. 152–60; K. McDermott,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Comintern: New Perspective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1（January 1995）, pp. 111–30.

[(383)](#_383)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New Haven, 2003）, p. 110; McDermott, ,Stalinist Terror, , p. 118.

[(384)](#_384) .B. Starkov, ,The Trial That Was Not Held,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8（1994）, p. 1303.

[(385)](#_385) .Golgofa, pp. 20, 21, 24; interviews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86)](#_386) .Golgofa, pp. 62–3.

[(387)](#_387) .Ibid., pp. 25, 39–40.

[(388)](#_388) .Ibid., pp. 26, 34; interviews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389)](#_389) .M.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7（November 2002）; H.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Jah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3（2005）, p. 88;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p. 516, 519. The figures for 1929–32 are from V. Popov, ,Gosudarstvennyi terror v sovetskoi Rossii. 1923–1953 gg., , Otechestvennyi arkhiv, 1992, no. 2, p. 28.

[(390)](#_390) .J. Getty,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8（Cambridge, 1985）.

[(391)](#_391) .P.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Cambridge, Mass., 1996）, chap. 5; O. Khlevniuk, ,The Politburo, Penal Policy and ,,Legal Reforms,,　in the 1930s, , in P. Solomon（ed.）, Reforming Justice in Russia, 1864–1996: Power, Culture, and the Limits of Legal Order（Armonk, 1997）, pp. 190–206.

[(392)](#_392) .J. Getty, , ,,Excesses Are Not Permitted,, : Mass Terror and Stalinist Governance in the Late 1930s, , Russian Review, 61（2002）, no. 1, pp. 113–38.

[(393)](#_393) .S. Fitzpatrick, ,Varieties of Terror, , in same author（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London, 2000）, p. 258. For a similar view: B. McLoughlin and K. McDermott, ,Rethinking Stalinist Terror, , in same authors（eds.）, Stalin, s Terror: High Politics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2003）, pp. 1–18.

[(394)](#_394) .O. Khlevniuk, ,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Terror,, : The Foreign Political Aspect, ,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vol. 34（1998）, pp. 163ff.; same author,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 1937–38, , in J. Cooper, M. Perrie and E. Rees（eds.）, Soviet History, 1917–19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London, 1995）, pp. 158–76. 另可參見H.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我從中借鑒引用了后面的段落。

[(395)](#_395)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 94; S. Payne,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m（New Haven, 2004）, p. 309.

[(396)](#_396) .S. Allilueva, 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London, 1967）, pp. 88–9; J. Getty and O.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New Haven, 1999）, pp. 157, 256–7.

[(397)](#_397) .V.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London, 1947）, p. 213.

[(398)](#_398) .V. Rogovin, Partiia rasstreliannykh（Moscow, 1997）, pp. 487–9; Reabilitatsia. Kak eto bylo, 3 vols.（Moscow, 2000–2004）, vol. 1, p. 30; O. Suvenirov, Tragediia RKKA, 1938–1938（Moscow, 1998）, p. 315.

[(399)](#_399) .Istochnik, 1994, no. 3, p. 80; N.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 1971）, p. 283;M. Jansen and N. Petrov, Stalin, 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 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Stanford, 2002）, pp. 89, 201.

[(400)](#_400) .F. Chuev, 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Moscow, 1991）, pp. 390, 413; Piatnitskii, Zagovor protiv Stalina, p. 65;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 96.

[(401)](#_401)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5 vols.（Moscow, 1999–2004）, vol. 5: 1937–1939, Part 1, 1937, pp. 32, 33, 46, 54, 387; Kuromiya,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Terror, , pp. 92–3.

[(402)](#_402) .N. Petrov and A. Roginskii, , ,,Pol, skaia operatsiia,,　NKVD 1937–1938 gg., , in L. Eremina（ed.）Repressii protiv poliakov i pol, skikh grazhdan（Moscow, 1996）, pp. 40–43. 關于“國家行動”作為“種族清洗”的形式，參見：T.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Ithaca, 2001）, pp. 328–43.

[(403)](#_403) .V. Garros, N. Korenevskaya and T. Lahusen（eds.）, Intimacy and Terror（New York, 1995）, p. 357.

[(404)](#_404)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405)](#_405) .R.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 s Russia（New Haven, 1996）, pp. 72–7.

[(406)](#_406) .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 91.

[(407)](#_407) .Interview with Viacheslav Kolobkov, St Petersburg, May 2004.

[(408)](#_408) .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New York, 1967）, pp. 21–2.

[(409)](#_409) .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 263.

[(410)](#_410) .MP, f. 4, op. 4, d. 2, ll. 2, 25; op. 5, d. 5, ll. 3–4; L. Il, ina, Moi otets protiv NKVD（St Petersburg, 1998）, pp. 16–21.

[(411)](#_411) .MSP, f. 3, op. 12, d. 2, ll. 35–40, 116–17.

[(412)](#_412)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p. 9–13.

[(413)](#_413)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London, 1992）, pp. 75, 87, 89, 127.

[(414)](#_414) .V. Bronshtein, ,Stalin and Trotsky, s Relatives in Russia, , in T. Brotherstone and P. Dukes（eds.）, The Trotsky Reappraisal（Edinburgh, 1992）, pp. 8–15.

[(415)](#_415) .Getty and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pp. 486–7; Chuev, Sto sorok besed, p. 415.

[(416)](#_416) .Golgofa, p. 29.

[(417)](#_417) .See also MSP, f. 3, op. 34, d. 2; MP, f. 4, op. 16, dd. 2, 3.

[(418)](#_418) .Golgofa, pp. 31, 34, 35–6, 43, 45;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5.

[(419)](#_419) .Golgofa, p. 37.

[(420)](#_420) .M.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68.

[(421)](#_421)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256; M. Prishvin and V. Prishvin, My s toboi. Dnevnik liubvi（Moscow, 1996）, p. 13.

[(422)](#_422) .MP, f. 4, op. 25, d. 2, ll. 9–10.

[(423)](#_423) .MSP, f. 3, op. 8, d. 2, l. 9.

[(424)](#_424) .MP, f. 4, op. 6, d. 2, ll. 18, 37.

[(425)](#_425) .E. Gerstein, Moscow Memoirs（London, 2004）, p. 79.

[(426)](#_426) .MM, f. 12, op. 14, d. 2, ll. 15–16.

[(427)](#_427) .MM, f. 12, op. 7, d. 2, l. 23.

[(428)](#_428) .Gerstein, Moscow Memoirs, p. 214.

[(429)](#_429) .MP, f. 4, op. 8. d. 2, l. 22.

[(430)](#_430) .MM, f. 12, op. 28, d. 2, ll. 12, 35–6.

[(431)](#_431) .GFA, O. Golovnia, ,Dom na Vasil, evskoi, , ms., pp. 2–3.

[(432)](#_432)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58.

[(433)](#_433) .A. Man, kov, Dnevniki tridtsatykh godov（St Petersburg, 2001）, p. 144.

[(434)](#_434)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5, no. 9, p. 165.

[(435)](#_435) .關于日記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參見“引言”部分注釋中所提到的Jochen Hellbeck的作品。

[(436)](#_436) ., ,,Zhizn,　stala veselei . . .,,　Iz dnevnika 1936 goda, , Oktiabr, , 1993, no. 10, p. 4; M. Prishvin, ,Dnevnik 1937 goda, , Oktiabr, , 1994, no. 11, p. 144; same author,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Moscow, 1986）, vol. 8, p. 473.

[(437)](#_437) .J.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Cambridge, Mass., 2006）, pp. 304–5, 306, 308–9, 311–22; RGALI, f. 2172, op. 3, d. 5, l. 249.

[(438)](#_438) .E. Evangulova, Krestnyi put, （St Petersburg, 2000）, pp. 68, 81, 83.

[(439)](#_439) .Man, kov, Dnevniki, p. 59.

[(440)](#_440) .Prishvin and Prishvin, My s toboi, pp. 22–3, 35, 37.

[(441)](#_441) .MM, f. 12, op. 25, d. 2, l. 136;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p. 448;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p. 71. 一名政治警察官員提供了較低的數字，說莫斯科在1930年有1萬名舉報人，載于：G. Agabekov, GPU: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31）. 另可參見：V. Semystiaha, ,The Role and Place of Secret Collaborators in the Informational Activity of the GPU-NKVD in the 1920s and 1930s（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of the Donbass Region）,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vol. 42, nos. 2–4（2001）, pp. 231–44.

[(442)](#_442) .關于較低層次的舉報人網絡，參見：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4,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pp. 154–64.

[(443)](#_443)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50.

[(444)](#_444) .W.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London, 1957）, pp. 100–102.

[(445)](#_445) .Frid, 58?, pp. 160–61.

[(446)](#_446) .MP, f. 4, op. 9, d. 2, ll. 25–7; d. 5, ll. 8–9.

[(447)](#_447) .O. Adamova-Sliuzberg, Put, （Moscow, 2002）, p. 172.

[(448)](#_448) .TsAODM, f. 369, op. 1, d. 161, ll. 1–2.

[(449)](#_449) .Interviewed in The Hand of Stalin（Part 2）, October Films, 1990.

[(450)](#_450) .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19–20.

[(451)](#_451) .Cited in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 s Russia, p. 154.

[(452)](#_452) .MSP, f. 3, op. 16, d. 2, ll. 3–4, 63–5.

[(453)](#_453) .Interview with Lev Molotkov, St Petersburg, May 2003.

[(454)](#_454) .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p. 216;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 32.

[(455)](#_455)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 222; V. Kozlov, ,Denunciation and Its Functions in Soviet Governance: A Study of Denunciations and Their Bureaucratic Handling from Soviet Police Archives, 1944–1953,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no. 4（December 1996）, p. 875. On apartments see V. Buchli, 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 1999）, pp. 113–17.

[(456)](#_456) .MSP, f. 3, op. 36, d. 2, ll. 3, 13–14; d. 3, ll. 4–6.

[(457)](#_457) .Simonov, Glazami, pp. 55, 62.

[(458)](#_458) .RGALI, f. 1814, op. 9, d. 5, ll. 65–7;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459)](#_459) .RGALI, f. 632, op. 1, d. 12, ll. 28–9; d. 13, l. 10; interview with Semyon Vorovsky, Moscow, June 2005.

[(460)](#_460) .RGALI, f. 631, op. 15, d. 242, ll. 6–8; f. 618, op. 3, d. 27, ll. 5–14.

[(461)](#_461) .RGALI, f. 653, op. 1, d. 1087, l. 4.

[(462)](#_462) .RGALI, f. 631, op. 15, d. 226, l. 72.

[(463)](#_463) .RGALI, f. 1814, op. 1, d. 437, ll. 1–7.

[(464)](#_464) .RGALI, f. 632, op. 1, d. 15, l. 23.

[(465)](#_465) .RGALI, f. 632, op. 1, d. 12, l. 13.

[(466)](#_466) .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467)](#_467) .RGALI, f. 1812, op. 1, d. 96, l. 7.

[(468)](#_468) .RGALI, f. 631, op. 15, d. 265, l. 34.

[(469)](#_469) .A. Granovsky, All Pity Choked: The Memoirs of a Soviet Secret Agent（London, 1952）, p. 101.

[(470)](#_470)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 pp. 90–92.

[(471)](#_471) .A. Gorbatov, Years off My Life（London, 1964）, pp. 103–4.

[(472)](#_472)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pp. 203–4.亞基爾將軍的動機之一，可能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后來都被槍決或送去了勞改營）。

[(473)](#_473) .F. Beck and W. Godin,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London, 1951）, p. 86.

[(474)](#_474) .S. Vilenskii（ed.）, Till My Tale is Told（London, 1999）, pp. 124–6.

[(475)](#_475) .Interviewed in The Hand of Stalin（Part 2）, October Films, 1990.

[(476)](#_476)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p. 206. See further: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pp. 131–5;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pp. 143–6.

[(477)](#_477)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478)](#_478) .MM, f. 12, op. 21, d. 2, ll. 28–9; op. 32, d. 2, l. 17.

[(479)](#_479) .MP, f. 4, op. 18, d. 2, ll. 32–5, 49–50.

[(480)](#_480) .VFA, letter from Pavel to Yevgeniia Vittenburg, [February] 1937.

[(481)](#_481) .TsMAMLS, f. 68, op. 1, d. 76, l. 77; d. 124, l. 19; d. 141, l. 88.

[(482)](#_482) .N. Kaminskaya, Final Judgment: My Life as a Soviet Defence Attorney（New York, 1982）, p. 19.

[(483)](#_483) .MM, f. 12, op. 23, d. 2, ll. 37–8.

[(484)](#_484) .Simonov, Glazami, pp. 54–5.

[(485)](#_485) .Adamova-Sliuzberg, Put, , p. 11.

[(486)](#_486) .Deti GULAGa 1918–1956, Rossiia XXvek. Dokumenty（Moscow, 2002）, pp. 272–3.

[(487)](#_487) .O. Khlevniuk,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 1937–1938, , in D. Hoffman（ed.）, Stalinism（London, 2003）, p. 98; Jansen and Petrov, Stalin, s Loyal Executioner, pp. 187–8, 192.

[(488)](#_488) .SLFA, Mark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41.

[(489)](#_489) .Simonov, Glazami, p. 59.

[(490)](#_490) .V. Shentalinsky, The KGB, s Literary Archive（London, 1993）, pp. 186–7.

[(491)](#_491) .RGALI, f. 1712, op. 1, d. 21, l. 4, op. 4, d. 8, l. 37.

[(492)](#_492) .RGALI, f. 1712, op. 3, d. 13, l. 1.

[(493)](#_493) .GARF, f. 5446, op. 82, d. 66, ll. 287–8. See also L. Siegelbaum and A. Sokolov（eds.）,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Yale, 2000）, pp. 237–41.

[(494)](#_494) .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77–8.

[(495)](#_495) .P.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Cambridge, 1996）, p. 234.

[(496)](#_496) .M. Shreider, NKVD iznutri: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95）, p. 42.

[(497)](#_497) .Ibid., p. 91.

[(498)](#_498) .Ibid., pp. 104–5.

[(499)](#_499) .Ibid., p. 120.

[(500)](#_500)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 304.

[(501)](#_501) .A.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 637.

[(502)](#_502) .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11–12.

[(503)](#_503) .MSP, f. 3, op. 37, d. 2, l. 93.

[(504)](#_504) .MSP, f. 3, op. 12, d. 2, ll. 42–3.

[(505)](#_505) .MP, f. 4, op. 6, d. 2, ll. 6–10, 39–41, 45–9; d. 3, ll. 1–6.

[(506)](#_506) .Golgofa, pp. 30, 32, 35;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August 2005.

[(507)](#_507) .MSP, f. 3, op. 18, d. 1, l. 1; d. 2, ll. 2–3, 7–10.

[(508)](#_508) .MP, f. 4, op. 25, d. 2, ll. 7–8, 13–16, 18, 19, 21–2, 26–30.

[(509)](#_509) .See e.g. MSP, f. 3, op. 4, d. 2; MP, f. 4, op. 4, d. 2; V. Shapovalov（ed.）, Remembering the Darkness: Women in Soviet Prisons（Lanham, 2001）, pp. 228–9; N. Ulanovskaia and M. Ulanovskaia, Istoriia odnoi sem, i（New York, 1982）, p. 135.

[(510)](#_510) .MM, f. 12, op. 2, d. 2, ll. 16–20.

[(511)](#_511) .O. Liubchenko, ,Arbat 30, kvartira 58, , Istochnik, 1993, nos. 5–6, pp. 26–9.

[(512)](#_512)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31;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513)](#_513)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 pp. 254–5（艾萊娜·邦納把校長的名字誤記成Klavdia Vasileevna）;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514)](#_514)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September 2004.

[(515)](#_515) .MSP, f. 3, op. 46, d. 2, ll. 17–18, 42–3.

[(516)](#_516) .MP, f. 4, op. 18, d. 2, l. 53.

[(517)](#_517) .MSP, f. 3, op. 37, d. 2, ll. 23–5, 37.

[(518)](#_518) .MM, f. 1, op. 1, d. 169（Sofia to 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 16 October 1937）.

[(519)](#_519) .GARF, f. 7523, op. 123, d. 202, ll. 16–19.

[(520)](#_520) .GARF, f. 5446, op. 26, d. 105, ll. 35–6.

[(521)](#_521) .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60–63.

[(522)](#_522) .MP, f. 4, op. 6, d. 2, ll. 37–8.

[(523)](#_523) .MSP, f. 3, op. 4, d. 2, l. 24.

[(524)](#_524) .The Diary of Nina Kosterina（London, 1972）, pp. 35, 44, 53, 85, 163, 165.

[(525)](#_525) .M.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334–5.

[(526)](#_526) .MSP, f. 3, op. 10, d. 1, l. 1; d. 3, ll. 7, 10–11.

[(527)](#Zhu_Li_Ya_He_Fu_La_Ji_Mi_Er_Zhi) .Golgofa, pp. 41, 46, 53–4;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28)](#_528) .Golgofa, pp. 33, 42.

[(529)](#_529) .Ibid., pp. 41–2.

[(530)](#Yi_Ge_Er_1938Nian_2Yue_9Ri_Bei_B)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She was receiving psychiatric help from May 1938（see Golgofa, p. 88）.

[(531)](#Zuo_Wan__Wo_Xiang__Yi_Zhao_Dao_L) .Golgofa, pp. 42–3, 58.

[(532)](#Zhu_Li_Ya_Yi_Zhi_Zai_Chuai_Mo_Ao) .Ibid., pp. 57, 100.

[(533)](#Ye_Xu__Yi_Ge_Er_Hui_Hui_Jia___Pi) .Ibid., pp. 52, 61;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34)](#Ta_Xian_Shi_Chen_Mo__Ran_Hou_Che) .L. Razgon, True Stories（London, 1997）, p. 131.

[(535)](#4Yue_10Ri__Pi_Ya_Te_Ni_Ci_Ji_Bei) .Starkov, ,The Trial, , p. 1307.

[(536)](#_535) .Lubianka. Stalin i glavnoe upravlenie gosbezopasnosti NKVD, 1937–1938（Moscow, 2004）, p. 544.

[(537)](#Wo_De_Sheng_Huo_Yi_Bian_Cheng_Wu) .Golgofa, p. 80.

[(538)](#E__Wo_Shi_Zai_Wu_Fa_Li_Jie__Ru_G) .Ibid., pp. 83–4.

[(539)](#Pi_Ya_Te_Ni_Ci_Ji_Ye_Xu_Zhen_Shi) .Ibid., p. 99.

[(540)](#Zhu_Li_Ya_Ben_Ren_Bei_Bu_Yu_1938)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iatnitsky, St Petersburg, September 2005.

[(541)](#Zhu_Li_Ya_Si_Yu_Yang_Quan___Ta_B) .Golgofa, pp. 114–16.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542)](#_542) .MP, f. 4, op. 2, d. 2, ll. 7–10.

[(543)](#_543) .MP, f. 4, op. 2, d. 2, l. 5. See similarly MM, f. 4, op. 11, d. 2, ll. 40–41.

[(544)](#_544) .MP, f. 4, op. 2, d. 2, l. 10.

[(545)](#_545) .MSP, f. 3, op. 41, d. 2, l. 10.

[(546)](#_546) .MSP, f. 3, op. 41, d. 2, ll. 6, 11, 31–2, 54, 59, 62–3, 65.

[(547)](#_547) .MSP, f. 3, op. 6, d. 2, ll. 6, 10, 25–6.

[(548)](#_548) .關于單親家庭中承擔成人角色的頭胎孩子，參見：MP, f. 4, op. 24, d. 2, ll. 39–40; op. 13, d. 2, ll. 42–4。

[(549)](#_549) .MSP, f. 3, op. 37, d. 2, ll. 11–12, 40;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36–8, 41–7, 50, 53–4, 187.

[(550)](#_550) .MP, f. 4, op. 22, d. 2, ll. 3–4, 24–6, 34–5.

[(551)](#_551) .See S. Davies,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1941（Cambridge, 1997）, pp. 131–2.

[(552)](#_552) .MM, f. 1, op. 3, d. 905（25 January 1939）.

[(553)](#_553) .See in particular MM, f. 1, op. 1, d. 5401; op. 3, d. 5923; f. 12, op. 25, d. 2; op. 31, d. 2.

[(554)](#_554) .MM, f. 1, op. 3, d. 905（25 August 1940）; f. 12, op. 3, d. 2, l. 31.

[(555)](#_555) .L. Siegelbaum and A. Sokolov（eds.）,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A Narrative in Documents（Yale, 2000）, p. 401.

[(556)](#_556) .GMPIR, f. 2, nos. 51291–1345; VS 11026; f. 6, VS 1937, VS 1937 VS 1938.

[(557)](#_557) .MM, f. 12, op. 22, d. 1, l. 1; d. 2, ll. 5–6, 14.

[(558)](#_558) .MSP, f. 3, op. 40, d. 2, ll. 10, 22; d. 5（20 May 1940）.

[(559)](#_559) .MSP, f. 3, op. 40, d. 2, ll. 7, 18, 24, 34–5.

[(560)](#_560) .MSP, f. 3, op. 16, d. 2, ll. 71–2.

[(561)](#_561) .MSP, f. 3, op. 16, d. 1; d. 2, ll. 25–7.

[(562)](#_562) .GARF, f. 5207, op. 3, d. 49, l. 190; d.56, l. 18.

[(563)](#_563)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300.

[(564)](#_564) .MSP, f. 3, op. 29, d. 2, ll. 1, 3, 14, 20–21.

[(565)](#_565) .MM, f. 12, op. 27, d. 2, ll. 4, 72.

[(566)](#_566) .MSP, f. 3, op. 13, d. 2, ll. 4–6, 21–4.

[(567)](#_567) .MSP, f. 3, op. 24, d. 2, ll. 10, 41; d. 4, l. 25.

[(568)](#_568) .MSP, f. 3, op. 24, d. 2, ll. 37–8.

[(569)](#_569) .MSP, f. 3, op. 24, d. 2, ll. 20, 39–40.

[(570)](#_570) .M. 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p. 48–9, 89.

[(571)](#_571) .Ibid., pp. 42, 65, 101.

[(572)](#_572) .Ibid., pp. 77–9, 126; interview with Viktoriia Shweitser（Mikhail Nikolaev, s widow）, Moscow, July 2004.

[(573)](#_573) .MSP, f. 3, op. 24, d. 2, l. 16; d. 4, l. 21.

[(574)](#_574) .MSP, f. 3, op. 12, d. 2, l. 68.

[(575)](#_575) .MSP, f. 3, op. 12, d. 2, ll. 127–30.

[(576)](#_576) .E. P. Evangulova, Krestnyi put, （St Petersburg, 2000）, pp. 59, 69, 75, 77, 81.

[(577)](#_577) .SFA, I. Slavina, ,Na vesakh nadezhdy i otchaianiia, , ms., p. 1.

[(578)](#_578) .MSP, f. 3, op. 42, d. 2, l. 23; d. 3, ll. 1–2.

[(579)](#_579) .MP, f. 4, op. 12, d. 2, ll. 10, 14, 32, 63–4.

[(580)](#_580) .MSP, f. 3, op. 11, d. 2, ll. 39, 61, 62, 63–4, 72.

[(581)](#_581) .Lynne Viola, ,Tear the Evil From the Root: The Children of Spetspereselentsy of the North, , in Natalia Baschmakoff and Paul Fryer（eds.）, Moder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rovinces, special issue of Studia Slavica Finlandensia, 17（April 2000）, pp. 60–61.

[(582)](#_582) .MP, f. 4, op. 18, d. 2, ll. 11, 16, 50, 52, 65, 76; d. 5, ll. 22–3.

[(583)](#_583) .MP, f. 4, op. 2, d. 2, l. 14.

[(584)](#_584) .Interviews with Oksana Kozmina（Moscow, 1988）, Klavdiia Goncharova（Moscow, 1986）, Inna Ilina（Moscow, 1988）, Lydia Violina（Moscow, 1988）, Klavdiia Babaeva（Moscow, 1988）; GFA, interviews with Sergei Barinov（Akmolinsk, 1988）; Leninskaia smena, 2 June 1988, p. 2; M. Shreider, NKVD iznutri: zapiski chekista（Moscow, 1995）, p. 117. See further A. Kukushkina, Akmolinskii lager, zhen ,izmennikov rodiny, . Istoriia i sud, by（Karaganda, 2002）.

[(585)](#_585) .MP, f. 4, op. 2, d. 2, ll. 4, 45, 51.

[(586)](#_586) .A. Applebaum, Gulag, p. 234;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 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47–8.

[(587)](#_587) .SFA, I. Slavina, ,Na vesakh nadezhdy i otchaianiia, , ms., pp. 6–7.

[(588)](#_588) .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589)](#_589) .將“模范囚犯”講述得最淋漓盡致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參見：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p. 251–91。

[(590)](#_590) .MM, f. 12, op. 29, d. 2, ll. 1, 18.

[(591)](#_591) .H. Volovich, ,My Past, , in S. Vilenskii（ed.）, Till My Tale is Told: Women, s Memoirs of the GULAG（Bloomington, 1999）, pp. 260–64.

[(592)](#_592) .Applebaum, Gulag, p. 293.

[(593)](#_593) .Interviews with Oksana Kozmina（Moscow, 1988）, Klavdiia Goncharova（Moscow, 1986）, Inna Ilina（Moscow, 1988）, Lydia Violina（Moscow, 1988）, Klavdiia Babaeva（Moscow, 1988）, Mikhail Iusipenko（Akmolinsk, 1988）.

[(594)](#_594) .On this see Solzhenitsyn, Gulag, vol. 2, pp. 229–34; Applebaum, Gulag, pp. 285–91.

[(595)](#_595) .MIFA, Tina Mikheladze, ,Vospominaniia, , ms., pp. 1–8; interview with Vakhtang Mikheladze, Moscow, April 2003.

[(596)](#_596) .MSP, f. 3, op. 41, d. 2, ll. 10–12, 40–41, 83–91.

[(597)](#_597) .GFA, Oksana Golovnia, ,Vospominaniia, , ms., pp. 5–7.

[(598)](#_598) .GFA, letter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22 June 1940; letters from Polina Eisner to Liuba Golovnia, 11 December 1940, 22 March 1941.

[(599)](#_599) .GFA, Oksana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 mam, , ms., p. 42; Polina Eisner（Ivanova）, ,Avtobiografiia,（February 1942）; 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letters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23 July 1939; 1 March, 27 March, 3 April 1940.

[(600)](#_600)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601)](#_601) .RGALI, f. 632, op. 1, d. 14, ll. 26–7.

[(602)](#_602) .RGALI, f. 631, op. 2, d. 453, l. 21; f. 2897, op. 1, d. 114;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35–6, 49;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andra Ivanisheva, 8 September 1939; Konstantin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August 1939.

[(603)](#_603) .RGALI, f. 1814, op. 1, d. 93, l. 20.

[(604)](#_604) .J. Colvin, Nomonhan（London, 1999）, pp. 169–75.

[(605)](#_605) .RGALI, f. 1814, op. 1, d. 480, l. 106; op. 6, d. 170, l. 46; op. 10, d. 339, l. 11; K. Simonov, 100 sutok voiny（Moscow, 1999）, p. 295.

[(606)](#_606) .G. Roberts, ,The Soviet Decision for a Pact with Nazi Germany, ,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1（1992）, pp. 57–78; R.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 s Germany and Stalin, s Russia（London, 2004）, p. 486.

[(607)](#_607) .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45（London, 2005）, p. 44.

[(608)](#_608) .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l. 44–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67;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292–3.

[(609)](#_609)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297–8.

[(610)](#_610) .Konstantin Simonov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4）, pp. 18–20.

[(611)](#_611) .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10, 298–9; 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612)](#_612)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p. 48–9.

[(613)](#_613) .Ibid., p. 96.

[(614)](#_614)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ly 2004.

[(615)](#_615)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 115; M. Simonova, ,Ia pomniu, , Ogonek, 1993, no. 6, pp. 22–3;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November 2003.

第六章 “等著我吧”（1941—1945）

[(616)](#_616) .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 ms., pp. 1–14; Vladimir to Maria Makhnach, November 1941; TsAODM, f. 3, op. 52, d. 27, l. 21.

[(617)](#_617)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6; K. Simonov, 100 sutok voiny（Moscow, 1999）, pp. 6–17.

[(618)](#_618)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51–2;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55.

[(619)](#_619) .RGALI, f. 1814, op. 4, d. 5, ll. 7, 58. 關于西蒙諾夫在戰爭年代發展了對大恐怖的思索，參見：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p. 88–9。 關于大恐怖對蘇維埃武裝部隊的遺患，參見：E. 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frontovogo pokoleniia: istorikopsikhologicheskii ocherk, , Vestnik MGU: Istoriia, 1992, no. 4, pp. 39–51; M. von Hagen, ,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Toward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 in R. Thurston and B. Bonwetsch（eds.）, The People, 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Urbana, 2000）, pp. 193ff.

[(620)](#_620)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17–21, 53, 121, 409–11.

[(621)](#_621) .Moskva voennaia 1941–1945: memuary i arkhivnye dokumenty（Moscow, 1995）, p. 475; 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 p. 84;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 50.

[(622)](#_622) .Moskva voennaia, p. 478; R. Bidlack, ,The Political Mood in Leningrad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Soviet–German War, , Russian Review, vol. 59, no. 1（January 2000）, pp. 101–11; G. Bordiugov, ,The Popular Mood in the Unoccupied Soviet Un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during the War, , in The People,s War, pp. 59–60; M. Gorinov, ,Muscovites,　Moods, 22 June 1941 to May 1942, , in The People, s War, pp. 119–20.

[(623)](#_623) .V. Shapovalov（ed.）, Remembering the Darkness: Women in Soviet Prisons（Lanham, Maryland, 2001）, pp. 150–51; MSP, f. 3, op. 35, d. 1, l. 1; d. 2, l. 34.

[(624)](#_624) .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7）, p. 94.

[(625)](#_625) .E. Maksimova, Deti voennoi pory（Moscow, 1988）, pp. 235–308; Merridale, Ivan, s War, p. 216.

[(626)](#_626) .Interviews with Iurii Streletsky, St Petersburg, May 2003, February 2004.

[(627)](#_627) .J. Dunstan, Soviet School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Basingstoke, 1997）, p. 82; J. Barber and M. Harris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1941–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London, 1991）, p. 128.

[(628)](#_628) .MSP, f. 3, op. 3, d. 2, ll. 14–15, 34–42; d. 3, l. 28.

[(629)](#_629) .MSP, f. 3, op. 45, d. 2, ll. 9, 53, 88, 165.

[(630)](#_630) .MSP, f. 3, op. 45, d. 2, ll. 11, 46.

[(631)](#_631) .Moskva voennaia, pp. 478, 481.

[(632)](#_632) .Ibid., pp. 149, 152.

[(633)](#_633) .K.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12 vols.（Moscow, 1979–87）, vol. 1, p. 171. 我借用了Mike Munford的譯文（www.simonov.co.uk）。

[(634)](#_634)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February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SLFA, Sonia Laskina, s papers;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41.

[(635)](#_635) .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krug otchuzhdeniia（Moscow, 2003）, pp. 150–52, 161–5;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2788, l. 1.

[(636)](#_636) .A. Todd and M. Hayward（eds.）,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Poetry（London, 1993）, pp. 623–4（translated by L. Yakovleva）.

[(637)](#_637) .L.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Ocherk zhizni i tvorchestva（Moscow, 1985）, pp. 66–7, 71, 78–9; L. 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vospominaniia fol, kloristafrontovika（Moscow, 1995）, pp. 56–7; B. Pankin, Chetyre Ia Konstantina Simonova（Moscow 1999）, p. 80; Poslednie pis, ma s fronta. Sbornik, 5 vols.（Moscow, 1992）, vol. 3（1943）, p. 257.

[(638)](#_638) .RGALI. f. 1814, op. 1, d. 765, l. 9.

[(639)](#_639) .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pp. 31, 57–8.

[(640)](#_640) .On this see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93, 208, 272–4.

[(641)](#_641) .RGALI, f. 1814, op. 8, d. 93, ll. 61–2.

[(642)](#_642)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pp. 129–32.

[(643)](#_643)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pp. 38–9, 70–72; same author, Pamiat, trudnoi godiny.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v russkoi literature（Moscow, 2000, pp. 47–9;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Princeton, 1990）, p. 13; R. Stites, ,Soviet Russian Wartime Culture: Freedom and Control, Spontaneity and Consciousness, , in The People, s War, p. 175; 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Durham, 1990）, pp. 70–71; RGALI, f. 1814, op. 1, d. 772, l. 362.

[(644)](#_644) .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p. 202–3.

[(645)](#_645) .RGALI, f. 1814, op. 9, d. 1532, l. 4; d. 775, l. 1;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and September 2003;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p. 181–2, 290; T. Okunevskaia, Tat, ianin den, （Moscow, 1998）, pp. 119–20.

[(646)](#_646) .See e.g. RGALI, f. 1814, op. 1, d. 765, ll. 15, 66, 68, 77.

[(647)](#_647) .RGALI, f. 1814, op. 9, d. 1530, l. 2; d. 1533, ll. 29–30.

[(648)](#_648) .RGALI, f. 1814, op. 9, d. 2768, l. 10; d. 1, l. 1; d. 1533, ll. 18–19; d. 2768, l. 15.

[(649)](#_649) .RGALI, f. 1814, op. 9, d. 1, l. 3.

[(650)](#_650) .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l. 19.

[(651)](#_651) .N. Ivanova, ,Konstantin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 , Znamia, 1997, no. 7;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8;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London, May 2004;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652)](#_652) .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17;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Lazarev, Shestoi etazh, p. 213.

[(653)](#_653)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p. 9–10;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22–4; SLFA, Zhenia Laskina to Vladimir Lugovskoi, 28 August 1943; Sonia Laskina to Vladimir Lugovskoi, 21 August 194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1812, ll. 1–2.

[(654)](#_654) .RGALI, f. 1814, op. 10, d. 339, l. 20;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321; E. Dolmatovskii, Bylo: zapiski poeta（Moscow, 1982）, p. 58（also 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2）.

[(655)](#_655) .rasnaia zvezda, 28 August 1941, p. 1; 7 November 1941, p. 4; RGALI, f. 1814, op. 1, d. 993, l. 37;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87.

[(656)](#_656) .Simonov, 100 sutok voiny, pp. 550–51.

[(657)](#_657) .Ibid., pp. 17–21.

[(658)](#_658)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134–8.

[(659)](#_659) .R. McNeal, Stalin: Man and Ruler（London, 1988）, p. 241; R. Parker, Moscow Correspondent（London, 1949）, pp. 21–2.

[(660)](#_660) .Pushkarev, Po dorogam voiny, p. 60; E. Seniavskaia, Chelovek na voine. Istorikopsikhologicheskie ocherki（Moscow, 1997）, pp. 47–8; Lazarev, Konstantin Simonov, p. 68;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 68;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1, pp. 105–7; A.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London, 1964）, p. 412.韋斯弄錯了該幕的最后一句臺詞，他引用的詞句實際上出現在前面。

[(661)](#_661) .K. Simonov, Pis, ma o voine, 1943–1979（Moscow, 1990）, p. 110.

[(662)](#_662) .D. Samoilov, Podennye zapisi, 2 vols.（Moscow, 2002）, vol. 1, p. 140; ,Zaveshchanie zhivym（pis, ma s fronta）, , Sovetskaia Rossiia, 9 May 1991.

[(663)](#_663) .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 p. 49; V.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Zametki pisatelia, , Kommunist, 1997, no. 7, p. 122.

[(664)](#_664) .S. Conze and B. Fieseler, ,Soviet Women as Comrades-in-Arms: A Blind Spot in Soviet History, , in The People, s War, p. 212.

[(665)](#_665) .nterviews with Rebekka（Rita） Kogan, St Petersburg, June, November 2003.

[(666)](#_666) .A. Chuyanov, Stalingradskii dnevnik, 1941–1943（Volgograd, 1968）, p. 209; Konstantin Simonov rasskazyvaet（Moscow, 1981）, p. 106.

[(667)](#_667) .RGASPI, f. 17, op. 125, d. 190, l. 16.

[(668)](#_668) .D. Glantz, The Siege of Leningrad, 1941–1944: 900 Days of Terror（London, 2001）, pp. 75–6.

[(669)](#_669) .這一頗有影響力的理論，其經典表述來自：E. Shils and M.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8, no. 12, pp. 280–315。

[(670)](#_670) .E. Seniavskaia, Frontovoe pokolenie 1941–1945: istoriko-psikhologicheskoe issledovanie（Moscow, 1995）, p. 86; same author, ,Dukhovnyi oblik, , pp. 46–7; C. Merridal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p. 279.

[(671)](#_671) .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8）, p. 197.

[(672)](#_672) .J.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London, 1983）, p. 40.

[(673)](#_673) .V. Zemskov, ,Ukaz ot 26 Iunia 1940 g.（Eshche odna kruglaia data）, , Raduga, 1990, no. 6, p. 47.

[(674)](#_674) .MP, f. 4, op. 15, d. 2, ll. 7–9; d. 3, l. 2.

[(675)](#_675) .MP, f. 4, op. 11, d. 2, ll. 26–8.

[(676)](#_676) .E. Bacon, The Gulag at War: Stalin, s Forced Labour System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ives（London, 1994）, p. 144; L. Borodkin and S.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Forced Labor in Norilsk, , in Paul Gregory and Valery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Stanford, 2003）, p. 78.

[(677)](#_677) .S. Ertz, ,Building Norilsk, , in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pp. 127–50; O vremeni, o Noril, ske, o sebe . . . Vospominaniia, 5 vols.（Moscow, 2001–6）, vol. 3, p. 12; Borodkin and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 pp. 77, 86–8.

[(678)](#_678) .MM, f. 12, op. 18, d. 2, l. 27.

[(679)](#_679) .Interviews with Vasilina Dmitruk, Vera Pristupa, Maria Treimanis（née Fishchuk）, Norilsk, July 2004.

[(680)](#_680) .Interview with Anna Darvina, Norilsk, July 2004.

[(681)](#_681) .Interview with Semyon Golovko, Norilsk, July 2004.

[(682)](#_682) .MM, f. 2, op. 5（,Khranit,　vechno!, , ms.）.

[(683)](#_683) .RGALI, f. 3084, op. 1, d. 1390, ll. 1, 13; MSP, f. 3, op. 22, d. 2, ll. 19–21, 36–7; d. 4, ll. 15–16; interviews with Natalia Babailova, Severodvinsk, March and November 2005; interview with Nina Sazhnova, Saratov, November 2004; interview with Nina Levina, Krasnoiarsk, August 2005.

[(684)](#_684) .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252; B. Pasternak, Doctor Zhivago（London, 1958）, p. 453; O. Ivinskaia, V plenu vremeni: gody c B. Pasternakom（Moscow, 1972）, p. 96.

[(685)](#_685)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 p. 224.

[(686)](#_686) .M. Gefter, ,Stalin umer vchera . . ., , in Inogo ne dano（Moscow, 1988）, p. 305; V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8.

[(687)](#_687) .H. Smith, The Russians（London, 1976）, p. 369; V. Kondrat, ev, ,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 gii, , Literaturnaia gazeta, 9 May 1990, p. 9.

[(688)](#_688)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689)](#_689) .P. Blake and M. Hayward（eds.）, Dissonant Voices in Soviet Literature（New York, 1962）, pp. 164–7（translated by Walter Vickery）.

[(690)](#_690) .關于黨的思想培訓中心在戰爭中的崩潰，參見：R. Brody, Ideolog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Soviet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I（Pittsburgh, 1994）, pp. 24–6。

[(691)](#_691) .Merridale, Ivan, s War, p. 141;Werth, Russia at War, p. 943; Pravda, 24 June 1944, p. 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MSP, f. 3, op. 30, d. 2, l. 23.

[(692)](#_692) .Smith, The Russians, p. 370.

[(693)](#_693) .MM, f. 12, op. 25, d. 2.

[(694)](#_694) .MSP, f. 3, op. 14, d. 2, ll. 46–53, 87–90; d. 3, ll. 27–33.

[(695)](#_695) .MP, f. 4, op. 11, d. 2, ll. 10, 34–7.

[(696)](#_696) .V. Pirozhkova, Poteriannoe pokolenie（St Petersburg, 1998）, p. 154.

[(697)](#_697) .TsAODM, f. 1870, op. 3, d. 1, ll. 15–17; d. 3, ll. 33–4.

[(698)](#_698) .MM, f. 12, op. 21, d. 2, ll. 31–2.

[(699)](#_699) .E.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London, 1998）, p. 17; ,Voina, kotoruiu ne znali: iz dnevnika, prokommentirovannogo samym avtorom 45 let spustia, , Sovetskaia kul, tura, 5 May 1990, p. 4;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00)](#_700) .M. Prishvin,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Moscow, 1986）, vol. 8, pp. 392, 435–6; VFA, A. Levidova,,Vospominaniia, , ms., p. 119; S. Gus, kov, Esli ostanus, zhiv（Moscow, 1989）, p. 215;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01)](#_701) .GARF, f. 9041, op. 2, d. 202, l. 8; RGASPI, f. 558, op. 11, d. 868, l. 56; f. 17, op. 122, d. 122, ll. 27–30; Pravda, 11 September 1989.

[(702)](#_702) .GARF, f. 7253, op. 16, d. 79, l. 173;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292–3.

[(703)](#_703) .Seniavskaia, ,Dukhovnyi oblik, , pp. 49–50.

[(704)](#_704) .T. Dunmore, Soviet Politics 1945–53（London, 1984）, p. 129;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 94; Bordiugov, ,The Popular Mood, , pp. 66, 68.

[(705)](#_705) .MSP, f. 3, op. 4, d. 2, ll. 41–2, 46, 57–8.

[(706)](#_706) .MSP, f. 3, op. 16, d. 2, ll. 30–34, 74–8, 98.

[(707)](#_707)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9. p. 639.

[(708)](#_708)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72.

[(709)](#_709) .Pravda, 27 June 1945.

[(710)](#_710) .Chelovek v istorii. Rossiia – XX vek: sbornik rabot pobeditelei（Moscow, 2002）, p. 293.

[(711)](#_711) .See Merridale, Ivan, s War, pp. 232–4.

[(712)](#_712)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 pp. 112–16; same author, ,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 gii, .

[(713)](#_713) .MSP, f. 3, op. 29, d. 2, ll. 5–6.

[(714)](#_714) .MM, f. 1, op. 1, d. 1942; d. 1944; f. 12, op. 16, d. 2, ll. 12–15, 68–9.

[(715)](#_715) .MM, f. 1, op. 1, d. 1944.

[(716)](#_716) .MM, f. 1, op. 1, d. 1944; f. 12, op. 16, d. 2, ll. 27, 29, 69.

[(717)](#_717) .MM, f. 12, op. 16, d. 2, ll. 32–3.

[(718)](#_718) .MM, f. 12, op. 16, d. 2, ll. 34, 71–2, 85.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義者（1945—1953）

[(719)](#_719) .MP, f. 4, op. 2, d. 2, ll. 64–89.

[(720)](#_720) .E.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London, 1998）, pp. 20–21, 38; Liudskie poteri SSSR v period vtoroi mirovoi voiny: sbornik statei（St Petersburg, 2005）, p. 130.

[(721)](#_721) .M. Heller and A.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London, 1986）, pp. 472–3; RGALI, f. 1814, op. 10, d. 387, l. 4; d. 389, l. 10.

[(722)](#_722)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p. 11, 40. A lower rate of mortality（1.5 million deaths） is given by M. Ellman,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s, ,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September 2000）, p. 615.

[(723)](#_723) .MP, f. 4, op. 2, d. 2, ll. 13, 19–20, 24–6, 76–9.

[(724)](#_724) .RGASPI, f. 17, op. 117, d. 530, ll. 37–8.

[(725)](#_725) .,Iz suzhdenii sovetskikh liudei o poslevoennykh problemakh i o zhizni v SSSR, , Istoriia otechestva v dokumentakh, 1945–1993（Moscow, 1995）, p. 17.

[(726)](#_726) .I. Ehrenburg, The War, 1941–45（London, 1964）, p. 124;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London, 1997）, p. 299 （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A. Mikoian, Tak bylo: razmyshleniia o minuvshem（Moscow, 1999）, pp. 513–14.

[(727)](#_727) .Interview with Marianna Gordon, St Petersburg, October 2003.

[(728)](#_728) .Interview with Valentina Aleksandrova, St Petersburg, December 2003.

[(729)](#_729) .RGASPI, f. 17, op. 125, d. 424, ll. 58–71. 關于這些團體，參見：J. Fürst, ,Prisoners of the Self？Political Opposition Groups in Late Stalinism,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3（2002）, pp. 353–75; H. Kuromiya, , ,,Political Youth Opposition in Late Stalinism,, : Evidence and Conjecture, ,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5, no. 4（2003）, pp. 631–8.

[(730)](#_730) .MSP, f. 3, op. 20, d. 2, ll. 53, 59.

[(731)](#_731) .MSP, f. 3, op. 47, d. 2, ll. 21, 31, 35, 38, 55.

[(732)](#_732) .See N. Tumarki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ult of World War II in Russia（New York, 1994）, p. 104; L. Lazarev, Pamiat, trudnoi godiny.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v russkoi literature（Moscow, 2000）, pp. 61–3.

[(733)](#_733) .Pravda, 10 February 1946;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415.

[(734)](#_734) .R. Overy, Russia, s War（London, 1997）, pp. 304–7.

[(735)](#_735) .A. Danilov and A. Pyzhikov, Rozhdenie sverkhderzhavy: SSSR v pervye poslevoennye gody（Moscow, 2001）, p. 108.

[(736)](#_736) .GARF, f. 9401, op. 2, d. 234, ll. 148, 153; d. 199, l. 392; S. Fitzpatrick, ,Postwar Soviet Society: The ,,Return to Normalcy,, , 1945–1953, , in S. Linz（ed.）,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Totowa, 1985）, pp. 143–5.

[(737)](#_737) .P. Greg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the Gulag, , in P. Gregory and V.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Stanford, 2003）, pp. 14, 16; G. Alexopoulos, ,Amnesty 1945: The Revolving Door of Stalin, s Gulag, , Slavic Review, vol. 64, no. 2（Summer 2005）, p. 274;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Oxford, 2004）, pp. 130–31, 268–71.

[(738)](#_738) .關于在諾里爾斯克獲得家庭重聚的好的案例，參見Kuznetsova-Babailova 的檔案，見于：MSP, f. 3, op. 22, dd. 2–5。

[(739)](#_739) .MM, f. 12, op. 20, d. 2.

[(740)](#_740) .MSP, f. 3, op. 8, d. 2.

[(741)](#_741) .L. Borodkin and S. Ertz, ,Coercion versus Motivation: Forced Labor in Norilsk, , in Gregory and Lazarev（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pp. 102–3.

[(742)](#_742) .V. Dunham, In Stalin, 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New York, 1976）.

[(743)](#_743) .N. DeWitt,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in the USSR（Washington, 1961）, pp. 606–7, 638–9.

[(744)](#_744) .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pp. 289, 326–7.

[(745)](#_745) .C.Milosz, The Captive Mind（London, 1953）, pp. 55, 57.

[(746)](#_746) .Interviews with Irina Aleksandrova, St Petersburg, May, November 2003.

[(747)](#_747) .MSP, f. 3, op. 37, d. 2, ll. 44–5.,

[(748)](#_748) .MFA, L. Makhnach, ,Oskolki bylogo s vysoty nastoiashchego, ms., p. 76.

[(749)](#_749) .MSP, f. 3, op. 34, d. 2, l. 4. See also MM, f. 12, op. 32, d. 2, ll. 77–8.

[(750)](#_750) .MP, f. 4, op. 2, d. 2, ll. 32–3.

[(751)](#_751) .MP, f. 4, op. 13, d. 2, ll. 37–8, 39, 42–3, 56.

[(752)](#_752) .Interviews with Iurii S, treletsky, St Petersburg, May 2003, February 2004.

[(753)](#_753) .PFA, ,Vospominaniia, ms., pp. 17, 22–4; interviews with Tatiana Elagina, Moscow, May, October 2003（name changed on the request of the informant）.

[(754)](#_754) .MP, f. 4, op. 7, d. 2, ll. 3, 7, 11–12, 26, 28, 39–40.

[(755)](#_755) .RGALI, f. 1814, op. 10, d. 360, l. 45;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82; A.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vblizi i na rasstoianii（Moscow 1987）, p. 103.

[(756)](#_756) .RGALI, f. 1814, op. 10, d. 346.

[(757)](#_757)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p. 143–4; N.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215–16.

[(758)](#_758) .K. Chukovskii, Dnevnik, 1901–1969, 2 vols.（Moscow, 2003）, vol. 2, p. 210; RGALI, f. 631, op. 15, d. 1004, l. 150;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 116.

[(759)](#_759)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760)](#_760) .RGALI, f. 1814, op. 10, d. 343, l. 1; N.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Moscow, 1999）, p. 7; L. Fink, Konstantin Simonov（Moscow, 1979）, pp. 220, 235, 251, 274.

[(761)](#_761) .L. Chukovskaia, Sochineniia v 2 tomakh（Moscow, 2000）, vol. 2, pp. 182, 186, 216. 西蒙諾夫當《文學報》主編時，被指責傲慢霸道（see RGASPI, f. 558, op. 11, d. 878, l. 55）.,

[(762)](#_762) .RGALI, f. 1814, op. 9, d. 229, ll. 16, 20;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p. 16; B. Pankin, Chetyre Ia Konstantina Simonova（Moscow, 1999）, pp. 19, 23, 35–5;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763)](#_763) .RGALI, f. 1814, op. 9, d. 2590, ll. 1, 2. 關于Portugalov在科雷馬勞改營的經歷，參見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對他的深情追憶，見于：RGALI, f. 2596, op. 2, d. 133, ll. 1–10。

[(764)](#_764)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 136. On Smeliakov: 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kniga o zhizni kinodramaturgov Dunskogo i Frida（Moscow, 2002）, pp. 592–5.

[(765)](#_765) .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l. 43, 45; d. 643, ll. 1–2; op. 9,, d . 1812, l. 4.

[(766)](#_766) .I. Berlin, ,Meetings with Russian Writers in 1945 and 1956, in Personal Impressions（Oxford, 1982）, pp. 160–61; N.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London, 1989）, p. 375.

[(767)](#_767) .G. Carleton, 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 Critical Constructions of Mikhail Zoshchenko（Evanston, 1998）, pp. 231–2.,

[(768)](#_768) .,Doklad t. Zhdanova o zhurnalakh Zvezda i Leningrad, Novyi mir, 1946, no. 9, pp. iv–xix.

[(769)](#_769)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04–7; RGASPI, f. 17, op. 13,2 , d. 229, l. 21.

[(770)](#_770)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p. 337–8; A.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Moscow, 1991）, p. 235.

[(771)](#_771) .RGALI, f. 1814, op. 9, d. 331, ll. 1–2;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18–20, 137, 141;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72)](#_772) .SLFA, ,K.M., two-part film on DVD, comments by Benedikt Sarnov in Part 1, at twenty-six minutes;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773)](#_773) .B. Schwarz, Music and Musical Life in Soviet Russia, 1917–1970（London, 1972）, pp. 208, 218; Gorlizki and Khlevniuk, Cold Peace, pp. 35–8;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p. 119–23.

[(774)](#_774) .H. Sali,s b ury, American in Russia（New York, 1955）, pp. 16–20, 38; G. Ivanova, ,Poslevoennye repressii i Gulag, in Stalin i kholodnaia,v oina（Moscow, 1998）, p.,　255.

[(775)](#_775) .J. Brent and V. Naukov, Stalins L,a st Crime: The DoctorsPlot（London, 2003）, p. 96.

[(776)](#_776) .,Evreiskii antifashistskii komitet, Izvestiia TsK KPSS, 1989, no. 12, p. 40; Reabilitatsiia: politicheskie protsessy 30–50-kh godov（Moscow, 1991）, p. 326.

[(777)](#_777) .Cited in A. Weiner, Making Sense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Princeton, 2001）, p. 195.,

[(778)](#_778) .RGALI, f. 1814, op. 9, d. 2645, ll. 3–4, 9, 1,8 ;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3, 77, 94; G.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Vlasti antisem, itizm（Moscow, 2001）, pp. 319ff.

[(779)](#_779) .A. Gerasimov, ,Za sovetskii patriotism v iskusstve, Pravda, 10 February 1949; N. Gribachev, ,Protiv kosmopolitizma i formalizma v poezii, , Pravda, 16 February 1949; T. Khrennikov, ,Burzhuaznye kosmopolity v muzykal, noi kritike, , Kul,tura i zhizn, , 20 February 1949; ,Do kontsa razoblachit, kosmopolitov-antipatriotov, , Pravda, 26–27 February 1949; L. Bol, shakov, ,Razgromit,　burzhuaznyi kosmopolitizm v kinoiskusstve, , Pravda, 3 March 1949; etc.

[(780)](#_780)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334–5;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185, 188–91; RGASPI, f. 83, op. 1, d. 5, ll. 92–5.

[(781)](#_781) .RGASPI, f. 17, op. 132, d. 237, ll. 13–15. See also RGASPI, f. 77, op. 4, d. 73, ll. 7–11;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 p. 19.

[(782)](#_782) .RGASPI, f. 17, op. 118, d. 229, l. 17.

[(783)](#_783) .N. Tipot（Sokolova）, ,Dnevnik, , private archive. 關于索夫羅諾夫和西蒙諾夫競相謀求法捷耶夫的官位，參見博爾切戈夫斯基的看法，見于：A. Borshchagovskii, Pustotelyi monolit（Moscow, 2002）, pp. 133–4.

[(784)](#_784) .RGALI, f. 1814, op. 9, d. 19（,Vospominaniia o kampanii po bor, be s kosmopolitizmom, , ts., 1976）;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214.

[(785)](#_785) .See e.g. K. Simonov, ,Zadachi sovetskoi dramaturgii i teatral, naia kritika, , Pravda, 27–8 February 1949（其有關薩特和米勒的評論，便出現于此）; same author, ,Zadachi sovetskoi dramaturgii i teatral, naia kritika, , Literaturnaia gazeta, 5 March 1949.

[(786)](#_786) .RGASPI, f. 17, op. 132, d. 226, ll. 1–6; d. 229, l. 30;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339–40.

[(787)](#_787)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19, 35–6, 49, 187, 200, 204, 215, 223, 272, 278–9; 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788)](#_788) .Bors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266, 279; 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4, l. 4.

[(789)](#_789) .Interview with 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Moscow, November 2003;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by, pp. 4, 240.

[(790)](#_790) .Ibid., pp. 261–2.

[(791)](#_791) .See A. Kozhevnikov, ,President of Stalin, s Academy: The Mask and Responsibility of Sergei Vavilov,, Isis, vol. 87, no. 1（March 1996）, pp. 18–50; N. Tolstoi（ed.）, Brat, ia Nikolai i Sergei Vavilovy（Moscow, 1991）; M. Popovsky, The Vavilov Affair（Hamden, 1984）; S. Ivanovich Vavilov: ocherki i vospominaniia（Moscow, 1991）. 瓦維洛夫悄悄地抵制官方決定，但他的異議一直沒有受到關注，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索爾仁尼琴為何攻擊他為“科學院的走狗主席”，參見索爾仁尼琴：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2, p. 638。

[(792)](#_792) .RGASPI, f. 17, op. 132, d. 237, ll. 14–15; RGALI, f. 1814, op. 9, d. 1365, l. 1; f. 2203, op. 1, d. 333, l. 1; f. 631, op. 16, d. 90; f. 2203, op. 1, d. 333, l. 5; d. 336, l. 11;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321.

[(793)](#_793) .RGALI, f. 1814, op. 6, dd. 70, 173; d. 170, l. 17;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ly 2004.

[(794)](#_794) .RGALI, f. 1814, op. 1, d. 500.

[(795)](#_795)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26–8; Fink, Konstantin Simonov, p. 229.

[(796)](#_796) .RGALI, f. 1814, op. 1, d. 563; op. 4, d. 10; op. 9, d. 5, ll. 69–70; RGASPI, f. 82, op. 2, d. 1458, l. 49; f. 558, op. 11, d. 806, l. 164;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28–31.

[(797)](#_797) .Ibid., pp. 135–7.

[(798)](#_798) .RGALI, f. 1814, op. 9, d. 809, ll. 1–6; Karaganov, Konstantin Simonov, pp. 88–9;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 pp. 609–10.

[(799)](#_799) .K. Simonov, Sobranie sochinenii, 12 vols.（Moscow, 1979–87）, vol. 12, p. 41.

[(800)](#_800)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l. 28–41.

[(801)](#_801)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85–9.

[(802)](#_802) .See Gosudarstvennyi antisemitizm v SSSR: ot nachala do kul, minatsii, 1938–1953（Moscow, 2005）, pp. 27–61.

[(803)](#_803)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 p. 267.

[(804)](#_804) .MSP, f. 3, op. 37, d. 2, ll. 13, 52;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72–3, 78–9, 257.

[(805)](#_805) .MM, f. 2, op. 5, d. 3; f. 12, op. 30, d. 2, l. 27.

[(806)](#_806) .Interviews with Mark Epshtein, St Petersburg, June and October 2003.

[(807)](#_807) .SLFA, various documents;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9, d. 1533; RGASPI, f. 495, op. 199, d. 207（Zaidler）.

[(808)](#_808)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 61.

[(809)](#_809) .RGALI, f. 1814, op. 9, d. 1541, l. 36; d. 1770, l. 2.

[(810)](#_810)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p. 59–61.

[(811)](#_811) .RGALI, f. 1814, op. 9, d. 2581.

[(812)](#_812)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pp. 619–26.

[(813)](#_813) .Interviews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ne 2003, July 2004;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Iakov Kharon to Sonia Laskina, 8 March 1954;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28 May 1954.

[(814)](#_814) .RGALI, f. 1814, op. 1, d. 454, l. 32; op. 10, d. 92, l. 37; RGASPI, f. 17, op. 133, d. 390, ll. 81–4; d. 389, ll. 158–6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For evidence of Simonov, s authorship of the letter of 24 March see Nash sovremennik, 1999, no. 1, p. 206.

[(815)](#_815)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189–204.

[(816)](#_816) .RGALI, f. 1814, op. 1, d. 802, l. 95.

[(817)](#_817) .RGASPI, f. 17, op. 119, d. 452, ll. 4–6;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20–22; Fink, Konstantin Simonov, p. 112.

[(818)](#_818) .Brent and Naukov, Stalin, s Last Crime, pp. 9, 129, 176, 184;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 86;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p. 137.

[(819)](#_819) .S.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 2003）, p. 568.

[(820)](#_820)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23–7.

[(821)](#_821) .Ibid., p. 229.

[(822)](#_822) .RGALI, f, 1814, op. 4, d. 10, l. 5.

[(823)](#_823) .SLFA, M. Laskin, ,Vospominaniia, , ms., pp. 87–8.

[(824)](#_824) .MP, f. 4, op. 2, d. 2, ll. 13, 30.

[(825)](#_825) .MP, f. 4, op. 23, d. 2, l. 15.

[(826)](#_826) .Mandelstam, Hope Abandoned, p. 385.

[(827)](#_827) .MM, f. 12, op. 9, d. 2, l. 67.

[(828)](#_828) .MP, f. 4, op. 11, d. 2, l. 46; op. 5, d. 2, l. 12.

[(829)](#_829) .MSP, f. 3, op. 4, d. 2, l. 31.

[(830)](#_830) .A. Knight, Beria: Stalin, 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1993）, p. 185; A. Lokshin, , ,,Delo vrachei,, :,,Otkliki trudiashchikhsia,,　, , Vestnik evreiskogo universiteta v Moskve, 1994, no. 1, pp. 52–62.

[(831)](#_831) .MSP, f. 3, op. 4, d. 2, ll. 43–4.

[(832)](#_832) .Interview with Zinaida Belikova, St Petersburg, May 2003.

[(833)](#_833)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p. 175.

[(834)](#_834) .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p. 357; MM, f. 12, op. 30, d. 2, l. 22; O. Adamova-Sliuzberg, Put, （Moscow, 2002）, p. 201.

[(835)](#_835) .See Applebaum, Gulag, pp. 435–53.

[(836)](#_836) .A. Makarova, ,Noril, skoe vosstanie. Mai-avgust 1953 goda, , ms.; Applebaum, Gulag, pp. 437, 440; MM, f. 12, op. 20, d. 2, ll. 74–5, 89, 91.

[(837)](#_837) .MM, f. 12, op. 20, d. 2, ll. 34, 48; f. 1, op. 1, d. 1925, ll. 11–30.

[(838)](#_838) .MM, f. 12, op. 20, d. 2, l. 92; MSP, f. 3, op. 8, d. 2, l. 18; d. 3, ll. 20–22; interview with Vasilina Dmitruk, Norilsk, July 2004.

[(839)](#_839) .1954年5月至6月，哈薩克斯坦的Steplag特殊勞改營，其Kengir分營的造反也有同樣溫和的要求。參見：S. Barnes, , ,,In a Manner Befitting Soviet Citizens,, : An Uprising in the Post-Stalin Gulag, , Slavic Review, vol. 64, no. 4（Winter 2005）, pp. 823–50.

[(840)](#_840) .MM, f. 12, op. 20, d. 2, ll. 98, 101.

[(841)](#_841) .Istoriia stalinskogo gulaga: konets 1920-kh – pervaia polovina 1950-kh godov. Sobranie dokumentov v semi tomakh, vol. 6, Vosstaniia, bunty i zabastovski zakliuchennykh（Moscow, 2004）, pp. 320–413; Applebaum, Gulag, pp. 441–2; interview with Semyon Golovko, Norilsk, July 2004.

第八章 歸來（1953—1956）

[(842)](#_842) .SLFA, Spravka MVD, 11 November 1955;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8 September 1955, 5 October 1955;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Sept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November 2003.

[(843)](#_843)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PSS i drugie materialy: mart 1953–fevral, 1956（Moscow, 2000）, p. 213.

[(844)](#_844) .SLFA, Sonia Laskina to Dmitry Shepilov, 4 June 1955; V. Frid, 58?: zapiski lagernogo pridurka（Moscow, 1996）, pp. 358–9.

[(845)](#_845)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Oxford, 2004）, p. 131; D. Shepilov, Neprimknuvshii（Moscow, 2001）, p. 267; A. Knight, Beria: Stalin, 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 1993）, pp. 209–10;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p. 246–7.

[(846)](#_846) .V.Naumov, ,Repression andRehabilitation, , inW.Taubman, S.Khrushchev andA.Gleason（eds.）, Nikita Khrushchev（New Haven, 2000）, pp. 90–91; SLFA, Sonia Laskina to Dmitry Shepilov, 4 June 1955; Konstantin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24 September 1955.

[(847)](#_847) .N.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 Talbott（Boston, 1974）, p. 79; A. Hochschild, The Unquiet Ghost: Russians Remember Stalin（London, 1994）, p. 223; N.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The Gulag Survivor（New Brunswick, 2002）, pp. 90–93.

[(848)](#_848) .SLFA, Yevgeniia to Sonia Laskina, 16 September 1955; Vladimir Lugovskoi to Yevgeniia Laskina, 20 July 1956; Maia Bykova to Yevgeniia Laskina, 25 December 1974;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June 2003.

[(849)](#_849) .E. Bonner, Mothers and Daughters（London, 1992）, pp. 89–90, 328, 330–31; interview with Elena Bonner, Boston, November 2006.

[(850)](#_850) .可對照于異議分子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娃（Liudmila Alekseyeva）的回憶錄。她提到，閱讀赫爾岑的作品和仿效十二月黨人的榜樣，同樣促使她在道德上與蘇維埃政權保持距離。參見：L. Alexeyeva and P. Goldberg,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Boston, 1990）, pp. 34–5.

[(851)](#_851) .MSP, f. 3, op. 33, d. 2, ll. 33, 39.

[(852)](#_852) .MSP, f. 3, op. 45, d. 2, l. 47.

[(853)](#_853) .MSP, f. 3, op. 45, d. 2, ll. 132, 166.

[(854)](#_854) .MSP, f. 3, op. 45, d. 2, ll. 26–7, 89–90, 134.

[(855)](#_855) .MSP, f. 3, op. 24, d. 2, l. 38.

[(856)](#_856) .MSP, f. 3, op. 35, d. 2, ll. 40–54.

[(857)](#_857) .MSP, f. 3, op. 39, d. 2, ll. 27, 29.

[(858)](#_858) .MSP, f. 3, op. 39, d. 3, ll. 1–5.

[(859)](#_859) .MSP, f. 3, op. 39, d. 2, ll. 31.

[(860)](#_860) .MSP, f. 3, op. 39, d. 2, ll. 36, 47, 52, 54.

[(861)](#_861) .B. Okudzhava, ,Devushka moei mechty, , in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 1989）, vol. 2, pp. 283–94.

[(862)](#_862) .MP, f. 4, op. 10, d. 2, ll. 9, 28.

[(863)](#_863) .MSP, f. 3, op. 38, d. 2, ll. 19, 36.

[(864)](#_864) .MM, f. 12, op. 29, d. 2, l. 20.

[(865)](#_865) .SFA, I.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 ms., p. 17;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866)](#_866) .MP, f. 4, op. 2, d. 2, ll. 23–4, 43–5.

[(867)](#_867) .GFA, letter from Anatoly to Liuba Golovnia, 5 December 1940; O. Golovnia, ,Predislovie k pis, mam,, ms., p. 70; L. Golovnia-Babitskaia, ,Predsmertnye zapiski, , ms., p. 4; A. Bachinskii, ,Zhizn, , liubov,　i smert, Anatoliia Golovni, , Stolitsa S, 17 January 1997; interview with Yevgeniia Golovnia, Moscow, July 2004.

[(868)](#_868) .MSP, f. 3, op. 46, d. 3, l. 43; MM, f. 12, op. 29, d. 2, ll. 34–5.

[(869)](#_869) .M. Nikolaev, Detdom（New York, 1985）, p. 96; interviews with Viktoriia Shweitser, Moscow, July 2004; Amherst, November 2006.

[(870)](#_870) .O. Adamova-Sliuzberg, Put,（Moscow, 2002）, p. 153.

[(871)](#_871) .Ibid., pp. 154–5.

[(872)](#_872) .關于這一點，參見：D. Field, ,Communist Morality and Meanings of Private Life in Post-Stalinist Russia, 1953–6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關于青年文化，參見：J. Fürs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ylish: Youth,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Late Stalinism, , in same author（ed.）, Late Stalinist Russia: Society between Reconstruction and Reinvention（London, 2006）, pp. 209–30.

[(873)](#_873) .MM, f. 12, op. 16, d. 2, ll. 78, 79–80, 85, 97.

[(874)](#_874) .MFA, L. Makhnach, ,Otets, , ms., pp. 3–8; interview with Leonid Makhnach, Moscow, July 2004.

[(875)](#_875) .MSP, f. 3, op. 8, d. 2, l. 24.

[(876)](#_876) .L. El, iashova, Kak zhit, ？ O zhizni Sof, i Mikhailovny Firsovoi,Sankt-Peterburgskii Universitet, no. 22（3489）, 20 October 1998, p. 24; Frid, 58?, p. 389; Sluzhili dva tovarishcha: kniga o zhizni kinodramaturgov Dunskogo i Frida（Moscow, 2002）, p. 146.

[(877)](#_877) .MM, f. 12, op. 18, d. 2, ll. 12–14, 17–19.

[(878)](#_878) .MSP, f. 3, op. 41, d. 2, ll. 37–41, 83–6; d. 3, l. 2.

[(879)](#_879) .MP, f. 4, op. 22, d. 2, ll. 16, 29, 35, 50, 53, 59.

[(880)](#_880) .MM, f. 1, op. 1, dd. 841, 2676; f. 12, op. 4, d. 2, ll. 59–80.

[(881)](#_881) .GFA, N. Iznar, ,Avtobiografiia, ; Natalia Iznar to Elena Abezgauz, undated.

[(882)](#_882) .RGALI, f. 1814, op. 9, d. 2581, ll. 28–36.

[(883)](#_883) .RGALI, f. 1814, op. 9, d. 229, ll. 15, 17, 18, 21, 32, 47, 48.

[(884)](#_884) .MM, f. 2, op. 1, d. 45, l. 1105; A.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3 vols.（London, 1974–8）, vol. 3, p. 455.

[(885)](#_885) .A. Applebaum, ,After the Gulag,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9, no. 16（24 October 2002）, p. 41.

[(886)](#_886) .MP, f. 4, op. 10, d. 2, ll. 10–13.

[(887)](#_887) .Adler, Beyond the Soviet System, pp. 30–31; A. Applebaum,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2003）, p. 460; C. Hooper, ,Terror from Within: Participation and Coercion in Soviet Power, 1924–64,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University, 2003）, p. 377.

[(888)](#_888)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vol. 3, p. 451.

[(889)](#_889) .RGASPI, f. 560, op. 1, d. 37, l. 487.

[(890)](#_890) .MM, f. 2, op. 1, d. 29（Anatolii Brat [Zhukov], ,Zhutkie gody, ）.

[(891)](#_891) .MSP, f. 3, op. 8, d. 2, l. 28.

[(892)](#_892) .MP, f. 4, op. 6, d. 2, ll. 28–30, 39–40.

[(893)](#_893) .MM, f. 12, op. 20, d. 2, l. 124.

[(894)](#_894) .MP, f. 4, op. 6, d. 2, l. 29.

[(895)](#_895) .MP, f. 4, op. 2, d. 2, l. 26.

[(896)](#_896) .Adamova-Sliuzberg, Put, , pp. 207–8.

[(897)](#_897) .MP, f. 4, op. 2, d. 2, l. 46.

[(898)](#_898) .MP, f. 4, op. 43, d. 2, l. 2.

[(899)](#_899) .MSP, f. 3, op. 46, d. 2, ll. 51–4; d. 3, ll. 49–50.

[(900)](#_900) .TsAFSB, Arkhivno-sledstvennoe delo I. V. Slavina（P-51969）; ,Delo reabilitatsii, （N4N-012826/55）; SFA, I. Slavina, ,Put,　na plakhu, , ms., pp. 3–6, 103; interview with Ida Slavina, Cologne, June 2003.

[(901)](#_901) .MSP, f. 3, op. 10, d. 2, ll. 15, 30–31; d. 3, ll. 34–5. See also MSP, f. 3, op. 38, d. 2, ll. 23–6; MM, f. 12, op. 2, d. 2, ll. 28–30.

[(902)](#_902) .L. Chukovskaia, Zapiski ob Anne Akhmatovoi, 3 vols.（Paris, 1980）, vol. 2, p. 137.

[(903)](#_903) .MSP, f. 3, op. 12, d. 2, ll. 60–67, 131–3.

[(904)](#_904) .MSP, f. 2, op. 51, d. 2, ll. 3–7.

[(905)](#_905) .MM, f. 12, op. 10, d. 2, ll. 18–23.

[(906)](#_906) .MSP, f. 3, op. 14, d. 2, ll. 66–8; d. 3, ll. 54–5.

[(907)](#_907) .I. Sherbakova, ,The Gulag in Memory, , in L. Passerini（ed.）,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1: 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Oxford, 1992）, p. 114（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908)](#_908) .See A. Inkeles and R.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 Mass., 1959）.

[(909)](#_909) .N.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London, 1989）, p. 48.

[(910)](#_910) .Ibid., p. 49.

[(911)](#_911) .Vokrug Fadeeva: neizvestnye pis, ma, zametki i dokumenty（Moscow, 1996）, pp. 12, 122; RGALI, f. 1814, op. 9, d. 5, l. 30; V. Kaverin, Epilog: memuary（Moscow, 2002）, pp. 313–24.

[(912)](#_912) .Izvestiia TsK KPSS, 1990, no. 10, p. 147.

[(913)](#_913) .關于法捷耶夫的善舉，參見：K. Chukovskii, Dnevnik, 1901–69, 2 vols.（Moscow, 2003）, vol. 2, pp. 282–3; A. Borshchagovskii, Zapiski balovnia sud, by（Moscow, 1991）, p. 21；阿赫瑪托娃1956年3月10日曾寫信給法捷耶夫，感謝他為爭取她兒子Lev Gumilyov 從西伯利亞勞動營獲釋而作出的努力（“在那可怕的歲月中，你的善良和同情超過了任何其他人”），載于Vokrug Fadeeva, p. 161。

[(914)](#_914) .RGALI, f. 618, op. 16, d. 88, l. 16.

[(915)](#_915) .Literaturnaia gazeta, 17 July 1954, pp. 2–3; 20 July 1954, pp. 2–3.

[(916)](#_916)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248–53;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917)](#_917) .Pravda, 4 July 1954, p. 3.

[(918)](#_918)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l. 21–2. 關于公眾對該小說的反應，參見：D. Kozlov, ,Naming the Social Evil: The Readers of Novyi mir and Vladimir Dudintsev, s Not by Bread Alone, 1956–1959, , in P. Jones（ed.）,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Reform in the Khrushchev Era（London, 2005）, pp. 80–98.

[(919)](#_919)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5; K. Simonov, Segodnia i davno（Moscow, 1978）, p. 78; A za mnoiu shum pogoni: Boris Pasternak i vlast, . Dokumenty 1956–72（Moscow, 2001）, pp. 89–90.

[(920)](#_920) .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 201.

[(921)](#_921)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pp. 349–51;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 2003）, pp. 270, 272, 274, 278.

[(922)](#_922)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pp. 5–6; Taubman, Khrushchev, pp. 273–4.

第九章 記憶（1956—2006）

[(923)](#_923)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 2003）, pp. 282–3.,

[(924)](#_924) .P. Jones, ,From the Secret Speech to the Burial of Stalin: Real and Ideal Responses to De-Stalinization, in same author（ed.）,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Reform in the Khrushchev Era（London, 2005）, p. 47.

[(925)](#_925) .L. Alexeyeva and P. Goldberg, The Thaw Generation: Coming of Age in the Post-Stalin Era（Boston, 1990）, p. 4.

[(926)](#_926) .MM, f. 12, op. 4, d. 2, ll. 47, 78.

[(927)](#_927) .MSP, f. 3, op. 18, d. 2, ll. 21–2.

[(928)](#_928) .MP, f. 4, op. 26, d. 2, ll. 12–14.

[(929)](#_929) .MP, f. 4, op. 22, d. 2, ll. 14, 62–4.

[(930)](#_930) .MP, f. 4, op. 2, d. 2, ll. 36–41.

[(931)](#_931) .MSP, f. 3, op. 19, d. 2, ll. 5, 24–33.

[(932)](#_932) .MP, f. 4, op. 19, d. 2, ll. 26–7, 41–5; d. 3, l. 1; d. 4, ll. 1–3.,

[(933)](#_933) .I. Shikheeva-Gaister, Semeinaia khronika vremen kulta lichnosti: 1925–1953（Moscow, 1998）, pp. 266–7; MSP, f. 3, op. 37, d. 2, ll. 31–2, 76.

[(934)](#_934) .MSP, f. 3, op. 8, d. 2, l. 25; M, P, f. 4, op. 2, d. 2, l. 23; MM, f. 12, op. 30, d. 2, ll. 36–8.

[(935)](#_935) .V. Shalamov, ,Dry Rations, in Kolyma Tales（London, 1994）, p. 43; MSP, f. 3, op. 37, d. 2, l. 45. See also: op. 1, d. 2, ll. 33–4; op. 36, d. 2, ll. 7–9.

[(936)](#_936) .C. Merridal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London, 2000）, p. 21.

[(937)](#_937) .C. Garland（ed.）, Understanding Trauma: A Psychoanal,y tical Approach（London, 1998）, pp. 4–5; D. Laub, ,Truth and Testimony: The Process and the Struggle, in C. Caruth（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1995）, pp. 61–75.

[(938)](#_938) .MSP, f. 3, op. 15, d. 3, l. 1.

[(939)](#_939)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940)](#_940) .RGALI, f. 1814, op. 9, d. 1538; V.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Moscow, 2003）, pp. 258–84; 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941)](#_941) .Pushnova, Valentina Serova, p. 322; RGALI, f. 1814, op. 9, d. 775, l. 1.

[(942)](#_942) .Interview with Maria Simonova, Moscow, March 2004; RGALI, f. 1814, op. 9, d. 775, l. 1.

[(943)](#_943)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8;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2003.,

[(944)](#_944) .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ei Simonov, 28 August 1957; Mark Laskin, ,Vospominaniia, ts., p. 15; RGALI, f. 1814, op. 10. d. 342, l. 20; interview with Fania Laskina, Moscow, July 2004; A.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Nizhny Novgorod, 1999）, pp. 42, 44–5, 148.

[(945)](#_945) .RGALI, f. 1814, op. 9, d. 2199, l. 2.

[(946)](#_946) .SLFA, Aleksei Simonov to Yevgeniia Laskina, 19 August 1956; Aleksei Simonov to Konstantin Simonov, 24 October 1956; Konstantin to Aleksei Simonov, 31 August 1956.

[(947)](#_947) .SLFA, Yevgeniia Laskina to Aleksei Simonov, 26 September 1956;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 67; Aleksei to Konstantin Simonov, 7 February 1957.

[(948)](#_948) .Interview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November 2003; SLFA, Aleksei Simonov, Diary, 23 December 1956; Aleksei Simonov to Vladimir Dudintsev, 13 December 1956;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l. 15–17, 22.

[(949)](#_949)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Moscow, 1990）, p. 12;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RGALI, f. 1814, op. 2, d. 127, ll. 2–3, 8.

[(950)](#_950)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2.

[(951)](#_951) .RGALI, f. 1814, op. 9, d. 1770, l. 13.

[(952)](#_952) .RGALI, f. 1814, op. 6, d. 170, l. 17.

[(953)](#_953) .V. Kondrat, ev, ,Ne tol, ko o svoem pokolenii. Zametki pisatelia, , Kommunist, 1997, no. 7, p. 122.

[(954)](#_954) .Interview with Marina Babak, Moscow, November 2003.

[(955)](#_955) .K. Simonov, Sto sutok voiny（Smolensk, 1999）; same author, Raznye dni voiny: dnevnik pisatelia, 2 vols.（Moscow, 1977–8）.

[(956)](#_956) .RGALI, f. 1814, op. 9, d. 11, ll. 1–21; op. 8, d. 58, l. 98.

[(957)](#_957) .RGALI, f. 1814, op. 9, dd. 2590, 681, 1857.

[(958)](#_958) .Simonov, Chastnaia kollektsiia, pp. 147–55. 這個刪減約有60頁打印稿，即刻出現于地下出版物，自1969年起又進入該小說的外國版本。它完整的俄文版本于1973年在蘇聯第一次出版。參見R. Pevear的簡介和注釋，載于他翻譯的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倫敦，1997年），vii–xix頁。

[(959)](#_959)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Simonov, Moscow, September, November 2003, February 2004.

[(960)](#_960) .RGALI, f. 1814, op. 10, d. 376, ll. 20–21; Konstantin Simonov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 1984）, p. 291;N. Bianki, K. Simonov i A. Tvardovskii v ,Novom Mire, （Moscow, 1999）, pp. 32–3.

[(961)](#_961) .L. Lazarev, Shestoi etazh: kniga vospominaniia（Moscow, 1999）, pp. 208, 210; interview with Lazar Lazarev, Moscow, November 2003; Simonov, Sto sutok voiny, pp. 550–54; RGALI, f. 1814, op. 9, d. 5, l. 63; op. 9, d. 19（,Vospominaniia o kampanii po bor, be s kosmopolitizmom, , ts., 1976）.

[(962)](#_962) .K. Simonov and I. Ehrenburg, V odnoi gazete: reportazhi i stati 1941–1945（Moscow, 1979）; Lazarev, Shestoi etazh, pp. 201–2.

[(963)](#_963) .A. Solzhenitsyn, The Oak and the Calf: Sketches of Literary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London, 1980）, p. 299.

[(964)](#_964) .Interview with Viktor Erofeev, Moscow, November 2003; interview with Andrei Erofeev, Moscow, April 2004; interview with Nina Arkhipova, Moscow, November 2003; D. Gillespie, ,Metropol,　, , The Literary Encyclopedia, 19 November 2005.

[(965)](#_965)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 pp. 7–8.

[(966)](#_966) .Ibid. Fragments of the memoir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Znamia in 1988, no. 3, pp. 3–66; no. 4, pp. 49–121; no. 5, pp. 69–96.

[(967)](#_967) .See e.g. A. Mikoian, Tak bylo: razmyshleniia o minuvshem（Moscow, 1999）, p. 589 （“當然，我們負有很大責任，但必須弄清當時的工作環境。我們相信，我們對很多事是茫然無知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無法作出改變。”）

[(968)](#_968) .Lev Razgon, True Stories（London, 1997）, pp. 21–34.

[(969)](#_969) .Interview with Ivan Korchagin, Akmolinsk, September 1988.

[(970)](#_970) .IFA, ,Kommentarii k pis, mam, , ts., 1988; Mikhail Iusipenko to M. Zelder, 29 December 1988; Mikhail Iusipenko to Sergei Barinov, 18 August 1988; interview with Oksana Kozmina, Moscow, 1988.

[(971)](#_971) . MM, f. 1, op. 2; f. 2, op. 5; f. 12, op. 9, dd. 2, 3.

[(972)](#_972) .關于記憶與敘事之間的關系，參見：V. Skultans, The Testimony of Lives: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Post-Soviet Latvia（London, 1998）.

[(973)](#_973) .Alexander Dolgun, s Story: An American in the Gulag（New York, 1975）, p. 4.

[(974)](#_974) .I. Sherbakova, ,The Gulag in Memory, , in L. Passerini（ed.）,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1: 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Oxford, 1992）, pp. 112–13（為求清晰，譯文略有調整）.

[(975)](#_975) .See e.g. MSP, f. 3, op. 42, d. 3, ll. 1–24.

[(976)](#_976) .M. McAuley, Soviet Politics 1917–1991（Oxford, 1992）, pp. 56–7.

[(977)](#_977) .關于古拉格回憶錄成為一種文學體裁，參見：Leona Toker, Return from the Archipelago: Narratives of Gulag Survivors（Bloomington, 2000）.

[(978)](#_978) .E. Ginzburg,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London, 1968）; Within the Whirlwind（London, 1981）.

[(979)](#_979) .C. Merridale,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 2005）, p. 334; A. Applebaum, ,The Real PatrioticWar,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3, no. 6（6 April 2006）, pp. 16, 18.

[(980)](#_980) .Ginzburg, Within the Whirlwind, p. 201.

[(981)](#_981) .O vremeni, o Noril, ske, o sebe: vospominaniia, 5 vols.（Moscow, 2001–4）; A. Macqueen, ,Survivors, , Granta, 64（Winter 1998）, p. 39.

[(982)](#_982) .Interview with Vasily Romashkin, Norilsk, July 2004.

[(983)](#_983) .Interview with Olga Iaskina, Norilsk, July 2004. This paragraph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over fifty people in Norilsk during July 2004. See the List of Interviews in Sources.

[(984)](#_984) .Moscow News, 4 March 2005.

[(985)](#_985) .Mikhail Baitalsky, Notebooks for the Grandchildren: Recollections of a Trotskyist Who Survived the Stalin Terror（New Jersey, 1995）, pp. 97–8.

[(986)](#_986) .MP, f. 4, op. 13, d. 2, l. 18.

[(987)](#_987) .MP, f. 4, op. 24, d. 2, ll. 64–7.

[(988)](#_988) .MP, f. 4, op. 22, d. 2, ll. 67–71.

[(989)](#_989) .關于這種現象，參見：H. Krystal, Massive Psychic Trauma（New York, 1968）; D.Wardl, 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2; N. Burchardt,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the Families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n England, , in D. Bertaux and P. Thompson（eds.）,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al History and Life Stories, vol. 2: Between Generations: Family Models, Myths and Memories（Oxford, 1993）, pp. 121–37. 心理學家瑪琳娜·古麗娜（Marina Gulina），在列寧格勒圍城的幸存者所帶大的孩子中，進行了一項有趣的試驗研究。其中的詳細信息，參見：,Malen, kii prints v blokadnom Leningrade: psikhoanaliticheskoe issledovanie, , Sankt-Peterburgskii Universitet, no. 9（3698）, 5 May 2005, pp. 32–5.

[(990)](#_990) .MSP, f. 3, op. 11, d. 1, ll. 1–2; d. 2, ll. 53–60, 74–84.

[(991)](#_991) .MSP, f. 3, op. 37, d. 2, l. 63;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Korsakov, St Petersburg, May, October 2003.

[(992)](#_992) .Interviews with Aleksei Iurasovsky, Moscow, July 2004, October 2005.

[(993)](#_993) .MP, f. 4, op. 24, d. 2, ll. 36–7, 44–7; MSP, f. 3, op. 16, d. 2, l. 91.

[(994)](#_994) .MP, f. 4, op. 26, d. 2, ll. 6–8; op. 3, d. 2, l. 37.

[(995)](#_995) .MP, f. 12, op. 4, d. 2, ll. 75–6.

[(996)](#_996) .MP, f. 12, op. 16, d. 2, l. 23; op. 17, d. 2, l. 52.

[(997)](#_997) .MP, f. 12, op. 17, d. 2, ll. 52–3.

[(998)](#_998) .B. Slutskii, Sud, ba. Stikhi raznykh let（Moscow, 1990）, p. 40.

[(999)](#_999) .See e.g. MP, f. 4, op. 5, d. 2, l. 20; op. 24, d. 2, ll. 70–73. 有些口述歷史學者認為，2000年之后，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威權政府統治下，俄國人好像回到了蘇維埃時期，“因社會壓力而重趨沉默”，與90年代早期相比，“不太愿意提供坦率的訪談”(D. Bertaux, P. Thompson and A. Rotkirch（eds.）, On Living Through Soviet Russia（London, 2004）, pp. 8–9）。

[(1000)](#_1000) .MSP, f. 3, op. 14, d. 3, ll. 52–4.

[(1001)](#_1001) .MSP, f. 3, op. 14, d. 2, ll. 41–5, 59–64, 76, 85–9, 93, 119; d. 3, ll. 34, 39–40, 45–6. Antonia died in December 2006.

# [資料來源]

檔 案

公共檔案

AFSBTO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ambov Oblast, Tambov

AFSBVO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Vologda Oblast, Vologda

AMILO　 Archive of the Moscow Historical-Literary Society （, Vozvrashchenie, ）

ARAN　 Archiv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GAOO　 State Archive of Orel Oblast, Orel

GAPO　 State Archive of Perm Oblast, Perm

GARF　 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GARK　 State Archive of the Komi Republic, Syktyvkar

GASO　 State Archive of Sverdlovsk Oblast, Yekaterinburg

GAVO　 State Archive of Vologda Oblast, Vologda

GMPIR　 State Museum of Political History of Russia, St Petersburg

GOPAPO　 State Socio-Political Archive of Perm Oblast, Perm

HP　　Harvard Project （,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 Harvard University, USA

IIS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IRL RAN　 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Pushkin House, ）, St Petersburg

MM [[1]](#_1___Biao_Zhu______Yi_Wei_Yin_Zi)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Moscow

MP [[2]](#_2___Biao_Zhu______Yi_Wei_Yin_Zi)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Perm

MSP [[3]](#_3___Biao_Zhu______Yi_Wei_Yin_Zi) 　 Archive of the Memorial Society, St Petersburg

OR RNB　 Manuscripts Department, Russian National Library, St Petersburg

RGA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the Economy, Moscow

RGAKFD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Documentary Films and Photographs, Krasnogorsk

RGAL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Literature and Art, Moscow

RGASP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Moscow

SPbF ARAN　St Petersburg Filial of th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SEES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TsAFSB　 Central 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Moscow

TsAODM　 Central Archive of Social Movements of Moscow

TsDNA　 Centre of Documents, , the People, s Archive, , Moscow

TsGAIPD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Documents, Moscow

TsGASP　 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St Petersburg

TsIAM　 Central Historical Archive of Moscow

TsKhDMO　 Cent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s of Youth Organizations, Moscow

TsMAMLS　 Central Moscow Archive-Museum of Personal Collections

私人檔案

AFA　Alekseyeva Family Archive, Moscow

GFA　Golovnia Family Archive, Moscow

IFA　Iusipenko Family Archive, Akmolinsk, Kazakhstan

LFA　Levitina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MFA　Makhnach Family Archive, Moscow

MIFA　Mikheladze Family Archive, Tbilisi, Georgia

MUFA　Muratov Family Archive, Moscow

PFA　Pavlukhina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RFA　Ramensky Family Archive, Strugi Krasnye

SFA　Slavin Family Archive, Cologne, Germany

SLFA　Simonov-Laskin Family Archive, Moscow

VFA　Vittenburg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VOFA　Voitinsky Family Archive, St Petersburg

采訪名單

Adasinskaia, Galina Antonovna （St Petersburg）

Akkuratnova, Maia Pavlovna （Moscow）

Aksyonova, Iraida Petrovna （Usole）

Aleksandrova, Irina Mikhailovna （St Petersburg）

Aleksandrova, Valentina Lvovna （St Petersburg）

Aliavdina, Veronika Anatolevna （St Petersburg）

Alkaeva, Raifa Izmagilovna （Krasnokamsk）

Anastaseva, Margarita Viktorovna （Moscow）

Andreyev, Oleg Grigorevich （St Petersburg）

Arapov, Aleksandr Pavlovich （St Petersburg）

Arkhipova, Nina Nikolaeva （Moscow）

Atapov, Sergei Mikhailovich （Tambov）

Avdasheva, Ninel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Babaeva, Klavdiia Mikhailovna （Moscow）

Babailova, Natalia Borisovna （Severodvinsk）

Babak, Marina Mikhailovna （Moscow）

Babikova, Yevgeniia Spiridonovna （Norilsk）

Babina, Rada Lvovna （Moscow）

Babitskaia, Vlada Alekseyevna （Moscow）

Babushkina, Lydia Vasilevna （Perm）

Badaeva, Valentina Fyodorovna （Perm）

Badiaeva, Galina Ivanovna （Perm）

Baigulova, Elena Alekseyevna （Moscow）

Balandin, Grigorii Pavlovich （Perm）

Baranenko, Nadezhda Pavlovna （Perm）

Barinov, Sergei Mikhailovich （Akmolinsk）

Barkovskaia, Marianna Iosifovna （Izobilnoe, Stavropol district）

Batin, Pyotr Yefimovich （Usole）

Batishcheva, Maria Karlovna （Norilsk）

Batrakova, Nina Dmitrevna （Perm）

Bazilevskaia, Valentina Borisovna （Voronezh）

Bazilevskaia, Vladilena Borisovna （Moscow）

Bekker, Valentin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Belikova, Zinaid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Beloborodov, Nikolai Nikolaevich （Perm）

Belousov, Arkadii Sergeyevich （Penza）

Belova, Anna Pavlovna （Krasnokamsk）

Beneta, Svetlana Anatolevna （Norilsk）

Blagoveshchensky, Andrei Borisovich （Moscow）

Bletsko, Tatia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Blium, Arlen Viktorovich （St Petersburg）

Blium, Igor Vsevolodovich （St Petersburg）

Bogdanov, Sergei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Bogdanova, Natalia Borisovna （Moscow）

Bolchis, Tatia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Bonner, Elena Georgievna （Boston, USA）

Borodina, Valentina Semyonovna （Norilsk）

Borozna, Mikhail Danilovich （Orel）

Borshchagovsky, Aleksandr Mikhailovich（Moscow）

Bronshtein, Svetlana Aleksandrovna （Moscow）

Bronshtein, Yekaterin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Budkevich, Maria Stanislavovna （St Petersburg）

Bulat, Iness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Burylovna, Zoia Pavlovna （Perm）

Bushueva, Angelina Vladimirovna （Perm）

Chechik, Elizaveta Natanovna （Moscow）

Cherepanova, Praskovia Iakimovna （Perm）

Cherkasova, Karina Leonidovna （Moscow）

Cherkasskaia, Bella Martynovna （St Petersburg）

Cherkesov, Oleg Vsevolodovich （St Petersburg）

Cherkesova, Svetlana Vsevolodovna（St Petersburg）

Cherniaev, Boris Dmitrievich （Tambov）

Cherniaeva, Dalita Artyomovna （Krasnokamsk）

Chesnokov, Vladimir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Chulkova, Antonina Alekseyevna （Perm）

Chuprun, Gerta Yevgenevna （Moscow）

Dadzis, Lydia Ianovna （St Petersburg）

Danilenko, Irina Aleksandrovna （Norilsk）

Danilov, Viktor Petrovich （Moscow）

Danilova, Natalia Stepanovna （Moscow）

Danilovich, Liia Iakovlevna （Perm）

Darvina, Anna Andreyevna （Norilsk）

Davydova, Inna Pavlovna （Voronezh）

Delibash, Elizavet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Dmitrenko, Irina Aleksandrovna （Norilsk）

Dmitruk, Stepan Kuzmich （Norilsk）

Dmitruk, Vasilina Korneyevna （Norilsk）

Dobrovolskaia, Ella Dmitrievna （Moscow）

Dombrovskaia, Elena Petrovna （Moscow）

Drozdov, Boris Pavlovich （Moscow）

Dudareva, Gali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Eisenberg, Vera Ignatevna （Kolpino）

Eliashova, Liudmila Leonidovna （St Petersburg）

Eliashova, Marksena Leonidovna （St Petersburg）

Ender, Zoia Borisovna （Rome, Italy）

Epshtein, Mark Borisovich （St Petersburg）

Erofeev, Andrei Vladimirovich （Moscow）

Erofeev, Viktor Vladimirovich （Moscow）

Feofilaktova, Ni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Filimonova, Larisa Fyodorovna （St Petersburg）

Filippova, Kir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Fomin, Vladimir Leonidovich （St Petersburg）

Fursei, Georgii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Gabaeva, Natalia Sergeyevna （St Petersburg）

Galchinskaia, Liudmil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Galitsky, Pavel Kalinikovich （St Petersburg）

Garmash, Larisa Danilovna （Moscow）

Garmash, Vitalii Ivanovich （Moscow）

Gavrilov, Boris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Genishta, Vladimir Sergeyevich （Novosibirsk）

Genishta, Yevgeny Sergeyevich （Moscow）

Gernet, Gali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Glazova, Margarit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Godes, Anri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Goldevskaia, Yekateri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Goldobin, Andrei Borisovich （St Petersburg）

Golovanova, Genrietta Ivanovna （Severodvinsk）

Golovko, Semyon Georgievich （Norilsk）

Golovnia, Oksana Anatolevna （Moscow）

Golovnia, Yevgeniia Viktorovna （Moscow）

Golubiatnikova, Natalia Nikolaevna （Norilsk）

Goncharov, Yevgeny Yefimovich （Norilsk）

Goncharova, Klavdiia （Moscow）

Gorbach, Larisa Fyodorovna （Perm）

Gordon, Marianna Lvovna （St Petersburg）

Gorshkova, Tamara Filippovna （Perm）

Gotman, Rudolf Gotlibovich （Perm）

Gremiakina, Antonina Dmitrevna （Krasnokamsk）

Gribelnaia, N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Grigoreva, Natalia Vasilevna （Moscow）

Gukovsky, Maksim Stepanovich （Voronezh）

Gurevich, Sergei Grigorevich （St Petersburg）

Gurova, Irina Gavrilovna （Moscow）

Iablokov, Iurii Yevgenevich （Moscow）

Iakovlev, Gennady Ilarionovich （Usole）

Iakovlev, Mikhail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Iakovleva, Lelita Andreyevna （Adler, Krasnodar region）

Iakovleva, N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Iakubovich, Vladimir Andreyevich （St Petersburg）

Ianchevskaia, Maria Leopoldovna （St Petersburg）

Ianin, Vladimir Andreyevich （Moscow）

Ianovich, Elen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Iashkov, Anatoly Vasilevich （St Petersburg）

Iaskina, Olga Ivanovna （Norilsk）

Iazykov,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Moscow）

Ibragim-Zade, Dilara Ibragimovna （Moscow）

Ilina, Inna Vasilevna （Moscow）

Ilina, Liana Lvovna （St Petersburg）

Iodis, Praskovia Andreyevna （Norilsk）

Iurasovsky, Aleksei Mikhailovich （Moscow）

Iushkevich, Mikhail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Iusipenko, Mikhail Terentevich （Akmolinsk）

Iusopova, Antonina Samsonovna （Krasnokamsk）

Ivanishcheva, Sofia Nikolaevna （Krasnokamsk）

Ivanov, Aleksei Petrovich （Voronezh）

Ivanov, Sergei Borisovich （Tambov）

Ivanova, Margarit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Ivanova, Mari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Ivanova, Olga Stepanovna （St Petersburg）

Ivanova, Tatia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Kagner, Irina Borisovna （Moscow）

Kalnina, Maia Konstantinovna （St Petersburg）

Kanepei, Elena Vasilevna （Yeisk, Krasnodar region）

Kasatkina, Lydia Dmitrevna （Perm）

Kashin, Boris Romanovich （Perm）

Kashtanov, Aleksei Mikhailovich （Penza）

Kasimova, Sanie Isliamovna （Berezniki）

Katseilidi, Vera Dmitrevna （Krasnokamsk）

Katseilidi, Yekaterina Dmitrevna （Krasnokamsk）

Kavelina, Olga Aleksandrovna （Moscow）

Kazakova, Zoia Pavlovna （Perm）

Kem, Vilgelmina Ivanovna （Usole）

Kharitonova, Ella Ilinichna （St Petersburg）

Khlystova, Svetlana Veniaminovna （Perm）

Kiselyova, Yevgeniia Konstantinovna （Moscow）

Kleimenova, Zoia Izrailevna （Moscow）

Kofman, Maia Lazarevna （Moscow）

Kogan, Rebekka （Rita） Samoilovna（St Petersburg）

Kolla, Galina Nikolaevna （Perm）

Kollakova, Julia Vasilevna （Moscow）

Kollang, Rene Almarovich （St Petersburg）

Kolobkov, Viacheslav Petrovich （St Petersburg）

Koltsova, Laur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Kondratenko, Di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Kondrateva, Adalina Veniaminovna （Moscow）

Konstantinova, Elena Aleksandrovna（Petrozavodsk）

Konstantinova, Natali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Korchagin, Ivan Petrovich （Karaganda）

Korsakov, Vladimir Georgievich （St Petersburg）

Kosaryov, Vladimir Valentinovich （St Petersburg）

Kosheleva, Galin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Kovach, Nikolai Ivanovich （Yeisk, Krasnodar region）

Kozhin, Viktor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Kozmina, Oksana Yevdokimovna （Moscow）

Kozyrev, Aleksandr Nikolaevich （St Petersburg）

Kraeva, Klara Maksimovna （Perm）

Kraevsky, Karl Borisovich （Moscow）

Krasilnikov, Grigorii Pavlovich （Krasnokamsk）

Krasnova, Elen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Krasnova, Elen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Krasovitov, Mikhail Gavrilovich （Krasnokamsk）

Krauze, Elena Fridrikhovna （Moscow）

Kreines, Natalia Mikhailovna （Moscow）

Krivulina, Julia Aleksandrovna （Ufa）

Kropotina, Valentina Andreyevna （Perm）

Kruglova, Tatiana Sergeyevna （Moscow）

Krutilova, Larisa Solomonovna （St Petersburg）

Krylov, Nikolai Arkhipovich （Perm）

Krylova, Irma Adolfovna （St Petersburg）

Krylova, Valentina Ivanovna （Perm）

Kulak, Lydi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Kurko, Nadezhda Adolfovna （St Petersburg）

Kurochkina, Olga Aleksandrovna （Perm）

Kuznetsov, Anatoly Pavlovich （Perm）

Kuznetsova, Julia Nikolaevna （Perm）

Kuznetsova, Maria Ilinichna （Moscow）

Kuznetsova, Tatiana Borisovna （St Petersburg）

Lapchev, Vasily Stepanovich （Perm）

Lapko, Laris Ivanovich （Gaiva）

Lapko, Rem Ivanovich （Yekaterinburg）

Lapko, Stanislav Ivanovich （Krasnokamsk）

Lapko, Stanislav Ivanovich （Perm）

Larionov, Maksim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Larkov, Sergei Alekseyevich （Moscow）

Laskina, Fania Samoilovna （Moscow）

Lazarev, Lazar Ilich （Moscow）

Lazareva, Valentina Grigorevna （Krasnokamsk）

Lazareva, Zoia Grigorevna （Krasnokamsk）

Lebedeva, Nadezhda Mikhailovna （St Petersburg）

Lebedeva-Epshtein, Tatiana Valerevna （Moscow）

Leshchukova, Maria Ivanovna （Usole）

Leven, Leonid Petrovich （St Petersburg）

Levidova, Ada Lvovna （St Petersburg）

Levin, Valerii Pavlovich （Moscow）

Levina, Nina Pavlovna （Krasnoiarsk）

Levitina, Bell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Liberman, Irina Solomonovna （St Petersburg）

Likhachyov, Sergei Ivanovich （Penza）

Lileyev, Nikolai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Liubavskaia, Mell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Liubich, Olga Aleksandrovna （Moscow）

Liverovskaia, Olga Alekseyevna （St Petersburg）

Lobachev, Vladimir Mikhailovich （Moscow）

Lomakin, Iurii Mikhailovich （Tambov）

Lopatin, Roman Aleksandrovich （Stavropol）

Lorentsson, Lilia Vikinitevna （Perm）

Loshkareva, Taisia Grigorevna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Loviagina, Polina Nikiforovna （Perm）

Lukomsky, Georgii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Makhnach, Leonid Vladimirovich （Moscow）

Makridin, Vasily Platonovich （St Petersburg）

Maksimov, Vladimir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Malakhovskaia, Terezia Valerianovna（St Petersburg）

Malanichev, Nikolai Ivanovich （Krasnokamsk）

Margulin, Valentin Mikhailovich （St Petersburg）

Markelova, Galina Georgievna （St Petersburg）

Martinelli, Elena Arvidovna （St Petersburg）

Medvedeva, Marina Sergeyevna （Moscow）

Melnikova, Tsetsiliia Vladimirovna （Cologne, Germany）

Meshalkin, Nikolai Ivanovich （Perm）

Meshalkina, Elfrida Gotlibovna （Perm）

Mezentseva, Klara Isaakovna （St Petersburg）

Miftakhov, Tolgat Latfyllinoch （Krasnokamsk）

Miftakhova, Asia Sadykova （Krasnokamsk）

Mikhailov, Valentin Mikhailovich （Tambov）

Mikhailova, Nadezhda Nikolaeva （Moscow）

Mikheladze, Vakhtang Yevgenevich （Moscow）

Mikova, Nina Grigorevna （Usole）

Mikueva, Irina Ilinichna （Perm）

Mikueva, Tamara Nikolaevna （Stavropol）

Mikuevich, Anatoly Pavlovich （Voronezh）

Mileiko, Vitalii Bronislavovich （St Petersburg）

Milkevich, Vladimir Vilkentivich （Berezniki）

Minusova, Vera Viktorovna （Perm）

Mitina, Valentina Nazarovna （Moscow）

Moiseyenko, Yevgeniia Mitrofanovna （Moscow）

Moiseyeva, Antonina Mikhailovna （Perm）

Molotkov, Lev Vladimirovich （St Petersburg）

Monko, Ianina Davydovna （Moscow）

Morozov, Nikita Fyodorovich （St Petersburg）

Mukhina, Nina Nikolaeva （Perm）

Muravnik, Leonid Iakovlevich （Moscow）

Muravsky, Valentin Tikhonovich （St Petersburg）

Muravsky, Vladimir Valentinovich （St Petersburg）

Nardina, Zoia Iakovlevna （Norilsk）

Nemishchenko, Galina Parfenevna （Moscow）

Netto, Lev Aleksandrovich （Moscow）

Neverova, Nina Vasilevna （Usole）

Nevskaia, Veronika Aleksandrovna（St Petersburg）

Nikiforova, Marksena Mikhailovna（St Petersburg）

Norkina, Maia Nikolaevna （Moscow）

Noskova, Tatiana Aleksandrovna （Perm）

Novikova, Minora Zinovevna （Moscow）

Novoseltseva, Roza Aleksandrovna （Moscow）

Obst, Elizaveta Iosifovna （Norilsk）

Orlova, Yekaterina Aleksandrovna （St Petersburg）

Osipov, Pavel Aleksandrovich （Orel, Usole district）

Ostasheva, Larisa Sergeyevna （Moscow）

Ovchinnikova, Nadezhda Ignatevna（St Petersburg）

Ozemblovskaia, Sofia Aleksandrovna （Perm）

Paches, Nikolai Ivanovich （Perm）

Paduchikh, Lydia Andreyeva （Orel, Usole district）

Panova, Non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Paramonova, Margarit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Paramonova, Nin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Pavlovich, Aleksandr Georgievich （Moscow）

Perepechenko, Elizaveta Dmitrievna （Moscow）

Petrova, Galina Ivanovna （Strugi Krasnye）

Petrovich, Valentina Iakovlevna （Perm）

Piatnitsky, Vladimir Iosifovich （St Petersburg）

Pikulova, Anastasia Nikolaevna （Perm）

Pishchalnikova, Aleksandra Gavrilovna （Moscow）

Pleskina, Anastasia Gavrilovna （Krasnokamsk）

Poloz, Rada Mikhailovna （Moscow）

Ponomaryov, Nikolai Iakovlevich （Usole）

Popkova, Linda Emmanuilova （Usole）

Potapova, Nona Petrovna （Perm）

Potapova, Olga Mikhailovna （Petrozavodsk）

Potter, Nadezhd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Pristupa, Vera Ignatevna （Norilsk）

Proskurina, Marina Semyonovna （Krasnokamsk）

Pukhova, Lydia Aleksandrovna （St Petersburg）

Radzevsky, Nikolai Semyonovich （Krasnokamsk）

Ragozina, Nadezhda Nikolaeva （Perm）

Ramenskaia, Olga Ivanovna （Strugi Krasnye）

Reifshneider, Ninel Kirillovna （Moscow）

Remchuk, Olga Grigorevna （Norilsk）

Riabova, Tamara Nikolaevna （Perm）

Riabtseva, Tatia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Riabushinsky, Mikhail Petrovich （Stavropol）

Rimm, Eduard Robertovich （Perm）

Rodak, Maia Isaakovna （Moscow）

Roginsky, Martyn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Romanov, Sergei Dmitrievich （Krasnokamsk）

Romanova, Natalia Ivanova （Krasnokamsk）

Romashkin, Mstislav Antonovich （Penza）

Romashkin, Vasily Feoktistovich （Norilsk）

Rozonovskaia, Svetlana Leonidovna（St Petersburg）

Sakulina, Ella Iakovlevna （Perm）

Saltykov, Leonid Konstantinovich （Perm）

Samieva, Inessa Petrovna （Pushkino）

Samsonov, Gennady Mikhailovich （Stavropol）

Sazhnov, Igor Natanovich （Norilsk）

Sazhnova, Nina Petrova （Saratov）

Sedukhina, Inessa Mikhailovna （Perm）

Selezneva, Vera Petrovna （Krasnokamsk）

Serbin, Semyon Semyonovich （Usole）

Serpokril, Nina Vasilevna （St Petersburg）

Shabrova, Iia Ivanovna （Moscow）

Shangina, Tatiana Mstislavovna （St Petersburg）

Shchegoleva, Yevgeniia Sergeyevna （Usole）

Shcherbakova, Emiliia Aleksandrovna （Perm）

Shchukina, Klavdiia Pavlovna （Perm）

Shchurenkova, Vera Anatolevna （Moscow）

Shenshina, Inna Yevgenevna （Perm）

Shikheyeva, Inna Aronovna （Moscow）

Shirkunova, Aleksandra Romanovna（Krasnokamsk）

Shirokikh, Pyotr Grigorevich （Perm）

Shishkina, Emma Ivanovna （Usole）

Shliapnikova, Klara Konstantinova（Krasnokamsk）

Shmelyov, Boris Vasilevich （St Petersburg）

Shtakelberg, Iurii Ivanovich （St Petersburg）

Shtein, Galina Aleksandrovna （Kirishi, Leningrad district）

Shumatov, Aleksandr Petrovich （Perm）

Shumilo, Vera Ivanovna （Norilsk）

Shumovsky, Teodor Abramovich （St Petersburg）

Shuvalova, Elena Vladimirovna （St Petersburg）

Shvartsvald-Khmyznikova, Elena Pavlovna（St Petersburg）

Shvartsvald-Khmyznikova, Konstantin Pavlovich（St Petersburg）

Shweitser, Viktoriia （Moscow）

Simonov, Aleksei Kirillovich （Moscow）

Simonova, Anna Iosifovna （St Petersburg）

Simonova, Maria Kirillovna （Moscow）

Simonova, Tatiana Petrovna （Krasnokamsk）

Sirman, Anzhelika Alekseyevna （St Petersburg）

Siuz-sin-Nian, Boris Ivanovich （Moscow）

Skachkova, Aleksandra Petrovna （Moscow）

Skachkova, Varvar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Skanchenko, Nadezhda Ivanovna （Moscow）

Skorobogatov, Mikhail Mikhailovich （Perm）

Skripnik, Marta Ivanovna （Moscow）

Slanskaia, Veronika Petrovna （St Petersburg）

Slavina, Ida Ilinichna （Cologne, Germany）

Smelskaia, Valentina Stepanovna （St Petersburg）

Smirnova, Yevgeniia Vladimirovna （Moscow）

Soboleva, Nina Aleksandrovna （Perm）

Sorokina, Yekaterina Nikolaevna （Usole）

Stepanova, Antonina Fyodorovna （Perm）

Stepantseva, Natalia Ilinichna （Perm）

Stogova, Alla Aleksandrovna （Moscow）

Stogova, Liubov Ivanovna （Moscow）

Streletsky, Dmitry Nikolaevich （Perm）

Streletsky, Iurii Sergeyevich （St Petersburg）

Striapunin, Vasily Nikolaevich （Krasnokamsk）

Sukhobaevsky, Igor Iurevich （Norilsk）

Sushentseva, Liudmila Vasilevna （Perm）

Suutarinen, Khugo Ivanovich （Shemeinyi, Usole district）

Suvorov, Artur Mikhailovich （Moscow）

Suvorova, Diana Mikhailovna （Moscow）

Suvorova, Elizaveta Petrovna （Usole）

Svetlov, Iurii Valentinovich （Moscow）

Taisina, Rezeda Shamsuvalievna （Perm）

Tamanov, Boris Borisovich （Voronezh）

Tarasova, Nina Fyodorovna （Krasnokamsk）

Tell, Vilgelm Tosifovich （Moscow）

Tetiueva, Liubov Aleksandrovna （Perm）

Tikhanova, Valentina Aleksandrovna （Moscow）

Tikhantovskaia, Margarita Vasilevna （Perm）

Tikhomirov, Sergei Aleksandrovich（St Petersburg）

Tikhomirova, Elvina Georgievna （Perm）

Timofeyeva, Zoia Andreyevna （St Petersburg）

Titorenko, Nikita Stepanovich （Voronezh）

Tokmacheva, Yevgenii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Torchinskaia, Elga Grigorevna （St Petersburg）

Treimanis, Maria Aleksandrovna （Norilsk）

Trofimova, Galina Yevgenevna （St Petersburg）

Tronina, Anna Ivanovna （Perm）

Tropina, Sofia Mikhailovna （Kolpino）

Trubina, Tamara Konstantinovna （Perm）

Turkina, Vera Aleksandrovna （Perm）

Uglitskikh, Ivan Ivanovich （Krasnokamsk）

Usanina, Valeriia Viktorovna （Perm）

Vangengeim, Eleonora Alekseyevna （Moscow）

Vasileva, Tatian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asileva,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asileva-Ruzova, Tatiana Sergeyevna（St Petersburg）

Vasiltseva, Vera Ivanovna （Perm）

Veber, Nina Vasilevna （Moscow）

Veksler, Arkadii Favishevich （St Petersburg）

Verzakova, Liudmila Nikolaevna （Krasnokamsk）

Vikhrova, Aleksandra Antonovna （Norilsk）

Vilensky, Nikolai Alekseyevich （Moscow）

Vinogradov, Iurii Abramovich （St Petersburg）

Violina, Lydia Mikhailovna （Moscow）

Vishniakova, Angelina Dmitrevna （Perm）

Vitkevich, Maria Ivanovna （St Petersburg）

Vittenburg,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Vlasov,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Volkonskaia, Elena （Cettona, Italy）

Volkov, Sergei Aleksandrovich （St Petersburg）

Volkova, Julia Mikhailovna （Moscow）

Volynets, Viktor Flegontovich （St Petersburg）

Vorobyov, Aleksei Mikhailovich （Moscow）

Vorovsky, Semyon Leonidovich （Moscow）

Yefremova, Nina Aleksandrovna （Perm）

Yegorovna, Vera Nikolaevna （Usole）

Yelsukova, Liudmila Anatolevna （Perm）

Yevangulova, Yevgeniia Pavlovna （St Petersburg）

Yevgenova, Irina Nikolaevna （St Petersburg）

Zagurskaia, Lilia Grigorevna （Moscow）

Zagurskaia, Tamara Grigorevna （Moscow）

Zaletaeva, Avgusta Pavlovna （Krasnokamsk）

Zavadskaia, Olga Sergeyevna （Irkutsk）

Zelenina, Nina Ignatevna （Perm）

Zelenina, Valentina Abramovna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Zeziulina, Anna Leonidovna （Perm）

Zhuravleva, Margarita Udovna （St Petersburg）

Zimniaia, Irina Nikolaevna （Moscow）

Znamenskaia, Antonina Nikolaevna（St Petersburg）

Zorin, Ilia Mikhailovich （Romanovo, Usole district）

[[1]](#_1_33) 標注“ \* ”意為引自紀念檔案館的所有材料，都是本書研究項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們中的大部分，可在網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細節。

[[2]](#_2_33) 標注“ \* ”意為引自紀念檔案館的所有材料，都是本書研究項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們中的大部分，可在網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細節。

[[3]](#_3_30) 標注“ \* ”意為引自紀念檔案館的所有材料，都是本書研究項目所收集和整理的。它們中的大部分，可在網站http://www.orlandofiges.com中找到更多的細節。

# [譯名對照表]

A

阿巴坎城，Abakan

阿達·列韋多娃，Ada levidova

阿德里安·馬克多諾夫，Adrian Makedonov

阿爾巴特地區 Arbat

阿爾伯特·里希特，Albert Rikhter

阿爾漢格爾斯克城，Arkhangelsk

阿爾季斯公司，Ardis

阿爾捷克，Artek

阿爾卡季·蓋達爾，Arkadii Gaidar

阿爾卡季·曼科夫，Arkadii Mankov

阿爾圖寧，Altunin

阿爾扎馬斯城，Arzamas

阿夫拉姆·扎韋尼亞金，Avraam Zaveniagin

阿夫納西婭·博托娃，Afanasia Botova

阿克巴什村，Akbash

阿克―布拉克，AK-Bulak

阿克莫林斯克，Akmolinsk

阿克斯，Agasi

阿拉，Alla

阿拉格維格魯吉亞餐館，Aragvi Georgian restaurant

阿利娜·多布列卡娃，Alina Dobriakova

阿利西婭，Alisia

阿廖娜·科茲羅娃，Alyona Kozlova

阿廖努什卡（艾萊娜），Alyonushka

阿廖沙，Alyosha

阿列克謝·奧科洛科夫，Aleksei Okorokovs

阿列克謝·巴別茨基，Aleksei Babitsky

阿列克謝·戈洛溫，Aleksei Golovin

阿列克謝·哈內耶夫斯基，Aleksei Khaneyevsky

阿列克謝·季茨克蘭，Aleksei Ditsklan

阿列克謝·柯西金，Aleksei Kosygin

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Aleksei Kuznetsov

阿列克謝·拉達琴科，Aleksei Radchenko

阿列克謝·帕申科夫（高爾基），Aleksei Peshkov

阿列克謝·潘捷列耶夫，Aleksei Panteleyev

阿列克謝·什馬利諾夫，Aleksei Schmarinov

阿列克謝·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

阿列克謝·蘇爾科夫，Aleksei Surkov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Aleksei Tolstoy

阿列克謝·西蒙諾夫，Aleksei Simonov

阿列克謝·葉夫謝耶夫，Aleksei Yevseyev

阿列克謝·尤拉索夫斯基，Aleksei Iurasovsky

阿林卡，Alinka

阿隆·蓋斯特，Aron Gaister

阿隆·索爾茨，Aron Solts

阿穆爾，Amur

阿納帕，Anapa

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ian

阿納斯塔西婭·福爾瑟，Anastasia Fursei

阿納托利·戈爾巴塔夫，Anatoly Gorbatov

阿納托利·戈洛夫尼亞，Anatoly Golovnia

阿納托利·戈洛溫，Anatoly Golovin

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

阿納托利·梅蘇諾夫，Anatoly Mesunov

阿納托利·尼基京，Anatoly Nikitin

阿納托利·索夫羅諾夫，Anatoly Sofronov

阿納托利·謝羅夫，Anatoly Serov

阿納托利·朱可夫，Anatoly Zhukov

阿斯多里亞酒店，Astoriia Hotel

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阿希諾戈諾夫，Afinogenov

埃爾弗拉達·戈特曼，Elfrida Gotman

埃爾弗拉達·梅沙爾金娜，Elfrida Meshalkina

埃爾加·托爾欽斯卡婭，Elga Torchinskaia

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埃莉諾拉，Eleonora

埃斯菲莉·法因施泰因，Esfir Fainshtein

艾別克·巴拉托夫，Aibek Baratov

艾哈梅特夫，Akhmetev

艾萊娜·巴伊格羅娃，Elena Baigulova

艾萊娜·邦納，Elena Bonner

艾萊娜·彼得羅夫娜，Elena Petrovna

艾萊娜·布爾加科娃，Elena Bulgakova

艾萊娜·康斯坦丁諾娃，Elena Konstantinova

艾萊娜·列別杰娃，Elena Lebedeva

艾萊娜·莫伊謝耶夫娜·阿別孜高茲，Elena Moiseyevna Abezgauz

艾萊娜·切爾卡索娃，Elena Cherkesova

艾萊娜·舒瓦洛娃，Elena Shuvalova

艾萊娜·斯卡列科娃，Elena Skriakova

艾萊娜·沃爾孔斯卡婭，Elena Volkonskaia

艾倫·吉利蘭，Alan Gilliland

艾瑪·畢阿，Emma Beer

艾瑪·格施泰因，Emma Gershtein

艾斯蒙德，N. B. Eismont

愛德華·別爾津，Eduard Berzin

愛德華·薩利，Eduard Salyn

愛麗絲，Alice

安德烈·博布羅夫，Andrei Bobrov

安德烈·格里加洛夫，Andrei Grigorev

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Andrei Grebenshchikov

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安德烈·梅德韋杰夫，Andrei Medvedev

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

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

安德烈·斯塔羅斯金，Andrei Starostin

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iavsky

安德烈·葉羅費耶夫，Andrei Erofeev

安東，Anton

安東尼娜·W. 布易斯，Antonina W. Bouis

安東尼娜·戈洛溫娜，Antonina Golovina

安東尼娜·馬茲娜，Antonina Mazina

安東尼娜·莫伊謝耶娃，Antonina Moiseyeva

安東尼娜·茲納緬卡婭，Antonina Znamenskaia

安東諾夫元帥，Marshal Antonov

安吉麗娜·布舒耶娃，Angelina Bushueva

安吉麗娜·葉夫謝耶娃，Angelina Yevseyeva

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

安娜·達爾維娜，Anna Darvina

安娜·杜博娃，Anna Dubova

安娜·卡爾皮茨卡婭，Anna Karpitskaia

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

安娜·利伯曼，Anna Liberman

安娜·謝苗諾娃，Anna Semyonova

安努沙卡，Annushka

安熱莉卡·西爾曼，Anzhelika Sirman

安雅，Anya

敖德薩，Oddessey

奧博連斯基，Obolensky

奧博連斯卡婭，Obolenskaia

奧布霍沃，Obukhovo

奧布洛夫卡村，Oblovka

奧爾戈諾，Olgino

奧爾沙，Orsha

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

奧克薩娜·戈洛夫尼亞，Oksana Golovnia

奧庫德扎亞，Okudzhava

奧勒什科韋齊，Oreshkovichi

奧莉加·阿達莫娃―斯柳茲貝格，Olga Adamova-Sliuzberg

奧莉加·貝戈爾茲，Olga Berggolts

奧莉加·比金娜，Olga Binkina

奧莉加·弗拉索娃，Olga Vlasova

奧莉加·福雷登貝格，Olga Freidenberg

奧莉加·拉緬斯卡婭，Olga Ramenskaia

奧莉加·洛巴切娃，Olga Lobacheva

奧莉加·洛普提娜―愛潑斯坦，Olga Loputina-Epshtein

奧莉加·伊亞斯基娜，Olga Iaskina

奧莉加·扎普里加耶娃，Olga Zapregaeva

奧廖爾，Orel

奧列格·柳波琴科，Oleg Liubchenko

奧列格·沃羅比約夫，Oleg Vorobyov

奧列霍沃―祖耶沃鎮，Orekhovo-Zuevo

奧列斯特·馬爾采夫，Orest Maltsev

奧倫堡，Orenburg

奧帕里諾鎮，Oparino

奧熱姆伯羅斯基，Ozemblovsky

奧薩鎮，Osa

奧索爾金，Osorgin

奧西波韋齊鎮，Osipovichi

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

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皮亞特尼察），Osip Piatnitsky（Piatnitsa）

B

巴比雅，Babi Yar

巴爾達，Barda

巴爾瑙爾，Barnaul

巴甫洛·狄青納，Pavlo Tychina

巴庫，Baku

巴拉巴村，Baraba

巴拉瑟夫，Balashov

巴姆拉戈勞改營，Bamlag camp

巴斯瑪奇穆斯林起義，Basmachi Muslim rebels

巴塔尼婭，Batania

巴塔伊斯克，Bataisk

白海運河，White Sea Canal

鮑里斯·愛潑斯坦，Boris Epshtein

鮑里斯·巴別茨基，Boris Babitsky

鮑里斯·波澤恩（鮑里亞叔叔），Boris Pozern

鮑里斯·德羅茲多夫，Boris Drozdov

鮑里斯·戈爾巴塔夫，Boris Gorbatov

鮑里斯·加夫里洛夫，Boris Gavrilov

鮑里斯·卡辛，Boris Kashin

鮑里斯·科龍涅茨基，Boris Kolonitsky

鮑里斯·拉斯金，Boris Kashin

鮑里斯·莫洛特科夫，Boris Molotkov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鮑里斯·斯捷潘諾維奇，Boris Stepanovich

鮑里斯·斯勒茨基，Boris Slutsky

鮑里斯·約翰遜，Boris Ioganson

鮑里索夫城，Borisov

鮑里索格列布斯克，Borisoglebsk

北地群島，Severnaia Zemlia.

貝爾巴伊特拉戈勞改營，Belbaltlag

貝爾塔·安希娜，Berta Anshina

貝加爾―阿穆爾鐵路，Baikal–Amur railway

貝拉·列維蒂娜，Bella Levitina

貝伊戈爾，Beigel

奔薩城，Penza

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

比金，Bikin

彼得·波塔波夫，Pyotr Potapov

彼得·列斯蓋夫特，Pyotr Lesgaft

彼得·涅澤夫茨夫，Pyotr Nizovtsev

彼得·帕爾琴斯基，Pyotr Palchinsky

彼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yotr Preobrazhensky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Petropavlovsk-Kamchatsky

彼得羅扎沃茨克，Petrozavodsk

彼爾姆，Perm

波德博洛熱地區，Podporozhe

波多利斯克，Podolsk

波爾塔瓦，Poltava

波克洛夫斯科耶，Pokrovskoye

波利娜·奧西佩科，Polina Osipenko

波利亞，Polya

波羅沃耶地區，Borovoe

波洛維克（瓦倫蒂娜·謝羅娃的烏克蘭姓），Polovyk

波洛維克娃（瓦倫蒂娜·謝羅娃的俄羅斯姓），Polovikova

波日瓦，Pozhva

波特馬勞改營，Potma camps

博洛特納亞廣場，Bolotnaia Square

布拉特·奧庫德扎亞，Bulat Okudzhava

布利乳酪，Brie

布良斯克，Briansk

布恰，Bucha

布提爾基監獄，Butyrki jail

德羅寧，Dronin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將軍，General Dmitry Pavlov

德米特里·富爾曼諾夫，Dmitry Furmanov

德米特里·戈洛夫尼亞，Dmitry Golovnia

德米特里·米爾斯基，Dmitry Mirsky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茲基，Dmitry Streletsky

德米特里·韋涅維季諾夫，Dmitry Venivitinov

德米特里·維特科夫斯基，Dmitry Vitkovsky

德溫斯克地區，Dvinsk

鄧尼金，Denikin

狄娜·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Dina Ielson-Grodzianskaia

第比利斯，Tbilisi

第內伯羅斯特羅伊，Dneprostroi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sk

第五縱隊，fifth column

蒂賓根，Tübingen

蒂拉斯波爾城，Tiraspol

蒂娜，Tina

杜伯洛沃村，Dubrovo

杜博夫，Dubov

杜金卡，Dudinka

杜西婭（法尼婭·塞繆羅夫娜），Dusia

短蓋軍帽，short-peaked cap

頓巴斯，Donbass

頓涅茨河，Donets River

多林卡鎮，Dolinka

E

C

采采利婭·博布羅夫斯卡婭，Tsetsiliia Bobrovskaia

岑特拉爾尼―魯德尼克，Tsentralnyi Rudnik

車里雅賓斯克，Cheliabinsk

重新做人，reforging（perekovka）

茨韋特梅塔夫托馬蒂卡實驗室，Tsvetmetavtomatika Laboratories

俄羅斯軍事總盟，Russian General Military Union

（ROVS）

鄂木斯克，Omsk

恩斯特·扎伊德勒，Ernst Zaidler

兒童之家，children’s home

F

D

達拉戈古拉格綜合企業，Dallag Gulag complex

達麗婭·拉斯金娜，Daria Laskina

達麗婭·塞繆羅夫娜，Daria Samuilovna

達尼拉，Danila

達尼洛夫修道院，Danilov Monastery

大衛·奧滕貝格，David Ortenburg

大衛·薩莫伊洛夫，David Samoilov

大衛·沃森，David Watson

大衛·扎斯拉夫斯基，David Zaslavsky

大轉變，the Great Break

丹尼爾·畢阿，Daniel Beer

丹尼爾·皮克，Daniel Pick

當代建筑師聯盟，Un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s

德博拉·羅杰斯，Deborah Rogers

法尼婭·拉斯金娜，Fania Laskina

法尼婭·塞繆羅夫娜，Fania Samuilovna

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Filippovsky bakery

菲利浦·巴扎諾夫，Filipp Bazanov

費奧多爾·阿利魯耶夫，Fyodor Alliluev

費奧多爾·艾希曼斯，Fyodor Eikhmans

費奧多爾·革拉特珂夫，Fyodor Gladkov

費奧多爾·斯米爾諾夫，Fyodor Smirnov

費奧多爾措沃村，Fyodortsovo

費奧多西婭，Feodosia

費奧克蒂斯塔，Feoktista

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

Feliks Eduardovich

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

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

弗拉基米爾·奧布羅切夫，Vladimir Obruchev

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Vladimir Orlov

弗拉基米爾·布舒耶夫，Vladimir Bushuev

弗拉基米爾·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

弗拉基米爾·弗拉索夫（濟科爾），

Vladimir Vlasov （Zikkel）

弗拉基米爾·福明，Vladimir Fomin

弗拉基米爾·格羅莫夫，Vladimir Gromov

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Vladimir Kornilov

弗拉基米爾·科薩科夫，Vladimir Korsakov

弗拉基米爾·克羅日科夫，Vladimir

弗拉基米爾·盧戈夫斯科伊，Vladimir Lugovskoi

弗拉基米爾·馬赫納茨，Vladimir Makhnach

弗拉基米爾·馬特維耶夫，Vladimir Matveyev

弗拉基米爾·皮亞特尼茨基，Vladimir Piatnitsky

弗拉基米爾·斯塔夫斯基，Vladimir Stavsky

弗拉基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Vladimir Ilich

弗拉基米爾·伊耶寧，Vladimir Ianin

弗拉斯·丘巴爾，Vlas Chubar

弗里德里希·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

弗魯扎·馬蒂內利，Fruza Martinelli

弗羅斯特叔叔，Uncle Frost

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

弗謝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

弗謝沃洛德·維什涅夫斯基，Vsevolod Vishnevsky

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Vsevolod Ivanov

伏龍芝軍事學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Vladivostok

富農，kulak Gertrud Ielson-Grodzianskaia

共用公寓，communal apartment

古比雪夫，Kuibyshev

古爾里普希村，Gulripshi

古爾契拉·塔吉羅娃， Gulchira Tagirova

古爾維奇，Gurvich

古連卡（葉夫根尼婭），Gulenka

光之城，Town of Light

國際工人救災電影廠，Mezhrabpomfilm

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

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

過濾營，filtration camp

H

G

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

哈爾科夫，Kharkov

哈卡斯自治州，Khakasin

哈勒欣河，Khalkin Gol River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

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

哈恰圖良，Khachaturian

哈娃·沃洛維奇，Hava Volovich

河堤大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

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

赫爾岑宮殿，Herzen palace

赫爾松城，Kherson

赫爾辛福斯（赫爾辛基），Helsingfors（Helsinki）

紅色教授學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

高爾察克，Kolchak

戈爾拉格監獄，Gorlag prison

戈羅霍娃街，Gorokhovaia Street

戈梅利，Gomel

格奧爾基·愛德華多維奇，Georgii Eduardovich

格奧爾基·福爾瑟，Georgii Fursei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格奧爾基·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

格奧爾基·皮亞特科夫，Georgii Piatakov

格奧爾基·亞歷山德羅夫，Georgii Aleksandrov

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ii Zhukov

格奧爾基·茲納緬斯基，Georgii Znamensky

格拉西莫夫克村，Gerasimovka

格里科·雅戈達，Genrikh Iagoda

格列勃，Gleb

格列高利·阿別孜高茲，Grigorii Abezgauz

格列高利·別雷赫，Grigorii Belykh

格列高利·羅斯金，Grigorii Roskin

格列高利·亞歷山德羅夫，Grigorii Aleksandrov

格林卡，Glinka

格魯謝，Grusha

格羅德諾城，Grodno

格特魯德·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

J

基拉，Gera

基柳雄切克，Kiriushonchik

基魯尼亞，Kirunia

基洛夫城，Kirov

吉卜林，Kipling

吉洪諾夫，Tikhonov

吉娜·格林訥，Zina Gliner

吉娜·拉祖米哈娜，Zina Razumikhina

吉娜·維滕貝格，Zina Vittenburg

季莫費·馬里安，Timofei Marian

季娜伊達·貝利科娃，Zinaida Belikova

季娜伊達·布舒耶娃，Zinaida Bushueva

季娜伊達·萊維娜，Zinaida Levina

季娜伊達·辛克維奇，Zinaida Sinkevich

季諾維也夫，Zinoviev

加爾各答，Calcutta

加里·庫珀，Gary Cooper

加林娜·阿達西斯卡婭，Galina Adasinskaia

加林娜·科舍連娃，Galina Kosheleva

加林娜·克拉夫琴科，Galina Kravchenko

加林娜·馬爾克洛娃，Galina Markelova

加林娜·佩特洛娃，Galina Petrova

加林娜·施泰因（加麗婭），Galina Shtein（Galia）

加米涅夫，Kamenev

建構派，Constructivists

建構主義運動，Constructivist movement

江布爾城，Dzhambul

杰里·庫厄伊，Jerry Kuehl

捷爾諾波爾地區，Ternopol region

捷列克蒂地區，Terekty region

捷姆尼科夫斯基勞改營，Temnikovsky camps

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K

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

喀拉海，Kara Sea

喀瑯施塔得，Kronstadt

卡蒂婭·布龍施泰因，Katia Bronshtein

卡蒂婭·布寧娜，Katia Bunina

卡蒂婭·西蒙諾娃（格魯津科），

Katia Simonova（Gudzenko）

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卡爾霍斯特鎮，Karlshorst

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Katerina Gerasimova

卡拉干達，Karaganda region

卡累利阿，Karelia

卡列林，Karelin

卡盧加城，Kaluga

卡馬河，Kama River

卡梅爾尼劇院，Kamerny Theatre

卡門培爾奶酪，Camembert

卡帕托莉娜，Kapitolina

卡特里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

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卡扎林斯克地區，Kazalinsk

凱姆鎮，Kem

凱瑟琳·梅里戴爾，Catherine Merridale

坎達拉克夏勞改營，Kandalaksha labour camp

坎斯克，Kansk

康斯坦丁·阿爾采烏洛夫，Konstantin Artseulov

康斯坦丁·科連科夫，Konstantin Korenkov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Konstantin Simonov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

科爾皮諾，Kolpino

科爾丘吉諾鎮，Kolchugino

科雷馬，Kolyma

科利亞·庫茲明，Kolia Kuzmin

科米地區，Komi region

科涅夫，Konev

科斯特羅馬，Kostroma

科特拉斯城，Kotlas

科特拉斯勞改營，Kotlas camp

克爾任采夫，Kerzhentsev

克爾扎基部落，Kerzhaki tribe

克捷萬·奧拉赫拉什維利，Ketevan Orakhelashvili

克拉夫蒂婭·阿列克謝耶娃，Klavdiia Alekseyeva

克拉夫蒂婭·科伊丘娜，Klavdiia Kolchina

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Klavdiia Rublyova

克拉夫蒂婭·亞歷山德羅夫娜，Klavdiia Aleksandrovna

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

克拉斯諾戈爾斯克，Krasnogorsk

克拉斯諾卡姆斯克，Krasnokamsk

克拉斯諾維舍爾斯克，Krasnovishersk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iarsk

克拉托沃，Kratovo

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

克里切耶夫小鎮，Krichev

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

克里沃舍伊諾村，Krivosheino

克列緬丘格城，Kremenchug

克列斯蒂監獄，Kresty

克倫斯基，Kerensky

克麥羅沃，Kemerovo

庫班，Kuban

庫爾干，Kurgan

庫爾斯克，Kursk

庫季姆卡城，Kudymkar

庫茲馬·彼得羅夫―沃德金，Kuzma Petrov-Vodkin

庫茲涅茨克，Kuznetsk

L

拉達·波洛茲，Rada Poloz

拉爾夫·帕克，Ralph Parker

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y Beria

拉赫塔小鎮，Lakhta

拉賈·旃達瓦卡，Raj Chandarvarkar

拉麗莎·加爾馬什，Larisa Garmash

拉麗莎·萊維娜，Larisa Levina

拉麗莎·扎多娃，Larisa Zhadova

拉佩夫，Lapev

拉斯普京，Rasputin

拉希爾·格里加洛夫娜，Rakhil Grigorevna

拉希爾·卡普蘭，Rakhil Kaplan

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

拉扎爾·拉扎列夫，Lazar Lazarev

萊弗爾梅信托公司，Leverhulme Trust

賴莎·奧爾洛娃，Raisa Orlova

賴莎·貝格，Raisa Berg

賴婭，Raia

勒熱夫地區，Rzhev

雷賓斯克，Rybinsk

莉利亞·布里克，Lilia Brik

莉帕·卡普蘭，Lipa Kaplan

李可夫，Rykov

里加，Riga

里賈納，Regina

里亞伯·比德爾，Riab Bindel

里亞布申斯基豪宅，Riabushinsky mansion

麗莎，Liza

麗塔·高根，Rita Kogan

利奧波德·阿韋爾巴赫，Leopold Averbakh

利達·法伊韋索維奇，Lida Faivisovich

利季婭·巴布什金娜，Lydia Babushkina

利季婭·季馬舍克，Lydia Timashuk

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Lydia Chukovskaya

利季婭·伊萬諾夫娜，Lydia Ivanovna

利翁·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

利沃夫，Lvov

利亞利亞，Lialia

梁贊，Riazan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列昂尼德·庫林，Leonid Kurin

列昂尼德·馬赫納茨，Leonid Makhnach

列昂尼德·薩爾特科夫，Leonid Saltykov

列奧·維帕林斯基，Leo Viprinski

列夫·采爾莫拉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

列夫·科佩列夫，Lev Kopelev

列夫·拉茲貢，Lev Razgon

列夫·內托，Lev Netto

列夫·普什卡廖夫，Lev Pushkarev

列夫·伊林，Lev Ilin

列福爾托沃監獄，Lefortovo prison

列瓦，Lyova

列婭列婭，Lialia

列澤達·泰西娜，Rezeda Taisina

林堡芝士，Limburger

留汀，Riutin

留汀政綱，Riutin Platform

柳芭·巴別茨卡婭，Liuba Babitskaia

柳芭·戈洛夫尼亞，Liuba Golovnia

柳芭·拉達琴科，Liuba Radchenko

柳芭·伊萬諾娃，Liuba Ivanova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Liubov （Liuba） Tetiueva

柳博芙·奧爾洛娃，Liubov Orlova

柳博芙·魯比娜，Liubov Rubina

柳博芙·沙波利娜，Liubov Shaporina

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娃，Liudamila Alekseyeva

柳德米拉·埃利亞舍娃，Liudamila Eliashova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諾娃，Liudamila Konstantinova

柳德米拉·列別杰娃，Liudamila Lebedeva

柳德米拉·泰德曼，Liudmila Tideman

柳德米拉·亞歷山德羅夫娜，Liudamila Aleksandrovna

露絲·邦納，Ruth Bonner

盧比揚卡，Lubianka

盧加鎮，Luga

魯道夫·戈特曼，Rudolf Gotman

魯法―占恩，Rufa-djan

魯卡契將軍（馬特·扎爾卡），General Lukach

魯緬采夫，I. P. Rumiantsev

倫卡，Lenka

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羅伯特·拉特波夫，Robert Latypov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

羅登貝格，Rottenberg

羅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

羅蘭·貝科夫，Rolan Bykov

羅斯托夫，Rostov

羅溫斯基，Rovinsky

羅扎·諾沃塞爾茨娃，Roza Novoseltseva

羅扎·韋托諾夫斯基，Roza Vetukhnovskaia

洛德亞，Lodia

M

馬爾庫沙·菲舍爾，Markoosha Fisher

馬戈，Margo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城，Magnitogorsk

馬加丹，Magadan

馬克斯娜·卡爾皮茨卡婭，Marksena Karpitskaia

馬克斯娜·尼基福羅娃，Marksena Nikiforova

馬克西米·泰德曼，Maximilian Tideman

馬克西姆·高爾基，Maksim Gorky

馬拉什蒂村，Malaeshty

馬拉亞―維舍拉鎮，Malaia Vishera

馬里烏波爾城，Mariupol

馬林斯克鎮，Marinsk

馬洛亞羅斯拉韋茨，Maloiaroslavets

馬尼婭，Mania

馬涅斯廣場，Manezh square

馬努斯·諾德爾曼，Manus Nudelman

馬什昌斯卡婭第一街，Meshchanskaia

馬特·扎爾卡，Mate Zalka

馬特維·伯曼，Matvei Berman

馬雅可夫斯基，Maiakovsky

馬亞·羅德克，Maia Rodak

馬亞·諾爾金娜，Maia Norkina

馬伊―古帕伐木營，Mai-Guba logging camp

瑪法·布留霍娃，Marfa Briukhova

瑪法·菲利娜，Marfa Filina

瑪格麗塔·奧列格，Margarita Aliger

瑪格麗塔·格施泰因，Margarita Gershtein

瑪麗安娜·巴爾科夫斯卡婭，Marianna Barkovskaia

瑪麗安娜·福爾瑟，Marianna Fursei

瑪麗安娜·戈登，Marianna Gordon

瑪麗亞（瑪莎）·西蒙諾娃，Maria（Masha）Simonova

瑪麗亞·布德克維奇，Maria Budkevich

瑪麗亞·德羅茲多娃，Maria Drozdova

瑪麗亞·費多羅夫娜，Maria Fyodorovna

瑪麗亞·戈洛溫娜，Maria Golovina

瑪麗亞·庫茲涅佐娃，Maria Kuznetsova

瑪麗亞·馬爾科夫娜，Maria Markovna

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瑪麗亞·涅斯捷羅娃，Maria Nesterova

瑪麗亞·喬索娃，Maria Chausova

瑪麗亞·維特克維奇，Maria Vitkevich

瑪麗亞·伊利納，Maria Ilina

瑪琳娜·巴巴克，Marina Babak

瑪琳娜·切奇涅娃，Marina Chechneva

瑪琳娜·伊萬諾娃，Marina Ivanova

邁丹尼克集中營，Maidanek

梅德韋熱戈爾斯克勞改營，Medvezhegorsk labour camp

梅爾·里德，Merle Read

梅拉，Mella

梅拉·布拉特，Mella Bulat

梅拉妮·杰克遜，Melanie Jackson

孟德爾·哈塔埃維奇，Mendel Khataevich

米爾·巴吉羅夫，M. D. Bagirov

米哈伊爾·巴伊塔爾斯基，Mikhail Baitalsky

米哈伊爾·波洛茲，Mikhail Poloz

米哈伊爾·布本諾夫，Mikhail Bubennov

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chev

米哈伊爾·格夫特，Mikhail　Gefter

米哈伊爾·古列維奇，Mikhail Gurevich

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

米哈伊爾·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

米哈伊爾·盧科寧，Mikhail Lukonin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Mikhail Mikhailovich

米哈伊爾·米羅諾夫，Mikhail Mironov

米哈伊爾·莫洛斯特沃夫，Mikhail Molostvov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夫，Mikhail Nikolaev

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Mikhail Pavlovich

米哈伊爾·普里謝維恩，Mikhail Prishvin

米哈伊爾·切列帕諾夫，Mikhail Cherepanov

米哈伊爾·施賴德爾，Mikhail Shreider

米哈伊爾·斯特羅伊科夫，Mikhail Stroikov

米哈伊爾·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

米哈伊爾·沃希切斯基，Mikhail Voshchinsky

米哈伊爾·西蒙諾夫，Mikhail Simonov

米哈伊爾·葉菲姆夫，Mikhail Yefimov

米哈伊爾·伊薩耶夫，Mikhail Isaev

米哈伊爾·尤西佩科，Mikhail Jusipenko

米哈伊爾·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

米利察·葉夫根涅夫娜，Militsa Yevgenevna

米利婭，Milia

米努辛斯克城，Minusinsk

米諾拉·諾維科娃，Minora Novikova

米特羅凡·莫伊謝延科，Mitrofan Moiseyenko

明斯克，Minsk

摩爾多瓦，Mordovia

摩爾曼斯克，Murmansk

莫吉廖夫城，Mogilyov

莫里斯·興德斯，Maurice Hindus

莫洛托夫，Molotov

莫斯科紀念學會，Moscow Memorial Society

莫托韋利哈鋼鐵廠，Motovilikha steelworks

莫伊謝·金茲伯格，Moisei Ginzburg

莫扎伊斯克，Mozhaisk

姆加鎮，Mga

N

內務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NKVD）

納夫塔利·法蘭克爾，Naftaly Frenkel

納利姆地區，Narym

納塔利婭·比安基，Natalia Bianki

納塔利婭·別吉切娃，Natalia Begicheva

納塔利婭·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

納塔利婭·季波特，Natalia Tipot

納塔利婭·加巴耶娃，Natalia Gabaeva

納塔利婭·康斯坦丁諾娃，Natalia Konstantinova

納塔利婭·列什琴科，Natalia Leshchenko

納塔利婭·馬利欣娜，Natalia Malykhina

納塔利婭·斯特凡茨娃，Natalia Stepantseva

納塔利婭·索科洛娃，Natalia Sokolova

納塔利婭·伊斯納爾，Natalia Iznar

娜杰日達·阿利盧耶娃，Nadezhda Allilueva

娜杰日達·格蘭金娜，Nadezhda Grankina

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ia

娜杰日達·馬克西莫夫，Nadezhda Maksimov

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

娜杰日達·米哈伊洛夫娜，Nadezhda Mikhailovna

娜杰日達·普霍娃，Nadezhda Pukhova

娜杰日達·斯卡奇科娃，Nadezhda Skachkova

娜塔莎·奧韋奇尼科娃，Natasha Ovchinnikova

奈莉·布舒耶娃，Nelly Bushueva

奈莉·戈爾登施泰因，Nelly Goldenshtein

尼古拉·布爾加寧，Nikolai Bulganin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尼古拉·福爾瑟，Nikolai Fursei

尼古拉·戈洛溫，Nikolai Golovin

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Kumilyov

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

尼古拉·科瓦奇，Nikolai Kovach

尼古拉·庫茲明，Nikolai Kuzmin

尼古拉·利列耶夫，Nikolai Lileyev

尼古拉·梅沙爾金，Nikolai Meshalkin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Nikolai Mikhailov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

尼古拉·薩哈羅夫，Nikolai Sakharov

尼古拉·沙查諾夫，Nikolai Sazonov

尼古拉·沃茲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

尼古拉·謝馬什科，Nikolai Semashko

尼古拉·伊萬諾夫，Nikolai Ivanov

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

尼科波爾城，Nikopol

尼科利納·戈拉，Nikolina Gora

尼娜·阿爾希波娃，Nina Arkhipova

尼娜·布拉特，Nina Bulat

尼娜·德利巴什，Nina Delibash

尼娜·費奧菲拉克托娃，Nina Feofilaktova

尼娜·戈登，Nina Gordon

尼娜·卡明斯卡婭，Nina Kaminskaia

尼娜·科斯特利娜，Nina Kosterina

尼娜·克柳耶娃，Nina Kliueva

尼娜·帕拉莫諾娃，Nina Paramonova

尼娜·恰拉赫昌，Nina Charakhchan

尼娜·維什尼亞克娃，Nina Vishniakova

尼娜·雅科夫列娃，Nina Iakovleva

尼娜·伊波利托夫娜，Nina Ippolitovna

尼涅利·賴夫施賴德爾，Ninel Reifshneider

尼亞佐夫，Niiazov

涅沃林，Nevolin

諾夫哥羅德，Novgorod

諾里爾斯克，Norilsk

切柳斯金號，the Cheliuskin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切托納，Cetona

丘索沃鎮，Chusovoe

丘伊亞諾夫，A. S. Chuianov

R

然娜·博格達諾維奇，Zhanna Bogdanovich

熱尼婭·戈洛夫尼亞，Zhenia Golovnia

熱尼婭·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

熱尼婭·葉萬古洛娃，Zhenia Yevangulova

瑞貝卡·高根，Rebekka Kogan

S

P

帕夫利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

帕夫林·維諾格拉多夫大街，Pavlin Vinogradov

帕維爾·布拉特，Pavel Bulat

帕維爾·德羅茲多夫，Pavel Drozdov

帕維爾·索洛緬，Pavel Solomein

帕維爾·維滕貝格，Pavel Vittenburg

佩列杰爾基諾，Peredelkino

佩斯托沃鎮，Pestovo town

普爾科沃天文臺，Pulkovo Observatory

普霍韋齊地區，Pukhovichi region

普里盧茨基修道院，Prilutsky Monastery

普列切斯坦卡大街，Prechistenka

普羅科菲耶夫，Prokofiev

普羅尼亞·科利賓，Pronia Kolibin

普日寧，Puzhinin

普什季諾鎮，Pushkino

普斯科夫，Pskov

Q

奇姆肯特，Chimkent

契卡（政治警察），Cheka

喬爾莫茲鎮，Chermoz

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

切爾登鎮，Cherdyn

切爾卡地區，Chelkar

切爾卡瑟，Cherkassy

切爾克斯克城，Cherkessk

切爾尼戈夫地區，Chernigov

切勒姆霍沃，Cheremkhovo

薩拉·貝爾施泰爾，Sara Bershtel

薩拉托夫，Saratov

薩沙·科濟列夫，Sasha Kozyrev

薩佐諾夫，Sazonov

塞米巴拉金斯克城，Semipalatinsk

塞繆爾·拉斯金，Samuil Laskin

塞瓦斯托波爾港，Sevastopol

三亞舅舅，Uncle Sanya

沙德林斯克鎮，Shadrinsk

沙爾鐵，Shaltyr

沙姆蘇瓦利·塔吉羅夫，Shamsuvali Tagirov

沙圖拉鎮，Shatura

上烏拉爾斯克城，Verkhneuralsk

神智學者，theosophist

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

什基德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hkid

什克洛夫鎮，Shklov

史蒂芬妮，Stephanie

斯大林斯克（庫茲涅茨克），Stalinsk

斯蒂芬·惠特克羅夫特，Stephen Wheatcroft

斯捷潘·波德魯布尼，Stepan Podlubny

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

斯捷潘·左羅賓，Stepan Zlobin

斯拉瓦·布舒耶夫，Slava Bushuev

斯列堅斯卡婭街，Sretenskaia Street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斯莫爾尼學院，Smolny Institute

斯內吉列夫，Snegirev

斯帕索―葉菲梅耶夫修道院，Spaso-Yefimeyev Monastery

斯塔夫羅波爾地區，Stavropol region

斯坦尼斯拉夫·布德克維奇，Stanislav Budkevich

斯坦尼斯拉夫·弗蘭采維奇，Stanislav Frantsevich

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Stanislav Kosior

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Stanislav Redens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

斯托爾波沃鎮，Stolpovo，

斯韋特蘭娜·布龍施泰因，Svetlana Bronshtein

斯韋特蘭娜·格列比翁希科娃，Svetlana Grebenshchikova

斯韋特蘭娜·赫列斯托娃，Svetlana Khlystova

斯韋特蘭娜·切爾卡索娃，Svetlana Cherkesova

斯韋特蘭娜·斯比特涅娃，Svetlana Sbitneva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斯維爾德洛夫廳，Sverdlov Hall

蘇哈勒夫卡市場，Sukharevka market

蘇赫貝茲沃德尼勞改營，Sukhobezvodny

蘇呼米，Sukhumi

蘇克孫地區，Suksun region

蘇梅地區，Sumy region

蘇茲達爾鎮，Suzdal

所羅門·米霍埃爾斯，Solomon Mikhoels

索爾，Saul

索菲亞·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Sofia Antonov-Ovseyenko

索菲亞·奧克蘭德，Sofia Oklander

索菲亞·奧熱姆伯羅斯卡婭，Sofia Ozemblovskaia

索菲亞·卡拉加諾夫，Sofia Karaganov

索菲亞·斯米多維奇，Sofia Smidovich

索科爾尼基，Sokolniki

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

索羅金，Sorokin

索洛韋茨基勞改營，Solovetsky labour camp

索尼婭·德利巴什，Sonia Delibash

索尼婭·拉斯金娜，Sonia Laskina

索尼婭·塞繆羅夫娜，Sonia Samuilovna

索茲河，Sozh River

坦克格勒（車里雅賓斯克），Tankograd

湯妮雅（安東尼娜），Tonya

唐納德·溫徹斯特，Donald Winchester

桃莉（達麗婭），Dolly

特奧多爾·沙寧，Teodor Shanin

特蘭斯瑪西科技公司，Transmashtekh

特里凡·特瓦爾多夫斯基，Trifon Tvardovsky

特列茲·維拉格，Terez Virag

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

特羅菲姆·莫羅佐夫，Trofim Morozov

特韋爾斯卡婭大街，Tverskaia Street

特維爾大街，Tver Boulevard

特維爾省，Tver province

天王星行動，Operation Uranus

鐵木辛哥，Marshal Timoshenko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Tukhachevsky

圖拉，Tula

托爾馬喬夫，V. N.　Tolmachyov

托爾欽斯基，Torchinsky

托利亞，Tolia

托洛茨基，Trotsky

托姆斯基，Tomsky

托木斯克勞改營，Tomsk labour camp

托斯卡納，Tuscany

W

T

塔蒂亞娜·奧庫涅夫斯卡婭，Tatiana Okunevskaia

塔蒂亞娜·波洛茲（米亞赫科娃），Tatiana Poloz（Miagkova）

塔蒂亞娜·科西諾娃，Tatiana Kosinova

塔蒂亞娜·克魯格洛夫，Tatiana Kruglov

塔蒂亞娜·洛博娃，Tatiana Lobova

塔蒂亞娜·莫爾加切娃，Tatiana Morgacheva

塔蒂亞娜·葉拉金娜，Tatiana Elagina

塔爾圖大學，Tartu（Iurev） University

塔爾希斯，Tarshis

塔夫達鎮，Tavda

塔甘羅格，Taganrog

塔吉娜·勒沃夫娜，Tatiana Lvovna

塔林，Tallin

塔瑪拉·特魯比娜，Tamara Trubina

塔瑪拉·伊萬諾娃，Tamara Ivanova

塔尼婭，Tania

塔什干，Tashkent

塔什塔戈爾鎮，Tashtagol

泰舍特勞改營，Taishet labour camp

坦波夫，Tambov

瓦爾達伊地區，Valdai region

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

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

瓦爾瓦拉·布德克維奇，Varvara Budkevich

瓦赫坦·米赫拉茲，Vakhtang Mikheladze

瓦萊里·福雷德，Valerii Frid

瓦萊里·戈洛法斯特，Valerii Golofast

瓦萊里·契卡洛夫，Valerii Chkalov

瓦莉奇卡（瓦倫蒂娜），Valichka

瓦留西卡（瓦萊里婭），Valeriia

瓦倫蒂娜·季哈諾娃，Valentina Tikhanova

瓦倫蒂娜·克魯波特娜，Valentina Kropotina

瓦倫蒂娜·瓦西列夫娜，Valentina Vasilevna

瓦倫蒂娜·謝羅娃，Valentina Serova

瓦倫丁·波圖帕契克，Valentin Portugalov

瓦倫丁·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ev

瓦倫丁·穆拉夫斯基，Valentin Muravsky

瓦圖丁，Vatutin

瓦西爾·貝卡烏，Vasil Bykau

瓦西里·阿克肖諾夫，Vasily Aksyonov

瓦西里·波洛維克，Vasily Polovyk

瓦西里·布柳赫爾，V. K. Bliukher

瓦西里·杜達列夫，Vasily Dudarev

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

瓦西里·卡里亞金，Vasily Kariakin

瓦西里·羅馬什金，Vasily Romashkin

瓦西里娜·德米特魯克，Vasilina Dmitruk

瓦伊加奇島，Vaigach

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

韋爾日比茨基，N. K. Verzhbitsky

韋尼阿明，Veniamin

韋斯寧兄弟，Vesnin brothers

維爾格爾姆，Vilgelm

維佳舅舅，uncle Vitia

維捷布斯克，Vitebsk

維克多·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

維克托·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

維克托·丹尼洛夫，Viktor Danilov

維克托·弗多維琴科，Viktor Vdovichenko

維克托·諾根，Viktor Nogin

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維克托·葉羅費耶夫，Viktor Erofeev

維克托林婭·施韋策爾，Viktoriia Shweitser

維拉·奧爾洛娃，Vera Orlova

維拉·布拉金，Vera Bragin

維拉·布龍施泰因，Vera Bronshtein

維拉·杰美恩，Vera German

維拉·米諾蘇娃，Vera Minusova

維拉·帕諾娃，Vera Panova

維拉·皮羅茨科娃，Vera Pirozhkova

維拉·圖爾金娜，Vera Turkina

維拉·瓦西里佐娃，Vera Vasiltseva

維拉·葉利謝耶娃，Vera Yeliseyeva

維羅尼卡·涅夫斯卡婭，Veronika Nevskaia

維羅尼切卡（維羅尼卡），Veronichka

維丘加鎮，Vichuga

維薩里昂·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

維舍拉河，Vishera River

維什尼―沃洛察克鎮，Vyshnyi Volochek

維塔利·加爾馬什，Vitalii Garmash

維亞濟馬鎮，Viazma

維亞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Viacheslav Kondratiev

維亞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Viacheslav Kolobkov

維亞特卡勞改營，Viatka labour camp

文尼察地區，Vinnitsa

沃爾夫岡·萊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

沃爾卡，Vovka

沃爾庫塔，Vorkuta labour camps

沃利克·巴別茨基，Volik Babitsky

沃龍諾夫，Voronov

沃羅涅日，Voronezh

沃洛蒂亞·季阿科諾夫，Volodia Diakonov

沃洛格達，Vologda

烏博列維奇將軍，General Uborevich

烏拉爾，Urals

烏里揚諾夫斯克，Ulianovsk

烏日哥羅德，Uzhgorod

烏斯秋扎納鎮，Ustiuzhna

烏斯秋茲地區，Ustiuzh

烏索勒鎮，Usole

烏伊阿爾鎮，Uiar

烏茲達村， Uzda

X

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

西夫切夫―弗拉熱克大街，Sivtsev Vrazhek

西吉茲蒙德·列瓦涅夫斯基，

Sigizmund Levanevsky

西馬，Sima

西蒙·文德，Simon Winder

西尼洛夫，K. R. Sinilov

西耶塔·莉莉娜，Zlata Lilina

西佐夫，Sizov

錫安黨，Zionist

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

下塔吉爾鎮，Nizhny Tagil

鄉間別墅，dacha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小土星行動，Operation Little Saturn

肖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

謝爾蓋·巴里諾夫，Sergei Barinov

謝爾蓋·德羅茲多夫，Sergei Drozdov

謝爾蓋·古謝夫，Sergei Gusev

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

謝爾蓋·克魯格洛夫，Sergei Kruglov

謝爾蓋·莫羅佐夫，Sergei Morozov

謝爾蓋·瓦維洛夫，Sergei Vavilov

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o Ordzhonikidze

謝爾科夫，Serkov

謝拉菲瑪，Serafima

謝廖扎·法捷耶夫，Seryozha Fadeyev

謝列梅捷夫伯爵，Sheremetev

謝米昂·基爾薩諾夫，Semyon Kirsanov

謝苗·菲林，Semyon Firin

謝苗·戈洛夫科，Semyon Golovko

謝苗·格魯津科，Semyon Gudzenko

謝斯得羅列茨克城，Sestroretsk

辛菲羅波爾，Simferopol

新切爾卡斯克城，Novocherkassk

新西布科夫，Novozybkov

修羅，Shura

Y

雅可夫·埃廷格爾，Iakov Etinger

雅可夫·德拉布金，Iakov Drabkin

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Iakov Sverdlov

雅羅斯拉夫·斯梅利亞科夫，Iaroslav Smeliakov

雅羅斯拉夫爾城，Iaroslavl

雅洛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sek

亞基爾將軍，General Iakir

亞歷山大·阿夫爾諾戈諾夫，Aleksandr Afinogenov

亞歷山大·阿夫杰延科，Aleksandr Avdeyenko

亞歷山大·巴爾米訥，Alexandre Barmine

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薩加茨基， Aleksandr Pavlovich Sagatsky

亞歷山大·別茲梅斯基，Aleksandr Bezymensky

亞歷山大·博爾切戈夫斯基，Aleksandr Borshchagovsky

亞歷山大·達尼埃茨，Aleksandr Daniets

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

亞歷山大·多爾根，Alexander Dolgun

亞歷山大·多夫任科，Aleksandr Dovzhenko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Aleksandr Fadeyev

亞歷山大·季哈諾夫，Aleksandr Tikhanov

亞歷山大·濟蒂諾夫，Aleksandr Eidinov

亞歷山大·杰格佳廖夫，Aleksandr Degtiarev

亞歷山大·卡爾帕特寧，Aleksandr Karpetnin

亞歷山大·卡利赫，Aleksandr Kalykh

亞歷山大·康斯坦丁諾夫，Aleksandr Konstantinov

亞歷山大·科爾涅伊奇克，Aleksandr Korneichuk

亞歷山大·科薩爾耶夫，Aleksandr Kosaryov

亞歷山大·克里維斯基， Aleksandr Krivitsky

亞歷山大·利伯曼，Aleksandr Liberman

亞歷山大·羅德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

亞歷山大·馬里安， Aleksandr Marian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y

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

亞歷山大·圖爾金，Aleksandr Turkin

亞歷山大·韋斯，Aleksandr Werth

亞歷山大·維辛斯基，Aleksandr Vyshinsky

亞歷山大·沃茲涅先斯基，Aleksandr Voznesensky

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Aleksandr Shcherbakov

亞歷山大·葉菲姆夫，Aleksandr Yefimov

亞歷山大·伊萬尼謝夫，Aleksandr Ivanishev

亞歷山大·約西列維奇，Aleksandr Iosilevich

亞歷山德拉·奧博連斯卡婭，Aleksandra Obolenskaia

亞歷山德拉·法伊韋索維奇，Aleksandra Faivisovich

亞歷山德拉·菲利普娃，Aleksandra Fillipova

亞歷山德拉·拉斯金娜，Aleksandra Laskina

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ksandra Sokolovskaia

亞歷山德拉·扎哈羅夫娜·格拉西姆丘克，Aleksandra Zakharovna Gerasimchuk

亞速海，Azov Sea

亞速鎮，Azov

揚松，N. M. Ianson

葉菲米婭，Yefimia

葉夫多基婭·戈洛溫娜，Yevdokiia Golovina

葉夫根尼·波波夫，Yevgeny Popov

葉夫根尼·波波夫金，Yevgeny Popovkin

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Yevgeny Dolmatovsky

葉夫根尼·列別捷夫，Yevgeny Lebedev

葉夫根尼·洛吉諾夫，Yevgeny Loginov

葉夫根尼·馬姆林，Yevgeny Mamlin

葉夫根尼·米赫拉茲，Yevgeny Mikheladze

葉夫根尼·扎米亞京，Yevgeny Zamiatin

葉夫根尼婭（熱尼婭）·葉萬古洛娃，Yevgeniia Yevangulova

葉夫根尼婭·金茲伯格，Yevgeniia Ginzburg

葉夫根尼婭·拉斯金娜，Yevgeniia Laskina

葉夫根尼婭·施特恩，Yevgeniia Shtern

葉夫根尼婭·瓦西列娃，Yevgeniia Vasileva

葉夫根尼婭·維滕貝格，Yevgeniia Vittenburg

葉戈爾卡，Egorka

葉戈羅夫元帥， Marshal Yegorov

葉卡捷琳娜·奧列茨卡婭，Yekaterina Olitskaia

葉克舍爾村，Yekshur

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Elizaveta Drabkina

葉麗薩維塔·德利巴什，Elizaveta Delibash

葉麗薩維塔·帕里佩琴科，Elizaveta Perepechenko

葉麗薩維塔·切奇克，Elizaveta Chechik

葉麗薩維塔·伊萬諾娃，Elizaveta Ivanova

葉利謝耶夫店，Yeliseyev store

葉莫奇卡，Emmochka

葉若夫，Yezhov

葉娃，Yeva

伊爾貝伊地區，Irbei

伊爾庫茨克，Irkutsk

伊爾瑪·奧斯特羅夫斯卡婭，Irina Ostrovskaia

伊凡·蒲寧，Ivan Bunin

伊戈爾·皮亞特尼茨基，Igor Piatnitsky

伊戈爾·切爾諾烏索夫，Igor Chernoutsan

伊格納蒂·馬克西莫夫，Ignatii Maksimov

伊拉伊達·法伊韋索維奇，Iraida Faivisovich

伊里奇廣場，Ilich Square

伊利亞·愛倫堡，Ilia Ehrenburg

伊利亞·法伊韋索維奇，Ilia Faivisovich

伊利亞·斯拉溫，Ilia Slavin

伊林（宗教節日），Ilin

伊琳卡，Ilinka

伊琳娜·奧斯特羅夫斯卡婭，Irina Ostrovskaia

伊琳娜·杜達列娃，Irina Dudareva

伊琳娜·菲利格，Irina Flige

伊琳娜·米庫耶娃，Irina Mikueva

伊琳娜·舍博夫―涅費多維奇，Irina Shcherbov-Nefedovich

伊琳娜·舍爾巴科娃，Irina Sherbakova

伊琳娜·亞歷山德羅娃，Irina Aleksandrova

伊納薩·布拉特，Inessa Bulat

伊娜·蓋斯特，Inna Gaister

伊娜·希赫耶娃，Inna Shikheyeva

伊若拉機器制造廠，Izhora machine-building plant

伊薩克·巴貝爾，Isaak Babel

伊薩克·斯拉溫，Isaak Slavin

伊萬·波圖帕契克，Ivan Potupchik

伊萬·布拉金，Ivan Bragin

伊萬·戈洛溫，Ivan Golovin

伊萬·柯察金，Ivan Korchagin

伊萬·拉達琴科，Ivan Radchenko

伊萬·利哈喬夫，Ivan likhachyov

伊萬·馬利金，Ivan Malygin

伊萬·米安契恩，Ivan Miachin

伊萬·斯米爾諾夫，Ivan Smirnov

伊萬·索伯列夫，Ivan Sobolev

伊萬·烏戈列茨基赫，Ivan Uglitskikh

伊萬諾沃城，Ivanovo

依達·斯拉溫娜，Ida Slavina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易卜拉欣·伊茲梅爾―扎德，Ibragim Izmail-zade

因塔勞改營，Inta camp

尤里·丹尼爾，Iulii Daniel

尤里·敦斯基，Iurii Dunsky

尤里·杰美恩，Iurii German

尤里·皮亞特科夫，Iurii Piatakov

尤里·施塔克爾貝格，Iurii Shtakelberg

尤里·斯特雷勒茲基，Iurii Streletsky

尤納·莫里茨，Iunna Morits

尤佐夫斯基，Iuzovsky

遠北建設托拉斯，Dalstroi（Far Northern Construction Trust）

約翰·奧特曼，Iogann Altman

約翰·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

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Marshal Jozef Pilsudski約瑟夫·布羅德斯基，Iosif Brodsky

約瑟夫·戈爾登施泰因，Iosif Goldenshtein

約瑟夫·利伯曼，Iosif Liberman

約瑟夫·維金斯基，Iosif Voitinsky Z

扎爾金特，A. B. Zalkind

扎戈爾斯克城，Zagorsk

扎戈列村，Zagore

扎哈利·德利巴什，Zakharii Delibash

柵欄區/法定猶太區，Pale of Settlement

詹妮弗·戴維斯，Jennifer Davis

張鼎，Ding Zhang

中央監察委員會，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中央文學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

重工業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Heavy Industry

朱莉婭·奈曼，Julia Neiman

朱莉婭·皮亞特尼茨卡婭，Julia Piatnitskaia

朱莉婭·莎拉波娃，Julia Sharapova

朱莉婭·沃爾科娃，Julia Volkova

卓婭·阿爾謝季耶娃，Zoia Arsenteva

卓婭·季莫菲耶娃（濟濟卡），Zoia Timofeyeva（Zizika）

茲韋尼戈羅德卡鎮，Zvenigorodka

祖博夫廣場，Zubov Square

祖耶夫卡鎮，Zuevka

做秀公審，show trial

